Public Disclosure Authorized
Public Disclosure Authorized
Public Disclosure Authorized
Public Disclosure Authorized

73068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



世界银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世界发展报告 2013

就业

世界银行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3：Jobs
Copyright © 2012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ISBN：978-0-8213-9575-2
ISSN：0163-5085
eISBN：978-0-8213-9576-9
DOI：10.1596/978-0-8213-95750-2

This Wor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World Bank in English as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3：JOBS in 2012.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arrang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ies，the original language will govern.
This volume is a product of the staff of the World Bank. The findings，interpretations，and conclusions expressed herein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World Bank or the governments they represent. The World Bank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the data included in this work. The boundaries，colors，denominations，and other information shown on any map in this work do not imply any judgment on the part of the World Bank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any territory or the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of such boundaries.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就业
2012 年，版权所有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地址：1818H Street，NW，Washington，DC 20433，USA

本书原版由世界银行以英文出版，书名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就业》。中文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中文版与英文版在内容上如有任何差异，以英文版内容为准。
本书是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成果，其中的看法未必反映执行董事会或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观点。世界银行不保证本书数据准确无误，并对任何人引用其中的观点和数据所引起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本书所附地图的疆界、颜色、名称和其他资料，并不表示世界银行的任何部门对任何地区的法律地位的看法，也不意味着对这些疆界的认可或接受。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2013-5960

权利和许可
本书的材料具有版权。未经许可，复印和（或）转载本作品的全部或部分材料可能违反有关法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鼓励传播其作品，通常可以迅速准许有关复印和转载的请求。如要求复印或重印本作品，请填妥资料送交版权许可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Inc.），地址：222 Rosewood Drive，Danvers，MA 01923，USA；电话：978-750-8400；传真：978-750-4470；网址：http：//www. copyright. com。任何其他关于版权和许可证的询问，包括各项附属权利，请寄往世界银行版权部（Office of the Publisher，The World Bank）。地址：1818H Street，NW，Washington，DC 20433，USA；传真：202-522-2422；E-mail：pubrights@ worldbank. org。

封面设计：WILL KEMP 世界银行
内页设计：DEBRA NAYLOR

世界发展报告 2013



就业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将就业在发展进程中的中心地位作为出发点，对我们看待职业的旧有观念提出了挑战并加以重新构建。通过采取跨领域和多学科的方式，本报告探究了为什么有些职业对发展的贡献比其他职业大，报告发现能带来最大发展效益的是那些能使城市更好地运行、将经济体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保护环境、培养信任和促进公民参与，或者减少贫困的职业。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就业/世界银行著；胡光宇，赵冰译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书名原文：World development report：JOBS and development
ISBN 978-7-302-33657-0

Ⅰ. ①2…　Ⅱ. ①世… ②胡… ③赵…　Ⅲ. ①就业问题–研究报告–世界–2013　Ⅳ. ①D5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8644 号

责任编辑：周　菁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 tup. com. cn，http：//www. wqbook. 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 tup. tsinghua. edu. 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 tup. tsinghua. edu. cn
印 刷 者：
装 订 者：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202mm × 266mm　　**印　　张**：25. 25　　**字　　数**：518 千字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9 月第1 次印刷
印　　数：1 ~ 0 000
定　　价：00. 00 元

产品编号：

目　　录

前言　Ⅸ
中文版序言　Ⅺ
译校出版与致谢　ⅩⅥ
致谢　ⅩⅦ
缩略语和数据注释　ⅩⅨ

概述：让就业成为中心议题　2
需要的工作　3
通过就业实现发展　9
评价工作的价值　15
就业议程各不相同……但彼此相关　18
透过就业的镜头看政策　22
就业是中心议题，但数字在哪里？　34
问题　传统智慧在什么情况下是正确的？　36
注释　39
参考文献　41

第 1 章　就业挑战　48
工作并不总是带来薪水的就业　49
青年膨胀，老龄化社会和移民国家　51
城市、工资和女性　52
就业正在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发生变化　54
繁荣，但是收入分布也在发生变化　58
私营领域的作用　58
全球层面的脆弱性　60
问题 1　什么是工作？　63
注释　67
参考文献　68

第一部分　就业的变迁性　74

第 2 章　就业与生活水平　76
就业改善物质福祉　76

工作不仅仅是收入 82
工作和生活满意度 84
问题 2 增长战略还是就业战略？ 87
注释 91
参考文献 92

第 3 章 就业与生产率 98
就业波动，而非无工作的增长 98
大多数工作分布在非常小的农场和公司中 104
农场中不平衡的技术进步 107
公司中平平者居多，领头羊鲜见 108
问题 3 企业家能力可以培养吗？ 114
注释 119
参考文献 121

第 4 章 就业和社会凝聚力 126
就业有助于管理社会紧张局势 127
就业（或就业匮乏）能够塑造社会互动 134
问题 4 政策可以提高社会凝聚力吗？ 140
注释 145
参考文献 146

第二部分 什么是对发展有利的好工作？ 152

第 5 章 评估工作的价值 154
以权利为基础 155
就业对个体和社会的价值 158
工作的溢出效应 159
就业对发展的贡献可以量化吗？ 162
问题 5 技能或就业，二者谁应当排在第一位？ 174
注释 179
参考文献 182

第 6 章 多样化的就业议程 190
农业经济体 191
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 193
城市化经济体 197
资源丰富型国家 199
小岛国家 203
青年失业率很高的国家 206
经济体的规范化 210

老龄化社会 213
问题 6 选择目标的投资环境 217
注释 222
参考文献 224

第 7 章 相互联系的就业议程 232
工人的移民 232
工作的流动 237
问题 7 为就业而竞争吗？ 243
注释 248
参考文献 249

第三部分 透过就业的镜头看政策 256

第 8 章 重新审视劳工政策 258
劳动管制：“平台”效应 260
集体代表：话语权的新形式 263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在限制中实现效率 267
社会保险：扩大覆盖面的挑战 272
问题 8 保护工人还是保护就业？ 277
注释 281
参考文献 284

第 9 章 劳工政策之外的政策问题 292
构建基本要素体系 293
制定就业政策优先事项 298
多元化的就业议程，多元化的政策重点 301
相互联系的就业议程：就业领域的全球合作 305
就业是中心议题，但是数字在哪里？ 311
问题 9 如何加速劳动力的再分配？ 313
注释 318
参考文献 320

附录 328

术语汇编 329

文献注释 332

背景文件和注释 334

部分指标 337

专栏

专栏 1 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是怎样增加的？ 30
专栏 1.1 工作和休闲的性质随着城市的扩展而变化 53
专栏 1.2 就业为女性带来了收入机会，但也带来了新的困难 54
专栏 1.3 发展中国家临时工中介业在发展 57
专栏 1.4 危机响应超越了对失业人口的收入支持措施 62
专栏 1.5 对非正规领域进行统计的国家很少 64
专栏 1.6 并不是所有儿童的劳动都属于童工 66
专栏 2.1 生活水平包括很多方面，测量生活水平的方法也有很多种 77
专栏 2.2 大多数贫穷人口都有工作 80
专栏 2.3 通过享乐定价法量化工作属性的价值 83
专栏 2.4 工作可能带来健康和安全风险 84
专栏 2.5 增长和就业的关系不是机械不变的 88
专栏 2.6 韩国从增长走向就业战略，新加坡则反其道而行 90
专栏 3.1 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有哪些？ 99
专栏 3.2 大多数就业岗位创造和就业岗位破坏是微型企业引起的 106
专栏 3.3 大多数微型企业分布在农村地区，从事商业活动 110
专栏 3.4 孟加拉国服装业繁荣的原因是什么？ 117
专栏 4.1 什么是社会凝聚力？ 128
专栏 4.2 工作能产生信任吗？对欧洲晴雨表和拉丁美洲晴雨表调查的分析 132
专栏 4.3 流离失所和失业可能破坏信任和关系 133
专栏 4.4 哥伦比亚莉萨拉尔达（Risaralda）地区的就业、动机和认同 134
专栏 4.5 话语权可以延伸到自就业领域：以自就业女性协会（SEWA）为例 135
专栏 4.6 一些工作使人们超越民族界线建立联系 136
专栏 4.7 测量获得工作机会的不平等程度 138
专栏 4.8 家政人员：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之旅 141
专栏 4.9 柬埔寨服装业：从书面上的法律到执行中的法律 142
专栏 4.10 在冲突后环境中，精心设计的计划会减缓社会紧张局势 143
专栏 5.1 儿童在马里的作坊式金矿从事危险性的工作 155
专栏 5.2 遵守核心劳动标准只完成了部分工作 157
专栏 5.3 体面工作概念和体面工作议程 158
专栏 5.4 经济学和社会学在不同的名称下研究工作的溢出效应 160
专栏 5.5 可用于量化就业对发展贡献的几种数据来源 163
专栏 5.6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绿色工作的国际定义可能是狭隘的 170
专栏 5.7 技能是如何形成的，技能又如何得到测量 175
专栏 5.8 人力资源规划让位于活跃的技能发展 177
专栏 6.1 农业国家埃塞俄比亚可以在制造业中竞争吗？ 194
专栏 6.2 冲突可以增加女性的劳动力参与 194
专栏 6.3 在南苏丹，解决就业问题迫在眉睫 195
专栏 6.4 对孟加拉国的发展持悲观态度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是却被证明是错误的 197
专栏 6.5 孟加拉国的企业家是地方性的 198
专栏 6.6 土地所有者公司可以在扩散财富的同时建设能力 203
专栏 6.7 在墨西哥，关于如何减少不规范性的争论处于白热化状态 212
专栏 6.8 在乌克兰，移民和持续下降的生育率进一步加剧了老龄化的影响 216
专栏 6.9 围绕工业政策的辩论再一次白热化 218
专栏 6.10 需要谨慎解释企业调查结果 219
专栏 6.11 特殊经济区的表现参差不一 221
专栏 7.1 跨国公司缘何选择了它们的经营所在地？ 240
专栏 7.2 联系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规模仍然不大 240
专栏 7.3 全球化常常被视为工作流向国外 244
专栏 8.1 就业保障立法不仅仅包括解雇规则 260

专栏 8.2 磋商委员会是造成南非失业问题的原因吗？ 265
专栏 8.3 集体磋商的新形式正在中国兴起 266
专栏 8.4 废品回收者迫使波哥大改革固体垃圾管理政策 267
专栏 8.5 就业 E—联系，新技术开辟新疆域 268
专栏 8.6 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启动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 271
专栏 8.7 现代技术可以减少社会保障的成本、漏损和腐败 276
专栏 8.8 短时工政策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新世界 280
专栏 9.1 如何增加女性的劳动力参与？ 300
专栏 9.2 世界上存在成功应对就业挑战的典范 302
专栏 9.3 改善经营时间，促进遵守劳动标准 307
专栏 9.4 就业与发展的知识缺口确定了研究议程 312
专栏 9.5 中国部分放宽了户籍制度 315

图

图 1 工作并不总能带来工资收入 5
图 2 对青年人来说，问题并非总是失业 6
图 3 中国的就业增长由私营部门引领 8
图 4 就业具有转化作用 8
图 5 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工作能提供更多的收入和福利 9
图 6 就业对极端贫困的下降贡献颇大 10
图 7 就业增长和消减同时出现是所有经济体的特点 11
图 8 公司规模越大，支付的工资越高 12
图 9 发展中国家微型企业提供的就业占比更大 13
图 10 失业或没有具有激励作用的工作的人较少参与社会 14
图 11 对于想要的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作看法是不同的 16
图 12 有些工作对发展的贡献更大 17
图 13 工作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可能不同 17
图 14 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不是在所有地方都一样 20
图 15 制造业工作岗位已经从高收入国家迁出 22
图 16 需要分三个不同层次的政策 23
图 17 资金和电力属于正规私营企业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之列 24
图 18 将工作与培训结合起来能提高项目的成功率 27
图 19 协助确定重点政策的树形图 28
图 20 哪些国家成功地应对了就业挑战？实行了哪些政策？ 32
图 1.1 工作并不总能带来收入 50
图 1.2 失业并不总是青年人面临的问题 51
图 1.3 增加就业岗位，应对人口增长 52
图 1.4 从农村流向城市并不总能促进经济增长 53
图 1.5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不高 55
图 1.6 技能组合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改变 56
图 1.7 随着国家的增长，就业会提供更高的收入和利益 57
图 1.8 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正在迎头赶上 59
图 1.9 教育回报在比较贫穷的国家较高 60
图 1.10 私营领域引领中国的就业增长 60
图 1.11 在发展中国家，危机对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就业的影响 61
图 1.12 大多数国家已经批准了核心劳动标准 65
图 2.1 工作时间因年龄而异 78
图 2.2 女性用于不直接产生收入的活动的时间更多 79
图 2.3 工作是家庭收入最重要的来源 80
图 2.4 工作使家庭脱贫，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样 81
图 2.5 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极端贫穷的降低 82
图 2.6 和收入相比，工人常常更看重工作安全 85
图 2.7 农民和失业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 86
图 3.1 从中期来看，经济增长并不以牺牲就业为代价 99
图 3.2 就业创造和破坏的同时发生是所有经济体的特征 100
图 3.3 劳动力的部门间再分配是东亚地区生产率增长的动力之一 101
图 3.4 公司层面的效率收益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 102

图 3.5 效率收益和就业增长可以并行不悖 103
图 3.6 小农农业是拉丁美洲以外其他地区农业经营的主导形式 104
图 3.7 微型企业的就业比例在发展中国家较高 105
图 3.8 不同地区的谷物产量差异很大 107
图 3.9 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生产率差量比较大 108
图 3.10 和小公司相比，大公司的绩效较好，工资水平也较高 109
图 3.11 和旧有的公司相比，新公司涉足创新性活动的可能性更大 109
图 3.12 和葡萄牙相比，加纳存活的公司起步规模较大，增长较小 111
图 3.13 印度和墨西哥的大多数公司增长停滞 112
图 3.14 一些自就业者具有成为成功企业家的潜质 115
图 3.15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管理分数差异很大 116
图 4.1 信任和公民参与与和平集体决策并行不悖 129
图 4.2 失业人口信任度和参与度较低 130
图 4.3 那些具有激励性的工作促使人们更多地信任他者，更多地参与社会 131
图 4.4 在印度尼西亚，拥有工作的人会更多地参与社区活动 132
图 4.5 就业机会不平等因国家而异 139
图 5.1 喜欢的工作有别于最重要的工作 159
图 5.2 某些工作对发展更有利 160
图 5.3 工作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可能相异 162
图 5.4 一些收入差异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另一些收入差异则不会 165
图 5.5 刚果共和国女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比例的增加提高了用于食物的开支 166
图 5.6 谁获得工作会对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的减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66
图 5.7 中国台湾地区的集聚效应因工业领域而异 167
图 5.8 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知识外溢效应提高了国内生产率 168
图 5.9 每位工人的高排放量可以与每份产出的低排量并行不悖 169
图 5.10 毗邻服装厂促使孟加拉国年轻女孩入校就读的人数增加 171
图 5.11 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提供社会认同、网络关系和公平感 172
图 5.12 很大一部分就业机会不平等是性别和父亲的教育程度引起的 173
图 5.13 和其他限制因素相比较，技能已经成为经营中更严重的限制因素 175
图 6.1 如果没有绿色革命，农业经济体的贫困率将居高不下 192
图 6.2 在受到冲突危害的国家中，不稳定和基础设施薄弱是严重阻碍企业经营的因素 196
图 6.3 小岛国家的地理位置远离经济中心 204
图 6.4 移民对小岛国家至关重要，对太平洋的岛国而言更是如此 205
图 6.5 某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非常高 207
图 6.6 在突尼斯，教育程度较高并不带来较好的就业 208
图 6.7 劳动法规可能不是实现规范化的最大障碍 211
图 6.8 如果特定年龄参与率保持不变，劳动力的规模将缩小 214
图 6.9 为避免生活水平的降低，就不得不增加劳动生产率 215
图 6.10 对企业限制因素的评估因企业而异 220
图 7.1 制造业工作已经流出了高收入国家 238
图 7.2 全球制造业工作的数量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239
图 7.3 促进就业的政策可能伤害也可能不伤害其他国家 247
图 8.1 劳工政策和制度的组合因国家而异 259
图 8.2 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谈判覆盖率不高 264
图 8.3 将工作和培训联合起来的方法提高了成功率 269
图 8.4 在罗马尼亚，公共工程项目的安置率最低，安置成本最高 272
图 8.5 不同国家的劳动税和社会缴费在面临不同就业挑战的国家中也不同 275
图 8.6 工人愿意为获得健康保险和退休金而放弃部分收入 275
图 8.7 美国经济衰退期间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之间的分离是大规模的 278
图 9.1 政策需要分成相互区别的三层 293
图 9.2 金融和电力是正规私营企业面临的顶级限制因素 295

图 9.3 法治与发展相关 297
图 9.4 决策树可能有助于制定政策优先事项 299
图 9.5 智利降低了对矿产品出口的依存度 304
图 9.6 斯洛文尼亚的青年失业率下降了 305
图 9.7 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提议一般是稳健的 309
图 9.8 印度制造业企业的分布存在“中等规模企业消失”的问题吗？ 314
图 9.9 出口加工区是斯里兰卡外国直接投资的推动力量 316
图 9.10 户口转变的限制随着城市规模和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317

地图

地图 1 只有部分国家移民在其人口中占很大比例 21
地图 3.1 韩国的制造业活动正在向主要城市中心的边缘地区扩展 102
地图 7.1 只有一些国家的移民在人口中的比例较大 233
地图 7.2 许多移民具有高技能 235
地图 8.1 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险覆盖率持续不高 274

表

表 3.1 墨西哥小公司很少实现增长 113
表 6.1 开采业项目是资本密集型的，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 200
表 6.2 资源丰富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跻身世界物价最高的城市之列 201
表 8.1 出现了新一波的关于就业保障立法影响的实证证据 261
表 8.2 最低工资的影响是劳动经济学所热衷的研究课题 262

关于封面



差不多每种语言中都有与就业相关的一系列词汇，每个词强调一个不同的角度。有些词暗示了所从事活动的性质，使人联想起需要的技能或专业知识。其他的词则专指用于生产的人类投入，给人以努力的形象并表达出一种体力付出的感觉。还有一些词只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数有关，这类词更容易与合计数字相关。在其他情况下，事关利害的似乎是合同关系，这种关系涉及多种义务和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在一些语言中，甚至有词汇专门指明人工作的场所，或至少指明生产过程的一个片段。词汇的这种多样性清楚地表明了工作的多面性，也说明就业无法用一个措词来描述或用一个指标来衡量。

与就业有关的词汇不是总能很恰当地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因为在每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范围可能并不相同。如果说语言形成了思维的话，有时人们提及就业的方式似乎是互相冲突的。分歧可能源于不同社会所强调的就业的特点不同，这也说明不同的国家就业议程可能不同。

在许多语言中，与就业有关的词不仅用作一般名词，还用作专有名词。有史以来，姓氏就和某些具体的技能或行业有着联系，比如：印地语中的 Vankar，日语中的 Hattori，西班牙语中的 Herrero，祖鲁语中的 Mfundisi，而这仅仅是其中几个例子。将与就业有关的词用来指明家庭则说明人们已将自己与自己从事的工作联系起来。如今，人们渴望以能激发自己的兴趣和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为依据来选择自己的工作。几乎每种语言也都有几个词用来表达缺乏工作的状态。而这些词几乎无一例外都有负面含义，其意义与“被剥夺”十分接近，有时它们甚至带有一种耻辱的成分。所有这些说明，语言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即：工作不仅仅意味着人们的收入，或者他们的职业，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们的身份。

前　言

今天，就业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全球决策者、商界和数十亿努力奋斗以求养家糊口的男人和女人无不心系于斯。

在世界努力摆脱全球危机的当下，大约有 2 亿人——包括 7 500 万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人——没有工作，更有千百万的人，其中多数是女性被完全排斥在劳动力队伍之外。展望未来，今后 15 年中需要新增 6 亿个就业岗位来消化迅速增长的就业年龄人口，这些就业岗位主要应该在亚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有将近一半的从业人员从事小规模农业或个体经营，这些工作通常不能带来稳定的收入和福利。对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贫困人群来说，问题不是缺少工作或者工作时间太短；许多人其实拥有不止一份工作而且工作时间很长。然而，太多的时候，他们的收入不足以保障他们自己和他们孩子的未来，有时他们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工作，而且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

就业有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现。除了对个人的福祉至关重要之外，它们还是许多更广泛的社会目标，比如：减贫、整个经济体范围内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社会凝聚力的核心。就业带来的发展效益包括获得技能、赋予女性权利和稳定冲突后的社会。能够为实现这些更广泛的目标作出贡献的工作不仅对拥有这些工作的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有价值的：这些工作就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将就业在发展进程中的中心地位作为出发点，对我们看待职业的旧有观念提出了挑战并加以重新构建。通过采取跨领域和多学科的方式，本报告探究了为什么有些职业对发展的贡献比其他职业大，报告发现能带来最大发展效益的是那些能使城市更好地运行、将经济体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保护环境、培养信任和促进公民参与，或者减少贫困的职业。关键是，这些职业不仅存在于正规部门，根据各国的国情，非正规职业也能发挥转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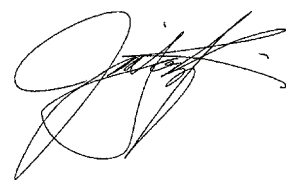
基于这样的框架，本报告触及了决策者们目前提出的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国家设计发展战略应该围绕增长还是应该专注于就业？会不会有应将关注焦点放在保护就业机会而不是保护就业者上的情况？发展过程中哪一个应该优先——创造就业机会还是培养技能？

私营部门是创造就业的重要发动机，在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就业中占 90%。但是，通过确保适当的环境，使私营部门能够引领强劲的增长，同时减少阻碍私营部门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制约因素，政府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报告提出了一种分三阶段入手的方式来帮助各国政府实现上述目标。第一，政策的基本原则——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有利营商环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依法治理——对增长和创造就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第二，设计良好的劳动力政策有助于确保增长能转化为就业机会，但这些政策必须通过在创造就业方面采取着眼点不限于劳动力市场的更开阔的方式来补充。第三，各国政府应该从战略上确定哪些就业在它们特定的国情下会对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并消除或抵消阻碍私营部门创造更多这种工作机会的障碍。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体中，工作正在快速地演变。人口变动、技术进步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在重新塑造着世界各国的就业状况。那些成功适应这些变化，并应对就业挑战的国家就能够实现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而那些没能做到这点的国家，就会错过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转化效应。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对我们了解就业在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其中的见解将成为世界银行集团的宝贵指南，指导我们与合作伙伴和客户合作以提出它们的就业议程。通过合作，我们能够促进就业机会的创造并使就业的发展效益最大化。



世界银行集团
行长
金墉

中文版序言

胡鞍钢

就业是民生之本。[①]它始终是世界发展的核心任务和重大挑战。

如何破解这一全球性难题呢？各国政府又如何为世界各国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使他们有安全的、生产性的、健康的以及对环境友好的工作？这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试错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的过程。

一、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性就业挑战

世界银行专题研究报告至少有两次关注过就业问题。第一次是世界银行《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一体化世界中的劳动者》（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该报告重点探讨在不断一体化世界中，劳动者获得的收入、面临的风险及工作的环境。当时全球的劳动力有 25 亿，几乎是 1965 年劳动力数量（13.3 亿）的两倍。其中低收入组占 58%，中等收入组占 27%，高收入组比重已从 1965 年的 21%降至 1995 年的 15%。这三个不同收入组的就业结构差异甚大，以农业为例，低收入组近 3/5（中国为 52.2%）、中等收入组为 1/5、高收入组仅有 3%的劳动力从事与农业相关工作。以就业类型比重看，低收入组约有 15%的劳动力在正规经济部门（中国为 22%），中等收入组比重为 1/3，高收入组的约 3.5 亿以上的就业者几乎都在支付工资的非农业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工作。

该报告分析了三种发展道路及其不同结果：一种是以东亚以及最近的中国为代表，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导致工人及自我就业者收入迅速增长，农村劳动力迅速流入工业和服务业等具有较高生产率的行业之中。第二种是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南亚为代表，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推行内向型的发展道路，保护某些产业，轻视农业的发展。第三种类型是以欧洲和中亚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为代表，它们脱离国际市场，也脱离国内经济现实；工资停滞、短缺、服务业部门落后、工业污染严重。报告指出，在这三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后两种道路不可避免地走入了“死胡同”。报告主张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增长道路，通过开放贸易和吸引资本，有效利用经济一体化，建立一个劳动力政策框架等等。

该报告还对 21 世纪作了预测，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全球性方案：一是悲观主义方案，即低增长的趋异方案；另一种是乐观主义方案，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同方案。报告预测，中国和印度逐渐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根据这两种不同方案预测，1994—2010 年期间， OECD 国家人均 GDP 年平均增长率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 年 11 月 8 日。

达到 2.3%，实际结果是 1.57%；中国人均 GDP 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3%和 3.9%，[①]这与中国的实际结果 9.1%相差甚远。[②]不过，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发展预测的低估也不只是这一次。

二、21 世纪初期全球性就业挑战

从那时起，经济全球化在加速，出口贸易占全球 GDP 比重几乎翻了一番，从 15%达到 30%，明显地超过当时世界银行乐观主义方案预测。但是全球性就业问题不仅不乐观，还越来越突出，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头号挑战。不过，从总体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看是悲观主义、“坏消息”，从局部，特别是中国看，则是乐观主义、“好消息”。但是“坏消息”还是多于“好消息”。

2013 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就业》，再次分析了全球性就业挑战。全球失业人数已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1 亿多人攀升至目前的 2 亿人，其中有 7 500 万青年（在 25 岁以下）人口失业，还有 6.2 亿青年人口既不工作也不学习。在全球就业者中，正规就业者（指从事有工资或薪水的雇佣工作）为 16 亿，非正规就业者（指从事农业或自我雇佣工作）为 15 亿，此外，还有 1.15 亿儿童在危险环境下工作。展望未来，今后 15 年（到 2028 年）全球还需要新增就业岗位 6 亿个，才能满足新增适龄年龄劳动人口就业需求。

不过该报告并没有说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也成了全球性失业的“重灾区”：2013 年上半年，欧元区失业率高达 12.1%，其中希腊高达 27.6%，西班牙高达 26.3%，美国为 7.4%，[③]而且青年人口失业率相当于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左右。

与此相反，中国在应对失业、创造就业岗位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也曾面临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失业挑战。在城镇，仅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累计下岗分流人员就超过 5 000 万人。国家“十五”计划首次提出：“五年城镇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达到 4 00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左右。”实际结果五年城镇新增就业 4 20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2%；国家“十一五”规划再次提出：“五年城镇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达到 4 50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左右。”实际结果五年城镇新增就业 5 771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1%；国家“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提出：“五年城镇新增就业 4 50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小于 5%。”2011—2012 年的实际结果，两年城镇新增就业 2 487 万人，相当于两年预期指标的 138%，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1%；过去十二年（2001—2012），城镇新增就业累计数为 12 458 万人，中国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就业岗位。从国际视角看，如果不是中国创造了这么大规模的新增就业，全球失业人数就不是两亿，而可能是三亿。

中国不仅创造了大规模的新增就业岗位，最重要的是进一步优化了就业结构，使不同就业者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转向中劳动生产率部门，从中劳动生产

① 世界银行：《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一体化世界中的劳动者》，中文版，120 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②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3）》，24 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③ The Economist, August 24TH–30TH , pp.72

率部门转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2001—2011 年，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由 50.0:22.3:27.7 调整为 34.8:29.5:35.7，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 15.2 个百分点，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上升 7.2 和 8.0 个百分点。

三、为何截然不同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 1/5，由于中国劳动力人口参与率，特别是女性就业参与率相当高，因此中国劳动力人口（包括就业人口、现役军人和失业人口）一直占世界总劳动力的 1/4。无论是从劳动力人口总规模看还是从总人口就业比率看，中国最大的发展难题就是创造就业，中国最优先的发展战略就是“就业优先”战略。①

中国政府对于就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1997 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为了“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出“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对此报告还专门做了说明：“从根本上说，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要求“广大职工要转变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努力适应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②仅 1998 年，全国国有、城镇集体职工总数就减少了 2 874 万人，③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员下岗。

当时也曾发生一场政策辩论：是增长优先还是就业优先？是国企改革优先还是建立社会保障体制优先？是经济效率优先还是社会公平优先？不过，随着社会矛盾冲突、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劳动争议爆炸性增长，决策者开始从注重增长优先转向就业优先。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国家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④

世界银行的报告总结了各国的实践，包括成功的也包括失败的，其中也介绍了中国在发展私营经济，创造就业的实践，称之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典型”。报告介绍道：“1981 年，中国在私营企业就业的工人为 230 万，而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工人则高达 8 000 万。二十年后，中国在私营企业就业的工人达到 7 470 万，第一次超过了国有企业就业的工人数量，此时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工人数量为 7 460 万。”事实上，中国创造就业的不止是私营企业，还包括大量的个体工商户。城镇个体工商户就业人员从 2001 年的 2 131 万人到 2011 年提高至 5 227 万人，净增加 3 096 万人。⑤此外还有大量未被统计的就业人员，主要包括进城务工人员。

世界银行报告根据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制度实力、资源禀赋、人口规模或结构等，划分了七种类型的国家及其就业挑战。根据发展水平划分农业国家、城市化国家和正规化国家；根据地理在内的自然禀赋，划分为资源丰富国家、

---

①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胡鞍钢执笔：《就业与发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年。

②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的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 年 9 月 12 日。

③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8 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年。

④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 年 11 月 8 日。

⑤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2）》，127 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年。

小岛国、受冲击影响的国家；根据人口及某些特殊人群的特殊环境，划分为青年人口失业率高的国家、老龄化国家。由于国家不同，就业挑战类型不同，就业议程也各不相同。针对以上七种类型国家或地区，报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框架，这包括什么是好工作，有哪些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不同类型国家是怎样成功地应对了就业挑战，实行了哪些政策？怎样区分不同的政策？基本原则是什么？劳工政策是什么？重点政策又是什么？有哪些优先事项？上述分类有助于启发并指导不同类型国家的应对策略。报告也基于大量的国家案例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介绍。

对中国而言，各地发展水平差异甚大，自然资源禀赋和区域优势不同，人口规模和结构也不相同。因此在国家总的就业战略和就业政策指导下，各地都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出了三个重要指标：一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二是农业转移劳动力，三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些指标均属于预期性指标，作为政府期望的发展目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政府是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引导社会资源配置，这包括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健全人力资源市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仅 2008 年至 2012 年，各级政府累计投入的就业专项资金为 1 973 亿元，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 2 800 万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830 万人[①]。通过不断实践，逐步创新了创造就业机制，即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三者相结合的机制。中国的实践表明，上述“中国政策”是积极就业的政策，也是创造就业的政策，不仅是有效的，而且还是成功的。

中国的就业战略和政策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从扩大就业规模到提高就业质量阶段。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报告还首次将鼓励创业纳入就业方针，并强调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同时，“健全面向所有困难民众的就业援助长效制度，完善就业与社会保障的联动机制，促进体面劳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②]

四、创造就业的外溢性与社会价值

世界银行报告详细论述了就业所带来明显的、又是难以计算的社会价值，既包括产生的个体价值，还包括远高于个人价值的溢出效应。一些人有了工作，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又为其他人提供工作需求，这叫做“就业创造就业”正循环或正反馈：就业—收入—消费—服务—就业。如果能够为特别是为那些穷人或贫困人口提供工作岗位，包括非正规、非正式的工作岗位，就能减少贫困。如果能够为青年人提供工作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在社会立足，就增加了社会公平感，也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预期。如果能够为女性提供工作机会，就有助于性别平等，有助于家庭和睦。如果城镇能够为外来人口或农村人口提供工作机会，就有助于他们尽快融入陌生的社区和社会，扩大了人际网络和发展空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越是创造就业机会的社区、地区或国家就越有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2013 年 5 月，http://www.gov.cn/zwgk/2013-05/14/content_2402180.htm

② 胡锦涛：《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词》，2010 年 9 月 16 日，新华网，2010 年 9 月 17 日。

可能减少贫困，增加个人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社会公平性不断改善，包括性别公平、城乡公平、区域公平。显然，个人所获得的工作机会不仅体现在个人的价值之中，还产生了远高于个人价值的溢出效应，从而形成社会价值。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劳动力规模巨大的国家，无论是个人价值还是社会价值都是超大规模的。从 2001—2012 年，全国就业人员从 7.28 亿上升为 7.67 亿，年平均增长率为 0.48%；其中农业就业人员从 3.64 亿减少至 2.58 亿，年平均增长率为–3.1%，非农业就业人员从 3.64 亿提高至 5.09 亿，年平均增长率为 3.1%。很显然，中国创造就业机会主要是在那些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产业，即使是在农业部门，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 7.3%，明显地高于同期农业增加值 4.2%，这意味着中国减少农业劳动力明显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从 2004 年之后，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人均生产总值差距（用差异系数表示）持续缩小，从 2004 年的 0.71 缩小至 2012 年的 0.46，2009 年之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距明显缩小，2001 年两者分别为 38.2%和 47.7%，相差 9.5 个百分点，2012 年分别为 36.2%和 39.3%，相差 3.1 个百分点，而且，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进入富裕阶段，即恩格尔系数小于 40%。中国保持了较高的女性就业参与率，2011 年全国城乡妇女就业人数达到 35 153 万，[①]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比重的 46.8%，女性总人口就业率为 54.5%，[②]这可能是世界最高的女性总人口就业率，也显示了性别公平核心是就业公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世界性难题，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问题。”[③]从未来趋势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预测，今后 15 年全球还需要创造 6 亿个新增工作岗位，这显示了世界各国面临的就业挑战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世界各国都需要坚持“就业是民生之本”的核心理念，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扩大就业、创造就业、提高就业质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在发展中就业，在就业中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城乡一体化、创新驱动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作为不断创造就业的过程，努力实现全社会就业更加充分的目标。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2013 年 5 月，http://www.gov.cn/zwgk/2013–05/14/content_2402180.htm

② 系笔者根据《2013 中国统计摘要》（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年）与《2012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 年 5 月）中数据计算得出。

③ 习近平：《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问题　把蛋糕做大 》，2013 年 05 月 14 日，中国新闻社。

译校出版与致谢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就业》是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出版社经过 5 个月的共同努力合作完成的。本书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胡光宇博士与清华大学出版社签约并负责译校工作。

本书翻译工作由胡鞍钢教授主持，是继世界银行 2004 年《中国国家经济备忘录 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2005 年世界发展报告：改善投资环境 促使人人受益》《2006 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2007 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下一代》《2008 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2010 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2011 年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与发展》《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等著作之后又一重要的学术翻译成果。

在本书的译校工作中赵冰、陈若愚等做了大量工作。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校人员为本书的如期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致　谢

本报告由 Martín Rama 以及 Kathleen Beegle 和 Jesko Hentschel 领导的团队编写。团队的其他核心成员有：Gordon Betcherman、Samuel Freije-Rodriquez、李悦、Claudio E.Montenegro、Keijiro Otsuka 和 Dena Ringold。团队还包括研究分析员：Tomas Bowen、Virgilio Galdo、Jimena Luna、Cathrine Machingauta、Daniel Palazov、Anca Bogdana Rusu、Junko Sekine 和 Alexander Skinner。Mehtabul Azam、Nadia Selim 和 Faiyaz Talukdar 则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支持。Mary Hallward-Driemeier、Roland Michelitsch 和 Patti Petesch 一直以来的参与也使本团队获益匪浅。

本报告由发展经济学部（DEC）和人类发展部（HDN）共同发起。前主管发展经济学部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主管发展经济学部的代理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Martin Ravallion 和主管人类发展部的副行长 Tamar Manuelyan-Atinc 为本报告的编写提供了总体指导。发展政策局局长 Asli Demirgüç-Kunt 以及社会保障和劳工局局长 Arup Banerji 对整个编写过程进行了监督。

在编写过程中，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行长金墉、常务副行长 Caroline Anstey 和 Mahmoud Mohieldin 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意见。各位执行董事及执行董事办公室通过举行多种会议和研讨会也建设性地参与了报告的编写。

由 George Akerlof、Ernest Aryeetey、Ragui Assaad、Ela Bhatt、蔡昉、John Haltiwanger、Ravi Kanbur、Gordana Matkovi 和 Ricardo Paes de Barros 组成的专家顾问组在报告编写的整个过程中贡献了大量的分析数据及反馈。

七个国家的案例研究给本报告的编写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信息。针对孟加拉的案例研究由 Binayak Sen 以及 Mahabub Hossain 和 Yasuyuki Sawada 领导。Nelly Agu-ilera、Angel Calderon Madrid、Mercedes Gonzalez de la Rocha、Gabriel Martinez、Eduardo Rodriguez-Oreggia 和 Hector Villarreal 参与了墨西哥的案例研究。Finn Tarp 与 Channing Arndt、Antonio Cruz、Sam Jones 和 Fausto Mafambisse 一起领导了对莫桑比克的研究。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研究由 Colin Filer 和 Marjorie Andrew 负责协调。Lual Deng 和 Nada Eissa 一起领导了对南苏丹的研究。突尼斯方面的工作由 AbdelRahmen El Lahga 协调，参与的人员有 Ines Bouassida、Mohamed Ali Marouani、Ben Ayed Mouelhi Rim、Abdelwahab Ben Hafaiedh 和 Fathi Elachhab。最后，对乌克兰的研究是由 Olga Kupets、Svitlana Babenko 和 Volodymyr Vakhitov 进行的。

本团队还想感谢为报告的编写提供了慷慨支持的政府或组织：以挪威外交部为代表的挪威政府、多方捐赠者支持的“知识带来改变计划”（Knowledge for Change Program，KCP Ⅱ）、北欧信托基金（Nordic Trust Fund）、丹麦外交部

为代表的丹麦政府、瑞士国家经济事务秘书处（SECO）、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以瑞典外交部为代表的瑞典政府、以日本政策与人力资源发展基金（PHRD）项目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另外，德国经济与发展合作部通过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组织了一个发展论坛，使来自世界各国的重要研究人员汇集柏林。

国家案例研究还得到了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AID）、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以丹麦外交部为代表的丹麦政府、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UNU-WIDER）的慷慨支持。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通过组织讲座和研讨会也为本团队提供了帮助。

特别感谢国际劳工组织（ILO）始终与本团队保持沟通。编写过程中的沟通由 Jose Manuel Salazar-Xirinachs 和 Duncan Campbell 负责协调，还有许多国际劳工组织的同仁参与其中。与我们共同举办机构间咨询活动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与国际工会联盟（ITUC）持续的对话也使本团队受益匪浅。

在孟加拉、加拿大、中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莫桑比克、挪威、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加坡、瑞典、瑞士、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和英国进行了国别咨询。所有咨询都有政府高级官员参与，多数咨询有学者、商业界代表、工会领导人以及民间团体的成员参与。此外，还与澳大利亚、荷兰、南非和西班牙的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了双边会议。

对研究人员和学者的咨询工作得到了肯尼亚的非洲经济研究协会（AERC）、埃及的经济研究论坛（Economic Research Forum）、智利的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协会（LACEA）的帮助。劳动力研究所（IZA）利用其在德国和土耳其的研究网络组织了专门的研讨会，由 Klaus Zimmerman 负责这些研讨会的协调工作。挪威的 Forskningsstiftelsen Fafo 承担了在四个国家进行的一项家庭调查，本报告利用了调查的结果。

Bronagh Murphy、Mihaela Stangu 和 Cecile Wodon 负责报告的制作和后勤保障，Quyên Thúy Dinh 也为此作出了贡献。Ivar Cederholm 负责协调资源的调动。Irina Sergeeva 和 Sonia Joseph 则负责资源的管理。Martha Gottron、Bruce Ross-Larsen、Gerry Quinn 和 Robert Zimmermann 参与了报告的编辑。在 Johan Mistiaen 的协调下，发展数据组为报告的编写提供了统计数据。

出版局负责协调了本报告的印刷和电子两个版本的设计、排版、印刷和分发。另外还要对 Mary Fisk、Stephen McGroarty、Santiago Pombo-Bejarano、NancyLammers、Stephen Pazdan、Denise Bergeron、Andres Meneses、Theresa Cooke、Shana Wagger、Jose De Buerba 和 Mario Trubiano，以及翻译部门的 Cecile Jannotin 和 Bouchra Belfqih 表示特别的感谢。

本团队还对发挥了协调作用的 Vivian Hon 和 Claudia Sepúlveda、为通信工作提供了指导的 Merrell Tuck-Primdahl、在网络方面提供了支持的 Vamsee Krishna Kanchi 和 Swati P.Mishra 帮助编辑制作了与本报告相关的系列电影的 Gerry Herman 以及提供了 IT 支持的 Gytis Kanchas、Nacer Mohamed Megherbi 和 Jean-Pierre S.Djomalieu 表示衷心的感谢。

还有许多世界银行内部和外部的人士通过评论和各种投入也为报告作出了贡献，文献注释里列出了他们的名字。

缩略语和数据注释

缩略语

ADB：亚洲发展银行
ALMP：积极就业计划
BAR：波哥大回收协会（Bogotá Association of Recyclers）
BPO：业务流程外包
CAFTA：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
CASEN：智利国家社会经济特征普查
CIRAD：农业发展研究国际合作中心
CFA：自由结社委员会
COSATU：南非工会大会
CSR：企业社会责任
ECLAC：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OSOC：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
EMBRAPA：巴西农业研究院
EPL：就业保障立法
EPZ：出口加工区
EU：欧盟
FAO：联合国粮农组织
FAFO：Fafo 研究基金会
FDI：外国直接投资
FACB：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
GDP：国内生产总值
GNP：国民生产总值
HOI：人类机会指数
I2D2：国际收入分布数据库
IC：工业委员会
ICLS：国际劳工统计会议
ICTWSS：工会、工资确定、国家干预和社会契约的制度特征
IDA：工业争端法（印度）
IDRC：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EA：国际能源署
IFC：国际金融公司
IFPRI：国际粮食政策研究院

ILO：国际劳工组织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SSP：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IT：信息技术
IZA：劳工研究院
KILM：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指标
KUT：韩国技术教育大学
MDG：千年发展目标
MERCOSUR：南美洲南锥共同市场
MFA：多种纤维协定
MGNREGA：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
MIS：信息管理体系
NASSCOM：软件服务公司国家协会
NEET：不处于教育、就业或培训中
NGO：非政府组织
ODI：海外发展研究所
OECD：经合组织
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PP：购买力平价
R&D：研发
SEWA：自就业女性协会
SEZ：经济特区
SME：中小企业
SNA：国民账户体系
SOE：国有企业
TEWA：工人就业合同终止法
TFP：全要素生产率
TVE：技术和职业教育
UN：联合国
UNDP：联合国发展署
UNECE：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P：联合国环境署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WDR：世界发展报告
WTO：世界贸易组织
WIEGO：女性在非正规就业中：全球化与组织化

数据注释

本报告中国家一词系其经济含义，并不代表世界银行对某块领土的法律或其他地位的看法。“发展中国家”一词系指中低收入经济体，为方便起见，也可能包括那些从中央计划经济体转型的经济体。除非另有说明，美元指现值美元。10 亿（billion）为 1 000 百万，1 万亿（trillion）为 1 000 个十亿。

让就业成为中心议题

就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事实上，发展是通过就业实现的。人们通过工作脱离贫穷和困苦，过上更好的生活。由于人们从事的工作越来越好，他们从农场进入公司，加上生产率较高的工作的产生和生产率较低的工作的消失，经济也随之增长。由于工作将不同种族和不同社会背景的人聚在一起，并养成了一种机会感，社会也随之变得繁荣。因此工作具有转变作用——它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收入、我们的职业，甚至我们的身份。

因此，就业无论在哪里都是发展议程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无论对决策者还是平民百姓、对商界领袖还是工会代表、对社会活动家还是专业学者而言都如此，也就不足为奇了。希望抓住大规模人口变动、技术创新、全球人口和工作的迁移以及工作性质的深刻变化带来的机会创造就业，决策者们提出了非常棘手的问题：

- 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是应该围绕增长，还是应该以就业为焦点？
- 企业家精神能培养吗？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微型企业中能培养吗？抑或企业家就是天生的？
- 虽然就业能对社会凝聚力有所帮助，但除了支持创造就业外，政府对此还能有所作为吗？
- 增加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是不是具备就业能力的前提条件？抑或技能可以在工作中培养起来？
- 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是否应该针对那些更具创造就业潜力的领域、活动或公司？
- 一个国家促进就业的政策可能会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就业为代价，这种风险有多大？
- 面临巨大打击和重大重组时，保护就业机会本身而不仅仅是保护就业者的政策是否可取？
- 如何能加速劳动者从生产率低的领域和活动流动到具有更高潜能的领域和活动？

个人看重就业是因为它能提供收入和福利，同时，就业有助于增加自尊和幸福感。但有些工作具有对社会更广泛的影响。女性就业可以改变家庭的支出方式和对孩子的教育和健康进行投入的方式。城市里的工作为加

深专业化程度和增加意见交流提供了支持，从而能提高其他工作的生产率。与全球市场相连的工作能为本国带来新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在动荡的环境中，为青年人提供工作可使他们在暴力之外有其他选择并有助于重建和平。

由于对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具有广泛的影响，工作对社会的价值甚至大于对个人的价值。但有些工作却会带来负面的溢出效应。由转移支付或特权支撑的工作机会给其他人造成负担或者会减少他们找到有酬工作的机会。损害环境的工作会让每个人都付出代价。因此，事实就是有些工作对发展贡献更大，而其他一些却鲜有帮助，即使它们对个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哪些工作具有最大的发展效益取决于环境。各国的发展程度、人口结构、资源禀赋和制度水平不同。农业社会面临的挑战是提高农业工作的生产率以及创造耕种以外的就业机会。资源丰富的国家需要使出口多样化，因此就业更多地与全球市场相连接而不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获得支持。正在逐步正规化的国家需要以扩大覆盖面，同时又不损害就业为目标设计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

绝大部分就业是由私营部门创造的，而政府能够支持或阻碍私营部门创造就业。可以通过就业实现发展的观点让人对政府能够实行的战略、政策和计划有了新的认识。战略应以一国的国情为依据，确定能带来最大发展效益的工作类型。政策应该消除阻碍私营部门创造就业的障碍。能产生就业的计划也是需要的，比如，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但是对这些政策和计划的成本和效益必须加以评估，把就业潜在的溢出效应——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考虑进来。

就更实际的层面而言，透过就业看发展，会导出一种分三级入手的政策模式：

- 基本原则。因为随着国家日益富有，就业会带来更高的收入和更广泛的社会效益，政策环境必须有助于增长。这就需要注重宏观经济的稳定、有利的商业环境、人力资本的累积和依法治理。
- 劳工政策。因为只有增长可能还不够，劳工政策需要有助于创造就业和增强就业带来的发展效益。政策可以在解决劳动力市场扭曲问题的同时不拖效率的后腿。但政策干预应避免造成扭曲，抑制城市和全球价值链中的就业，同时应为最脆弱的群体提供话语权和保护。
- 重点政策。因为某些就业对发展的贡献大于其他就业，所以有必要根据国情确定哪类就业能带来最大的发展效益，并消除——或者至少抵消——那些会导致几乎无法创造这类就业的市场缺陷和制度不足。

就业对于发展而言的中心地位不应被解释为劳工政策和制度的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有近一半的就业人口是农民和个体经营者，因此不在劳动力市场中。而且即使是在雇用就业的情况下，劳工政策和制度也未必是创造就业的主要障碍。多数情况下，影响最大的障碍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之外。促进创造就业的因素也许就是能使城市更好地运行、使农民得到并应用适当的农业技术或者允许公司开发新的出口产品的政策。就业是发展的基石，同时，发展政策对就业来说也是必要的。

需要的工作

对许多人而言，提到“工作”一词就会想到受雇于雇主的劳动者和一份按期支付的薪水。然而，在最贫穷

16 亿人从事有工资或薪水的雇佣工作

15 亿人就业于农业或自我雇佣

越南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为 77%

巴基斯坦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为 28%

39% 的智利制造业人员就业于微型企业

97% 的埃塞俄比亚制造业人员就业于微型企业

墨西哥 35 年间公司就业率增长至当初的 2 倍

美国 35 年间公司就业率增长至当初的 10 倍

1.15 亿儿童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

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多达 2100 万

为了使就业人口与就业年龄人口的比率保持在当前的水平，未来 15 年内需要新增工作岗位 6 亿

9000 万人在国外工作

2.48 亿青年人既不工作也不学习

印度制造业中处于第 90 百分位的公司与处于第 10 百分位的公司的生产率之比为 22 倍

美国制造业中处于第 90 百分位的公司与处于第 10 百分位的公司的生产率之比为 9 倍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每年新增劳动力 1000 万

中国每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 3000 万

全球移民占全球人口的 3%

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人口中外国出生的人所占的比例 60%

的国家，大部分劳动者不在雇主—雇员这个关系范畴内。全世界有超过 30 亿人工作，但他们的工作千差万别。大约 16.5 亿人接受雇用并定期得到工资或薪水。另外 15 亿人在农业或小型家庭企业中工作，或者从事临时或季节性日间劳动。与此同时，还有 2 亿人，其中多数是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并在积极寻找工作。有大约 20 亿处于就业年龄的成人，其中多数是女性，既没有工作也没有积极寻找工作，但其中还有数量不明的人非常希望有一份工作。因此，澄清工作的含义就成为一个有益的出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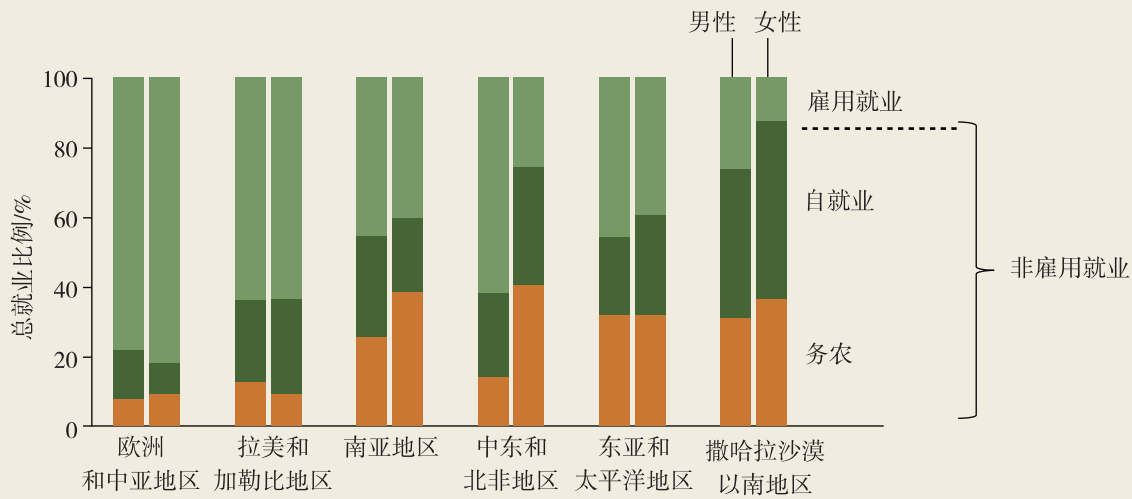
用以描述人们做什么来谋生的词汇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中意思各不相同。一些词指的是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的劳动者。其他一些词的含义更为广泛，包括了农民、城市中的个体商贩以及小孩和老人的看护者。这种区别不仅仅是语义上的，不同的意思还表明人们看重的工作的侧面不同，另外，对于工作是什么的看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对于就业政策应该如何的看法。

对于统计学家来说，“工作”就是“一个人为雇主或在自我雇用状态下已履行或要履行的一系列任务和职责[1]”。工作是由被雇用者完成的。对被雇用者的定义是：为市场或以自用为目的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人。但是，统计学上的定义却没有谈到什么不应被视为工作。国际规范将保证基本人权视为底线。其中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8 年）和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1998 年），则进一步规定了核心劳工标准。综合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看，工作就是能产生收入（货币或其他某种形式的）而不侵犯人权的活动。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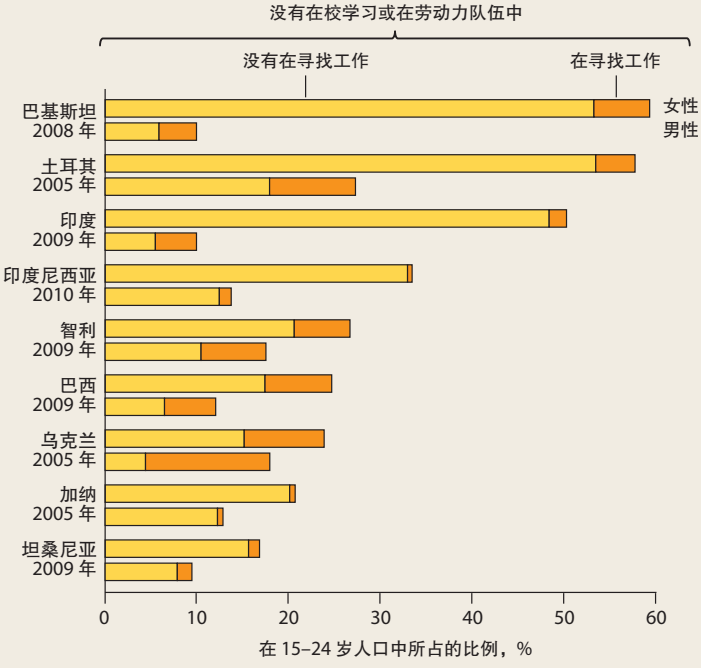
工作这个领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千差万别。这种多样性指的不仅是工作时间长短和就业机会的数量这些工业化国家常用的衡量尺度，还包括工作的性质。有两个主要方面引人注目。其一是自我雇用和农业的盛行[2]。另一个就是传统和现代生产模式的并存，既有自给农业和低技能工作，又有技术推动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以及高技能

图 1　工作并不总能带来工资收入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注释：数据为可获得的最近年份的数据。

图 2 *对青年人来说，问题并非总是失业*



资料来源：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团队。

以公司没有注册为依据，还是以不提供社会保障或者没有雇佣合同为依据。由于范围有限，或者由于刻意的逃避，非正式就业不受劳动法规的监管。不论采用哪种具体的定义，非正式通常与较低的生产率有关。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将工作正式化就能提高效率。非正式工作可以是较低生产率的结果，同样也可以是较低生产率的成因[4]。

不同性别和年龄之间的差别令人震惊。全球范围内，不到一半的女性有工作，相比之下男性就业的比例大约为五分之四。在巴基斯坦，只有 28% 的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而加入劳动力队伍的男性则超过了 82%。而在坦桑尼亚和越南，加入劳动力队伍的男性和女性比例均超过了 75%。除了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存在明显的反差以为，女性的收入也大大低于男性，这种差距不能完全用教育、经历，或者工作的行业来解释。尽管将多数时间用于上学和培训的 15 至 24 岁青年人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但一些国家青年人的失业状况却令人担心（自 2008 年初以来南非青年人的失业率已超过 40%，另外，2012 年初西班牙青年人的失业率超过了 50%）[5]。即使在失业率低的国家，青年人的失业率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甚至更高。除此之外，有 2.48 亿青年人处于“闲散”状态—既不上学或接受培训，也没就业，也不寻找工作。各国 15 至 24 岁青年人的闲散率不同，从 10% 到 50% 不等（图 2）[6]。许多青年人干的是没有报酬的工作；即使有报酬，他们拥有社会保险的可能性也较低[7]。

不断改变的工作领域

人口的大规模变化加剧了这种复杂局面。要保持就业人口在处于就业年龄人口中的比例不变，到 2020 年时大约应比 2005 年时新增 6 亿个工作机会，这些工作中的大多数应在亚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尽管一些国家经历了劳动力的巨大增长——中国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每年新增近 800 万名劳动力，而印度每年新增 700 万——其他国家则面临着人口的减少。例如，乌克兰的劳动力数量估计每年下降 16 万[8]。

迅速的城市化正在改变就业的构成。到 2020 年之前，预计超过一半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将生活中城镇中[9]。其结果就是：非农劳动力的增长将大大超过农业劳动力的增长。这种结构性转变，虽然在工业化国家花了数十年才实现，现在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改变着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结构性转变能大幅度提高效率，一些发展中国家迅速地缩小了与工业化国家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但其他国家则未能迎头赶上[10]。总的来说，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

迅速的城市化正在改变就业的构成。到 2020 年之前，预计超过一半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将生活在城镇中 [9]。其结果就是：非农劳动力的增长将大大超过农业劳动力的增长。这种结构性转变，虽然在工业化国家花了数十年才实现，现在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改变着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结构性转变能大幅度提高效率，一些发展中国家迅速地缩小了与工业化国家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但其他国家则未能迎头赶上 [10]。总的来说，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

全球化也在改变着工作的性质。在工业化国家，工作正在从初级和传统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行业转变 [11]。与此同时，技术的提高和向发展中国家外包业务导致中等技能的工作数量下降 [12]。生产任务被分割，使它们得以在不同的地方完成 [13]。跨国公司建立了一体化的价值链，以便利用全球各地的国家技能人才储备 [14]。外包不仅出现在服务业，还出现在制造业。1990 年至 2008 年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服务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将近增加了一倍，达到 21%[15]。

通过使它们进入更大的、甚至全球性的就业市场，技术在改变着劳动者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有些新市场通过互联网运作；其他一些则利用移动电话技术 [16]。兼职和临时雇用就业是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主要特点之一。在南非，临时就业代理机构雇用的劳动者约占劳动力的 7%；临时就业代理行业平均每天雇用 41 万名劳动力。在印度，临时就业代理机构雇用的临时劳动者数量 2009 年增加了 10% 以上，2010 年增加了 18%[17]。

全球生产格局的这种变化还带来了技能禀赋以及顶级人才全球分配的变化。作为外包中心在人们眼中所具有的吸引力方面中国和印度排名靠前，因为它们在技能人才储备方面获得的评分格外高 [18]。印度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近 2 000 万，接近了美国的水平；而这两个国家均被中国超越，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有 3 000 万 [19]。国际学生评价中得最高分的学生里美国学生依然占很大比例，但韩国学生所占的比例和德国相同，而俄罗斯联邦紧随这两国之后。仅在上海一地表现出色的学生数量就相当于整个德国的 1/5，大约是阿根廷的两倍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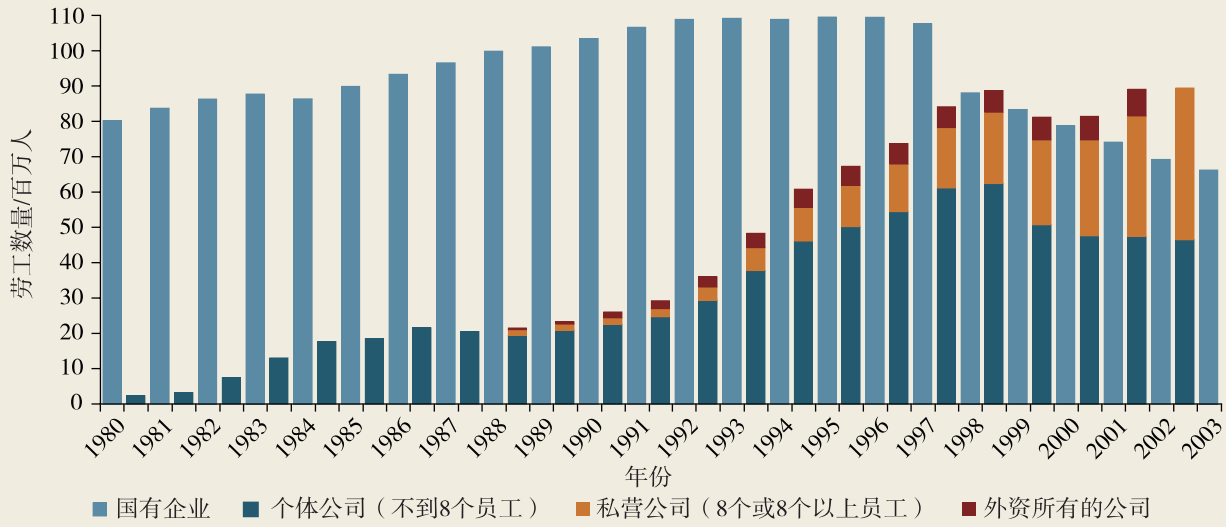
私营部门的作用

在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私营部门是创造就业的主要发动机和全球 90% 的工作来源。在 1995 年至 2005 年间，巴西创造的全部就业机会中私营部门占 90%。在菲律宾和土耳其，这一比例为 95%[21]。通过私营部门增长带来就业机会增加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1981 年，在私营部门就业的劳动者为 230 万，而在国营企业（SOE）工作的人为 8 000 万 [22]。20 年后，私营部门就业人数达到 7 470 万，首次超过国营企业就业人数（7 460 万）。

与全球平均水平不同，在中东和北非的一些国家，公共部门是最主要的雇主，这一模式可以说与独立后时期的政治经济有关，在某些情况下也与石油收入的充足有关 [23]。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共部门向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工作。但随着公共部门继续扩大就业的财政空间缩小，“排队”等待公共部门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导致出现非正规就业、学历证书贬值，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排斥 [24]。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劳动力依然无法就业，或者就业不足，并且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 [25]。

总的来说，各国在创造就业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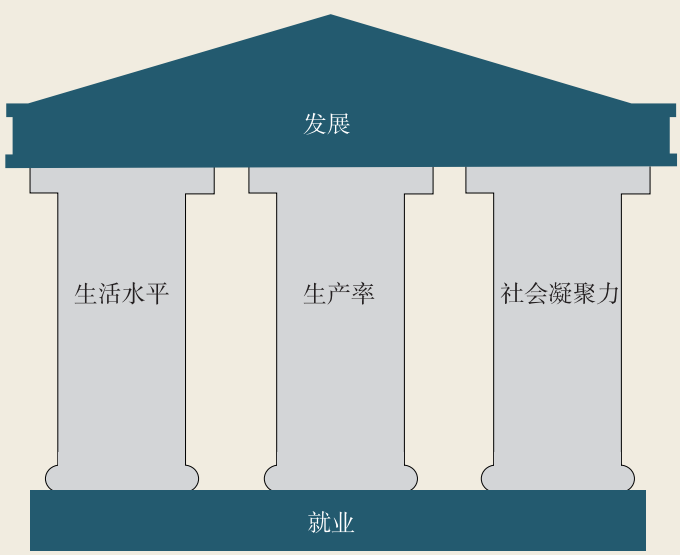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的就业增长由私营部门引领



资料来源：Kanamori 和赵 2004 年。
注释：没有 2002 年的外资所有的公司的数据和 2003 年的非国有企业的数据。

颇为成功。现在有工作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这些工作提供的收入总的来说也更高。的确，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转变，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已经有所削减。发展中国家每日生活费不到 1.25 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的人口比例从 1981 年 52% 下降到 2008 年的 22%，数量从 19.4 亿人降至 12.9 亿 [26]。这种下降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但新创造的数百万生产率更高的工作（大部分在亚洲，但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却是主要的推动力 [27]。

图 4 就业具有转化作用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就业极易受经济滑坡影响，而私营部门的就业比公共部门的就业更易受影响。短期危机就可以将数年的进步一举抹去。危机可能始于一个国家，但现在通过全球化，可以传播到整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最近的金融危机在一年内就造成 2 200 万新增失业人数。2008 年以前，总就业的增速徘徊在 1.8%左右，2009 年降至不到 0.5%，到 2011 年仍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 [28]。旨在防止和减轻危机影响的政策是各种措施的不同组合，它们对就业带来的影响可能多种多样 [29]。

人口变化、城市化、全球化，技术进步以及宏观经济危机会带来难以克服的就业挑战。未能很好应对这些挑战的国家可能陷入恶性循环：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并且就业问题造成的不满会影响相当一部分劳动力 [30]；青年人口的失业和闲散率可能居高不下，

女性得到的就业机会可能减少，使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收益得不到利用[31]；生活水平提高不大、生产率增长缓慢，以及社会凝聚力遭到侵蚀这一重复出现的模式会再次开始。相比之下，那些较好地应对了就业挑战的国家则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其结果——富裕的人口、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女性和青年人能得到更多的机会——可能会自我强化。

通过就业实现发展

就业不仅是能带来收入和福利这么简单。它们还能带来产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与社会中的其他人互动。通过这些成果，就业可以提升生活水平、提高生产率和培养社会凝聚力（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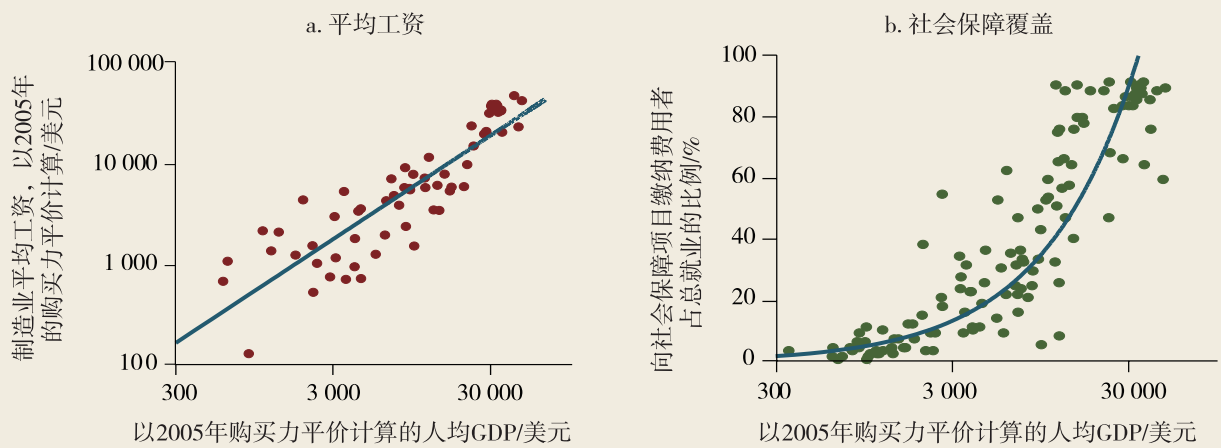
工作意味着我们的收入

工作是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对多数人来说，工作是收入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在最贫困的国家。许多家庭会因为家庭成员找到或失去工作而摆脱或陷入贫困。得到有报酬工作的机会（包括从事农业活动和处于自我雇用状态），为家庭提供了增加消费和减少消费变化的途径。农业产出提高、有机会从事农业以外的小规模活动、家庭成员移居到城市，以及转入雇用工作都是通向富裕之路上的里程碑[32]。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人的选择范围也得以扩大——家庭成员可以选择脱离劳动力队伍或者减少工作时间，并将更多时间用于教育、退休或家庭。

工作收入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同时，与工作有关的福利也随之改善。这种联系并非机械的，但增长无疑对就业是有益的（图 5）。诚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作者的平均技能会有所提高，这意味着对各国的观察无法进行精确的比较，因为这种观察没有以完全相同的工作者为参照。但增长也能使那些技能并未提高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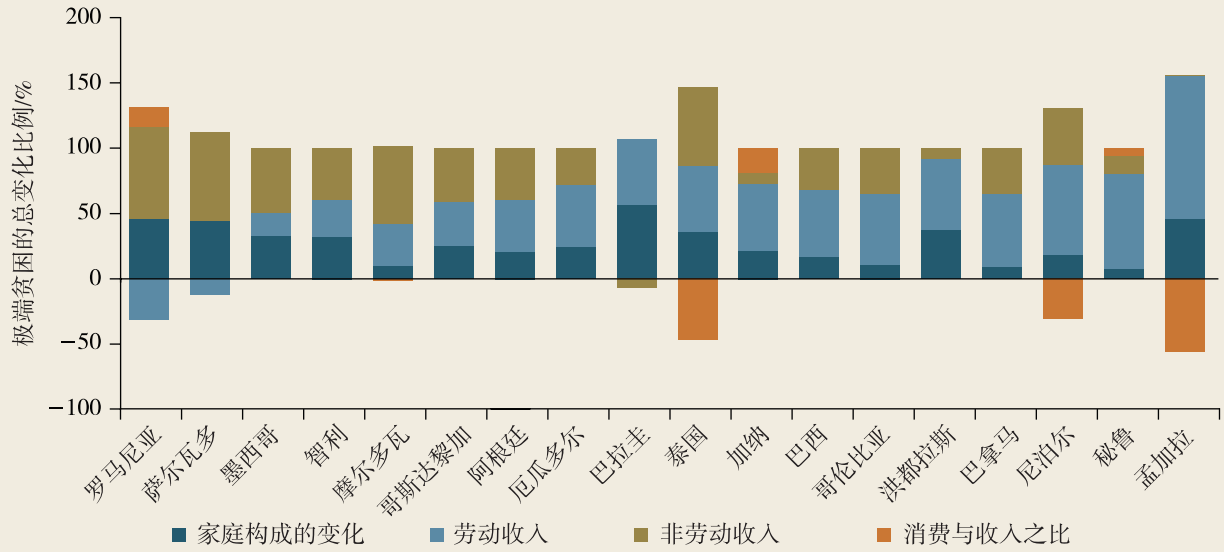
对贫困动态长达 20 多年，且涵盖了加拿大、厄瓜多尔、德国和南非等这样迥异的国家的研究表明，与劳动力相关的事件能促成摆脱贫困[33]。这些事件包括一家之长改换工作、家庭成员开始工作，和工作的家庭成员收

图 5　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工作能提供更多的收入和福利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注释：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

图 6 就业对极端贫困的下降贡献颇大



资料来源：Azevedo 等 2012 年；Inchauste 等 2012 年；均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

注释：家庭构成的变化表明成年人（18 岁以上，含 18 岁）在家庭内部所占比例的变化，而劳动收入则表明每个成年人就业和收入的变化。非劳动收入指其他来源的收入的变化，比如：转移支付、养老金、估算住房租金等。如果图中某条柱形在横轴下方，则意味着其他来源的收入加剧了而不是减轻了贫困。图中估算的变化发生的时段：阿根廷（2000—2010 年）；孟加拉（2000—2010 年）；巴西（2001—2009 年）；智利（2000—2009 年）；哥伦比亚（2002—2010 年）；哥斯达黎加（2000—2008 年）；厄瓜多尔（2003—2010 年）；萨尔瓦多（2000—2009 年）；加纳（1998—2005 年）；洪都拉斯（1999—2009 年）；墨西哥（2000—2010 年）；摩尔多瓦（2001—2010 年）；巴拿马（2001—2009 年）；巴拉圭（1999—2010 年）；秘鲁（2002—2010 年）；尼泊尔（1996—2003 年）；罗马尼亚（2001—2009 年）；以及泰国（2000—2009 年）。计算孟加拉、加纳、摩尔多瓦、尼泊尔、秘鲁、罗马尼亚和泰国的变化时，采用了基于消费的贫困衡量指标，而对其他国家变化的计算则采用了基于收入的指标。

入增加。反之，缺乏就业机会会削弱家庭提高自身福祉的能力[34]。对低收入国家的大量定性研究表明，得到工作和创办企业是人们摆脱贫困的两个主要原因[35]。定量分析则证实，劳动力收入的变化对减贫的贡献最大（图 6）。在拉美 16 国的 9 个国家中，减贫成果有一半以上是由于劳动收入变化带来的，而在另外 5 个国家，劳动收入对减贫的贡献超过 1/3。在孟加拉、秘鲁和泰国，教育、工作经历以及居住区域的改变对减贫有所影响，但这些特点带来的回报（包括劳动力收入）才最为重要。鉴于大多数人在不那么发达的经济体中工作，仅仅有工作还不够。在摆脱贫困方面能带来改变的是增加工作带来的收入[36]。

除了对收入的根本的、直接的贡献外，就业还会对个人福祉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包括精神和身体健康。没有工作会降低生活满意度，特别是在那些雇用工作是普遍现象的国家和那些缺乏机会会转化为公开的失业而不是就业不足的国家。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工作的物质、非物质，甚至主观特性都会对其福祉产生影响[37]。工作场所的安全、工作的稳定性、学习和晋升的机会，以及医疗和社会保障福利等其他特点也是劳动者看重的。但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这些优越性的工作相对较少。

工作意味着我们的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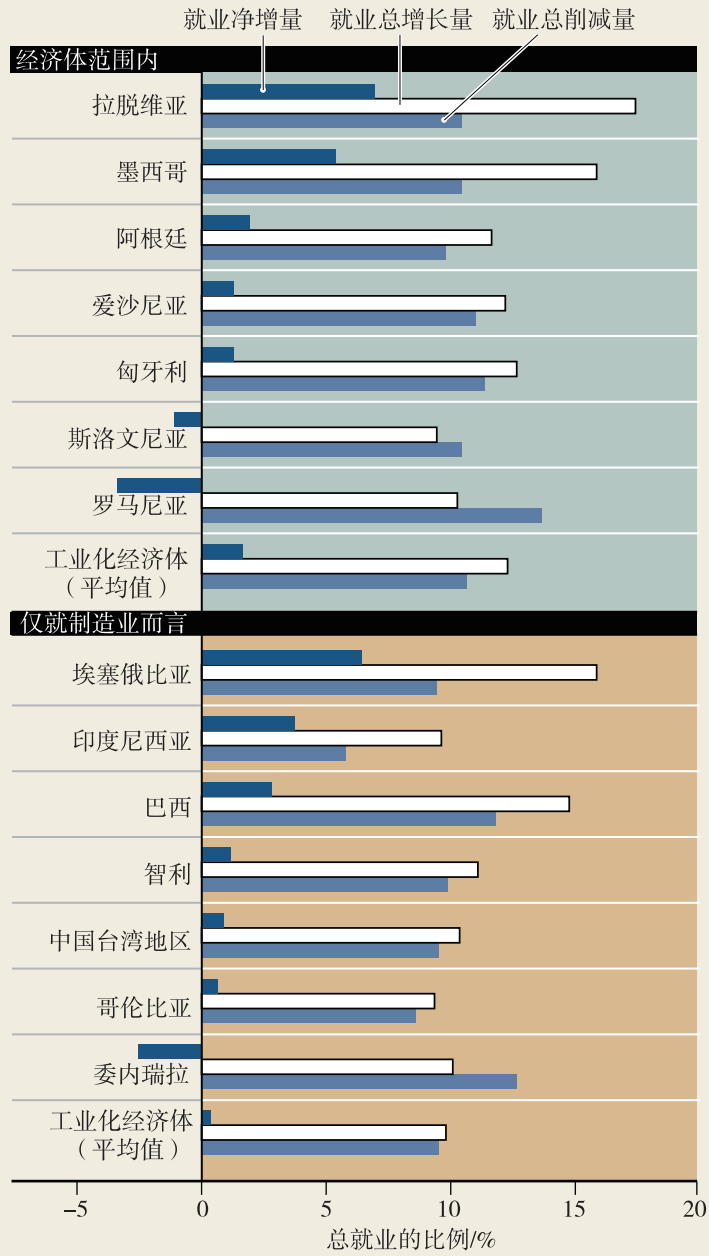
因为工作的劳动生产率变得更高，加之劳动生产率高的工作产生，劳动生产率低的工作消失，所以经济实现增长。这些进步的最终驱动力也许是新的商品、新的生产和运输方式，以

及新的市场，但它们却要通过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的不断重组与重新分配来实现。就业净增数字掩盖了更大规模的就业总增长量和就业总削减量[38]。就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来看，在一年内，7%至20%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但也有类似比例的就业机会消失（图7）[39]。

由于经济随着高生产率工作的产生和低生产率工作的消失而增长，生产率进步与就业产生之间的联系并非机械的。中期内，就业趋势与劳动力规模趋势高度一致，因此真正的“无就业增长”是非常少见的情况。然而，短期内，创新要么会导致就业增加，要么会导致就业减少[40]。通行的看法是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缩减规模实现的，但一些公司却能够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扩大雇用规模[41]。在智利、俄塞俄比亚和罗马尼亚，成功地“扩大了规模的”公司对产量和就业增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时它们的数量远远大于那些成功地“缩小了规模的”公司[42]。在私营部门的活力和国有部门的重组共同作用下，过渡期经济体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现了产量和就业的迅速增长[43]。

成功地扩大了规模的公司通常都比较年轻、规模较小并且更具创新精神[44]。但是大公司通常更具创新精神，生产率也更高。它们对机器的投资更多。它们比小公司更有可能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办和关闭工厂、进行外包，以及与外国伙伴一起成立合资公司[45]。用一定量的劳动力，这些公司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出口也更多。它们支付的工资也比微型和小型企业要高很多（图8）。但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人在非常小的经济单位中就业，而这些经济单位并不一定非常有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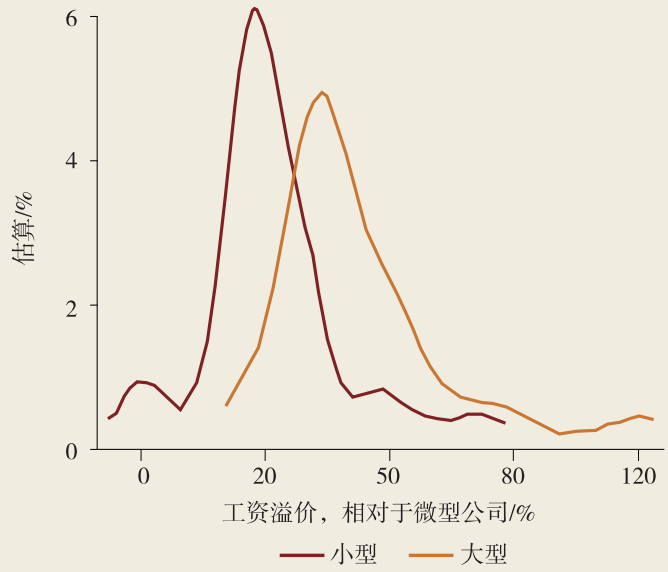
图7　就业增长和消减同时出现是所有经济体的特点



资料来源：《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Bartelsman、Haltiwanger和Scarpetta 2009年以及Shiferaw和Bedi 2010年做出的估计。

注释：本表显示了年度就业流动。数据来自：阿根廷（1996—2001年）、巴西（1997—2000年）、加拿大（1984—1997年）、智利（1980—1998年）、哥伦比亚（1983—1997年）、爱沙尼亚（1996—2000年）、埃塞俄比亚（1997—2007年）、芬兰（1989—1997年）、法国（1989—1997年）、德国（1977—1999年）、匈牙利（1993—2000年）、印度尼西亚（1991—1994年）、意大利（1987—1994年）、拉脱维亚（1983—1998年）、墨西哥（1986—2000年）、荷兰（1993—1995年）、葡萄牙（1983—1998年）、罗马尼亚（1993—2000年）、斯洛文尼亚（1991—2000年）、中国台湾地区（1986—1991年）、英国（1982—1998年）、美国（1986—1991年，1994—1996年），以及委内瑞拉（1996—1998年）。

图 8 公司规模越大，支付的工资越高



资料来源：Montenegro 和 Patrinos 2012 年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注释：本图采用了 138 个家庭和劳动力调查，涵盖 33 个国家 1991—2010 年间的情况。横轴说明在考虑了员工特点的情况下，相对于微型企业，小型公司（10~50 名员工）和大型公司（50 名以上员工）的工资溢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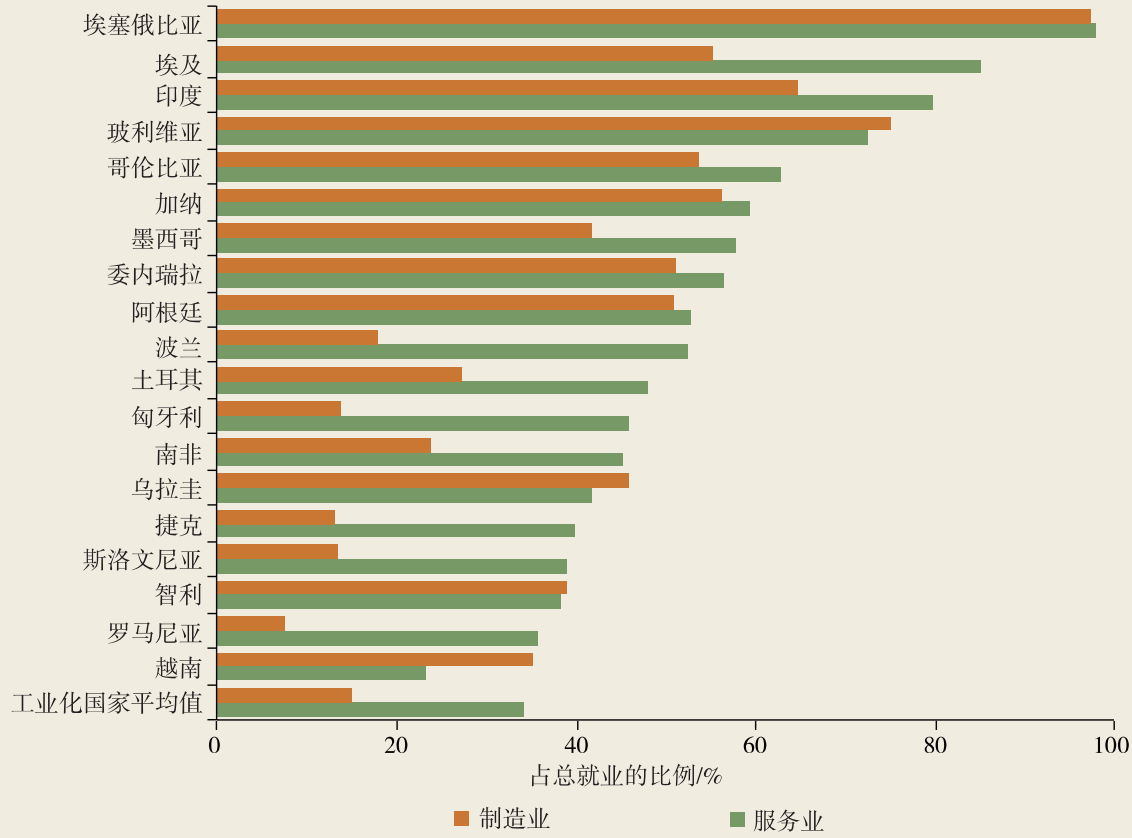
农业以家庭农场为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特别是在亚洲，农场的平均规模很小，分别为 1.8 公顷和 1.2 公顷[46]。绿色革命在使谷物收成增加的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因为新的技术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但是，各地区的进步是不平衡的，而且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进步。机械化程度更高的农场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是土地市场的制约常常使机械化的速度放慢，在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小型农场每公顷的产量往往更高。

在农业之外，存在大量微型企业和家庭企业（图 9）。这些小型单位在创造就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使在中高收入国家也是如此。在埃塞俄比亚，这种小型单位在制造业就业中占了 97%，而在智利，它们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也高达 39%。在服务业中，它们的作用常常更加重要。即使在私营部门出现只有 20 年的东欧国家，微型企业为制造业提供了 10%到 20%的就业，为服务业提供了 30%到 50%的就业。经济单位数量之大与它们之间生产率的差异之大相关。在印度，即便在界定的非常狭隘的行业内也是这种情况，比如，在分布中处于第 10 百分位的制造业工厂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处于第 90 百分位的工厂的 1/22。拉美许多国家也与这种模式类似。相比之下，美国的比率为 1:9[47]。

尽管微型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暗淡无光，但它们本身却也各不相同。许多微型企业和家庭企业是贫困人群求生的一种手段以及寻求农业之外多样生产活动的一种方式。平均来说，这些企业的所有者收入并不高[48]。但是在中等收入国家，许多微型和小型企业的所有者与他们在工业化国家的同行一样具有企业家精神。它们的薄弱表现可能缘于不利的投资环境——比如，获得信贷的途径有限[49]。少量的微型企业，即“羚羊”企业，积极投资并能得到更高的回报[50]。

虽然大型公司的生产率更高，但它们也不是全都生来规模就大。在工业化国家，从本田到微软这样一些更令人瞩目的成功案例是从修车铺开始的。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成功的公司是从小型家庭企业发展而来。泰国的卜蜂集团（即正大集团）从 1921 年由两兄弟在曼谷创立的一家小种子商店，发展成最大的跨国农业综合企业集团之一，现在在 15 个国家开展业务并有近 100 家子公司。印度的塔塔集团从 19 世纪末在孟买创立的家庭贸易公司演变成跨国企业集团，在几大洲共有114 家子公司和附属机构，业务横跨八个行业。中国的许多成功的企业集群，比如温州的制鞋工业，也是从彼此密切合作的小型家庭企业开始

图 9　发展中国家微型企业提供的就业占比更大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的估计以及欧洲统计局（EUROSTAT）。

注释：微型企业指有不到 10 名员工的正规或非正规的公司。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自：阿根廷（2006—2010 年）、玻利维亚（2005 年，2007 年）、智利（2006 年，2009 年）、哥伦比亚（2009 年）、捷克（2005—2007 年）、埃及（2006 年）、埃塞俄比亚（1999 年）、加纳（1991 年）、匈牙利（2007—2008 年）、印度（2004 年，2009 年）、墨西哥（2004—2010 年）、波兰（2005—2007 年）、罗马尼亚（2005—2007 年）、斯洛文尼亚（2005—2007 年）、南非（2005—2007 年）、土耳其（2006—2010 年）、乌拉圭（2009 年）、委内瑞拉（2004—2006 年）、越南（2009 年）。工业化国家的数据来自：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2005—200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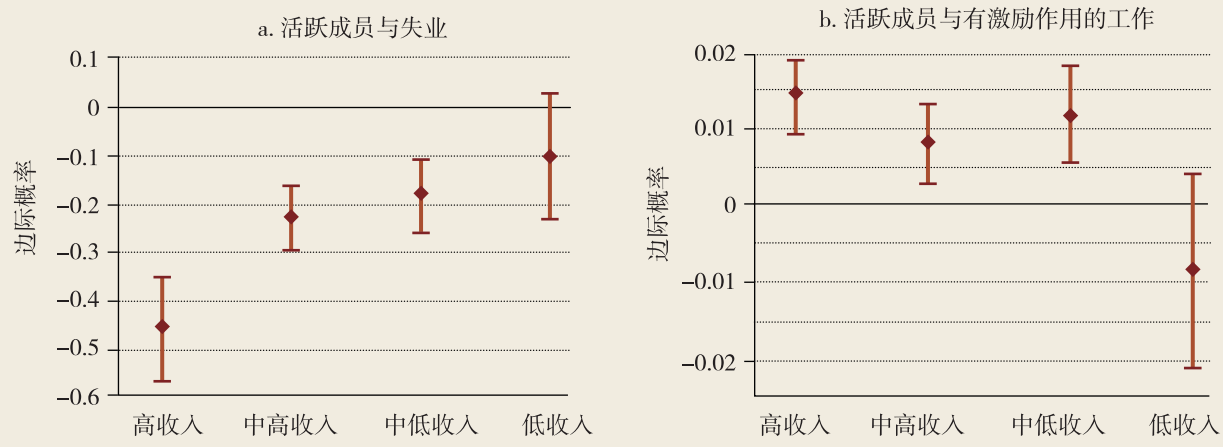
起步的[51]。

不幸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大更老的公司往往如一潭死水，而较小较年轻的企业则易于动荡不安。常常缺少一种充满活力的变化过程。在加纳，许多公司创建之时规模就很大，而且在之后的 15 年中基本未见成长。形成对照的是，在葡萄牙，许多创建时是微型企业的公司大幅地成长[52]。在印度，大部分公司创建时规模也很小，但它们往往保持这种小规模，在生命周期内它们的雇员数量不会有太多变化。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比较就是将有 35 年历史的公司的规模与它们创建之初的规模进行比较。在印度，这些公司的规模缩小了 1/4。在墨西哥，它们的规模扩大了一倍。而在美国，公司规模比原来大 10 倍[53]。如果企业家具有更大的活力，且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单位向生产率高的单位重新分配的规模更大，那么生产率的总增长将颇为可观[54]。但帮助实现这些增长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工作意味着我们的身份

不论有还是没有，工作都能塑造

图 10 失业或没有具有激励作用的工作的人较少参与社会



资料来源：Wietzke 和 McLeod 2012 年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

注释：纵轴表明受调查者在九类社团中是活跃成员的可能性，对受访者的收入、教育和人口特点进行了控制。在图表 a 中，将上述概率与失业联系起来；在图表 b 中，拥有工作被赋予了认知性、创造性和独立性的特点。纵向线条代表估计可能性的 95%置信区间。

人们对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看法。尽管有些工作能赋予人以力量，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缺乏就业机会却能导致暴力或社会动乱。青年人由于缺少工作能够提供的身份感和归属感，可能转向黑帮寻求补偿。例如，在厄瓜多尔，青年人加入黑帮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求支持、信任和凝聚力——社会资本——他们坚称家庭没能提供这些东西，同时还因为在当地的环境中缺乏机会[55]”。

工作场所可以是一个遇到新理念以及与不同性别或不同种族的人互动的地方。20 世纪 90 年代末接受访问的波斯尼亚人表示：“种族合作最受支持的地方是工作场所[56]。”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经商人士则报告说与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情形相比，他们在工作场所与之互动的人来自更多的种族[57]。人际网络也会产生排斥作用。在摩洛哥，父辈不在正规部门工作的人得到这种工作的可能性比其他人小得多[58]。

社会内部的就业分配，还有对什么人为什么会得到就业机会的看法，可以塑造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和对公平性的认识。父母是否有工作以及有哪种工作可能会对孩子的志向产生影响。“阿拉伯之春”并不仅仅缘于就业问题，而是因为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缺少就业机会的失望以及因工作的分配是基于关系而不是才能所带来的挫败感在各国引起共鸣。

工作会影响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会影响他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还会影响他们感知自己在社会中的利害关系的方式[59]。工作对集体也会产生影响。它们能决定社会如何处理共同决策、应对不同集团间的紧张关系，以及避免和解决冲突。不过，这种联系并不直接。就业仅仅是有助于社会设法和平地作出共同决策的能力的一个因素。而通过影响企业家做出商业决策的环境，社会凝聚力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就业。

超越自身群体的信任和市民参与是社会凝聚力的两个指标。失业和就业岗位的损失与信任及市民参与程度低有关。尽管很难说二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但也不仅仅是一种相关关系。在印度尼西亚，2000 年时有工作但 2007 年时已经失业的男性和女性与工作人口相比参加社区活动的可能性

要小。而那些 2007 年时有工作，而在 2000 年时没工作的人参与社区活动的可能性比那些仍然没工作的人要大得多[60]。

工作的性质也很重要。那些能增强人能力，赋予人权力并尊重权利的工作与更多的信任以及更强的参与公民社会的意愿是联系在一起的。能建立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工作有可能形成促使人们跨国工作和解决冲突的动力。如果人们认为他们当前或者未来能得到就业机会，他们对其他人的信任以及他们对制度的信心就会增强。最后，通过对社会身份、人际网络和公平性的影响，工作会对社会凝聚力产生影响。

评价工作的价值

并非所有形式的工作都是可以接受的。剥削劳动者、使他们暴露于危险环境中，或者威胁他们身心健康的活动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不好的。儿童卖淫和强迫劳动违反人的尊严原则，而且会损害个人和集体的幸福。今天，全球估计有 2 100 万人沦为债役劳动、奴役、强迫卖淫以及其他形式的非自愿工作的牺牲品[61]。2008 年，有 1.15 亿 5 至 17 岁的青少年儿童从事危险的工作[62]。有关人权和劳动标准的国际准则反对强迫劳动、各种有害的儿童劳动、歧视和对劳动者话语权的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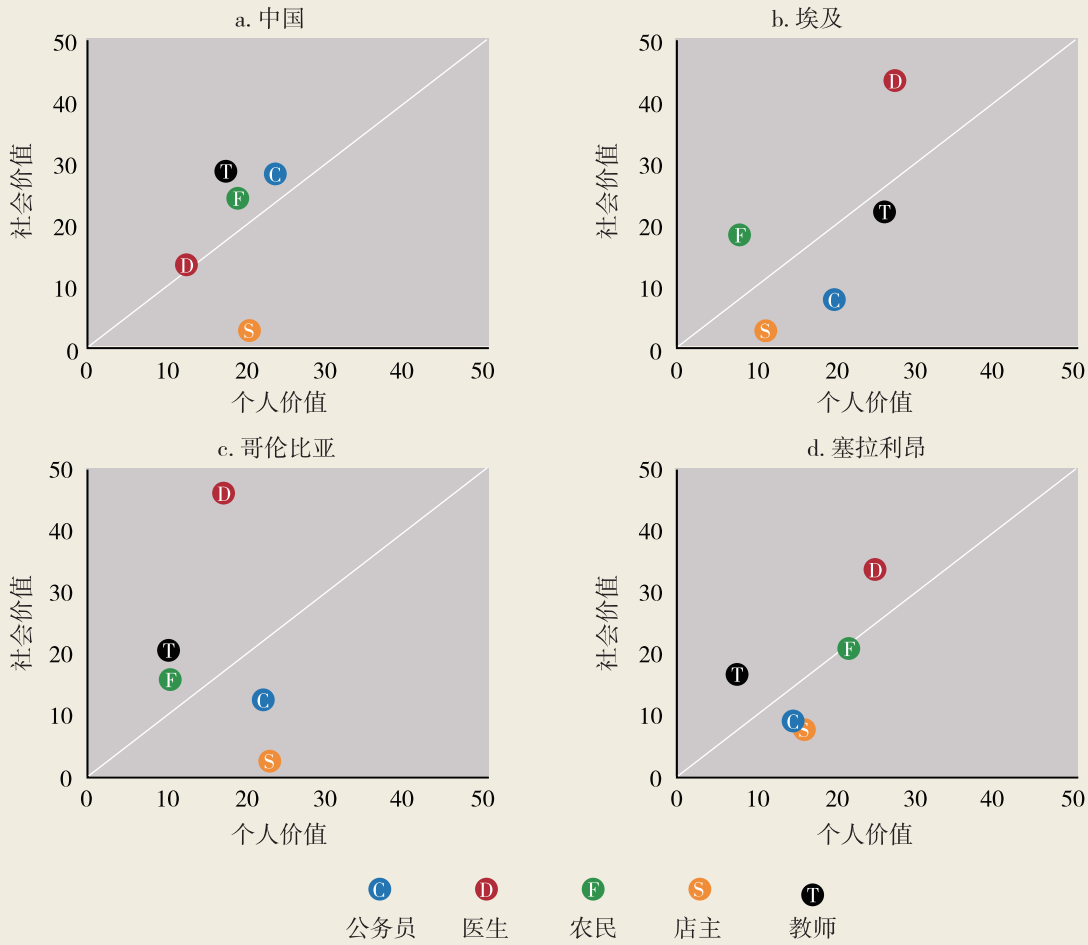
除了权利之外，工作最明显的结果是它能为拥有它的人提供收入。收入可以是现金或其他形式的，而且可能包括一系列相关福利。工作的其他特点，比如稳定性、话语权和成就感也会影响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工作的几个侧面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体面工作”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是国际劳工组织 1999 年引入的[63]，其定义为“使男性和女性在自由、平等、安全和有尊严的情况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工作的机会”，已被许多国家的政府用来表达它们在就业问题上的政策纲领。“体面工作”这一概念还被联合国以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所采纳，并得到多个国际论坛的认可。

由于工作能提供收入、生成产品、影响身份，因此，它们会影响拥有它们的人的福祉，同时也会影响其他人的福祉。要了解就业对发展的贡献有多大，就需要对这些效果（即工作的溢出效应）加以评估。能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的工作对社会的价值比对拥有它们的个人的价值更大，当溢出效应为负面时，则是相反的情况。直觉上，许多人对这种更广泛的效果是有概念的。被问及他们最喜欢的工作时，中国、哥伦比亚、埃及和塞拉利昂的受访者给出的答案与他们被要求指出对社会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时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图 11）。做公务员或者商店店主一般是个人比较喜欢的工作，而教师和医生则经常被说成是对社会最重要的工作。

哪些人得到工作也会带来差异，而且不仅是对个人来说的差异。在重视减贫的社会中，能使家庭摆脱困苦的工作会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因为这能增加那些关注减贫的人的福祉。女性就业的重要性也超出了个人的范畴。女性对家庭收入贡献的比例增长常常会改善孩子接受教育的水平以及健康状况。在孟加拉，服装行业雇用大量的女性，在距村庄通勤可达的距离内开办服装厂被视为机会的信号，同时还会改善女童的教育状况[64]。据估计，在印度南部村庄的低种姓人群中，一个女性的年收入每增加 90 美元，她的孩子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就会增加 1.6 年[65]。

类似的，由外商直接投资创造或维系的就业也会影响其他就业，从而会影响其他人。随着这些投资而来的

图 11　对于想要的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作看法是不同的



资料来源：Bjorkhaug 等 2012 年；Hatloy 等 2012 年、Kebede 等 2012 年，以及张（音）等 2012 年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注释：该图表明了接受调查者中为自己考虑（个人价值）而想要某个工作的人和那些认为工作有利于社会的人（社会价值）所占的比例。

是知识和技术，这些不仅会提高外商子公司的生产率，还会提高与其子公司互动或位于子公司周边的当地公司的生产率。这种知识的外溢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规模可观[66]。相反，需要通过转移支付（不论资金来自纳税人还是消费者）支持的受保护行业的工作会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如果需要受到保护是由于采用会造成高昂环境成本的过时技术的话，那么负面的溢出效应会更大。

工作还能塑造社会价值和准则，影响不同群体彼此共存和处理紧张关系的方式。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进行的调查发现，愿意和不同种族的人一起工作或经商的人数大于愿意和不同种族的人一起上学或居住的人数[67]。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项针对面临风险的青年人的项目表明，就业能改变他们的行为，进而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青年与就业项目》（*Programa Juventudy Empleo*）提供综合的职业和生活技能培训，加入该项目使青年人减少了对黑帮、暴力和其他危险行为的参与[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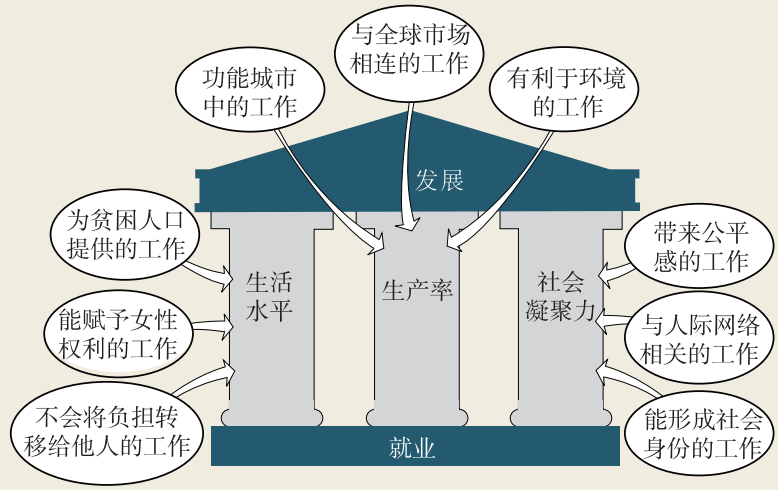
在收入和福利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工作带来的正面溢出效应越大，

这个工作的转化作用就越强，它对社会的价值就越大。俗话说，好工作是能给拥有它的人带来更大福利的工作，但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是那些对社会最有价值的工作。对于工作的这些更广泛的效益的认识形成了近来的发展思路[69]。

工作带来的溢出效应在所有三种转变中均能找到（图 12）。一些人的工作会直接影响另一些人的收入，比如，在某个工作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支持的情况下，或者在限制性的监管规定减少了其他人的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其他溢出效应通过互动发生：在家庭中涉及性别平等问题时，在工作场所中分享知识和理念时，或者在社会中关系到人际网络的情况下。当就业及其分配有助于共同目标（比如：减贫、环境保护，或公平性）的实现时，溢出效应也会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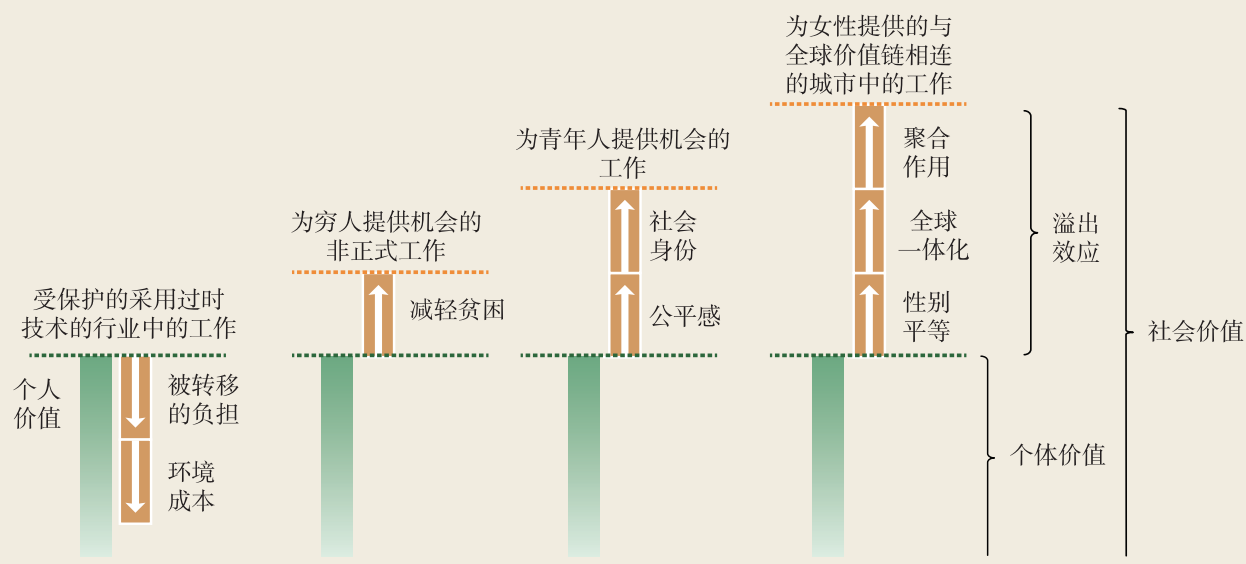
因为工作会同时影响其他人及其拥有者的福祉，从个人角度来看完全相同的两个工作，从社会角度来看可能会有所不同。个人角度是一个有益的起点，因为它常常与社会角度一致。班加罗尔信息技术行业的一份高报酬的工作对于劳动者来说可能是好事，而它对于印度来说也是好事，因为它有助于这个国家的长期增长。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上述两种角度可能会有冲突。比如，20 世纪 90 年代越南的贫困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这是因为土地被重新分配给了农民，而且

图 12　有些工作对发展的贡献更大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图 13　工作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可能不同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对农业商业化的限制得以解除[70]。从个人角度看，务农工作条件艰苦、收入差别很大，而且没有正规的社会保障。但农业工作对发展却有很大贡献，因为它们是许多人摆脱贫困的通行证。相反，得意扬扬的公用事业公司常常能为员工提供一系列特别待遇，即使这些本身只能提供有限的覆盖和并不可靠的服务，而且是经济增长和减贫的障碍。这种工作从个人角度看可能很有吸引力，但是对社会来说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就业议程各不相同……但彼此相关

不是所有地方都面临同样的就业挑战。创造更多的就业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目标，但哪些类型的工作对发展贡献最大则取决于一国之国情。能将经济体与世界相连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最重要的，而在其他情况下，能减少贫困或者消除冲突的工作可能会带来最大的发展效益。毫无疑问，发展水平也关系重大。农业经济体的就业议程和快速城市化的经济体的就业议程不会相同。在那些已经纠结于能将正规经济扩展到什么程度的国家，就业议程必然也是不同的。

但是在特定情况下，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不仅是由人均收入决定的。它可能受到正在发生或仍在回荡的冲突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地理或自然禀赋也可能是决定因素。小的岛国有独特的就业挑战，资源富足的经济体也一样。还有人口也可能是关键的特点——比方说青年人失业率很高的国家和人口老龄化国家所面临的令人印象深刻却又迥然不同的挑战。

就业挑战的类型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制度实力、禀赋和人口会决定就业的发展效益在哪些方面最大。因此，鉴于它们各自的主导特点，一个国家的就业议程与另一个国家的会有所不同。由于发展程度不同而带来的挑战分别按农业国家、城市化国家和正规化国家三种情况来阐述。

- 农业国家。多数人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并生活在农村地区，由于贫困率高，因此能提高生活水平的工作具有很大的发展效益。城市需要运作得更加有效以便利用聚合效应和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因此，能为城市最终变得具有经济活力奠定基础的工作，对发展而言就是好工作。然而，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形下，完成城市化也许都需要数十年，因此，应优先考虑提高农业的生产率。
- 城市化国家。农业生产率得到充分提高，足以解放大量劳动力，使他们能够到城市工作。女性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在轻型制造业中的就业机会能对在家庭资源分配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些能深化城市化国家的全球一体化的工作，特别是在高附加值的出口行业的工作也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随着国家的城市化，拥堵、污染和其他高密度造成的损害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不会危害环境的工作就具有特别积极的发展效益。
- 正规化国家。大规模且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通常会带来更发达的经济，而正规机构和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和劳动者。但是，进一步增强正规性，使之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典型水平，则需要在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之间进行权衡。因此，那些不会造成劳动力成本过高就能被正规化的工作，以及那些能减少从正规机构受益的人和未能从正规机构受益的人之间差距的工作，便具

备附加的社会价值。

在一些国家，就业挑战由人口和影响某些特别人群的特殊环境决定。

- 在青年人失业率高的国家，青年人看不到未来的机会。这些国家中有许多经历了青年人数量的激增，这会对就业和收入带来下行压力。还有许多国家的教育和培训系统没有培养出私营部门需要的技能。经过更仔细的观察，可以发现问题往往出在需求面而不是供应面，因为有限的竞争减少了就业机会，特别是技能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取消经商准入和就业方面的特权可能会产生大的发展效益。
- 老龄化社会面临着代际问题，但这些问题源自于就业年龄人口的减少以及供养和照顾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的高昂成本。通过促进积极老龄化的政策，确保社会中最有生产能力成员（包括具备高度技能的老年人）能够工作，来减轻工作年龄人口下降的影响。通过改革方案设计，可以抑制养老金、医疗和长期看护成本的增长，但这些改革可能成为社会紧张的根源。

包括地理在内的自然禀赋以及制度可以形成特别的就业挑战。

- 资源丰富的国家可能有大量的外汇收入，但在开发自然资源之外，这种财富不一定能转化为就业的增长。其实，外汇的充足可能妨碍其他出口活动的竞争力。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通过转移支付或者为公共部门就业提供补贴来分配部分财富，同时依靠移民来从事不体面的工作。这种方式可以维持生活水平，但却会降低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在这些国家，能支持出口多样化的工作有很大的发展效益。
- 小的岛国由于它们的面积狭小且地处偏远，除了通过旅游业之外，不能利用聚合效应及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因此工作带来的生产率方面的溢出效应有限，同样基本服务业和政府部门之外的就业机会也有限。向外移民为改善生活水平提供了另一个途径，回归移民和移民聚居的社区可以促进新经商理念在当地居民中的传播。
- 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最紧迫的挑战就是为社会凝聚力提供支持。为前战斗人员或者容易卷入暴力的青年人提供就业尤为重要。由于机构十分脆弱，且政局反复无常，这些国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可能无法吸引私人投资和接入全球价值链。然而，建筑行业即使在非常糟糕的营商环境中也可以蓬勃发展，而且这一行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不仅能通过对就业产生直接影响而为社会凝聚力提供支持，还可以为未来私营部门创造就业做出准备。

上述标准并不互相排斥。乍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时又是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约旦和亚美尼亚是正规化国家，同时又是青年人失业率高的国家。不过，通过就业的镜头看发展并专注于不同国家类型的主要特点有助于更明确地找到每种情况下对发展贡献最大的工作类型。有了这种专注，才能对具体情况下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之间的权衡进行更丰富的分析。这种专注会帮助我们找到创造就业的障碍，并且最终会帮助决策者找到政策的重点（图 14）。

人的迁移——以及工作的迁移

人和工作的迁移意味着就业挑战不仅针对国家而言，而且还具有全球性。这些迁移的过程对迁出国和接受国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率具有影响，而且它们可能给家庭乃至整个社区带来或好或坏的转变。折中是不可避免的，

图 14 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不是在所有地方都一样

就业挑战	哪些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
农业经济	生产率更高的小农户农业 与全球市场相连的城市工作
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能遣散武装人员的工作 能使流离失所的人群重新融入社会的工作 能为人提供对抗之外的选择的工作
城市化国家	为女性提供机会的工作 提升国家出口层次的工作 不会导致过度聚集的工作 能使农村移民融入城市的工作
资源丰富国家	支持出口多样化的工作 不通过转移支付补贴的工作
小岛国	与全球市场相连的工作 不会损害脆弱生态系统的工作
青年人失业率高的国家	不通过租金支持的工作 不依据关系分配的工作
正规化国家	有可负担的社会福利的工作 不会造成社会保障覆盖缺口的工作
老龄化社会	能延长有技能的人工作时间的工作 能减少为老年人服务的成本的工作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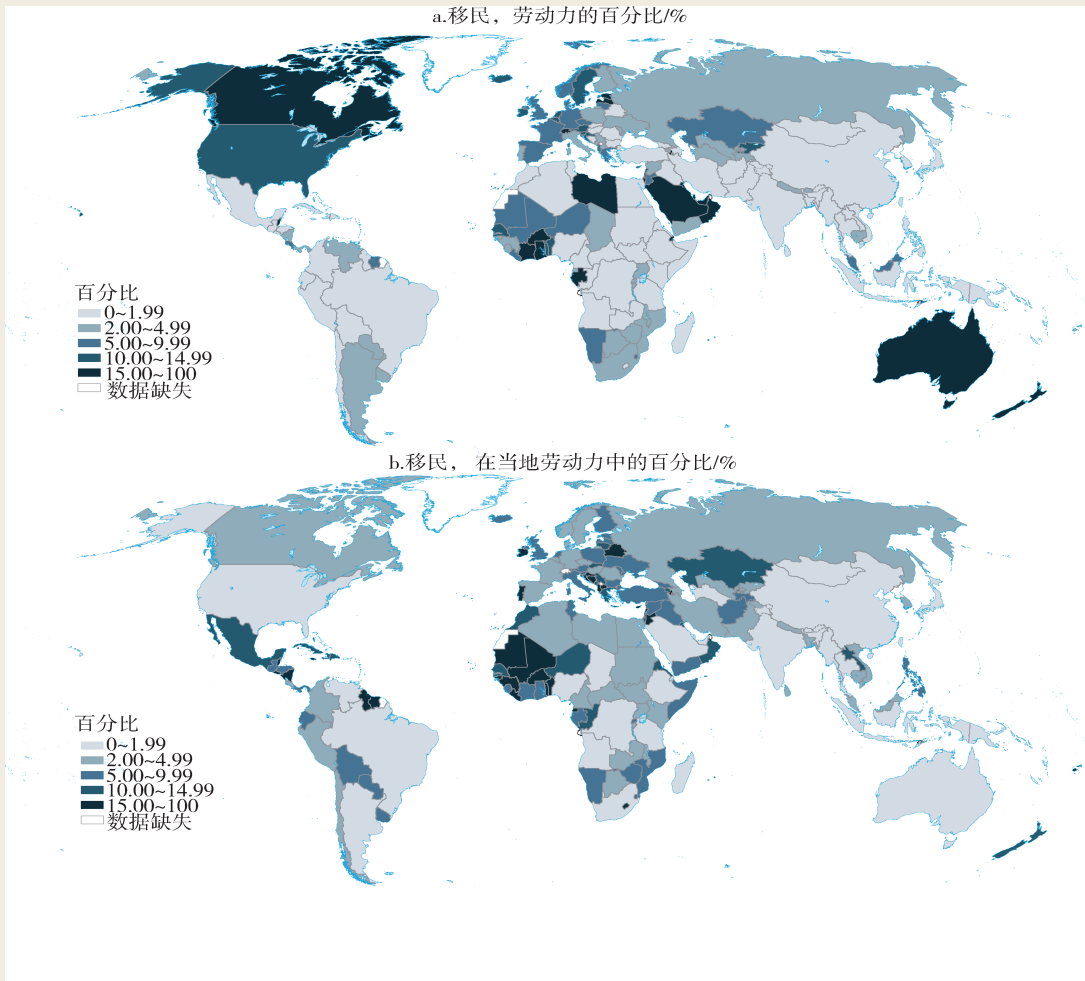
单靠接受国的政策来处理这种折中，结果可能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21 世纪之交，全球跨国移民有 2 亿多人，其中近 9 000 万人是劳动者。许多移民是临时或季节性工人，最终会返回自己的祖国。一些国家以接受移民为主，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向外迁出移民，不过，还有一些国家既不大量接受移民也不大量向外迁出移民（地图 1）。大的移民接受国中有些接受移民的绝对数量大（比如美国），有些相对数量大（比如约旦和新加坡）。源于孟加拉、墨西哥和印度的移民在全球总移民中占大部分；斐济、牙买加和汤加的人口有很大一部分在海外。一些小国家的数字非常惊人。比如，萨尔瓦多有大约 1/5 的人口生活在国外，而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有超过 60%的人口出生在国外 [71]。

跨国迁移通过工资和汇款增加了移民及其家庭的收入。而多数研究结果发现移民接受国的劳动收入并没有受到或者只受到很少的负面影响。如果移民在海外比在本国的生产率高（通常是这种情况），那么移民对全球的产量也会有贡献。他们甚至对向外迁出移民的国家也有贡献，因为移民和归国者的人际网络会成为投资、创新和专业知识流动的渠道。移民对社会的影响则复杂得多。从积极的一面来说，迁移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连接起来的方式注定会扩展他们的视野。从消极的一面来说，与家人和朋友分离可能导致移民感到痛苦和孤独。移民还可能在接受国导致种族偏见和加剧社会紧张局面，特别是当移民被隔离在与世隔绝的职业或聚居区，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的时候。

工作也在迁移。过去四十年的一个标志就是工业化国家将制造业的工作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图 15）。近来，同样的模式也见于服务业的工作。事实上，服务业是全球贸易中增长最迅速的一部分。发展

地图 1　只有部分国家移民在其人口中占很大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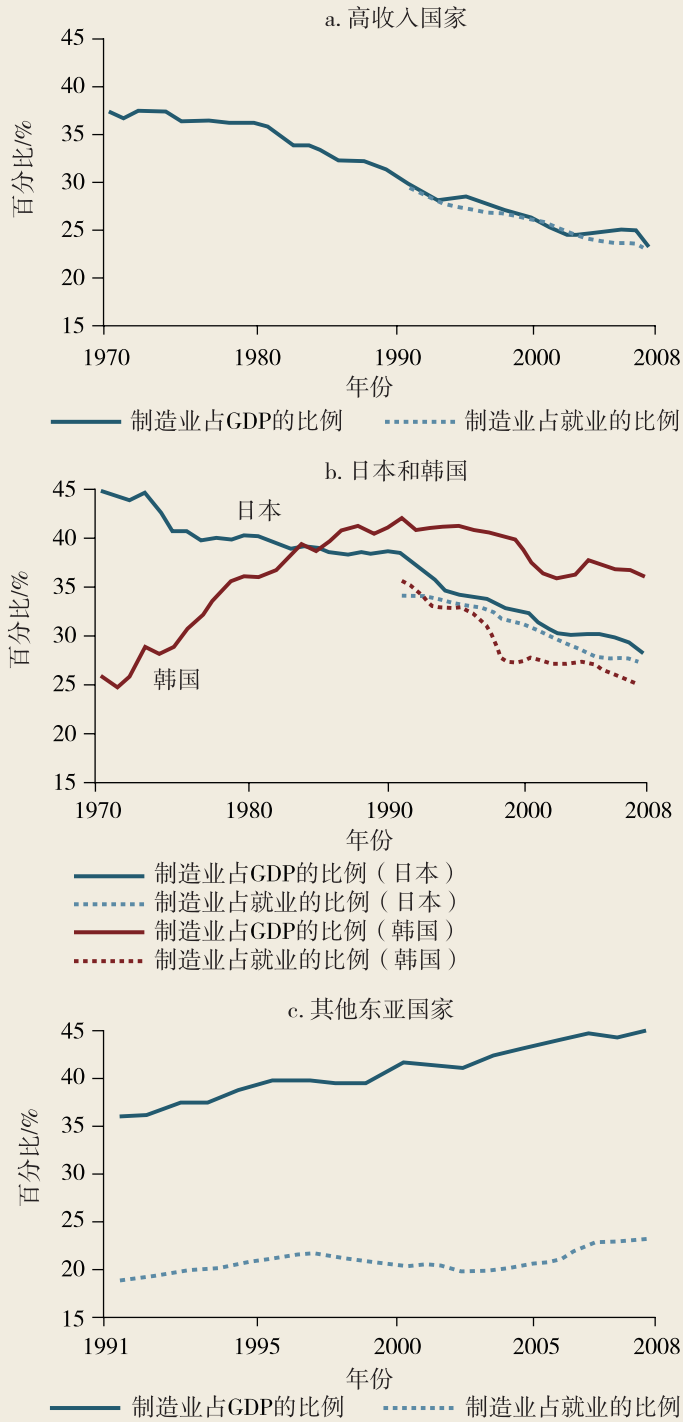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Özden 等人 2011 年以及 Artuc 等人 2012 年的研究，并采用了 2000 年的普查数据。
注释：本地图由世界银行地图设计室制作。本地图的疆界、颜色、名称和其他任何信息并不表示世界银行集团对任何地区法律地位的看法，也不意味着对这些疆界的认可或接受。

中国家现在不仅出口运输和旅游这样的传统服务，还出口现代的和技能密集型服务，比如：金融中介、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法律和技术支持，以及其他商业服务。在这方面印度是先锋，但其他国家——巴西、智利、中国和马来西亚（若要略举一二的话）——也抓住了这个机会[72]。

那些工业和被分拆的服务工作的迁入国，它们的劳动者和企业家是工作迁移中最明显的赢家。这种工作的迁移，加上新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转移，促进了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迁移的隐性赢家是全世界的消费者。劳动力国际分配的改善增加了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可能性以及通过贸易获益的可能性。明显的失败者是那些因为本国工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下降眼见工作消失的人。在这些失败者中，有许多有技术的劳动者在薪水没有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找到了类似的工作，其他人则没能找到。掌握技能不多的劳动者，或者那些只掌握某个行业或职业的特有技能，而这种技能已经不再被需要的人，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图 15 制造业工作岗位已经从高收入国家迁出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联合国统计部门的数据进行的估计。
注释：图 a 中不包括日本。

透过就业的镜头看政策

尽管创造就业并不是政府的职责，但政府的作用却是持续创造就业的基础。无论是培养技能的教师，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农业扩展机构，还是设计高效城市的城市规划者，这些行政服务的质量对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为遣散战斗人员，在某些情况下，临时性就业项目也是合理的。但作为一个一般性规则，创造就业应由私营部门来承担。政府的职责是确保由私营部门带动的强劲增长所需的条件，弄清楚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以及消除和减少那些阻碍创造更多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限制因素。

政府可以通过一种分三级入手的政策模式来履行这种职责（图 16）：

- 基本原则。工作会随着发展而改善，随着国家的富裕，工作能提供更高的收入和福利，但前提是要形成一种有助于发展的政策环境。宏观经济的稳定、有利的营商环境、人力资本的累积，以及依法治理属于最基本的要素。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需要抑制相关价格的反复无常和避免它们出现重大偏差。足够的基础设施、获得资金的途径，以及健全的监管是营商环境的关键要素。营养、健康和教育方面的良好成果不仅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还使他们具备了从事生产性工作的能力。依法治理包括产权的保护和工作中权利的逐步实现，目的是避免出现增长与不可接受的就业形式并存的局面。
- 劳工政策。因为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就业，因此，第二级的任务是确保劳工政策不会对创造就业造成损害，而是能强化工作带来的发展效益。劳动力市场的缺陷不应通过制度的失灵来解决；相反，劳工政策应该保持在对效率的负面影响比较温和的范围内——即在“高原区域”。劳工政策应避免坠落两个“悬崖”：一是会造成扭

曲的政策干预阻碍城市和全球价值链中产生新工作，一是表达意见的机制和对最脆弱的劳动者（不论他们是否有收入）保护的缺乏。第一悬崖会削弱聚合作用及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发展效益；第二个悬崖会导致生活水平低下和社会凝聚力欠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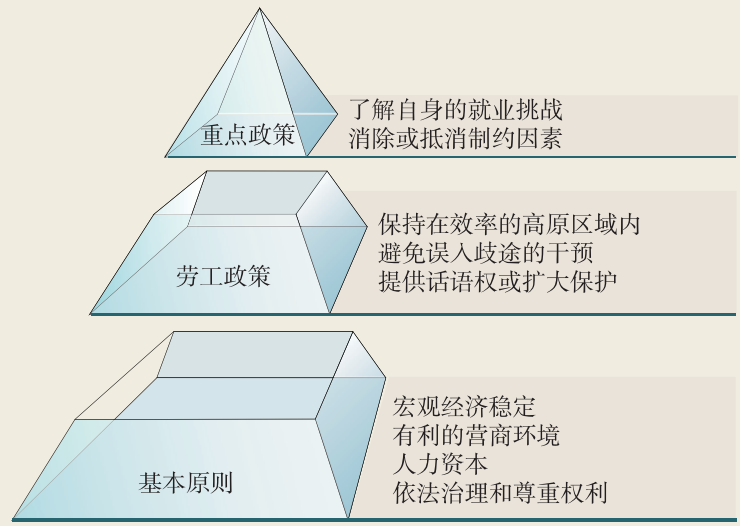
- 重点政策。因为有些工作对发展的贡献比其他工作大，因此有必要搞清楚在具体国情下哪些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在激励机制被曲解，致使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十分稀少的情况下，更有选择性的政策干预是合理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政策应该消除阻碍私营部门创造出更多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市场缺陷和制度失灵问题。如果不能明确地找出这些失灵和缺陷，或者不能轻易地消除它们，那么抵消它们可能是一种选择，但是对这样做的成本和效益则需要加以仔细的评估。

基本原则：确保基本要素

宏观经济稳定。经济的反复无常会损害就业和收入，而且这种损害是迅速的。根据最近的估计，国内生产总值每下降百分之一，日本的失业率就会增加 0.19 个百分点，美国增加 0.45 个百分点，西班牙增加 0.85 个百分点[73]。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和自我雇用更为普遍，而且收入支持机制也更为有限，短期内宏观经济不稳对公开失业的影响较小，对工作收入的影响较大[74]。

经济反复可以源于内部，也可以由外部冲击引起。从内部来说，它常常是无法持续的预算赤字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结果。然而，紧缩的预算和刻板的货币政策规定也不一定就是神奇的“魔杖”。预算赤字或多或少会令人头疼，但其程度还是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快慢，而央行的独立性则需要比照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一致性来权衡。

图 16　需要分三个不同层次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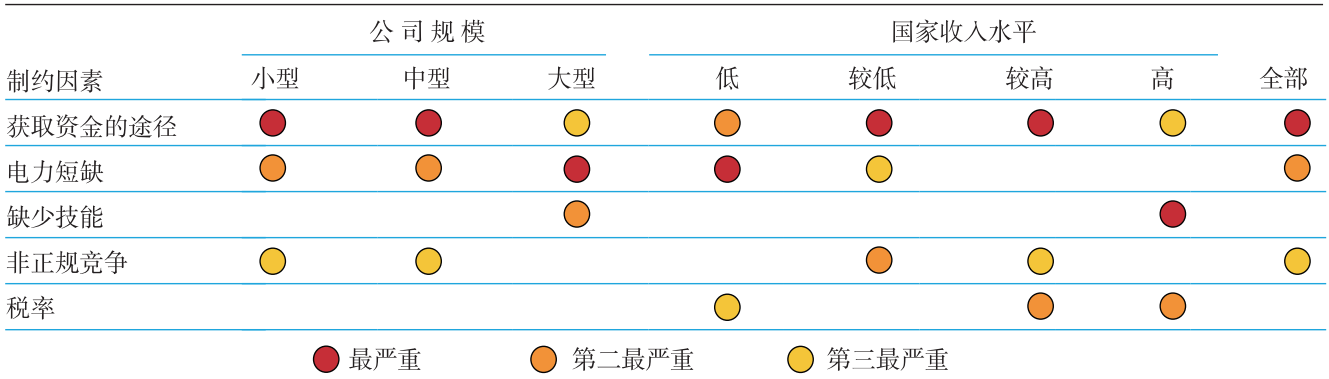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评估宏观经济管理的正确性需要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75]。

经济反复也可能是由外部冲击导致的，这些冲击包括自然灾害以及发端于国外的危机。一旦这些冲击发生的话，预防性政策能够减轻它们的影响。多数情况下，需要实行短期的一揽子刺激或调整措施——但是，由于乘数效应较低，这些措施在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及在发达国家那么见效[76]。

要维持出口部门的活力，进而创造与国际市场和全球价值链相连的就业，就需要避免汇率偏差。一个国家外汇收入的猛增通常会导致其货币币值被高估，从而造成进口成本降低和出口竞争力下降。资源丰富的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货币升值压力，过去几年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只是增加了这种压力。币值被高估还可能发生在需要大量外国援助以便快速启动发展、应对自然灾害或促进冲突后复苏的国家。对 83 个国家在 1970 年至 2004 年间的情况进行的一项分析表明，援助能促进增长（尽管回报越来越少），但却会导致币值被高估，同时对出口多

图 17　资金和电力属于正规私营企业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之列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公司即将发布的报告。

注释：颜色代表平均排名：最严重（红），第二严重和第三严重（分别为橙和黄）。此分析基于世界银行对 106 个国家的 46 556 个公司的调查。小型公司的员工不到 20 人，中型公司的员工人数为 21~99 人，大型公司的员工人数超过 100 人。

样化会有负面影响[77]。

有利的营商环境。资金、基础设施和商业监管决定了投资环境的质量，因而会对私营公司创造就业产生影响。获得资金的途径对于处于发展各个阶段的国家来说都是商业扩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中则是首要的制约因素（见图 17）。金融市场具有将资源向着效率更高的用途分配，阻碍资源流入有政治关联者或者经济强权的手中，并扩大金融包容性的潜能。但要确保资金分配的透明度和竞争性，法规监管是必须的[78]。何谓金融行业的适当监管以及在审慎和稳定与创新和包容之间寻求平衡是否必要，2008 年的金融危机重新开启了有关这两个话题的激烈辩论。

具备经济适用、质量又高的基础设施是公司运营的前提条件。就世界范围来说，电力短缺被企业家们列为限制公司成长和创造就业的第二严重的制约因素，在低收入国家则被列为最严重的。远程通信改善了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流动，而互联网和移动技术促进了新理念的传播。道路、港口和机场扩大了进入市场的途径[79]。对基础设施的监管方式也十分重要。不适当的定价政策和规定会扩大所需基础设施服务的缺口。在许多国家，基于政治关系的垄断导致基础设施服务数量下降、价格升高和质量降低[80]。

商业监管还会影响企业成长和创造就业的机会。监管规定会增加经商的成本，这体现在符合规定所需要的金钱或时间上。为满足规定或支付费用而采取的步骤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负担，延误或需要酌情决定的情况也是一种负担，比如，得到许可或牌照的过程。处于同一地点的不同公司，在满足规定或得到许可所需要的时间上会有很大的不同[81]。商业监管规定还会影响竞争，从而带来了要创新和提高生产率的压力。在各个国家，有关经营准入的规定与生产率和公司创建是相反的关系，在准入率高的行业影响更大[82]。在墨西哥，放松准入要求使得公司注册和就业数量增加，同时推低了消费价格，这主要是通过建立新公司而不是使非正规公司正规化实现的[83]。

人力资本。营养、健康和教育方面取得良好成果本身就是发展目标，因为它们能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同时它们也使人们具备了从事生产性工作和得到就业机会的能力，通过这个途径，人力资本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地都有强有力的证据证

明，在校学习时间增加一年会使收入大幅度上升，这种收入的增长反映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具备的生产率更高[84]。营养、健康和教育综合起来能形成人的技能和能力，这两者从中长期来看与生产率提高和减贫有密切的联系[85]。另外，健康的加强会直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人力资本是取得令人满意的就业成果的一个基本要素。人力资本是累积形成的。

在生命的“头 1 000 天”里，即从孕育之初到两岁的时候，足够的健康和营养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期间的大脑发育会影响人整个一生的身体健康、学习能力和社会行为[86]。在从子宫到一岁的整个养育环境中，确保足够的营养、健康和认知刺激能大大增加此后儿童成长投资的回报[87]。尽管基础是早期打下的，但人力资本和技能是在整个儿童到青壮年时期不断形成的。学校教育对于青少年时期结束前进一步发展认知和社会技能是必须的[88]。在青春期到成人早期之间，社会技能依然具有可塑性。青年人可以继续接受更专业化的技能培养，包括接受高等教育，但他们能否取得成功则取决于他们需要学习的通用技能能否适应不同的任务并解决不同的问题。在更具活力的经济环境中，这些通用技能尤为重要。

不幸的是，证据表明，许多国家在培养儿童和青年人的人力资本方面做得远远不够。落实（培养的）系统的质量往往赶不上基本社会服务扩展的步伐。在 2009 年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至少有 1/5 年龄在 15 岁的学生实际上属于文盲（即没有达到 PISA 阅读评估中至少 2 级的水平）[89]。

依法治理。在各国，拥有保护产权的制度，坚持依法治理，遏制腐败都是和更高的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的[90]。保护产权使企业在投资时无须担心资产被盗或者被充公，从而有助于促进私营部门的增长[91]。合同执行能力扩大了潜在的供应商和客户圈，使得私人关系在建立互信方面重要性降低[92]。依法治理对企业和就业的增长有直接影响。相信自己的产权是安全的企业家与那些不相信的企业家相比会将更多的利润用于再投资[93]。相反，犯罪和暴力活动猖獗的话，公司就会避而远之，不利于吸引国内外投资[94]。对各国的投资环境调查一致表明，犯罪和腐败是经商的障碍[95]。

有效的司法系统是执行产权法律法规并减少犯罪和腐败的重要机构。通过执行交易监管法规和确保增长成本与效益的公正分配，独立、负责和公正的司法部门能够对私营部门的增长和创造就业作出贡献。司法制度能够保障合同执行、降低公司交易成本，并创造一个安全的、更容易预测的商业环境[96]。有效的法庭能提升公司投资的意愿[97]。

尊重各项权利的制度环境是法治的重要要素，也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基础。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界定了儿童劳动、强迫劳动、歧视以及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方面的最基本要求[98]。工作中的健康与安全问题也有待政府和雇主的重视。要确保这些标准能够在实际操作中贯彻落实，劳动者和雇主都需要得到获取信息的渠道。这也意味着向那些从事不受正式法律法规保护工作的劳动者提供法律保障。非正规劳动者团体可以向成员告知其权利，帮助他们利用法律机制并赋予他们集体话语权[99]。

劳动力政策：避免坠落两个“悬崖”

劳动力市场失灵可能会妨碍经济

增长转化成更多更好的就业。传统分析方法专注于劳动力供应、劳动力需求，以及二者的匹配，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就业不足或雇用就业不足的原因。劳工政策如果不能弥补劳动力市场的缺陷，甚或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缺陷，那么这些政策实际上就会限制就业机会的创造，这种限制甚至会非常严重。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限制创造有转化作用的工作的因素可能与劳动力法规并无关联。农业经济中小型农业生产率较低，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农业科研和推广的失败。而在青年人失业率较高的国家，任人唯亲和政治上的偏袒更可能导致技术先进领域缺乏竞争，而这些领域本可以促进对技术岗位的需求。

劳动力政策应包含哪些内容，人们在这一点上并无共识。各种观点出现分化，体现了基本观念上的分歧。一些人认为，劳动力市场监管和集体谈判致使效率低下，从而导致产出和就业的减少，而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保护了内部人，但牺牲了不受保护的其他人。按照这种观点，失业保险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项目会导致人们失去工作动力而且是对资金的一种浪费。但另一些人认为，这些政策为工人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使他们能够与雇主抗衡并抵御劳动力市场的风云变幻。这些政策甚至可以改善劳动者和公司的信息获取能力，提供防范风险的保障，创造长期投资条件，从而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

两种观点的倡导者都可以找到支撑其立场的例证。认为劳动力政策和制度本身就是问题之一的人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有限，但在创造就业方面却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记录。他们还指出，在许多北非和南欧国家，正是就业保障法规阻碍了青年人寻找工作。相反，认为劳动力政策是解决方法之一的一方则以德国为例，认为德国在抵御金融危机方面相对比较成功，共享就业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仔细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政策的实际效果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大部分研究认为效果平平——显然不及争论交锋的激烈程度给人的印象那么深[100]。不论企业大小，不论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劳动力政策和法规一般都不是正规私营企业面对的三大制约因素之一。劳动力市场监管的过度或不足都会导致生产率下降。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仍有一片“高原区域”：劳动力政策对效率的增强效应和削弱效应同时存在，且多数影响是可以再分配的，一般有利于中年男性工作者（对资本拥有方、女性和青年人而言截然相反）。

研究所及的大部分国家，就业保障规定和最低工资要求对总就业影响较小。这些规定有利于受其保护的人群，但对青年人、妇女和技能偏低的工人不利。在哥伦比亚和印度尼西亚，最低工资的增长带来的总体效果并不明显，但对青年劳动者就业的冲击较大[101]。监管对就业流的影响更为明显，令劳动力市场出现“流动不畅”的局面，并使劳动力再分配速度放缓[102]。但是，尽管这些因素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影响生产率方面的证据却令人难以得出定论，当然这种证据也很稀缺[103]。

在发展中国家，集体谈判权在公共部门和竞争有限的领域之外并无重大影响，因为在这些领域有租金要分配[104]。工会不断提高其成员的工资收入。研究发现，工会成员工资的附加值在墨西哥约为 5%~15%；在韩国约为 5%；南非约为 10%~20%[105]。但由此导致的就业减少还不清楚。在部分国家（尽管不是全部），工会代议的代

价看来是就业减少。但即使如此，幅度也还是相对较小。工会代议对生产率的影响证据有限，而且还有好有坏[106]。主要挑战是如何保证不挣薪水的人的话语权，以便解决他们的农场和微型企业面临的种种限制，并以能提高生产率的方式来组织集体谈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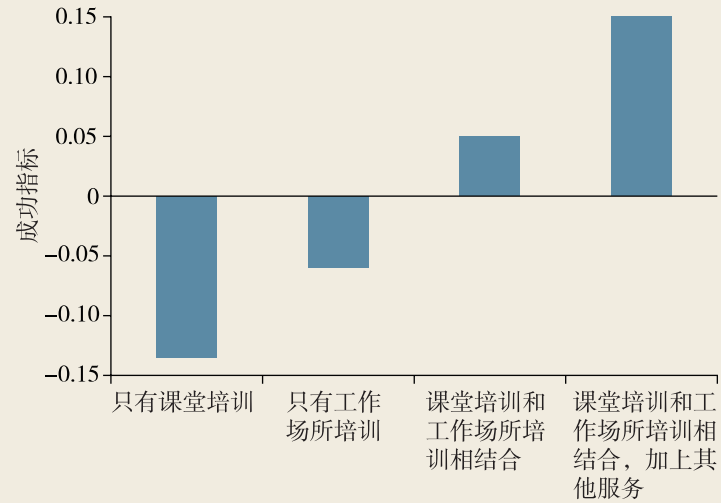
各种积极的劳动力市场项目，例如提供培训、就业服务、工资补贴，以及公共就业，效果也不尽相同[107]。如果不能配合需要，不是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出发，或者管理不当又缺乏透明度，那么这些项目几乎毫无用处，甚至更糟。但如果设计合理且执行有力，它们就有助于促进工作选配，缓解经济下滑的负面影响，填补雇主或劳动者培训投入不足的缺口（见图 18）。但即使是这种情况，这些项目的效果往往也不明显，因此，对于积极劳动是市场政策能取得的成果不能抱太高的期望。

即使是在最正规化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也是有限的。失业保险有助于劳动者抵御失业带来的种种风险，但也会削弱求职的努力。当失业保险、养老金、医疗和其他福利的资金均来自工资时，较高的缴纳比率有可能使公司丧失雇用的动力。在正规部门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人们越来越多地讨论通过税收为社会保险项目提供资金[108]，但任何税收都会造成扭曲。总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为劳动者所重视的、负担得起的各项社会保障。主要问题在于协调整合社会保护和社会援助，从而将缺口和重叠都降到最低。

总之，劳动力政策和制度可以改善劳动力市场信息、控制风险，并提供表达途径。但这些优势的代价可能是劳动力市场活力减弱、创造就业和求职的动力减少，以及保障覆盖的和未覆盖的人群之间出现差距。因此，面临的挑战是将劳动力政策置于在一个高原区域内——监管和制度至少可以解决一部分劳动力市场缺陷，同时又不会牺牲效率。劳动力市场规则太弱、规划力度不够，或者根本没有劳动力市场规则，就无法解决信息匮乏、权力不平等，以及风险管理不足的问题。反之，规则太严格、规划太宏大也会在市场缺陷之上导致制度性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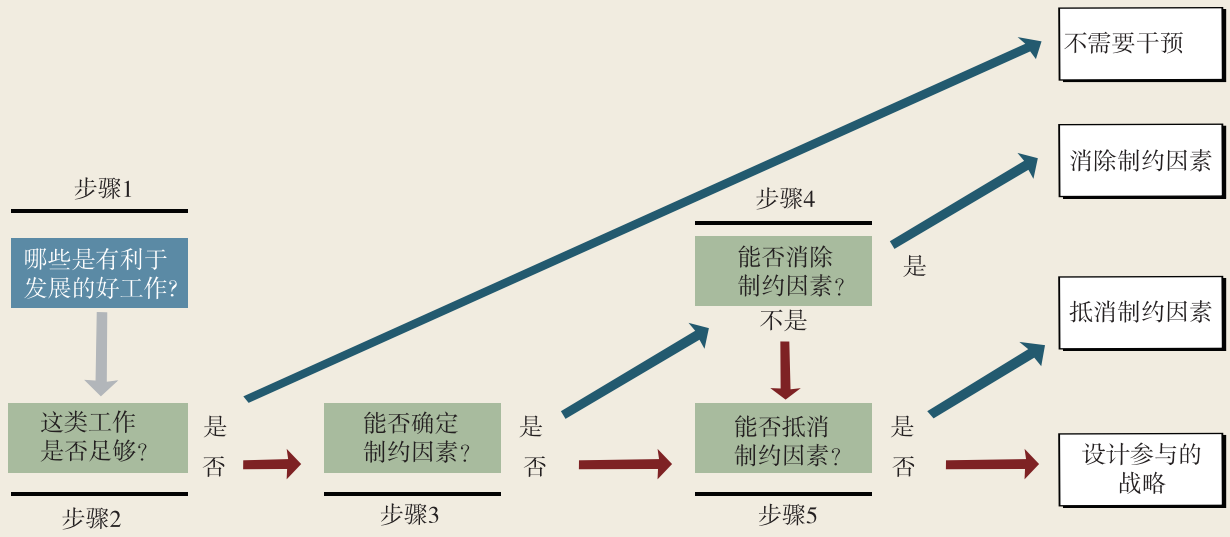
专注于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能使我们具备一定的识别力，从而判断出高原区域的边界，即“悬崖”在哪里。在高原区域的一端是一种劳动力政策，这种政策可能导致城市中或全球价值链中的就业创造放缓，并使各国错失支持就业的聚合效应以及知识的溢出效应。一旦掉下“悬崖”，就会失去城市化和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发展效益。但这并不一定就是应采取最低限度监管的论据。实际上，仍有进行各种安排，强化全方位协调，从而提高效率的空间，中国最近在集体谈判方面的尝试就表明了这一点。

图 18　将工作与培训结合起来能提高项目的成功率



资料来源：Fares 和 Rother 等 2012 年。
注释：本图显示了培训种类与项目成功的相关系数，其中成功被定义为改善了就业或收入并具有成本效益。

图 19 协助确定重点政策的树形图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在高原区域的另一端，缺乏让那些不为雇主工作或者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提供话语权和获得保护的机制，也是值得忧虑的。为那些往往属于最贫困人群的劳动者传达意愿可能会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限制就业中介滥用权力会提高效率，而构建有包容力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能为增强社会凝聚力做贡献。在这方面，印度的自就业女性协会和越南的贫困人群医疗保险项目的经验都鼓舞人心[109]。与劳动力市场管制过度相比，这个“悬崖”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其真实影响却丝毫不小。

重点政策：实现就业带来的发展效益

在确保各项基本要素能够支持经济增长，且劳动力政策是适当的之外，决策者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帮助实现就业带来的各种发展效益。某些工作更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生产率，以及社会凝聚力。但具体是哪些工作则取决于各国国情——其发展程度、人口构成、禀赋和制度。有些情况下，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涌现并不受制约，也就不需要特定的政策支持。但有些情况下，政府可以支持私营部门创造更多这类工作。有时候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消除那些阻碍创造能带来高发展效益的工作的限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政策可以更主动一些以绕过制约因素，当然前提是这样做为社会带来的益处能超过由此产生的成本。

遵循五个步骤确定重点政策的简单方法（图 19）：

- 步骤 1：哪些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确定重点的第一步是在特定国家背景下评估工作带来的发展效益。国家特点不同，这类工作的性质也不同，国家的特点包括：发展阶段、人口构成、禀赋，以及制度。农业国家、资源丰富国家、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或者青年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其就业挑战都不同。而且，对发展有最大影响的工作种类也不同，各国的就业议程也因此而不同。
- 步骤 2：这类工作是否足够？一个国家在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

时未必面临制约。比如说，轻工业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对减贫有重大影响。如果轻工业正在蓬勃发展，就有希望实现制造业新就业机会带来的发展价值。但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发展价值也可能无法实现，比方说在不当的城市化政策限制了新公司的建立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些差距，而政府在建设基本面和采用适当劳动力政策之外，还要进行干预就很难找到理由了。

数据和分析可以用来确定错位激励因素，就业对个人的价值和对社会的价值之间存在差距就可以表明这一点。有几个研究专门领域针对这类差距。例如，公共财政学的研究工具可以用来衡量资本和劳动力承担的税收负担，也可以评估个人之间或企业之间的交叉补贴。劳动力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某类工人的实际收入与其潜在收入之间的差距，或者教育的社会与个人回报之间的差距。贫困的分析有助于确定哪种工作更可能为贫困群体提供就业机会，或者确定在哪里创造就业更有利于减贫。生产率的研究能够定量分析外商所有的投资公司或者城市就业的溢出效应。环境分析可以帮助了解各类工作产生的碳排放和污染。价值调查可以发现哪类工作能提供人际网络和社会身份。

- 步骤 3：能否确定制约因素？具体的工作对个人和对社会的价值之间的差距表明就业能带来尚未发掘的溢出效应。差距往往是市场缺陷和制度失灵所致，人们为此从事那些从社会角度而言未必最佳的工作，企业为此不能创造本可以创造的有利于发展的就业，人们通过工作形成的联系也因此不如社会期望的那么多。不过，确认制约因素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比如，女性就业机会不足可能是文化、社会和经济因素的综合产物。同样，城市就业的障碍可能存在于土地市场，或者存在于协调城市发展的制度安排中，或者增加收入以便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能力方面。

- 步骤 4：能否消除制约因素？如果能够确定导致激励机制错位的制度失灵和市场缺陷问题，就应当考虑改革。找到问题根源，针对失败和缺陷进行改革，是一个正确的经济学原则。如果改革从技术和政治上可行，决策者就可以直接解决限制私营部门创造更多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主要制约因素。

- 步骤 5：能否抵消制约因素？改革也许不可行，或者因为技术，或者因为政治，或者根本无法确定制约因素。那么就要考虑抵消性政策，恢复创造就业的动力。例如，如果由于各种通行而又根深蒂固的规范和观念使女性难以工作，那么可以通过对社会的和有形的基础设施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来提高其就业能力（专栏 1）。同样，如果受政治影响的监管制度减缓了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领域的再分配，那么可以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来增强城市就业的吸引力，通过以物流管理来增强与全球市场相联系的工作的吸引力。

但有时会出现制约因素既不能被消除也不能被抵消的情况，那么这时就需要一种涉及对各种方案更深入的分析和主要利益相关方认可的参与战略。消除或抵消限制因素的决策要有选择性，还要有良好公共财政原则的支持。需要对政策方案的成本和效益进行评估，但在总体发展影响是指导性目标的情况下，测算会有不同。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要评估以遣散前武装人员为目的的就业项目的效益，可以先评估参与人员收入的增长能否证明项目成本是合理的，但全面测算

专栏 1　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是怎样增加的?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比例的大幅度增长。拉丁美洲的增速最快。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共有 7 000 多万女性加入了劳动大军，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比例从 36%增至 43%。在哥伦比亚，这一比例从 1984 年的 47%增长到 2006 年的 65%。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东和北非地区过去三十年来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年增幅仅为 0.17 个百分点。

近期研究认为，这种快速转变主要来源于有孩子的已婚和同居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比例的增长，而不是人口构成、教育或者商业周期的影响。社会态度的改变促进了这种转变，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对其进行直接的政策干预的空间和理由都十分有限。比如说，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就很低，尤其是已婚女性的比例很低。但这并不能机械地归因于宗教，因为在印尼这样的国家，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就很高。其他一些社会准则和法律、法规妨碍了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尽管她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虽然影响社会态度的空间有限，但有证据表明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和计划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证据还表明，同时对社会的和有形的基础设施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和干预，可以改变女性对劳动力队伍的参与以及她们的收入能带来的回报。这些投资可以分为三类。它们可以解决服务短缺的问题（例如，电力或者日间护理设施的缺乏），这种短缺迫使女性将大量时间投入家庭生产。它们可以使女性更容易累积生产性资产，比如教育、资本和土地等，从而促使女性投入高生产率市场活动。另外，它们可以消除暗含偏见甚至歧视性做法的准则或法规，这些准则和法规妨碍女性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

上述三种有针对性的投资和干预，每一种都有一些成功经验。由公共部门提供儿童看护可以减少女性参与工作而不能从事家务产生的损失。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公共部门提供日间看护或对日间看护进行补贴的项目，比如墨西哥的 Estancias Infantiles 和哥伦比亚的 Hogares Comunitarios，以及阿根廷和巴西类似项目。改善基础设施服务——尤其是水和电方面的服务——有助于女性减少在家务和看护上花费的时间。例如，南非农村地区的电气化就促使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提高了 9%左右。其次，纠正服务提供制度的偏见，例如通过政府土地分配和登记制度的作用使女性得以拥有和继承资产。最后，推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推广人际网络并取消歧视性的法律、法规，对于增加工作给女性带来的回报也十分重要。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 Amador 等 2011 年、Chioda 2012 年和世界银行 2011 年的报告。

还应纳入对重新融入社会及建设和平的潜在正面效应的考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帮助前武装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的项目成本是每位受益人约 800 美元[110]。若以传统标准衡量，该项目很可能被认为成本效益不高。是否还要继续执行取决于决策者对该项目在社会凝聚力方面能作出多大贡献的判断。为了使决策透明，应该说明这些贡献。

多样的就业议程，多样的重点政策

一些国家在实现就业带来的发展效益方面有成功经验，可为其他国家所借鉴。

越南是一个农业国家，20 世纪 90年代集中精力提高农业生产率，释放劳动力从事农村非农工作，并最终支持他们走向城市。1993 年，越南 70%以上的就业来源于农业，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 58%，饥荒仍是现实的忧虑[111]。二十年后，越南成为稻米和咖啡的第二大出口国，黑胡椒和腰果的第一大出口国，同时也是茶叶、橡胶和海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国。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再加上对农业推广、土地改革和放松管制的大力重视，实现了农业生产率在很小规模的农业用地上的快速提高。上述政策是更大的整套改革方案的一部分，这使越南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12]。与此同时，政府也推行了各项旨在创造非农就业的政策。越南向外资开放，首先放开了自然资源开发和轻工业领域，2007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扩大了开放的范围。1992 年至 1994 年短短两年中，注册外商直接投资就增加了 4 倍；过去 5 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资金超过了 GDP 的 8%[113]。

卢旺达是一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种族冲突和灾难后已经重新崛起。得益于冲突的停止和一系列积极的改革措施，到 2000 年，卢旺达经济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114]。经济增长得以持续，2011 年增长率估算达到 8.8%；2005 年至 2010 年期间，贫困率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当年冲突过后，政府支持超过 54 000 名前武装人员解除武装，重新融入社会。2012 年，73%的前武装人员表示对自己融入社会感到满意，85%的社区成员感到两大族群之间存在互信 [115]。尽管前武装人员仅占卢旺达 1 000 万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对提升社会凝聚力作出了贡献。在此基础上，卢旺达通过制度和商业监管改革，令私营部门恢复了活力 [116]。咖啡业已经创造了数以千计的新就业机会 [117]。

智利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设法找到了一种与非资源部门就业创造和谐发展的铜业发展道路。智利拥有全球 1/4 以上的铜储备。在有效管理货币升值和通胀等资源相关风险的同时，智利实现了出口和整体经济的多元发展。失业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20%左右降至目前的单位数 [118]。资源稳定基金（1987 年创建）和财政透明制度（1999 年起施行）令智利储备了渡过时艰所需的资金并避免了竞争力的丧失。在公共部门管理的各方面推进治理改革，提升了问责制度和透明度。包括支持外商投资在内的积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政策为与全球市场相联系的就业带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提供了支持。针对非矿业出口行业，尤其是农业产业的竞争创新基金扩大了出口基础 [119]。公共预算增加了教育开支，1990 年至 2009 年增长近一倍，中等和高等教育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120]。

斯洛文尼亚成功地解决了其青年人失业率极高的难题，青年人与成年人的失业率之比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3:1 降至目前的 2:1 左右 [121]。但成功却不应归功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项目的开支（在转型国家中仅处于平均水平）、劳动力市场开放（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制度上仍有很多限制），或者较低的最低工资水平（仍处于高位）[122]。成功在于：这些政策的潜在扭曲似乎以某种方式被抵消了。工会和雇主团体广泛参与薪资制定谈判，并达成共识，薪金较好地反映了宏观经济趋势和行业生产率状况 [123]。全球危机爆发之前的持续增长在青年人失业率下降方面功不可没。斯洛文尼亚及时抓住欧盟整合的良机，成功地重组了出口行业。极好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纯熟的劳动力也作出了贡献。

实际上，针对各类就业挑战都有成功的政策经验（图 20）。韩国是一个城市化国家随着就业从农业向轻工业再向高附加值行业的转移，政府仔细设计并分阶段执行了相应政策 [124]。首先制定土地开发政策，其次是土地使用监管制度，然后是全面城市规划；住房和交通运输政策控制了城市化的规模不经济。汤加是一个小岛国，积极推行新西兰 2007 年推出的认可季节性雇主计划，通过移民提供就业机会，使移民汇款、农业技术、电脑使用能力和英语技能均有所提高 [125]。巴西则提供了迅速正规化国家的例证。过去十年来，正规部门创造就业的速度一直是非正规部门的 3 倍。危机爆发前五年，正规部门占总就业的比例就增加了大约 5 个百分点 [126]。家庭补助券（Bolsa Familia）等非缴纳型社会保障计划、小企业税则简化项目等，鼓励企业将工人正规化，也完善了税法和

图 20 哪些国家成功地应对了就业挑战？实行了哪些政策？

就业挑战	哪些国家和哪些政策？
农业经济体	越南 土地改革、农业扩张，以及市场激励措施
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卢旺达 前武装人员重新融入社会和营商改革
城市化国家	韩国 土地使用政策和综合性城市规划
资源丰富的国家	智利 财政稳定规定和以出口为导向的政策
小岛国	汤加 积极利用回迁移民协议
青年失业率高的国家	斯洛文尼亚 通过贸易整合实现产品市场的竞争
正规化国家	巴西 非缴纳型社会保障计划、规定的简化与执行
老龄化社会	波兰 残障人员管理和养老金改革，包括提高退休年龄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劳动法规的执行，为其成功作出了贡献。老龄化中的波兰，就业比率却从 2006 年的 60%增长到 2009 年的 65%，主要原因就在于调整了合格残障人员养老金制度的执行，并鉴于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改革了养老金制度，下调了退休金水平。2012 年，波兰将领取退休金年龄从男性 65 岁和女性 60 岁提高到一视同仁的 67 岁 [127]。

相互关联的就业议程：就业方面的全球合作

一国的就业政策会影响到他国，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重要的是国际协调机制能否影响一国政府的决策，抑负扬正。有些领域可以进行更多、更好的协调。

权利和标准：为制定标准和提供改善权利落实的渠道，应有跨国机制的存在。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可以影响国内立法，也是传达意愿和国际协调的渠道，对居家工作的工人和家庭佣工逐步采用该章程就证明了这一点。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的基本权利和原则宣言》核心劳工标准获得支持就体现了各国对国际社会压力的回应 [128]。但是，压力的效应有限，强迫劳动、在危险环境中使用童工工作、用工歧视，以及缺乏话语权的持续存在说明仅有认可还不够。

贸易协定是在保障权利方面进行国际协调的一种潜在的工具。贸易协定可以纳入一些激励条款，将贸易准入和采用并执行劳动法和标准关联起来，鼓励对劳动者意愿和工作条件的重视。但是，将权利和贸易联系起来能否为协定任意一方的劳动者带来益处，这一点仍然不够清楚。劳工条款也可以用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削弱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就业机会。此外，针对协定的执行及监督，既缺乏能力也缺乏机制，贸易协定自身在这方面并不是一项有力工具。比如，哥伦比亚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定是个成功案例，它有两个附带项目，其一是培养监督服装厂工作条件的能力；其二是支持由仲裁委员会解决集体劳工纠纷 [129]。

除了政府在跨国章程和贸易协定

方面做出努力外，私营部门问责制和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CSR）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自愿在经营中承担社会和环保责任[130]。欧盟和北美的企业最有可能采用行为准则，对用工标准的承诺也就成为与供应商业务往来的条件。至于哪套行为准则可以促进标准执行，这方面证据却十分有限。由于全球供应链纷繁复杂，季节性和临时性劳动力仍处于CSR框架之外，在全球供应链之外的劳动者也不在这个框架内[131]。要想有效，CSR方面的工作应该更专注于构建当地企业履行责任的能力以及劳工权益检查人员履行自身职责的能力。

贸易和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商品贸易已经逐渐放开，更自由贸易对贸易双方均有利的观念也得到广泛认同。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缺乏利用全球一体化益处的竞争力。因此，提供直接援助用以降低物流成本并提升工农业企业竞争力就成了当务之急。贸易援助显著增长，已经占到发展中国家援助总额的近1/3。不过，若专注于那些最宜于解决受援国具体就业挑战的出口活动，在提升援助效率方面仍有进一步作为的空间。私营部门的参与也会提升援助效率[132]。

与商品贸易不同，多边和地区层面的服务贸易开放一直进展迟缓。正在讨论的当前多哈回合谈判中的提议承诺提高市场准入的安全性，但与现有政策相比在开放性上并没有增加[133]。服务贸易中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市场缺陷——从基础设施的网络外部性到信息不对称和融资领域的道德风险——因此监管力度更大。服务贸易放开需要适当的国内监管。建立电力市场，或者缓解大型分销商对零售贸易的社会冲击，都很棘手[134]。发展中国家服务市场开放程度远低于工业化国家，这并不奇怪[135]。

服务市场开放会带来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很多服务都是生产过程的投入。电力、资金、通信和贸易都对商业成本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下游行业的竞争力。通过促进就业创造和增加工人收入，这些生产率的提升也应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影响可能较为复杂。手机将人（尤其是穷人）与产品市场、就业机会或者政府服务联系在一起，从这方面看影响显然是正面的。但零售贸易消失会导致城市中心退化，影响到难以找到替代就业渠道的年长小店主的生活，从这方面来看又是负面的。处理好这些得失权衡需要服务业适当依次放开，国内监管也必不可少，这样做也就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的担心[136]。国际合作能够弥补知识差距并促进执行[137]。

国际协定也可以促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的发展。例证之一就是性别平等。贸易并不是性别中性的，这意味着，贸易的开放改变着妇女的就业渠道。传统上，男性更可能从事体力劳动，对从业者体力有一定要求，而脑力劳动需要灵敏、关注，或者沟通交流——从纺织品缝纫到数据处理——为女性就业带来更多机会。德里和孟买的呼叫中心有超过100万员工，大部分都是女性。侧重脑力劳动的行业，其产品若享有优先进口权，就可以为那些远未实现性别平等的国家的女性创造就业机会[138]。但随着国家沿国际价值链攀升，有性别倾向性的机会会发生改变。马来西亚就是这种情况，这个国家女性占制造业工人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下降[139]。

移民：与商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不同，与移民，尤其是劳动力跨国流动有关的国际协定极少。即使有，其

涵盖范围也有限。分别于 1952 年和 1978 年施行的《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97 条和第 143 条谈到了防止针对移民的歧视或虐待，呼吁惩处或制裁那些鼓励偷渡或非法移民的国家，但分别只有 49 个国家和 23 个国家认可这两项条款。放开对自然人提供服务的限制，虽然符合服务业贸易总协定（GATS）模式 4 的要求，却并未被许多国家（有工业化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列入日程。联合国针对移民工及其家庭权利的国际公约（已经于 2003 年开始执行）也只有 22 个国家认可——大部分都是工人向外移民的国家。

尽管移民在跨境流动，法律却主要由各国具体制定。这个领域获得了全球的重视，但在需要做些什么的问题上观点却各不相同。一派观点强调各国间巨大的收入差距，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会极大加快全球生产率的提高和减贫的发展 [140]。但另一派则强调国家安全和对社区及本地文化的保护，认为有必要设置壁垒，限制劳动力跨国流动。还有一派指出保护移民（无论他们是否拥有合法身份）人权、为那些受到迫害的人提供庇护的道德责任 [141]。但哪一派的观点都不充分，无论哪种观点都无法独立解决劳动力跨国流动给政策设计带来的复杂局面。

很多时候，劳动力迁出国和接受国都可以通过合作享受流动带来的益处。大部分虐待行为都是蛇头，或者与非法移民有关系的公司或工人所为，因此，保护移民工权利的基本工具就是劳动力跨国流动的“正规化”。但是，没有劳动力流出国和接收国在制度上的合作，正规化也无法推行。这就是有必要针对职业、行业、地区制定配额并设立停留期条款，签订双边协议的原因 [142]。这种协议中可以对劳动者的短期流动和向永久移民转化的步骤加以区分，订立相应的条件和条款。协议还可以考虑税收、社会保障，甚至更高等级教育的资金等问题，后者正是技术移民的特殊关切。协议中还可以设计激励条款，令劳动力迁出国和接受国的受益者均有动力执行协议 [143]。

就业是中心议题，但数字在哪里？

重要研究和数据工作还有待进行。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研究，探讨就业和脱贫/致贫之间的关系、非正规部门微型和小型企业的动态变化以及就业和人类行为及准则之间的关联。对就业溢出效应大小的研究可以确认具体国家中对发展有利的好工作的类型。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关系到就业对获取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根据职业和从业人员的特点而变化。此外，如果有关在特点各异的城市的就业的生产率溢出效应证据有所增多，将对制定发展政策有很高价值。对各类就业产生的环境影响的预测，目前来看仍很缺乏。在劳动力政策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实践证据来界定高原区域的边界，这也会因具体国家的不同而不同。针对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以及移民工会给各国就业构成带来哪些影响，也需要进行更多研究。如果对和服务业相关的国际承诺与国内政策的应有的改革顺序有了更多切实了解之后，那些不愿意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对全球一体化的效益加以利用的国家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确定重点就业政策需要以可靠数据为基础。鉴于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都不是领薪雇员，而在正规部门从业的就更少了，因此衡量就业情况是一种挑战。确定哪些就业在减贫方面最

有效，需要将家庭收入或消费信息与家庭成员就业信息结合来看。了解哪些生产单位能创造更多就业，或者劳动力再分配是否带来显著增长而不只是反复的大比例的生产单位的同时创生和消失，也需要获取种类繁多的生产单位的投入和产出信息。评估就业构成如何影响对社会的信任和参与意愿，也要了解个人价值和个人行为的相关信息。

针对全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不足，和各国非正规就业指标也难以比对，都说明数据的质量和获取对决策来说仍然是一个制约因素。很多研究都着眼于失业率，而且经常性地对其加以衡量[144]。但在大部分劳动力并不从事雇用工作的国家，公开性失业并不是一项很有效的指标。旨在消除贫困的千年发展目标列出了四项指标，来监督实现就业目标的进展，指标被定义为："实现充分的生产性就业，为包括妇女和年青人在内的所有人提供体面的工作。"但这些指标只部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就业数量和质量上的所取得的进步[145]。

劳动力统计方面的挑战目前可以归结为三类：数据差距、数据质量，以及规划、协调和沟通问题。数据差距关系到那些根本没有劳动力统计数据，或者只零星地收集数据的国家。而只要有统计数据，就存在数据质量问题，整个统计流程都存在问题，从恰当定义的采用到问卷设计，从采样框架到访谈程序，从数据录入和编码到数据核实及估算程序。而在数据收集和数据传播归属不同机构管辖时，规划、协调和沟通就成了问题[146]。

25 年前，人们开始重新重视减贫问题，将减贫作为发展政策的主要对象，从而发起了一项长期的数据工作。世界各国纷纷通过标准化调查收集居民生活水平数据，适时记录了采用的取样方法和各种定义。研究人员和项目参与人员可以随时查阅这些数据和文件。就就业而言，用于贫困分析的家庭调查所采用的就业模块需要加以标准化，将非正规企业和微型企业纳入到已经得到认可的调查中。这种方法会让就业受到关注。

***

就业问题来自人口构成、结构性转变、技术进步，以及周期性宏观经济危机，各国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应对。可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确保劳动力市场顺利运行，期待就业机会随之而来。或者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会相应带来最有利于发展的就业机会。女性就业、城市就业机会和与全球价值链相联系的就业机会，为社会最弱势群体提供话语权和社会保障的就业机会，可能就成了当务之急。就业问题的具体性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地理条件、禀赋、制度以及发展水平。但普遍的一条是需要对阻碍了私营部门创造更多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制度失灵和市场缺陷加以补救。然后各国可以再回过头来着手处理最初的难题。对于每个问题，传统智慧都有解答，但是却不能让实行者完全满意。透过就业看发展不会导致彻底否认这种传统智慧，但是会导致对这种智慧何时站得住脚何时站不住脚的进行衡量。

简而言之，各国可以任由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率提高缓慢，社会动荡不安。或者也可以解决自身的就业挑战，从而让更富裕的生活、不断提高的生产率，以及因为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就业途径变得更加公平而增强的社会凝聚力，以可以自我加强的模式为它们所享受。

问题 传统智慧在什么情况下是正确的？

是增长战略还是就业战略？传统智慧认为应专注于经济增长，将其作为持续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前提条件。但是，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三种转变不同步，存在滞后和差距的现象并不少见。增长对减贫的影响在各个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凝聚力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强——即使对一部分人来说贫困减轻了，生活水平改善了，但其他人的期望却没有得到满足。不同行业的就业密度以及得到就业机会方面的公平性都十分重要，因此，必须是能同时带来三种转变的就业才行。

可以说在改善生活水平、加速提高生产率和促进社会凝聚力之间进行权衡反映的是一个衡量问题，而不是一种实际的选择。如果衡量增长的指标能捕捉到就业带来的各种无形的社会效益（从贫困减轻到社会凝聚力增强），那么增长战略和就业战略就可以等同起来。然而，增长战略可能对女性就业、二线城市的就业或者青年人的闲散状态不够重视。在就业的潜在溢出效应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就业战略可能是更有益的着眼点。

企业家精神可以培养吗？传统智慧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微型和小型企业只不过是一种谋生的形式，成长的机会有限。但是自就业劳动者在发展中国家就业中的比例很大。即使他们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成功地建立了可以成长的业务，对生活水平和生产率的总体影响也是相当可观的。此外，在发展中国家多数大型企业从创建之初规模就大，常常是政府支持或者能优先得到资金和信息的结果。能打破特权是微型和小型企业的成功如此重要的又一个原因。

即使在中小型企业中，管理方面的做法对于企业的生产率也十分重要。获得技能并将其用于业务中的能力是成功的企业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然而市场未能培养企业家精神，因为知识的溢出效应意味着：获得或者形成新的管理理念和知识所带来的部分回报会被他人盗取。而且不同的受益者吸收管理实践经验的潜力有着巨大的不同。通过小企业主带有的明显特点可以预测其作为企业家所具备的潜力，而且提高小企业主管理能力的计划也已被证明能带来不同。因此，针对有企业家潜力的小企业主的计划可以对生活水平和生产率产生巨大影响。

就业政策对社会凝聚力能否有所贡献？传统智慧认为，缺乏就业对社会凝聚力不利，但除了确保充分就业外，政府几乎做不了什么或者也不应做什么。不过，公开失业并不是许多国家的主要挑战，因为就业的特点也非常重要。尽管并非所有的就业都会对社会凝聚力产生积极影响，那些能形成社会身份、建立人际网络（特别是针对受排斥的群体的）并增加公平感的就业能够有助于消除紧张关系和支持和平地作出共同决定。

能够支持包容、扩大获得话语权和其他权利的途径、改善劳动力市场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措施可以增加人们对自己与社会息息相关的认知。当因为青年人失业而发生社会动乱和冲突的风险很高的时候，这种认知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管理不力或者目标不一致，就业计划就会削弱社会凝聚力，但如果设计良好的话，就能产生积极效果。针对处于危险中的青年人的就业政策可以加入有关冲突解决方面的咨询和培训。公共工程项目能够促进社区参与以及市民与地方政府间的接触。政策关注点因此不能只放在就业数量上，还应放在为受到排斥的群体增加就业机会上。

技能和工作——哪个是第一位的？传统智慧认为在提升技能方面进行投资会增加就业机会并提高生产率和劳动收入。高失业率和技能匹配不当常常被归咎于教育和培训体系的不足，但在现实中，这也可能是市场失真，从而向教育体系发出错误信号或导致私营企业缺乏活力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对培训体系进行大规模投资（这可以在世界许多地方见到）可能会出现令人失望的结果，因为在就业方面希望取得的成果并没有实现。

一系列核心的基本技能（既有认知的，也有社会的）对于生产性就业是必须的，而这些技能无法在岗位上获得。没有这些一般性技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前景便十分渺茫。对于要在附加值阶梯上进一步攀升的国家而言，技能也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能引发创新，产生互相学习的效益，因此本身就能增加就业机会。但除这两者之外，大部分学习可以通过工作来

完成：就业机会能形成社会技能并创造对于教育和培训的需求。在许多情况下，在岗学习能显著地提高收入，一年的工作经验带来的回报大约相当于在校多学习一年带来的回报的 1/3 到 1/2。

有针对性的投资环境？传统智慧认为平等的环境更加可取，因为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来选择优胜者，而针对性有可能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但鉴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空间和管理能力通常都十分有限，创造一个全面有利于营商的环境充满挑战性，相应的问题就是应如何确定政策重点。传统智慧对针对性的怀疑态度源于以往工业政策方面的失败经验，然而，针对性不一定非要瞄准工业领域。增加女性就业率高的行业的就业机会，或者提高小型农业的生产率，或者增加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就业，对这些予以支持可能会带来较高发展效益，当然这还要取决于国情。

对于哪些领域存在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有了明确认识，并且有足够的信息来了解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支持创造这样的工作机会的情况下，有针对性的投资环境可能才有保证，但条件是对针对性干预的设计使它们能不为利益集团所利用。在受益者数量巨大（比如受益者是农民、城市企业、女性微型企业主）的情况下被利用的风险比较容易得到控制。而如果是瞄准工业领域的工业政策则这种风险就高得多。

为就业而竞争？传统智慧认为就业机会的数量是无限的，因此，在一个国家能促进就业的政策对别的国家不会造成损害。实际上，从中长期来看，总就业量基本由劳动力规模决定。但是政策可能会改变全球贸易、投资和移民流动，从而影响就业构成。令人担心的是在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在就业中所占的比例在一个国家有所提高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个国家出现下降。旨在扩大本国在全球具有最大有效溢出的就业中所占比例的政策可能会损害其他国家的福祉，尽管全球福祉可能有所提高。

不过，并非所有支持创造就业机会的努力都演变为以邻为壑的政策。这些努力是否会演变为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决于采用措施的类型以及就业带来的溢出效应的性质。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就业政策服务于什么目的。旨在加强对权利保障法规的遵守、将强迫劳动和各种有害的儿童劳动行为诉诸法律的政策会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另外，旨在获取有效外部性带来的益处的政策可能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在这些政策会削弱开放的贸易体系，并且与国家有力的比较优势不一致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保护就业者还是就业机会？传统智慧认为保护就业者的政策是可取的，因为它们能减轻福利方面的损失，同时使劳动力得以重新分配，从而支持创造性的消减。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和保护就业的立法来保护那些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行的就业会冻结本就效率不高的资源分配。保护就业机会还会带来很高的被利用的风险。它可能导致持久的非生产性就业，遏制技术进步，阻碍结构性转变并最终削弱增长。

然而，的确会出现大量就业机会即刻丧失或受到威胁，而新增的就业机会却寥寥无几的情况。还有一些就业会产生可观的生产率溢出效应，这些工作一旦大量消失，会导致出现废弃的城市和萧条的地区。如果造成的冲击只是个别性的——如果就业紊乱只是地方性的且规模有限，如果劳工流动依然保持常规——那么保护就业者应该放在首位。在出现系统性危机或进行重大的经济重组时保护就业机会也许是合理的。但保护就业的政策会产生长久的低效率，在制度薄弱的国家尤其如此，从而使制定和执行触发规则和日落条款，对保护的程度和规模加以界定成为必要。

如何加速劳工的重新分配？传统智慧认为政策应该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为焦点，正是这种僵化使劳工滞留在生产率低的企业或地区。但是改革在政治上并不总是可行的。在印度，复杂且缺乏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显然对经济效率有消极影响，但是，60 年来这些制度基本没什么变动。

对规避有扭曲作用的监管的容忍有助于抑制制度僵化带来的成本，但却无法保证活力。在印度，普遍存在的不遵守规定一直是对缺乏灵活性的监管规定最主要的回应。然而，尽管总体经济的表现活力十足，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依然委靡不振。其他有类似严苛的监管障碍的国家积极利用工业集群、活力城市或全球价值链中的就业带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以削弱监管规定的约束力，从而完成了能提高效率的劳动力再分配。在斯里兰卡，出口加工区（EPZ）的发展推动了服装业的起飞。在巴西，内部人口流动的剧增与这个国家不断地融入全球经济以及支持产业集群和城市聚合作用的发展政策密切相关。在中国，劳动力的再分配植根于竞争性城市的发展，并受到地区性竞争和试验的支持。通过城市化和全球一体化，对增强就业带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予以战略性关注，可以克服劳动力市场的僵化。

就业推动发展 它不应是增长后才要考虑的事情

有些就业具有更大的发展效益 **重要的不仅是就业的数量**

就业由私营部门创造 公共部门的行动为就业创造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就业机会存在于农场和规模很小的企业 **非正规是正常现象**

有些工作是不可接受的 不应忽视权利

不能“一刀切” **不同的国家就业挑战不同**

确保政策基本原则 不论就业挑战是什么它们都会产生影响

创造就业的主要制约因素可能存在于别的方面 **劳工政策的重要性并没通常认为的那么大**

确定公共部门行动的重点 专注于发展效益更大的就业

有关跨境投资和移民的数据与合作滞后 **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就业议程**

注释

1. 国际劳工组织 2007，第二条。另外还见于联合国 2009。

2. Ghose、Majid 和 Ernst 2008。

3.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Gindling 和 Newhouse 2012。

4. Kanbur 2009。

5.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部门，http：//laborsta.ilo.org/sti/sti_E.thtml。

6.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Lyon、Rosati 和 Guarcello 2012。

7. 世界银行 2006b。

8.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的估计，http：//laborsta.ilo.org/applv8/data/EAPEP/eapep_E.html 及世界发展指标，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9. 联合国 2011。

10. 林（音）2012；Pagés 2010；世界银行 1992。

11. 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 2008。

12. Autor 和 Dorn 2011；Gratton 2011；Holzer 和 Lerman 2009。

13. Feenstra 2010。

14. Brown、Ashton 和 Lauder 2010。见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Selim 2012。

15. Goswami、Mattoo 和 Sáez 2011。

16. 实例包括 oDesk，https：//www.odesk.com/；Babajob，http：//wwwbabajobcom/；Google Trader（例如：http：//www.google.co.ug/africa/rader/search?cat=jobs）；和 SoukTel，http：//www.souktel.org/。

17. TeamLease 2010。

18. A.T. Kearney 2011。

1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http：//stats.uis.unesco.org/unesco/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175.

20. 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对参加 2009 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国家评分最高的 20% 学生进行的估计，这项评估针对的是 15 岁的学生。见 http：//www.pisa.oecd.org。

21.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工的统计的数据库，简称：Laborsta，http：//laborsta.ilo.org/e。

22. 私营部门就业此处指“私营公司”，也指“个体”。前者的定义是由自然人投资和建立的营利单位，或者由使用 7 个以上工人劳动的人掌控的营利单位。后者包括雇用少于 8 个工人的单位。外国投资公司和集体所有公司在官方统计中不算做私营部门。欲知详情，参见 Kanamori 和赵（音译）(2004)。

23. Nabli、Silva-Jáuregui 和 Faruk Aysan 2008。

24. Assaad 2012；Assaad 和 Barsoum 2007。

25. Mryyan 2012；Gatti 等 2012；Stampini 和 Verdier-Choucane 2011；国际劳工组织 2011。

26. 根据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对陈（音译）和 Ravallion（2010）的更新。

27. World Bank 2011b。

28. 国际劳工组织 2012a。

29. 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 2012。

30. Bell 和 Blanchower 2011；Farber 2011。

31. 世界银行 2011c。

32. Ravallion 2009。

33.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Inchauste 2012。

34. Baulch 2011；Fields 等 2003。

35. Narayan、Pritchett 和 Kapoor 2009。

36.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zevedo 等 2012。本报告采用了包括 Paes de Barros 等（2006）以及 Bourguignon 和 Ferreira（2005）等作者开发的方法。

37. Blanchower 和 Oswald 2011。

38. Haltiwanger 2011 年；Nelson 1981；Schumpeter 1934。

39. Bartelsman、Haltiwanger 和 Scarpetta 2009；Davis、Haltiwanger 和 Schuh 1996。

40. Bartelsman、Haltiwanger 和 Scarpetta 2009。

41. Baily、Bartelsman 和 Haltiwanger 1996。

42.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的估计。

43. Bartelsman、Haltiwanger 和 Scarpetta 2004；Brandt、Van Biesebroeck 和张（音）2012；林（音）2012；Rutkowski 等 2005。

44.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的估计，以及 Dutz 等（2011）。

45. Ayyagari、Demirgüç-Kunt 和 Maksimovic 2011；国际金融公司即将发表的报告。

46. 南非不包括在本图中，因为它是例外，其农场的平均规模是 288 公顷。

47. Hsieh 和 Klenow 2009；Pagés 2010。

48. Banerjee 和 Duo 2011；Fox 和 Sohnesen 2012；Schoar 2010；Sutton 和 Kellow 2010。

49. de Soto 1989；Perry 等 2007。

50. Grimm、Kruger 和 Lay 2011；McKenzie 和 Woodru 2008。

51. Mertens 2011；Witze 2010。

52. Sandefur 2010。

53. Hsieh 和 Klenow 2011。

54. Bartelsman、Haltiwanger 和 Scarpetta 2009；Haltiwanger 2011；Hsieh 和 Klenow 2009；Syverson 2011。

55. Moser 2009，240。

56. Dani 等 1999，3。

57. Kilroy 2011。

58. Gatti 等 2012。

59. Akerlof 和 Kranton 2010。

60.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Giles、Mavridis 和 Witoelar 2012。

61. 国际劳工组织 2012b。

62. 国际劳工组织 2010。

63. 国际劳工组织 2002。

64. Heath 和 Mobarak 2011。

65. Luke 和 Munshi 2011。

66. Alfaro 和陈（音）2011；Romer 1993。

6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3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3b。

68. Ibarraran 等 2012。

69. 作为实例，近年来的世界发展报告关注的主题：青年（世界银行 2006b）、地理（世界银行 2009b）、冲突（世界银行 2011a）和性别（世界银行 2011）探讨了不同背景下就业的溢出效益。

70. Glewwe 2004。

71. 国际移民组织 2010。

72. Goswami、Mattoo 和 Sáez 2011。

73. Ball、Leigh 和 Loungani 2012。

74. 世界银行 2012，多期出版物。

75. 增长与发展委员会 2008。

76. Kraay 2012。

77. Elbadawi、Kaltani 和 Soto 2009。

78. King 和 Levine 1993；Levine 2005。

79. 国际金融公司即将发表的报告。

80. Foster 和 Briceño-Garmendia 2010。

81. Djankov、Freund 和 Pham 2010；Hallward-Driemeier、Khun-Jush 和 Pritchett 2010。

82. Klapper、Laeven 和 Rajan 2006。

83. Bruhn 2008。

84. 实例见 Psacharopoulos 和 Patrinos（2004）；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Montenegro 和 Patrinos 2012。

85. 实例见 Hanushek 和 Woessmann（2008）以及 Commander 和 Svejnar（2011）关于与生产率的联系的部分。Lee 和 Newhouse（2012）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中探讨了结构性变化和贫困的联系。

86. Engle 等 2007，Grantham-McGregor 等 2007；Heckman 2008；Walker 等 2007；Young 和 Richardson 2007。

87. Engle 等 2007。

88. Heineck 和 Anger 2010，Cunha、Heckman 和 Schennach 2010。

8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2009，http：//www.pisa.oecd.org。

9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3；Rodrik 2000。

91. Keefer 2009；North 1981、1990。

92. 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 2001；North 1990；Rodrik、Subramanian 和 Trebbi 2004。

93. 世界银行 2004。

94. 世界银行 2010。

95. 世界银行 2004。

96. 世界银行 2004。

97. Laeven 和 Woodru 2007。

98. 国际劳工组织 1998。

99.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陈（音）等 2012。

100. Betcherman 2012。

101. Alatas 和 Cameron 2003；Arango 和 Pachón 2004；SMERU 研究所 2001。

102. Haltiwanger、Scarpetta 和 Schweiger 2008。

103.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Betcherman 2012；Freeman 2009；经合组织 2006。

104. Aidt 和 Tzannatos 2002。

105. Freeman 2009。

106. Aidt 和 Tzannatos 2002。

107. Card、Kluve 和 Weber 2010；经合组织 2006；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lmeida 等 2012。

108. Bird 和 Smart 2012；Levy 2008。

109. Bhatt 2006；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陈（音）等 2012。

110. 世界银行 2010。注意这一单位成本是多国遣散和重新融入社会项目的合计成本，包括各种形式的融入支持，不只是就业。

111. Glewwe 2004。

112. Rama 2009。

113.《2012 年世界发展指标》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华盛顿，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114. 世界银行 2007。

115. 卢旺达遣散和重新融入委员会2012。

116. 2010 年卢旺达被《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列为排名第一的改革国家。

117. Dudwick 和 Srinivasan，即将发布；世界银行 2010a。

118.《2012 年世界发展指标》。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华盛顿，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119. Consejo Nacional de Innovación 2008；世界银行 2008。

120. 世界银行 2006a；《2011 年世界发展指标》。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华盛顿，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121. 经合组织 2010。

122. 经合组织 2009。

123. 经合组织 2009。

124. Yusuf 和 Nabeshima 2006；Park 等

2011。

125. 见世界银行 2010；Gibson、McKenzie 和 Rohorua 2008。

126. Fajnzylber、Maloney 和 Montes-Rohas 2011；经合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 2011。

127. 世界银行 2011d。

128. Chau 和 Kanbur2002 年发现同伴效应的证据，即一个国家是否批准协议取决于已经批准协议的类似国家数量。

129.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dler 和 Hwang 2012。

130.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Levi 等 2012；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Newitt 2012。

131. Locke，即将发表；Locke、Quin 和 Brause 2007。

132. Hoekman 2011。

133. Borchert、Gootiiz 和 Mattoo 2011。

134. Francois 和 Hoekman 2010。

135. Hoekman 和 Mattoo 2011。

136. Fink、Mattoo 和 Rathindran 2003；Francois 和 Hoekman 2010。

137. Hoekman 和 Mattoo 2011。

138. 世界银行 2011c。

139. Randriamaro 2007。

140. 实例见 Winters 等（2002）；世界银行（2005）。

141. 实例见 EFRA（2011）和 Angenendt（2012）。

142. 地区性协议，比如在欧盟的申根协定，也可以覆盖移民的签证或社会保障等特定领域。几个拉美国家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在制定有关社会保障权利和移民监管法规的共同原则。

143. 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见 Pritchett（2006）。

144. 只有 65 个编制月度或季度劳动力调查报告，而其他 116 个编制年度调查报告。

145. 四个指标是：受雇者人均 GDP（衡量生产率的一个指标）、就业人数与人口之比率、每日生活费不到 1.25 美元的受雇用人口所占的比例（所谓工作的穷人）、自营和无报酬劳动者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被称为脆弱劳动者）。见联合国发展集团 2010。

146. 国际劳工组织 2012c。有关数据对劳动力分析和政策的重要性请参见 Kanbur 和 Svejnar（2009）。

参考文献

“*Processed*”一词表述的是经过非正式复制的作品，通常可能无法通过图书馆获取。

A.T. Kearney. 2011. *Offshoring Opportunities amid Economic Turbulence: A.T. Kearney Global Services Location Index, 2011*. Chicago: A.T. Kearney Global Services Location Index.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5): 1369–401.

Adler, Daniel, and Hans Hwang. 2012. “From Law on the Books to Law in Action: A Note on the Role of Regula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Good Jobs in Cambodia’s Garment Sector.”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Aidt, Toke, and Zafiris Tzannatos. 2002. *Union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Economic Effects in a Global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kerlof, George A., and Rachel E. Kranton. 2010. *Identity Economics: How Our Identities Shape Our Work, Wages, and Well-Be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atas, Vivi, and Lisa Ann Cameron. 2003.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s on Employment in a Low Income Country: An Evaluation Us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98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lfaro, Laura, and Maggie Xiaoyang Chen. 2011. “Selection, Reallocation,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Identifying the Impact of Multinational Activity o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 October 6.

Almeida, Rita, David Margolis, David Robalino, and Michael Weber. 2012. “Facilitating Labor Market Transitions and Managing Risk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Amador, Diego, Raquel Bernal and Ximena Peña 2011. “The Rise in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Colombia: Fertility, Marital Status or Educatio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Angenendt, Steffen. 2012. “Migration and Social Inclusion–Looking through the Good Jobs Lens.” In *Moving Jobs to the Center Stage,* BMZ (Bundesministerium fuer Wirtschaftliche Zussamenarbeit), Berlin Workshop Series. Berlin.

Arango, Carlos, and Angelica Pachón. 2004. “Minimum Wages in Colombia: Holding the Middle with a Bite on the Poor.” Borradores de Economía Serie 280, Banco de la República de Colombia, Bogotá.

Artuc, Erhan, Frederic Docquier, Caglar Özden, and Chris Parsons. 2012. “Education Structure of Global Migration Patterns: Estimates Based on Census Dat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Assaad, Ragui. 2012. “The MENA Paradox: Higher Education but Lower Job Quality.” In *Moving Jobs to the Center Stage.* BMZ (Bundesministerium

fuer Wirtschaftliche Zussamenarbeit), Berlin Workshop Series. Berlin.

———. 1997. "The Effects of Public Sector Hiring and Compensation Policies on the Egyptian Labor Market."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1 (1): 85–118.

Assaad, Ragui, and Ghada Barsoum. 2007. "Youth Exclusion in Egypt: In Search of 'Second Chances.'" Middle East Youth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Series 2, Wolfensohn Center for Development, Dubai School of Government, Dubai.

Autor, David H., and David Dorn. 2011. "The Growth of Low-Skill Service Job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Processed.

Ayyagari, Meghana, Asli Demirgüç-Kunt, and Vojislav Maksimovic. 2011. "Firm Innov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Roles of Governance and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46 (6): 1545–80.

Azevedo, João Pedro, Gabriela Inchauste, Sergio Olivieri, Jaime Saavedra Chanduvi, and Hernan Winkler. 2012. "Is Labor Income Responsible for Poverty Reduction? A Decomposition Approach."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Baily, Martin Neil, Eric J. Bartelsman, and John Haltiwanger. 1996. "Downsiz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Myth or Realit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8 (4): 259–78.

Ball, Laurence, Daniel Leigh, and Prakash Loungani. Forthcoming. "Okun's Law: Fit at 50?" Working Pape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Banerjee, Abhijit V., and Esther Duflo. 2011.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Bartelsman, Eric, John Haltiwanger, and Stefano Scarpetta. 2004. "Microeconomic Evidence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in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374,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 2009. "Measuring and Analyz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Firm Dynamics." In *Producer Dynamics: New Evidence from Micro Data*, ed. Timothy Dunne, J. Bradford Jensen, and Mark J. Roberts, 17–76.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aulch, Bob, ed. 2011. *Why Poverty Persists: Poverty Dynamics in Asia and Africa.*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Bell, David N. F., and David G. Blanchflower. 2011. "The Crisis, Policy Reactions and Attitudes to Globalization and Job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680,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Betcherman, Gordon. 2012.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Bhatt, Ela. 2006. *We Are Poor But So Many: The Story of Self-Employed Women in In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ird, Richard M., and Michael Smart. 2012. "Financing Social Expenditur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ayroll or Value Added Taxe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Working Paper Series 1206, Andrew Young School of Policy Studies,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Atlanta.

Bjørkhaug, Ingunn, Anne Hatløy, Tewodros Kebede, and Huafeng Zhang.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Colombi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Blanchflower, David G., and Andrew J. Oswald. 2011. "International Happiness." Working Paper Series 1666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Borchert, Ingo, Batshur Gootiiz, and Aaditya Mattoo. 2011. "Services in Doha: What's on the Table?" In *Unfinished Business: The WTO's Doha Agenda,* ed. Will Martin and Aaditya Mattoo, 115–44. London: London Publishing Partnership.

Bourguignon, François, and Francisco H. G. Ferreira. 2005. "Decomposing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s: Methodological Aspects." In *The Microeconomic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Dynamics in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ed. François Bourguignon, Francisco H. G. Ferreira, and Nora Lustig, 17–4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Brandt, Loren, Johannes Van Biesebroeck, and Yifan Zhang. 2012.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7 (2): 339–51.

Brown, Philip, David Ashton, and Hugh Lauder. 2010. *Skills Are Not Enough: The Global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Future of the UK Economy.* Wath upon Dearne, U.K.: U.K. Commission for Employment and Skills.

Bruhn, Miriam. 2008. "License to Sell: The Effect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Reform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Mexico."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53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ard, David, Jochen Kluve, and Andrea Weber. 2010.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Evaluations: A Meta-Analysis." *Economic Journal* 120 (11): 452–77.

Chau, Nancy H., and Ravi Kanbur. 2001. "The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Conventions: Who, When and Why?" In *Brookings Trade Forum: 2001*, ed. Nancy H. Chau, Ravi Kanbur, Ann E. Harrison, and Peter Morici, 113–56.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Chen, Martha, Chris Bonner, Mahendra Chetty, Lucia Fernandez, Karin Pape, Federico Parra, Arbind Singh, and Caroline Skinner. 2012. "Urban Informal Workers: Representative Voice and Economic Right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Chen, Shaohua, and Martin Ravallion. 2010. "The Developing World Is Poorer Than We Thought, but No Less Successful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 (4): 1577–625.

Chioda, Laura. 2012. *Work and Family: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Women in Search of a New Balan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ommander, Simon, and Jan Svejnar. 2011. "Business Environment, Exports Ownership, and Firm Performan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 (1): 309–37.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008. *The Growth Commission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onsejo Nacional de Innovación. 2008. *Hacia una Estrategia Nacional de Innovación para la Competitividad.* Santiago: Consejo Nacional de Innovación.

Cunha, Flavio, James J. Heckman, and Susanne Schennach. 2010. "Estimating the Technology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 Formation." *Econometrica* 78 (3): 883–931.

Dani, Anis, Sarah Forster, Mirsada Muzur, Dino Djipa, Paula Lytle, and Patrizia Poggi. 1999. *A Social Assessment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avis, Steven J., John C. Haltiwanger, and Scott Schuh. 1996.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e Soto, Hernando. 1989. *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Djankov, Simeon, Caroline Freund, and Cong S. Pham. 2010. "Trading on Tim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2 (1): 166–73.

Dudwick, Nora, and Radhika Srinivasan, with Jose Cueva and Dorsati Madani. Forthcoming. *Creating Value Chains in Africa's Fragile States: Are Value Chains an Answer?* Directions in Development Ser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utz, Mark A., Ioannis Kessides, Stephen O'Connell, and Robert D. Willig. 2011.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Driven Inclusive Growt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85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EFRA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2011. *Fundamental Rights of Migrants in an Irregular Situ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lbadawi, Ibrahim, Linda Kaltani, and Raimundo Soto. 2009. *Aid, Real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Santiago: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Engle, Patrice L, Maureen M. Black, Jere R. Behrman, Meena Cabral de Mello, Paul J. Gertler, Lydia Kapiriri, Reynaldo Martorell, and Mary Eming Young. 2007. "Strategies to Avoid the Loss of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in More than 200 Million Childre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Lancet* 369 (9557): 229–42

Euro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 2008. *Future Skill Needs in Europe, Medium-Term Forecast, Synthesis Report.* Brussels: Euro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

Fajnzylber, Pablo, William F. Maloney, and Gabriel V. Montes-Rojas. 2011. "Does Formality Improve Micro-Firm Performance?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the Brazilian SIMPLES Program."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4531,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Farber, Henry S. 2011. "Job Loss in the Great Recess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rom the Displaced Workers Survey, 1984–2010."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696,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Fares, Jean, and Olga Susana Puerto. 2009. "Towards Comprehensive Training."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92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Feenstra, Robert C. 2010. *Offshor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Microeconomic Structure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ields, Gary, Paul Cichello, Samuel Freije-Rodriguez, Marta Menendez, and David Newhouse. 2003. "Household Income Dynamics: A Four-Country Sto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0 (2): 30–54.

Fink, Carsten, Aaditya Mattoo, and Randeep Rathindran. 2003. "An Assess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s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15 (4): 443–66.

Foster, Vivien, and Cecilia Briceño-Garmendia, eds. 2010. *Africa's Infrastructure: A Time for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Fox, Louise, and Thomas Sohnesen. 2012. "Household Enterprise in Sub-Saharan Africa: Why They Matter for Growth, Jobs, and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618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François, Joseph F., and Bernard Hoekman. 2010. "Services Trade and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8 (3): 642–92.

Freeman, Richard. 2009. "Labor Regulations, Unions,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rket Distortions or Efficient Institutions?" I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5, ed. Dani Rodrik and Mark Rosenzweig, 4657–702. Amsterdam: Elsevier.

Gatti, Roberta, Diego Angel-Urdinola, Joana Silva, and Andras Bodor. 2012. *Striving for Better Jobs: The Challenge of Informalit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hose, Ajit K., Nomaan Majid, and Christoph Ernst. 2008. *The Global Employment Challeng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ibson, John, David McKenzie, and Halahingano Rohorua. 2008. "How Pro-Poor is the Selection of Seasonal Migrant Workers from Tonga Under

New Zealand's Recognized Seasonal Employer Program." Working Paper Series 469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Giles, John, Dimitris Mavridis, and Firman Witoelar. 2012.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Cohesion,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Indonesi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Gindling, T. H., and David Newhouse. 2012. "Self-Employ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Glewwe, Paul W. 2004. "An Overview of Economic Growth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Vietnam in the 1990s." In *Economic Growth, Poverty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Vietnam*, ed. Paul Glewwe, Bina Agarwal, and David Dollar, 1–2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oswami, Arti Grover, Aaditya Mattoo, and Sebastián Sáez, eds. 2011. *Exporting Services: 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antham-McGregor, Sally, Yin Bun Cheung, Santiago Cueto, Paul Glewwe, Linda Richter, Barbara Strupp,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eering Group. 2007.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the First 5 Years for Childr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ancet* 369 (January): 60–70.

Gratton, Lynda. 2011. *The Shift: The Future of Work Is Already Here*. London: HarperCollins.

Grimm, Michael, Jens Kruger, and Jann Lay. 2011. "Barriers to Entry and Returns to Capital in Informal Activities: Evidence from Sub-Saharan Afric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7 (S1): S27–S53.

Hallward-Driemeier, Mary, Gita Khun-Jush, and Lant Pritchett. 2010. "Deals Versus Rules: Policy Implementation Uncertainty and Why Firms Hate It." Working Paper Series 1600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Haltiwanger, John. 2011.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Volatility." In *Making Globalization Socially Sustainable*, ed. Marc Bacchetta and Marion Jansen, 119–46.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altiwanger, John, Stefano Scarpetta, and Helena Schweiger. 2008. "Assessing Job Flows across Countries: The Role of Industry, Firm Size, and Regulations." Working Paper 1392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Hanushek, Eric A., and Ludger Woessmann. 2008. "The Role of Cognitive Skill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 (3): 607–88.

Hatløy, Anne, Tewodros Kebede, Huafeng Zhang, and Ingunn Bjørkhaug.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Sierra Leon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Heath, Rachel, and Mushfiq Mobarak. 2011. "Supply and Demand Side Constraints on Educational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Garment Sector Jobs and a Girls' Schooling Subsidy Program in Bangladesh."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Processed.

Heckman, James J. 2008. "The Case for Investing in Disadvantaged Young Children." *In Big Ideas for Children: Investing in Our Nation's Future,* 49–58. Washington, DC: First Focus.

Heineck, Guido, and Silke Anger. 2010. "The Returns to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in Germany." *Labour Economics* 17 (3): 535–46.

Hoekman, Bernard. 2011. "Aid for Trade: Why, What, and Where Are We?" In *Unfinished Business? The WTO's Doha Agenda*, ed. Will Martin and Aaditya Mattoo, 233–54. London: London Publishing Partnership.

Hoekman, Bernard, and Aaditya Mattoo. 2011.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gulatory Reform: Re-invigora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51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olzer, Harry, and Robert Lerman. 2009. *The Future of Middle-Skill Jobs*. Washington, DC: Center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Hsieh, Chang-Tai, and Peter J. Klenow.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4): 1403–48.

———. 2011. "The Life Cycle of Plants in India and Mexico." Chicago Booth Research Paper 11-33,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Ibarrarán, Pablo, Laura Ripani, Bibiana Taboada, Juan Miguel Villa, Brigida Garcia. 2012. "Life Skills, Employability and Training for Disadvantaged Youth: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Design." IZA Conference Paper, May 12, 2012. Processed.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Forthcoming. *IFC Job Study: Assessing Private Sector Contributions to Job Creation*. Washington, DC: IFC.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1998.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at its 86th session, ILO, Geneva, June 18.

———. 2002. *Decent Work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Geneva: ILO.

———. 2007. Resolution Concerning Updat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Adopted by the Tripartite Meeting of Experts on Labour Statistics on Updat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ILO, Geneva, December 6.

———. 2010. *Accelerating Action against Child Labour*. Geneva: ILO.

———. 2011.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Geneva: ILO.

———. 2012a.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2: Preventing a Deeper Jobs Crisis*. Geneva: ILO.
———. 2012b. *ILO Global Estimate of Forced Labour: Results and Methodology*. Geneva: ILO.
———. 2012c. "What Are the Key Challenges Facing Labour Statistics Today?" ILO, Geneva. Processed.
ILO and World Bank. 2012. *Inventory of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Joint Synthesis Report*. Washington, DC: ILO and World Bank.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3. "Growth and Institutions." In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03; Growth and Institutions,* 95–128. Washington, DC: IMF.
Inchauste, Gabriela. 2012. "Jobs and Transitions out of Poverty: A Literature Review."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Inchauste, Gabriela, Sergio Olivieri, Jaime Saavedra Chanduvi, and Hernan Winkler. 2012. "Decomposing Recent Declines in Poverty: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Peru, and Thailand."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8.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8: Managing Labor Mobility in the Evolving Global Economy*. Geneva: IOM.
———. 2010.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0. The Future of Migration: Building Capacities for Change*. Geneva: IOM.
Kanamori, Tokishi, and Zhijun Zhao. 2004.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Kanbur, Ravi. 2009. "Conceptualizing Informality: Regulation and Enforcement." *India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 52 (1): 33–42.
Kanbur, Ravi, and Jan Svejnar, eds. 2009. *Labor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outledge.
Kebede, Tewodros, Anne Hatløy, Huafeng Zhang, and Ingunn Bjørkhaug.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Egyp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Keefer, Philip. 2009. "Governance."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ed. Todd Landman and Neil Robinson, 439–62.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Kilroy, Austin. 2011. "Business Bridging Ethnicity." Ph.D. thesi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King, Robert, and Ross Levine. 1993.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 (3): 717–37.
Klapper, Leora, Luc Laeven, and Raghuram Rajan. 2006. "Entry Regulation as a Barrier to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2 (3): 591–629.
Kraay, Aart. 2012. "How Large Is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Multiplier? Evidence from World Bank Lend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 (2): 1–59.
Laeven, Luc, and Christopher Woodruff. 2007. "The Quality of the Legal System, Firm Ownership, and Firm Siz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 (4): 601–14.
Lee, Jean, and David Newhouse. 2012. "Cognitive Skill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Levi, Margaret, Christopher Adolph, Aaron Erlich, Anne Greenleaf, Milli Lake, and Jennifer Noveck. 2012. "Align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Why, When, and How to Uphold Labor Standard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Levine, Ross. 2005. "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865–934. Amsterdam: Elsevier.
Levy, Santiago. 2008. *Good Intentions, Bad Outcomes, Social Policy, Inform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exico*.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Lin, Justin Yifu. 2012.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cke, Richard. Forthcoming. *Beyond Compliance: Promoting Labor Justice in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cke, Richard, Fei Quin, and Alberto Brause. 2007. "Does Monitoring Improve Labor Standards? Lessons from Nike."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61 (1): 3–31.
Luke, Nancy, and Kaivan Munshi. 2011. "Women as Agents of Change: Female Income and Mobility in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4 (1): 1–17.
Lyon, Scott, Furio C. Rosati, and Lorenzo Guarcello. 2012. "At the Margins: Young People neither in Education nor in Employmen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Maloney, William F., and Jairo Núñez Méndez. 2003.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s: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Working Paper Series 98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McKenzie, David, and Christopher Woodruff. 2008.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Returns to Capital and Access to Finance in Mexico."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2 (3): 457–82.
Mertens, Brian. 2011. "Forbes Asia's Businessman of the Year." *Forbes Asia Magazine,* December 5.
Montenegro, Claudio E., 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 2012. "Returns to Schooling around the World."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Moser, Caroline O. N. 2009. *Ordinary Families, Extraordinary Lives: Assets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Guayaquil, 1978–2004.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Mryyan, Nader. 2012. "Demographic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Jordan." Working Paper Series 670, Economic Research Forum, Giza, Egypt.

Nabli, Mustapha K., Carlos Silva-Jáuregui, and Ahmet Faruk Aysan. 2008. "Authoritarianism, Credibility of Reforms, and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orking Paper Series 443, Economic Research Forum, Cairo.

Narayan, Deepa, Lant Pritchett, and Soumya Kapoor. 2009. *Moving Out of Poverty: Success from the Bottom Up*.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Nelson, Richard R. 1981. "Research 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Dead Ends and New Departur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 (3): 1029–64.

Newitt, Kirsten. 2012. "Private Sector Voluntary Initiatives on Labour Standard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6.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06*. Paris: OECD.

———. 2009. *OECD Reviews of Labour Market and Social Policies: Slovenia*. Paris: OECD.

———. 2010. *Off to a Good Start? Jobs for Youth*. Paris: OECD.

OECD and ILO. 2011. G20 Country Policy Briefs: Brazil—Share of Formal Employment Continues to Grow. Paris: OECD and ILO.

Özden, Çaglar, Christopher Parsons, Maurice Schiff, and Terrie L. Walmsley. 2011. "Where on Earth Is Everybody?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Bilateral Migration 1960–2000."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5 (1): 12–56.

Paes de Barros, Ricardo, Mirela de Carvalho, Samuel Franco, Rosane Mendoça. 2006. "Uma Análise das Principais Causas da Queda Recente na Desigualdade de Renda Brasileira." *Revista Econômica* 8(1): 117–147.

Pagés, Carmen, ed. 2010. *The Age of Productivity: Transforming Economies from the Bottom Up*.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ark, Jaegil, Daejong Kim, Yongseok Ko, Funnan Kim, Keunhyun Park, and Keuntae Kim. 2011.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olicies in Korea." 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 Settlements.

Perry, Guillermo E., William F. Maloney, Omar S. Arias, Pablo Fajnzylber, Andrew D. Mason, and Jaime Saavedra-Chanduvi. 2007. *Informality: Exit and Exclus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ritchett, Lant. 2006. *Let Their People Come: Breaking the Gridlock on Global Labor Mobil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Psacharopoulos, George, 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 2004.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Further Update." *Education Economics* 12 (2): 111–34.

Rama, Martín. 2001. "The Consequences of Doubling the Minimum Wage: The Case of Indonesia."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54 (4): 864–81.

———. 2009. "Making Difficult Choices: Vietnam in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40,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ommiss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Randriamaro, Zo. 2007. *Gender and Trade: Overview Report (2006)*. Brighton, U.K.: BRIDGE.

Ravallion, Martin. 2009. "Are there lessons for Africa from China's Success against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37 (2): 303–13.

Rodrik, Dani. 2000. "Institutions for High-Quality Growth: 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5 (3): 3–31.

Rodrik, Dani, Arvind Subramanian, and Francesco Trebbi. 2004. "Institutions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9 (2): 131–65.

Romer, Paul Michael. 1993. "Idea Gaps and Object Gap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 (3): 543–73.

Rutkowski, Jan, Stefano Scarpetta, Arup Banerji, Philip O'Keefe, Gaëlle Pierre, and Milan Vodopivec. 2005. *Enhancing Job Opportunities: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wanda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Commission. 2012. *Tracer: Community Dynamics and Payment Verification Study*. Kigali: Rwanda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Commission.

Sandefur, Justin. 2010.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Firm Size Distribution in an African Economy."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0-5,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Oxford.

Schoar, Antoinette. 2010. "The Divide between Subsistence and Transform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vol. 10, ed. Josh Lerner and Scott Stern, 57–81.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lim, Nadia. 2012. "Innovation for Job Creatio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Shiferaw, Admasu, and Arjun S. Bedi. 2010. "The Dynamics of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Is Sub-Saharan Africa Different?"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 Discussion Papers 22, Courant Research Centre, Göttingen, Germany.

SMERU Research Institute. 2001. *Wage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Policy in the Indonesian Urban Labor Market.* Jakarta: SMERU Research Institute.

Stampini, Marco, and Audrey Verdier-Choucane. 2011. "Labor Market Dynamics in Tunisia: The Issue of Youth Unemploymen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611,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Sutton, John, and Nebil Kellow. 2010. *An Enterprise Map of Ethiopia.* London: 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re.

Syverson, Chad. 2011. "What Determines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2: 326–65.

TeamLease. 2010. *Temp Salary Primer 2010.* Ahmedabad, India: TeamLease Services Pvt. Ltd.

United Nations. (UN). 2009.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New York: UN.

———. 2011.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1 Revis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3a. *Early Warning Report: FYR Macedonia.* New York: UNDP.

———. 2003b. *Early Warning System: Bosnia and Herzegovina.* New York: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Group. 2010. *Thematic Paper on MDG1: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and Hunger, Review of Progres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Walker, Susan P., Theodore D. Wachs, Julie Meeks Gardner, Betsy Lozoff, Gail A. Wasserman, Ernersto Pollitt, and Julie A. Carter. 2007. "Child Development: Risk Factors for Adverse Outcom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ancet* 369 (9556): 145–57.

Wietzke, Frank-Borge, and Catriona McLeod. 2012. "Jobs, Well-Being, and Social Cohesion: Evidence from Value and Perception Survey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Winters, Alan, Terrie Walmsley, Zhen Kun Wang, and Roman Grynberg. 2002. "Negotiating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Temporary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University of Sussex Discussion Paper 87, Sussex, U.K.

Witze, Morgen. 2010. "Case Study: Tata."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9.

World Bank. 199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A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for Every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Remittances and Migr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6a. *Chil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6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7: Development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7. *Rwanda: Toward Sustained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Volume I, Synthesis and Priority Measur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8. *Chile: Toward a Cohesive and Well Governe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9a. *Doing Business 201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9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0. MDRP (Multi-Country Demobilization and Reingration Program) Repor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a.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b.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South As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c.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d. *Capabilities, Opportunities and Participation.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A Companion Report to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e. "Fueling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in Poland through Employment, Skills, and Innovation." Technical repor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2012. *Job Trend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Young, Mary Eming, and L. M. Richardson, eds. 2007.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From Measurement to Action: A Priority for Growth and Equit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Yusuf, Shahid, and Kaoru Nabeshima. 2006. *Post-Industrial East Asian Cities: Innovation for Growth.*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Zhang, Huafeng, Ingunn Bjørkhaug, Anne Hatløy, and Tewodros Kebede.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Chin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第 1 章

1 就业挑战

人口变迁、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和全球此起彼伏的动荡局势正在改变世界的就业形势。然而在许多国家，传统农业和自就业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工作的人口超过了 30 亿，但是这些工作的性质却迥然相异。大约 16.5 亿的人口从事有固定工资或薪水的工作。剩余的 15 亿人口在农场或家庭小作坊中工作，或从事临时的、季节性的日工。在最贫穷的国家，大多数工人从事的工作都不在雇用关系的范围之内。另外还有 2 亿人口处于正在积极寻找工作的失业状态，这部分人口中极大一部分是年轻人。还有将近 2 亿工作年龄的成年人既没有工作，也不谋求就业；这部分人口中的大部分是女性。还有一些数量未知的人口急于就业。[1]

世界面临的就业挑战是多方面的，包括改善工作人口的工作环境，支持将人口再分配到更好的工作中去，为那些有意工作的人口创造就业机会等。在一些国家，青年人口的膨胀带来了数百万新的求职者。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劳动力以每年 800 万人的速度增长着。南亚的劳动力以每月 100 万人的速度增长着。在其他地方，工作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工人在推迟退休。到 2020 年，65 岁及 65 岁以上的老人将需要 4 000 多万份额外工作。[2]

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将更多的乡村人口引向城市地区。在未来的 15 年中，发展中国家一半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地区，由此引发的移民现象促使就业迅速地从农业转向工厂或街道。一般而言，从乡村向城市地区的移民会改善个体的福利，对那些实现工资就业的个体而言更是如此。但是，工人在全球收入中的比例可能呈现下降的态势，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不同国家同一行业的工资水平在趋同，但是工作要求的技能越高，支付给工人的奖金也越高。女性的收入仍然低于男性的收入，而且在不同的国家里，参与工作的女性比例也大不相同。在越南，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的女性比例是 75%，而在巴基斯坦，这一比例仅为 28%。

就业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尽管工人的教育水平在提高，许多公司声称它们难以找到它们所需要的技术工人。兼职工人和临时工似乎在增加。例如在印度和南非，临时就业服务和劳务经纪人的数量急剧增加。外包曾经集中在制造业，但是新技术使服务行业任务的分包成为可能。同时，因特网和移动电话的新平台为工人和雇主的匹配提供了创新性的方法，而且新平台不仅仅适用于高技能工作。

工作并不总是带来薪水的就业

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工人与雇主以及一份稳定的薪水。然而，这个狭隘的定义将 15 亿为生存而工作的人排斥在外。实际上工作的概念要比工资就业宽泛得多。工作是可以产生以货币表示或以实物偿付的实际收入或推算收入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活动。但是并不是所有形式的工作都可以被视为就业。违背工人意志或侵犯基本人权的活动不应该被视为就业。其他一些隐含劳动努力的活动，例如烹饪或清洗衣物等家务活，人们并不认为是就业，除非这些活动是由被雇用的、拿薪水的人完成的。

工作的多种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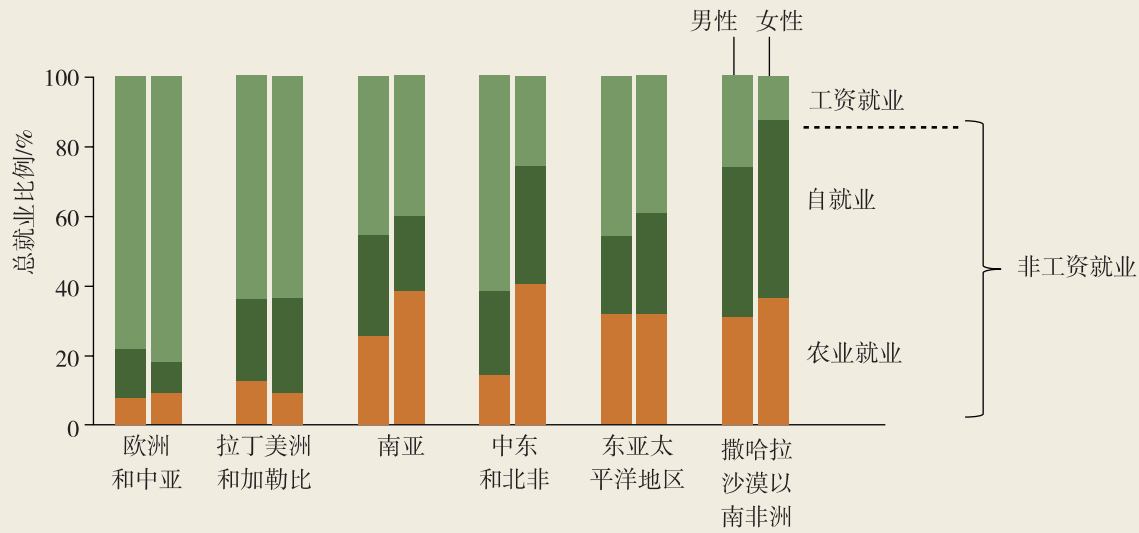
界定和衡量一份工作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是由于人们使用时间和工作的方式的多样性（见问题 1）。经济学家常常对工作和休闲加以区分，但是事实要比这复杂。时间可以分配给非生产性活动和生产性活动。第一范畴包括用于吃睡、教育和娱乐的时间。生产既包括市场性活动，也包括非市场性活动。一项活动是否是生产性的，可以以一项基于第三人的测试来判定，“如果一项活动具有这样的性质，即该活动可以委托给一名领取薪水的工人，那么该活动将被视为生产性的活动”[3]。

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分配模式因国家而异，随时间的推移而不同。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并允许带薪休假的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是规定。一些工作只要求在每周的某几天内工作几个小时，一些工作长年累月几乎每天都要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很长。在前一周，某些人只有一种工作，而其他人可能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工作。2011 年，韩国和西班牙的临时性就业在其全部工资性就业中比例超过 15%，而澳大利亚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这一比例在 5%左右。[4]

衡量失业或就业不足具有同等的挑战性。有些人愿意工作较长的时间，也有些人不愿意。在亚美尼亚、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秘鲁，工作时间少于期望工作时间的工人的比例超过了 15%，而在匈牙利、巴基斯坦、葡萄牙和美国，这一比例不足 3%。[5] 一些愿意工作的人没有工作。失业率因商业周期而异。2009 年和 2010 年左右，当全球大多数国家受到了最严重的国际危机的冲击时，失业率在南非和西班牙的 20%以上和奥地利、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和泰国的不足 3%之间波动。[6]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状况更多样化。这里所述的多样化不仅仅是指工作时间的长短、就业岗位的数量等发达国家的通常标准，也是指工作的特点。引人瞩目的特点有两个。第一，自就业盛行，这常常导致对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测量不够充分。[7] 第二，传统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并

图 1.1 工作并不总能带来收入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注释：数据是可以获得的最近年份的数据。

存导致就业的性质大相径庭，既有糊口农业和打杂工作，也有技术驱动的制造业工作和服务业工作。

无论是根据公司注册、社会保险还是根据书面的雇用合同来界定，发展中国家就业的一大特点都是非正式工作的高度盛行。非正式就业并不在劳动规章的监管之下，这或者是因为它们的经营范围有限，或者是因为它们故意避免或规避。先抛开本报告所采用的具体定义不提，非正式就业通常与较低的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司注册、社会保险或书面合同会提高效率。不规范可以是较低的生产率的表现，也同样可以是较低的生产率的原因。

就业因地区而异

在发展中国家，自就业和农业就业的比例几乎达到一半。绝大多数自就业者所在的小企业没有雇用领工资的雇员。[8] 但是工资就业、农业就业和自就业的比例因性别和国家不同而差别很大。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女性的非工资就业比例超过了 80%，然而在东欧国家和中亚国家，这一比例不足 20%（图 1.1）。

性别差异同样惊人。[9] 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就业的女性不足 50%，而实现就业的男性几乎达到了 80%。大约 50%的处于就业状态的男性和女性是工资收入者，但是这一统计数字掩盖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女性的工资就业严重不足，但是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女性工资就业的可能比男性更大。巴基斯坦的女性劳动力比例为 28%，但是男性劳动力的比例超过了 82%，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中，女性工资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即使在坦桑尼亚和越南这样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超过 75%以上的国家，女性的工资就业仍然低于男性。除了这些显著的差异之外，女性获得的收入远远低于男性这一现象仍然在持续。而教育、经验或就业领域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差异。

进入学校或参与培训的青年（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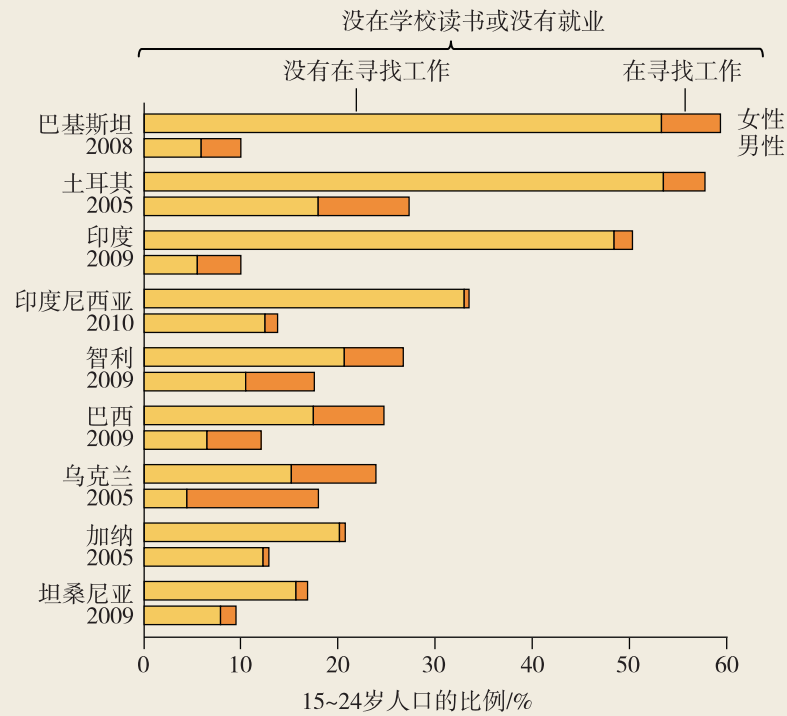
常定义为年龄在 15 岁至 24 岁的人口）的比例在持续增长。然而，一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达到了警戒线（南非自 2008 年年初以来超过了 40%，西班牙 2012 年年初超过了 50%）[10]。即使在青年失业率较低的国家，青年失业率也是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或两倍以上。此外，很大一部分青年人被视为处于“赋闲”状态，他们既不是在接受教育或就业，也不是接受培训或寻找工作（见图 1.2）。[11] 在一些国家，超过 1/3 的 15~24 岁青年处于赋闲状态。在大多数国家，和赋闲率比较起来，失业率微不足道。[12] 很多时候，工作的青年从事的是无薪工作。即使他们获得工资，他们获得社会保险的可能性也较低。[13]

尽管童工在减少，但是每 8 个儿童中仍有 1 个儿童受到影响（在危险工作中是每 14 个儿童就有 1 个儿童受到影响）。国际劳工组织（ILO）对童工的定义是任何由未满 12 岁的儿童所从事的劳动或针对超过 12 岁的儿童的劳动，以及任何妨碍他们参与教育或损害他们身心健康和个体发展的劳动。2008 年，世界范围内参与工作的儿童共计 3.06 亿，其中 2.15 亿儿童的活动属于童工，1.15 亿儿童的活动属于危险性劳动。[14] 这些儿童中的大多数属于不领薪水的家庭工人或农业劳动者，一半以上生活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比例最高，每 4 个儿童中就有 1 个儿童受到影响（6 500 万人）。

青年膨胀，老龄化社会和移民国家

人口变迁可以是大规模的，但是并不总是沿着同一个方向进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历了劳动力的急剧增长：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

图 1.2　失业并不总是青年人面临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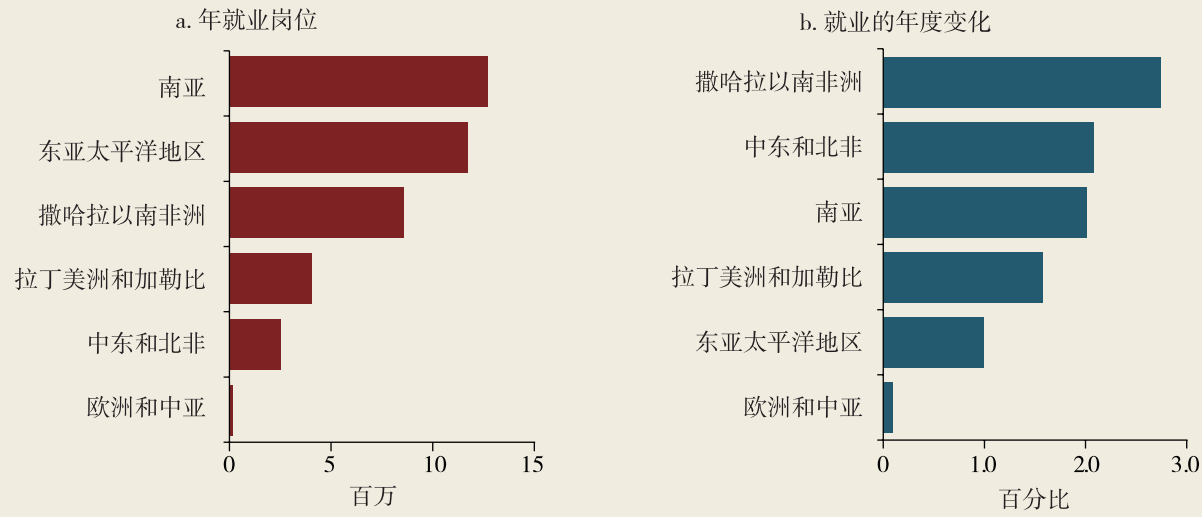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中国每年的新增劳动力将近 800 万人，印度的新增劳动力是 700 万人（现在这一速度迅速降低，尤其是中国）。许多较小的国家面临着很大的相对增长，即使绝对数字相对不那么惊人。在其他国家，总人口和劳动力正在缩减。例如，据估计，乌克兰的劳动力每年以 0.75%的速度下降，大约相当于每年减少 16 万人。[15]

一个简单的概念性联系可以阐释大规模人口变迁引起的挑战。为保持工作年龄人口就业率的连续性，2020 年提供的工作机会应该比 2005 年多 6 亿个。其中东亚太平洋地区和南亚应该提供 1.75 亿个工作机会，或者说每月将近 100 万个工作机会（见图 1.3）。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作机会将需要增加约 50%，这相当于就业增长率每年要增加 2.7%。但是同一时期，人口正在老龄化的东欧和中亚只需要增加

图 1.3 增加就业岗位，应对人口增长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发展指标得出的数据。
注释：2005 年至 2020 年期间的估测值，基于假设就业率稳定的情况下的人口预期增长。

240 万个工作机会。

发挥重要影响的不仅仅是劳动力的规模。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同样重要。青年待在学校里的时间长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推迟了，而成年人的寿命增加了，生活也更健康了。在过去二十年中，65 岁及 65 岁以上老人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对稳定。然而，即使该参与率保持稳定，为应对老人数量的增加这一问题，到 2020 年也将需要创造将近 4 200 万个就业岗位。尽管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规模的绝对数已经开始下降，这 4 200 万个就业岗位中的 1/4 仍将是中国需要的。[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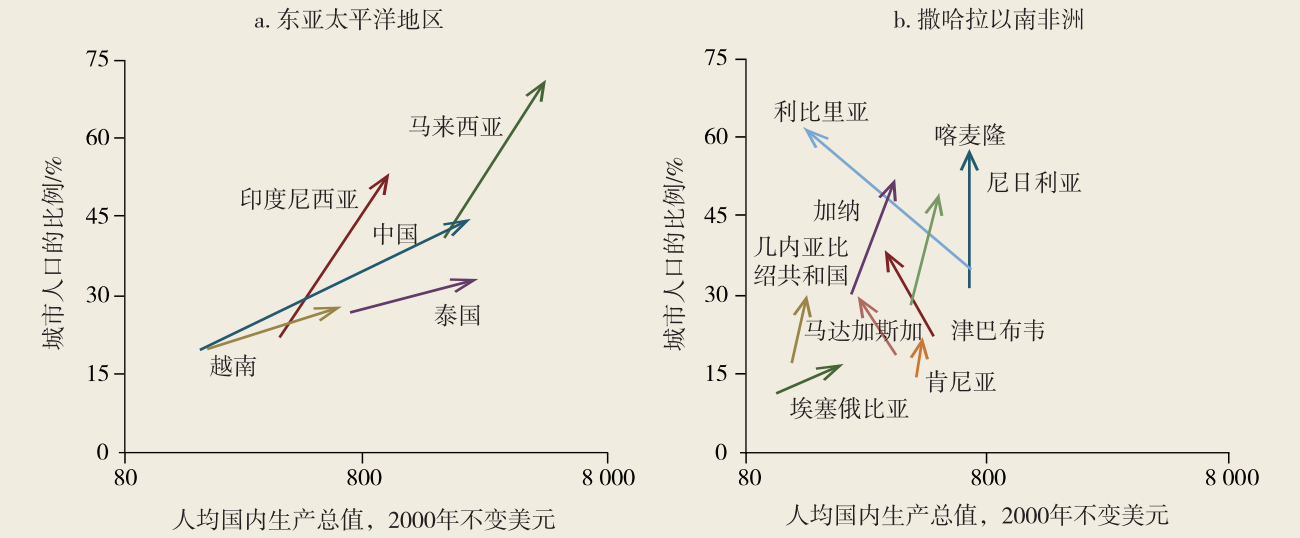
国际移民也正在改变许多国家的劳动力规模和结构。在世纪之交，世界上的国际移民超过 2 亿人，其中将近 9 000 万人是工人。如果国际移民组建成一个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家将超越巴西，成为世界第五大的国家。精准的估测不尽相同，但是存在一个共识，即移民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占了将近 3%。[17]

这些总数掩盖了国家间的重大差异。一些国家是绝对意义上（例如美国）或相对意义上（如约旦和新加坡）的大的移民接收国。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家的移民在世界移民总量中的比例很大，斐济、牙买加和汤加等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口在海外。一些较小的国家的数字惊人。例如，将近 1/5 的萨尔瓦多人居住在国外，科威特、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超过 3/5 的人口是在国外出生的。[18]

城市、工资和女性

经济发展促使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过程被称为结构转型。[19] 到 2020 年，发展中国家一半以上的总人口将居住在城镇地区。[20] 这意味着非农劳动力的增长将大大超过农业劳动力的增长。[21] 城市化源自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维系了较高的生活水平。城市化也与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有关，这是因为城市工作比乡村工作更具生产性。但事实并不总是这样。[22] 在东

图 1.4　从农村流向城市并不总能促进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
注释：数据与 1985 年至 2010 年期间的变化相符。

亚，人口脱离农业的状况的确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相关，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远非如此（见图 1.4）。

技术变革刺激家庭增加市场生产以代家庭生产。[23] 结构变革增加了用于消费活动或投资活动的时间，但也

专栏 1.1　工作和休闲的性质随着城市的扩展而变化

今天，在整个发展中世界的中小城市中都可以看到结构转变的进程。这一进程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大多数人，甚至是年轻人都记着旧有的乡村生活环境。他们融入并享受现代城市生活，他们的工作和休闲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并不考虑返归旧有的风俗。

25 年前，印度尼西亚唐格朗市外围的一个 5 000 人口的地区开始发展，铁厂、橡胶厂、服装厂和线厂在附近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些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仍然从事农业工作。但是大多数女性和男性在工厂以及其他同时兴起的行业中就业谋生。许多男性开摩托出租车，女性在工厂的门口出售糖果或其他物品。居民也通过在家里做衣服、制造扫帚等手工艺品以及从事建筑业等谋生糊口。一些人是公务员和教师。比较贫穷的女性收集并转售废旧织物。新涌入该地区的人口也为当地家庭通过出租房屋、寄宿等提供了产生收入的机会。似乎该地区人人都有手机，都有方便出行的摩托车。

一位 28 岁的钢铁工人和一位钢铁工人的父亲说，在一个比较新的社区里寻找工作曾经要容易得多。那时候初中生仍然能找到工作。他说，现在，生产工人必须至少是个高中生，而年龄不足 30 岁的职校毕业生更受青睐。招聘也变得更严了。他补充说，“大家都知道，如果想要被公司录取，候选人必须有内部关系，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工作，而工作的机会却有限”。该地区的许多工厂工人的工作合同都是六个月，都希望续订合同。据悉，当地所有的最好的工作是自己经营生意。但即使可能面临失业，一个 41 岁的人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回归乡村。失业令人绝望。别绝望。再找一份工作，别挑剔”。

一个地方官员在拿当前状况和以前比较时，这样描述该地区繁荣的市场，“现在市场更加干净了、更重要了。卖主和商人更多了，因而选择也多了。现在，通往市场的公共交通更便利了。过去很难找到公共交通工具，而且街道也泥泞不堪”。他估计该地区的贫困人口降低了一半，从世纪之交的 20%降低到现在的 10%左右。他指出该地区很好地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工厂工人得以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工作的变化也带来了休闲的变化。现在青年男性花时间在网上聊天，也玩电脑游戏。“以前我们通过邮局寄信，”一个 22 岁的人回忆道，“现在，没有人愿意去邮局了。去邮局有失身份。现在人人都有手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11a。

专栏 1.2 就业为女性带来了收入机会，但也带来了新的困难

就业可以更广泛地改变女性在家庭中和社会中的角色。在南非德班外围的一个有 3 000 居民的社区，据估计有80%的女性出外工作，她们主要是教师和护士，但是她们也在办公室、零售专营店或警局工作。10 年前，女性没有这样的机会，“女性不再被视为家庭主妇”，一位年轻的女性在德班的一个访谈小组中如是说。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东部一个繁华的地区，女性在街头兜售食物、眼镜、盘子和毯子。年轻女性解释说兜售毯子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女性从事这项工作是“因为她们不得不帮助养家。她们丈夫的工作不能带来足够的收入”。她们的教育程度比她们的长辈高，牙买加地区年轻女性更有可能在附近的陶瓷工厂或商店或所在市场的美容院或城市新开张的购物中心工作。

十年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的一个贫穷社区，在街头兜售布料或糖果的女性很少。现在，许多女性通过兜售彩票或经营小型布店或美容院等活动获得收入。这些女性的收入对她们的家庭至关重要，这是因为男性在艰难地挣扎。近年来，城市自由贸易区提供的在工厂工作的机会或者其他就业机会一直在缩减。圣地亚哥访谈小组的参与者说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找到工作，这是因为雇主“对她们（女性）抱有更大信心”。

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面临着挑战。打架斗殴、偷窃和帮派暴力活动让圣地亚哥的女性担心她们自身的安全。许多女性认为晚上出外工作是非常危险的。尽管工作机会在增加，流动性仍然是一个限制因素，这不仅仅是由交通设施贫乏和安全风险造成的，也是由于女性作为工资获得者和家庭的照料者这一双重角色决定的。在乡村地区，由于传统文化和性别规范的约束，离开自己的村子到外面的农场工作或从事其他工作对女性而言是困难的。

在秘鲁库斯科外围的一个半城市化地区，大量女性在家里从事手工业、缝纫以及各类农业活动。在家庭外面，她们到农场工作，或经营自己的小商店或小餐馆，或在这些地方当雇工。然而这些女性解释说她们认为在家里的活动（例如养殖业）比在外面的工作好，因为“那是无人打扰的工作，而且我们可以照顾孩子”。

女性因工作在城市中的通勤来往遭遇了很多困难。在斐济的一个城市地区劳托卡，地方经济停滞不前，大量女性参与工作是为了帮助家庭渡过难关。访谈小组的参与者解释说只有男性“可以在其他镇里就业……妻子不可以，因为她有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和公婆的责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11a。

意味着劳动的增加。在一些情况下，结构变革甚至减少了用于休闲的时间，[24] 对那些转向生产率不高的市场工作的工人而言尤其是这样。[25] 在过去，这种结构变革常常需要几十年时间，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它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改变了生活（见专栏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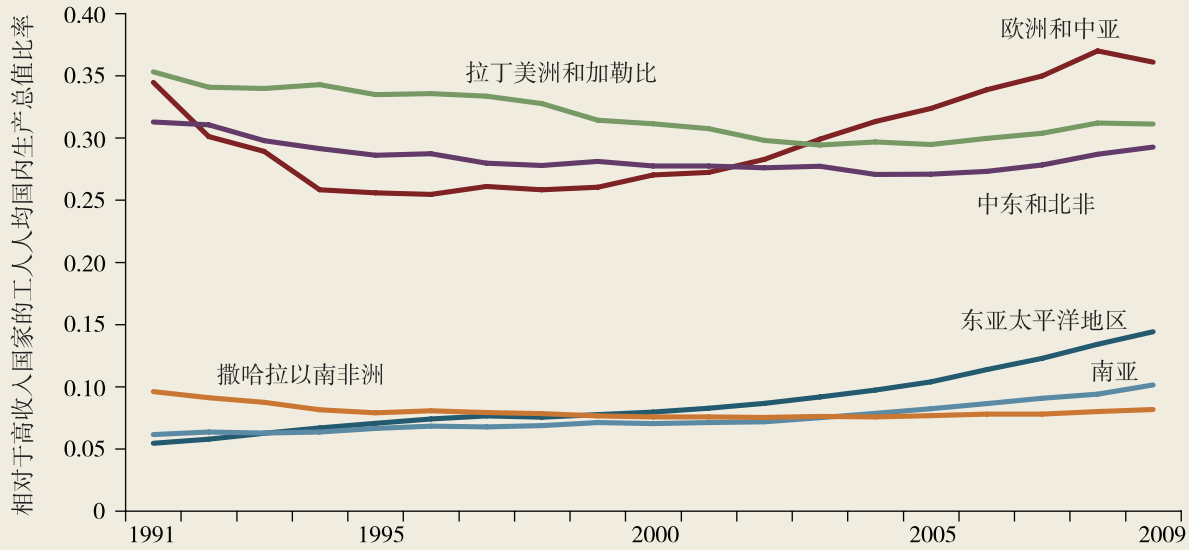
从家庭生产向市场生产转变并不是性别中立的，这是因为女性倾向于适应家庭生产，而男性在传统上就更重视市场生产。而随着女性进入就业领域，她们常常继续在家里工作。当同时考虑工作和家务劳动时，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忙一些。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都是这样。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和印度的证据显示，女性用于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多于男性。[26] 但是当她们参加工作，尤其是参加那些在家庭以外的工作时，她们的经济角色改变了（见专栏 1.2）。

就业正在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发生变化

新技术、全球化和结构变革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一些发展中国家仅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成功地缩减了与工业国家的生产力差异。[27] 但是其他国家没有赶上工业国家，对所有发展中地区而言，这一差异仍然很大（见图 1.5）。

工作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工业国家正在经历着从主要和传统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持续转变的过程。同时，发展中国家技术的进步和外包业务灵活性的提高正在导致中等技术工作的减少。[28] 技术已经

图 1.5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不高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
注释：以 2005 年美元购买力平价估算的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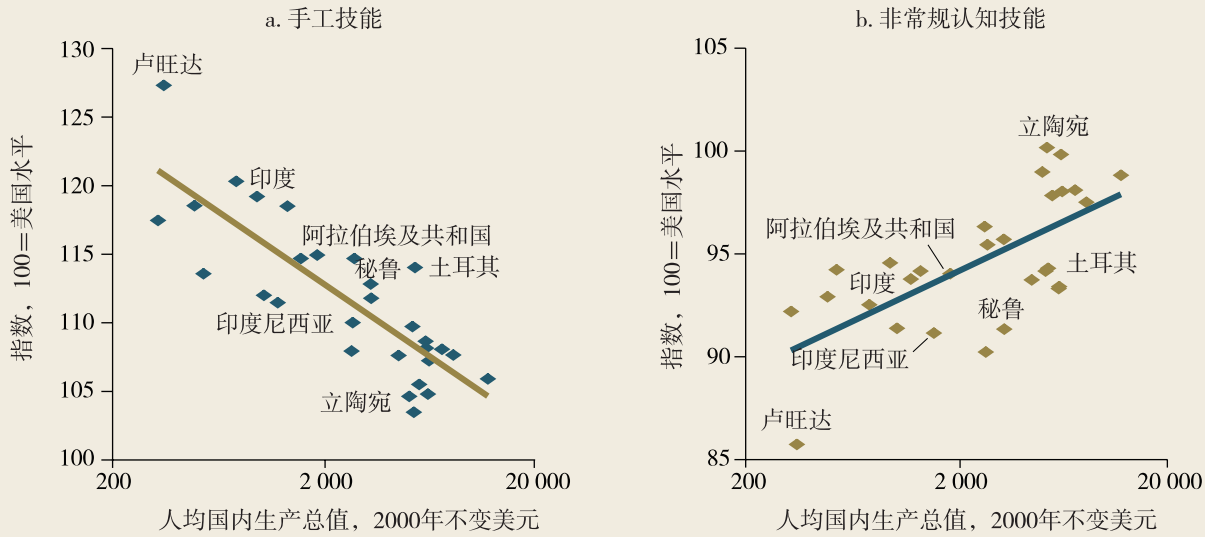
使生产任务的分散成为可能，从而使生产在不同的地方进行。[29] 跨国公司建立了一体化价值链，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补充其技能蓄水池。[30] 外包行为同时发生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中。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服务业产品出口中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11%上升到 2008 年的 21%。[31] 印度在信息技术领域独领风骚，但是其他国家，例如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已经开始重视出口服务业产品。[32]

这一不断变化的全球生产景观引起了技能禀赋及国家间一流人才分布的转变。据观察，中国和印度作为外包的中心具有很高的吸引力，这时因为其人口的技能和可用人口的数量高得超乎寻常。[33] 印度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接近 2 000 万，几乎和美国等量齐观。中国有 3 000 万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超过了美国和印度。[34] 美国依然吸纳了很大一部分在学生评估中获得高分的国际学生，但是韩国和德国的水平相等，俄罗斯联邦紧跟其后。仅仅是上海市的优秀学生数量已经是德国的 1/5，大约是阿根廷的 2 倍。[35]

然而技能并不是单维度的。工作不同，所要求的手工技能（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认知技能（脑力劳动所需要的）和社会技能（与他人交往所需要的）的组合也不同。行业的就业分布可以用于估测生产的技术密度。随着收入的增加，国家的生产对手工技能的需求趋于降低，对非常规认知技能的需求增加。[36] 然而，即使在既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基线上，国家使用非常规技能的程度也不相同（见图 1.6）。[37]

技术进步扩大了崛起的机遇，即使低收入国家也可以在高技能生产领域创造就业岗位，并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国际价值链连在一起。换句话说，技术进步使国家能够从手工技能密集的直线型发展道路转向使用高阶认知技能和社会技能的发展道路。[38] 在以一项指标测量各国作为服务外包中心的吸引力时，印度和中国高居榜首。加纳和塞内加尔分别名列 26 名和 28

图 1.6 技能组合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改变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edo 等 2012。
注释：所有的技术密度均是相对于美国水平的测算值。 每一个数据点显示了国民生产的技术密度，转引自 Autor，Levy 和 Murnane 2003 对职业结构和个体技能的描述。

名，远远超过南非或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强国。[39] 高技能利基市场在全世界蓬勃发展。这些市场倾向于毗邻大都市地区具有良好基础设施条件的高等教育中心，从开罗的智能商业园到加纳的基于信息技术的服务业中心，都是这样。[40] 印度的班加罗尔和钦奈与中国的苏州已经崛起为世界研发中心。

通过提供进入更大的、甚至全球性的就业市场的通道，技术本身正在改变工人和公司的联系方式。一些市场通过因特网运作，其他市场使用移动电话技术。[41] 这些变化正在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而且不仅仅是高技能行业的工人。例如，2009 年启动的 Baba 就业现在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蓝领就业数字市场，拥有 32 万就业名单和 8 万多个求职者。

随着技术和企业组织的改变，永久性工作越来越不常见，而且这一趋势仍在持续。兼职工作和临时性工资就业（也称为非标准就业）现在已经成为工业国家的主要特征。在美国，在未来五年中希望提高兼职员工和临时员工比例的公司超过一半以上。[42] 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趋势也很明显（见专栏 1.3）。

人们的工作和他们的期望也许并不一致。在高收入国家开展的调查显示，一半的工人（既包括自就业工人，也包括领工资的雇员）更愿意自己做老板。[43] 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较低，在这些国家，在家庭企业或农场中工作的劳动力的比例也较大。在东欧和中亚 35 国中，平均约 1/4 的成人愿意自就业，但是该比率在阿塞拜疆和匈牙利的 10%和白俄罗斯和土耳其的 43%之间波动。[44] 在比较贫穷的国家，自就业常常是不得已的下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找到付薪水的工作。[45] 贫穷人口并不总是奢望拥有自己的小本生意。[46]

专栏 1.3　发展中国家临时工中介业在发展

十年前，在高收入国家之外，临时工人力资源业被视为无关紧要的行业。但是现在，临时工人力资源业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蓬勃发展，甚至已经发展到大城市之外。[a] 这一增长常常被视为雇主对复杂的管理框架的响应。临时工人力资源业也使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管理工作量高峰期的工作，更加灵活地根据企业需求上调或下调员工人数。

临时工人力资源企业根据具体情况雇用不同类型的工人，从初级水平的、希望获得经验的新手到寻求事业快速发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层事业型雇员。

在南非，临时工约占劳动力的 7%，雇用临时工的行业日均提供 41 万个就业机会。[b] 1994 年至 2009 年期间，金融业的就业增长仅仅稍次于零售业，在统计金融业的就业增长时，临时工也被包括在内。无须特殊技能的工作和服务相关的行业在劳动经纪业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临时在服务业中就业的工人缴纳退休金和健康保险的可能性较低，一般被认为是更脆弱的群体。

这种临时就业形式在印度存在了几十年，部分原因在于这是规避严厉的劳动法律的途径。[c] 然而这种临时就业形式在现代工业中的存在只有 15 年，而且正在迅速发展。2009 年，劳务经纪人招募的临时工数量增加了 10%以上，2010 年增加了 18%。根据一些媒体报道，工人正从永久性的工作中离职，转向更具吸引力的临时工作。一些公司宣称新招聘的工人中有 15%是从永久性工作转向临时工作的工人。[d] 印度临时工人力资源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为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并促进增长，人力资源机构引入了降低猎头服务费用的方法。大量临时工人力资源公司正在进军商业资源（人力资源）和培训（团队招聘）等利基市场。[e]

随着临时工中介业的发展，审核工业管理框架的呼吁也在增加。[f] 一些呼呼强调应对脆弱性。在这些领域就业的工人通常面临着较低的收入（这是因为部分报酬流向了临时工中介机构）。他们也缺乏劳动法和职业保障所赋予的利益。其他呼吁强调行业的职业化。例如，2011 年，团队招聘和其他七家人力资源公司成立了印度人力资源联盟，该联盟旨在倡导改革劳动法，并使一个广大劳动力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国家更愿意接纳临时工中介业。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注释：a. Dourgarian（2011）评论说 2011 年引领人力资源业增长的并不是八国集团，而是金砖四国（巴西、印度、俄罗斯联邦和中国），以及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巴基斯坦。

b. 关于南非的讨论来自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Bhorat（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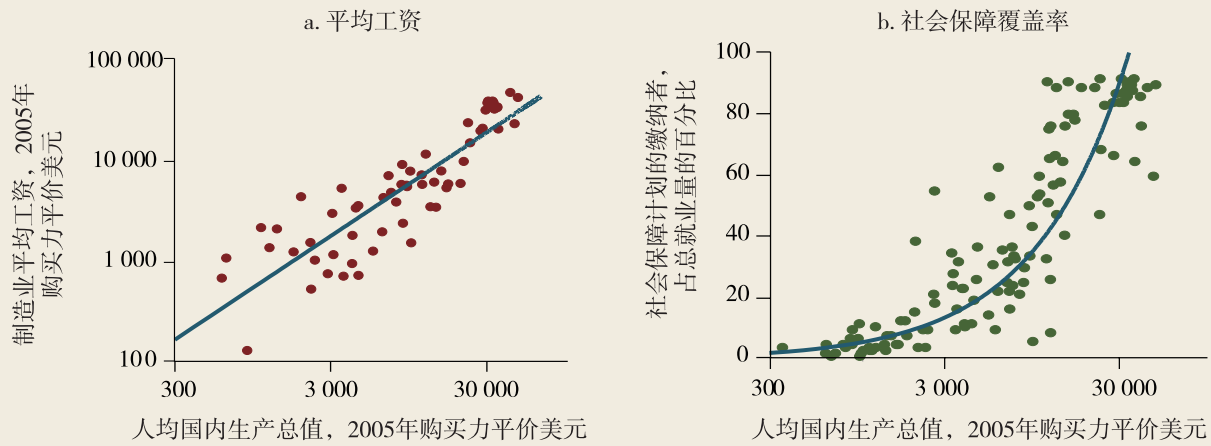
c. 世界银行 2011b。

d. 团队招聘 2010。

e. Bajaj 2011。

f. 国际劳工组织 2011；Musgrave 2009。

图 1.7　随着国家的增长，就业会提供更高的收入和利益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注释：一个点代表一个国家。

繁荣，但是收入分布也在发生变化

劳动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而就业引起的相关利益也在改善（图 1.7）。二者的关系不是机械的，但是增长对就业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收入和利益的改善部分源自经济体随着发展而获得的较高的平均技能，部分源自具有同样技能的工人获得了更好的机会。

发展中世界的贫穷问题减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就业实现的。发展中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 1.25 美元（购买力平价或 PPP 衡量）的人口的比例从 1981 年的 52%降低到 2008 年的 22%，或从 19.4 亿人口降低到 12.9 亿人口。[47] 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主要由亚洲创造的、发展中世界其他地区也参与创造的数百万新的、更富生产性的就业岗位是主要的驱动力。[48] 从来没有比现在这么多的人获得工作，而这些工作提供的收入一般也比较高。

但是在大多数国家里，无论是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正在下降。[49] 这一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和 90 年代初期就已初露端倪的趋势，是由几方面的力量共同引起的，其中包括有利于技能工人的技术进步，也包括全球竞争削弱了工人的谈判力。中国和印度进入全球贸易导致全球化的劳动力规模翻了一番，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50]

近年来收入分配的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生产要素之间，而且发生在工人之间。与此相关的两大区别是：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之间区别，在贸易领域工作和不在贸易领域工作的区别。贸易另一生产衬衫或电脑等可用于进出口的商品和服务。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是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收入开始以超过工业国家的速度增长，而且与技能水平无关。但是这一趋势在贸易领域更加明显，而非贸易领域的低技能工人仍然处在最不利的地位（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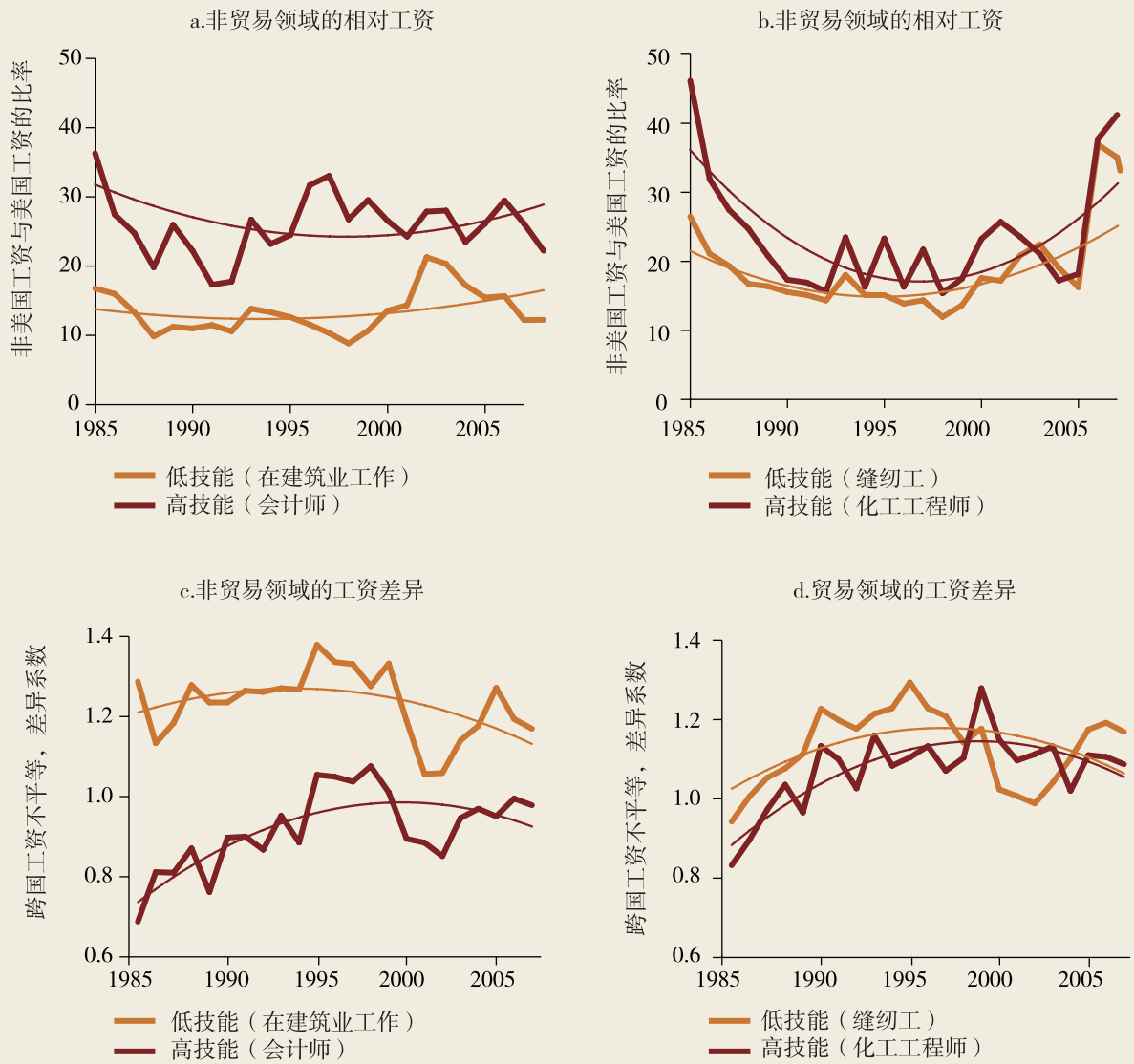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贸易领域的低技能工人相对于高技能工人较低的工资是与教育回报的增加相一致的。教育回报测量了同等年龄同等工作经验的同性工人之间因高等教育成就而获得的工资溢价。在所有地区，较高的教育程度与较高的劳动收入相关，但是这种收益并不是线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劳动收入是那些仅受过中等教育的工人的两倍甚至更多。然而，仅受过中等教育的工人的工作比受过初等教育的工人高不了多少。一般来说，国家的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溢价也越高（图 1.9）。

私营领域的作用

应对所有人口挑战和技术挑战的方案取决于私营领域。这并不表示政府不需要发挥任何作用。对发展而言，行政服务的质量至关重要。它的教师是否发展技能，农业推广员是否提供农业生产率，或城市规划者对城市的规划是否功能齐全匹配，这些都很重要。在某些情况下，公共工程或针对复员军人的就业计划同样是正当合理的。但是私营领域是创造就业岗位的主要引擎，世界上大约 9/10 的工作是由私营领域创造的。1995 年至 2005 年期间，巴西几乎 90%的工作是由私营领域创造的。而在菲律宾和土耳其，这一比例达到了 95%。[51]

但是私营领域扩大就业机会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典型是中国。1981 年，在私营领域就业的工人为 230 万，而

图 1.8　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正在迎头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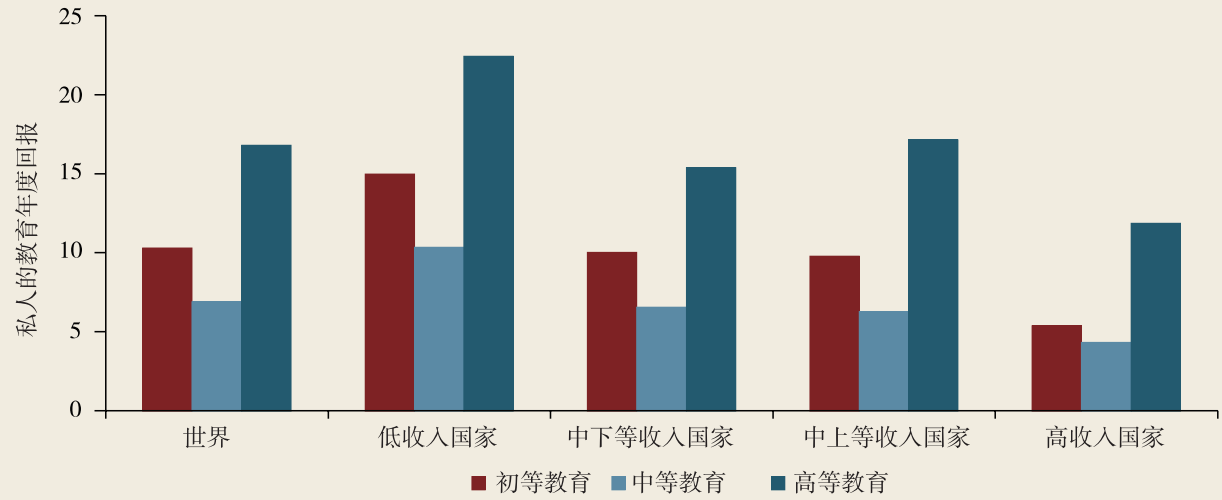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基于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Oostendorp 2012。

注释：为制作本图所采用的数据包括 1983 年至 2008 年在 150 多个国家根据行业搜集的不平衡小组的工资数据。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十月调查数据库，并以标准化的工资比率对每一行业的数据进行了校准。如欲阅读关于数据的描述，请查阅 Freeman，Oostendorp 和 Chor 2011。图中 a 组和 b 组的竖轴表示美国工资和非美国工资的比率，c 组和 d 组的竖轴表示样本中所有国家的工资的差异系数，差异系数是衡量工资不平等程度的一个指标。

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工人则高达 8 000 万。二十年后，在私营领域就业的工人达到 7 470 万，第一次超过了在国有企业（SOEs）就业的工人数量，此时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工人数量为 7 460 万（见图 1.10）。[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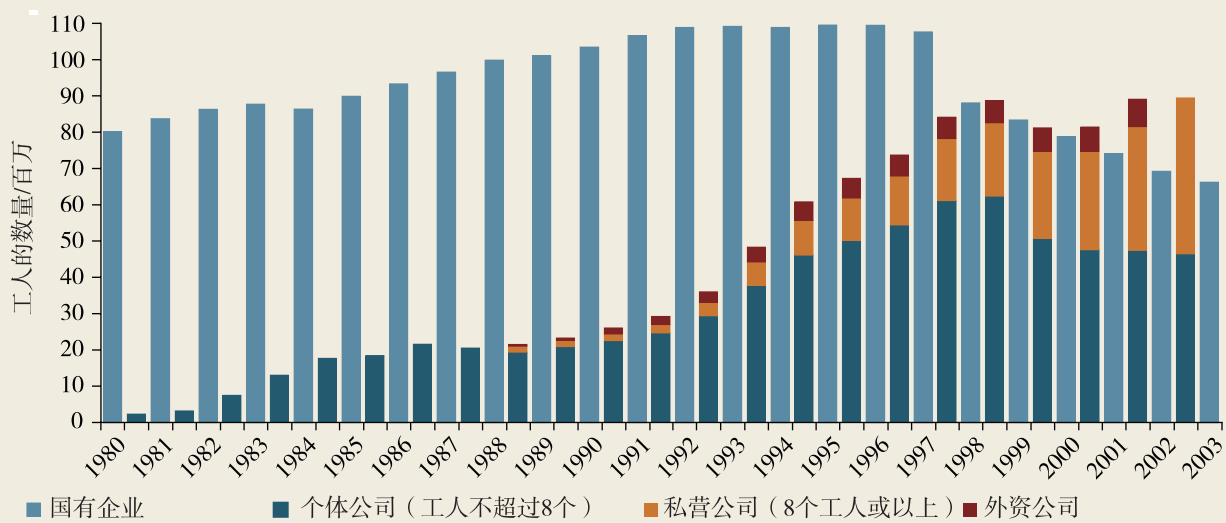
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较，在中东和北非的一些国家中，国家仍然是主导性的雇主，这一模式是和独立后时期的政治经济相联系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和丰富的石油储备相联系的。[53]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公共领域的工作是提供给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的。然而近年来，持续扩大公共领域就业的财政空间萎缩了，“排队”等候公共领域工作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导致转向

图 1.9 教育回报在比较贫穷的国家较高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Montenegro 和 Patrinos 2012。
注释：报告中的数据是国家层面私人回报的未加权平均数，是 69 个国家 2000 年至 2010 年期间的样本中最近年份的数据。

图 1.10 私营领域引领中国的就业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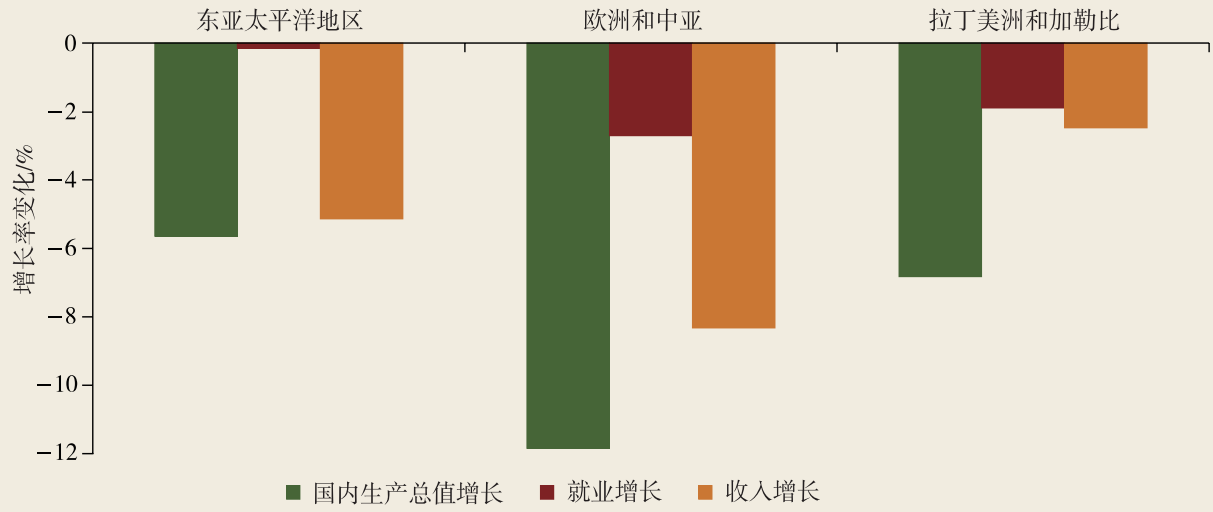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Kanamori 和 Zhao 2004。
注释：关于外资公司 2002 年的数据和非国有企业 2003 年的数据缺失。

非正规领域的就业扩大，教育证书的贬值和社会排斥的新形式。[54] 一支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青年劳动力因而处于失业状态或就业不足状态，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55]

全球层面的脆弱性

经济衰退会对就业造成不利影响，对私营领域的不利影响远远大于对公共领域的影响。短期危机可能摧毁几十年的进步成果。危机可能肇始于某个国家，然后通过全球化蔓延到整个地区，或者如近期的危机，蔓延到全世界。1995 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蔓延到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其他新兴国家。1997 年，对泰铢的投机性攻

图 1.11　在发展中国家，危机对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就业的影响



资料来源：Khanna，Newhouse 和 Paci 2010。
注释：竖轴测量了危机开始前后的增长率差异。

击严重影响了印度尼西亚、马拉西亚和韩国的经济。2007 年，粮食价格的飞涨导致了粮食供给和膨胀问题，加剧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降低了实际工资。[56]

2008 年，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及其导致的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金融制度的崩溃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危机，仅仅一年就导致了 2 200 万新的失业人口。2008 年之前，就业总量的年增长在 1.8%左右徘徊，2009 年降低到不足 0.5%，到 2011 年仍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57] 欧洲正疲于应付高额公债危机，它的金融体系脆弱，欧元前景不确定，中国和印度的增长又减速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全球危机已经结束。

2008 年至 2009 年的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不尽相同。一些国家，比如吉尔吉斯斯坦、墨西哥、罗马尼亚、俄罗斯、南非和土耳其等波罗的海国家的就业出现了绝对下降；而另一些国家，如巴西、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则只是经历了短期的降低。针对具体国家研究清楚地显示了对不同人口群体的就业影响。例如，据估计，这场危机使中国减少了 2 000 万~3 600 万个就业机会，特别是减少了出口导向型领域的面向移民工人的就业机会。[58] 在墨西哥，2008 年和 2009 年第二季度期间的就业机会降低了 50 万，实际工资也降低了 10%。[59] 在印度尼西亚，尽管危机的影响不是很严重，但是年轻的、临时的和非正式的工人受到了影响。[60] 在所有国家，青年人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61]

基于失业和收入降低状况的调整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也各不相同。劳动力市场的规范程度越低，收入缩减也越大，就业数量降低的幅度也就越小。在劳动力市场规范化程度很高的中欧和东欧，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降低了 12 个百分点，就业紧缩了 3%，收入降低了 8%以上（见图 1.11）。[62] 在规范化就业率很低的东亚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降低了 5.5 个百分点，而就业总量几乎没有发生变化。[63]

专栏 1.4 危机响应超越了对失业人口的收入支持措施

世界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响应来应对就业危机。除宏观经济激励措施和针对性行业政策之外，各国还采取了补充性政策，主要有：强化对受影响人口的收入支持政策；通过工资补贴、信贷政策和公共工程计划刺激劳动力需求的政策和对最受影响人口的技能和量身定制的就业服务的投资。

就全球而言，失业保险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在危机期间，由于失业保险计划的有效覆盖率低，获得失业救济的失业人口只有 15.4%。在经合组织的 23 个成员国中，中欧和拉丁美洲，救济的期限延长了。非正规领域很大或没有失业计划的国家依赖现金转移支付和公共工程计划为那些需要救济的人口提供额外的收入支持。哥伦比亚的家庭在行动是一个针对增加儿童营养、提高儿童教育的计划，它的覆盖率从 180 万家庭扩展到 270 万家庭。阿根廷的家庭福利政策延伸到覆盖所有的非正规领域的工人家庭。

所有收入水平的国家均采取了提高劳动力需求的措施。高收入国家将一半以上（56%）创造和保障就业的专用资源用于针对公司的信贷政策。高收入国家也贯彻工作共享安排来减免危机的影响。这些倡议的使用率在意大利达到了 3.3%，在德国达到了 3.2%，在日本达到了 2.7%。

中低收入国家 67%的资源用于直接创造就业岗位的措施和公共工程计划。例如，墨西哥的临时工作计划扩大到约 25 万工人，或其劳动力的 0.5%。欧洲普遍实行工资补贴。最常用的实施方式是降低社会保险缴费额，目的对象是中小企业或长期求职者和青年等弱势群体。然而要及时达到有效的规模，国家需要在危机发生之前就贯彻这类措施或计划。

相比之下，加强培训、就业服务或针对弱势群体的具体支持计划无论是范围还是规模都相对较小。在这一范畴，发展或维持技能的预算份额最大，智利、墨西哥、土耳其和美国的支出最多。

总的说来，具备更成熟社会保障体系及明确的就业计划的国家能够迅速响应，降低危机对就业的影响。除少数例外情况，我们对这些计划可能产生的期望外效应（例如保护某些就业是否以破坏其他形式的就业为代价）所知甚少。严密的效应分析才刚刚开始。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 2012。

针对危机的政策响应规模史无前例，但是也涉及不同的工具组合，这些工具对就业具有不同的潜在影响。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世界的财政刺激金额已经高达 5.5 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日本和美国占 70%以上。[64] 在 77 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80%采用了金融扩张的措施。高收入国家青睐削减税收，提高失业救济并直接援助企业。中低收入国家扩大支出，包括支付培训费用和收入支持措施。[65] 国家的响应主要针对阻止或减缓就业损失，而不是去尝试弥补收入的不足（见专栏 1.4）。

* * *

人口、城市化、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宏观经济危机带来了严峻的就业挑战。不能成功应对就业挑战的国家可能陷入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因就业而产生不满的恶性循环中。[66] 青年失业率和赋闲率可能很高，女性可能面临就业机会有限的问题，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得不到挖掘。[67] 一种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其缓慢、生产率增长滞缓、社会凝聚力逐渐涣散的循环模式可能兴起、相比之下，成功应对就业挑战的国家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繁荣富裕的人口、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生产率提高、女性和青年的机会改善等成果可能由此而互相加强。

问题 1 什么是工作?

世界上的工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形形色色，而且正在迅速地变化着。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和各种不同的文化使用多样化的词语来描述人们为谋生而进行的劳动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对工作的解释都可能大相径庭。对一些人来说，该词语使他们联想到被雇主雇用的、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的有固定工资的工人的形象。另外一些人可能想到农民、在城市里自就业的小贩或照看儿童或年长亲属的护理者。

工作重要，词语也重要

不同的解释抓住了人们所看重的工作的不同方面。越南河内的一名女性解释说，“一名工作的老年女性，哪怕只是卖蔬菜，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人们会听取她的意见”。[68] 孟加拉国 Satgailijhara 一名通过努力工作脱贫的男性将他工作的价值与一名稻农能够为他的孩子投资联系起来，“我能让我的孩子接受教育。那是我生命中最杰出的成就”[69]。

Ela Bhatt 是一名律师，她创立了印度自就业女性协会。在描述她以语言界定工作的困难性时，解释了人们每天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做工作的多样性：“小农场主在自己的农场工作。在艰难的时候，她也作为劳动者到其他农场工作。农业季节结束后，她到森林里采集树胶和其他森林产品。她一年到头都生产刺绣品，或者计件买给承包人，或者出售给来村子里采购商品的贸易商。那么，她的贸易活动应该归为哪一类呢？她属于农业领域，工厂领域还是以家庭为基地的生产领域？她应该被划分为农场主还是农业工人？她是自就业还是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70]

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语义上的问题。用于描述工作的词语和范畴都具有实质的含义。关于工作是什么和工作意味着什么的观点对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就业政策的观点产生的影响几乎不可避免。对那些将词语工作与被雇主雇用的、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的领取工资的工人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人而言，他们可能强调为公司创建支持性的投资环境。对那些认为工作一词也覆盖农业、街头零售、废物收集和家政等领域的人而言，他们可能认为就业政策也应当包括土地改革、农业推广、城市化政策或赋予最脆弱工人发言权等。

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ICLS）给出了国家间正式使用的标准定义，工作就是“一个人为雇主或在自就业中所履行或意欲履行的一组任务或职责”[71]。根据该定义，工作与就业并不等同。工作空缺的存在和具有多项工作的人的存在意味着工作的数量高于就业人员的数量。失业现象的存在意味着人们找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工作。工作系指任务，而领取工资的雇员、农场主和自就业的人系指完成任务的人。

灰色地带

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的定义将某些形式的工作排斥在正式的就业统计数据之外。雇员是经济活跃人口的组成部分，被定义为“为联合国国民账户与盈余所定义的商品生产与服务生产”贡献的人。[72] 国民账户体系（SNA）包括“所有面向市场的产品，无论是用于出售还是交换”，以及自己使用的商品，但是“家庭内部用于自身最终消费的服务性生产除外”。[73] 这样，该定义就将养儿育女、照顾老人或在家里做饭以及工作途中的活动排斥在官

方的统计活动之外。

一些国家正在开始对这些类型的活动进行评估。国民账户体系为国家创立反映不被视为工作的各种家务劳动的卫星账户提供了指导方针。根据这些指导方针，“工作可以指一个人为家庭而从事的、国民账户体系生产界限以外的、全部生产界限以内的、没有报酬的家庭服务和志愿工作”。[74] 以墨西哥为例。在该方针的指导下，墨西哥评估了家庭中诸如管家、照顾儿童等没有报酬的活动的价值。2003 年至 2009 年期间，这些活动几乎是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 1/4，约相当于 2/3 的工人工资和收益。[75]

非正规性领域是另一个重要的灰色地带。关于非正规性概念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将近四十年，但是仍未就何为非正规性领域就业达成一致意见。一些思想流派将非正规性与公司的特征联系起来，即公司是否注册或纳税。其他思想流派强调工人的特征，即工人是否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或是否签有劳动合同。还有一些思想流派强调以生产和生产率水平界定非正规性。关于如何评估非正规性的共识正

专栏 1.5　对非正规领域进行统计的国家很少

关于二元经济的概念早就存在一个体系。[a] 英国一位人类学家在一篇关于加纳的论文中，在对二元经济的认识和哈里斯（Harris）与托达罗（Todaro）的两部门模型的基础上，创造了非正规性这个术语。这一概念因在国际劳工组织（ILO）驻肯尼亚代表团报告中的大量引用而得到普及。[b] 自此，对非正规性的研究剧增，这一概念也称为发展研究、劳动经济学及其他学科的标准概念。现在，非正规性的原因和含义是学术界激烈辩论的议题之一，对非正规性的扩大研究议程旨在理解劳动力市场在发展中国家是如何运营的。[c]

可用于测量非正规性、非正规性就业和非常规性领域的方法形形色色。当非正规性与非法地下活动或非标准工作等其他概念交织在一起时，对非正规性的测量会更加复杂。由于缺乏关于非正规性的国家层面的、系统的数据，研究者使用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标准确立自己的测量数据，从而有时候会导致结论的偏离。

关于测量非正规性的建议是在 1993 年召开的第 15 届劳动统计学家国际大会（ICLS）上起草的。四年后，联合国创立德里小组，为定义和搜集非正规性领域的数据撰写文件并提供建议。2003 年，第 17 届劳动统计学家国际大会通过文件“关于非正规性就业统计性定义的指导方针”，引入了非正规性就业的定义和一系列测量规则。德里小组自 2006 年以来就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撰写即将出版的“非正规性就业和非正规性领域的调查手册”。2008 年，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的最新版本采纳了此前关于测量非正规性的大多数决议和建议，从而形成了一个包括非正规性领域和非正规性就业的宽泛定义。然而，灰色地带仍然存在于农业、独立职业或农村工人通常所从事的活动中。

定期对非正规性进行统计的国家很少。国际数据的匮乏显而易见，例如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数据库重要指标的最新版本中，具有非正规性数据的国家只有 60 个。[d] 一份由国际劳工组织和非正规就业女性：全球化和组织化（WIEGO）准备的关于世界非正规性的报告系统地使用了最全面的关于非正规性的定义，覆盖了到目前为止的 47 个国家的非正规性就业和在非正规性公司就业的数据。[e] 国际劳工组织—非正规就业女性：全球化和组织化的报告显示，非正规性比率的波动幅度在乌拉圭的 40%、泰国的 42%和玻利维亚的 75%、印度的 80%之间波动。

非正规性的程度随着公司和工人间生产率差异、规章制度的性质差异及其执行力度的差异而变化。非正规性是否是退出、排斥、不平衡执行或较低的公司生产率综合作用的结果仍然有待商榷。提高测量的质量可以提供有关非正规性程度的信息，为促进本领域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数据。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注释：a. Boeke 1942；Lewis 1954。

b. Harris 和 Todaro 1970；Hart 1973；国际劳工组织 1972。

c. 关于该议题最近的几次学术辩论是 Guha-Khasnobis and Kanbur 2006；Perry a 等 2007；Kanbur 2009；Blades，Ferreira 和 Lugo 2011；以及 Vanek 等 2012.

d.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重要指标（数据库）。

e. Vanek 等 2012。

在形成，但是使用的定义仍然忽略了一些被某些人视为非正规工作的工作类型。同时，还有为数相对很小的国家定期提供对非正规性的统计数据（见专栏 1.5）。

什么活动不是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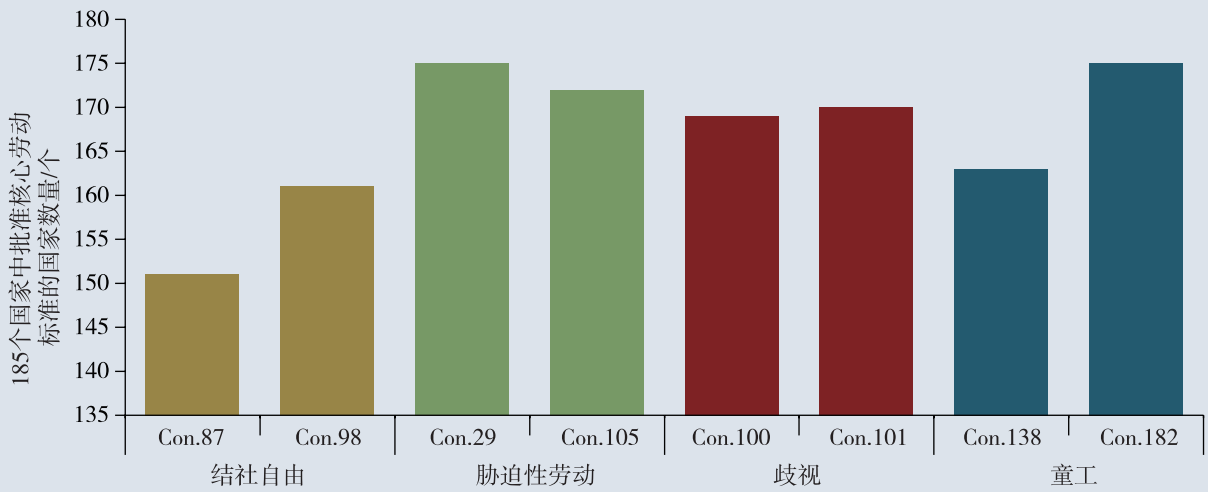
关于何为工作的观念种种不一，尽管如此，关于什么样的活动永远都不能被视为工作的问题却存在着广泛的共识。国际规范将基本人权定义为不能接受的界限。联合国大会 1948 年一致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宣言》规定了工作和免受歧视的权利。[76]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1998 年通过的《劳动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进一步明确了核心劳动基准，即呼吁取缔胁迫性、强制性劳动、童工和劳动歧视，规定了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77] 大多数国家已经签署批准了与胁迫性劳动、童工和歧视相关的公约，还有少数国家签署批准了关于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公约（见图 1.12）。[78]

尽管国际公约协助确定了何种工作形式是不能接受的工作，但是在实践中，许多人从事的工作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据估计约 2 100 万的人口被胁迫劳动，100 万左右的人口涉足非法交易。[79] 在许多情况下，胁迫性劳动强加在少数民族或移民、女性和当地居民等受到歧视的群体之上。拉丁美洲血汗工厂的移民工人，非洲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儿童士兵，欧洲和亚洲受到性剥削的被贩卖人口以及中东资助和约下的临时移民工人是世界上最明显的胁迫劳动形式的受害者。

童工是另一个触目惊心的例证（见专栏 1.6）。尽管核心劳动标准包含有对童工的规定，许多国家也签署批准了相关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国际劳工组织估计 2008 年全球涉足危险工作的儿童有 1.15 亿。法律和道德考虑以及可能诱导父母谬报儿童工作的不完善的调查设计使测量工作复杂化。[80] 这些数据实际上可能降低了问题的严重性。

近期研究显示，儿童工作的原因形形色色，错综复杂。[81] 这些原因包

图 1.12　大多数国家已经批准了核心劳动标准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2012c。
注释：Con.是公约的缩写。

专栏 1.6 并不是所有儿童的劳动都属于童工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卷入童工的儿童包括“任何在 5 岁到 17 岁之间某一特定时期涉足下述一种或多种活动的人：a.危险工作；b.除了危险工作以外的最糟糕的儿童劳动形式；c.其他形式的儿童劳动（根据儿童的年龄和每周工作的时间”。[a] “最糟糕的儿童劳动形式”包括任何危害儿童健康、安全或道德的工作。根据工作的具体性质、某些特定工业对儿童的要求以及整体的工作条件等，这类工作可以被确定为危险工作。除了危险工作，最糟糕的儿童劳动形式包括任何形式的奴役、束缚、兵役、非法交易儿童的活动和使用、购买或提供用于娼妓、色情或其他非法活动儿童的行为。

国际劳工组织的两个公约（第 132 号和第 182 号）、国际劳工组织的两个建议（第 146 号和第 190 号）以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都对童工的定义进行了解释。然而，国际标准也对国家设置允许儿童涉足生产性活动的界限留有余地（例如关于年龄或危险工作的定义等）。标准也允许儿童从事有限的家务活儿或轻度生产性活动，前提是这些活动被认定为无害的。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注释：a. 国际劳工组织 2008a。

括家庭贫困、进入学校的可能性和承担学校费用的能力、家庭偏好，甚至儿童在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城市化影响下对工作的认识等。在某些环境下，如果家庭资产和金融、土地或其他资源的获得提高了对家庭成员劳动的需求，比较富裕的家庭的孩子也可能成为童工。[82] 童工可能对教育、健康、生育和行为产生影响，尽管建立这些联系是一项挑战。学校和工作之间一对一的平衡并不常见。在许多地方，大部分参与工作的儿童也入校学习。而且，儿童辍学的原因也可能与童工无关。在某些情况下，12 岁及 12 岁以上儿童参与家庭农业劳动或小作坊劳动有助于获得技能。[83]

简言之，工作就是产生以货币表示或以实物偿付的实际收入，并且在劳动时不违背基本权利和原则的活动。该定义包括劳动统计学家国际大会指导方针所涉及的工作范畴：工资或薪水就业者，雇主，合作社成员、家庭工人（包括无酬家庭成员）和自就业者。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范畴不能给予某些个体唯一的或明确的归类。例如，小农场主有时候是工资性就业或自就业，但是如果他们雇用无酬的家庭工人，他们也可能成为雇主。工作包括为家庭带来收入的劳动活动，即使在家庭企业或家庭农场中不对某人的具体劳动所产生的收入进行评估。

根据该定义，工作要比被雇主雇用的、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的领取固定工资的活动要宽泛很多。

注释

1.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的估测值。

2.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http：//laborsta.ilo.org/applv8/data/ EAPEP/eapep_E.html）和世界发展指标（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 velopment-indicators）得出的估测值。

3. Reid 1934，11。

4. 经合组织就业数据库（http：//www.oecd.org/employment/database）。临时工是指季节性工作、固定期限的合同工作、随叫随到的工作和临时支援机构的工人的组合，因国家而异，取决于各国的定义和可查的数据。

5. Lee，McCann 和 Messenger 2007。

6. 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司，“劳动力市场的短期指标”（http：//laborsta.ilo.org/sti/sti_E.html.）。

7. Ghose，Majid 和 Ernst 2008。

8.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Gindling 和 Newhouse 2012。

9. 世界银行（2011c）提供了对这些议题更深刻的评论。

10. 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司，“劳动力市场的短期指标”（http：//laborsta.ilo.org/sti/sti_E.html.）。

11. 有时候，没有就业、参与教育或培训的青年也被称为“NEETs”。欲知详情，请查阅统计附件。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Kovrova，Lyon 和 Rosati 2012；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Ranzani 和 Rosati 2012。

12.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Lyon，Rosati 和 Guarcello 2012。

13. 世界银行 2006。

14. 国际劳工组织 2010。

15. 联合国人口署，2011 世界人口展望；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参与评估与规划。

16. Rozelle 和 Huang 2012，估测来自国际劳动办公室数据库关于劳动者的数据 Laborsta（http：//laborsta.ilo.org/，October2011）。

17. 国际移民组织 2008；Lucas 2005；Ozden 等 2011。

18. 国际移民组织 2010。

19. Chenery 和 Syrquin 1975；Clark 1940；Kuznets 1966；Rostow 1960。

20. 联合国 2011b。

21. Herrmann 和 Khan 2008。

22. 促进对非正规性领域研究的主要资料如下：Harris 和 Todaro 1970；Hart 1973；国际劳工组织 1972。关于非洲结构变迁进程的近期研究，请查阅 Losch，Freguin-Gresh 和 White（2012）。

23. Freeman 和 Schettkat 2005；Ngai 和 Pissarides 2008。

24. Bardasi 和 Wodon 2006；Lee，McCann 和 Messenger 2007；Maddison 2001；Ramey 和 Francis 2009。

25. Bardasi 和 Wodon 2010；Gammage 2010。

26. Charmes 2006；Gálvez-Muñoz，Rodríguez-Modroño 和 Domínguez-Serrano 2011；Hirway 和 Jose 2012。Burda，Hamermesh 和 Weil（2011）认为工作总量的性别差异随着经济的周期而变化，但在长期上趋同。

27. 国际劳工组织 2009a；Pagés 2010。

28. Autor 和 Dorn 2011；Gratton 2011；Holzer 和 Lerman 2009。

29. Feenstra 2010。

30. Brown，Ashton 和 Lauder 2010。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美国母公司而言，在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分公司进行的研究的比例已经从 1997 年的 5%上升至 2008 年的 14%，主要是在中国、韩国、新加坡和印度（http：//nsf.gov/statistics/seindl12/c4/c4s4.htm）。

31. Goswami，Mattoo 和 Sáez 2011。

32. Goswami，Mattoo 和 Sáez 2011。

33. A.T.Kearney 2011。

3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 http：//stats.uis.unesco.org / unesco / 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175。

35. 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对 12 个在 2009 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中名列前 20%的国家的估算值。该计划评估的学生年龄为 15 岁。

36. 关于该技能的定义基本上沿用了 Autor，Levy 和 Murnane（2003）及 Acemoglu 和 Autor（2011）的定义。其他方法对认知技能、非认知技能和技术技能（世界银行 2012）或对认知 / 问题解决、学习、个体 / 行为 / 伦理和社交技能（国际劳工组织 2008b）进行了区分。

37.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edo 等 2012。

38. Brown，Ashton 和 Lauder 2010。

39. A.T.Kearney 2011。

40. Yoshino 2011。

41. 这方面的典型包括 oDesk（https：//www.odesk.com/），babajob（http：//www.babajob.com/），谷歌商人（例如，http：//www.google.co.ug/africa/trader/search?cat=jobs）和 Souk-Tel（http：//www.souktel.org/）。

42.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2011。

43. Blanchflower，Oswald 和 Stutzer 2001。国际社会调查计划的更新（2005）数据显示

了相似的模型。

44. 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 2010 年转型期生活调查得出的估算值。

45. Banerjee 和 Duflo 2011；Perry 等 2007。

46. Banerjee 和 Duflo 2011。尽管自就业代表较低的福利水平并不总是事实。在他们对加纳的研究中，专门为《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Falco 等 2012 发现，一般而言，雇用别人的非正规性公司的所有者比正式工要开心得多。

47. 基于作者对 Chen 和 Ravallion 2010 的更新。

48. 世界银行 2011b。

49. Guscina 2006；Lübker 2007；Rodriguez 和 Jayadev 2010。

50. Bentolila 和 Saint–Paul 2003；Freeman 2008。

51. 国际劳动办公室劳动统计数据库，Laborsta，http：//laborsta.ilo.org/。

52. 在中国，“私营领域”的定义是宽泛的，有时候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其定义又是模糊的。“私营公司”和“个体公司”是有区别的。被称为“私营公司”的实体系指由自然人投资建立的或控制的、雇员超过 7 个的盈利实体，“个体公司”的雇员少于 8 个。在官方统计中，外资企业或外资集团并不是私营领域的组成部分。更多详情，请查阅 Kanamori 和 Zhao（2004）。

53. Nabli，Silva–Jaurengui 和 Faruk Aysan 2008。

54. Assaad 2012；Assaad 和 Barsoum 2007。

55. Mryyan 2012。

56. 关于此前危机的研究，请查阅 Fallon 和 Lucas（2002）。关于粮食价格危机，请查阅 Ivanic 和 Martin（2008）。

57. 国际劳工组织 2012a。

58.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Giles 等 2012。这些损失是暂时的，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工人短缺的问题。

59. Freije–Rodriguez，Lopez–Acevedo 和 Rodriguez–Oreggia 2011。

60. McCulloch，Grover 和 Suryahadi 2011。

61. Cho 和 Newhouse 2010。

62. Khanna，Newhouse 和 Paci 2010。

63. Khanna，Newhouse 和 Paci 2010；世界银行 2012。

64. 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 2012。

65. 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 2012；Robalino，Newhouse 和 Rother，待出版。

66. Bell 和 Blanchflower 2011；Farber 2011。

67. 世界银行 2011c。

68. 世界银行 2011a。

69. Narayan，Pritchett 和 Kapoor 2009，19。

70. Bhatt 2006，17。

71. 文章 2，国际劳工组织 2007。同时见联合国（2009）。

72. 文章 9，国际劳工组织 1982，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normativeinstrument/wcms_087481. pdf。

73. 联合国 2009，6–7。

74. 国际劳工组织 2009b，42。

75. 墨西哥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 2011。

76. 联合国 1948，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文章 23（1）。

77. 国际劳工组织 1998。

78. 核心国际劳动标准是八大公约的主题，这八大公约涉及四个领域，第 87 号公约（1948），即《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保护公约》；第 98 号公约（1949），即《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29 号公约（1930），即《强迫劳动公约》；第 105 号公约（1957），即《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 100 号公约，即《同酬公约》；第 111 号公约，即《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38 号公约，即《最低年龄公约》；第 182 号公约（1999），即《童工劳动最恶劣形式公约》。见“公约”，NORMLEX 数据库：关于国际劳动标准的信息，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2012），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

79. Andrees 和 Belser 2009；国际劳工组织 2009c；国际劳工组织 2012b。

80. Dillon 等 2012。

81. Basu 1999；Basu 和 Tzannatos 2003；Cigno 和 Rosati 2005；Edmonds 2008。

82. Del Carpio 和 Loayza 2012；Hazarika 和 Sarangi 2008。

83. Edmonds（2008）提供了关于童工的理论和经验论据的综述。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T. Kearney. 2011. *Offshoring Opportunities amid Economic Turbulence: A.T. Kearney Global Services Location Index, 2011.* Chicago: A.T. Kearney Global Services Location Index.

Acemoglu, Daron, and David Autor. 2011. “Skills, Tasks and Technologies: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In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ume 4, ed. Orley Ashenfelter and David E. Card. Amsterdam: Elsevier.

Aedo, Cristian, Jesko Hentschel, Javier Luque, and Martin Moreno. 2012. "Skills Around the World: Structure and Recent Dynamic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Andrees, Beate, and Patrick Belser. 2009. *Forced Labour: Coercion and Exploitation in the Private Economy*.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ssaad, Ragui. 2012. "The MENA Paradox: Higher Education but Lower Job Quality." In *Moving Jobs to the Center Stage*. Berlin: BMZ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stchaftliche Zussamenarbeit), Berlin Workshop Series.

Assaad, Ragui, and Ghada Barsoum. 2007. "Youth Exclusion in Egypt: In Search of 'Second Chances.' " Middle East Youth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Series 2, Wolfensohn Center for Development, Dubai School of Government, Dubai.

Autor, David H., and David Dorn. 2011. "The Growth of Low-Skill Service Job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Processed.

Autor, David H., Frank Levy, and Richard J. Murnane. 2003.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4): 1279–333.

Bajaj, Vikas. 2011. "Outsourcing Giant Finds It Must Be Client, Too."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Banerjee, Abhijit V., and Esther Duflo. 2011.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Bardasi, Elena, and Quentin Wodon. 2006. "Poverty Reduction from Full Employment: A Time Use Approach."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Paper 11084, Munich.

———. 2010. "Working Long Hours and Having No Choice: Time Poverty in Guinea." *Feminist Economics* 16 (3): 45–78.

Basu, Kaushik. 1999. "Child Labor: Cause, Consequence, and Cure, with Remarks on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 (3): 1083–119.

Basu, Kaushik, and Zafiris Tzannatos. 2003. "Child Labor and Development: An Introduction."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7 (2): 145–6.

Bell, David N. F., and David G. Blanchflower. 2011. "The Crisis, Policy Reactions and Attitudes to Globalization and Job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680,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Bentolila, Samuel, and Gilles Saint-Paul. 2003. "Explaining Movement in the Labor Share." *Contributions to Macroeconomics* 3 (1).

Bhatt, Ela. 2006. *We Are Poor but So Many: The Story of Self-Employed Women in In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horat, Haroon. 2012. "Temporary Employment Services in South Afric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Blades, Derek, Francisco H. G. Ferreira, and Maria Ana Lugo. 2011.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Introduction."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7 (Special Issue): S1–S7.

Blanchflower, David G., Andrew J. Oswald, and Alois Stutzer. 2001. "Latent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Nat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 (4–6): 680–91.

Boeke, Julius H. 1942. *Economies and Economic Policy in Dual Societies*. Haarlem: Tjeenk Willnik.

Brown, Philip, David Ashton, and Hugh Lauder. 2010. *Skills Are Not Enough: The Global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Future of the UK Economy*. Wath upon Dearne, U.K.: United Kingdom Commission for Employment and Skills.

Burda, Michael C., Daniel S. Hamermesh, and Philippe Weil. 2011. "Total Work, Gender and Social Norms." Working Paper Series 130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Charmes, Jacques. 2006. "A Review of Empirical Evidence on Time Use in Africa from UN-Sponsored Surveys." In *Gender, Time Use, and Poverty in Sub-Saharan Africa*, ed. C. Mark Blackden and Quentin Wodon, 39–7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hen, Shaohua, and Martin Ravallion. 2010. "The Developing World Is Poorer Than We Thought, but No Less Successful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 (4): 1577–625.

Chenery, Hollis Burnley, and Moises Syrquin. 1975.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7–197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o, Yoonyoung, and David Newhouse. 2010. "How Did the Great Recession Affect Different Types of Workers? Evidence from 17 Middle-Income Countri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681,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Cigno, Alessandro, and Furio C. Rosati. 2005. *The Economics of Child Labou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ark, Colin. 1940.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Macmillan & Company.

Del Carpio, Ximena, and Norman Loayza. 2012. "The Impact of Wealth on the Amount and Quality of Child Labo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95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Dillon, Andrew, Elena Bardasi, Kathleen Beegle, and Pieter Serneels. 2012. "What Explains Variation in Child Labor Statistic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Tanzan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8 (1): 136–47.

Dourgarian, Gregg. 2011. "Five Staffing Industry Trends for 2011." *Staffing Talk*, January 3.

Edmonds, Eric. 2008. "Child Labor." I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4, ed. T. Paul Shultz

and John Strauss, 3607–709. Oxford: North Holland Elsevier.

Falco, Paolo, William Maloney, Bob Rijkers, and Mauricio Sarrias. 2012. "Subjective Well-Being, Informality, and Preference Heterogeneity in Afric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Fallon, Peter, and Robert Lucas. 2002.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es on Labor Markets, Household Incomes and Poverty: A Review of Evidenc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7 (1): 21–45.

Farber, Henry S. 2011. "Job Loss in the Great Recess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rom the Displaced Workers Survey, 1984–2010."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696,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Feenstra, Robert C. 2010. *Offshor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Microeconomic Structure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reeman, Richard B. 2008. "The New Global Labor Market." *Focus* 26 (1): 1–6.

Freeman, Richard, Remco H. Oostendorp, and Davin Chor. 2011. "The Standardized ILO October Inquiry 1953–200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Freeman, Richard, and Ronald Schettkat. 2005. "Marketization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and the EU-US Gap in Work." *Economic Policy* 20 (41): 5–50.

Freije-Rodriguez, Samuel, Gladys Lopez-Acevedo, and Eduardo Rodriguez-Oreggia. 2011. "Effects of the 2008–09 Economic Crisis on Labor Markets in Mexico."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84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Gálvez-Muñoz, Lina, Paula Rodríguez-Modroño, and Mónica Domínguez-Serrano. 2011. "Work and Time Use By Gender: A New Clustering of European Welfare Systems." *Feminist Economics* 17 (4): 125–57.

Gammage, Sarah. 2010. "Time Pressed and Time Poor: Unpaid Household Work in Guatemala." *Feminist Economics* 16 (3): 79–112.

Ghose, Ajit K., Nomaan Majid, and Christoph Ernst. 2008. *The Global Employment Challeng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iles, John, Albert Park, Fang Cai, and Yang Du. 2012. "Weathering a Storm: Survey-Based Perspectives on Employment in China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98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Gindling, T. H., and David Newhouse. 2012. "Self-Employ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Goswami, Arti Grover, Aaditya Mattoo, and Sebastián Sáez, eds. 2011. *Exporting Services: 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atton, Lynda. 2011. *The Shift: The Future of Work Is Already Here.* London: HarperCollins.

Guha-Khasnobis, Basudeb, and Ravi Kanbur, eds. 2006. *Informal Labour Market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Guscina, Anastasia. 2006.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Labor's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arris, John R., and Michael P. Todaro. 1970.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 (1): 126–42.

Hart, Keith. 1973. "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1 (1): 61–89.

Hazarika, Gautam, and Sudipta Sarangi. 2008. "Household Access to Microcredit and Child Work in Rural Malawi." *World Development* 36 (5): 843–59.

Herrmann, Michael, and Haider Khan. 2008. "Rapid Urbanization, Employment Crisis and Poverty in African LDCs: A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Aid Policy."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Paper 9499, Munich.

Hirway, Indira, and Sunny Jose. 2012. "Understanding Women's Work Using Time-Use Statistics: The Case of India." *Feminist Economics* 17 (4): 67–92.

Holzer, Harry, and Robert Lerman. 2009. *The Future of Middle-Skill Jobs.* Washington, DC: Center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Brookings Institute.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1972. *Employment, Incomes and Equality: A Strategy for Increasing Productive Employment in Kenya.* Geneva: ILO.

———. 1982. Resolution Concerning Statistics of the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Employment,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Adopted by the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Statisticians, ILO, Geneva, October 29.

———. 1998.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at its Eighty-sixth Session, ILO, Geneva, June 18.

———. 2007. Resolution Concerning Updat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Adopted by the Tripartite Meeting of Experts on Labour Statistics on Updat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ILO, Geneva, December 6.

———. 2008a. Resolution Concerning Statistics of Child Labour. Adopted by the Eigh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Statisticians, ILO, December 5.

———. 2008b. *Skills for Improved Productivity, Employm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Geneva: ILO.

———. 2009a. *Protecting People, Promoting Jobs: A Survey of Country Employment and Social Protec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Geneva: ILO.

———. 2009b.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Statisticians.* Geneva: ILO.
———. 2009c. *The Cost of Coercion.* Geneva: ILO.
———. 2010. *Accelerating Action against Child Labour.* Geneva: ILO.
———. 2011. *Private Employment Agencies, Promotion of Decent Work and Improving the Functioning of Labour Markets in Private Services Sectors.* Geneva: ILO.
———. 2012a.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2: Preventing a Deeper Jobs Crisis.* Geneva: ILO.
———. 2012b. *ILO Global Estimate of Forced Labour 2012: Results and Methodology.* Geneva: ILO.
———. 2012c. NORMLEX Database: Information System on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ILO, Geneva.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0.
ILO and World Bank. 2012. *Inventory of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Joint Synthesis Report.* Washington, DC: ILO and World Bank.
INEGI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y Geografía de México). 2011. *Sistema de Cuentas Nacionales de México. Cuenta Satélite del Trabajo no Remunerado de los Hogares de México, 2003–2009.* Mexico, DF: INEGI.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8.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8: Managing Labor Mobility in the Evolving Global Economy.* Geneva: IOM.
———. 2010.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0—The Future of Migration: Building Capacities for Change.* Geneva: IOM.
Ivanic, Maros, and Will Martin. 2008. "Implications of Higher Global Food Prices for Poverty in Low-Income Countrie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9 (1): 405–16.
Kanamori, Tokishi, and Zhijun Zhao. 2004.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Kanbur, Ravi. 2009. "Conceptualizing Informality: Regulation and Enforcement." *India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 52 (1): 33–42.
Khanna, Gaurav, David Newhouse, and Pierella Paci. 2010. "Fewer Jobs or Smaller Paychecks?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the Recent Crisis in Middle-Income Countries." Economic Premise April 2010, Number 11, Poverty Reduction and Equity Group and the Human Development Network Social Protection Divis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ovrova, Irina, Scott Lyon, and Furio Camillo Rosati. 2012. "NEET Youth Dynamics in Indonesia and Brazil: A Cohort Analysi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Kuznets, Simon. 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Lee, Sangheon, Deidre McCann, and Jon C. Messenger. 2007. *Working Time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Lewis, W. Arthur.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 (2): 139–91.
Losch, Bruno, Sandrine Freguin-Gresh, and Eric Thomas White. 2012.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Change Revisited: Challenges for Lat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Lübker, Malte. 2007. "Labour Shares." Technical Brief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eneva.
Lucas, Robert E. B. 2005.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Low-Income Countri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yon, Scott, Furio C. Rosati, and Lorenzo Guarcello. 2012. "At the Margins: Young People neither in Education nor in Employmen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Maddison, Angus.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cCulloch, Neil, Amit Grover, and Asep Suryahadi. 2011. *The Labor Market Impact of the 2009 Financial Crisis in Indonesia.* Sussex, U.K.: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1. *An Economy That Works: Job Creation and America's Future.* Washington, DC: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ontenegro, Claudio E., 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 2012. "Returns to Schooling around the World."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Mryyan, Nader. 2012. "Demographic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Jordan." Working Paper Series 670, Economic Research Forum, Giza, Egypt.
Musgrave, Amy. 2009. "Labor Broking Industry Likely to Face Regulation." *Business Day*, August 25.
Nabli, Mustapha K., Carlos Silva-Jáuregui, and Ahmet Faruk Aysan. 2008. "Authoritarianism, Credibility of Reforms, and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orking Paper Series 443, Economic Research Forum, Cairo.
Narayan, Deepa, Lant Pritchett, and Soumya Kapoor. 2009. *Success from the Bottom Up.* Vol. 2 of *Moving Out of Pover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Ngai, Rachel L., and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2008. "Trends in Hours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1 (2): 239–56.
Oostendorp, Remco. 2012. "The Occupational Wages around the World (OWW) Database: Update for

1983–2008."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Özden, Çaglar, Christopher Parsons, Maurice Schiff, and Terrie L. Walmsley. 2011. "Where on Earth Is Everybody?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Bilateral Migration 1960–2000."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5 (1): 12–56.

Pagés, Carmen, ed. 2010. *The Age of Productivity: Transforming Economies from the Bottom Up*.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erry, Guillermo E., William F. Maloney, Omar S. Arias, Pablo Fajnzylber, Andrew D. Mason, and Jaime Saavedra-Chanduvi. 2007. *Informality: Exit and Exclus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anzani, Marco, and Furio Camillo Rosati. 2012. "The NEET Trap: A Dynamic Analysis for Mexico."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Ramey, Valerie A., and Neville Francis. 2009. "A Century of Work and Leisur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 (2): 189–224.

Reid, Margaret. 1934. *Economic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Robalino, David, David Newhouse, and Friederike Rother. Forthcoming. "Labor and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during the Crisis and Recovery." In *Labor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Impacts and Policy Responses*, ed. Arup Banerji, David Newhouse, David Robalino, and Pierella Paci.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odriguez, Francisco, and Arjun Jayadev. 2010. "The Declining Labor Share of Income."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aper 2010/36,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New York.

Rostow, Walt Whitman.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zelle, Scott, and Jikun Huang. 2012. "China's Labor Transition and the Future of China's Rural Wages and Employmen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TeamLease. 2010. *Temp Salary Primer 2010*. Ahmedabad, India: TeamLease Services Pvt. Ltd.

UN (United Nations). 1948.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dopted by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December 10.

———. 2009.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New York: UN.

———. 2011b.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1 Revision*. New York: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Vanek, Joann, Martha Chen, Ralf Hussmanns, James Heintz, and Françoise Carré. 2012. *Women and Me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A Statistical Picture*. Geneva: 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World Bank. 200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7: Development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0. *Stepping Up Skills for More Jobs and Higher Productiv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a. *Defining Gender in the 21st Century: Talking with Women and Men around the World, A Multi-Country Qualitative Study of Gender and Economic Choi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b.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South As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c.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2. *Job Trend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Yoshino, Yutaka, ed. 2011.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 Africa: From Survival to Growth*. World Bank Directions in Development Ser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第一部分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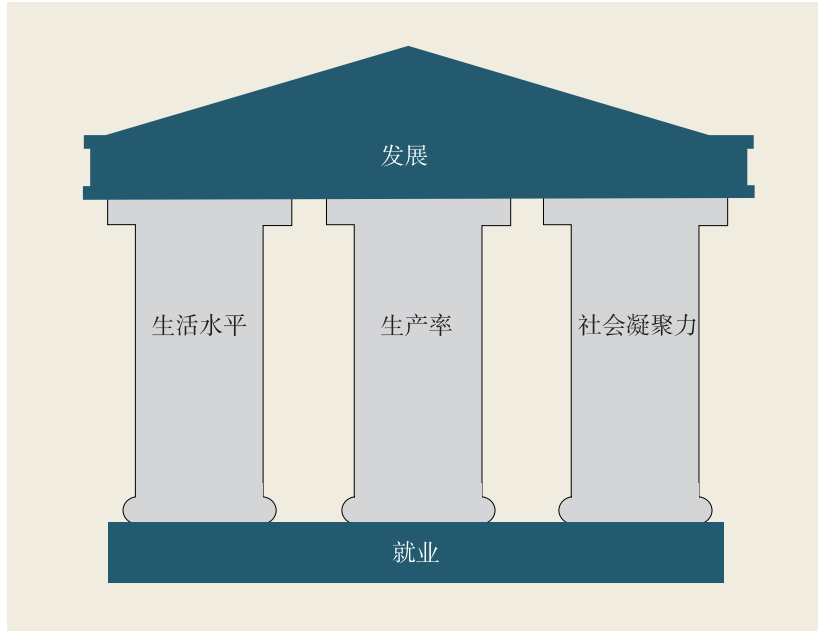
就业的变迁性



第一部分

经济发展的真谛在于以生产率增长支撑生活水平的改善。这也包括城市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促进性别平等等相关的社会变革。所有这些变迁都与就业息息相关。发展进程意味着一些工作变得更好了，一些工作消失了，一些人获得或改变了工作，就业机会从一个地方转向国内或国外的另一个地方。发展常常意味着劳动力从农村的、农业的且基本上是糊口性的活动转向城市的、非农业的且基本上是市场导向型的活动。这种转变改变了家庭和社区的生活，改变了公司的组织架构，改变了社会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这种转变可以提高生产率，改善生活水平，而且会对社会的凝聚力产生影响。因此，就业是发展的重要引擎。

- 生活水平：就业为人们脱贫提供了收入机会，提高了他们的消费水平，广泛促进了个体福利的提高。
- 生产率：通过部门内就业岗位的提供和就业岗位的损失以及部门和国家间就业岗位的重新分配，就业也是经济增长的根本。



- 社会凝聚力：就业通过很多方式界定了人们的角色；通过塑造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就业可以对社会信任和公民参与产生影响。

区分这三大变迁有助于我们理解就业是如何促进发展的。人们的福利是最终目标，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变紧紧抓住了这一主线。但是，没有生产率的增长或当资源被浪费在冲突中，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就会沦为空谈。联合审视三大变迁的原因，正在于此。

第 2 章

2

就业与生活水平

工作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减贫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工作对福祉的贡献不仅仅是工作提供的收入。

工作是世界各国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对大多数人而言，尤其是对最贫穷国家的人而言，工作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与工作相关的事情是家庭脱贫或陷入贫困最常见的理由。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体的选择增加了，家庭成员可以选择游离在劳动力之外或减少自己的工作时间，增加用于教育、退休或家庭的时间。包括农业和自就业在内的收入丰厚的工作机会，为家庭提供了增加消费并减少可变因素的途径。较高的谷物产量，进入非农场小型企业工作，家庭成员移民城市以及转向工资性就业等都是通向繁荣过程中的里程碑。

除了基本的、直接的收入贡献之外，工作还对福祉的其他方面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没有工作会危害心理健康，在那些工资性就业被视为准则，就业岗位的匮乏转化为公开性失业而非就业不足的国家中，情况更是如此。但是一项易于造成职业性意外事故的工作或职业性疾病的工作可能损害身体健康或造成更严重的问题。更广泛一点儿，工作的货币、非货币甚至主观的特征都可能对福祉产生影响（见专栏 2.1）。

就业也对工人如何看待自己及如何与他人相处产生影响。大多数人认为工作应当具有意义，应当对社会有所裨益。工作带给人的自尊感和工作的其他客观特性共同构成了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决定因素。

就业改善物质福祉

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生产率和劳动收入的提供允许家庭增加用于投资和消费活动的时间，降低用于生产的活动。这样，教育和退休生活得到了人们的相对重视。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随着受教育机会的扩大，工业国家青年工作的时间量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同样，退休生活的年数也与预期寿命同步增长。[1] 较高的收入也延长了找工作的时间，对家庭的年轻成

专栏 2.1　生活水平包括很多方面，测量生活水平的方法也有很多种

社会科学对如何界定和测量生活水平的讨论源远流长。通常认为，朗特里（Rowntree）和布思（Booth）就 19 世纪晚期的英国所做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就测量贫困所做的研究工作具有深远的意义。20 世纪 30 年代创立的国民账户体系强调测量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总量，并且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一般标准。到 20 世纪 70 年代和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逐渐达成共识，即国内生产总值并不能完全覆盖健康状况或遭遇犯罪、污染及城市堵塞等影响福祉的重要方面。研究还显示，物质设施的分布对个体福祉具有影响。现在达成的共识是，生活水平不仅仅取决于平均收入和消费，而且取决于健康和教育、卫生设施和住房、安全和自由等多种利益的获得。[a]

为更好地理解和比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全面搜集个体家庭和社区数据的工作一直在持续。对同一国家不同人口群体的完全的、基于国际或国家贫困线收入或消费总量比较的贫困数据，大量增加。微观数据搜集工作使密切监控世界生活水平和减贫工作成为可能。据记载，推进实现第一个世纪发展目标（根除极端贫穷）的进程采用了全球货币贫穷测量法。反过来，更翔实的数据集促进了测量生活水平的更新的方法的兴起，其中很多方法在性质上是多维度的。这些方法将福利的货币和非货币指标及福祉在不同人口群体间的分布信息联系在了一起。[b]

尽管取得了上述进步，重大的争论依然存在，涉及哪项指标更适合测量福祉的某一维度和哪项指标应获得多大的关注度时尤其如此。近期的一些提案甚至建议修订统计体系，制订更完善的生产测量标准，将产品质量、政府服务和用于家庭活动和休息的时间等方面的变化纳入其中。也有一些提案将福祉的主观指标，人类、物质和环境资产的水平和可持续性指标纳入生活水平的测量方法之中。[c] 其他提案强调建立在哲学观念之上的主观指标。[d]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价值观和信念的差异，指标总和及对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指标进行比较就成为一项更加复杂的工作。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注释：a. Adelman 和 Morris 1973；Chenery 和 Syrquin 1975；Nordhaus 和 Tobin 1973；Sen 和 Hawthorn 1987；Steckel 1995；Streeten 1979。

b. 这些指标包括人类发展指数（UNDP 1990）、人类机会指数（Paes de Barros 等 2009）及大量的多维度贫穷指数（Alkire 和 Foster 2011；Bourguignon 和 Chakravarty 2003；Kakwani 和 Silber 2008）。同时参阅经合组织 2011。

c. Fitoussi，Sen 和 Stiglitz 2010。

d. 例如，不丹研究中心测量不丹国民幸福指数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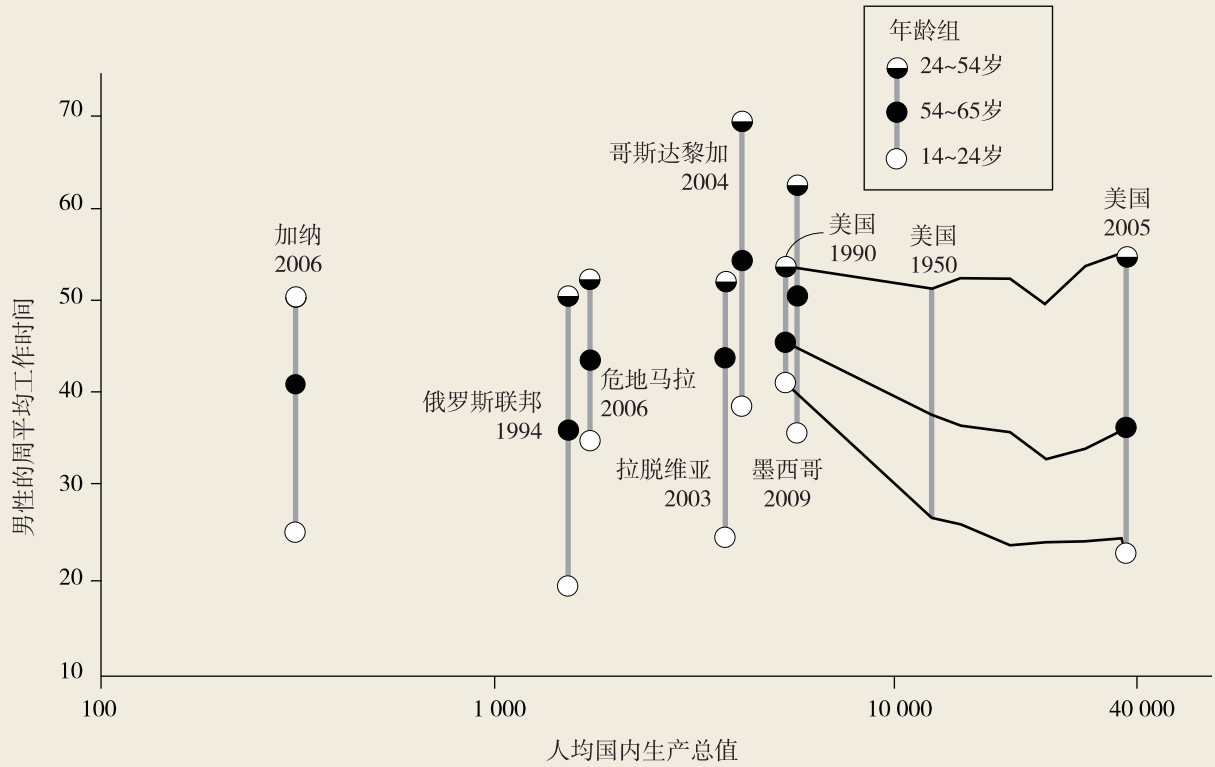
员而言尤其如此，这常常导致失业率的提高。在成熟期的男性和女性中（25 至 54 岁），（市场和非市场）工作时间总量保持相对稳定，主要变化是女性市场活动量的持续增加（见图 2.1）。然而，这些总的趋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生产、消费和投资活动的性质也因国家而异。在某些国家，青年较短的工作时间更多地与赋闲而不是与教育联系在一起。在另外一些国家，教育实现了加速发展。同样，工作性质随着发展而改变。在农业生产活动占据主导地位的农村经济中，家庭生产的目的常常是直接消费。欠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常常表现为用于无报酬工作（包括农业和其他类型的自就业）的时间更多。发展促进了工作组织形式从家庭生产向市场生产的转变。[2]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作获得工资或薪水形式的报酬。重新分配常常伴随着女性市场参与的增加。[3] 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每天的工作比例大体相当。但是女性的不直接带来收入的活动要多于男性（见图 2.2）。

工作并不自动保证收入和福利的持续改善。工作人口常常陷入贫穷。在许多国家，和非贫穷家庭相比，贫穷家庭的成年人工作的可能性更大。缺少工作或工作时间不够通常不是贫穷人口的特征；他们的工作常常超过一个，工作的时间也更长，但是他们的工资待遇却很差（见专栏 2.2）。

在更富裕的社会里，来自资本、转移支付（社会援助）或储蓄（社会保险和退休金）的收入所占的比例较

图 2.1 工作时间因年龄而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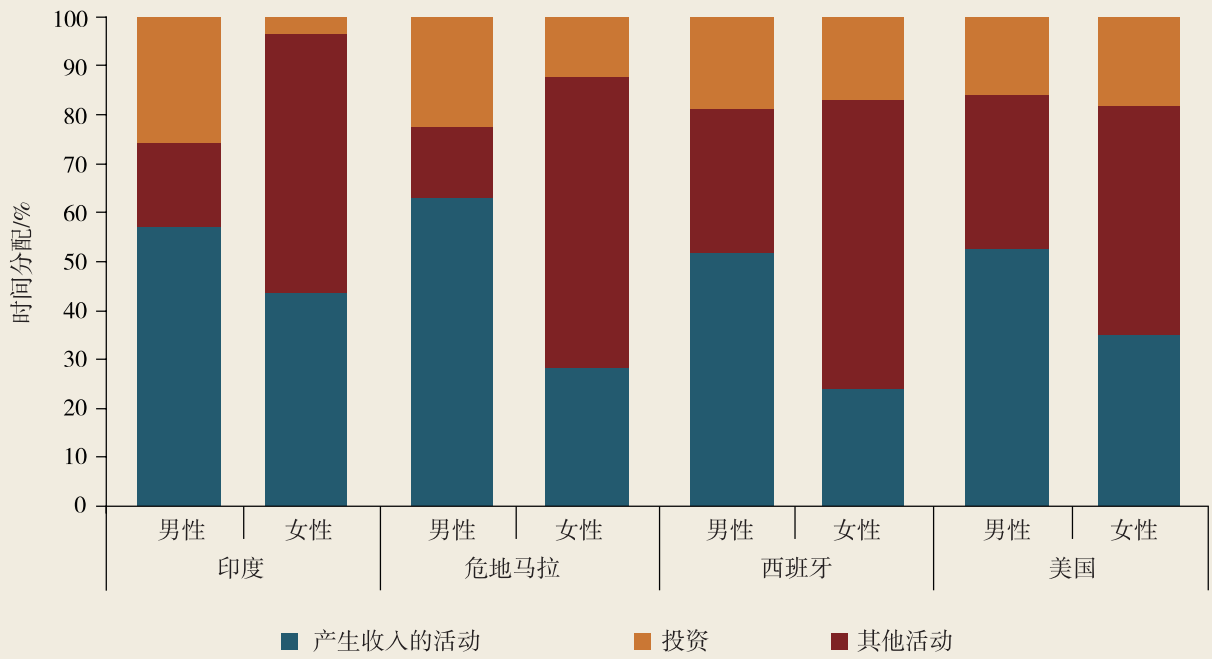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Berniell 和 Sanchez-Paramo 2011；Ramey 和 Francis 2009。
注释：竖轴测量每周用于生产活动的时间（市场工作和非市场工作），包括一些未被纳入国民账户体系的工作（比如儿童看护）。测量时并没有把用于教育或休闲的时间包括在内。水平轴测量以 2000 年美元表示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大。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家庭仍然要通过工作谋生，劳动收入在家庭收入总量中的比例最大（见图 2.3）。发展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劳动收入的构成变化。[4]

工作相关的事情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脱贫的主要路径。一项关于贫穷动态的研究显示，劳动相关的事情是引起家庭脱贫的启动器。这项研究持续了二十多年，研究对象国的差异性很大，如加拿大、厄瓜多尔、德国和南非等（见图 2.4）。这些事件包括家庭的户主换了一份新工作，其他家庭成员开始工作，正在工作的家庭成员的劳动收入增加了。在对低收入国家进行的一组大规模定性研究中，获得工作和开始经商是人们在解释自己的脱贫原因时所陈述的两大原因。[5]反过来，缺少工作机会降低了家庭改善自身福祉的能力。[6]

工作不是一个家庭脱离贫穷的唯一决定因素。人口变迁，譬如新生儿、亲属移入或由于死亡或分离造成的家庭分裂，会对人均支出产生影响，从而对家庭的贫穷状态产生影响。人口变迁对来自资产或转移支付的非劳动收入、私人汇款、公共社会援助或退休金的影响也是如此。这些变迁可能互相作用，而且常常同时发生。例如，家庭成员为就业而移民城市，这不仅仅会提高移民家庭成员的福利，而且会提高那些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的福利。除了得到汇款，那些留在村里的

图 2.2　女性用于不直接产生收入的活动的时间更多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2005 年 ISSP 西班牙和美国的数据、1999 年印度时间利用调查和 2006 年危地马拉家庭调查的数据。
注释：本图人口系指 15 岁及以上的人口。产生收入的活动系指用于工资或有酬就业、农业、雇用劳动力的自就业和在家庭企业中从事无酬家庭劳动的时间；投资系指用于教育、保健和找工作的时间；其他活动包括国民账户体系之外的工作，比如儿童护理和家务活等。休闲和与消费活动相关的其他活动（例如，购物和社会互动）以及睡眠等活动不包括在内。

人可以耕种移民家庭成员的土地，从而增加了劳动量。[7]

在众多变化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测量劳动收入对减贫的贡献不是一件易事。然而，允许根据收入来源解构贫穷变化的近期方法确认了劳动收入对减贫的基本贡献（见图 2.5）。根据美国每天 2.5 美元贫困线的测量，在被分析的 18 个国家中，有 10 个国家贫穷状况的改变一多半是由劳动收入引起的。在另外 5 个国家中，1/3 强的减贫成就来自劳动收入。[8] 对孟加拉国、秘鲁和泰国劳动收入对减贫贡献的进一步解构发现，个体特征的变化（教育、工作经验或居住地区）非常重要，但是这些特征的回报更重要。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便是回报之一。[9]

就业和减贫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脱贫都与所从事工作类型的改变有关。同一工作生产率的变化也可能发挥作用。例如在孟加拉国和越南，贫穷状况的改观主要不是由于收入来源从农场转入非农场收入引起的，而是由同一部门的收入提高引起的。[10]

对同一家庭在较长时期内的跟踪研究可以丰富对与工作相关的事件与脱贫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个国家的研究显示，农业和非农活动交织在一起，并不能互相取代。土地获得、农业产量的增加和市场准入是非农业工作增长的基本要素，因此也是家庭收入多样化的基本条件。[11] 根据这些研究，由于大多数人口都在农业经济中工作，仅仅具有工作并不是最重要的。对脱贫具

专栏 2.2 大多数贫穷人口都有工作

贫穷人口并不是指没有工作的人。这一认识使贫穷工作人口的概念以及他们是谁、为什么即使他们拥有工作他们依然贫穷的问题成为引人关注的议题。最先研究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等国家的研究者，现在，贫穷工作人口的概念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劳工组织将贫穷工作人口纳入其统计体系，而且对这一群体的测量已经列入千年发展指标体系。

贫穷工作人口被定义为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低于两种国际贫困线（每天 1.25 美元或每天 2 美元）中任一贫困线的雇员。[a] 家庭支出调查根据人均消费水平将人口分为贫穷人口和非贫穷人口。这些调查也提供了参加工作的家庭成员的信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估测，生活在每天 2 美元贫困线以下的工人有 9.1 亿，将近全球总就业量的 30%。[b] 低收入国家的发生率远远高于这一水平，非洲高达 63.7%，亚洲高达 54.2%。[c]

然而我们应当以谨慎的态度解释这一概念。在贫穷工作人口之外，还可能存在劳动收入很低、但由于他们具有私人转移或来自社会保险或社会援助项目的收入，从而支出水平超过贫困线的个体。换句话说，不在贫穷工作人口范畴之内并不意味着较高的劳动收入。

最低生活工资是表明工作收入是否足以满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最低生活水平的概念。这是足以保障工人及其家庭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水平。但是从定义转向测量殊非易事。由于涉足非工资工作的工作人口超过一半，精确测量劳动收入可能难以实现。而且，人们对标准家庭的组成解释不同，对计算方法又没有达成共识。[d] 一个替代性方法是计算那些单靠劳动收入不能达到贫困线的人口的比例，比如墨西哥的贫穷劳动力趋势指数。[e]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注释：关于发达国家贫穷工作人口的概况，见 Blank，Danziger 和 Schoeni（2006），以及 Brady，Fullerton 和 Cross（2010）；关于发展中国家，见 Fields（2011）。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和范围，可以见联合国“我们可以结束贫穷，2015：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纽约。

a. 指标 18，“贫穷，收入分布和贫穷工作人口，” KILM（劳动力市场重要指标）（数据库），2011 年第 7 版，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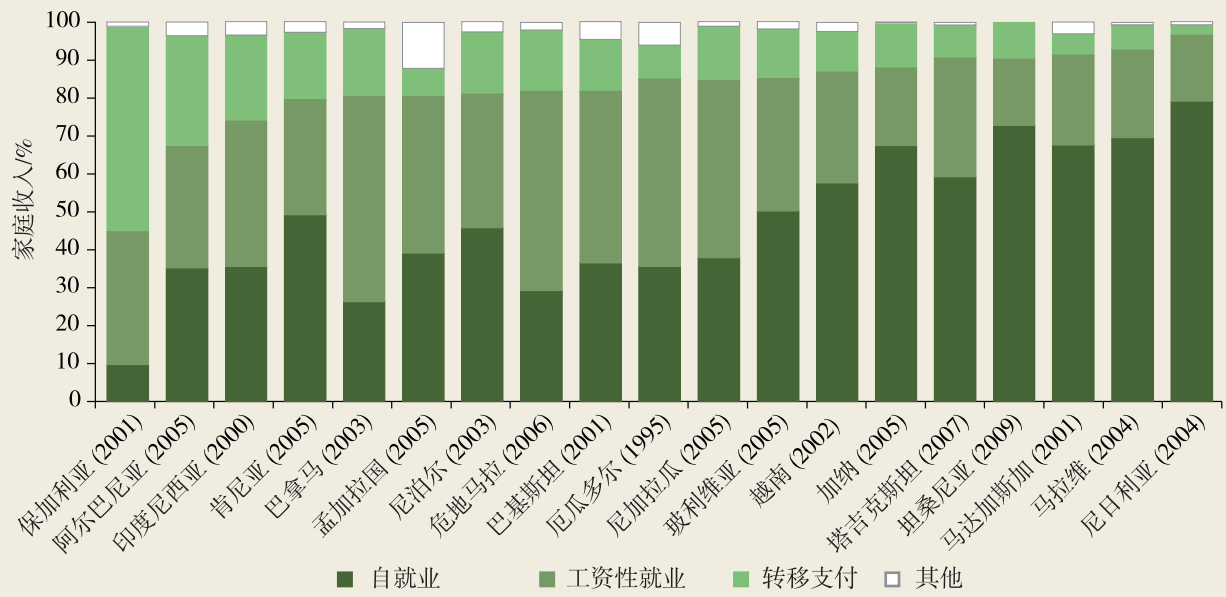
b. 国际劳工组织 2011，41–42。

c.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KILM 数据库对低收入国家 2009 年的选择性估测。

d. Anker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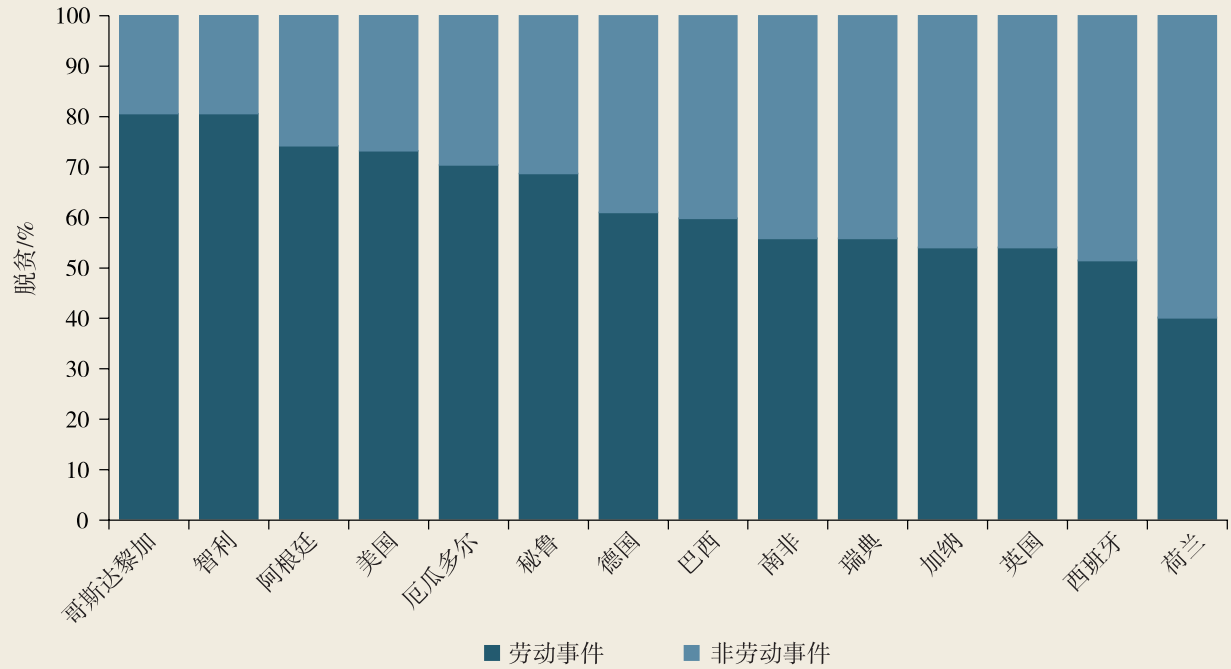
e. 贫穷劳动力趋势数据，社会发展政策评估国家委员会（CONEVAL），墨西哥市。

图 2.3 工作是家庭收入最重要的来源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Covarrubias 等 2012。

图 2.4　工作使家庭脱贫，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样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Inchauste 2012。
注释：非劳动事件包括非劳动收入的变化（比如租金或退休金）。触发事件被定义为在减贫期间，一组互相排斥的事件范畴（如家庭解构、收入来源和家庭需求的变化）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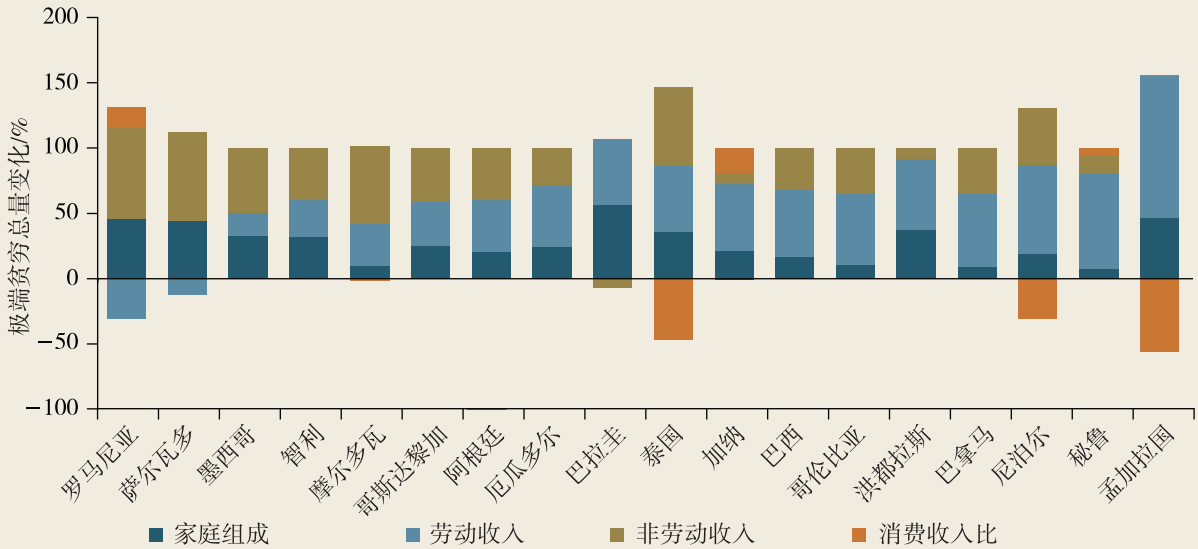
有重大作用的是提高劳动的收入。

其他生产要素对解释以就业实现脱贫具有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对乌干达和巴基斯坦的研究显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商品化的扩大和经济作物生产的增加对减贫的贡献很大。这项研究使用了乌干达连续的农村数据和巴基斯坦连续 10 年的农村数据。这一时期经济作物价格的上升也有助益。[12] 土地权的改善及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更便利的进入投入和产出市场也扩大了脱贫的机会，这在乌干达尤其明显。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了影响，这些因素源自土地市场或粮食市场而不是劳动力市场。

记录在案的最大的减贫与农业领域的工作相关。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和越南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发展状况证明了农业生产率、土地改革所释放的力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和非农业工作机会的重要性。[13] 在中国农村地区，脱贫与非农业活动相联系，但是涉足这些活动的工人倾向于是那些从农业收入增加中受益并提高了教育程度的工人。[14] 而且，无论是更容易获得非农工作还是移民机会，都降低了家庭面对收入冲击的脆弱性。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国家也记录了类似的事件。亚洲农村地区的减贫活动与非农业活动的多样性相关，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减贫活动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可能更密切。[15]

工作和再度陷入贫穷也有关系。干旱洪涝和冲突等大范围的冲击可以将家庭逼入贫穷或甚至长期性的贫穷。具体到个体的事件，比如户主患病或健康状况不佳等也会产生相同的后果。

图 2.5 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极端贫穷的降低



资料来源：Azevedo 等 2012；Inchauste 等 2012；均为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注释：家庭组成系指家庭内部成年人口（年龄为 18 岁及以上）比例的变化。劳动收入系指每位成年人的就业和收入变化。非劳动收入系指转移支付、退休金和推算房租收入等其他收入来源的变化。如果图中的长条在横轴以下，它意味着该来源将加剧而不是降低贫穷。本图对阿根廷（2000—2010）、孟加拉国（2000—2010）、巴西（2001—2009）、智利（2000—2009）、哥伦比亚（2002—2010）、哥斯达黎加（2000—2008）、厄瓜多尔（2003—2010）、萨尔瓦多（2000—2009）、加纳（1998—2005）、洪都拉斯（1999—2009）、墨西哥（2000—2010）、摩尔多瓦（2001—2010）、巴拿马（2001—2009）、巴拉圭（1999—2010）、秘鲁（2002—2010）、尼泊尔（1996—2003）、罗马尼亚（2001—2009）和泰国（2000—2009）的变化进行了计算。对孟加拉国、加纳、摩尔多瓦、尼泊尔、秘鲁、罗马尼亚和泰国的变化的计算采用了基于消费的贫穷测量方法，对其他国家的变化计算则基于收入测量方法。

在这些情况下，将家庭逼入贫穷的并不是失业本身，而是个体和家庭资产的破坏。[16] 而且即使将这些冲击因素考虑在内，户主丢失工作仍然是陷入贫穷的关键决定因素。[17]

显然，贫穷人口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收入人口的死亡或残疾会大大增加陷入贫穷或延续贫穷的可能性，对资产很小的家庭而言尤其如此。来自乌干达和巴基斯坦的研究显示，参加工作的家庭成员的比例对此也有重大的影响。赡养率持续增加的家庭持续贫穷或陷入贫穷的可能性更大，而工作年龄人口增加的家庭陷入贫穷或延续贫穷状态的可能性则较小。[18]

工作不仅仅是收入

工作的影响超越了工资和收入的范围。一些工人高度重视工作场所安全、稳定、通勤时间、学习和晋升机会、退休金利益资格及其他福利设施等。然而，对工作的这些方面的货币价值进行量化殊非易事。对中国建阳、哥伦比亚萨拉尔达（Risaralda）、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开罗和法尤姆（Fayoum）及塞拉里昂洛克港（Port Loko）和弗里敦（Free Town）的比较调查显示，尽管被调查者表达了支付意愿，他们将工作收益与货币价值相联系的能力有限。[19] 而在那些给出明确估价的人口中，支付退休金收益的意愿从中国占月工资的 5%到哥伦比亚的 7%再到埃及的 13%不等。给予交通补贴的价值较低（分别为 2%、1%和 7%），但是他们更看重永久性的合同，尤其是在埃及（分别为 3%、8%和 22%）

专栏 2.3　通过享乐定价法量化工作属性的价值

工人不仅仅重视工作带来的收入。在个体层面，人们看重工作可能对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福利以及对他们的家庭产生的影响。除了工作带来的收入外，他们可能看重工作的稳定性，他们的收益、晋升的可能性或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工人也可能看重一项工作对他们社会关系和声望的影响，或对社会目标的贡献。

享乐定价法评估人们如何通过更广泛的工作满意度或工作幸福感来衡量具体工作属性的价值。主观幸福感指数通过统计分析与包括收入在内的不同工作属性联系在一起。统计方法可用于评估每一工作属性对幸福感或工作满意度的贡献。

与估测享乐价格函数中不同工作属性相联系的权重允许对工人所赋予的每一工作属性的价值进行评估。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享乐价格函数相应权重和收入权重对一项工作属性的货币价值进行评估。例如，享乐函数揭示了被调查者愿意为换取稳定或工作创造性或在工作场合发言权而放弃的收入的比例。[b]

根据本报告委托进行的调查，对健康保险收益的享乐评估在哥伦比亚和中国占小时工资的 1.5%到埃及的 4.2%再到塞拉里昂的 5.1%之间波动。[a] 这远远低于被调查者所回答的明确估价：中国是 4.9%，哥伦比亚和塞拉里昂是 10%；埃及最高，是 25%。这表明个体对工作健康保险收益的显现性偏好低于他们所表达的愿意获得的价格。享乐定价法也可以识别其他不太明显的工作属性的价格的显现性偏好。哥伦比亚、中国和埃及的受薪工人将放弃每小时工资中 1.5%的“重要”收益。在埃及，受薪工人为获得非手工或非常规工作而愿意放弃的收入的比例可以高达每小时工资的 2.1%。

该方法与评估工作收益尤其相关。例如，这些受益包括为获得老年退休金而减少的收入。工作者通常看重这些收益，但是他们更看重通过社会安全贡献而减少的收入。如果预期的退休金不高，而且不确定，那么他们可能倾向于留在非正规性领域。和因参与而引起的扣除相比，一个精心设计的、集中其他工作者长寿风险的方案可能更为工作者所看重。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注释：a.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挪威 Fafo 研究基金会 2012 年工作调查的计算值。
b. 近期的例证是 Hintermann，Alberini 和 Markandya 2010，Falco 等 2012。

（见专栏 2.3）。

工作属性对福利还有一些较不明显但同样真实的影响。特别是工作对工人健康这一人类发展和个人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直接的影响（见专栏 2.4）。据估计每年因接触危险物质而死亡的人数为 65.1 万，这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因工作相关的事故或疾病引起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天 6 千人，或每年 220 万。大多数死亡（170 万）是由职业病引起的，其余的由工作场所中的致命性事故引起或死于通勤来往中。[20] 每年遭遇职业事故或职业病折磨的人口超过 4 亿（将近全球劳动力的 15%）。在某些时候，发生率高得令人难以容忍：印度一半的石笔工人和拉丁美洲 37%的煤矿工人饱受轻重不等的硅肺病的折磨（由于吸入硅石粉尘而引起的一种职业性肺病）。[21] 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虐待关系和性骚扰可能危害心理健康。健康风险并不局限在工资性就业中。打水或在炉灶前烹调（正如许多自就业工人所做的那样）也会带来风险，这些风险更可能影响女性而不是男性。[22]

职业事故和职业病具有经济成本。由于估算应该将用于卫生保健和疾病福利的支出以及因工作日减少而放弃的收入包括在内，计算这些经济成本并不简单。估算自就业的经济成本尤其困难。测量自就业经济成本的研究为数不多，这些研究认为自就业造成的社会负担很高。据估计，2004 年，西班牙单是工业领域的这些成本就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1.72%。2003 年，毛里求斯的工伤成本约等于国内生产

专栏 2.4　工作可能带来健康和安全风险

对三个国家服装厂工人的调查凸显了他们在工作中所面临的健康和安全风险。印度尼西亚、约旦和海地的制衣工人报告了包括饥渴和严重疲劳等在内的与工作有关的身体压力。

在印度尼西亚，一半以上的被调查工人报告说他们常常或每天经历严重口渴的折磨。高温可能是原因之一。在被问及工厂是太热或太冷的问题时，只有约一半（52%）的工人报告说温度没有问题。职业安全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59%的工人担心危险的设备，73%的工人担心发生事故，64%的工人担心粉尘或被污染的空气，69%的工人担心化学气味。

在约旦的工厂，37%的工人报告说他们担心危险的设备，45%的工人报告说他们担心发生事故和受伤。

在海地，40%的工人报告说他们偶尔、常常或每天都会经历严重疲劳或极度疲劳；41%的工人报告说他们经常头疼、头晕、后背疼或脖子疼。63%的工人报告说他们常常或每天都会经历严重口渴的折磨，这令人震惊。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劳工组织 2011。

总值的 2.8%。[23] 估计全球职业病引起的成本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4%。[24]

残疾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因国家而异。残疾人口的就业率在波兰的 70%和瑞士与赞比亚的 20%之间波动，低于总人口的就业率。[25] 残疾可能是已有的状况，或者是工伤或工作条件造成的。造成残疾人劳动成果差异的原因包括生产率差异、社会福利体系的抑制和歧视。在任何情况下，就业率较低是导致残疾人陷入贫穷的主要原因。

在工资性就业盛行的国家中，失业可能对福利产生严重影响。与收入一样，社会地位也被视为发展和维系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26] 研究证明了失业的危害和找到工作的积极影响。[27] 医学研究将失业和压力、沮丧、心脏病和酗酒联系在一起。[28] 心理苦闷、婚姻解体和自杀也和失业相关。[29] 随着外包、劳动非正规性和现代工作流动性的增加，抑郁症和压力相关的疾病越来越普遍。[30]

失业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独立于社会保险或其他保护机制之外的。[31] 这是因为失业带来的心理苦闷关乎社会耻辱。研究显示，如果失业或工作不稳定的现象比较普遍，或者失业范围或不稳定工作分布的不平等程度较低，失业工人或工作不稳定的工人面临的威胁就较小。这一发现证明，一个人的工作与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密切互动。[32]

工作和生活满意度

幸福既是个人目标，也是社会愿望。幸福与就业状况相关。大量文献表明，失业人口认为和有工作的人比起来，他们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都较低。[33] 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一个人找到工作时，其主观幸福感就会增加，失去工作时其主观幸福感就会降低。[34]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不满是稍纵即逝的，但是其他人指出，只要对工作稳定性的担忧持续，不幸福感就会持续。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具“不幸福感”，但是证据显示，女性受到配偶失业的影响。失业有损自尊，也会降低家庭其他成员的社会地位。[35]

当工作不足，失业成为问题，人们会改变自己的期望和态度。世界价值观调查对很多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数据表明，较高的失业率与人们降低工作期望有关，或许这表明有效工作的缺失迫使个体接受任何工作。

对生活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的不仅仅是失业。在英国，在失业率较高的地区，不幸福感也较低，这表明，失业会对人们产生伤害，但是如果当地的失业人口较多，失业对人们的伤害也会较小。[36] 当普遍的工作匮乏降低了失业带来的社会耻辱，失业对幸

福感的影响似乎被部分抵消了。失业也使人们丧失了通过工作场合与人交往的机会，从而导致相关社会网络的收缩，这可以损害社会资本，削弱与他人的联系。[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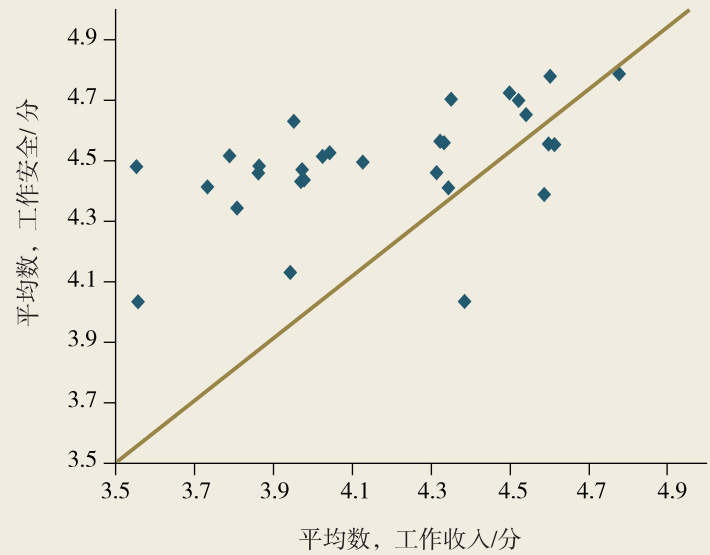
仅仅具有工作不足以保障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工作中因收入不稳定、工作不稳定或对健康与安全的焦虑引起的不安全感也会对人的福利产生影响（见图 2.6）。[38] 对工资工人而言，合同类型及其有效期很重要；兼职工作者和季节性工人的工作满意度较低。即使签有长期合同的工人也可能感觉到不安全。[39] 在海地、约旦和越南的工厂里，工作收入并不影响生活满意度，但是工作条件会产生影响。[40] 在更发达的国家，工作赋予的自主性越高，生活满意度也越高。[41]

大多数对工作与生活满意度两者关系的研究都是在工资性就业普遍的国家中进行的。发展中地区领取工资的工人比例较小，而越来越多对发展中地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显示，和其他工人和失业工人相比，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最低（见图 2.7）。同时，领取工资的工人和自就业者的满意度高于失业者。

自就业者的生活满意度是否高于工资工人取决于具体环境。在工业国家、在东欧和中亚，平均生活满意度在各群体间大体相当；但是在拉丁美洲，自就业者的生活满意度却要低许多。[42]

工作也对人们如何认识自己及与他人的交往产生影响。大多数人强烈感觉他们的工作应该对社会有所裨益和贡献。一项 2005 年在 29 个国家展开的调查询问人们如何评价他们工作的属性。[43] 超过 3/4 的被调查者回答说重要的是工作要对社会有所裨益，相当比例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工作要对他人有所助益也很重要。在九个国家中，被调查者中认为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对社会有所裨益的比例高于认为工作的重要性在于高收入的比例。尽管这些国家多为高收入国家，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或南非，人们对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和高收入工作的偏好差异不大。

图 2.6　和收入相比，工人常常更看重工作安全



资料来源：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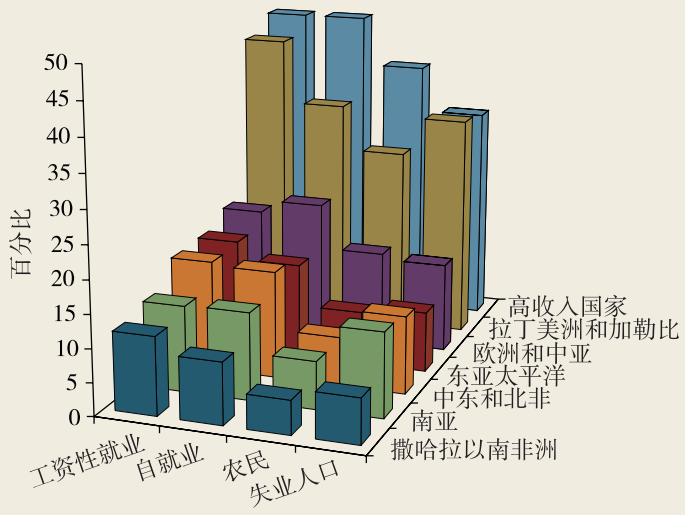
注释：分析覆盖了 29 个国家，图中每一个圆点代表一个国家。被调查者对工作安全和工作收入的重要性打分，分值在 1 到 5 之间。5 分表示非常重要，4 分表示重要，3 分表示无所谓重要不重要，2 分表示不重要，1 分表示根本不重要。

文化差异或社会规范也可能对工作满意度和其他诸如幸福感或社会认同等非物质性福利产生影响。尽管如此，无所恐惧或没有痛苦等其他用于替代工作满意度的健康变量也显示了其与工作条件的关系。对海地、约旦和越南的研究发现，基本健康卫生、工作场所设施或工会的存在等基本工作条件会降低恐惧或痛苦的感觉。[44]

* * *

工作对工作者的福利具有影响，

图 2.7 农民和失业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



资料来源：Gallup 2009，2010。

但是工作也会对其他人的福利产生影响。一些工作具有较大的减贫效应，使那些认为根除贫穷是基本社会目标的人受益。一些工作提高了女性的就业率，赋予她们在家庭资源分配中较大的话语权，通常会提高用于养育儿童的支出。和减贫一样，性别平等也是一项广泛认可的社会目标。具有这些额外影响的工作可以促进发展。考虑到这些溢出效应，工作在个体及全体社会的福利中发挥着基本的作用。因此，就业可能成为发展战略的中心议题（见问题 2）。

问题 2 增长战略还是就业战略？

快速持续的增长通常被视为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和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社会凝聚力不断加强的前提条件。经济增长、生活水平和社会凝聚力的确可以共同发展进步，而且正如包括韩国和新加坡在内的东亚经济体的诸多经验所示，三者常常共同发展进步。[45] 在东亚经验的基础上，传统观点重视增长，认为生活水平会随着增长而提高，社会凝聚力会随着增长而加强。这就是“增长”战略背后的主要原则。“增长诊断”和“绑定约束分析”的目标均在于识别和消除经济增长的障碍，维持经济在较长时间内的增长。

但是生活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凝聚力的加强并不一定会同时发生。不同国家中增长对减贫的不同影响可以解释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中出现的落后和差异问题。2%的年增长率在一些国家可以使贫穷降低 1%，而在其他国家可以使贫穷降低 7%。[46] 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经历了经济增长期，然而贫穷状况的改善微乎其微。[47] 另外，减贫工作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时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如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前五年的巴西和墨西哥。[48]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贫穷下降了，某些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有其他人的期望没有实现，因而社会凝聚力并不伴随着增长而加强。就这一点而言，突尼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增长率远远超过地区的平均水平，但是它仍然经历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冲突。[49]

承认这些落后和差异导致国家转向了更细致的经济增长方法，追求“亲贫的”、“分享的”或“普惠性”增长。[50] 在这些方法中，不仅增长率重要，而且收入的初级分配以及通过增长进程本身和政府转移支付再分配资源的可能性也很重要。[51] 透过这些合理的甄别，我们可能指出工作的作用。如果较高的收入是通过给大多数劳动力，尤其是贫穷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产生的，那么增长就是“普惠性”的。近期的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不同部门的就业密度。[52] 就业机会对社会凝聚力也有影响。这样，就业将三大变迁联系在一起。

意识到就业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就可以突破先解决增长问题再随着需求增加而解决就业问题的顺序观念。相反，就业被视为可以促进实现发展转型的方法。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增长和就业（或失业）的关系因时间、国家和部门的不同而有重大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既定的增长率并不保证既定的就业创造水平或就业组成（见专栏 2.5）。

当增长战略不足以解决问题

强调增长与就业的总量关系贬低了某些将就业与发展联系起来的重要渠道的作用。劳动需求创造就业的观念没有反映发展中国家工作人口中农民和自就业者的处境。而强调以劳动力市场作为增长和就业传送链条的观念也没有抓住工作人口与家庭其他成员、同事之间，更广泛一点，和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互动。只强调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可能不能衡量就业对促进性别平等、对支持城市化或对促成和平的集体决策的作用。如果只考虑总量关系，理解如何提高就业的积极的溢出效应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三大重要变迁同时发生的观点可以在诸如孟加拉国的城市化经济体中找到支持证据。利用其丰富的、技能相对较低的劳

专栏 2.5 增长和就业的关系不是机械不变的

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统计关系有时候被称为奥肯法则。1962 年，亚瑟·奥肯发现，在“二战”结束后的年度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增长 1%，失业率就降低 0.3%。从那以后，该经验法则在众多国家中找到了有力的论据。然而近期的研究发现，奥肯法则并不如其名字暗示的那样稳定。[a]

关于奥肯法则稳定性的辩论阐明了经济衰退和经济扩张的特征。近期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工业国家的失业率对产出降低的响应更灵敏。这对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敏性的制度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有趣的是，遭遇金融危机和大范围房价破产的国家（例如近年的美国和西班牙），其失业问题比奥肯法则所预测的更严重、时期也更长。相比之下，拥有大量短期工作计划的经济体（例如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荷兰等），其失业问题没有奥肯法则预测的那么严重。[b]

奥肯法则与失业相关，其他研究则重视失业的增长弹性。这种弹性最简单的表现方式是就业变化百分比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变化百分比的比率。这些弹性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差异很大，从而使我们很难预测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就业岗位。例如在坦桑尼亚，就业增长弹性从 1992—1996 年的 1.04 降低到 2004—2008 年期间的 0.27。埃塞俄比亚、加纳和莫桑比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c] 在拉丁美洲，近期估测显示，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就业增长弹性远远低于之前危机时期的弹性。换句话说，大衰退在该地区造成的净就业减少相对较低。[d]

就业和失业是总量，增长也可能对失业的结构产生影响。这可以解释一些重要的矛盾，例如尽管印度的制造业迅速增长，该领域的就业却处于停滞状态等。[e] 其他研究显示，由于劳动强度不同，和制造业相比，农业、建筑业或服务业等一些领域的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更多。[f] 乌克兰的农业综合企业、印度的建筑业和卢旺达的旅游业的投资项目对就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不仅仅由于这些项目直接创造的工作机会，还由于其庞大的分销渠道网络所创造的间接就业机会。[g]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注释：a. Cazes，Verick 和 Al Hussami 2011；Moosa 2012。

b. Balakrishnan，Das 和 Kannan 2009。

c.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Martins 2012。

d. 世界银行 2010。

e. Bhalotra 1998；Roy 2004。

f.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rias-Vasquez 等 2012。

g. 国际金融公司，待出版。

动力，这些经济体可以在轻工业品制造业的世界市场上占据一席地位，从而创造了大量的工资就业岗位，为农村移民提供了机会，并缓解了社会迅速变革时期的社会紧张局势。在孟加拉国，轻工业品制造业的扩张为处于生育率降低时期的年轻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提供了机会。反过来，女性的就业机会又促进了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改善了人类发展成果，加快了减贫的速度。

然而在实践中，三大变迁的平衡不仅仅意味着滞后和差异。根据一国所面临的就业挑战的性质，为提高生活水平而创造就业机会的增长与为提高生产率或增强社会凝聚力而创造就业机会的增长之间可能发生矛盾。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

- 在农业经济体中，鉴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的比例，提高小农业的生产率是基本条件。但是某些领域中的城市就业也是增长的必要条件，这些领域将经济与世界市场和全球价值链联系在一起。由于同时支持二者的资源有限，就需要在生活水平和生产率之间进行平衡。
- 在资源丰富型国家，对采掘业的大规模投资提高了增长率，扩大了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但是创造的直接（或者甚至是间接）就业岗位甚少，对减贫的作用也常常较小。而且，丰富的外汇也削弱了其他领域的竞争力，

致使其他部门很难创造生产性的就业岗位。

- 在青年失业率很高的国家，就业机会跟不上教育扩张所形成的期望。而短期内为缓解社会紧张局势采取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对减贫的作用可能不大，这是因为许多失业青年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将公共资源用于资助他们可能降低经济活力。
- 在规范化的国家中，国家通过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扩大到尽可能多的工人来提高社会凝聚力。广大的、不分工作类型的覆盖常常被视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但是扩大覆盖面而不扭曲工作、储蓄和参与正规制度也非易事，而且可能对生产率和长期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如果就业战略可能是适当的

改善生活水平、加速生产率增长和培育社会凝聚力之间的平衡反映了一个有争议的、需要权衡的问题。就业对产生的贡献可以量化，但是就业的一些溢出效应却不能量化。消弭社会紧张局势的就业，即使为社会所看重并可能增加未来的生产率，并不增加可测量的产出。相反，尽管在出口领域中通过工作获得技能和管理知识的机会更多，但是当出口领域的就业被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领域的就业所取代时，可测量的产出并不降低。

如果就业的溢出效应可以得到合理的量化，人们就可以完全地理解三者之间的平衡，从而可能对既定增长战略的产出和就业潜力作出充分的评估。例如，完全考虑当前污染对工人未来健康的负面影响，这将使对基于既定技术的增长战略的潜在产出的评估更加完全。选择消弭紧张局势或更多地参加世界贸易的战略会为未来可持续的、加速的增长奠定基础，而仅仅基于产出增长的短期评估不会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对增长的测量抓住了就业的无形社会效益，那么增长战略可以等同于就业战略。然而，如果只重视可测量的增长，就很容易忽略就业带来的溢出效益，这就是需要就业战略的原因。通过强调就业的溢出效益，就业战略凸显了发展进程中的不同利益成果。

考虑就业战略是引起人们注意就业社会价值的方法。就业战略对具体国家环境中为发展作出更多贡献的工作类型进行评估。就业战略依靠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识别工作如何提高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而且，就业战略力图发现实践中对创造具有最高发展收益的就业岗位构成限制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就业战略将重视增加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在另一些情况下，就业战略将为青年创造就业机会，还有一些情况下，就业战略将为创造城市就业岗位或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工作岗位创造支持性环境。就业战略和更全面的增长战略或许差别不大，但是就业战略使就业成为中心议题。

并不是所有的环境都需要就业战略。只有在就业潜在的重要溢出效应没有实现，从而导致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出现冲突时，就业战略才是必要的。如果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的提高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如同东亚几个国家或孟加拉国等城市化经济体的情况），增长战略可能是更适合的战略。毫无疑问，韩国和新加坡等极其成功的东亚经济体经历了几十年的“普惠性”增长，然而即使是这些国家，在它们发展进程的具体阶段也实施了就业战略（见专栏 2.6）。

专栏 2.6 韩国从增长走向就业战略，新加坡则反其道而行

韩国和新加坡是将长期经济增长、迅速减贫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有效结合在一起的成功典范。但是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两国均依赖过就业战略。

新加坡独立时社会局势紧张，失业率高，民族关系紧张。新加坡的第一个发展战略强调就业、住房和工资节制。随着失业问题的减弱，下一个战略转向提高劳动成本，鼓励高附加值活动。然而成本驱动导致了衰退，自此，新加坡把注意力转向了增长而不是就业。

与新加坡相反，1996 年，韩国摒弃了发展计划，但是在 2010 年，韩国采纳就业战略作为随后十年的最高政策基准。2010 年 10 月，韩国政府启动了《2020 国家就业战略：为了增长、就业和福利的平衡》。根据长期规划的传统，该国家战略为 2020 年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工作年龄人口（15~64 岁）的就业率最少增加至 70%，即工业国家的平均水平。针对恢复经济的宏观经济指标与个体、尤其是青年缺少实现充分就业的能力失衡是造成韩国实施该战略的原因。

为实现 70%的目标，该战略确认了四大支柱。首先是承认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联合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性，包括以就业友好型的方式贯彻实施经济和工业政策。其次是提高工作场所的灵活性和公正性，包括为增加劳动法某些领域规章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同时减少其他领域的规章制度。这样，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在所有企业中，无论其规模[a]，得到实施，同时强制性引入了工作时间储蓄制度。[b] 同时，关于临时工人合同期限和定期合同的规章制度放松了，从而提高雇用的灵活性。再次是扩大劳动力参与和女性、青年及老年工人的技能发展。这包括确立永久性兼职工作的制度，从而允许父母既可以工作，也可以照顾孩子，尤其是在遭遇劳动力短缺却又不能提供全职工作的领域中确立这一制度。在薪水封顶制下，年老的工人通过选择较短的工作时间而较长时间地保留在劳动力中。[c]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该战略的意图在于通过鼓励身体健壮的福利领取者参加就业援助计划，强化他们谋求就业的义务来实现福利到工作的转变。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Huff 1994，1995；韩国 2010。

注释：a. 2004 年引入了 40 小时工作制，但只适用于雇员超过 1 000 人以上的企业。

b. 该制度允许雇员因加班、假日工作或夜间工作而调休。

c. 薪水封顶制允许公司再雇用退休人员。

注释

1. Gershuny 2000；Krueger 等 2009；Ramey 和 Francis 2009。

2. Ngai 和 Pissarides 2008。

3. 关于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不断增加的情况，参阅 Hongqin，MacPhail 和 Dong（2011）。另外，关于中东女性劳动力参与停滞的情况，参阅 Gammage 和 Mehra（1999）。

4. Davis 等 2010。

5. Narayan，Pritchett 和 Kapoor 2009。

6. 参阅 Baulch 2011 所引用的研究；Fields 等 2003；以及 Fields 等 2007。

7. de Brauw 和 Giles 2008；Giles 和 Murtazashvili 2010。

8.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zevedo 等 2012。在萨尔瓦多和罗马尼亚，金融危机导致劳动收入的降低，而非劳动收入弥补了较低的劳动收入。对墨西哥而言，尽管雇员的收入增加了，但是成年工作人口的减少抵消了该效果，和转移支付相比较，劳动收入对脱贫的相对贡献较低。

9.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Inchauste 等 2012。

10. Dang 和 Lanjouw 2012。

11. Estudillo，Sawada 和 Otsuka 2008；Himanshu，Bakshi 和 Dufour 2011；Lanjouw 和 Lanjouw 2001；Lanjouw 和 Murgai 2009；Otsuka，Estudillo 和 Sawada 2009；Takahashi 和 Otsuka 2009。

12.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Mansuri 等 2012a。

13. Glewwe，Gragnolatti 和 Zaman 2002；Ravallion 和 Chen 2007；Ravallion，Chen 和 Sangraula 2009。

14. Christiaensen 等 2009；de Brauw 等 2002；Giles 2006；Giles 和 Yoo 2007。

15. Christiaensen 和 Todo 2009；Estudillo 等 2012；Himanshu 等 2011。

16. Dercon 和 Porter 2011；Fields 等 2003；Lawson，McKay 和 Okidi 2006；Lohano 2011；Quisumbing 2011；Woolard 和 Klasen 2005。

17. Fields 等 2003；Fields 等 2007。

18.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Mansuri 等 2012b。

19.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Bjorkhaug 等 2012；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Hatloy 等 2012；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Kebede 等 2012；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Zhang 等 2012。

20. 国际劳工组织 2010。

21. 国际劳工组织 2005。

22. Al-Tuwaijri 等 2008；Brenner 1979。

23. 西班牙和毛里求斯的估测值均摘自 Ramessur（2009）。

24. 国际劳工组织 2005。

25.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 2011。

26. Wilkinson 和 Marmot 1998。

27. Baingana 等 2004；Murphy 和 Athanasou 1999。

28. Brenner1971；Brenner1975；Dooley，Catalano 和 Wilson1994；Dooley，Prause 和 Ham-Rowbottom 2000。

29. Lundin 和 Hemmingsson 2009；Stuckler 等 2009a，2009b。

30. 国际劳工组织 2010。

31. Ouweneel 2002。

32. Helliwell 和 Putnam 2004；Stutzer 和 Lalive 2004。

33. Blanchflower 和 Oswald 2011；Winkelmann 和 Winkelmann 1998；如何对国家间和文化间自报告的主观成果进行比较是研究者切实关注的问题。见 King 等 2004。

34.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Gales，Mavridis 和 Witoelar 2012。

35. Bjorklund 1985。

36. Clark 和 Oswald 1994。

37. Helliwell 和 Putnam 2004。

38. Dooley，Prause 和 Ham-Rowbottom 2000；Winefield 2002。

39. Bardasi 和 Francesconi 2004；Origo 和 Pagani 2009。

40.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Dehejia，Brown 和 Robertson 2012。

41.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Wietzke 和 McLeod 2012。

42. Graham 2008。

43. 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2005。

44.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Dehejia，Brown 和 Robertson 2012。

45. Gill 和 Kharas 2007；Stiglitz 1996；世界银行 1993。

46. Ravallion 2001；Ravallion 2011。

47. Bigsten 等 2003；Demombynes 和 Hoo-geeven 2007。

48. Ferreira，Leite 和 Ravallion 2010；Hanson 2010。

49. 1990 年至 2008 年期间，坦桑尼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 年实际美元）以年均 3.4%的速度增长，而同期中东和北非的平均水平为 2.0%（世界发展指标）。

50. 衡量“亲贫”增长的标准有几个。见 Ravallion 2004。

51. Ianchov ichina 和 Lundstrom 2009；Ravallion 2001。

52. Christiaensen，Demery 和 Kuhl 2011；Loayza 和 Raddatz 2010。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delman, Irma, and Cynthia Taft Morris. 1973.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l-Tuwaijri, Sameera, Igor Fedotov, Ilise Feitshans, Malcolm Gifford, David Gold, Seiji Machida, Michele Nahmias, Shengli Niu, and Gabor Sandi. 2008. *Beyond Death and Injuries: The ILO's Role in Promoting Safe and Healthy Job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lkire, Sabina, and James Foster. 2011. "Understandings and Misunderstanding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9 (2): 289–314.

Anker, Richard. 2011. *Estimating a Living Wage: A Methodological Review.*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rias-Vasquez, Javier, Jean N. Lee, and David Newhouse. 2012. "The Role of Sectoral Growth Patterns in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Azevedo, João Pedro, Gabriela Inchauste, Sergio Olivieri, Jaime Saavedra Chanduvi, and Hernan Winkler. 2012. "Is Labor Income Responsible for Poverty Reduction? A Decomposition Approach."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Baingana, Florence, Andrew Dabalen, Essimi Menye, Menahem Prywes, and Michael Rosholm. 2004. "Mental Health and Socio-Economic Outcomes in Burundi." Health, Nutrition and Population Discussion Paper,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alakrishnan, Ravi, Mitali Das, and Prakash Kannan. 2009. "Unemployment Dynamics during Recessions and Recoveries: Okun's Law and Beyond." In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balancing Growth,* 69–108.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ardasi, Elena, and Marco Francesconi. 2004. "The Impact of Atypical Employment on Individual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British Worker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8 (9): 1671–88.

Baulch, Bob, ed. 2011. *Why Poverty Persists: Poverty Dynamics in Asia and Africa.*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Berniell, M. Inés, and Carolina Sanchez-Paramo. 2011. "Time Use Databas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Bhalotra, Sonia R. 1998. "The Puzzle Of Jobless Growth in Indian Manufacturing."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0 (1): 5–32.

Bigsten, Arne, Kebede Bereket, Abebe Shimeless, and Mekonnen Taddesse. 2003.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Ethiopia: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Panel Surveys." *World Development* 31 (1): 87–106.

Bjørkhaug, Ingunn, Anne Hatløy, Tewodros Kebede, and Huafeng Zhang.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Colombi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Björklund, Anders. 1985. "Unemployment and Mental Health: Some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 (4): 469–83.

Blanchflower, David G., and Andrew J. Oswald. 2011. "International Happiness." Working Paper Series 1666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Blank, Rebecca M., Sandra K. Danziger, and Robert F. Schoeni. 2006. *Working and Poor.*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Bourguignon, François, and Satya Chakravarty. 2003. "The Measure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1 (1): 25–49.

Brady, David, Andrew Fullerton, and Jennifer Moren Cross. 2010. "More Than Just Nickels and Dimes: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Working Poverty in Affluent Democracies." *Social Problems* 57 (4): 559–85.

Brenner, Harvey. 1971. "Economic Changes and Heart Disease Mort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65 (12): 606–11.

———. 1975. "Trends in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Associated Illnesses: Some Effects of Economic Cha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65: 1279–92.

———. 1979. "Mortality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Lancet* 26: 568–73.

Cazes, Sandrine, Sher Verick, and Fares Al Hussami. 2011. "Diverging Trends in Un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Evidence from Okun's Law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mploy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10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eneva.

Chenery, Hollis Burnley, and Moises Syrquin. 1975.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1970." In *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 Policies to Improv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rowth,* ed. Hollis Burnley Chenery, Richard Jolly, Montek S. Ahluwalia, C. L. Bell, and John H. Dulo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ristiaensen, Luc, Ruchira Bhattamishra, Lei Pan, and Sangui Wang. 2009. "Pathways Out of Poverty in Lagging Regions: Evidence from Rural Western Chin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Christiaensen, Luc, Lionel Demery, and Jesper Kuhl. 2011. "The (Evolving) Role of Agriculture in Poverty Reduction—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 (2): 239–54.

Christiaensen, Luc, and Yasuyuki Todo. 2009. "Poverty Reduction during the Rural-Urban Transformation: The Role of the Missing Midd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2009 Conference, Beijing, August 16.

Clark, Andrew, and Andrew J. Oswald. 1994. "Unhappiness and Unemployment." *Economic Journal* 104: 648–59.

Covarrubias, Katia, Benjamin Davis, Aminata Bakouan, and Stefania Di Giuseppe. 2012. "Household Income Generation Strategi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Dang, Hai-Anh, and Peter Lanjouw. 2012. "Measuring Poverty Dynamics and Labor Transitions with Synthetic Panels Based on Cross-Sections." Processed.

Davis, Benjamin, Katia Covarrubias, Kostas Stamoulis, Paul C. Winters, Carlogero Carletto, Esteban Quiñones, Alberto Zezza, and Stefania DiGiuseppe. 2010.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Rural Income Generating Activities." *World Development* 38 (1): 48–63.

de Brauw, Alan, and John Giles. 2008. "Migrant Labor Markets and the Welfare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vidence from Chin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58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de Brauw, Alan, Jikun Huang, Scott Rozelle, Linxiu Zhang, and Yigang Zhang. 2002.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during the Refor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 (2): 329–53.

Dehejia, Rajeev, Drusilla Brown, and Raymond Robertson. 2012. "Life Satisfaction, Mental Well-Being, and Workplace Characteristics Evidence from Vietnam, Jordan, and Haiti."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Demombynes, Gabriel, and Johannes G. Hoogeeven. 2007. "Growth, Inequality, and Simulated Poverty Paths for Tanzania, 1992–2002."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6 (4): 596–628.

Dercon, Stefan, and Catherine Porter. 2011. "A Poor Life? Chronic Poverty and Downward Mobility in Rural Ethiopia, 1994 to 2004." In *Why Poverty Persists: Poverty Dynamics in Asia and Africa*, ed. Bob Baulch, 65–95.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Dooley, David, Ralph Catalano, and Georjeanna Wilson. 1994. "Depression and Unemployment: Panel Findings from the 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61 (3): 745–65.

Dooley, David, JoAnn Prause, and Kathleen Ham-Rowbottom. 2000. "Inadequate Employment and High Depressive Symptoms: Panel Analy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5: 294.

Estudillo, Jonna P., Tomoya Matsumoto, Ziauddin Hayat Chowdhury, Nandika Kumanayake, and Keijiro Otsuka. 2012. "Labor Markets,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Rural Poverty in Selected Countries in Asia and Sub-Saharan Afric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Estudillo, Jonna P., Yasuyuki Sawada, and Keijiro Otsuka. 2008. "Poverty and Income Dynamics in Philippine Villages, 1985–2004."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 (4): 877–90.

Falco, Paolo, William Maloney, Bob Rijkers, and Mauricio Sarrias. 2012. "Subjective Well-Being, Informality, and Preference Heterogeneity in Afric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Ferreira, Francisco H. G., Phillippe G. Leite, and Martin Ravallion. 2010. "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xplaining Brazil's Poverty Dynamics 1985–2004."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3 (1): 20–36.

Fields, Gary. 2011. *Working Hard, Working Po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elds, Gary, Paul Cichello, Samuel Freije-Rodriguez, Marta Menendez, and David Newhouse. 2003. "Household Income Dynamics: A Four-Country Sto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0 (2): 30–54.

Fields, Gary, Robert Duval Hernández, Samuel Freije, and María Laura Sánchez Puerta. 2007. "Intra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Latin America." *Economía* 7 (2): 101–54.

Fitoussi, Jean-Paul, Amartya Sen, and Joseph E. Stiglitz. 2010. *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 New York: The New Press.

Gammage, Sarah, and Rekha Mehra. 1999. "Trends, Countertrends, and Gaps in Women's Employment." *World Development* 27 (3): 533–50.

Gershuny, Jonathan. 2000. *Changing Times: Work and Leisure in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les, John. 2006. "Is Life More Risky in the Open? Household Risk-Coping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s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1 (1): 25–60.

Giles, John, Dimitris Mavridis, and Firman Witoelar. 2012.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Cohesion,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Indonesi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Giles, John, and Irina Murtazashvili. 2010. "A Control Function Approach to Estimating Dynamic Probit Models with Endogenous Regresso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Study of Poverty Persistence in Chin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40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Giles, John, and Kyeongwon Yoo. 2007. "Precautionary Behavior, Migrant Network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Deci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Household Panel Data from Rural Chin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 (3): 534–51.

Gill, Indermit, and Homi Kharas. 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lewwe, Paul W., Michele Gragnolatti, and Hassan Zaman. 2002. "Who Gained from Vietnam's Boom in the 1990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0 (4): 773–92.

Graham, Carol. 2008.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in Latin America: What Happiness Research Can (and Cannot) Contribute." IDB Working Paper 549,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Hanson, Gordon H. 2010. "Why Isn't Mexico Ri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8 (4): 987–1004.

Hatløy, Anne, Tewodros Kebede, Huafeng Zhang, and Ingunn Bjørkhaug.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Sierra Leon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Helliwell, John, and Robert Putnam. 2004. "The Social Context of Well-Be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59: 1435–46.

Himanshu, Ishan Bakshi, and Camille Dufour. 2011. "Poverty, Inequality and Mobility in Palanpur: Some Preliminary Results." Asia Research Centre Working Paper 45, Asia Research Cent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Himanshu, Peter Lanjouw, Abhiroop Mukhopadhyay, and Rinku Murgai. 2011. "Non-Farm Diversification and Rural Poverty Decline: A Perspective from Indian Sample Survey and Village Study Data." Asia Research Centre Working Paper 44, Asia Research Cent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Hintermann, Beat, Anna Alberini and Anil Markandya. 2010.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Safety with Labour Market Data: Are the Results Trustworthy?" *Applied Economics* 42 (9): 1085–100.

Hongqin, Chang, Fiona MacPhail, and Xiao-yuan Dong. 2011. "The Feminization of Labor and the Time-Use Gender Gap in Rural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17 (4): 93–124.

Huff, W. G. 1994.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ingapore: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What Is the Singapore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 (6): 735–59.

Ianchovichina, Elena, and Susanna Lundstrom. 2009. "What Is Inclusive Growth?"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Forthcoming. *Job Study*. Washington, DC: IFC.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and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1. "Baseline Data Collection: Better Work." IFC and ILO,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5. *Facts on Safety at Work*. Geneva: ILO.

———. 2010. *Emerging Risks and New Patterns of Preven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of Work*. Geneva: ILO.

———. 2011. *Growth,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Geneva: ILO.

Inchauste, Gabriela. 2012. "Jobs and Transitions Out of Poverty: A Literature Review."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Inchauste, Gabriela, Sergio Olivieri, Jaime Saavedra-Chanduvi, and Hernan Winkler. 2012. "Decomposing Recent Declines in Poverty: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Peru, and Thailand."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ISSP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2005. "Module on Work Orientation." ISSP, Cologne.

Kakwani, Nanak, and Jacques Silber. 2008.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o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Kebede, Tewodros, Anne Hatløy, Huafeng Zhang, and Ingunn Bjørkhaug.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Egyp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King, Gary, Christopher J. L. Murray, Joshua A. Salomon, and Ajay Tandon. 2004. "Enhancing the Validity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ability of Measurement in Survey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 (1): 191–207.

Krueger, Alan B., Daniel Kahneman, Claude Fischler, David Schkade, Norbert Schwarz, and Arthur A. Stone. 2009. "Time Us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France and the U.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3 (1): 7–18.

Lanjouw, Jean O., and Peter Lanjouw. 2001. "The Rural Non-Farm Sector: Issues and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6 (1): 1–23.

Lanjouw, Peter, and Rinku Murgai. 2009. "Poverty Decline, Agricultural Wages, and Nonfarm Employment in Rural India: 1983–2004."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0 (2): 243–63.

Lawson, David, Andy McKay, and John Okidi. 2006. "Poverty Persistence and Transitions in Uganda: A Combin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2 (7): 1225–51.

Loayza, Norman, and Claudio Raddatz. 2010. "The Composition of Growth Matter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3 (1): 137–51.

Lohano, Hari Ram. 2011. "Poverty Dynamics in Rural Sindh, Pakistan, 1987–88 to 2004–05." In *Why Poverty Persists: Poverty Dynamics in Asia and Africa*, ed. Bob Baulch, 145–86.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undin, Andreas, and Tomas Hemmingsson. 2009. "Unemployment and Suicide." *The Lancet* 374 (9686): 270–1.

Mansuri, Ghazala, Slesh Shrestha, Hernan Winkler, and Monica Yanez-Pagans. 2012a. "A Plot of My Own: Land Titling and Economic Mobility in Rural Ugand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 2012b. "Health or Wealth? Income Earner Death and Economic Mobility in Rural Pakista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Martins, Pedro. 2012.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Africa: Tales of Lions and Cheetah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Moosa, Imad A. 2012.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Okun's Coeffici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4 (3): 335–56.

Murphy, Gregory C., and James A. Athanasou. 1999. "The Effect of Unemployment on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72 (1): 83–99.

Narayan, Deepa, Lant Pritchett, and Soumya Kapoor. 2009. *Success from the Bottom Up*. Vol. 2 of *Moving Out of Pover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Ngai, Rachel L., and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2008. "Trends in Hours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1 (2): 239–56.

Nordhaus, William D., and James Tobin. 1973. "Is Growth Obsolete?" I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ed. Milton Moss, 509–64.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 *How's Life? Measuring Well-Being*. Paris: OECD.

Origo, Federica, and Laura Pagani. 2009. "Flexicur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Europe: The Importance of Perceived and Actual Job Stability for Well-Being at Work." *Labour Economics* 16 (5): 547–55.

Otsuka, Keijiro, Jonna P. Estudillo, and Yasuyuki Sawada, eds. 2009. *Rural Poverty and Income Dynamics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Routledge.

Ouweneel, Piet. 2002. "Social Security and Well-Being of the Unemployed in 42 Nation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3 (2): 167–92.

Paes de Barros, Ricardo, Francisco H. G. Ferreira, José R. Molinas Vega, and Jaime Saavedra Chanduvi. 2009. *Measuring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Quisumbing, Agnes R. 2011. "Poverty Transitions, Shocks and Consumption in Rural Bangladesh, 1996–97 to 2006–07." In *Why Poverty Persists: Poverty Dynamics in Asia and Africa*, ed. Bob Baulch, 29–64.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Ramessur, Taruna Shalini. 2009. "Economic Cost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Evidence from a Small Island Economy." *Safety Science* 47 (7): 973–9.

Ramey, Valerie A., and Neville Francis. 2009. "A Century of Work and Leisur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 (2): 189–224.

Ravallion, Martin. 2001.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Looking Beyond Averages." *World Development* 29 (11): 1803–15.

———. 2004. "Pro-Poor Growth: A Prime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24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2011.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Brazil, China and India."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6 (1): 71–104.

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2007.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1): 1–42.

Ravallion, Martin, Shaohua Chen, and Prem Sangraula. 2009. "Dollar a Day Revisited."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3 (2): 163–84.

Republic of Korea. 2010. *National Employment Strategy 2020 for the Balance of Growth, Employment and Welfare*.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Roy, Dutta Sudipta. 2004. "Employment Dynamics in Indian Industry: Adjustment Lags and the Impact of Job Security Regula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3 (1): 233–53.

Sen, Amartya, and Geoffrey Hawthorn. 1987. *The Standard of Living*.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ckel, Richard H. 1995. "Stature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3: 1903–40.

Stiglitz, Joseph E. 1996. "Some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1 (2): 151–77.

Streeten, Paul. 1979. "Basic Needs: Premises and Promises."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1: 136–46.

Stuckler, David, Sanjay Basu, Marc Suhrcke, and Adam Coutts. 2009a. "The Public Health Effect of Economic Crises and Alternative Policy Responses in Europe: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Lancet* 374 (9686): 315–23.

Stuckler, David, Sanjay Basu, Marc Suhrcke, and Martin McKee. 2009b. "The Health Implications of Financial Crisi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Ulster Medical Journal* 78 (3): 142–5.

Stutzer, Alois, and Rafael Lalive. 2004. "The Role of Social Work Norms in Job Search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 (4): 696–719.

Takahashi, Kazushi, and Keijiro Otsuka. 2009.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Nonfarm Income and the Changing Use of Labor and Capital in Rice Farming: The Case of Central Luzon, 1979–2003."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0 (2): 231–42.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New York: UNDP.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World Bank. 2011. *World Report on Disability*. Washington, DC: WHO and World Bank.

Wietzke, Frank-Borge, and Catriona McLeod. 2012. "Jobs, Well-Being, and Social Cohesion: Evidence from Value and Perception Survey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Wilkinson, Richard, and Michael Marmot. 1998.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The Solid Fact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inefield, Anthony H. 2002. "The Psychology of Unemployment." In *Social,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s*, ed. Claes von Hofsten and Lars Bäckman. Vol. 2 of *Psycholog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Winkelmann, Rainer, and Liliana Winkelmann. 1998. "Why Are the Unemployed So Unhappy?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Economica* 65: 1–15.

Woolard, Ingrid, and Stephan Klasen. 2005. "Determinants of Income Mobility and Household Poverty Dynamics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1 (5): 865–97.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0. *From Global Collapse to Recovery: Economic Adjustment and Growth Prospect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Zhang, Huafeng, Ingunn Bjørkhaug, Anne Hatløy, and Tewodros Kebede.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Chin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第 3 章 3

就业与生产率

发展中国家的部门间和部门内的生产率差异很大，因而，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就业的再分配对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然而再分配常常不会起太大的作用。

随着新的高生产率就业岗位的创造和低生产率工作的消失，工作的生产性提高了，生产率也随之增长。在中期内，就业趋势与劳动力趋势相邻比依，因而不存在无工作的增长这样的事情。但是短期内就业和增长的关系更为复杂。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也破坏大量的就业岗位，这导致结构变革和劳动力的空间再分配。隐藏在这些部门和空间变革之下的是公司活力，公司活力导致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的重组和再分配。

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人口在规模很小、活力不足的经济单位中工作。家庭农场常常在农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亚洲家庭农场的平均规模是 1.2 公顷，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规模是 1.8 公顷。农业以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微型企业和家庭经营企业中的就业比例相当大。这些企业对就业岗位创造和破坏有很大作用，尽管对净就业创造和生产率的增长未必有作用。

在农业中，绿色革命已经提高了谷物的产量和就业的增长，这是因为新技术是劳动密集型的。然而绿色革命的进程在地区间并不均衡。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绿色革命。

农业以外领域的生产率因企业而大不相同，这意味着就业再分配的潜在的、可观的生产率收益。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也不同。在面临竞争时，大公司更具创新性。另外，微型企业是多元化的群体。大多数微型企业倾向于波动而不是增长，它们是贫穷人口得以生存的手段。然而有一些微型企业具有创业精神，它们的成功可以促进工资性就业。

就业波动，而非无工作的增长

无工作的增长是一种普遍的观点，人们常常认为这一观点有数据支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失业率既没有

专栏 3.1　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有哪些?

主要有四大动力促进了一个经济体人均产出的增加，尽管这有过于简化之虞。第一是人均劳动力适用的资本增加。第二是相对于总人口工作人口数量的增加。当生育率降低，成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增加，或女性从家务劳动转向产生收入的活动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第三种机制是通过提高人们自身的生产性，产出也可以增长。技能获得，亦称为人力资本积累，使一个人可以使用同等资本带来更多的产出。第四种机制是技术进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估算。技术进步意味着资本、劳动力和技能更有效的联系，同时适用新知识。

增长分解对这四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量化。任何具体的国家，只要具有关于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就业和人力资本的充分数据，就可以实现增长分解，量化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中一些变量可能需要建构或取近似值；例如，一个经济体的资本存量是根据累积投资估测的，而人力资本则是根据其人口的教育程度得出的、并以教育质量矫正的近似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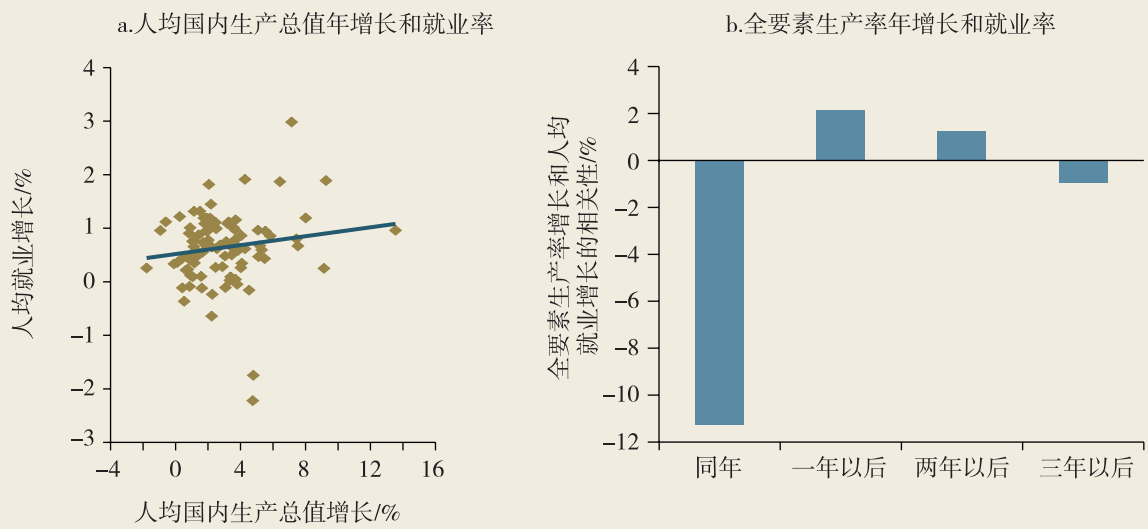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激增，也没有消失为零，因而就业趋势与劳动力规模的趋势相邻比依。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GDP）一定会对就业增长产生影响，但是在中期内它对就业增长的影响低于人口和参与率。来自 97 个国家过去十年的数据肯定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人均就业率的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见图 3.1a）[1]。二者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但是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增长确实是无就业增长。

另一方面，短期中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不十分明确。增长部分是通过低生产率就业的消失和更具生产性就业的创造实现的。[2] 因此对国家十年内的同一样本而言，一年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的确与同年就业率的降低相关（见图 3.1b）。只有在连续的年份中，就业的负面效应才会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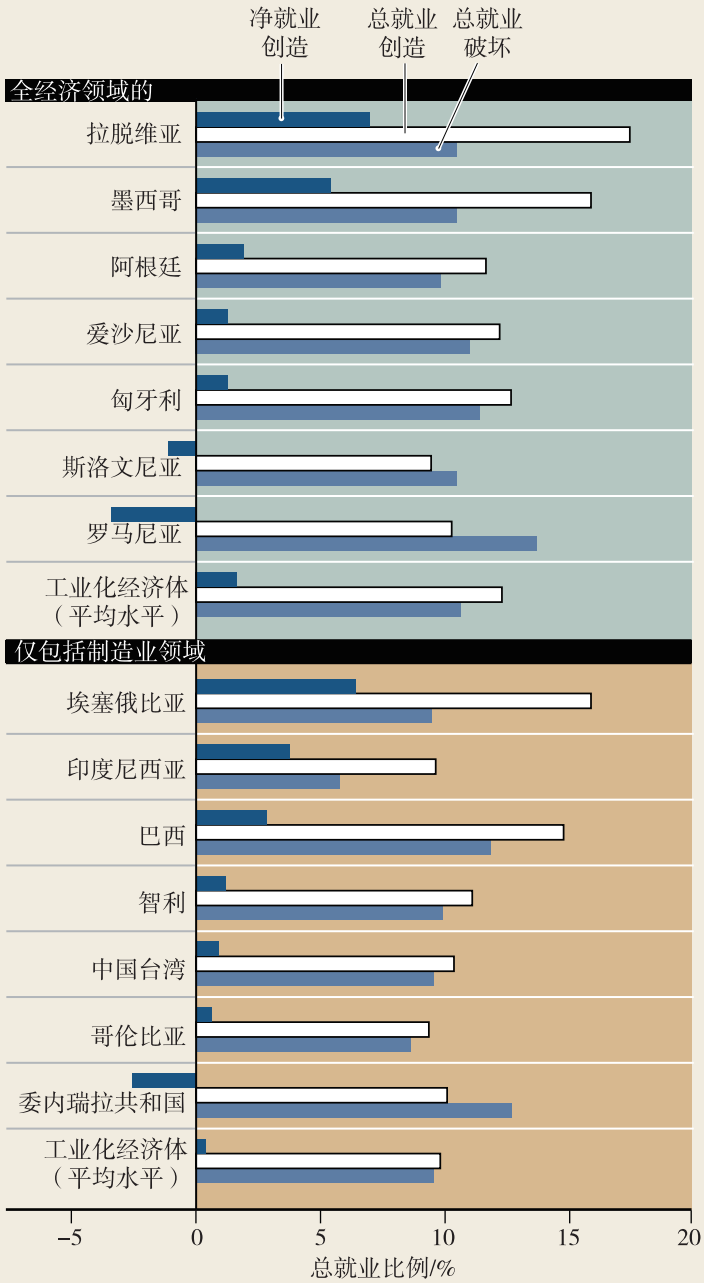
生产率增长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图 3.1　从中期来看，经济增长并不以牺牲就业为代价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1999—2009 年期间平均增长分解得出的估算值。
注释：数据来自 97 个国家。图 a 代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与就业人口比率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个点代表一个国家。图 b 描述了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与同年及随后年度就业率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图 3.2 就业创造和破坏的同时发生是所有经济体的特征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Bartelsman，Haltiwanger 和 Scarpetta 2009b 及 Shiferaw 和 Bedi 2010 得出的估算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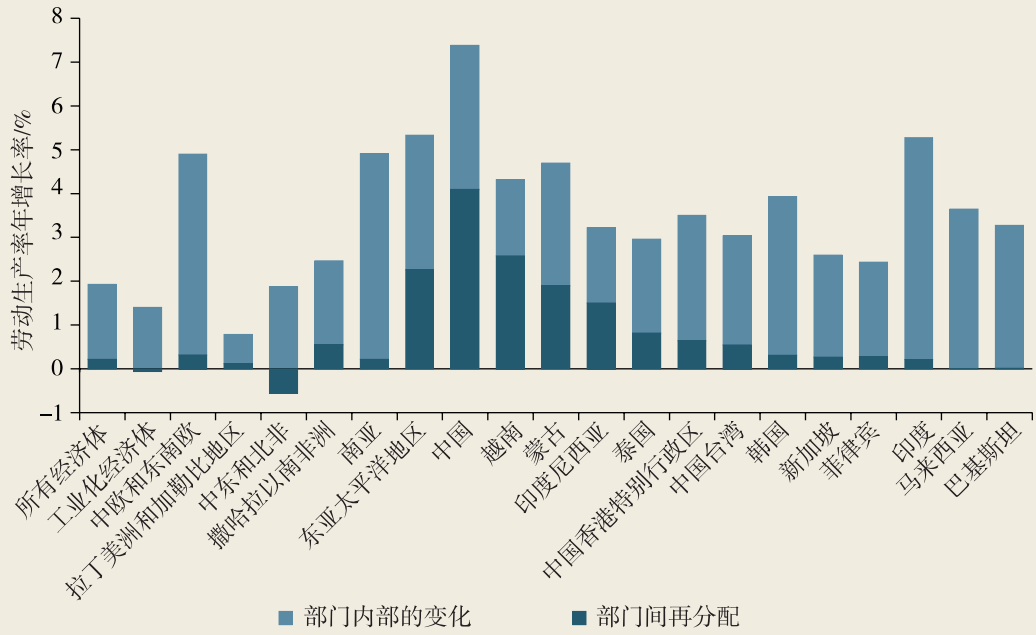
注释：本图显示了年工作流动量。数据来自阿根廷（1996—2001）、巴西（1997—2000）、加拿大（1984—1997）、智利（1980—1998）、哥伦比亚（1983—1997）、爱沙尼亚（1996—2000）、埃塞俄比亚（1997—2007）、芬兰（1989—1997）、法国（1989—1997）、德国（1977—1999）、匈牙利（1993—2000）、印度尼西亚（1991—1994）、意大利（1987—1994）、拉脱维亚（1983—1998）、墨西哥（1986—2000）、荷兰（1993—1995）、葡萄牙（1983—1998）、罗马尼亚（1993—2000）、斯洛文尼亚（1991—2000）、中国台湾（1986—1991）、英国（1982—1998）、美国（1986—1991，1994—1996）和委内瑞拉（1996—1998）。

对差异巨大的经济体（例如埃塞俄比亚和美国）过去三十年中不同时期的分析揭示了全部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见图 3.2）的程度。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中，每年创造的就业岗位在 7%至 20%之间波动，而每年消失的岗位也大体相当。[3] 即使在总就业率降低的年度中，例如 20 世纪 90 年代，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岗位，委内瑞拉的制造业领域亦是如此。相反，在墨西哥，工作破坏的速度几乎是其总就业增长率（6%）的 2 倍。

工作流动可能和经济体部门结构的重大变迁相关。技术变革常常发生在特定产品和生产过程中，从而引起不同部门的生产率以不同的速度增长。然而，经济中不同部门的相对重要性不仅仅取决于技术进步，还取决于市场需求和非市场动力。当最具生产性的部门扩张，生产力总量就会增加。这种结构效应被称为生产率提高型结构变革，在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中转移的文献中有详细记载。基于比较分散的数据的分析显示，在几个迅速增长的东亚国家中，劳动力的跨部门再分配也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总劳动生产率年增长 7.3%，其中 4.1 个百分点是劳动力的跨部门再分配带来的；越南总劳动生产率年增长 4.2%，其中 2.6 个百分点是劳动力的跨部门再分配带来的（见图 3.3）。[4]

工作流动也与就业空间分布的变化相关。从农村地区的农业转向城镇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变革或许是最显而易见的劳动力空间再分配，但并不是唯一的途径。[5] 即使在部门内部，工作流动也常常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活动更具创新性的新工厂倾向于在多

图 3.3　劳动力的部门间再分配是东亚地区生产率增长的动力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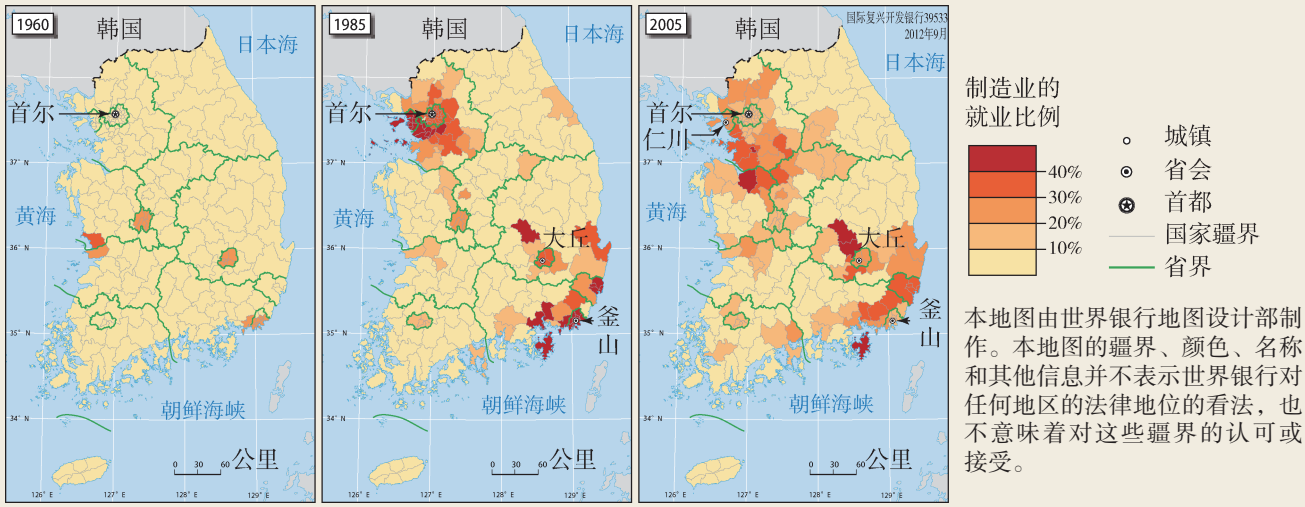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Kucera 和 Roncolato 2012 得出的估算值。
注释：本图根据部门内的变化和部门间的再分配，将 81 个经济体 1999 年至 2008 年期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生产率变化。本图考虑了农业、狩猎、林业和渔业，采矿及设备，制造业，建筑业，贸易、饭馆和酒店，运输业、储藏和通信，以及其他服务业七个部门。地区增长率为加权平均数，权重基于一个经济体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元化的大城市（即孵化器）中起步，这是因为那里的供应商和劳动力密度较高，而且信息的交流也更顺畅。而随着发展日渐成熟和信息日渐自给自足，这些工厂会迁到土地和工资成本较低的较小的城市。结果，许多中小城市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6]

空间再分配的程度因部门和国家而异。例如在韩国，制造业在城市中心的主导地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企业慢慢向城市中心的边缘地区扩展，而不是像其他工业国家那样直接向不同的地区跃进（见地图 3.1）[7]。巴西、中国和越南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8] 在印度，大型制造业企业开始从城市中心搬到农村地区。[9] 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一些地方创造了就业岗位，一些地方破坏了就业岗位，这和转型的性质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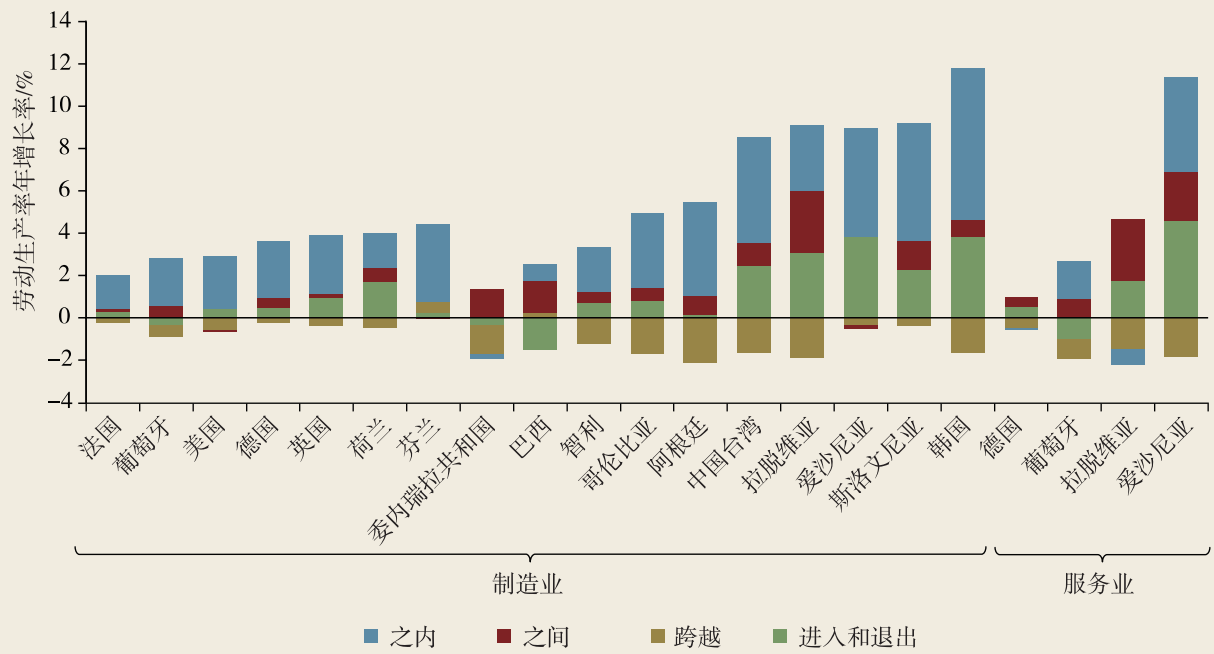
在这些就业结构部门变化和空间变化下面的，是将工作流动和生产率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公司活力。如果现存公司对其所从事的活动更加娴熟，如果越来越多的更具生产性的公司进入市场，如果生产性较低的公司减少，那么总生产率就会增长。如果更具生产性的公司规模变大，而生产性较低的公司规模变小，总生产率也会增长。分解分析显示，在大多数国家中，总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公司对其所从事的业务更加娴熟（见图 3.4）。进入和退出意味着新的公司比现有的公司更具生产性，也会促进总生产率的增长。总体而言，现存公司在倒闭之前经历着生产率的降低，新公司在五年之内倾向于达到其所在行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这些复杂的动力意味着在任何时间，生产率参差不齐、相

地图 3.1 韩国的制造业活动正在向主要城市中心的边缘地区扩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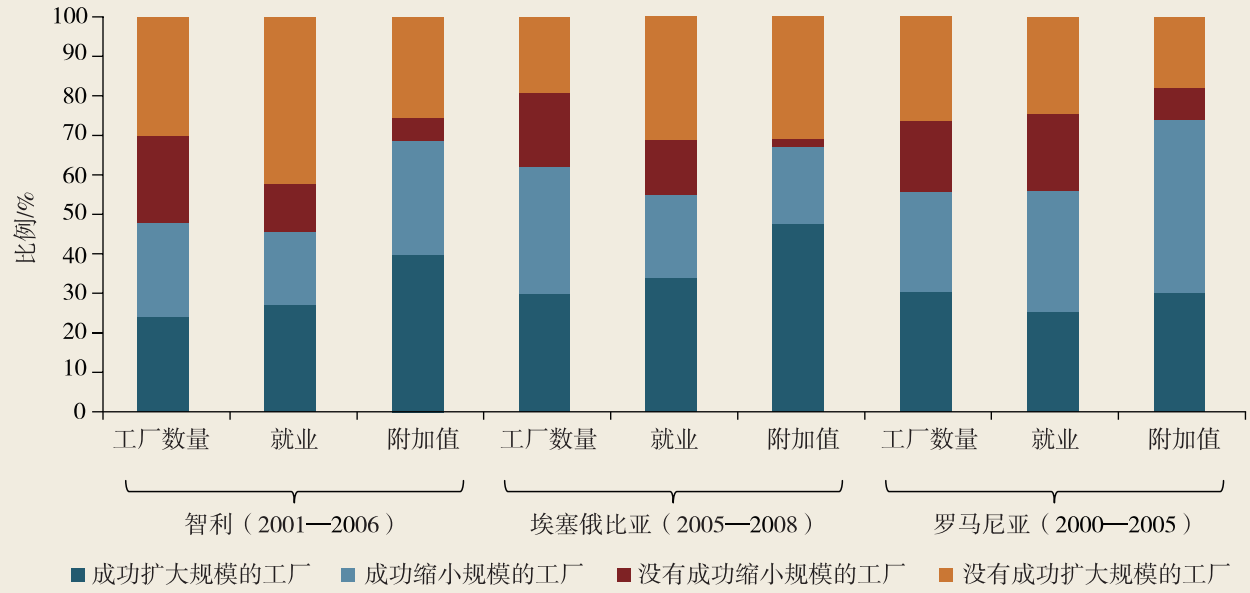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Park 等 2011。
注释：本地图显示了 1960 年，1985 年和 2005 年在城市或县层面的制造业中就业的比例。

图 3.4 公司层面的效率收益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



资料来源：基于 Bartelsman，Haltiwanger 和 Scarpetta 2009b。
注释：本图对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进行了分解。工业国家的数据来自法国（1990—1995）、荷兰（1992—2001）、美国（1992，1997）、葡萄牙（1991—1994）、英国（2000，2001）和德国（2000—2002）。发展中经济体的数据来自阿根廷（1995—2001）、巴西（2001）、智利（1985—1999）、哥伦比亚（1987—1998）、爱沙尼亚（2000，2001）、韩国（1988，1993）、斯洛文尼亚（1997—2001）、中国台湾（1986，1991，1996）和委内瑞拉（1999）。之内抓住了公司层面的变化，之间代表公司间就业比例的变化，跨越代表前两者之间的互动，进入和退出代表公司的开张和关闭。

图 3.5　效率收益和就业增长可以并行不悖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Amadeus 数据库，Bureau van Kijk，阿姆斯特丹，以及埃塞俄比亚大中型制造厂和电力行业调查，中央统计局，亚的斯亚贝巴。

注释：no.指数量。本图显示了这四组中每一组利益变量对年均增长率的贡献。本图所涉及的工厂至少雇用了 10 个工人，而且在整个时期都存在。成功扩大规模的工厂是那些同时实现了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增长的工厂；成功缩小规模的工厂是那些生产率增长而就业却降低了的工厂；没有成功缩小规模的工厂是指那些就业和生产率同时降低的工厂；没有成功扩大规模的工厂是指那些就业增加而生产率却降低了的工厂。

差很大的公司并存共处，即使在狭义的工业中也概莫能外。[10]

通过精简公司层面的规模来提高生产率的普遍观点在这些分析中找到了部分支持的依据。在许多情况下，生产率正在迅速增长的公司的就业规模倾向于缩减。[11] 然而精简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有许多规模扩大的公司同时实现了生产率的增长和就业规模的扩大。[12] 例如，2001 年至 2006 年期间，智利 1/4 的工厂是成功缩小了规模的工厂，这和普遍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还有 1/4 的工厂是成功扩大了规模的工厂，同时实现了生产率和就业的增长（见图 3.5）。更重要的是，和成功缩小了规模的工厂相比，成功扩大了规模的工厂对生产、就业和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更大。2000 年至 2005 年的罗马尼亚，2005 年至 2009 年的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尽管国家的经验各异，但是具有足够数量的成功扩大规模的公司却是一种普遍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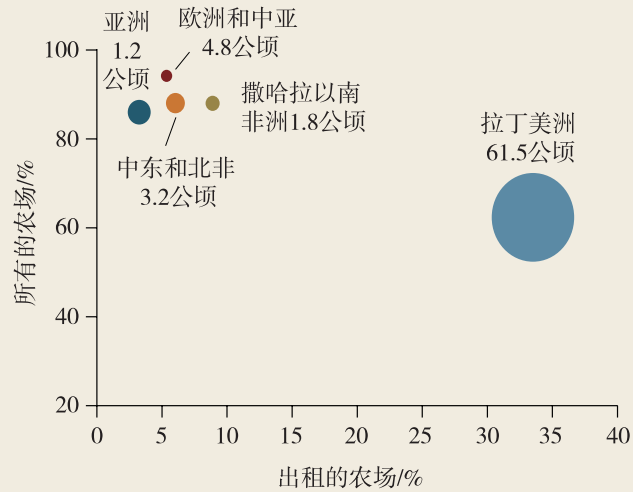
考察不同国家，我们发现制造业中成功扩大规模的工厂倾向于是那些较新的、较精简的、更具创新性的工厂。在同一行业和同一地区的幸存者中，智利 2001—2006 年期间比较新的公司更可能是扩大了规模的公司，罗马尼亚 2000—2005 年期间比较新的公司更可能是成功扩大了规模的工厂。在所有三个国家中，雇员不满 20 人的幸存工厂倾向于稍稍扩大而不是缩小规模。在罗马尼亚，工人人均资本投资额增加的幸存工厂也常常是成功扩大规模的工厂。[13] 近期来自 71 个国家 26 000 家制造商的证据显示，对产品或生产过程进行了创新的公司更可能是成功扩大规模的公司；和没有进行创新的公司相比，它们不仅提高了全

要素生产率，而且带来了较高的就业增长。[14]

欧洲的转型中经济体阐明了就业再分配和生产率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改革之前，这些经济体饱受严格的计划体制造成的严重扭曲之苦，因为计划经济阻碍资源流入使用效率更高的部门。自由化导致了大范围的规模缩减和就业损失，但最终也加强了动力、流动和市场，为更具生产性的私营公司开辟了发展空间。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这些进入市场的活力四射的公司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介于 20%至 50%之间。老旧公司的退出释放了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为效率更高的新公司或既有公司所用。尽管由于缺乏经验和规模较小等原因，这些新公司的生产率低于更发达国家公司的平均水平，这些新公司的生产率却要高于它们的国内同侪。它们在提高中高端技术工业的生产率、对现存公司施加竞争压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5]

中国的生产率快速增长也因大规模的劳动力再分配而得到加强。从 1978 年开始，经济改革逐渐扩大了市场的影响力，加深了全球一体化。所有这些都为私营实体，包括乡镇企业的形成及外资公司进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改革的前十年（1978—1988），生产率增长总量中几乎一半源自从农业转向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再分配。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力流出国有领域的再分配，私营领域的活力和国有领域的重组。企业进入的规模令人震惊：工业公司的数量从 1980 年的 377 000 家增加至 1996 年的将近 800 万家。2004 年的经济普查公布，年销售额在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制造业公司有 133 万家。[16] 其中大多数是私营公司。1998 年至 2006 年期间制造业领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有 2/3 是由这些新公司的进入和难以生存的国有企业的倒闭促成的。[17]

图 3.6　小农农业是拉丁美洲以外其他地区农业经营的主导形式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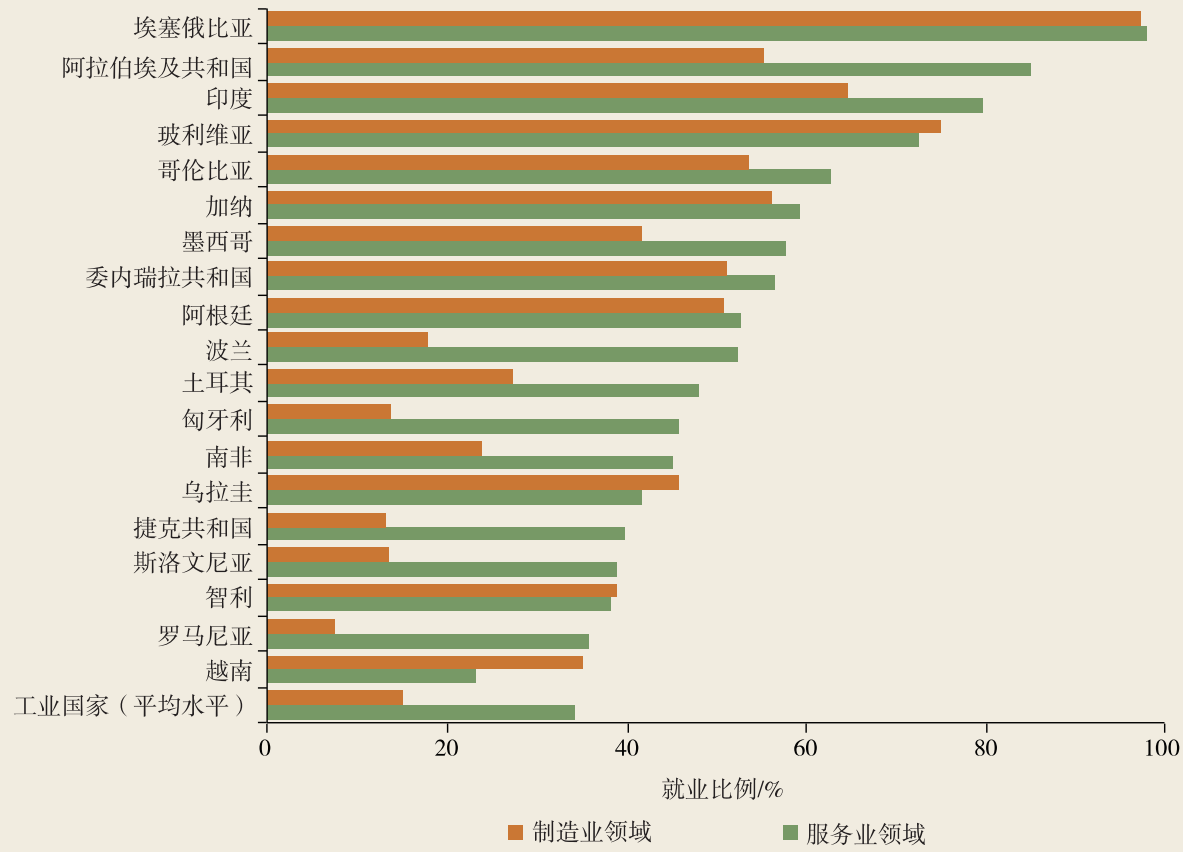
注释：ha 即公顷。亚洲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泰国。欧洲和中亚国家包括：阿塞拜疆、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包括：巴西、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乌拉圭、委内瑞拉、维尔京群岛（美属）。中东和北非的国家包括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约旦、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包括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

大多数工作分布在非常小的农场和公司中

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人在规模非常小、不太有活力的经济单位中工作，如家庭农场，微型企业和家庭企业。尽管微型企业常常被定义为雇用 10 个或 10 个以下工人的企业，许多微型企业实际上是一人企业。考虑到微型企业对就业总量的贡献，它们不应该被忽略。理解微型企业的活力对解读就业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在家庭农场中，雇员通常从事除草或收割等简单的工作，而家庭劳动力通常从事水资源管理、土地整理和施肥等精细密集型活动。难以监测雇

图 3.7　微型企业的就业比例在发展中国家较高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际收入分布数据库（I2D2）和欧洲统计局得出的估算值。
注释：微型企业系指雇员少于 10 个的正规或非正规公司。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自阿根廷（2006—2010）、玻利维亚（2005，2007）、智利（2006，2009）、哥伦比亚（2009）、捷克共和国（2005—2007）、阿拉伯埃及共和国（2006）、埃塞俄比亚（1999）、加纳（1991）、匈牙利（2007—2008）、印度（2004，2009）、墨西哥（2004—2010）、波兰（2005—2007）、罗马尼亚（2005—2007）、斯洛文尼亚（2005—2007）、南非（2005—2007）、土耳其（2006—2010）、乌拉圭（2009）、委内瑞拉（2004—2006）和越南（2009）。工业国家的数据来自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等国家 2005—2007 年的数据。

员的工作是导致对雇用劳动力依赖有限的原因，而没有机器，农场就不能扩大并超过家庭劳动力所能管理的规模，这一规模通常是 1~2 公顷。[18] 即使在高收入国家，家庭农场也占据主导地位，而所有者耕种是最常见的土地保有形式，在亚洲尤其是这样（见图 3.6）。

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场平均规模都很小，分别为 1.2 公顷和 1.8 公顷。[19] 在亚洲，农民通常拥有地块，通过租赁合同促进土地在土地相对丰富的家庭和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家庭间流转使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场规模比亚洲稍微大一点儿，但是在这两个地区，规模和所有者自己耕种的重要性大体相当。[20]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殖民政府在发展中国家创建了大型农场，例如非洲南部地区的庄园，拉丁美洲和菲律宾的大农场和加勒比的种植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存在大片土地被大家庭、宗族或家族拥有的传统土地权。[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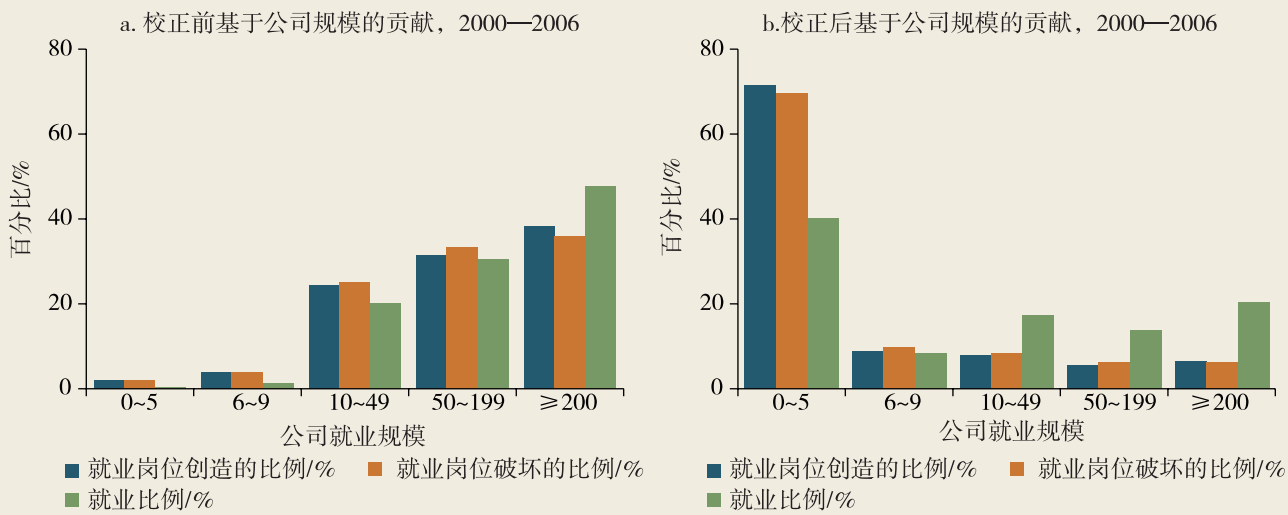
在农业之外，微型企业和家庭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在阿根廷、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和墨西哥注册的制造业

专栏 3.2 大多数就业岗位创造和就业岗位破坏是微型企业引起的

在一些家庭和劳动力调查中，雇员被要求告知他们所在公司的规模，或者当他们是自就业时，告知他们自有企业的规模。这些信息可用于估测基于工厂规模的就业分布。反过来，这一分布数据可用于矫正遗漏了非正规企业的经济普查或工厂层面调查。

该方法被用于智利的制造业调查，即国家年度工业调查中。该调查覆盖了 90%就业规模达到或超过 50 人的企业，但是就业规模在 10 人到 49 人之间企业的覆盖率不足 50%。调查遗漏了将近 30 万在微型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其中 25 万人在雇员不足 5 个人的公司中工作。

制造业调查中得出的基于公司规模的工作流动的分布可以以智利家庭调查，即国家经济社会特征调查中基于工厂规模的就业分布来校正。在校正之前，大多数就业岗位创造和就业岗位破坏似乎是较大的公司引起的。但是校正显示，工作流动总量中的 80%是由微型企业引起的。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该估算值，因为关于微型企业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的信息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只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智利才开始将微型企业纳入调查之中。但是即使误差微乎其微，该估算值也会大到足以改变就业岗位创造和就业岗位破坏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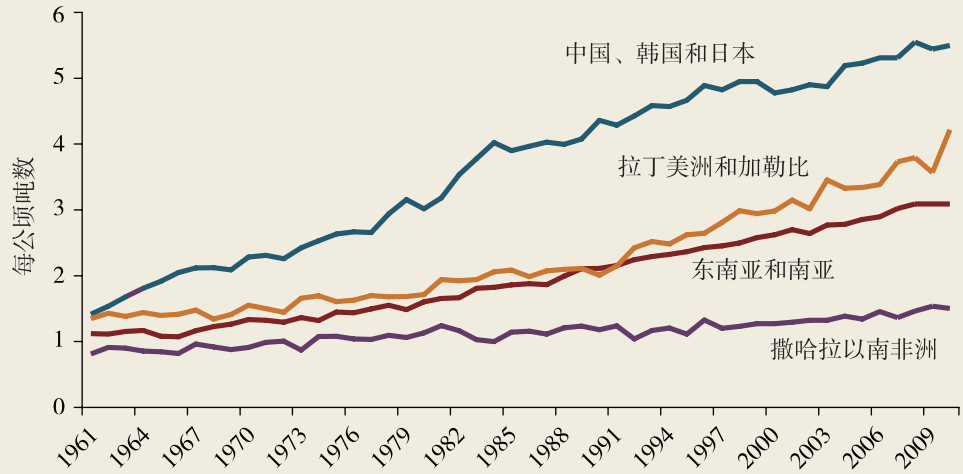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企业中，80%以上的企业雇用的工人少于 10 个。[22]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的制造业企业中，约 90%雇用的工人在 5 个到 49 个之间。[23] 制造业之外的微型企业的比例甚至更高，墨西哥服务业达到 94%，突尼斯所有现代领域达到 98%。[24] 在几个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大多数非正规企业是 1~3 人的企业。[25]

常常有人宣称大多数就业和大多数就业岗位的创造与中小企业相关，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通常不是真的。实际上，微型企业和小企业创造了大部分就业岗位，即使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亦是如此（见图 3.7）。该比例经常被低估，这是因为经济普查和工厂层面的调查很少覆盖经济领域的经营规模尤其小的非正规部分。但是针对全体人口的家庭和劳动力调查数据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这些小企业在制造业的就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埃塞俄比亚制造业中 97%的就业和智利制造业中 39%的就业发生在这些小企业中。这些小企业在服务业领域中的作用常常更为重要。即使在私营领域进入只有 20 年历史的东欧国家，微型企业在制造业中的就业比例也在 10%到 20%之间，在服务业领域中的

图 3.8　不同地区的谷物产量差异很大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农业（数据库），粮农组织，罗马。
注释：数字是小麦、大米和粗粮产量的加权平均数。

就业比例也在 30%至 50%之间。微型企业和小企业在就业岗位创造和就业岗位破坏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见专栏 3.2）。[26]

农场中不平衡的技术进步

人们普遍假定大农场的生产率更高。然而在低收入国家，较小农场的每公顷产量更高，这是因为家庭农场用于每单位土地的劳动力更多，尽管它们购买的生产投入较少。农场规模和生产率的这种反向关系首先在南亚发现。[27] 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随着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造成了农业的集约化，这种反向关系也出现了。在肯尼亚、马拉维、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农场规模每增加 1%，产量就降低 0.1%到 0.2%。[28] 每公顷土地所用的家庭劳动力也与农场规模反向相关。[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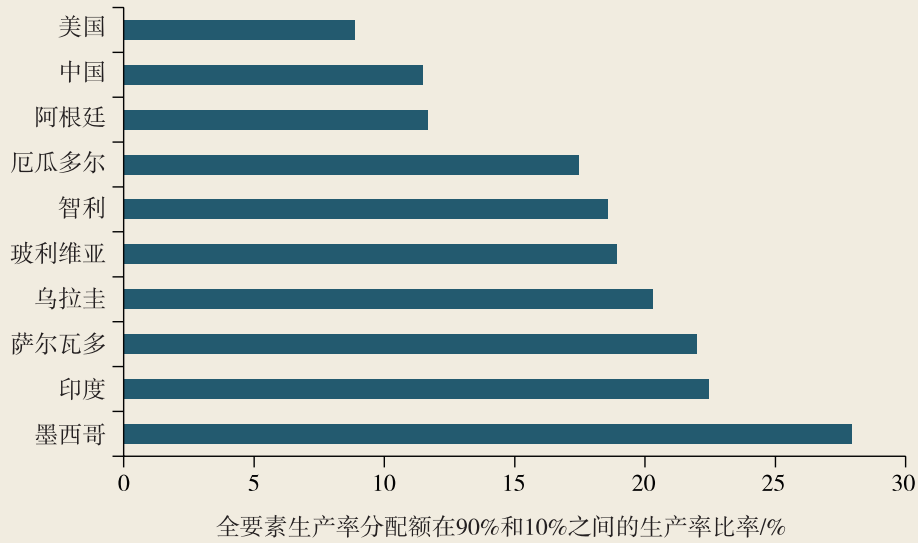
谷物产量和农场规模的关系会出现，这是因为农场的规模越大、机械化程度越高，生产率也越高。然而土地市场的限制通常会放慢农场的扩张和机械化速度。[30]

绿色革命新技术是劳动密集性的，因而有助于创造就业岗位。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研发了短期成熟的、肥料反应的高产水稻和小麦品种。其他谷物的品种改良，例如玉米，也接踵而至。这些品种和改良的生产实践被迅速推广，特别是在亚洲热带地区得到迅速推广。无机肥料在较长时间内的使用稳步增加。[31]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技术的持续进步和不断采用，谷物产量急剧增加。[32]

然而地区间的进步并不均衡（见图 3.8）。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证据显示小农场主在采用新技术上滞后于大农场主。但是即使由于人口对有限可耕地的压力造成了农用地的日益稀缺，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绿色革命。[33] 以不断缩减的农业用地养育不断增加的人口要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增加其谷物产量。[34] 然而农业改良技术是具有地区针对性的：亚洲的改良品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产率不一定高，而灌溉区的高产品种在雨水丰足地区的产量可能很低。[35]

绿色革命引起的农业增长不仅创造了农业领域的就业岗位，而且促进

图 3.9 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生产率差量比较大



资料来源：Pagés 2010。

注释：本图阐释了在狭义的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分配在 90%和 10%之间工厂的生产率比率。全要素生产率采纳了 Foster，Haltiwanger 和 Syverson（2008）的定义，即实物生产率。数据只覆盖制造业领域。数据来自阿根廷（2002），玻利维亚（2001），智利（2006），中国（2005），厄瓜多尔（2005），萨尔瓦多（2005），印度（1994），墨西哥（2004），美国（1997）和乌拉圭（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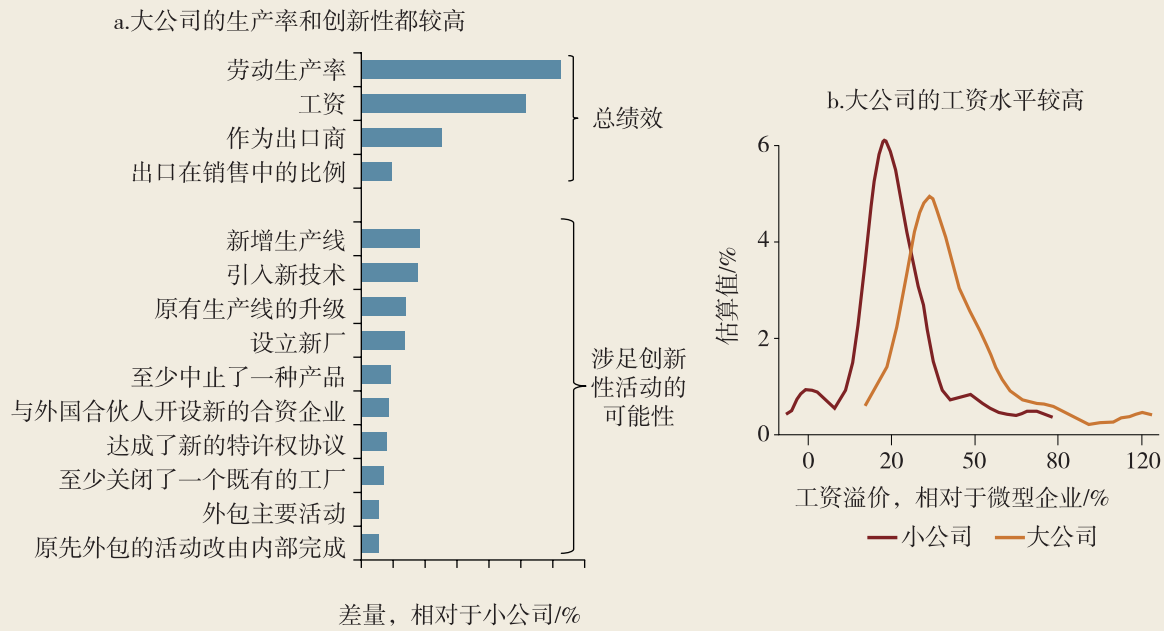
了非农业领域的发展。[36] 现代技术的采用刺激了肥料和其他需要购买的投入的生产与销售。谷物供给的增加刺激了粮食市场的发展，使移民城市的人口的生活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除了生产链前后环节，农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37] 跨国分析显示，农业增长造成了非农领域的扩张，对那些农业领域庞大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尤其如此。[38]

公司中平平者居多，领头羊鲜见

在农业之外，生产率因企业而大不相同，这意味着就业再分配可以给总生产率带来大的收益。在印度，在狭义定义的制造业中，全要素生产率分配达到 90%的工厂的产出是全要素生产率分配仅为 10%的工厂的产出的 22 倍。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一比率估计为 9 比 1。[39] 在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差量也很高（见图 3.9）。关于非制造业公司的详细数据相对较少。但是墨西哥零售业和乌干达通信交通业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差量也很大。[40]

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也因公司而异。通常情况下，大公司的创新能力高于小公司。大公司对机械的投资更多，雇用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和小公司相比，大公司更有可能涉足开发新的生产线、引入新技术、开张和关闭工厂、外包或与外国合伙人设立合资企业等活动（见图 3.10a）。在劳动力数量既定的情况下，大公司的产出更多，更可能出口，也更倾向于出口。大公司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也远远超过微型企业和小企业（见图 3.10b）。大公司甚至根据年龄、教育程度和工人的其他特征支付工资溢价。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公司都具有创新性。如果支撑公司规模的是非市场机制，那么效率就会受到损害。和其他大公司相比，没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大型国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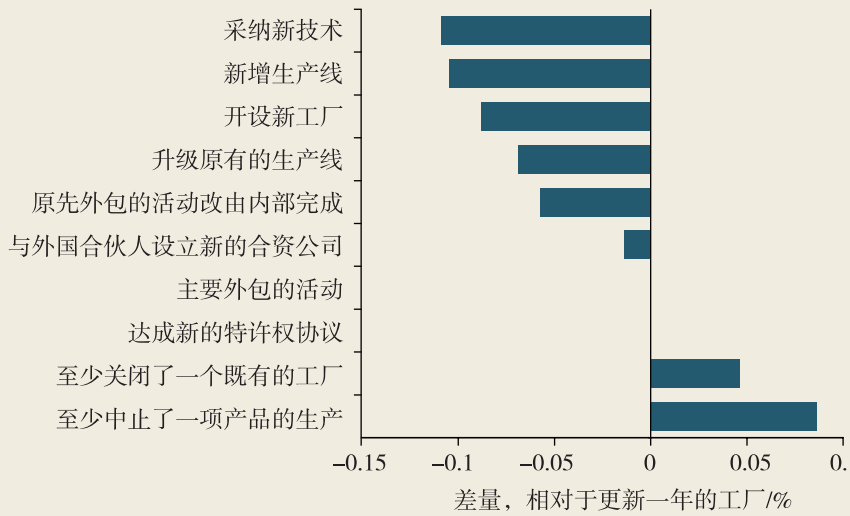
图 3.10　和小公司相比，大公司的绩效较好，工资水平也较高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Ayyagari，Demirgüc-Kunt 和 Maksimovic 2011a 得出的估算值；及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准备的文件 Montenegro 和 Patrinos 2012。

注释：a 组使用了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该调查涉及 102 个发展中国家 54 000 个公司 2006 年至 2010 年期间的总体绩效，涉及 47 个发展中国家 19 000 家公司 2002 年至 2005 年期间的创新性活动。分析包括公司特征、行业和国家。在本图 a 组中，大公司雇用的员工为 100 人或超过 100 人，小公司的员工则不足 20 人。b 组使用了 33 个国家 1991 年至 2010 年期间的 138 个家庭和劳动力调查的数据，以工人特征为依据。在 b 组中，大公司系指雇用人数超过 50 人的公司，小公司系指雇用人数在 10 人到 50 人之间的公司。

图 3.11　和旧有的公司相比，新公司涉足创新性活动的可能性更大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Ayyagari，Demirgüc-Kunt 和 Maksimovic 2011a 的估算值。

注释：本图使用了世界银行企业调查的数据，该调查涉及 47 个发展中国家 19 000 家公司 2002 年至 2005 年期间的公司特征、行业和国家。统计意义不大的估算被视为零。

专栏 3.3 大多数微型企业分布在农村地区，从事商业活动

城市地区的微型企业，特别是非正规领域的微型企业，正在引起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但是农村地区的微型企业也很繁荣。对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微型企业和小企业的调查显示，略少于一半的微型企业和小企业设立在居民为 2 万或 2 万多的城镇里。多米尼加共和国城市地区微型企业和小企业的比例达到了 46%，但是在其他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城市地区微型企业和小企业的比例都低于 30%。即使将农村小镇计入（一般为居民在 2 千到 2 万之间的居住地）城市地区，大多数国家位于严格意义上农村地区的企业也远远超过 50%。

绝大多数微型企业从事商业活动，这对将微型企业与街头小贩和小贸易商联系起来的传统观点是一种支持。但是相当一部分微型企业涉足轻工业产品制造活动。根据对非洲西部地区国家的 1—2—3 调查，首都城市最重要的领域是小贸易（在所有企业中的比例为 27.1%），紧跟其后的是其他制造业和食品业（16%）及其他服务业（11.8%）。同样，对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调查显示，56%到 74%分布在城市地区的微型企业和小公司、60%到 70%分布在农村地区的微型企业和小公司从事的是商业活动。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家庭企业调查显示了相似的模式。这些调查确认了对所有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三种制造业活动：纺织服装、食品饮料、木材和森林产品。这三大范畴在城市地区制造业中的比例约为 75%，在农村地区制造业中的比例将近 90%。

大多数微型企业在家里或街头营业。根据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家庭企业的调查，25%到 45%微型公司以家庭作为基本经营地点，10%到 40%在街头营业。

资料来源：Fox 和 Sohnesen 2012；Grimm，Kruger 和 Lay 2011；Liedholm 2002。

创新性和生产率较低。[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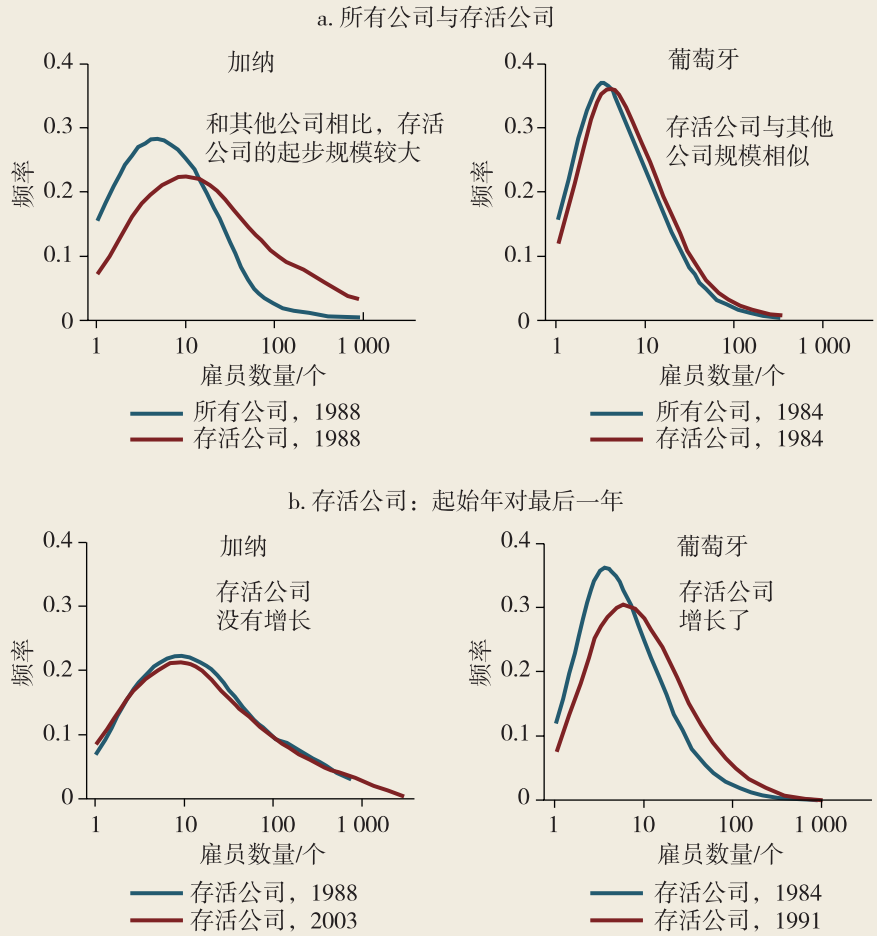
在公司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新公司涉足创新性活动的可能性也大于老公司（见图 3.11）。新公司的增长预期也较好，来自工业国家的证据印证了这一点（见图 3.11）。[42] 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人力资源和金融资源集中在大型国企中。然而，这些企业的激励机制阻碍了创新。相比之下，新兴的村镇企业缺少采用新技术和输入新设备的资源，但是它们的决策更为灵活。结果，尽管和大中型私营公司相比它们的生产率较低，但它们比大型国企更具活力。[43]

在发展中国家，公司间的生产率和增长预期差量由于微型企业数量众多而进一步扩大，许多微型企业不过是贫穷人口赖以糊口的手段。大多数微型企业资本有限，甚至常常没有固定地址。许多微型企业设立在农村地区，吸纳一些农闲时期的分散劳动力（见专栏 3.3）。在 18 个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地区每天生活费不足 1 美元的人口比例是 44%，农村地区在非农企业中工作的人口比例是 24%。平均而言，他们的收入不高。[44]

尽管如此，这些非农场活动为贫穷人口收入的多样化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渠道。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 9 个国家中，大多数非农就业来自于家庭发起的企业，而不是进入正在迅速扩张的私营工作领域。来自家庭企业的收入尽管微薄，但就对消费的贡献而言，其与工资就业所得的收入旗鼓相当。而这些小企业为贫穷家庭逐渐涉足生产率更高的活动提供了途径。[45]

尽管作为一个群体微型企业的绩效不佳，但是它们也非常多样化。在中等收入国家，相当一部分微型企业和小企业所有者和他们工业国家的同侪一样富于企业家精神。他们绩效不佳更多是由信贷受限、获得技术和市场的政策性壁垒等环境因素引起的，能力有限反倒在其次。例如在几个拉丁美洲国家里，加入自就业行列的多是那些在工资性就业期间积累了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工人。对他们而言，

图 3.12　和葡萄牙相比，加纳存活的公司起步规模较大，增长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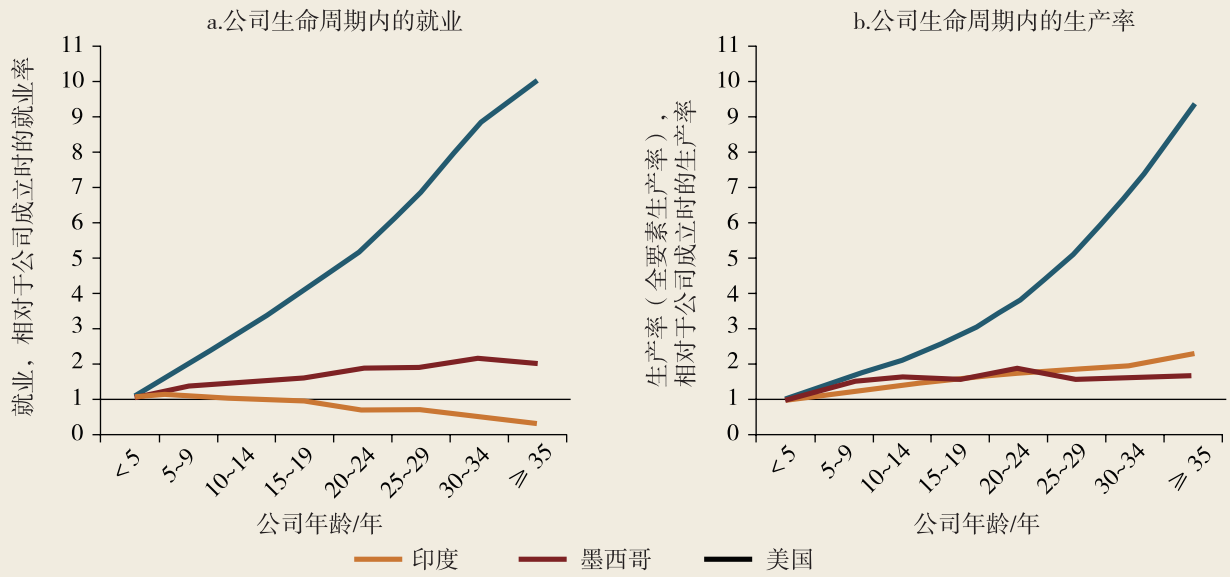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Cabral 和 Mata 2003；Sandefur 2010。

经营微型企业是一个选择。那些成功提高生产率水平的自就业者更可能使自己的企业延续、增长下去，并为别人创造就业机会。[46]

极少数微型企业实际上展现了非凡的绩效。这些微型企业具有相似的特征，即工业国家所谓的“羚羊跃进”，连续四年或更长时间内，这些高增长公司的收入每年以至少 20%的速度增长。在工业国家，“羚羊跃进”这个术语被用于形容那些收入基础至少是 100 万美金的公司，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这样的公司太大了。尽管如此，类似的活力也可以在小得多的企业中存在。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 7 国的数据显示，城市非正规企业拥有的资本存量中位数不足 80 美金，而最佳 20%的企业的资本存量平均为 5 000 美金。绩效最佳的 20%企业的月均利润是所有企业月利润中位数的 7 倍。这些公司的资本回报率也相对较高。[47] 微型企业的异质性表明它们可以成为更具生产率的大公司的孵化器。

微型企业的活力不仅关系到生计，也关系到生产率的增长。大公司的创新成果更多，但是不是所有的大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大公司。在工业国家，一些振奋人心的成功企业，从本田到

图 3.13 印度和墨西哥的大多数公司增长停滞



资料来源：Hsieh 和 Klenow 2011。

注释：本图描述了公司中不同年龄群体的平均就业（或生产率）相对于相同公司成立时的平均就业（或生产率）水平。计算印度的数字时采用了 1989—1990 年和 1994—1995 年数据，计算墨西哥的数字时采用了 1998 年和 2003 年数据，计算美国的数字时采用了 1992 年和 1997 年数据。

微软，都起步于汽车修理站。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成功的公司也成长自小型的家庭企业。泰国的卜蜂集团 1921 年在曼谷成立时，还是一家由两兄弟成立的小种子店，现在已经成长为世界最大的跨国农业联合大企业，目前在 15 个国家运营，旗下有将近 100 家公司。[48] 印度的塔塔集团原是 19 世纪晚期成立于孟买的家庭所有的贸易公司，现在已经成长为跨国联合企业，有 114 家公司和分支机构，涉足 9 个商业领域，足迹分布几个大洲。[49] 中国许多成功的公司集群，例如温州的鞋和电器产业，也起步于共同努力的家庭小企业。[50]

然而，公司常常缺乏充满活力的生命周期。较大的、较老的公司趋向于停滞，而较小的企业则更为活跃。以加纳为例。许多公司起步时规模较大，但是在随后的 15 年中增长微乎其微（见图 3.12）。相比之下，葡萄牙的许多公司起步时是微型企业，在随后的七年中迅速增长。[51] 印度的大多数公司起步时都是小公司，但是它们趋向于保持原来的规模，在它们的生命周期内就业规模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一项发人深省的比较对公司在 35 岁时的规模与起步时的规模进行了比较。在印度，规模降低了 1/4。在墨西哥，增加了一倍。在美国，公司比原来的规模大了 10 倍（见图 3.13a）。在这些国家，公司生命周期内生产率的增长也遵循了类似的轨迹（见图 3.13b）。[52]

在发展中国家的微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中，搅动——以相对很高的比率进入和退出——比增长要普通得多。在几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中，同一年内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微型企业和小企业约为 20%，大多数则在三年内倒闭。在存活的企业中，

表 3.1　墨西哥小公司很少实现增长

		2011 年同样的公司根据规模的分类/%			
		自有账户工人	1 ~4 个工人	5 ~9 个工人	10 个或更多的工人
1987 年根据公司规模的分类	自有账户工人	51.9	12.4	0.5	0.2
	1 ~4 个工人	22.1	49.2	3.9	1.5
	5 ~9 个工人	7.8	35.1	22.6	13.1
	10 个或更多的工人	4.1	15.2	14.4	44.6

资料来源：Fajnzylber，Maloney 和 Rojas 2006。
注释：每行的加总值并不等于 100，这是由于这些公司中的某些所有者已经成为领取薪水的工人或处于失业中。

雇员能增加 4 个或更多的企业不足 3%。[53] 在越南，20%到 30%的家庭企业在两年内退出市场，而家庭企业的总数量却保持不变。[54]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如同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的经验所示，很少有家庭企业从家庭以外雇用雇员。[55] 在墨西哥，启动微型企业更可能维持其单个工人的状况而不是增加公司的规模（见表 3.1）。[56]

企业间生产率的巨大差量、大量不可持续的微型企业和较大公司的停滞均显示，在过去几十年中支撑转型经济体和东亚国家迅速增长的市场选择和创造性破坏过程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很薄弱。这种薄弱性阻碍了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转向更能提高生产率的使用途径，削弱了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生产率的增长。解决新兴公司面临的难题，取缔现任官员推行的限制增长的因素可能带来相当大的收益，但是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见问题 3）。[57]

* * *

工作可以对他者的生产率产生影响，这里他者系指工作者及其所属的经济单位。具有这些额外影响的工作对发展的作用或多（或少）。这些额外效应产生的原因在于工作联系彼此的方式不同，而且一些联系并不是通过市场发生的。在职能性城市中，人们之间的观念交流更有效，从而提高了每个人的生产率。在集群里，比邻而依的同类公司受益于更大的合格工人蓄水池和公共支持服务。公司也通过贸易和投资与外国企业发生联系，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公司可以获得更多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技能。通过这些途径，具体的工作可以促进经济体中任何地方他者的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如果就业过度使用自然资源或破坏了环境，从而降低了总生产率，那么它的效果就是负面的。

问题 3 企业家能力可以培养吗?

自就业在发展中国家中很流行，而微型企业和小企业是低技能工人赖以维生的主要源泉。即使这些微小的经济单位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成功地建立了可存续的企业，由于其雇用工人的潜力而对生活水平产生的总体影响也将相当可观。它们的成功对生产率而言也非常重要。当前工业国家相当一部分大企业都是从微型和小型家庭企业发展起来的。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许多大企业起步规模就很大，这常常是政府支持或具有获得金融和信息的特权等造成的结果。打破特权也是微型企业的成功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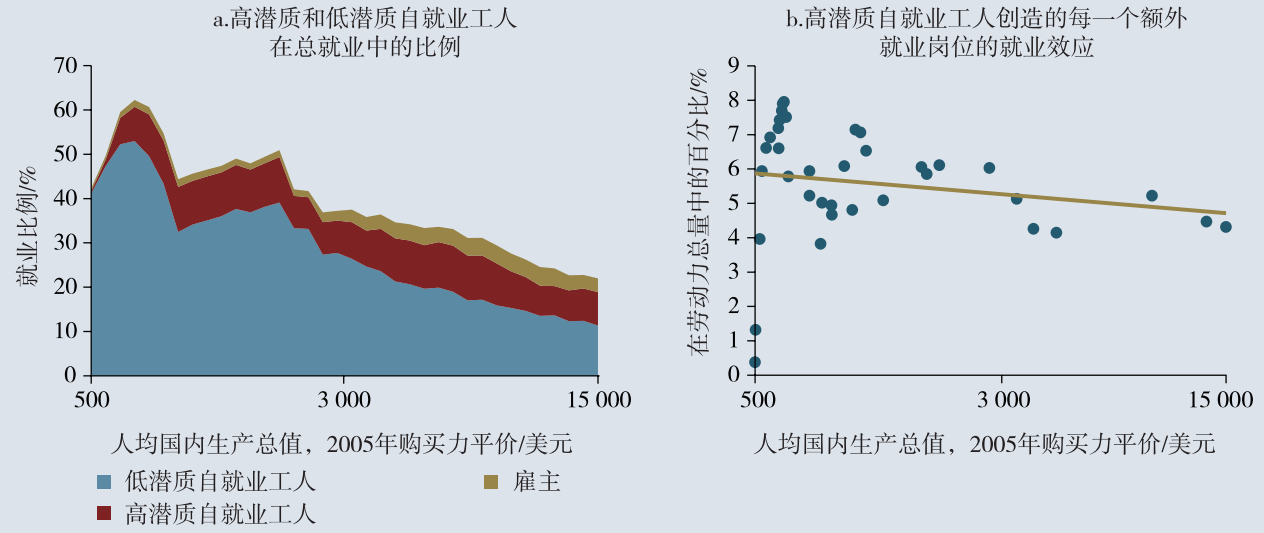
关于是否存在帮助自就业者获得成功的空间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曾经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自就业者或微型企业的所有者都被视为被监管热情和腐败扯了后腿的潜在企业家。微型企业和小企业丰厚的资本回报率被视为发展潜力的证据。[58] 但是资本回报率摇摆不定，人们普遍持悲观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大量未登记的自就业被视为糊口企业，这些企业竭力实现收支相抵，而不是发展繁荣。[59] 拉丁美洲和西非几个国家关于微型企业和小企业增长的证据显示，大多数微型企业至少在两年内保持起步时的就业规模不变。[60] 普遍的悲观主义观点中还有这样一个观点，即企业家的能力和技能难以传递，尤其是难以传递给那些所受正规教育有限的男人。这种观点认为企业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的。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将生存能力转变为企业家能力的努力注定要失败。然而公司间，包括微型企业间存在的巨大生产率差量表明，事实在乐观主义观念和悲观主义观念之间的某一点：生存能力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企业家能力也不可能完全缺失。

何为企业家?

企业家能力在已知技术的界限内将实施新观念的创新能力与提升公司效率的管理能力结合起来。企业家能力具有具体的心理特征，诸如个体的成就需求，只要努力便会有成果的信念、自信和面对风险的积极态度等。这些特征很难察觉，也很难测量。但是对不同地方（这些地方的差异很大，比如中国和俄罗斯联邦）企业家和工人的比较显示，教育、经验、性别、居住地和年龄等可观察到的个体特征是企业家能力的良好指标。[61] 在微型企业中，如果企业的所有者教育程度较高，经验较多，那么资本的回报率也较高。

因此，自就业者可观察到的特征可以用于识别有潜力成为成功企业家的个体。[62] 为阐明这一点，成功的企业家被定义为雇用别人为自己工作而且生活不贫困的人。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中，这一群体在总就业中的比例很小，而且相对稳定。[63] 另一方面，不雇用雇员的自就业工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先增加后下降（见图 3.14a）。不雇用雇员的自就业工人最多时比例达到总就业的 3/5，这和低收入国家的情况相一致。在这个群体中，大多数是成功潜力相对较低的

图 3.14　一些自就业者具有成为成功企业家的潜质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准备的文件 Gindling 和 Newhouse 2012；《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36 国的数据得出的估算值。
注释：在 b 组中，一个圆点代表一个国家。

个体。他们的特征更贴近工资工人，而不是雇主。[64]

然而，如果每一个天分很高的自就业工人创造一个额外工作，总就业量将大幅度上升，在低收入国家尤其会这样（见图 3.14b）。作为工作年龄人口的一部分，这样额外创造的就业岗位在肯尼亚将达到 8%，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将达到 5%，在哥斯达黎加将达到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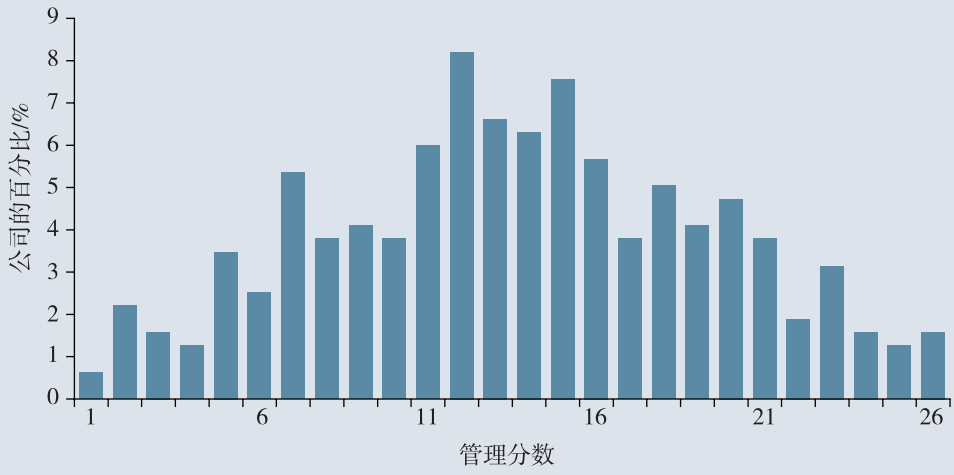
尽管这一计算是推定的，几项研究宣布，不规范领域微型企业主和小企业主可观察到的特征，诸如教育和性别，是创新和就业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65] 墨西哥企业注册制度改革后，和那些与工资工人相近的企业主相比，那些和正规领域内企业主特征相似的非正规领域的企业主更可能注册他们的企业。[66]

企业家能力的限制因素有哪些？

如果不能获得基础设施和金融资源，即使有潜在技能的企业家也难以获得成功。没有基础设施和金融资源，单单管理能力本身可能不足以实现生产率收益和就业扩张的目标。投资环境也对企业的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清除公司增长的阻碍因素是培育企业家能力的前提条件。

尽管都存在阻碍因素，微型企业和小企业的企业家能力却大不相同。人们常常对创新型或改革型企业家与可复制型企业家或糊口型企业家进行区分。[67] 前者属于熊彼得式企业家，后者通常管理微型企业或小企业，是追随者。然而这样的区分并没有抓住潜在于完全改革型与完全糊口型企业之下的更广泛的、逐渐变化的管理绩效。一项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微型企业主和小企业主所采纳管理方式数量的研究显示，这些企业主的管理分数差异很大（见图 3.15）。分数与企业绩效密切相关。[68] 在印度相对较大的公司中，管理分数也存在较大的差异。[69]

图 3.15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管理分数差异很大



资料来源：Fafchamps 和 Woodruff 2012。
注释：管理分数测量企业主使用和掌握核心管理技巧与商业技能的程度。分数基于对 26 项技能的评估（26 分是可能得到的最高分）。

越来越多的文献确认了管理手段在解释公司生产率中的重要性。尽管大公司受到异常重视，近期的研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中小公司如何开始创新。在最具说服力的研究中，随机选取的公司受到免费的管理培训，然后拿这些公司的绩效与对照组公司的绩效进行比较。对这些项目的评估发现，培训丰富了企业主的财务知识，提高了企业主的基本管理技能。预期影响也是正向的，但是就企业绩效的提高和就业创造而言，仍然缺乏活力。取得较好成就的是那些对概念已有初步理解，相对他人而言能够较容易地获得金融资源的企业家。

另一方面，为微型企业提供金融资源或促进其在相关政府部门注册或雇用额外职员支付工资而设计的类似干预措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参差不一。[70] 在墨西哥和斯里兰卡，给予微型企业的补助增加了企业主（只有在企业主是男性的情况下）的收入，但是并没有扩大就业。在加纳，给予女性企业主的类似补助并没有带来微型企业的大幅度增长。在斯里兰卡，只有 22%合格的微型企业接受了工资补贴，这些补贴相当于一个工人前 6 个月工资成本的 50%和随后 2 个月工资成本的 25%之和。总的来说，这些结果显示缺少金融资源并不是唯一的限制因素。

以企业主所受教育和所参加的培训来衡量的企业家技能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公司间和地区间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原因。[71] 但是市场不能培养企业家能力，因为知识的溢出效应意味着获得或发展新的管理观念的某些回报可能为他人所攫取。或许更紧要的是企业家自己并不承认管理技能的相关性。[72] 例如，巴西的微型企业主和小企业主中，只有 3%认为管理是企业的约束性限制因素。[73] 这可能是信息和知识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导致低生产率、低生活生平和就业岗位不足的恶性循环。

获得技能并将其运用于企业发展的能力似乎是成功企业家最重要的个体特征之一。成功也取决于具备诸如计算能力、读写能力和社交能力等核

心能力。很多文献强调了企业家的受教育年限作为公司增长、就业及效率的决定因素之一的重要性。[74] 在俄罗斯和中国，和其他人相比，企业主的家庭成员和童年好友中是企业家的更多，这表明社会环境同样也会产生影响。[75]

学习也可以通过就业实现。在埃塞俄比亚，掌管 50 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的企业家中，将近一半是在贸易公司中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从而对市场以及如何满足市场有了理解。[76] 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轻工业产品制造中，很多企业的创建者和成功的企业家一开始都是贸易商或大企业市场营销部的雇员。[77]

作为潜在的知识转移来源，纳入较大公司（常常是外资公司）的供应链正在引起重视。[78] 从硅谷返回的印度企业家已经把 Bangalore 变成了信息技术产业的枢纽。也许，孟加拉国服装业是证明向外国学习很重要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见专栏 3.4）。

针对性管理培训案例

管理实践与生产率差异、盈利、公司增长和生存等相关。[79] 孟加拉国服装业的发展经验表明，通过接触先进的管理实践和技术可以培养企业家能力。但是通过管理培训是否可以提高管理能力则有待商榷。创造力、卓识远见和冒险精神是任何创新过程的关键因素，但这些因素是否可以扩散和培养却是个问题。

近年来就管理培训干预是否有效进行的试验可谓蔚为大观，提供的证据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一些模式源自对可用证据的系统性回顾。成功的管理培训必须是简单的，必须有合适的教学材料，而且培训必须延续特定的最小时段。以导师对培训生的现场指导补充课堂教学可以产生可观的积极效应。[80] 例如，墨西哥的现场指导提高了销售、利润和生产率绩效。[81] 但是在加纳，对微型企业的现场指导和支持并不成功。[82] 和参与培

专栏 3.4　孟加拉国服装业繁荣的原因是什么?

孟加拉国的服装业解释了向国外学习先进的管理实践、市场营销和技术是多么的重要。1979 年韩国 Daewoo 公司与孟加拉国 Desh 有限公司合作生产出口服装时，这个南亚国家还没有现代工业。仅仅是 20 多年以后，该行业正在为孟加拉国带来 125 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在 360 万在该行业就业的工人中，80%是女性。

可以说，从金融创新到政策支持的一系列因素是成功发展的原因所在。但是这始于 1979 年。Desh 派遣了 130 名新招聘的、受过教育的雇员到 Daewoo 设在韩国的服装厂，接受了为期八个月的密集培训，培训涉及缝纫技能、工厂管理、质量控制、国际采购和营销等，随后这些技能被应用于孟加拉国的 Desh 工厂。在几年间，几乎所有的被培训者离开了 Desh，开始了自己的服装生意。这些原先在 Desh 工作的工人，要么加入了富裕企业主新建立的服装厂，要么开办贸易中心，通过给服装制造商提供包括国际采购和销售、样板制作和再设计工程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服务促进服装业的繁荣扩散。

看到 Desh 出口的好开端和 Desh 前工人的成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开始自己的服装生意，富有家庭积极投资该行业。结果，服装公司的规模从一开始便很大，它们的平均规模在 1983—1984 年为 300 个工人，在 2010—2011 年为 700 个工人。截至 2005 年，服装公司所有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5 年，其中约 60%完成了大学专科或本科的教育。

向国外学习的过程仍在持续。一些企业家参与了在新加坡、日本和欧洲的培训项目。继韩国 Daewoo 这一服装业企业之后，东亚其他新兴国家进入孟加拉国，投资培训孟加拉国的工人和经理层人员。这样，韩国的许多贸易商和制造商在启动自己当前的企业前，都曾经有过服装贸易和生产的工作经验，包括在合资企业工作的经验。

资料来源：孟加拉国针织品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 2012；Easterly 2002；Mottaleb 和 Sonobe 2011；Rhee 1990。

训项目相比，或者在生产率不错的大型公司工作可以更有效地获得关键性的企业家技能。[83]

针对女性的企业家能力培训效果参差不一。培养女性企业家能力具有创造更广泛的社会效益的潜力，这些社会效益与女性就业有关，譬如改变家庭资源的分配格局，提高家庭福利，特别是儿童的福利。女性企业家能力常常为女性提供允许她们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就业机会。然而秘鲁为女性微型企业主提供课堂培训对关键的经营成果，例如销售和利润，没有产生影响，即使企业的经营改善了。[84] 然而以现场指导补充的课堂培训却产生了积极的成果。[85] 在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管理培训改善了男性企业家而非女性企业家的管理实践和经营成果。[86] 这些参差不一的结果也反映了女性在社会中面临着更多的限制因素，包括进入学校参与有效学习的限制。

培训评估普遍发现，受益人吸收管理经验技能的潜力大不相同。随时可观察的个体特征有助于识别具有高潜力从管理培训中受益的企业主。专家小组或许可用于识别和评估微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的增长潜力，但是这类方法太过昂贵，难以大规模应用。一个有效的替代方法是调查问卷，问卷的设计抓住了潜在培训者的能力、态度和管理分数。[87] 管理培训本身可用作筛选工具。作为培训结果，高潜力培训生常常注入新的投资，扩大就业规模。金融机构可以将这类活动视为潜在高投资回报的信号。在发展中国家，将管理培训和金融支持结合起来的项目更好地提高了企业绩效。[88]

培训项目可以由私营提供商开展，由私营投资者资助，他们之所以投资，是因为这些企业家的成功会给他们带来可观的利益。但是只要存在知识溢出效应，只要管理技能的重要性被低估，政府就要发挥作用。考虑到企业主能力的差异，合理的针对性是确保公共资助项目产生积极回报的关键因素。在加纳、坦桑尼亚和越南进行的随机实验显示，这类项目的效益通常高于它们的成本，尽管实施培训项目的成本大不相同。[89] 然而，如果整体的投资环境不利于私营领域的增长，提高企业技能的针对性培训项目极有可能收效甚微。

注释

1. 图 3.1 没有使用就业，而是使用了劳动力。一般而言，失业率在长期内（10 年期）的变化微不足道，而经济体的就业受到其劳动力规模的驱动。

2. Haltiwanger 2011；Schumpeter 1934。

3. 就业创造总量系指所有加入总就业量的就业数量。当扩张的经济单位雇用工人或当新的经济单位创立的时候，就业数量就会增加。原则上讲，经济单位可以是小到一个人的微型企业，但是大多数定量分析只有在企业雇用几个工人时才将其视为经济单位。就业破坏总量系指所有就业损失的数量。当经济单位倒闭或经济单位的规模缩减时，就会发生就业损失。净就业创造系指这两大总流量的差数。就业创造率和就业破坏率衡量在某一特定时期（通常为一年），相对于既有就业岗位数量，多少就业岗位出现了或消失了。见 Bartelsman，Haltiwanger 和 Scarpetta 2009b；Davis，Haltiwanger 和 Schuh 1996。

4. Kucera 和 Roncolato 2012；McMillan 和 Rodrik 2011；Pieper 2000；Timmer 和 de Vries 2009。

5. 世界银行 2009。

6.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Duranton 2007 和 Duranton 2012；Duranton 和 Puga 2001；Henderson 2002。

7. Park 等 2011；世界银行 2011b。

8. Ghani，Goswami 和 Kerr 2012。

9. 关于如何以公司活力分解生产率增长的讨论，见 Foster，Haltiwanger 和 Krizan（2001）及 Griliches 和 Regev（1992）。

10. Bartelsman 和 Doms 2000；Bartelsman，Haltiwanger 和 Scarpetta 2004；Foster，Haltiwanger 和 Krizan 2001；Roberts 1996；Syverson 2011；Tybout 1996，2000。公司间生产率的差量本身不足以测量就业创造和劳动力再分配过程的效率。不完善的市场机构和制度可以扭曲这一过程。见 Haltiwanger 2011；Nelson 1981。

11. Bartelsman，Haltiwanger 和 Scarpetta 2004；Tybout 1996。

12. Baily，Bartelsman 和 Haltiwanger 1996。

13.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Amadeus 数据库、智利国家年度工业调查、埃塞俄比亚大中型制造企业和电力行业调查等得出的估算值。

14. Dutz 等 2011。

15. Bartelsman，Haltiwanger 和 Scarpetta 2004；Rutkowski 等 2005。

16. Brandt 和 Rawski 2008；世界银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2。

17. Brandt，Hsieh 和 Zhu 2008；Brandt 和 Rawski 2008；Brandt，van Biesebroeck 和 Zhang 2012。

18. Hayami 和 Otsuka 1993。

19. 南非被排除在本图之外，因为南非农场的平均规模是 288 公顷，不属于这一规模范畴。

20. 事实上，租赁市场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兴起。见 Holden，Otsuka 和 Place 2009。

21. Otsuka 和 Place 2001。

22. Pagés 2010。

23. 亚洲发展银行 2009。分析基于来自印度（2004—2005），印度尼西亚（2006），韩国（2004），菲律宾（2005）和中国台湾（2006）的数据。

24.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Rijkers 等 2012；Pagés 2010。

25. Grimm，Kruger 和 Lay 2011；Liedholm 2002。

26. 关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的分析，同时参见 Ayyagari，Demirgç-Kunt 和 Maksimovic（2011b）；分析显示小公司对就业和就业岗位创造有不小的贡献。

27. 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资料很多，见 Barrett，Bellemare 和 Hou 2010；Carletto，Savastano 和 Zezza 2011；以及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准备的文件 Larson 等 2012。

28. Holden，Otsuka 和 Place 2009；以及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Larson 等 2012。

29. 以肯尼亚为例。2007 年生产玉米最好的四分之一农场（根据规模测算）中，每公顷土地的家庭劳动力投入是 418 小时，而最差的四分之一农场的劳动力投入则达到了 1 032 小时。

30. 不仅在约旦这样的高工资经济体中发现了这种正向关系，近期在印度也发现了这样的关系。见 Foster 和 Rosenzweig 2011；Hayami 和 Kawagoe 1989。

31. Evenson 和 Gollin 2003。

32. 世界银行 2007。农业技术的改良可以导致该领域生产率的迅速增长和总生产率的趋同。根据来自 50 个国家 1967—1992 年的数据，Martin 和 Mitra（2001）发现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农业领域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超过制造业领域的速度。

33. 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增长中，这表明非洲的某些地区发生了绿色革命。见 Block 2012。

34. Hayami 和 Ruttan 1985。

35. David 和 Otsuka 1994。

36. Ravallion 2005；Ravallion 和 Chen 2007。

37. Haggblade，Hazell 和 Reardon 2007。

38. Christiaensen，Demery 和 Kuhl 2011。

39. Hsieh 和 Klenow 2009。

40. Pagés 2010。数字基于实物生产率（或 TFPQ），如 Foster，Haltiwanger 和 Syverson（2008）所定义的那样。本要素是每单位投入实际产出的衡量标准，使用工厂层面的价格减缩指数计算。TFPQ 比 TFPR 更精确，TFPR 是 TFPQ 的收入替代指标，采用工业层面的价格缩减指数计算。TFPQ 是更受青睐的测量标准，这是因为 TFPR 将数量和价格的效果结合了起来。 数量和价格受到需求因素、质量差异、利润和潜在扭曲等因素的影响。此前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基于 TFPR 的研究没有发现较高的生产率差量，但是由于这些研究基于落后的方法，因此并没有太大的信息价值。见 Tybout 2000。

41. Ayyagari，Demirgç-Kunt 和 Maksimovic 2011a。

42. Ayyagari，Demirgç-Kunt 和 Maksimovic 2011a；Haltiwanger，Jarmin 和 Miranda 2010。

43. Lin 2012；Wang 和 Yao 1999。

44. Banerjee 和 Duflo 2011；Fox 和 Sohnesen 2012；Schoar 2010；Sutton 和 Kellow 2010。

45. Fox 和 Sohnesen 2012。

46. Perry 等 2007。

47. Grimm，Kruger 和 Lay 2011；McKenzie 和 Woodruff 2008。

48. Mertens 2011；《经济学家》2001；卜蜂集团，www.cpthailand.com.

49. Kasbekar 2007；Witze 2010。

50. Sonobe，Hu 和 Otsuka 2004。

51. Sandefur 2010。

52. Hsieh 和 Klenow 2011。

53. Liedholm 2002；Mead 和 Liedholm 1998。

54. 来自 1—2—3 调查的结果。

55. Grimm，Kruger 和 Lay 2011；Kinda 和 Loening 2008；Loening 和 Imru 2009。

56. Fajnzylber，Maloney 和 Rojas 2006。

57. Bartelsman，Haltiwanger 和 Scarpetta 2009a；Haltiwanger 2011；Hsieh 和 Klenow 2009；Syverson 2011。

58. Banerjee 和 Duflo 2004；Banerjee 等 2009；de Mel，McKenzie 和 Woodruff 2008a；Gobel，Grimm 和 Lay 2011；Grimm，Kruger 和 Lay 2011；McKenzie 和 Woodruff 2008。

59. Banerjee 和 Duflo 2011；Schoar 2010；Sutton 和 Kellow 2010；Tokman 2007。如欲获取更多的正向观点，参见 de Soto（1989）及 Yunus 和 Jolis（1999）。

60. Fajnzylber，Maloney 和 Rojas 2006；结果来自世界银行 2009 年和 2010 年期间进行的非正规领域调查。

61. Djankov 等 2005，2006b。关于理清企业家能力动因和精心设计针对高潜力企业家的政策关系的重要性，同时参见 Vivarelli（2012）。

62. 关于识别高潜能企业家技能的方法论详情，请参见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Gindling 和 Newhouse（2012），Knorringa 和 Lay（2012）。

63.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Gindling 和 Newhouse 2012。

64. de Mel，McKenzie 和 Woodruff 2008b。

65. de Mel，McKenzie 和 Woodruff 2009；Sonobe 和 Otsuka 2006；Sonobe 和 Otsuka 2011。

66. Bruhn 2008。

67. Baumol 2010；Schoar 2010。

68. Fafchamps 和 Woodruff 2012。

69. Bloom 等 2011。

70. de Mel，McKenzie 和 Woodruff 2010；Fafchamps 等 2011；McKenzie 2010。

71. Gennaioli 等 2011；Kelley，Bosma 和 Amorós 2010；van der Sluis，van Praag 和 Vijverberg 2005。

72. Bloom 等 2011；Mano 等 2011。

73. 巴西 ECINF 2003 调查的估算值。

74. Fafchamps 和 Woodruff 2012；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Gindling 和 Newhouse 2012；Grimm，Kruger 和 Lay 2011；Otsuka 和 Sonobe 2011；Sonobe 和 Otsuka 2006。

75. Sutton 和 Kellow 2010。

76. Otsuka 和 Sonobe 2011；Sonobe 和 Otsuka 2006。

77. Djankov 等 2006a，2006b。

78. 参见美洲发展银行发出的倡议，“以基于市场的方案促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社会变革”http：//browndigital.bpc.com/ publication/?i=92819。

79. Bennedsen 等 2007；Bloom 等 2011；Bloom，Schweiger 和 van Reenen 2011；Bloom 和 van Reenen 2007，2010。

80. Drexler，Fischer 和 Schoar2011；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Kairiza 和 Sonobe2012；Mano 等 2011；Valdivia2011。

81. Karlan，Bruhn 和 Schoar 2012。

82. Karlan，Knight 和 Udry 2012。在加纳，干预措施仅包括十小时咨询待遇，相比之下，印度针对较大公司的成功项目长达 700 个小时，见 Bloom 等（2011）。

83. Bloom 和 van Reenen 2010；Bruhn，Karlan 和 Schoar 2010；Bruhn 和 Zia 2011；de Mel，McKenzie 和 Woodruff 2009。

84. Karlan 和 Valdivia 2010。

85. Valdivia 2011。

86. Berge，Bjorvatn 和 Tungodden 2011；Giné 和 Mansuri 2011。

87. Fafchamps 和 Woodruff 2012。关于替代性方法，请参见肯尼迪学院（http：//www.efinlab.com）创业金融实验室以心理测验工具揭示成功企业家特征的工作。

88.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Cho 和 Honorati 2012。

89.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Sonobe，Higuchi 和 Otsuka 2012。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9. *Enterprises in Asia: Fostering Dynamism in SMEs*. Manila: ADB.

Ayyagari, Meghana, Asli Demirgüç-Kunt, and Vojislav Maksimovic. 2011a. "Firm Innov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Role of Finance, Governance,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46(6): 1545–80.

———. 2011b. "Small vs. Young Firms across the World: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Job Creation, and Growt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63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aily, Martin Neil, Eric J. Bartelsman, and John Haltiwanger. 1996. "Downsiz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Myth or Realit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8 (4): 259–78.

Banerjee, Abhijit V., and Esther Duflo. 2004. "Do Firms Want to Borrow More? Testing Credit Constraints Using a Directed Lending Program."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4681,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 2011.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Banerjee, Abhijit V., Esther Duflo, Rachel Glennerster, and Cynthia Kinnan. 2009. "The Miracle of Microfinanc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Processed.

Bangladesh Knitwear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 2012.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Knitwear of Bangladesh." Bangladesh Knitwear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 Bangladesh. Processed.

Barrett, Christopher B., Marc F. Bellemare, and Janet Y. Hou. 2010. "Reconsidering Conventional Explanations of the Inverse Productivity–Size Relationship." *World Development* 38 (1): 88–97.

Bartelsman, Eric J., and Mark Doms. 2000. "Understanding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Microdat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8) 3: 569–94.

Bartelsman, Eric, John Haltiwanger, and Stefano Scarpetta. 2004. "Microeconomic Evidence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in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374,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 2009a.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The Role of Allocation and Selection." Working Paper 1549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2009b. "Measuring and Analyz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Firm Dynamics." In *Producer Dynamics: New Evidence from Micro Data*, ed. Timothy Dunne, J. Bradford Jensen, and Mark J. Roberts, 15–82.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aumol, William J. 2010. *The Microtheory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nnedsen, Morten, Kasper M. Nielsen, Francisco Perez-Gonzalez, and Daniel Wolfenzon. 2007. "Inside the Family Firm: The Role of Families in Succession Decisions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 (2): 647–91.

Berge, Lars Ivar Oppedal, Kjetil Bjorvatn, and Bertil Tungodden. 2011. "Human and Financial Capital for 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Field and Lab Experiment." Discussion Paper 1, Norwegian School of Economics, Bergen, Norway.

Block, Steven. 2012.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king Paper Series 1684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Bloom, Nicholas, Benn Eifert, Aprajit Mahajan, David McKenzie, and John Roberts. 2011. "Does Management Matter? Evidence from Indi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57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loom, Nicholas, Helena Schweiger, and John Van Reenen. 2011. "The Land That Lean Manufacturing Forgot?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1723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Bloom, Nicholas, and John van Reenen. 2007.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across Firms and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 (4): 1351–408.

———. 2010. "Why Do Management Practices Differ across Firms and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4 (1): 203–24.

Brandt, Loren, Chang-Tai Hsieh, and Xiaodong Zhu. 2008.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In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d.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andt, Loren, and Thomas G Rawski. 2008.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andt, Loren, Johannes van Biesebroeck, and Yifan Zhang. 2012.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7 (2): 339–51.

Bruhn, Miriam. 2008. "License to Sell: The Effect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Reform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Mexico."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53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ruhn, Miriam, Dean Karlan, and Antoinette Schoar. 2010. "What Capital Is Miss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2): 629–33.

Bruhn, Miriam, and Bilal Zia. 2011. "Stimulating Managerial Capital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Impact of Business and Financial Literacy for Young Entrepreneur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64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abral, Luis M. B., and José Mata. 2003.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Firm Size Distribution: Facts and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 (4): 1075–90.

Carletto, Calogero, Sara Savastano, and Alberto Zezza. 2011. "Fact or Artefact: The Impact of Measurement Errors on the Farm Size–Productivity Relationship."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90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ho, Yoonyoung, and Maddalena Honorati. 2012. "A Meta-Analysis of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Christiaensen, Luc, Lionel Demery, and Jesper Kuhl. 2011. "The (Evolving) Role of Agriculture in Poverty Reduction—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 (2): 239–54.

David, Christina C., and Keijiro Otsuka, eds. 1994. *Modern Rice Technolog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sia.*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Davis, Steven J., John C. Haltiwanger, and Scott Schuh. 1996.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e Mel, Suresh, David J. McKenzie, and Christopher Woodruff. 2008a. "Returns to Capital in Micro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 (4): 1329–72.

———. 2008b. "Who Are the Microenterprise Owners? Evidence from Sri Lanka on *Tokman v. de Soto*."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3511,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 2009. "Innovative Firms or Innovative Owners?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on in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3962,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 2010. "Wage Subsidies for Microenterpris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2): 614–18.

de Soto, Hernando. 1989. *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Djankov, Simeon, Miguel Edward, Yingyi Qian, Gerard Roland, and Ekaterina Zhuravskaya. 2005. "Who Are Russia's Entrepreneur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3 (2–3): 1–11.

Djankov, Simeon, Yingyi Qian, Gerard Roland, and Ekaterina Zhuravskaya. 2006a.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and Russia Compared."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4 (2–3): 352–65.

———. 2006b. "Who Are China's Entrepreneurs?" *Amercian Economics Review* 96 (2): 348–52.

Drexler, Alejandro, Greg Fischer, and Antoinette Schoar. 2011. "Keeping It Simple: Financial Literacy and Rules of Thumb." MIT Sloan Management, Cambridge, MA. Processed.

Duranton, Gilles. 2007. "Urban Evolutions: The Fast, the Slow, and the Stil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1): 197–221.

———. 2012. "Agglomeration and Jo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Duranton, Gilles, and Diego Puga. 2001. "Nursery Cities: Urban Diversity, Process Innovation, and the Life Cycle of Produ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5): 1454–77.

Dutz, Mark A., Ioannis Kessides, Stephen O'Connell, and Robert D. Willig. 2011.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Driven Inclusive Growt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85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Easterly, William. 2002. *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Economist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venson, Robert E., and Douglas Gollin. 2003. *Crop Variety Improvement and Its Effect on Productivity: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Wallingford, U.K.: CABI Publishing.

Fafchamps, Marcel, David J. McKenzie, Simon Quinn, and Christopher Woodruff. 2011. "When Is Capital Enough to Get Female Microenterprises Growing?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in Ghana." Working Paper Series 1720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Fafchamps, Marcel, and Christopher Woodruff. 2012. "Identifying and Relaxing Constraints to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Small-Scale African Enterprises."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Processed.

Fajnzylber, Pablo, William Maloney, and Gabriel Montes Rojas. 2006. "Microenterprise Dyna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 Similar Are They to Those in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Evidence from Mexico."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 (3): 389–419.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2010. *2000 World Census of Agriculture: Main Results*

and Metadata by Country (1996–2005). Rome: FAO.

Foster, Andrew D., and Mark R. Rosenzweig. 2011. "Are Indian Farms Too Small? Mechanization, Agency Costs, and Farm Efficiency." Brown University, Providence, RI. Processed.

Foster, Lucia Smith, John C. Haltiwanger, and Cornell J. Krizan. 2001.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Lessons from Microeconomic Evidence." In *New Developments in Productivity Analysis*, ed. Charles R. Hulten, Edwin R. Dean, and Michael J. Harper, 303–72.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ster, Lucia Smith, John C. Haltiwanger, and Chad Syverson. 2008. "Reallocation, Firm Turnover, and Efficiency: Selection on Productivity or Profita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1): 394–425.

Fox, Louise, and Thomas Sohnesen. 2012. "Household Enterprise in Sub-Saharan Africa: Why They Matter for Growth, Jobs, and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18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Gennaioli, Nicola,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Hleifer. 2011. "Human Capit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1715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Ghani, Ejaz, Arti Grover Goswami, and William R. Kerr. 2012. "Is India's Manufacturing Sector Moving Away From Cit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12-090,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Gindling, T. H., and David Newhouse 2012. "Self-Employ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Giné, Xavier, and Ghazala Mansuri. 2011. "Together We Will: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on Female Voter Turnout in Pakista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Göbel, Kristin, Michael Grimm, and Jann Lay. 2011. "Capital Returns, Productivity and Accumulation in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Peruvian Panel Data." Processed.

Griliches, Zvi, and Haim Regev. 1992. "Productivity and Firm Turnover in Israeli Industry, 1979–1988."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5 (1): 175–203.

Grimm, Michael, Peter Knorringa, and Jann Lay. 2012. "Constrained Gazelles: High Potentials in West Africa's Inform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Erasmus University–Rotterdam, Rotterdam, Netherlands. Processed.

Grimm, Michael, Jens Kruger, and Jann Lay. 2011. "Barriers to Entry and Returns to Capital in Informal Activities: Evidence from Sub-Saharan Afric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7 (S1): S27–S53.

Haggblade, Steven, Peter B. R. Hazell, and Thomas Anthony Reardon, eds. 2007. *Transforming the Rural Nonfarm Econom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altiwanger, John. 2011.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Volatility." In *Making Globalization Socially Sustainable*, ed. Marc Bacchetta and Marion Jansen, 119–46.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altiwanger, John, Ron S. Jarmin, and Javier Miranda. 2010. "Who Creates Jobs? Small vs. Large vs. Young." Working Paper Series 163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Hayami, Yujiro, and Toshihiko Kawagoe. 1989. "Farm Mechanization, Scale Economies and Polarization: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1 (2): 221–39.

Hayami, Yujiro, and Keijiro Otsuka. 1993. *The Economics of Contract Choice: An Agrarian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yami, Yujiro, and Vernon W. Ruttan. 1985.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enderson, Vernon. 2002.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7 (1): 89–112.

Holden, Stein T., Keijiro Otsuka, and Frank M. Place. 2009. "Land Markets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In *The Emergence of Land Markets in Africa: Assessing the Impacts on Poverty, Equity, and Efficiency*, ed. Stein T. Holden, Keijiro Otsuka, and Frank M. Place, 3–17. Washington, D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Hsieh, Chang-Tai, and Peter J. Klenow.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4): 1403–48.

———. 2011. "The Life Cycle of Plants in India and Mexico." Research Paper 11-33,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Forthcoming. *IFC Job Study: Assessing Private Sector Contributions to Job Creation.* Washington, DC: IFC.

Kairiza, Terrence, and Tetsushi Sonobe. 2012. "Are Female Entrepreneurs Less Skillful in Managment?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in the Garment Industry in Tanzania." Discussion Paper 11-24,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Tokyo.

Karlan, Dean, Miriam Bruhn, and Antoinette Schoar. 2012. "The Impact of Consulting Services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Trial in Mexico." Working Paper 100, Economics Department,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Karlan, Dean, Ryan Knight, and Christopher Udry. 2012. "Hoping to Win, Expected to Lose: Theory

and Lessons on Micro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 Cambridge, MA. Processed.

Karlan, Dean S., and Martin Valdivia. 2010. "Teaching Entrepreneurship: Impact of Business Training on Microfinance Clients and Institu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 (2): 510–27.

Kasbekar, Kiron. 2007. *Only the Fittest Survive.* London: Tata Group.

Kelley, Donna, Niels Bosma, and José A. Amorós. 2010. *GEM Global Report.* London: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Kinda, Tidiane, and Josef L. Loening. 2008. "Small Enterprise Growth and the Rural Investment Climate: Evidence from Tanzani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67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ucera, David, and Leanne Roncolato. 2012. "Structure Matters: Sectoral Driver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Labour Productivity–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eneva. Processed.

Larson, Donald F., Keijiro Otsuka, Tomoya Matsumoto, and Talip Kilic. 2012. "Can Africa's Agriculture Depend on Smallholder Farmer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Liedholm, Carl. 2002. "Small Firm Dynamics: Evidence from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8 (1–3): 227–42.

Lin, Justin Yifu. 2012.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ening, Josef, and Mikael Imru. 2009. "Ethiopia: Diversifying the Rural Economy. An Assessment of the Investment Climate for Small and Informal Enterprises." Paper 23278,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Munich.

Mano, Yukichi, Alhassa Iddrisu, Yutaka Yoshino, and Tetsushi Sonobe. 2011. "How Can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 Sub-Saharan Africa Become More Productive? The Impacts of Experimental Basic Management Training."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75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Martin, Will, and Devashish Mitra. 2001.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Agriculture versus Manufact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9 (2): 403–22.

McKenzie, David. 2010. *Impact Assessment in Finance and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What Should We Lear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cKenzie, David, and Christopher Woodruff. 2008.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Returns to Capital and Access to Finance in Mexico."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2 (3): 457–482.

McMillan, Margaret S., and Dani Rodrik. 2011.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Working Paper Series 1714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Mead, Donald C., and Carl Liedholm. 1998. "The Dynamics of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26 (1): 61–74.

Mertens, Brian. 2011. "Forbes Asia's Businessman of the Year." *Forbes Asia Magazine*, December 5.

Montenegro, Claudio E., 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 2012. "Returns to Schooling around the World."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Mottaleb, Khondoker A., and Tetsushi Sonobe. 2011. "An Inquiry into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Garment Industry in Banglades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60 (1): 67–89.

Nelson, Richard R. 1981. "Research 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Dead Ends and New Departur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 (3): 1029–64.

Otsuka, Keijiro, and Frank Place. 2001. *Land Tenure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grarian Communities in Asia and Afric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Otsuka, Keijiro, and Tetsushi Sonobe. 2011. "A Cluster-Bas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icy for Low-Income Countri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70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agés, Carmen, ed. 2010. *The Age of Productivity: Transforming Economies from the Bottom Up.*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ark, Jaegil, Daejong Kim, Yongseok Ko, Eunnan Kim, Keunhyun Park, and Keuntae Kim. 2011.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olicies in Korea.* 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 Settlements.

Perry, Guillermo E., William F. Maloney, Omar S. Arias, Pablo Fajnzylber, Andrew D. Mason, and Jaime Saavedra-Chanduvi. 2007. *Informality: Exit and Exclus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ieper, Ute. 2000. "De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Nexu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6 (4): 66–99.

Ravallion, Martin. 2005. "Externalities in Rur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or China." In *Spatial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ed. Ravi Kanbur and Anthony J. Venables, 137–6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2007.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1): 1–42.

Rhee, Yung Whee. 1990. "The Catalyst Model of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Bangladesh's Success with Garment Exports." *World Development* 18 (2): 333–46.

Rijkers, Bob, Hassen Arouri, Caroline Freund, and Antonio Nucifora. 2012. "Which Firms Create

Jobs in Tunisi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Roberts, Mark J. 1996. "Employment Flows and Producer Turnover." In *Industrial Evo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icro Patterns of Turnover, Productivity, and Market Structure*, ed. Mark J. Roberts and James R. Tybou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utkowski, Jan, Stefano Scarpetta, Arup Banerji, Philip O'Keefe, Gaelle Pierre, and Milan Vodopivec. 2005. *Enhancing Job Opportunities: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andefur, Justin. 2010.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Firm Size Distribution in an African Econom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0-05, Oxford. Processed.
Schoar, Antoinette. 2010. "The Divide between Subsistence and Transform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Volume 10*, ed. Josh Lerner and Scott Stern, 57–81.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iferaw, Admasu, and Arjun S. Bedi. 2010. "The Dynamics of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Is Sub-Saharan Africa Different?"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 Discussion Paper 22, Courant Research Centre, Göttingen, Germany.
Sonobe, Tetsushi, Yuki Higuchi, and Keijiro Otsuka. 2012.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Job Cre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Sonobe, Tetsushi, Dinghuan Hu, and Keijiro Otsuka. 2004. "From Inferior to Superior Products: An Inquiry into the Wenzhou Mode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2 (3): 542–62.
Sonobe, Tetsushi, and Keijiro Otsuka. 2006. *Cluster-Bas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 East Asian Mode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011. *Cluster-Bas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Sutton, John, and Nebil Kellow. 2010. *An Enterprise Map of Ethiopia*. London: 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re.
Syverson, Chad. 2011. "What Determines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2), 326–65.
The Economist. 2001. "Face Value: Radicalism, Asian Style."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March 22.
Timmer, Marcel P., and Gaaitzen J. de Vries. 2009. "Structural Change and Growth Accelerations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A New Sectoral Data Set." *Cliometrica* 3: 165–90.
Tokman, Victor. 2007. "Modernizing the Informal Sector." Working Paper 42,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Tybout, James R. 1996. "Heterogeneit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Assessing the Evidence." In *Industrial Evo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icro Patterns of Turnover, Productivity, and Market Structure*, ed. Mark J. Roberts and James R. Tybou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 "Manufacturing Fi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 Well Do They Do, and Wh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8 (1): 11–44.
Valdivia, Martin. 2011. "Training or Technical Assistance for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Peru." GRADE (Grupo de Análisis para el Desarrollo), Lima. Processed.
van der Sluis, Justin, Mirjam van Praag, and Wim Vijverberg. 2005. "Entrepreneurship Selection and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 (2): 225–61.
Vivarelli, Marco. 2012. "Entrepreneurship in Advanc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 Microeconomic Perspective,"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6513, IZA, Bonn.
Wang, Yueping, and Yang Yao. 1999. *Market Reform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mall Enterprises in Chin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itze, Morgen. 2010. "Case Study: Tata."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9.
World Bank. 200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9.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a. "Brazil Urbanization Review."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 2011b. *Vietnam Urbanization Review: Technical Assistance Repor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Forthcoming. *Planning, Connecting, Financing Cities—Now. Urbanization Review Flagship Repor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2012.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unus, Muhammad, and Alan Jolis. 1999. *Banker to the Poor: Micro-Lending and the Battle against World Povert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第 4 章 4

就业和社会凝聚力

就业可以塑造社会互动和社会管理集体决策的方式。就业使人们处于相互联系的状态，而且提供了发表意见的渠道。

就业对我们的身份认同及与他人的关系产生影响。在大多数社会中，就业是自尊和社会地位的基本决定因素。历史上，一些文化中的家庭姓氏和特定的行业相联系，这是因为他们以他们从事的行业来定义自己：英国的农场主（Hurudza）和印度的木匠（Suthar）。

就业的关系网络将大家联系在一起。工作场所可以成为新思想碰撞、新信息交汇和不同民族人口互动的场所。就业在社会中的分布会产生很多影响，即对谁拥有获得机会的渠道，为什么就业可以塑造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和愿望，人们在社会中分一杯羹的观念及公平的概念等产生影响。

就业的这些个别影响可能产生集合效应。就业或失业可能对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因素及社会管理集体通过和平方式决策的能力产生影响。尽管阿拉伯之春期间失业青年的挫败感显示工作岗位的匮乏可能导致社会骚乱，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业和社会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就是明确的、即时的或直接的。这种关系更多是情景性的，由个体及其价值观念、态度和行为以及他们所处环境中的制度所塑造的。而且这种关系有两种方向：通过打造企业家投资决策的环境，社会凝聚力也可以对就业产生影响。

关于就业和社会凝聚力关系的经验证据受到数据因素、测量社会互动的复杂性以及影响社会凝聚力的众多因素的限制。然而，价值调查跨国分析发现，失业或缺少工作机会与信任程度和社会参与程度较低相关。这不仅仅是富裕国家独有的现象。失业可能导致意志消沉，增加彼此的不信任感，促使人们脱离社区生活。没有社会关系的移民可能被排斥在工作机会之外，而工作机会可能使他们在新的环境中成功。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人们，尤其是青年缺少工作机会而又对未来有期望，他们可能转向暴力活动或犯罪活动，从而弥补原本应该由

工作提供的自尊和归属感。同样，那些提供有限未来增长机会或缺少表诉意见渠道的工作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和挫败感。

一些就业与社会凝聚力呈正相关关系。那些赋权的、建立能动性或提供意见表诉渠道的工作可以增强信任和人们参与民事社会的意愿。就业可以创建经济社会联系，而且可能建立跨越疆界工作解决冲突问题的动力。如果人们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他们都有工作机会，那么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心可能增加。工作可以通过其对社会认同、网络和社会公平的影响对社会凝聚力产生影响。

就业有助于管理社会紧张局势

关于金融危机和阿拉伯之春的新闻报道传递了一个共同感觉，即失业，尤其是青年失业可能激发骚乱和暴力活动。[1]2010 年 9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峰会召开之前，《电讯报》的头版发表了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忧世界就业危机引发“社会骚乱”的报道。[2]2011 年，《世界报》在关注突尼斯的社会公平问题时将就业与社会不稳定联系起来，“抗议者不是要求政府给他们找到工作，而是谴责劳动力市场缺少透明度和公平”。[3]一名水果摊贩因不能得到许可证而进行的抗议成了突尼斯革命的导火索。2011 年夏天英国的骚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青年高失业率造成的。[4]

这些事件表明，就业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其中包括社会如何应对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如何管理不同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如何规避并解决冲突问题。社会凝聚力的定义方式很多（见专栏 4.1）。但是总的说来，社会凝聚力系指社会和平管理集体决策的能力。[5] 因此，社会凝聚力与群体互动的过程及决定群体如何互动的制度相关。这并不是说集体决策应当是自上而下强加的，而是说话语权渠道、问责制及不同群体的普遍参与有助于形成社会的凝聚力。

信任和公民参与举足轻重……

支撑和平集体决策的国家能力涉及多个因素，包括制度质量、群体间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渠道的有效性。关于政治稳定性、暴力缺失及话语权和问责制的跨国数据可用于建构国家层面的社会凝聚力指标。[6] 北欧国家、瑞士和新西兰的这些指标分数很高。尽管指标是静态的测量标准，和平决策能力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引起的社会变化而发展，这些社会变化主要有城市化，女性就业的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增长。

以就业实现互动的性质对社区和社会中社会凝聚力的程度产生影响。信任和公民参与是衡量个体层面社会凝聚力的两个可测量的指标。这些指标与国家层面的指标，即和平决策能力相关（见图 4.1）。

信任系指个体对自己所认识的人（包括家庭和邻居）所信赖的程度。[7] 信任也可以指对初次相遇的人、不同宗教团体和不同民族的人的信赖。公民参与体现了人们通过加入社区组织、工会、政党或宗教组织或通过参与社会生活而自愿参与公民社会的程度。参与和活动的形式包括非暴力活动，譬如参与抗议，这对社会凝聚力具有建设性的作用。公民参与涉及社会资本、参与及促使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能动性。

……而且信任和公民参与受到就业的影响

信任和公民参与与就业相联系。

专栏 4.1 什么是社会凝聚力?

社会凝聚力的概念可以远溯到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的作品，他是一名出生在 15 世纪突尼斯的穆斯林学者，他的宗派主义（asabiyah）观点通常被译为“社会凝聚力”。哈勒敦生活的时代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斗争，哈勒敦把宗派主义视为拥有权利促进更广泛的社会一体化的小群体（部落）团结。[a]

四个世纪以后，埃米尔·涂尔干对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凝聚力进行了思考。[b] 他对两种类型的团结尤为关注，后一种团结类型兴起于欧洲的工业化过程。他发现，原始社会的团结是机械的团结，强大的集体精神基于相对同质性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相比之下，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复杂，其团结是基于美德、对发挥不同作用的劳动力的尊重及对道德规范的需求。

更近一点儿，社会凝聚力与社会资本联系在一起。20 世纪 90 年代，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强调个体通过参与群体所获得的利益及个体投资这些关系的必要性。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对创建灵敏的、有效的和代表性制度所需条件的分析正是建立在此主题的基础之上。北意大利的制度明显好于南意大利，帕特南推定最核心的使然条件是存在更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以地方社团的密度来衡量。[c] 社会凝聚力可以理解为比社会资本更广泛的概念，因为社会凝聚力考虑更广阔背景下的群体间关系。伊斯特里（Easterly），瑞特恩（Ritzen）和沃尔卡克（Woolcock）将社会凝聚力定义为“社会内部（收入、民族、政党、种姓、语言）社会经济分工的性质和程度。”[d]

尽管社会凝聚力具有多个侧重点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的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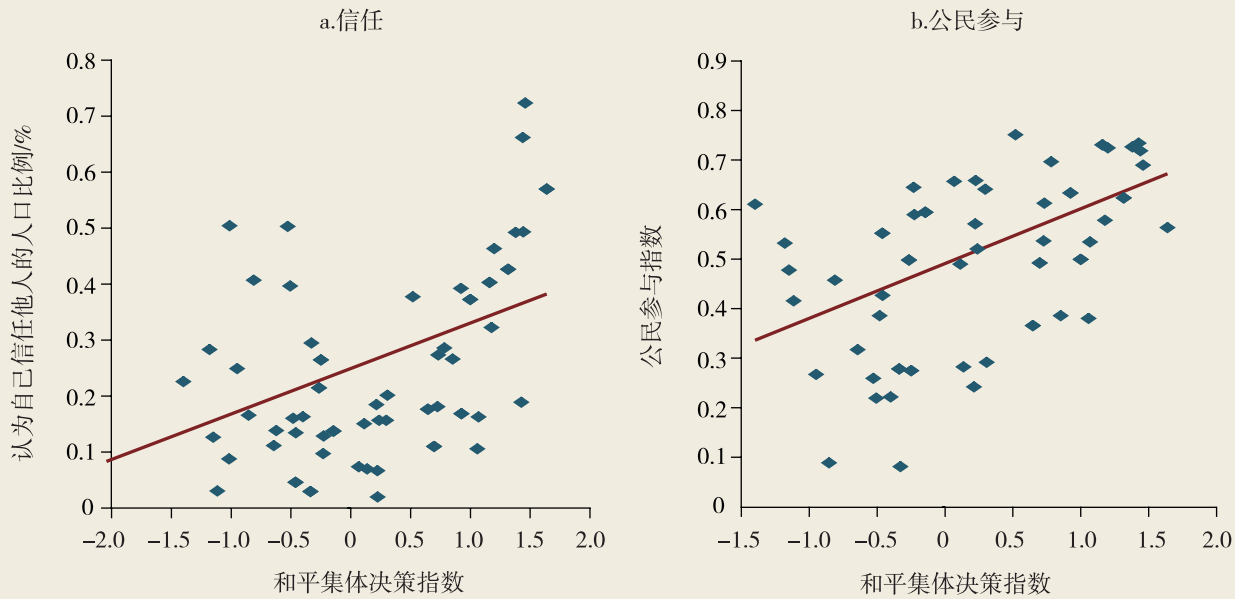
- 社会凝聚力通常被视为积极的概念。它既可以是自身的目的，也可以是自身的手段。经合组织对凝聚社会的描述是“为全体成员的福祉而奋斗”的社会。[e] 法国计划总署对社会凝聚力的定义为“有助于个体获得同一社区归属感和被社区承认的成员感的一系列社会过程”。[f]
- 社会凝聚力与个体、群体和社会的互动相关。这些互动被视为“将个体所属群体中个体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和将不同群体联系在一起的纽带。[g]
- 社会凝聚力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马德里俱乐部，“共享的社会是稳定的、安全的、公正的，以提倡和保护一切人权为基础……，包括社会地位地下的脆弱群体和个人。”[h]
- 最后，一些社会凝聚力定义将这一概念与过程和制度特征相联系。例如，社会凝聚力可以指代“社会（而不仅仅是群体、网络）和平管理集体行动问题的能力”。[i] 该定义将社会凝聚力与共享和公民参与联系在一起。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Norton 和 de Haan 2012 总结出来的；经合组织 2011。
a. Weiss 1995。
b. Durkheim 1893。
c. Putnam，Leonardi 和 Nanetti 1993。
d. Easterly，Ritzen 和 Woolcock 2006，105。
e. 经合组织 2011，17。
f. Jenson 1998，4。
g. Moreno 和 Jennings 1937，371。
h. 经合组织 2011，53。
i. Woolcock 2011。

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态度及人们对他人和制度的信任，就业或失业可能影响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就业也可以为不同群体人口的互动提供渠道。具有某些特定特征的工作可能比其他工作更能促进信任和公民参与。

在高收入国家，失业和自述的较低信任相联系（见图 4.2a）。失业与公民参与的关系更密切，失业与社团、示威游行和签署请愿书较低的参与率相关（见图 4.2b，图 4.2c 和图 4.2d）。失业与积极参与社团的关系具有重大的负面效应，低收入国家除外。关于信任和失业的好坏不一的调查结果强调，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失业可能不永远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由于在缺少社会安全网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口为保持收支平衡都参与工作，因而发展中国家的公开失业通常较低，而且并不总是集中在贫穷人口中。在发展中

图 4.1　信任和公民参与与和平集体决策并行不悖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2005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斯德哥尔摩的总结；2005 年世界治理指标。

注释：分析（a 组）包括 56 个国家，（b 组）包括 49 个国家。“和平集体决策指数”是世界治理指数中“话语权和问责”及“政治稳定性和暴力缺失”指数的平均指数。“公民参与指数”是世界观价值调查中被调查者对下述问题回应的平均水平：a）积极参与社团；b）被调查者是否参与过或将参与游行示威；和 c）被调查者是否签署过请愿书。

国家，工作的类型，工作提供的机会和工作联系人们的方式可能是与社会凝聚力更相关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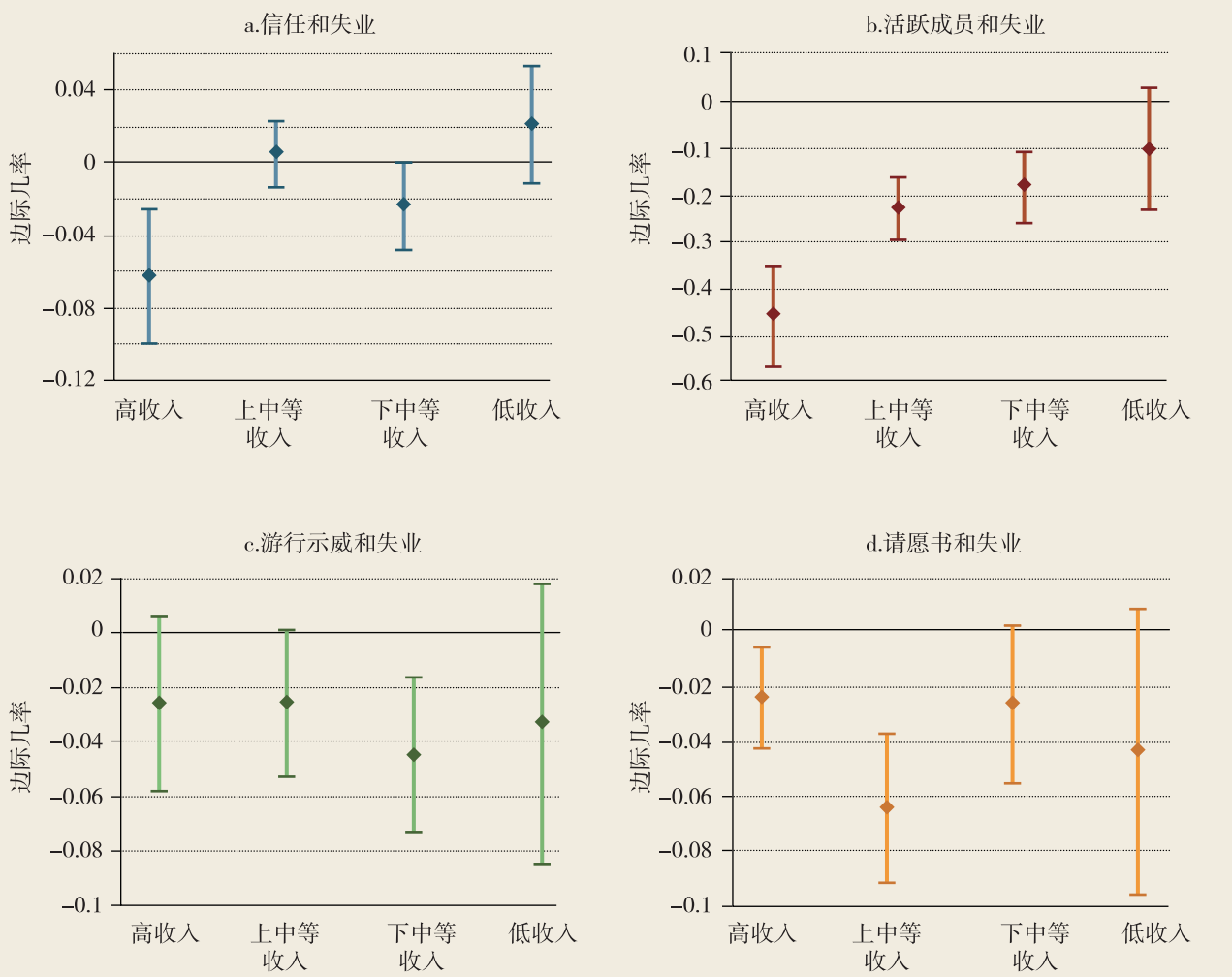
就业和社会凝聚力关系的其他迹象来自于对工作特征的审视。2005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询问人们他们的工作是手工的或是认知的任务，是常规性的或是创造性的任务，以及他们在工作中有多大的独立性。这些自述特征是衡量工作积极性的指数，指数与高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信任呈正相关关系（见图 4.3a）。在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中，这种关系并不明显。具有可观察的认知、创造和资助特性的工作与公民参与指标在所有国家呈正相关关系，低收入国家除外（见图 4.3b，图 4.3c 和图 4.3d）。[8, 9] 同样，2012 年在中国、哥伦比亚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进行的调查中，认为自己的工作有更多的自主性、较大创造性和认知性内容的工人更愿意帮助其他工人。[10]

不仅仅是关联？

尽管这些使人联想到就业和社会凝聚力的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尽管失业人群更不愿意相信他人或参加社团，对别人信任程度较低的人也可能处于失业状态或不参与公民社会。而且，信任和公民参与受到同辈和社会互动效应（例如信任或加入他人）的影响，因而得出结论并非易事。

尽管我们优先考虑的是就业如何促进信任和公民参与，这种关系是双向的。也存在社会凝聚力对就业产生影响的途径。信任和社会资本（公民参与的因素）可能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政治环境。[11] 信任可以降低

图 4.2 失业人口信任度和参与度较低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Wietzke 和 McLeod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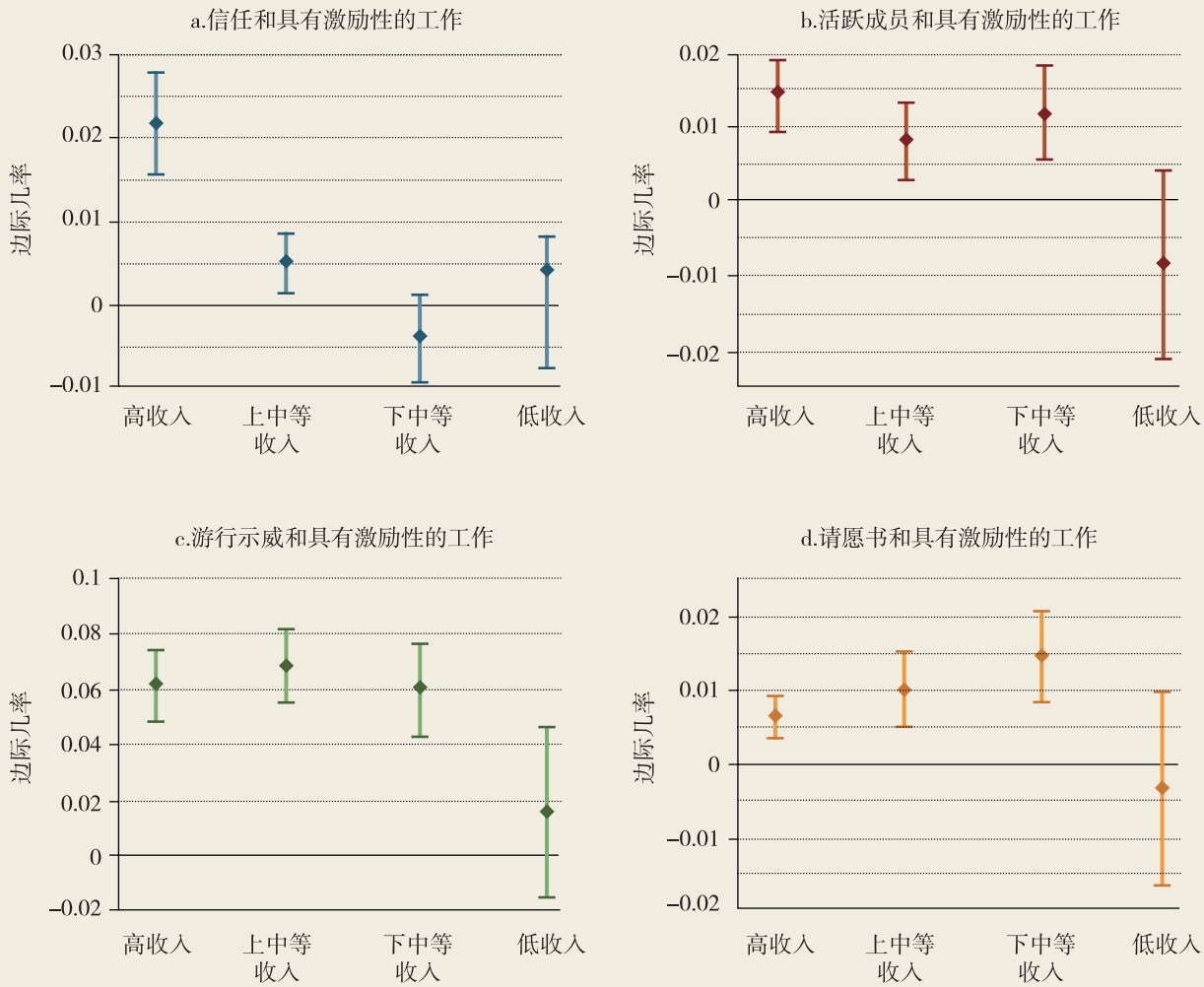
注释：本分析包括 54 个国家。竖轴显示个体自述的失业时的信任或公民参与。估测对收入、教育和被调查者的人口特征予以考虑。信任基于下述问题，“一般来说，你会说你可以信任大多数人还是你在与他人交往时需要百般谨慎?”公民参与变量包括（a）在九个不同的社团中，被调查者是否是一个或多个社团的活跃成员；（b）被调查者是否参与了或即将参与示威游行；或者（c）被调查者是否或即将签署请愿书。竖线显示每一系数 95%的信心区间。如果竖线跨越横轴，相应的系数在统计学上意义不大。

交易成本，克服不确定性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可以降低研究和信息、治安与执行、谈判与决策相关的成本；可以成为知识传播与交流的基础，促进创新和公司间的协作。[12] 同时，不信任、歧视、泾渭分明的民族界线或不平等等因素也可以对能否创造就业岗位及其类型产生影响。

关于就业状况与公民参与直线关系的证据来自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的一项调查，该调查在 2000 年和 2007 年期间对社区会议和志愿者活动的参与度进行了跟踪调查，并对同样的被调查者进行了采访。[13] 在此期间，社区活动的参与率增加了 8%，但是工作经历不同的人群间增长的速度也不同（见图 4.4）。[14]

在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和其他人相比，2000 年就业但是 2007 年失业的男性和女性参与社区活动的可能性较

图 4.3　那些具有激励性的工作促使人们更多地信任他者，更多地参与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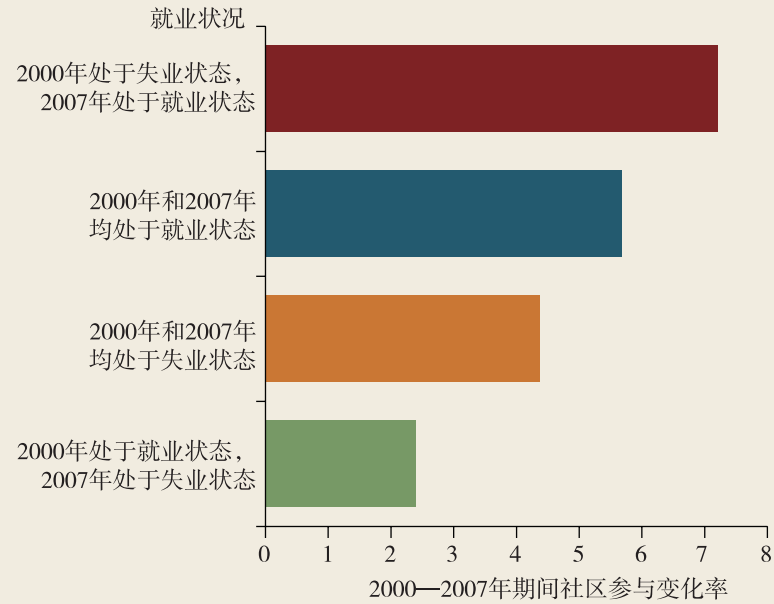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Wietzke 和 McLeod 2012。

注释：本分析覆盖 54 个国家。竖轴显示个体自述的信任或公民参与的边际几率（d–利润系数），以一项评估被调查者认为它们的工作是否是认知性的、创造性的或独立的指数为基础。信任基于下述问题，“一般来说，你会说你可以信任大多数人还是你在与他人交往时需要百般谨慎?”公民参与变量包括（a）在九个不同的社团中，被调查者是否是一个或多个社团的活跃成员；（b）被调查者是否参与了或即将参与示威游行；或者（c）被调查者是否或即将签署请愿书。竖线显示每一系数 95%的信心区间。如果竖线跨越横轴，相应的系数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

低。相反，和那些 2007 年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口相比，2000 年失业但 2007 年就业的男性和女性参与社区活动的可能性要高得多。[15] 分析中没有考虑的因素可以对这些结果予以解释。例如，因病失去工作的人也丧失了参与社区活动的能力。近期对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跨国分析显示，就业状况和对他者及制度的信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见专栏 4.2）。[16]

失业、信任和公民参与的经验结果显示，丢失工作不仅仅意味着丢失收入。丢失工作可以降低自我价值感，限制家庭和社会关系。失业可以破坏经济社会关系，滋生不信任，损害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和对未来的希望。没有工作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丧失，意味着不能为家庭提供收入。塞尔维亚一名刚从工厂下岗 24 小时的工人解释说，“一切都自动离我而去。我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我拥有的权利。一切

图 4.4 在印度尼西亚，拥有工作的人会更多地参与社区活动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库），兰德公司，圣莫尼卡，加利福尼亚州。
注释：社区参与包括参加社区会议；合作性、志愿性劳动；邻里关系改善；邻里联防或女性社团。

都丢失了。”[17] 由于新的就业岗位有限，阿根廷、保加利亚和圭亚那的民族社区经历了大范围的失业问题，这些社区对长期失业社会含义的描述惊人的一致（见专栏 4.3）。

对社区而言，丢失工作所滋生的不信任似乎不仅仅是对原雇主或对就业机会匮乏漠不关心或负有责任的政府机关的不信任，而且也会对邻居、从前的同事或朋友产生不信任。这种挫败感可能会加剧对政治环境的不满。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失业可能导致对民主有效性的负面观点，导致人们厚爱粗暴的领导，该研究使用了在 69 个国家进行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18] 工作不稳定或令人消沉的工作会产生与失业类似的效应。地位卑微、工作安全或工作中的话语权会削弱人的自信心，让人对未来感到绝望，停止参与社会网络。[19]

在极端的情况下，失业会促进暴力活动或社会骚乱。青年尤其可能转向帮派或其他暴力群体，从而弥补缺失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关系。[20] 对厄瓜多尔青年的纵向研究发现，涉足毒品

专栏 4.2 工作能产生信任吗?对欧洲晴雨表和拉丁美洲晴雨表调查的分析

一项分析使对信任与就业的演变及二者双向关系的研究具有了可行性，该分析使用了 21 世纪前十年拉丁美洲晴雨表和欧洲晴雨表价值观调查。调查的问题包括人际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在不同的调查年份中都对小组进行了定义和调查。分析审视了小组的社会凝聚力和就业状况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某些可能与信任和就业状况相关的国家特征也得到了考虑。

数据集抓住了社会凝集力形成过程的重要特征，这是因为信任和公民参与的概念受到同伴互动和社会互动效应的很大影响。例如，个体信任其他人的倾向或个体的地位取决于他所属的同类社会人口群体中他人对他的可观察到的或实际的信任。

模型同时考虑了群体层面就业状况（包括失业和自就业）对信任的影响。经验主义者对群体层面就业状况的改变能多早预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社会及其制度的信任发生的变化。估测效果衡量了小组中失业率在某一年中发生 1 个百分点的变化会导致该小组个体在来年信任程度会发生百分之几的变化。

该分析发现，在欧洲，失业率的增加伴随着信任的增加，但是在拉丁美洲却恰恰相反。同时，自就业的增加提高了欧洲人的信任，而拉丁美洲正好相反。这些结果降低了拉丁美洲对政府和他者的信任。反过来，除了发现自就业对人们对拉丁美洲政府的信任有微小的负面影响之外，分析并未找到有力的证据证明信任与就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些结果可能反映了欧洲社会保障体系较大的覆盖率及公开失业在拉丁美洲没有在欧洲那么严重。这也和证明另一种观念的证据是一致的，即在拉丁美洲，自就业是人们找不到工资性工作时最后的选择，但是自就业所提供的独立也受到某些人的重视。[a]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rias 和 Sosa 2012。
a. Perry 等 2007。

专栏 4.3　流离失所和失业可能破坏信任和关系

圭亚那缩小铝土开采的规模

在没有创造新机会的情况下缩小铝土矿的规模导致圭亚那林登地区家庭和社区关系的恶化。[a]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和 80 年代中期期间，林登附近的铝土开采缩减了一半，工人失业持续贯穿了整个 90 年代。到 1999 年，林登地区的正式失业达到了约 40%，居民对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不满。

矿工曾经属于待遇最好的工人，他们因为自己的工作而受到尊敬，被视为经济的推动者。在缩减规模的过程中，人们尤其感到屈辱，“被辞退的工人得不到任何信息。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然而……在我们被辞退前，他们常常给我们开会，告诉我们（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b]

物质困苦和不稳定让社会认同及男女两性关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女性将男性无力维持自己作为养家者的权威和家庭暴力直接联系起来。“特别是在虐待事件中，在劝解之后你会惊奇地发现，问题恰恰是回到经济形势上。男人不能为家庭提供足够的收入。”[c] 贫困与忽视或虐待儿童等触目惊心的问题相关。据说一些父母让自己的孩子沦为娼妓。据悉，种植大麻，使用可卡因和涉足毒品国际贩卖的青年人数正在迅速增加。

缩小铝土开采的规模也减少了教会等社区组织可用的经济资源：“教会也陷入了危机之中。作为个体，我们难逃危机之害，我们把它带进了教堂，转而又扩散到社会中去。”有人如是说。[d]

保加利亚的体制改革和失业

在共产主义体制结束后，保加利亚大规模缩减了其不可持续的国有企业。国企工作的消失意味着包括健康医疗和就业保障等在内的众多利益的丧失。在焦点小组，人们将丢失工作与糟糕的健康状况、社会隔离和犯罪等问题联系起来。尤其是老人，当他们不得不寻求在年轻的亲属或雇主那里工作时，那是一种耻辱。

失业不仅仅会削弱社会关系。它造成不信任和互相猜忌。改革也造就了成功者，然而他们也受到互不信任的困扰。丢失工作的人开始避免参与传统的社会聚会，因为他们负担不起人们所期望他们提供的礼物。人们觉得曾经与良好的健康状况、追求个人和职业成就、良好的人际关系、在社区中获得的尊重和社会凝聚力等相联系的安全已经遥不可及了。在曾经相对平等的社区中，人们分辨出五六种不同的福祉水平。

阿根廷的经济改革

拉马坦萨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外围的一个人口为 120 万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曾经是以纺织业、柴油机、家电和钢铁等为主导产业的制造业中心。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改革致使对技术和熟练工人的依赖增加。拉马坦萨的工厂倒闭了，就业机会不足。由于流动性不高，人们不得不接受没有失业保险或健康保险的临时工作或非正式工作。那些成功找到工作的人对剥削性的工资、酷虐待遇以及对他们尊严的侵犯感到不满。

和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工作丢失对男女两性的关系产生了影响。尽管一些男性适应了更为平等的角色，许多男性因其作为家庭顶梁柱的自尊受到打击而沮丧或愤怒。女性抱怨说家庭暴力增加了。男性觉得失业削弱了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Dudwick 2012。
a. 世界银行 2004a。
b. 世界银行 2004a，26。
c. 世界银行 2004a，29。
d. 世界银行 2004a，53。

和枪支的帮派成员参加这些活动“是因为他们寻求家庭不能提供给他们的支持、信任和凝聚力等社会资本，也因为地方环境缺少机会”。[21] 同样，对美国的分析显示，帮派给青年提供了他们未能从工作中获得的收入、尊敬和社会关系，在可得机会有限的城市中尤其如此，例如芝加哥和纽约这样稳定的、具有工会组织的制造业工作在流失的城市。[22]

移民、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等流动人口缺少工作机会的问题尤其令人担忧。这可以对地位和社会认同产生影响，例如，对在原籍地具有较好工作的移民的地位和社会认同产生影响。失业对流动人口的社会影响尤其会使那些在新社区缺少家庭联系或其他联系的人口感到孤立。失业可能影响人

们的心理福祉和参与公民社会的能力。即使那些找到工作的移民，如果他们的工作不足以让他们融入新的社会或移民缺少关于自身权利的话语权或信息，他们也可能是容易受到冲击的群体。

就业（或就业匮乏）能够塑造社会互动

社会凝聚力和就业的关系未必是直接的或直线的。就业和社会的互动是情景性、多维度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具有工作或没有工作会对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产生影响，也包括着对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就业可以实现人们的信息交流、经济联系和与他人的联系。就业分配方式可以影响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如他们所属的社会是否是公平的、基于成就的，他们是否在社会中拥有自己的权益，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愿景和愿望等（见问题 4）。

就业带来社会认同

某些工作对人们如何看待自身及他们与他者的关系具有积极影响。一项工作所传递的身份认同能够对个体所属的社会范畴、他们的行为和塑造这种行为的规范产生影响。[23] 在工业国家，赋予人们学习和发展失业机会的工作可以激励人们并强化身份认同。在美国，给低工资工人提供技能发展和增长机会的项目旨在强化自尊心和主动性。[24]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倡导在卫生保健、儿童看护、教育、生物技术和制造业领域建立职务晋升制度，评定雇员的工作能力，赋予雇员发展技能、参与培训并增强责任感的机会。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疗养院实施的方案结果显示，拥有增长机会会改善沟通和团队工作效果，减少逆转，建立在团队中的自尊和信心。[25]

就业对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工人具有相似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对社会凝聚力具有意义。孟加拉国服装业的增长使 300 万女性进入工厂工作。尽管就身体上而言工厂的工作很艰苦，待遇也不好，但这些工作提高了女性的自主性，扩大了她们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26]“我比以前勇敢了，”一名 26 岁的工人解释说，“我理解了许多我以前不理解的事情。”[27] 观察者注意到，女性步行上下班的景象改变了流行的观念，即公共场合应当接受女性，女性有权涉足公共制度。[28] 同事一起旅行，共享关于工作机会的信息，组建储蓄小组。[29]

工作也对自就业工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影响，这里，自就业工人包括农民（见专栏 4.4）。那些提供话语权表诉渠道的工作可能是赋权的，赋予工人在工作中的应得利益和共享利益。[30] 非正式工人在工作中缺少代理人，同样也被排斥在地方政府和经济团体之外。自就业工人公民协会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缺。[31] 印度自就业女性协会（SEWA）的核心战略就是通过扩大其

专栏 4.4　哥伦比亚莉萨拉尔达（Risaralda）地区的就业、动机和认同

戴维是莉萨拉尔达某个农村地区一家小商店的所有者。他出生在哥伦比亚其他地区，但是现在在莉萨拉尔达地区生活了好多年了。他喜欢住在这个安全的、和平的地区。在靠近他所居住的村庄主街道的地方，他拥有自己的商店，这大概有 15 年了。

关于他的工作，他最喜欢的一点是这份工作带给他的在社区中深深的归属感。必要时，居民会到他的商店里赊购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尽管有少数顾客欠账不付款，他还是尽心竭力地帮助村民。商店的收入仅能维持生计，他需要参与其他商业活动获得额外的收入。他觉得他的商店是他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商店的存在使他能够满足邻居的需求。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Bjorkhaug 等 2012。

专栏 4.5　话语权可以延伸到自就业领域：以自就业女性协会（SEWA）为例

自就业女性协会（SEWA）成立于 1972 年，是由印度古吉拉特省艾哈迈达巴德市布匹批发市场的一小群推手推车的移民女性组成的协会。这些女性的工作是装卸布匹，把布匹运入和运出批发市场。她们的收入基于往返的趟数，与她们往返的距离和装载的重量无关。由于没有记录，她们常常不能全额拿到她们应该拿到的收入。艾拉·巴特（Ela Bhatt）是纺织业劳动者协会女性部的负责人，她将这些女性组织起来与布商谈判争取公平的待遇。

自就业女性协会现在是国际工会联盟的成员，而且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非正规领域工人组建协会的典范。2011 年，自就业女性协会在印度有 130 万会员，其中 82 万是古吉拉特省人，其余的分散在其他八个省。成员来自多个贸易和行业领域，来自所有的宗教和种族群体。

自就业女性协会注重自力更生，提倡围绕工作保障、收入保障、粮食保障和社会保障等中心战略组织起来。自就业女性协会一开始是工会组织，现在，它开始涉足包括领导力发展、集体谈判、政策倡议、金融服务（储蓄、贷款和保险）、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培训和能力建设等其他广泛的领域。

贫穷工人，尤其是贫穷女性工人在制定规则影响她们的机构中没有话语权，这是自就业女性尤其关注的问题。协会通过能力建设，增加参与地方委员会，市、省和国家计划机构，三方委员会，最低工资和其他顾问委员会，具体行业协会和地方、省国家劳工联盟的代表，扩大其成员的话语权。

在过去的十年中，自就业女性协会还鼓励在南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建立或合作建立国家和区域性家长工人网络，在印度和肯尼亚建立了街贩国家网络，家政工人和捡垃圾者国际网络。尽管其中一些网络力量微薄，大多数网络都能够协作，平衡资源并影响政策。家政工人、以家庭为工作场所的工人、街头摊贩和捡垃圾者组成的区域性和国际网络已经促成了（针对以家庭为工作场所的工人和家政工人）两大国际公约，保证了几个国家政策、法律和法律判决的执行。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Chen 等 2012。

成员在社区中的话语权赋权其成员和伙伴（见专栏 4.5）。

工作建立人们之间的关系

一些工作使人们得以结识他们原本不会相遇的人，其中包括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背景的人（见专栏 4.6）。工作的这种联系作用有助于提高社会凝聚力。工作可以创造以任务为中心的重复性互动，并最终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32] 一项在美国进行的、以政治观点和工作场所为研究内容的研究发现，工作中的横向互动提高了人们关注那些相异观点理论依据的自觉性，提高了“让人们超越政治分歧进行政治对话”的理论觉悟。[33] 在对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岛的 200 名经理、业主和销售代表进行的调查中，81%的被调查者认为和社会生活相比，他们的工作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其他民族的人。[34]

工作中的互动有助于提高信任，在不同群体间形成正向的相互依存。18 世纪的孟德斯鸠这样写道，“和平是商业自然而然的结果。两个进行磋商的国家可以成为相互依存的国家，只要这两国中一国具有买方利益，一国具有卖方利益。”[35] 通过就业形成的关系，无论是通过贸易还是其他交易形成的，会对社会关系产生影响。

2001 年印度多民族城市的研究显示，经济依存（包括就业形成的经济依存）可以减少社区间发生暴力活动的诱因。[36] 在经济关系联系更多的城市中发生民族暴力活动的可能性较低，而那些经济联系较少的城市则更频繁地发生骚乱。俱乐部、政党、工会和企业协会等民间社团的存在有助于减少暴力活动。但是经济利益成为这两个群体的社区成员参与这些协会的共

专栏 4.6 一些工作使人们超越民族界线建立联系

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调查阐释了工作将不同背景的人员联系起来的途径。

“格鲁吉亚的萨达卡赫鲁（Sadakhlo）市场毗邻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边界，但是人们在这里却听不到因双方仇恨而引起的恶言恶语，而在边界几里开外的地方却可以听到。‘他们打架，我们不’，阿塞拜疆的一名贸易商慕可赫塔（Mukhta）边说边用自己的胳膊拥抱自己的亚美尼亚同事阿沙特（Ashot）。”[a]

“关于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大陆的边界争议，厄尔涅狄市场的一位摊贩说，‘这里没有政治问题。市场有一种语言叫经济。就是这样了。’”[b]

“在几内亚，马林凯民族的成员是花生市场链中的批发商，而花生的主要生产者常常是古尔塞族（Guerse）。马林凯批发商和古尔塞农民愿意在彼此之间进行贸易。这正在促进缓解民族和宗教紧张局势……这种贸易意愿源自双方承认存在利润的可能性。”[c]

“和在爪哇一样，在缅甸，第一件引起游客注意的事情恐怕是杂居在这里的民族：欧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和当地人。最严格的意义上，这只是杂居，因为他们和平居住在这里却并不融合。每个群体都坚持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文化语言，自己的观念和方式。只是在市场的买卖活动中……他们作为个体相逢。”[d]

在古代的科尔多瓦和西班牙，市场代表着“超越性别、部落和信仰界限等因素的聚会地方，而这些因素是伊斯兰城市化的成分。“[e]

“人不能凭空和解。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方案，必须有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纽带。由于他们在一起工作，一起清洗咖啡，一起谈话，所以他们开始谈论生意，然后他们开始谈论家庭琐事。这培育了关系，促进了和解”。[f]

“如果我不是从事这项工作，我可能只有印度朋友或非洲朋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名为食品加工商工作的销售经理说，“但是现在我有许多许多朋友。马亚罗的白人朋友、西班牙港的中国朋友。而且关系很密切。比跟你一起出生的某个人，比如你的隔壁邻居还要密切。这就是我为什么不会拿我工作交换任何东西的原因。”[g]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Kilroy 2012。
a. 《经济学家》2000。
b. 美国之音 2002。
c. Spilsbury 和 Byrne 2007。
d. Furnivall 1948，304–312。
e. Vicente–Mazariegos–Eiriz 1985，763，引自 Briggs 2004，326。
f. Fatuma Ngangiza，卢旺达团结与调解委员会，BBC 新闻 2006 的引述。
g. Kilroy 2011。

同动力。[37]

就业也可以在非城市环境中发挥联系作用。对加纳和乌干达的研究阐释了农民如何通过网络联系获得信息并提高生产率。在加纳，种植凤梨的农民借鉴自己邻居成功或不成功的经验调整自己的化肥使用量。开始种植凤梨的农民更有可能根据他们从其他农民那里获得的信息作出变动，这反映了在职互动和向他人学习具有的潜力。[38] 在一项定性研究中，加纳青年被问及什么样的特征使工作具有吸引力时，他们强调了通过工作结识新朋友并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39]

在乌干达农村地区农民中进行的一项实验发现，利用社会网络关系的糊口棉农可以改变现存的社会互动关系并获得有益的结果。随机化的干预措施将培训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与农民结组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相提并论。结组农民被鼓励讨论农业活动、问题和解决方案，并设定耕作成果增加的目标。干预措施鼓励信息交流，也鼓励通过扩大农民网络互相学习。参与该项目的农民，尤其是女性，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农民与既有社交圈之外的人建立联系有助于扩散他们原本不能共享的信息。[40]

工作可能并不总能帮助消除群体间的差异和紧张局势。尽管内在于工

作中的激励可以促使人们跨越性别、种族和民族界线互动，这些激励可能不足以建立信任或改变行动，从而对社会凝集力有所裨益。论述偏见的文献显示，跨群体接触可以改变人们对他人的认识。[41] 然而也存在风险。如果工作中的合作并不成功，群体间的紧张局势可能一触即发，尤其是之前有过冲突并互相指责的群体之间，更是这样。[42]

尽管关系网络以积极的方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它也可能是排斥性的。对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调查一致发现人们通过熟人获得工作。然而，如果缺少关系的人或群体被排除在外，这种对关系网络的依赖也可能产生负面的社会效果。在摩洛哥，在对教育、社会地位和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后，那些父亲不在正规部门工作的人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要小得多。[43] 除了获得工作的不公正性外，家庭关系也对劳动收入产生影响。例如在巴西，儿子的工资受到父母工资的影响。[44]

从农村移居城市的移民的经历突出了网络的排他性问题。移民常常选择他们拥有关系的地方作为他们的移民目的地。但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可能彻底断绝与家庭和社区的联系，而家庭和社区的联系给人们提供经济社会支持，包括提供获得工作的渠道。他们也可能缺乏融入新的居住地所需要的信息。跨越国界或地区的移民，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口，或逃离冲突或和平协议签署后返还的难民，和冲突后退伍的士兵可能尤其容易面临被排斥在工作机会之外的困境。这是冲突下或转型中环境均需关注的问题，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大量人口从农村移居城市。[45] 许多自就业工人，特别是以家庭为基地、与外界隔离的工人和缺少与他人互动机会的家政工人，也不在关系网络的覆盖之下。

工作对人们的愿望和期望具有影响

工作分配的不同方式可以影响人们的愿望和期望，并对人们是否相信自己享有社会利益产生影响。其他人具有的工作可能促进个体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的转变。儿童的未来目标可能受到其父母是否有工作及其父母所从事的工作的类型的影响。当教育和努力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或当人们察觉工作的分配缺少公平性时，人们就会产生挫败感，甚至发动社会骚乱。

阿拉伯之春同样关注政治话语权和就业，甚至更关注就业。然而由于工作机会匮乏而引起的普遍失望（特别是青年人的失望）和因工作的分配基于关系而非成就引起的失意得到了全国的响应。埃及的一位青年评论说，“到大公司工作，你要有 wasta（关系；照字面理解，就是中间人）。这和你的资格无关。你必须找人为你担保工作。在某些情况下，你要付费。”[46] 对也门共和国的社会评估记录了因工作分配基于部族、家庭背景或政党关系而引起的失意。某焦点小组的被调查者解释到，“要得到工作，就需要有人为他说话，特别是有萨那的人为他说话”。青年人说根据国家公务员制度，从父亲那里继承行政职位并不被认为是错误的。[47]

基于关系和其他个体不能掌控的环境进行的工作分配可能影响人们对社会公平性的认识。近期衡量机会不平等的工作对基本服务获得机会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基于出生时环境或在多大程度上由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引起进行了审视，这里基本服务是指教育、健康和卫生等人类发展的基本条件。[48]

专栏 4.7 测量获得工作机会的不平等程度

机会平等的概念可以上溯到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a]，概念源自这样一种思想，即个体在生活中成功的机会不应当由性别、民族、出生地或家庭背景等个体不能掌控的情景因素决定。约翰·罗默在其 1998 年的著作中确定了机会平等的原则，并主张政策应当谋求实现不受情景因素约束的机会平等。[b] 在实际应用中，本概念在对机会进行测量时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并对出生时情景而非努力或天资等个体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不平等进行了估测。[c]

人类机会指数是跨国跨区域分析儿童获得基本商品和服务机会时使用的一种方法，这里基本商品和服务包括卫生、纯净水、电和基本教育。[d] 人类机会指数既抓住了社会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程度，也抓住了在社会中具有不同情景因素的群体间平等分配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程度。

近期研究对人类机会指数方法在欧洲、中亚和拉丁美洲就业中的应用进行了检验，检验使用了 2006 年转型中生活调查和拉丁美洲晴雨表调查的数据。[e] 在这一情况下，机会被定义为具有工作且每周工作的时间超过 20 个小时，情景系指个体的性别、父亲的教育程度、父母过去与共产党的关系（在欧洲和中亚）及自述的少数民族地位；个体特征是指教育程度和年龄。那些缺少机会的人系指每周工作时间不足 20 小时的人口，失业人口或那些想增加工作的人。

人类机会指数系指机会的覆盖率，并以情景和个体特征界定的群体间不平等加以调整。不平等由“相异性”（此后简称为 D）指数衡量，相异性指数反映了为实现所有群体间机会覆盖率均等而可用于再分配的机会的比例。对相异性指数的解构显示了情景对群体间的不平等影响有多大（相对于个体特征），那一种情境因素的作用最大。情景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可以对获得周工作时间超过 20 小时的工作产生影响。直接渠道的例证之一是，属于少数群体这一情景因素可以对获得工作的机会产生影响。至于间接渠道，情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教育，而反过来，教育又会影响获得工作的机会。解构相异性指数旨在测量直接渠道，确定由预定的情景引起的不平等，工人间教育和经验差异引起的净效应。[f]

注意事项

一些使行动复杂的问题成为分析中应该注意的事项。首先，应该如何以获得工作的渠道定义机会？人们的工作偏好不同，因此，一部分不平等可能不是渠道匮乏的结果，而是人们的自愿选择。而具有特定情景和个体特征的人首先更愿意（或较不愿意）加入劳动力大军。第二，应当考虑那种情景因素？数据只是覆盖了情景因素中有限的部分，而一些情景因素根本就观察不到。文献一般都考虑了性别、少数民族地位和父母的教育程度，而父母是否与共产党有关系可以代表在欧洲和中亚国家的社会地位，即使很多年以后也是如此。然而，父母教育程度可能与个体不被注意的能力相关。控制个体的教育水平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却不能完全应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接受同等教育的孩童中，那些父母受过教育的孩童可能因不为人知的投入而获得更好的技能。方法没有作出情景缺失的假设，然而情景缺失的状况可能是存在的，因为同一调查通常不提供关于所有情景因素的信息。不平等或相异性指数具有这样的特性，即指数将永远随着情景因素或个体特征的增加而增加。尽管存在这些注意事项，该方法是将机会不平等分析用于就业获得渠道的第一步。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bras 等 2012。

a. Nozick 1974；Rawls 1971。

b. Roemer 1998。

c. Roemer 等 2003。

d. Paes de Barros 等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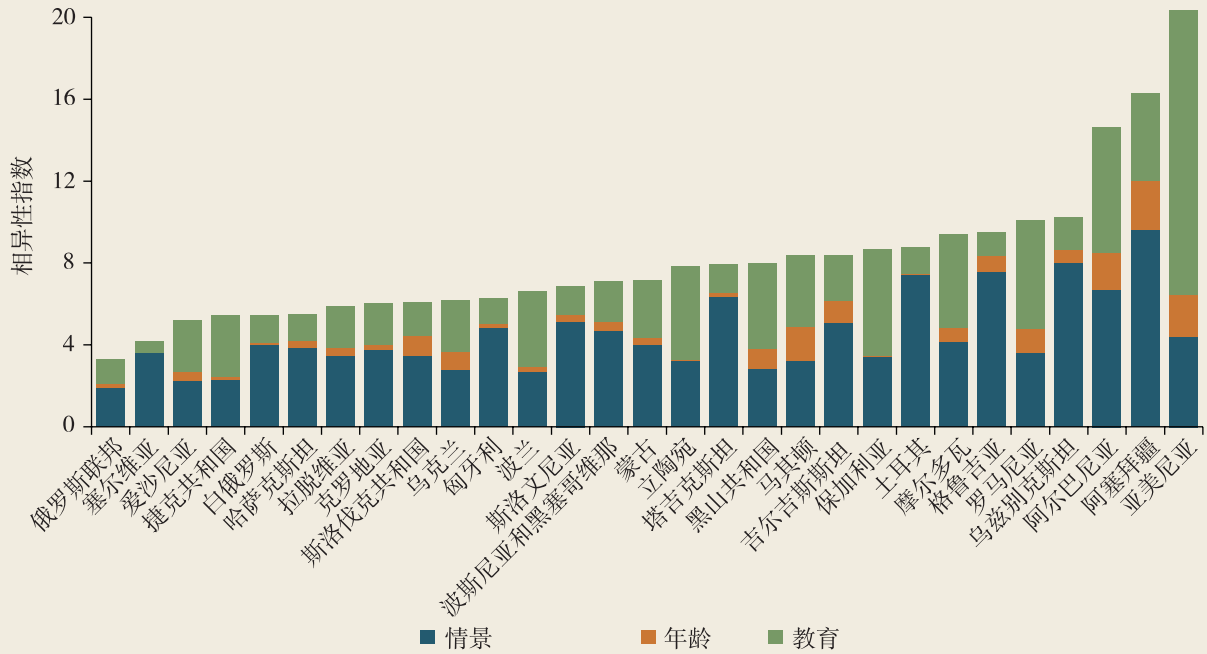
e. 转型中生活调查 I（数据库），欧洲复兴发展银行，伦敦。

f. 估测间接渠道，即估测情景因素通过教育造成的影响将面临困难，这是因为教育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而不仅仅是可以获得信息情境因素。而且，将通过教育产生影响的情景因素排除在外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测量就业获得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情景因素。尽管情景也可能影响教育程度，这些效果将发生在生命中很早的阶段（主要是在儿童时期），因此并不反映就业机会的不平等。

本方法适用于工作可得性时，考虑了出生时状况或个体特征与机会获得的相关性，其中出生时情景包括性别、种族及父母的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个体特征包括教育程度和年龄等。[49] 来自欧洲和中亚 29 国的结果显示，群体间基于出生时情景和个体特征的不平等在 3%到 20%之间波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出生时情景对不平等造成的影响很大，它引起的不平等占总体不平等的一半以上（见图 4.5）。

出生时情景对阿塞拜疆造成不平

图 4.5　就业机会不平等因国家而异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bras 等 2012；基于转型中生活调查 I 的数据（数据库）；欧洲复兴发展银行，伦敦。
注释：机会被定义为拥有周工作时间达到或超过 20 个小时的工作。情景包括性别、民族、父母教育程度及其政治关系。相异性指数系指为了实现所有群体间机会覆盖率均等而可用于再分配的机会的比例。

等的影响最大，紧随阿塞拜疆其后的是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在这些国家，出生时情景是造成获得工作机会不平等的罪魁祸首。在某些国家，教育是造成不平等的特大原因，亚美尼亚首当其冲，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紧随其后。

对拉丁美洲 18 国的类似分析证明了这些研究结果，该分析使用了 1990 年拉丁美洲晴雨表调查。总的来说，工人的教育程度及其出生时情景是造成他们或她们工作机会获得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而教育在正规领域的正规就业中发挥着尤其重要的作用。[50]

* * *

就业和社会凝聚力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理清二者的关系也并不容易。这一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方兴未艾。就业对个体层面的信任和公民参与的影响显示，基于就业的交流和关系可以对社会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包括如何治理群体间的紧张局势和集体决策。然而某些工作和其他工作相比，可以为社会凝聚力的提高作出更大的贡献。最重要的未必是人们是否具有工作，而是工作及其特征可以为提高社会凝聚力作出更大的贡献。在特定情景下，如果工作影响社会身份和社会规范，如果工作改变了家庭中、社区中或社会中的谈判力，或如果工作改变了群体间的权力关系，工作可以使社会实现转型。影响社会认同、以网络联系人们和增加工作获得公平意识和贤能优先意识的工作具有促进社会凝聚力提高的潜力。

问题 4 政策可以提高社会凝聚力吗?

在摩洛哥拉巴特，失业大学生日日聚集在政府大楼前抗议工作机会的匮乏。[51] 在南苏丹朱巴，新政府面临着让 15 万战士复员、使国内大量流离失所的人口在冲突后重新融入社会的挑战。[52] 对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国家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决策者而言，扩大就业机会迫在眉睫，这既有社会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

无论是在工业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普遍认为拥有工作是关系到社会凝聚力，即社会如何和平管理集体决策的重大问题。工作可以建立认同，或可能与信任或更多的社会参与相关，这种观点常常被认为只有在富裕国家的少数几个行业中才贴近现实。那些工作被视为发展中国家负担不起的奢侈工作。即使那些承认某些工作可以更多地提高发展中国家社会凝聚力的人士，也对政策的作为远远不止于就业岗位创造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在大多数工作由私营领域产生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影响就业的性质或政府是否能够影响就业的性质尚不清楚。一些人士甚至怀疑工作自身能否提高社会凝聚力。他们认为，在制度、历史、政治和社会因素等错综复杂的网络中，工作只是促进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改变的其中一个因素。考虑到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以就业提高社会凝聚力不能成为选择。

公共资助就业计划的负面经历为这种怀疑论调提供了某些佐证。将人们安置在没有前途的、没有未来就业希望的临时就业计划造成的伤害可能大于利益。[53] 同样，冲突后复员计划由于目标对象引起的分歧，具有加剧前敌对双方紧张局势的风险。[54] 如果公共资助计划的工作被分配给了政府官员的亲朋好友，或者计划本身陷于腐败或治理风险，社会凝集力事实上还会受到削弱。然而，这些负面经历可能揭露了计划的设计不佳，而不是证明就业政策不能促进社会凝聚力。

通向信息、权利和话语权

通过为面临就业障碍的群体扩大就业机会并扩大他们的话语权和权利，政策可以提高社会凝聚力。如果人们认为工作的分配基于特权和关系而不是德行和成就，他们可能会产生挫败感。扩大就业机会的公平性和均等性，就要向公众发布关于工作及如何得到工作的信息，并告知他们存在的法律机制，例如反歧视法和减少歧视现象、支持包容机会匮乏群体的积极行动方案。但是具有书面法律还不够。增加公平性涉及执行制度和问责与纠偏机制。尽管这类措施可能是由多个目标驱动的，它们也可以被视为是从社会凝聚力的视角出发的。

通过确保空缺职位的信息广为人知，以及关于如何使用公共就业计划的信息的传播，透明度和就业信息可得性可以增加机会的公平性和均等性。获得关于权利的信息对保证劳动实践的公平性同样重要。农民、自就业工人和没有正式劳动合约的工人常常不清楚他们与土地所有者、贸易商、地方机构和雇主有关的权利，不清楚他们有上诉的选择。合作社、非正式工人协会和工会等民间社团组织可以扩

散关于权利及表诉不满渠道的信息。[55]

相关挑战是将有效的法律保护延伸到那些在法律框架外工作的人口。在国际层面，以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条文对家政工人和在家里生产的工人进行培训扩大了对这些群体的法律保护（见专栏 4.8）。在国家层面，赞比亚和菲律宾等国家在国内立法中纳入了对非正式工人的法律保护。巴西在其宪法中承认了家政工人并扩大了其社会保障，包括保证家政工人的孕产假利益。国家社会保障机构为雇用家政工人的雇主进行登记提供激励。尽管在实践中难以付诸实施，巴西、捷克共和国、菲律宾和南非确定了家政人员的最低工资。[56]

同样，移民工人也在法律框架之外。移民输出国和移民输入国均可以采取措施扩大法律保障。菲律宾政府建立了保护其海外工人的机制。政府为移民工人提供出发前的信息和支持服务，政府也与输入国签署了承认移民工人权利的双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政府也提倡针对海外工人的自愿性社会安全计划。[57]

问责制度的存在及其性质可以对权利在实践中的执行力度产生影响。[58] 法律框架依赖劳工部、监察机构和法庭的能力解决纠纷并让各方承担责任。大多数国家允许劳动纠纷在特别法庭或民事法庭听审。然而法律诉讼可能是耗时的、昂贵的和麻烦的。为此，许多国家建立了解决纠纷的替代性程序，包括法庭听审前的和解、调停和仲裁。[59] 哥伦比亚 2003 年引入了仲裁委员会帮助管理劳工不满问题，改善日益增长的服装业中的工业关系（见专栏 4.9）。

反歧视政策

反歧视法和积极行动措施等法律机制有助于那些被排斥在机会之外或遭遇耻辱困扰的群体获得工作。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中都有保障平等的条款，一般包括在国家的义务之中。国家常常以应对就业分割、不平等报酬、招聘中的偏见、工作中的性骚扰和教育与培训的匮乏等问题的法律法案对其加以辅助补充。[60] 积极行动计划包括雇用女性、少数民族和其他被排斥的群体成员的积极措施。[61] 这类计划可以是强制性的或志愿性的，适用于公共或私人领域。

积极行动计划可能奏效，然而也存在着许多陷阱。评估结果毁誉不一。[62] 最广泛的研究来自美国，研究发现，当计划是临时性的，并与招聘、培训

专栏 4.8　家政人员：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之旅

家政人员包括从事洗涮、烹调、园艺、儿童护理和老人护理的人员。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世界上的家政人员达 5 260 万之多；其他估计几乎是这一数字的两倍。女性，通常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占家政人员的 80%以上。[a] 许多家政工人是移民，童工，尤其是女孩司空见惯。在大多数国家中，家政人员，特别是移民家政人员被排斥在劳动者和社会保障法律之外。

长期以来，家政人员一直努力在各自所在的国家获得承认并纳入劳动保护法律体系之中。2006 年，家政人员组织在国际工会和代表非正式工人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开始在国际上组织起来。他们的主要要求是承认和获得权利，包括一场要求以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形式保障家政人员劳动权利的运动。

运动包括在国家层面的广泛协作，动员人员，获得劳工部、工会和雇主协会的支持。结果，牙买加家政人员的工资提高了 10%，为改善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印度尼西亚家政人员的状况还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

2011 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家政人员公约和家政工人建议。公约规定国家劳动法和劳动规章覆盖家政人员，其中包括与社会保护计划有关的部分。

争取获得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保护的过程促进了组织和个体领袖的能力建设，并使家政工人协会在工会中取得一席之地。它也为承认并行使权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2012 年 3 月，新加坡政府宣布新加坡将要求雇主每周给国内的 20.6 万家政工人放假一天，这些家政工人大多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和印度。[b]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Chen 等 2012。
a. 国际劳工组织 2011a。
b. Kennedy 2012。

专栏 4.9 柬埔寨服装业：从书面上的法律到执行中的法律

服装业是柬埔寨正规领域中最大的雇主。到 2008 年中期，服装业工厂超过了 300 个，工人将近 34 万人，其中 90%是女性工人。劳动条件包括工资低、过度加班、职业健康和安全状况糟糕、童工及随着服装业扩张而兴起的反工会活动成为重大问题。政府的第一反应是 1997 年通过新的劳动法。然而法律执行不力。劳动监察局缺乏信誉，监察官工资低，资源不足，人们认为他们屈从于影响。法庭被认为是腐败的，对工人或雇主的需求熟视无睹。结果，罢工和游行示威增加了，主要国际品牌更加关注它们能否在柬埔寨生存下去。

面对这种情况，1999 年柬埔寨与美国达成了双边协议。以其他贸易协定的类似条款为基础，美国同意，如果半年期审核显示柬埔寨在遵守国际核心劳动标准和柬埔寨法律所规定的标准方面取得了进步，美国就增加柬埔寨的进口配额。协议签署后，美国对国际劳工组织的两大项目提供资助，支持该条款的执行。第一个项目，即后来被称为柬埔寨更佳工厂的项目，参与监督服装厂的工作条件。

第二个项目建立了预防和解决劳动纠纷的仲裁委员会。委员会的 30 名兼职成员通过了国际劳工组织的任命程序，并得到工会、雇主组织和政府的认可。委员会对劳工部调解不能解决的集体劳动纠纷进行委托性的但（一般）不具约束性的仲裁。委员会处理的纠纷中，大部分涉及遵守劳动法相关的工资、奖金、利益和工作条件等内容。一些诉讼也涉及权利，包括反工会活动、性别平等、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等。

自 2003 年建立以来，委员会听审了 1200 多件纠纷诉讼，其中成功解决的纠纷达到 70%。舆论调查显示，人们非常信任委员会的独立性和效率。2010 年，柬埔寨服装制造业协会及主要工会联盟同意将现存劳动权利的纠纷仲裁程序转入委员会。结果，委员会作出的裁决迅速增加，满怀异议的争议方减少。每工厂发生的罢工降低至 10 年来的最低水平。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dler 等 2012。

和现场培训相结合的时候，计划的效果最好。[63]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比较有限。在南非，支持黑人、女性和残疾人口的积极行动与公司的激励措施（包括获得许可证和合同）相得益彰。评估发现，计划对缩小就业差异和工资差异的影响有限，但是缩小了最顶端工资分配的差异。该发现表明，计划可能对在技能等级中处于较高位置的个体有裨益，但是对此前处于弱势的一般人口没有帮助。[64]

针对代表名额不足的群体的雇员配额可以被宪法奉为圭臬，如印度对特定种姓和部落和马来西亚对土著人那样。两国的实践均显示，配额制运作良好，但是可能被政治化。[65] 以具体计划支撑的配额制很成功。以孟加拉国为例。孟加拉国的女性就业率非常低，最贫穷人口就业创造计划为女性预留了 30%的配额，这使参与该计划的女性人数在当年翻了一番，据悉参与者的满意度很高。[66]

就业计划可以塑造社会认同并使人们联系起来

获得工作可以增强自尊心，为社会带来收入以外的效益。支持高危人群（包括青年）就业的计划要重视工作影响人们态度、价值观和行为及改善群体间关系的方式。按理说，在青年失业率很高的国家里，针对性培训项目在设计时具有强化自尊的可能性，这可以扩大社区参与，减少犯罪和暴力活动。相关证据仍然有限，而且不确定，但是某些针对青年的培训项目不断涌现的结果，包括那些冲突后环境中涌现的结果多少给人以希望。

北乌干达社会行动基金认为，职业培训、生活技能和咨询的联合作用可以扩大社区参与，减少冲突后环境中青年之间的攻击行为（见专栏 4.10）[67]。一项针对利比亚高危青年的再融入和农业生计计划使社会参与出现了适度增长，非法活动也降低了。参与者对邻国科特迪瓦暴力活动人员招募的兴趣也降低了。然而，计划对降低攻击和暴力活动的影响并不明显。[68] 对多米尼加共和国青年就业计划的评估发现，针对失业青年的职业与生活技能联合培训可以减少参与帮派的活动并延迟青少年怀孕时间。[69] 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证据很少，对就业和培训计划的评估很少将社会凝聚力成果标准，例如社区参与和冲突

解决等纳入评估中。

临时就业计划可以为危险和脆弱人群的青年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渠道，尤其是在危机期间或冲突后。[70] 这些计划对就业能力的支持毁誉不一，因为它们通常涉及的是地位很低、鲜能带来未来收入机会的工作。但是也有迹象表明，在设计计划时可以投资有益于社会凝聚力的技能。萨尔瓦多的临时收入援助计划针对暴力活动发生率很高地区的女性和青年。早期结果显示计划增强了受益者的自尊心，减少了暴力活动的再发生。[71]

公共工程计划高度依赖社区参与识别地方项目，为集体决策提供了讨论场所。社区会议可能将受到冲突和危机影响的人群集中起来（见专栏 4.10）。在卢旺达，针对国家公共工程计划的会议除了讨论与项目相关的问题，还讨论和平建设、安全、社区发展和和解。2011 年，燃料匮乏和建筑材料价格上涨搁置了也门共和国的公共工程活动。然而，社区同心协力发现了解决这些障碍因素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其中包括使用地方材料，寻找替代性运输模式。[72]

计划的参与性可以为被排斥群体提供表诉意见的渠道。在对埃塞俄比亚的生产安全网计划的参与者进行的调查中，2/3 的被调查者说该计划了给了他们第一次参与地方会议的机会，该计划的受益人口达到 760 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工程计划之一。在此计划实施以前，许多参与者与地方政府官员没有接触沟通。[73]

与私营领域合作的就业计划可以通过就业使人们联系起来。突尼斯的一个计划采用协作大学论文的过程教授学生基本的企业家能力。学生在教授和私营领域老师的指导下制订商业计划。计划的初步结果显示，计划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赋予了他们冒险的信心。突尼斯一位男性参与者解释道，“我变得更加独立了。我的行为发生了变化。我使用我的新技能，我更加克制自己。”学生还解释说计划通过给予他们与导师互动的机会，扩大了他们的职业网络。“现在我有了社会网络，我知道去咨询谁，”一名女性参与者解释说。[74]

专栏 4.10　在冲突后环境中，精心设计的计划会减缓社会紧张局势

乌干达北部地区青年的机会

二十年的叛乱、不稳定和冲突造成乌干达北部地区贫困率很高。截至 2005 年，该地区再次采纳了和平与稳定的措施，对前战斗人员和其他受到战争影响的人口的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提供了契机。2006 年，政府启动了青年机会计划，刺激年龄在 16~35 岁之间青年人口的收入产生和就业增长。计划以成功的补贴方案为参与小组的职业培训和商业材料提供现金补贴。小组的平均成员为 22 个，大多数成员表达了对裁剪、木工、金属加工、机械或美发的兴趣。

干预措施实施两年后的评估发现对技能的投资增加了，技能工作参与增多了，收入增加了，储蓄提高了。获得补贴的人参与社区会议的人数要高出 4 个百分点，成为社区动员者的人数要高出 9 个百分点。参与者认为他们更多地受到家庭和社区的社会支持。而且，和参照组相比较，接受补贴的男性的攻击性行为降低了 31%。这一发现与将攻击行为与压力程度、低社会地位和可观察到的不公正相联系的理论是一致的，较高的就业率和收入可以减缓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

斯里兰卡北部省区的公共工程

在斯里兰卡，工作换现金计划一开始是为再安置内部冲突结束后返回的 10 万名人员而建立的，这项计划实际上帮助了 25 万名返回人员，并迅速演变为北部省区最大的就业源泉之一。

参与者指出，在很多情况下计划会议是他们从安置国内流离失所人口的营地返回后参加的第一次社区层面的聚会。许多人认为，社区会议、共享的事务、团队工作及老人和儿童作为计划的间接受益者介入计划给新安置的家庭带来了归属感。

Sachchithananthan Subodhini 是一位 36 岁的女性，她来自北部省 Puthukkudiyiruppu 地区的 Thervipuram，她说她“很高兴。工作换现金使整个村庄在工作中成为一个集体”。回想起她自 1995 年流离失所后的生活经历，她说该计划“有助于社区的团结……村庄似乎荒废了，但是（志愿工作）帮助社区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资料来源：Blattman，Fiala 和 Martinez 2011（乌干达北部地区）；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ndrews 和 Kryeziu 2012（斯里兰卡）。

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会对社会凝聚力产生影响，那些塑造社会认同、建立网络关系、增加公平性，尤其是增加被排斥群体公平性的工作可以缓解紧张局势。增加工作分配和工作过程中的公平性也对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影响。支持包容性、扩大话语权和权利、提高劳动力市场透明度和问责的措施可以提高平等。这些措施还可以提高人们所认为的自己在社会中的利益。当青年失业和冲突引起的社会骚乱风险很高时，这一概念可能尤为重要。尽管治理不良或目标分散的政策可以降低社会凝聚力，精心设计的计划可能具有积极效应。针对危险时期青年的就业政策可以纳入冲突解决方案的咨询和培训。公共工程计划可以促进公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社区参与和雇用。

注释

1. 世界劳工组织（2011b）估测失业率对社会骚乱的影响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2. Evans-Pritchard 2010。

3. Solletty 2011。法语原文是："[L] es manifestants ne demandent pas à l'Etat de leur trouver du travail mais dénoncent le fait que, sur le marché de l'emploi, les choses ne se font jamais dans la transparence et avec justice."

4. Hudson 等 2011。

5. 本定义基于 Woolcock 2011。

6. 基于全球治理指标中的指标，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载于 Kaufmann，Kraay 和 Mastruzzi 2010。

7. Fukuyama 1995；North 1990；Putnam 2000。

8. Delhey，Newton 和 Welzel 2011。

9. 工作的这些特性也与价值观相关，价值观包括对他人的宽容，性别平等偏好、个体选择和话语权（尽管没有参照其他因素）。见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Welzel 2012。

10. 基于 FAFO（Fafo 研究基金会）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进行的好工作调查数据。以收入、年龄、教育和家庭特征指数为参照的工作属性的概率回归基于下述问题，"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不算你为家庭、为工作或在志愿组织中所做的，你多久积极帮助其他人一次?"

11. Easterly，Ritzen 和 Woolcock 2006；Knack 和 Keefer 1997。Fukuyama（1995）指出，社会中的信任体现了经济转型和制度的性质。同样，Arrow（1972，357）写道，"实际上任何一次商业交易本身就带有信任的成分，在一段时期内进行的任何一次交易无疑都是如此。世界上的经济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缺乏互相信任的观点似乎是有争议的。"North（1990）讨论了信任和非正规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作用。

12. Noteboom 1999；Ostrom 1990；世界银行 2004b。关于概述，见 Boschma（2005，51-52）。

13.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Giles，Mavridis 和 Witoelar 2012。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库），兰德公司，圣莫尼卡，加利福尼亚州，http://www.rand.org/labor/FLS/IFLS.html。收录的社区活动包括参与社区会议，合作性、志愿性劳动，邻里关系改善，邻里监督（员）或女性协会。这些趋势可能由一系列因素引起，包括为社区对话创造了更多空间的 1998 年政治改革和 1999 年开始的公共服务下放，2004 年引入的、以备预算咨询的多利益攸关方论坛，多利益攸关方论坛包括村庄会议，要求父母参与的学校管理倡议，明确促进社区参与的发展计划的扩大等。

14.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Giles，Mavridis 和 Witoelar 2012。KDP（Kecamatan 发展项目）等发展和反贫计划及其在城市的相对物 UPP（城市减贫计划）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倡社区参与，并在新的、扩大的综合体 PNPM（社区赋权国家计划）中得到继续提倡。其他减贫计划（包括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Keluarga Harapan 计划）通常都有社区参与的成分。

15. 这些结果与威斯康星大学纵向研究的发现相近，威斯康星大学纵向研究对将近 5 000 名 1957 年高中毕业的人进行了长达 45 年的跟踪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丢失工作可能导致人退出社团生活。哪怕是一次下岗，尤其是当下岗发生在人的壮年工作时期时，将导致"生命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可能性长久的、实质上和统计意义上都很大地降低"，这尤其表现在教堂、青年和社区群体中。见 Brand 和 Burgard 2008。

16.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rias 和 Sosa 2012。

17.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Petesch 2012。

18. Altindag 和 Mocan 2010。

19. Helliwell 和 Putnam 2004。

20. Bell 和 Blanchflower 2010；专门为《2011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Cramer 2010。

21. Moser 2009，240。

22. 专门为《2011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Cramer 2010；Padilla 1992。Noteboom 1999；Ostrom 1990；世界银行 2004b。关于概述，见 Boschma（2005，51-52）。

23. Akerlof 和 Kranton 2010。

24. Fitzgerald 2006；Holzer 和 Lerman 2009；Osterman 2005。

25. Wilson，Eaton 和 Kamanu，2002。

26.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Dudwick 2012；专门为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Hossain 2011。

27. Amin 等 1998，191。

28. Feldman 2009，引自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Dudwick 2012；专门为《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Hossain 2011。

29. Amin 等 1998。

30. Marsden 2000。

31.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Chen 等 2012。

32.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Kilroy 2012；Pickering 2006。

33. Mutz 和 Mondak 2006，153。

34. Kilroy 2011；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Kilroy 2012。

35. Montesquieu 1951。

36. Varshney 2002。

37. Chandra 2001。

38. Udry 和 Conley 2004。

39. Anarfi，Anyidoho 和 Verschoor 2008。

40. Vasilaky 2010。

41. Allport 1954。Pettigrew 和 Tropp（2011）提供了群体间研究的元分析。

42. Austin 和 Worchel 1979。

43. Gatti 等 2012。

44. Arias，Yamada 和 Tejerina 2004。同时见 Wang 2011。

45. 专门为《2011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Willman 和 Makisaka 2010。

46. Singerman 2007，33。

47. Marc 等 2012，50。

48. 世界银行 2005。

49.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bras 等 2012。

50.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bras 等 2012。

51. Amos 2012。

52. 国际移民组织 2012。

53. 关于公共工程计划的经验评估，请查阅 Betcherman，Olivas 和 Dar 2004；Harvey 2011；Martin 和 Grubb 2001；McCord 和 Slater 2011。

54. Dudwick 和 Srinivasan，待出版；USAID 2009。

55. Chen 等 2007。

56.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Fredman 2012。

57.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Fredman 2012；McKenzie，Theoharides 和 Yang2012。

58. Locke，Amengual 和 Mangla 2009。

59. Purcell 2010。

60.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Fredman 2012。

61. Holzer 和 Neumark 2000。

62. 世界银行 2011。

63. Holzer 和 Neumark 2000。

64. Burger 和 Jafta 2010。

65. Bardhan，Mookherjee 和 Parra 2012；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Das 2012；Datta 1999；Deshpande 2008；Funston 2001；Gudavarthy 2012；Montlake 2010；Teoh 2008；Weisskopf 2004；Yadav 2010。

66.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Das 2012。

67. Ibarraran 等 2012。

68. Blattman 和 Annan 2011。

69. Blattman，Fiala 和 Martinez 2011。

70. 公共工程计划可以迅速扩大规模，覆盖大量人口。阿根廷 2002 年危机后引入的户主计划的规模迅速扩大，每月覆盖的人口达到 200 万。包括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利比里亚、尼泊尔、塞拉利昂、苏丹和也门共和国等在内的冲突后国家启动并扩大了这类计划。

71. 肯尼亚、塞拉利昂和南非的计划也为青年成为企业家提供职业培训和支持。

72.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ndrews 和 Kryeziu 2012。

73.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ndrews 和 Kryeziu 2012。

74. Brodmann，Grun 和 Premand 2011，3。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bras, Ana, Alejandro Hoyos, Ambar Narayan, and Sailesh Tiwari. 2012.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in the Labor Market: Evidence from Life in Transition Surveys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Adler, Daniel, and Hans Hwang. 2012. "From Law on the Books to Law in Action: A Note on the Role of Regula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Good Jobs in Cambodia's Garment Sector."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Akerlof, George A., and Rachel E. Kranton. 2010. *Identity Economics: How Our Identities Shape Our Work, Wages, and Well-Be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port, Gordon. 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Altindag, Duha Tore, and Naci H. Mocan. 2010. "Joblessness and Perception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Democracy." Working Paper Series 1599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min, Sajeda, Ian Diamond, Rushira T. Naved, and Margaret Newby. 1998.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of Female Garment-Factory Workers in Bangladesh."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29 (2): 185–200.
Amos, Deborah. 2012. "In Morocco, Unemployment Can Be a Full-Time Job." *National Public Radio,* January 27.
Anarfi, John Kwasi, Nana Akua Anyidoho, and Arjan Verschoor. 2008. "The Economic Empowerment of Young People in Ghan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Andrews, Colin, and Adea Kryeziu. 2012. "Public Works and the Jobs Agenda: Pathways for Social Cohesio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Arias, Omar, and Walter Sosa. 2012. "Do Jobs Cause Trust? Results from Pseudo-Panel Analysis of Euro and Latino Barometer Survey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Arias, Omar, Gustavo Yamada, and Luis Tejerina. 2004. "Education, Family Background and Racial Earnings Inequality in Brazi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25 (314): 355–74.
Arrow, Kenneth. 1972. "Gifts and Exchang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 (4): 343–62.
Austin, William G., and Stephen Worchel. 1979.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Monterey, CA: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Bardhan, Pranab K., Dilip Mookherjee, and Monica L. Parra. 2012.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Reservations in West Bengal Local Governments on Anti-Poverty Targeting." *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1 (1): 1948–837.
BBC News. 2006. "Coffee Key to Reconciling Rwandans." *BBC World News*, August 30.
Bell, David N. F., and David Blanchflower. 2010. "Youth Unemployment: Déjà Vu?"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4705,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Betcherman, Gordon, Karina Olivas, and Amit Dar. 2004. "Impacts of Active Labor Market Programs: New Evidence from Evaluations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40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jørkhaug, Ingunn, Anne Hatløy, Tewodros Kebede, and Huafeng Zhang.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Colombi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Blattman, Christopher, and Jeannie Annan. 2011. "Reintegrating and Employing High Risk Youth in Liberia: Lessons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of a Landmine Action an Agriculturual Training Program for Ex-Combatants." Policy report 2011.1, Yale University, 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 New Haven, CT.
Blattman, Christopher, Nathan Fiala, and Sebastian Martinez. 2011.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Rural Africa, Mid-Term Results from an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the Youth Opportunities Program in Northern Uganda." Yale University, 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 New Haven, CT.
Boschma, Ron. 2005. "Social Capit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Third Italy." In *Learning from Clusters*, ed. Ron Boschma and Robert Kloosterman, 139–68. Dordrecht: Springer Verlag.
Brand, Jennie, and Sarah Burgard. 2008. "Job Displace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Findings across the Life Course of a Cohort of Joiners." *Social Forces* 87 (1): 211–42.
Briggs, Xavier de Souza. 2004. "Civilization in Color: The Multicultural City in Three Millennia." *City & Community* 3 (4): 311–42.
Brodmann, Stefanie, Rebekka Grun, and Patrick Premand. 2011. "Can Unemployed Youth Create Their Own Jobs? The Tunisia Business Plan Thesis Competition." Fast Brief 83 (March), MNA Knowledge and Learning,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urger, Rulof, and Rachel Jafta. 2010. "Affirmative Action in South Africa: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n Labour Market Outcomes." Working Paper Series 76, Centre for Research on Equality, Human Security and Ethnicity,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Chandra, Kanchan. 2001. "Civic Life o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39 (1): 110–18.
Chen, Martha, Chris Bonner, Mahendra Chetty, Lucia Fernandez, Karin Pape, Federico Parra, Arbind Singh, and Caroline Skinner. 2012. "Urban Informal Workers: Representative Voice and Economic Right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Chen, Martha, Renana Jhabvala, Ravi Kanbur, and Carol Richards. 2007. *Membership-Based Organizations of the Poor.* London: Routledge.
Cramer, Christopher. 2010. "Unemploy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Violenc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1.
Das, Maitreyi Bordia. 2012. "Stubborn Inequalities, Subtle Processes: Exclusion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Datta, Nonica. 1999. "Backward Caste Movement Gains Groun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4 (39): 2630–31.
Delhey, Jan, Kenneth Newton, and Christian Welzel. 2011. "How General Is Trust in 'Most People'? Solving the Radius of Trust Probl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 (5): 786–807.
Deshpande, Satish. 2008. "Changing Social Composition." *Seminar* 587 (July): 23–26.
Dudwick, Nora. 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s and Social Cohesion: Some Examples from Ethnograph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Dudwick, Nora, and Radhika Srinivasan, with Jose Cueva and Dorsati Madani. Forthcoming. *Creating Jobs in Africa's Fragile States: Are Value Chains an Answer*? Directions in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urkheim, Emile. 189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Easterly, William, Jozef Ritzen, and Michael Woolcock. 2006. "Social Cohesion,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8 (2): 103–20.

Eaton, Charles, and Andrew W. Shepherd. 2001. *Contract Farming: Partnerships for Growth*. Rom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Evans-Pritchard, Ambrose. 2010. "IMF Fears 'Social Explosion' from World Jobs Crisis." *Telegraph*, September 13.

FAFO (Forskningsstiftelsen Fafo [Fafo Research Foundation]). 2012. "Good Jobs Survey." FAFO Institute for Appli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slo.

Fitzgerald, Joan. 2006. *Moving Up in the New Economy: Career Ladders for U.S. Worke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eldman, Shelley. 2009. "Historicising Garment Manufacturing in Bangladesh: Gender, Generation, and New Regulatory Regim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11(1): 268–82.

Fredman, Sandra. 2012. "Anti-Discrimination Laws and Work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 Thematic Overview."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Fukuyama, Francis.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Funston, John. 2001. "Malaysia: Developmental State Challenged." I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ed. John Funston, 160–202.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Furnivall, John S. 1948.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tti, Roberta, Diego Angel-Urdinola, Joana Silva, and Andras Bodor. 2012. *Striving for Better Jobs: The Challenge of Informalit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iles, John, Dimitris Mavridis, and Firman Witoelar. 2012.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Cohesion,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Indonesi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Gudavarthy, Ajay. 2012. "Can We De-Stigmatize Reservations in Ind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7 (6): 55–62.

Harvey, Philip. 2011. "A Job-Led Recovery Strategy Achieving Economic Recovery through Direct Public Job Creation." Dēmos, NY.

Helliwell, John, and Robert Putnam. 2004. "The Social Context of Well-Be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59: 1435–46.

Holzer, Harry, and Robert Lerman. 2009. *The Future of Middle-Skill Jobs*. Washington, DC: Center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Brookings Institute.

Holzer, Harry J., and David Neumark. 2000. "Assessing Affirmative A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8 (3): 483–568.

Hossain, Naomi. 2011. "Exports, Equity, and Empowerment: The Effects of Readymade Garment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on Gender Equality in Bangladesh."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Hudson, Maria, Rosemary Davidson, Lucia Durante, Jemma Grieve, and Arjumand Kazmi. 2011. *Recession and Cohesion in Bradford*. York, U.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Ibarraran, Pablo, Laura Ripani, Bibiana Taboada, Juan Miguel Villa, and Brigida Garcia. 2012. "Life Skills, Employability and Training for Disadvantaged Youth: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Design." IZA Conference Paper,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May 12.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1a. *Global and Regional Estimates on Domestic Workers*. Geneva: ILO.

———. 2011b. *World of Work Report: Making Markets Work for Jobs*. Geneva: ILO.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12. "IOM Tracking of Spontaneous Returns Project: Total Returns to South Sudan Post CPA to June 2009." Geneva, IOM.

Jenson, Jane. 1998. "Mapping Social Cohesion: The State of the Canadian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3, Canadian Policy Research Networks, Ottawa.

Kaufmann, Daniel, Aart Kraay, and Massimo Mastruzzi. 2010.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Issu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43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ennedy, Alex. 2012. "Singapore to Require One Day Off a Week for Maids." Associated Press, March 5.

Kilroy, Austin. 2011. "Business Bridging Ethnicity." PhD thesi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 2012. "Jobs to Social Cohesion: Via Interests, Attitudes, and Identiti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Knack, Stephen, and Philip Keefer. 1997.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4): 1251–88.

Locke, Richard, Matthew Amengual, and Ashkay Mangla. 2009. "Virtue out of Necessity? Compliance, Commit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 Conditions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Politics & Society* 37 (3): 319–51.

Marc, Alexandre, Alys Willman, Ghazia Aslam, Michelle Rebosio, with Kanishka Balisuriya. 2012. *Societal Dynamics and Fragility: Engaging Societies in Responding to Fragile Situation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arsden, David. 2000. "A Theory of Job Regulation,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nd the Organisation of Labour Institutions." *Industrielle Beziehungen* 7 (4): 320–47.

Martin, John P., and David Grubb. 2001. "What Works and for Whom? A Review of OECD Countries' Experiences with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8 (2): 9–60.

McCord, Anna, and Rachel Slater. 2011. *Overview of Public Works in Sub-Saharan Africa*.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McKenzie, David, Caroline Theoharides, and Dean Yang. 2012. "Distor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nt Labor Market: Evidence from Filipino Migration and Wage Responses to Destination Country Economic Shock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604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Montesquieu, Baron de. 1951. *2 Oeuvres Completes: De l'Esprit des Lois* (2 Complete Works: Spirit of the Laws). Paris: Gallimard/Pleiade.

Montlake, Simon. 2010. "Malaysia Cautiously Challenges Longtime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30.

Moreno, Jacob L., and Helen H. Jennings. 1937. "Statistics of Social Configurations." *Sociometry* 1: 342–74.

Moser, Caroline O. N. 2009. *Ordinary Families, Extraordinary Lives: Assets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Guayaquil, 1978–2004*.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Mutz, Diane, and Jeffery Mondak. 2006. "The Workplace as a Context for Cross-Cutting Political Discourse." *Journal of Politics* 68 (1): 140–55.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on, Andrew, and Arjan de Haan. 2012. "Social Cohesion: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ith Respect to Job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Noteboom, Bart. 1999. *Inter-Firm Alliances: Analysis and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Nozick, Robert.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2: Social Cohesion in a Shifting World*. Paris: OECD.

Osterman, Paul. 2005. "Making Bad Jobs Good: Strategies for the Service Section." In *Job Quality and Employer Behaviour*, ed. Stephen Bazen, Claudio Lucifora, and Wiemer Salverda. 237–252.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dilla, Felix M. 1992. *The Gang as an American Enterprise*. Piscataway,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Paes de Barros, Ricardo, Francisco H. G. Ferreira, Jose R. Molinas Vega, Jaime Saavedra Chanduvi. 2009. *Measuring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erry, Guillermo E., William F. Maloney, Omar S. Arias, Pablo Fajnzylber, Andrew D. Mason, and Jaime Saavedra-Chanduvi. 2007. *Informality: Exit and Exclus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etesch, Patti. 2012. "The Exponential Clash of Conflict, Good Jobs, and Changing Gender Norms in Four Economi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Pettigrew, Thomas F., and Linda R. Tropp. 2011. *When Groups Meet: The Dynamics of Intergroup Contact*.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Pickering, Paula. 2006. "Generating Social Capital for Bridging Ethnic Divisions in the Balkans: Case Studies of Two Bosniak Cit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9 (1): 79–103.

Purcell, Julius. 2010. *Individual Disputes at the Workplace: Alternative Disputes Resolution*. Dublin: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Putnam, Robert.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Putnam, Robert, Robert Leonardi, and Rafaella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awls, John.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Roemer, John E. 1998.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emer, John E., Rolf Aaberge, Ugo Colombino, Johan Fritzell, Stephen Jenkins, Arnaud Lefranc, Ive Marx, Marianne Page, Evert Pommer, and Javier Ruiz-Castillo. 2003. "To What Extent Do Fiscal Regimes Equalize Opportunities for Income Acquisition among Citize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7: 539–65.

Singerman, Diane. 2007. "The Economic Imperatives of Marriage: Emerging Practices and Identities among Youth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Youth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6, Wolfensohn Center for Development, Dubai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Solletty, Marion. 2011. “Le Chômage des Diplômés, Moteur de la Révolte Tunisienne.” *Le Monde*, January 10.

Spilsbury, John, and Karri Goeldner Byrne. 2007. “Value Chain Activities for Conflict-Affected Populations in Guinea.” Micro Report,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Teoh, Shannon. 2008. “Poll Shows Most Malaysians Want NEP to End.” *Malaysian Insider*, October 9.

The Economist. 2000. “An Uncommon Market in the Caucasus.” *The Economist*, June 1.

Udry, Christopher, and Timothy G. Conley. 2004. “Social Networks in Ghana.” Discussion Paper 888, Economic Growth Center,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USAID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9. *A Guide to Economic Growth in Post-Conflict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USAID, Bureau for Economic Growth, Agriculture and Trade.

Varshney, Ashutosh. 2002.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c Life: Hindus and Muslims in Ind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Vasilaky, Kathryn. 2010. “As Good as the Networks They Keep? Expanding Farmer’s Social Networks Using Randomized Encouragement in Rural Uganda.”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Processed.

Vicente-Mazariegos-Eiríz, José Ignacio. 1985. “La ciudad hispanomusulmana: Organizacíon social y formalizacíon urbana.” In *Urbanismo e Historia en el Mundo Hispano*, ed. Antonio Bonet Correa, 2: 749–64. Madrid: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Voice of America. 2002. “South Ossetia Market Important for Local Economy.”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Wang, Shing-Yi. 2011. “Marriage Networks, Nepotism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China.”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Processed.

Weiss, Dieter. 1995. “Ibn Khaldun 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7 (1): 29–37.

Weisskopf, Thomas. 2004. “Impact of Reservation on Admission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Ind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9 (39): 4339–49.

Welzel, Christian. 2012. “The Contribution of ‘Good’ Jobs to Development and Cohesion: The Human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Wietzke, Frank-Borge, and Catriona McLeod. 2012. “Jobs, Well-Being, and Social Cohesion: Evidence from Value and Perception Survey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Willman, Alys, and Megumi Makisaka. 2010. “Interpersonal Violence Prevention: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Emerging Lesson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1.

Wilson, Randall, Susan Eaton, and Amara Kamanu. 2002. “Extended Care Career Ladder Initiative (ECCLI) Round 2: Evaluation Report.”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RWP03-006,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Woolcock, Michael. 2011. “What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 Can Social Cohesion Make to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Cohes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January 20.

World Bank. 2004a. *Guyana: A Poverty and Social Impact Analysis of Bauxite Mining Reforms in Guyay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4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A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for Every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Equit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Yadav, Yogendra. 2010. “Why Caste Should Be Counted In.” *The Hindu*, May 14.

第二部分 2

什么是对发展有利的好工作?



第二部分

收入，利益（如果有）和总体工作满意度对具有固定工作的个体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收入和利益（无论有形还是无形）是衡量工作社会价值最直接的第一标准。但是工作也可能对他人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针对女性的工作可能影响家庭层面的资源分配，有利于孩子。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工作可能形成知识外溢，从而提高其他工人的生产率。提供机会的工作可能向他人传递公平感，帮助他们保持就业状态。这样的溢出效已经成为近期关于发展思考的重点。分析可能围绕性别、城市化或冲突等概念展开，但是许多行动通过工作来实现。

个体和社会关于就业的观点常常重合，但也不尽然。例如，个体可能高度觊觎具有额外津贴和利益的工作，但是如果他们的特权是由政府转移支付或限制性规章支撑的，这就降低了他人的收入或减少了他人的工作机会，这样的工作社会价值较小。鉴于这些差异，从个人角度看来平等的工作，也许从社会角度来看就全然不同。在评估工作对社会的贡献时，不仅要考虑工作对工作拥有者的价值，也要考虑工作可能对他人造成的正面或负面的溢出效应。对发展有利的好工作是那些具有最高社会价值的工作。

相反，某些形式的工作毫无疑问是坏工作。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签署批准了一组普遍的权利，力图在工人中消除强迫劳动、有害的童工形式、歧视和压制发言的现象。这些形式的劳动不应当被视为工作。

工作如何促进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的提高因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异。因此，工作议程天然具有具体国家的属性。然而，通过将一个经济体的不同特征联系在一起，我们可能建立工作挑战的类型。这包括农业经济体、受冲突影响国家、城市化国家、资源丰富型国家、小岛国家、高青年失业率国家、规范化国家和老龄化社会。由于挑战的性质各异，在一种情境下有助于发展的好工作在另一种情境下可能并无重大意义。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进行权衡。短期内最能缓解紧张局势的工作可能对生产率作用不大，或者那些对生产率具有最大影响的工作可能不能带来广泛的生活水平的改善。识别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有助于形成这些权衡的思维图像。

不同的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工作挑战，但是人口移民和工作流动这两股力量将它们的工作议程联系在一起。这两股流动对输出端和输入端国家具有影响。移民的到来或工作的外包对移民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均产生影响。外国工人的可得性和移民网络的发展引导储蓄和观念的流动，跨国公司的到来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所有这些都一定会提高生产率。家庭结构和社区生活也受到人口和工作流动的影响。

第 5 章

5

评估工作的价值

工作的价值常常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衡量的。但是工作也可以对他人的收入、生产率或福祉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些溢出效应也应当得到评估。

工作最重要的影响是对工作拥有者的影响。工作提供收入，可以赋予利益和保险，还常常是更广泛的生活满意度的源泉。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增加工作对个体的这些直接影响。

工作除了对工作拥有者具有重要影响外，工作对社会也很重要，这是因为工作可以对他人的收入、就业机会和生产率产生影响，也可以对管理紧张局势的集体能力产生影响。工作也可以对共同的社会目标贡献力量，比如减贫、环境保护和公平性。工作的个体和社会价值常常是相近的，但是这两种角度也可能出现分歧。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当土地被再分配给农民，农业商品化的限制被放宽，越南的贫困率以空前的速度下降。[1] 尽管这增加了个体收入，但是农业工作工作条件艰苦，收入易变性大，而且得不到正规的社会保障。但是这对越南的发展贡献颇大。另一方面，臃肿的公用事业常常为其雇员提供一系列特权，即使这些公用事业本身对人口的覆盖率有限，提供的服务也不可靠，这些公用事业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减贫的进程。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工作具有吸引力，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不是这样。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是那些具有最大社会贡献的工作，不仅考虑它对工作拥有者的价值，也考虑它对他人正面或负面的潜在溢出效应。

承认工作的多方面影响对理解工作所产生的可能的权衡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工作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却并没有对减贫产生影响。在其他情况下，为避免社会凝聚力的涣散而急需工作，但是使用公共资金立即创造工作岗位的方法却不可能迅速提高生产率。理解就业对总体福祉水平不同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可能有助于识别随着三大变迁而兴起的良性循环或潜藏的恶性循环。

工作对工作拥有者的价值是发展成果的首要标志。但是评估工作对社

会更广泛的价值要求具有工作对他人生活水平，对总体生产率或对社会凝聚力的可能的溢出效应信息。来自家庭、工厂层面和价值调查的数据以及定性评估可用于确定相关溢出效应的存在。尽管量化工作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所有差异可能不太现实，识别出差异的所在之处有助于提高政策权衡的透明度。此项工作可以借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等几个学科的分析工具。这些学科常常强调工作的溢出效应，尽管未必称其为溢出效应。

尽管某些工作对发展的贡献大于个体价值，某些形式的劳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坏工作。所有国家均签署批准了一系列普遍的权利。大多数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和其他组织都批准或签署了力图消除强迫劳动、有害的童工形式、歧视和压制发言等的准则。这样，某些劳动活动被广泛视为不可接受的劳动，不应当被视为工作。

以权利为基础

尽管工作可以是转化的，但是某些形式的工作百害而无一利。那些剥削工人、使工人遭遇危险环境之害、威胁工人的身体和心理福利的工作对个体和社会都是有害的。坏工作的负面效应可能延续很长时间。从西非贩运奴隶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产生的影响可谓是极端的例证。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奴隶贸易已经结束了 100 多年，那些祖先受过奴隶制度威胁的个体对亲属、邻居和地方政府的信任也较低。[2] 今天，国际人权规范和劳动标准不接受工人中的强迫劳动，有害的童工形式、歧视和压制言论的行为。然而据估计，全球抵债劳动、奴役、强迫卖

专栏 5.1　儿童在马里的作坊式金矿从事危险性的工作

马里的很多作坊式金矿是重点开采冲击矿的村庄小矿，需要淘金分选。尽管马里相对限制童工，估计还是有 2 万到 4 万儿童在作坊式金矿工作，其中一些儿童才 6 岁。[a] 人权观察如是记录这项工作的危险性质：

“他们挖井，在地下工作，拖拉、运载并粉碎矿石，淘洗金子。许多儿童遭受严重的头疼、脖子疼、胳膊疼或背疼的折磨，而且因负重量太大和长期重复性的行动可能遭遇长期的脊椎伤痛风险。儿童持续受到滚落的岩石和尖利工具的伤害，也会跌落井里。此外，在不牢固的井里作业时，他们要冒严重受伤的风险，因为这些井有时候会塌陷”。[b]

由于矿主使用汞将金从岩石中分离出来，这项工作会引起中毒。汞中毒可能引起严重的神经紊乱，视觉损害、头疼、记忆丧失和注意力集中的问题。儿童自己常常能意识到危险：

“是我的继母把我弄到这里来工作的。我的亲生母亲走了。我的继母拿走了我所有的报酬……从工作中我得不到一分钱……我们早晨八点开始工作，要持续一整天……我搬来矿石，淘洗金子。我用汞工作，我接触汞……他们说汞有毒，我们不应该吞食汞，但是他们没有说别的什么……我不想在矿上工作。我想留在学校读书。我染上了疟疾，我在那里（矿上）工作的时候很累。”

——Marian D.，据估计年龄为 11 岁，Worognan，锡加索（Sikasso）地区，2011 年 4 月 8 号[c]

“很危险的工作——经常会出现塌方。人们会受到伤害。三个人死在了塌方中。小孩不深入井里……从在这儿工作起我就有了状况——我的背痛，我小便有问题。没有人跟我讲关于安全的问题。”

——Ibrahim K.，15 岁[d]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人权观察 2011 的总结。

a. 马里政府已经采取了包括儿童权利的措施，其中包括禁止作坊式金矿雇用童工从事有危害的工作，并于 2011 年 6 月通过了马里消除童工国家行动计划。

b. 人权观察 2011，6。

c. 人权观察 2011，29。

d. 人权观察 2011，31。

淫和其他非自愿工作形式的受害者将近 2 100 万。[3]2008 年，1.15 亿年龄介于 5 岁到 17 岁的儿童参与危险工作（见专栏 5.1）[4]。

在国际层面，联合国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的原则。这些权利在国际公约和区域框架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并不纳入国内法律之中。[5]1998 年工人权利全球议程重点关注工作场所的四大基本原则和权利。那时候，国际劳工组织的广大成员签署了宣言，宣言包括一系列消除强迫劳动和强制劳动、废除童工、取缔就业歧视和行业歧视、允许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核心劳动标准。[6] 其他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包括工作时间、社会保障、职业安全与健康和劳动监察等一系列相关的主题。[7]

国际法要求各国国内法律要与其签署批准的国际法律文件相一致。核心劳动标准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 1998 年宣言要求国际劳工组织所有成员国，无论其是否批准具体的公约，均要“尊重、促进和实现”标准。[8] 该标准对其他保护工人权利的法律文件具有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国家和区域立法、众多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文本、国际组织章程和公司行为法等文件引用该标准实现的。[9] 可以说，国际法律框架并不包括一些基本权利。例如，核心劳动标准并不直接应对包括安全和健康等在内的工作条件问题。[10]

理论上的权利和权利在实践中的执行存在差异（见专栏 5.2）。即使在批准了核心劳动标准并具有书面法律的国家中，也存在儿童在有害的工作条件下工作、寻找工作或获得报酬时面临歧视、强迫劳动依然顽固存在、结社自由受到限制的现象。条约、公约和法律的承诺可能不能改变对工人权利独立产生影响的制度、实践和行为。导致这些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许多工人不受法律的保护。例如：

- 许多劳动法律和规章制度只覆盖正规就业关系中的工人，这限制了工人诉诸法律机制的范围。职业中介机构雇用工人行为的日渐增多使法律问责复杂化，这是因为，临时工常常与职业中介机构签署合同，而职业中介机构则反过来与实际雇主签署合同。这类工人常常达不到劳动权利有约束力的法定最低就业水平。[11]
- 一些劳动法律有意将家政工人、家庭工人或小企业的工人排斥在外。[12] 出口领域和为吸引投资而暂缓规章制度实施的其他地区也可能适用排斥性的法律。农业领域和企业中没有报酬的家庭工人，包括家庭农场中的儿童也可能被排斥在外。许多女性从事这类没有报酬的工作。[13]
- 基于国家和国际背景定义的劳动权利可能和习惯法、宗教法和本土法存在抵触。许多国家具有法律多元主义特征，在这些国家，多个法律体制并行不悖。辖区重叠是家庭法中关涉到婚姻、离婚和继承等问题是最常见的问题。[14]

理论上的权利和实际权利的差异突出了实施重大议程消除不可接受的工作形式的重要性。包括私人雇主和民间社团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动者，逐渐加大了促使遵守劳动权利和劳动标准的工作力度。跨国公司和行业协会常常采用行为准则、自愿标准及监控和审计策略。[15] 非政府组织监督工厂和公司，为工人提供培训和教育，并协调国内国际运动。尽管促进遵守

专栏 5.2　遵守核心劳动标准只完成了部分工作

采纳了国际劳工组织 1998 年《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所载八大核心劳动标准的国家的数量正在稳步增加。但是各国遵守四大原则的差异仍然显而易见，这四大原则是童工、强迫劳动、歧视、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a]

童工。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和第 182 号公约要求国家制定管理 18 岁以下儿童工作的行动计划并对其实施予以监督。第 182 号公约涉及最具危害性的童工形式，175 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东亚太平洋地区从事危险工作的儿童数量最多，但是跨区域证据显示状况正在改善。[b] 巴西和印度是出现进步的两个国家。1992 年至 2008 年期间，巴西 7~15 岁儿童就业率下降了 10 多个百分点，从 18%下降至 7%。与此同时，入学率从 85%上升到 97%。印度的儿童就业率从 8%下降至不足 4%，入学率上升了 14 个百分点（从 72%上升至 86%）。[c]

强迫劳动。第 29 号公约和第 105 号公约规定了强迫劳动的核心标准，和批准有关其他核心标准公约的国家数量相比，批准第 29 号公约和第 105 号公约的国家数量更多。据估计，三分之二的强迫劳动以经济剥削的形式出现，五分之一的强迫劳动是国家或军队强加的，其余的则涉及商业性剥削。其中最后一种形式对女性和女孩的影响异乎寻常。[d] 强迫劳动对个体、家庭和社区的长期影响可能非常严重。解救强迫劳动受害者、尤其是解救商业妓女的非政府组织发现，受伤后的压力、社会耻辱和疾病可以阻碍受害者重新融入社会。[e]

歧视。第 100 号公约和第 111 号公约涉及因性别、民族、残疾或其他地位引起的工作获得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分割、报酬差异和工作中的骚扰或暴力行为等歧视行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歧视可以被视为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无论该法律是正规的法律体系还是习惯法。歧视是由基于种族、性别、宗教、政治观念、母国或社会起源的不平等待遇引起的，或是由政策、实践或规则的不平等影响造成的。每一层面的歧视都会对就业结果产生影响。[f] 尽管在取缔影响女性获得工作的法律障碍方面取得了进步，壁垒因素依然存在。[g] 44 国法律对女性的工作时间予以限制，[h] 71 国对女性可以从事的行业设置法律限制。这类限制常常剥夺了女性平等获得工作的权利。婚姻法、继承法或财产法以及传统法或习惯法等法律中的不平等也对女性获得生产性资产或商业机会造成了影响。

就业歧视可能是由不直接应对劳动问题的政策引起的。例如，在中欧和东欧一些国家，Roma 儿童常常被分入专门为残障儿童设立的学校，这些学校为进一步教育和随后的就业提供的机会有限。在捷克共和国，被排斥在劳动力以外的特殊学校的 Roma 毕业生是非 Roma 毕业生的 2 倍。[i] 对捷克共和国 Roma 的研究发现，在特殊学校就读的年龄介于 10~19 岁的 Roma 人的比例是 19%，而非 Roma 人口的这一比例是 7%。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这一比例分别是 12%和 8%。[j] 2007 年捷克共和国涉及 Roma 学生的诉讼案件显示，和非 Roma 学生相比，Roma 学生更有可能被划入为智障学生设立的学校。欧洲人权法庭裁决认为，这种超高的比例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的非歧视保护原则。[k]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FACB）。尽管第 87 号公约和第 98 号公约是最早的核心标准之一，但是和其他核心标准相比，批准第 87 号和第 98 号公约的国家较少。这两大条约包括建立并加入组织的权利，并呼吁在雇主和工人组织之间建立磋商机制。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属于“能然权利”，赋予工人呼吁改善工作条件其他方面，如安全和健康的表诉渠道。[l]

在工会和其他社团被禁止的国家，在社团活动受到限制的国家，或在其成员受到暴力活动或镇压威胁的国家，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会受到限制。工人和雇主的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均受到隶属于国际劳工组织执行机构的自由结社委员会的监督，除国际劳工组织监督已批准公约的常规监督机制外，自由结社委员会也是履行监督职能的普遍监督机制。自由结社委员会处理与公民自由权相关的投诉，也处理反工会骚扰、恫吓、侵犯聚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其他行动；这里公民自由权包括对工会领袖或成员的谋杀、绑架、失踪、威胁、逮捕和扣押行为。[m] 第 87 号公约保护所有工人的权利，包括自就业工人。然而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在实践中的执行是有限的，这是因为许多工人在传统的雇主—雇员关系之外就业，或并不在正规工会覆盖的行业或领域中工作。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国际劳工组织 1998；国际劳工组织 2012a。
b. Diallo 等 2010。
c. UCW 2010。
d. 国际劳工组织 2009。
e. Farley 2003。
f. Fredman 2011。
g. 世界银行 2011d。
h. 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 2011。
i. 世界银行 2008a。
j. 世界银行 2012b。
k. 欧洲人权法庭 2007。
l.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Levi 等 2012。
m. ITUC 2011。

权利和标准的努力的增加并不能保证改善权利和标准的实施，但是它为增加工作中权利的问责提供了潜在的途径和和伙伴关系。

就业对个体和社会的价值

工作最明显的成果是它提供给工人的收入。这些收入可以是现金或实物，可能还包括一系列相关利益。工作提供的收入及其带来的产出通常随着工人技能的提高而增加。因此，提高技能是提高工作对于个体和社会的价值的最直接的途径之一（见问题 5）。从个体福祉的角度来看，工作的其他特征也可能非常重要。和工作压力和焦虑对身心健康的任何伤害性影响一样，稳定、话语权和工作成就感均对总体的工作满意度具有影响。[16]

国际劳工组织 1999 年推行的体面工作概念结合了工作特征的某几方面（见专栏 5.3）。自此，许多政府使用体面工作来表述他们的就业政策议程。体面工作的概念也被联合国和数家国际组织所接受，并且得到了众多全球论坛的认可。

工作也可能对工作拥有者之外的他人产生影响。当被问及他们最中意的工作，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被调查者作出的回答不同于当他们被问及什么是对社会最重要的工作的回答（见图 5.1）。他们频频提及公务员或店主是他们中意的工作，但认为老师和医生是对社会最重要的工作。中国是唯一一个认为公务员对社会的价值大于对个体的价值的国家。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教师对个体的价值大于对社

专栏 5.3 体面工作概念和体面工作议程

体面工作被定义为“男性和女性获得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从事体面的、生产性劳动的机会”。[a] 该定义基于广泛的工作概念，即工作包括一切形式的经济活动。[b] 国际劳动组织已经将所有人获得体面工作作为其所有活动的组织原则，并且制定了将所有人获得体面工作纳入国家战略规划目标体系的议程。[c] 国际劳工组织的体面工作议程是基于四大战略目标之上的政策方法，这四大战略目标是：关于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及国际劳动标准，富有成效和自主选择就业，社会保护和社会对话。

在全球层面，国际劳工组织界定了体面工作指标体系，借以测量体面工作的不同方面并跟踪其随着时间推移而取得的进步。在 2010 年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峰会上，目标 1（消除极端贫困与饥饿）纳入了一个新的指标，即“使所有人包括女性和青年人都享有充分的生产就业和体面的工作”。[d] 体面工作指标被用于帮助国家测量进步，确立优先事项。一组有限的指标被用于监测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e]

国际劳工组织的体面工作包括一个门槛，不应该有低于门槛的工作。门槛包括四个成分：生产性就业（而不仅仅是任何工作），与国情相适应的基本社会保障，话语权和组织机会及关于工作中的权利。作为渐进性议程，体面工作指标可能随着国家的经济、社会和制度进步发生变化。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劳工组织已经赢得了相当大的吸引力和国际政治认同。体面劳动的概念最初形成于 1999 年的国际劳工大会，现在，体面工作已经成为国际劳工组织宪章的组成部分，在联合国大会上得到了国家元首们的支持，得到了 20 国集团以及欧盟、非盟、美洲国家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南锥体共同市场等区域性机构的支持。许多国家使用体面工作概念定义发展目标，识别政策重点，测量会议具体目标的进展情况。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国际劳工组织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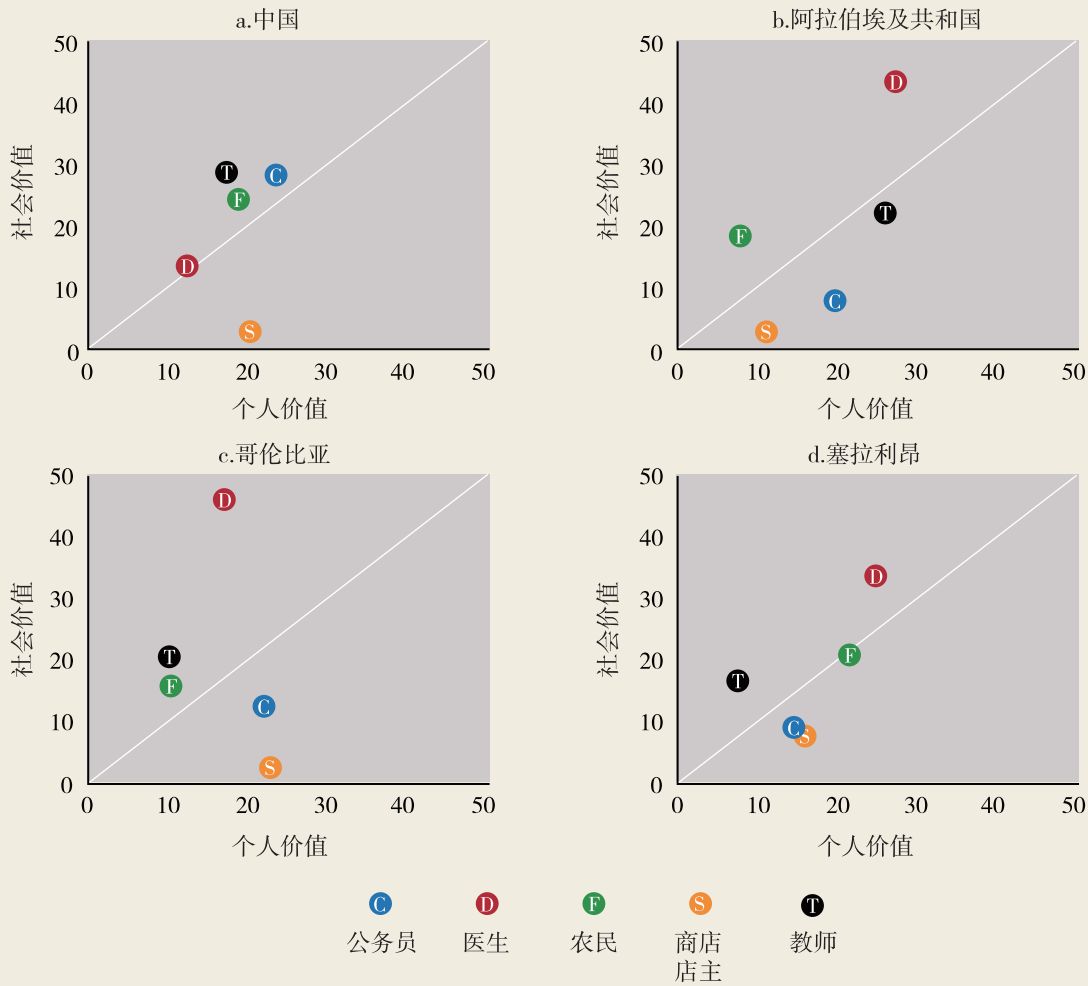
b. Anker 2003；Ghai 2003；UNECE 2010。

c. “体面工作议程，”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http：//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decent-work-agenda/lang—en/index.htm。

d. 联合国 2011。

e. “测量体面工作，” 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http：//www.ilo.org/integration/themes/mdw/lang—en/index.htm。

图 5.1　喜欢的工作有别于最重要的工作



资料来源：Bjørkhaug 等 2012；Hatløy 等 2012；Kebede 等 2012；及 Zhang 等 2012；所有这些文件都是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注释：本图反映了被调查者愿意从事的工作比例（个体价值）及认为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比例（社会价值）。

会的价值。而在塞拉利昂，农民对个体和社会的价值同等重要，而在其他国家，农民被认为是对社会有价值的工作，但并不是人们中意的工作。

这种直觉可以发展为对某些工作对社会的价值或多或少高于对个体的价值的原因的结构性分析。这些原因可以按照三大标题分为三组，每组与三大发展变迁中的一种变迁相对应。个体的工作可以改善社会中他人的生活水平，或者可以对他人的收入和就业机会产生不利影响。个体的工作有助于提高他者的生产率，或通过环境影响对他者的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个体的工作可以力挺更和平的集体决策，或反过来，当它们基于特权之上时，可能加剧社会紧张局势。

工作的溢出效应

对发展有利的好工作是那些具有最高社会回报的工作。作为第一位近似值，工作对工作拥有者个人的价值提供了衡量工作社会价值的好标准。但是一些工作对他者的生活水平、总

专栏 5.4 经济学和社会学在不同的名称下研究工作的溢出效应

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几个分支学科重视研究就业溢出效应产生的渠道，尽管这些学科可能并不如此表述溢出效应。劳动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评估收入差异及其原因，其中包括歧视、不平衡的谈判力、规章制度和税收政策。公共财政学文献也就工作对就业、资本密集度、税收收入和补贴（包括那些用于社会保险贡献的资金）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性别研究审视了性别歧视及其与就业关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决定因素。贫困分析研究了就业分布和不同增长模式对贫穷和不平等的影响。经济地理揭示了工作的空间集中对生产率的影响。国际经济学分析了出口领域就业和外资公司带来的资源分配和创新动力。环境经济学测量了不同领域就业或在自然资源基础上使用不同技术的负向（或正向）影响，并很重视这些影响。身份经济学研究人们及其同辈群体的关系（包括通过就业产生的关系）是如何影响行为和规范的。公平性分析已经开始研究，个体出生时情景相对于个体能力和努力对就业成果的影响程度。最后，冲突研究致力于识别导致不能建设性地、和平地管理的紧张局势背后的社会条件，其中包括获得工作及工作分配中的公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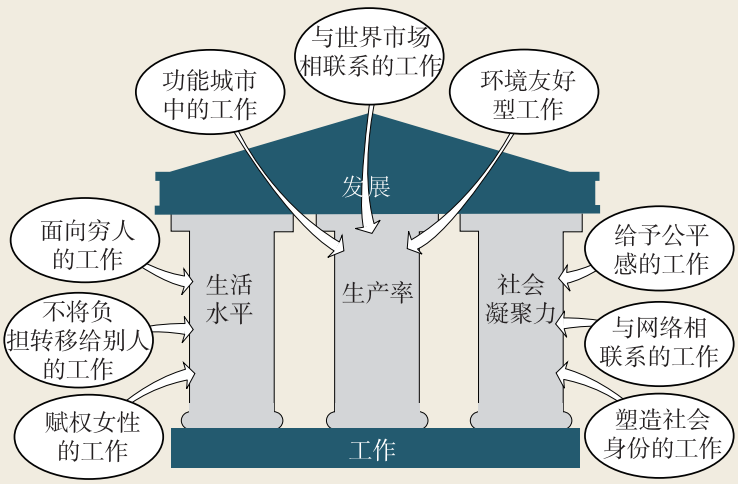
这些学科以严格分析评估工作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异，因此可以识别出什么是对发展有利的好工作。[a]

尽管这些学科可能并未明确提出围绕就业展开，这些学科塑造了近期的发展思维。《2007 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下一代》[a] 显示，为青年人拓宽就业机会是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催化剂。《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讨论了收获集聚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成果，而这通过就业实现。《2011 年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与发展》指出，就业是冲突后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而《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则为工作是促进性别平等并将其转变为社会经济进步的手段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例如，近期以青年（世界银行 2006）、地理（世界银行 2009c）、冲突（世界银行 2011c）和性别（世界银行 2011d）的世界发展报告审视了不同环境下工作的溢出效应。

图 5.2 某些工作对发展更有利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体生产力或社会凝聚力也具有溢出效应。当溢出效应是正向效应时，工作的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当溢出效应是负向效应时则相反。原则上，溢出效应也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和社会视角就没有得到真正区分。尽管如此，就业可以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这一观点是社会科学几个分支学科的核心，对近期的发展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专栏 5.4）。

全面评估就业对发展的贡献要求确认溢出效应可能发生的途径。九大对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途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图 5.2）：

- 他人的收入。不平衡的谈判力或监管不足可能引起相对于工作产出过高或过低的劳动收入。这种扭曲对雇主的收入和其他工人的工作机会具有影响。当工作通过转移支付获得支持时，纳税人也可能受到影响。无论从字面上还是象征意义上，不对他人征税的工作是有利于发展的工作。
- 家庭分配。拥有工作并对家庭预算贡献力量可以改变工作拥有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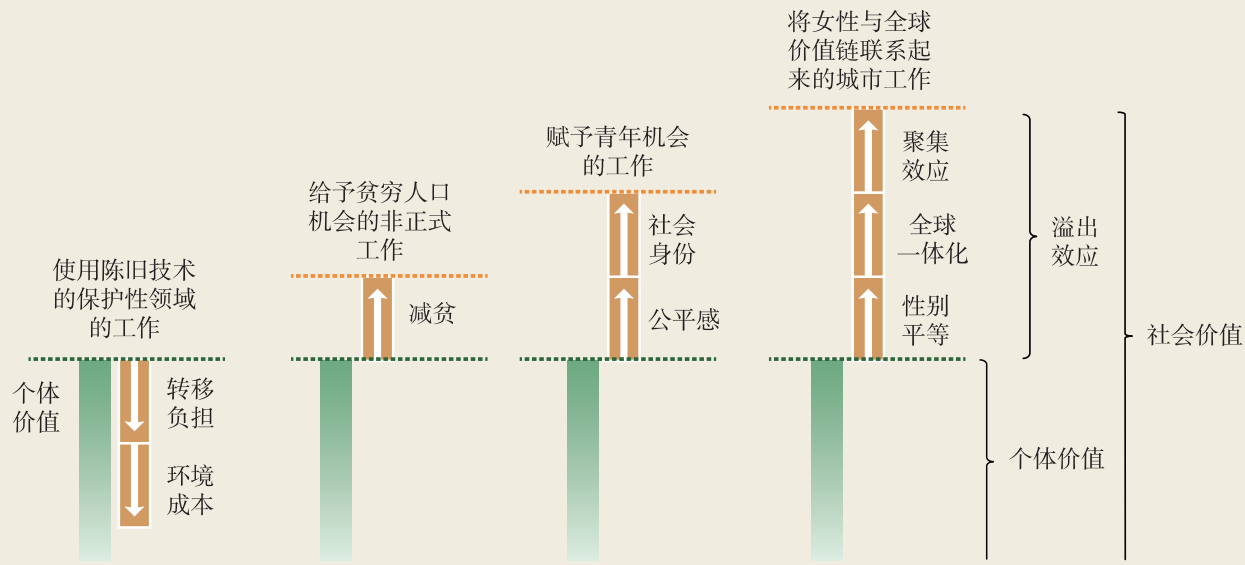
地位，并增加他或她在如何分配预算上的话语权。如果工作拥有者是女性，用于食物和儿童的开支可能增加，这可能会扩大儿童的福祉。赋权女性的工作具有产生这类积极溢出效应的潜力。

- 减贫。如果工作具有利他性质，对总体减贫具有价值，那么即使工作拥有者自身的收入不发生任何变化，工作也会对他人的福祉产生影响。由于工作是脱贫的主要渠道，促使他人脱贫的工作机会具有社会价值。向贫穷人口倾斜的就业机会更有利于发展。
- 聚集效应。生产率不仅取决于经济单位的内部效率，也取决于经济单位所处的环境。通过劳动力流动及与供应商互动而实现的学习和模仿，以及更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中技能的更好匹配可以提高生产率。因此，功能城市中的工作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相反，过分拥挤和堵塞的城市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 全球一体化。国际贸易和参与全球价值链也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涉足出口领域的公司的生产率呈上升趋势，这样，它们迫使其他生产率较低的公司倒闭。外国直接投资（FDI）引起的知识溢出提高了整体生产率。这样，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工作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
- 环境效应。破坏环境或过度使用稀缺资源的工作对整体生产率具有负面影响。但是工作也可以对环境产生正面影响，如管理森林和其他公共资源的工作。不考虑工作的环境效应，那么工作社会价值的评估也就无从谈起。
- 社会身份。工作可以影响他人的福祉，这是通过影响工作拥有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从而影响社会实现的。工作可以塑造影响工作拥有者与他者互动的规范，首先是信誉、守时和礼貌。工作可以促进公民参与，扩大信任，这取决于工作的特征。
- 网络。工作使人们相互联系。工作可以在同事之间或更广泛的社会中传递信息。工作对农民工融入新的城市环境产生影响。当工作增进了不同社会背景和民族背景的互动时，也可能促进社会宽容。
- 公平感。在自己的工作之外，整体就业机会获得过程中明显的公平缺失可以削弱归属感。工作分配与平等机会观念的抵触可能导致人们脱离集体决策的过程。遵循透明度和成绩标准的工作有助于提高社会中的公平感。

由于工作不仅影响工作拥有者的福祉，而且也影响他人的福祉，两份从个人角度来看大体相当的工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仍然可能是不同的。在一个重视减贫的社会中，一份使家庭脱贫的正式工作应当被视为社会价值更大的工作。一份需要通过转移支付（无论是纳税者还是消费者）获得支持的保护性行业类工作的社会价值较低，而如果需要获得保护与使用环境成本很高的陈旧技术相关，这类工作的社会价值则更低。与此相反，出口领域的工作有助于从国外获得新技术和管理知识，并通过与供应商的互动传播这种知识，这类工作的社会价值较高；而如果工作拥有者是女性，她的工作地位赋予她权利，那么这类工作的社会价值会更高。给予青年在社会中归属感并向他人传递机会感的工作同样如此（见图 5.3）。

工作对发展的贡献因环境而异。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减贫具有重要的意义。生产率效应各异：类似于新加坡的高度城市化、高度联

图 5.3 工作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可能相异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系的国家已经内化了大部分效应，而类似于孟加拉国和危地马拉的正在城市化的国家则仍然能够收割重大利益。非法采矿工作可能破坏环境，结果，这类工作对生产率增长的净贡献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土耳其风能科技园的工作对三大变迁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工人提供收入和工作满意；使土耳其置身于新能源技术发展的前沿；而且通过为村民提供新的生计机会，这类工作常常增加社会凝聚力。

然而工作常常涉及平衡。一项具体工作可能同时具有正面的溢出效应和负面的溢出效应。以技能要求相对较低、但使用陈旧技术从而会破坏环境的工作为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类工作可以减贫，因而具有正面的溢出效应，但是它对环境的破坏也展现了它的负面溢出效应。将国内经济与全球联系起来的工作也面临着类似的平衡，这是因为这种联系是通过关系获得的，因而降低了工作市场的公平感。

这类平衡可能呈现战略性特征：在中国，公路投资的性质和位置对工作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中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投资带来了最高的增长回报，在那里，公路投资创造的工作是最具生产率的工作。但是在生活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这类工作对减贫的贡献最大。[17]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选择是必要的。评估和划定溢出效应是明智决策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就业对发展的贡献可以量化吗?

劳动收入是测量就业对发展贡献第一位的、最直接的尺度。但是当工作带来对儿童的投资、赋予人们通过工作获取新技能的可能性，或让他们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发生变化。由于这些方面的转变很少反映在劳动收入上，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对个体的吸引力可能不如对社会的重要性大。这就是即使在完全就业

专栏 5.5　可用于量化就业对发展贡献的几种数据来源

家庭调查（例如用于贫困分析的家庭调查）是评估工作对社会贡献的极其重要的输入数据。活动、就业和收入定期更新的高质量数据可用于理解就业动态。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生活水平调查和劳动力调查收集家庭数据。社会计划覆盖率极高的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关记录有关工作贡献的信息。遗憾的是，鲜有国家追踪就业历史。这类历史（包括就业转型）是理解年轻求职者的失业时间、失业是否给中年群体留下创伤或内部移民如何支持农村家庭的关键。

工厂层面的调查是理解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态势及其对总量生产率影响的另一个标准输入数据。许多国家采用抽样框架开展这样的调查，假定抽样框架覆盖所有的制造业经济单位；在某些情况下，覆盖范围延伸到其他领域的经济单位，比如贸易。其他国家通过管理记录收集生产和就业数据，关于投入的信息不太详细，因此对预测生产率变化的作用有限，但是这些信息对公司如何诞生、增长、衰退和关闭的过程及由此引发的就业的变化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描述。遗憾的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收集非正规领域众多微型企业的信息。这些信息对理解就业岗位由经济的哪一领域创造和经济中哪一领域的工作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最大非常重要。

调查价值观和态度的特别家庭调查和定性评估是评估工作与信仰、行为联系的重要工具。这些调查常常提供对他人信任、公民参与、被调查者特征及其工作的信息。这些调查的信息与生活水平和劳动力调查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可用于识别处于危险的人口群体，分析工作与和平集体决策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观察个体或族群随着时间推移的就业变化为探索工作、信任、行为和态度之间可能的因果联系提供了条件。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给女性的工作也不足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性别平等远没有实现的国家里，在城市化和全球一体化刚刚起步的国家里，在冲突仍然可能发生的国家里，溢出效应尤其关系重大。

全面评估就业对发展的贡献包括评估工作提供的收入及工作可能带来的溢出效应。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具体国家环境中识别工作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如果有）的差异。这样的评估需要数据，许多国家现在正在或多或少定期地收集某些数据（专栏 5.5）。运用数据全面测量工作的社会价值也需要进行严格的分析。数据中模式可能来自虚假关联，而如果具有不同基本特征的个体或工作为自己选择特定的工作或活动，相关结论可能存在瑕疵。劳动经济学、生产率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已经制定了分析所需要的分析工具。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可以提供定量数据所缺失的结构和情景。在某些情况下，随机试验或自然试验可能阐明发挥作用的机制。然而方法论陷阱很多，因此最安全的方法是对可用证据进行三角测量。

生活水平

有三类溢出效应可以提高或削弱工作对生活水平的直接贡献：可以影响他人收入的工作，可以大幅度改变家庭资源分配的工作、可以为诸如减贫等公共社会目标作出贡献的工作。

他人的收入。被补贴的公司或臃肿的公共领域机构中的工作对他人的收入产生影响，因为这些工作会引起额外的税负和经济领域其他地方收入的减少（或工作的消失）。雇主和雇员间谈判力不平衡的工作，或歧视女性或少数民族群体的工作，其相对于工作产出的收入过高或过低。

对通过转移支付获得支持的工作而言，公共财政工具可用于评估工作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异。税收和

政府支出影响收入，改变激励，从而对资源分配，包括就业产生了影响。适用于资本和劳动力的税负分析、个体或公司间的交叉补贴评估、或所得税影响评估可以确定工作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异。

税收楔子并不一定意味着工作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同，或就业影响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避免的方法论陷阱是假定个体并不认为他们缴纳的税或保险具有价值。如果工人将社会保障缴款视为延迟的利益而看重，他们的净负担要低于缴款率所显示的负担。如果工人看重全额缴款，就不会存在资源误置。在某些体制里，缴款与利益密切相关；而在另一些体制里，二者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再分配比较强大。但是即使与税收相比这些利益较少，其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雇主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较低的工资将税负转移到雇员身上。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寻求工资就业的工人数量一定，全部税负可由工人承担，而就业却和没有税负一样[18]。在土耳其，降低社会保障税只能部分提高净收入和降低劳动成本总量，从而减缓了就业变化。然而，这种效应对挣扎在最低工资线的低技能工人稍微高一点儿。[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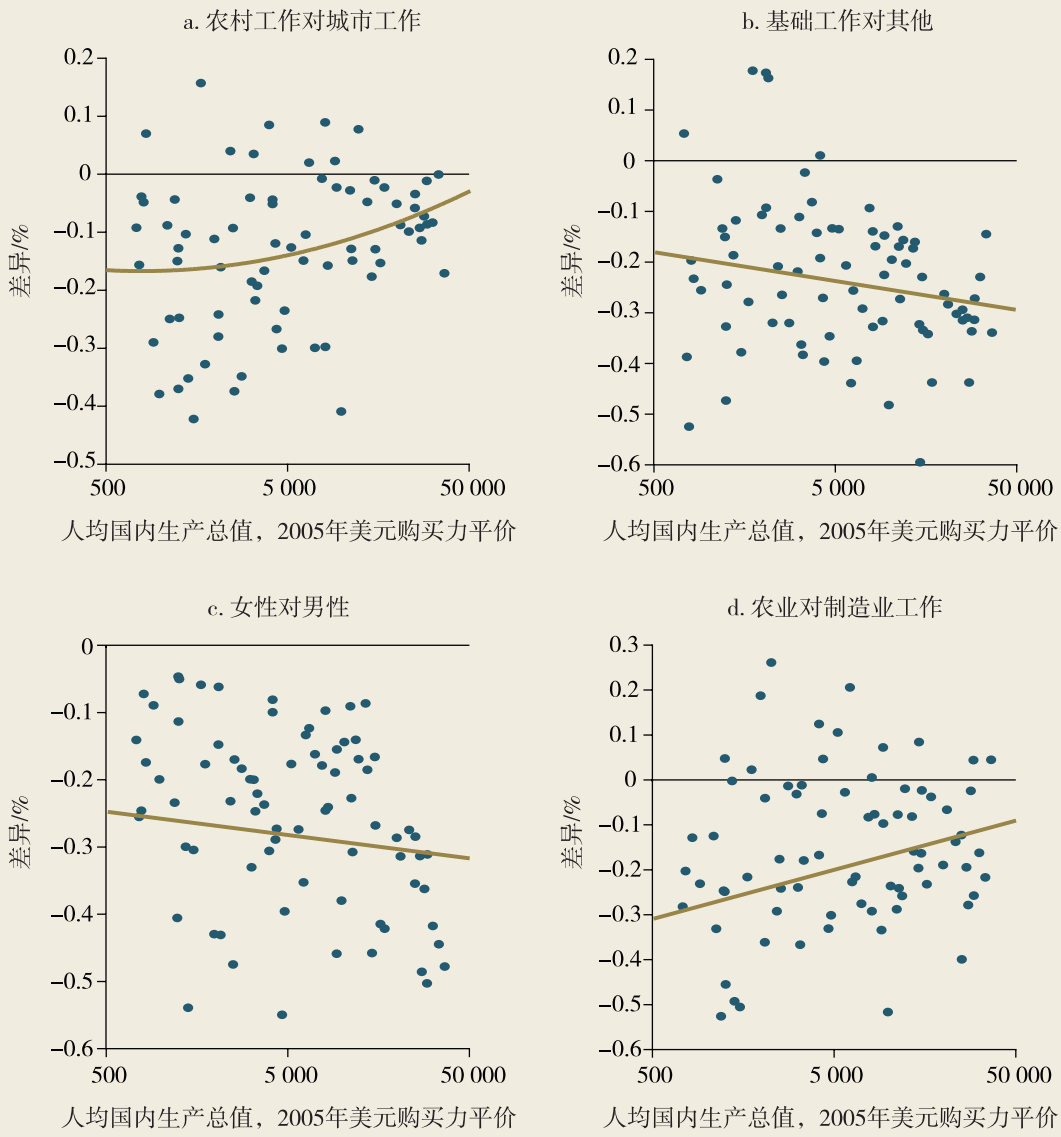
劳动经济学的工具可用于测量特定群体工人的实际收入与不平衡谈判力或歧视缺失时所得收入之间的差异。收入函数（劳动经济学的标准工具）可以对这些差异的程度进行估测。女性、少数民族和在农业领域工作的人的实际收入要低于估测值，工会成员的实际工资要高一点。一些差异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消失，另一些差异则持续不变（见图 5.4）。至少表面上看来，性别和职业差异并没有要消失的迹象。

尽管这些工作是有益的，但是收入差异可能来自工作特征的差异或在分析中没有涉及的工人。性别差异可能来自歧视，也可能来自工作—生活平衡的选择。工会差异可能显示了强大的谈判力，但是也可能反映了被组织起来的工人生产率较高。农村收入差异可能受到移民城市的工人和留守家园的工人之间不太明显的差异的影响。因此，即使这些差异得到严格的测量，理顺差异背后的原因是得出政策结论之前最重要的一步。

家庭分配。谁拥有工作可能对家庭收入如何演变、如何使用产生影响。就业机会对青年尤其重要。从学校向工作的艰难过渡可能导致恐惧，恐惧对长期收入愿景具有负面影响，因而会对未来家庭支出具有负面影响。对那些从学校向工作过渡中遭遇困难的人而言，他们在今后生活中面临失业风险的可能性比较高。[20] 面向女性的工作除了使拥有工作的女性受益之外，也可能使社会中其他人受益。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一般低于男性，她们的收入通常也低于她们的男性同事，但是到家庭外面参与工作赋予了她们权利。[21] 一些证据发现，支出决策取决于家庭中不同成员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比例。女性对家庭资源的控制权增加了用于食物和儿童教育的开支。

贫穷和性别分析的标准工具可用于测量女性就业对家庭资源分配的影响。以墨西哥为例，女性较高的收入比例可以加大用于食物和儿童衣服的开支，减少用于白酒的开支。[22] 孟加拉国、科特迪瓦和南非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23] 在刚果共和国，女性收入在家庭收入总量中比例的增加使得用于食物的开支大幅度上升，用于成人服装和娱乐活动的开支大幅度下降（见图 5.5）。[24] 但是，我们不应当认为

图 5.4　一些收入差异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另一些收入差异则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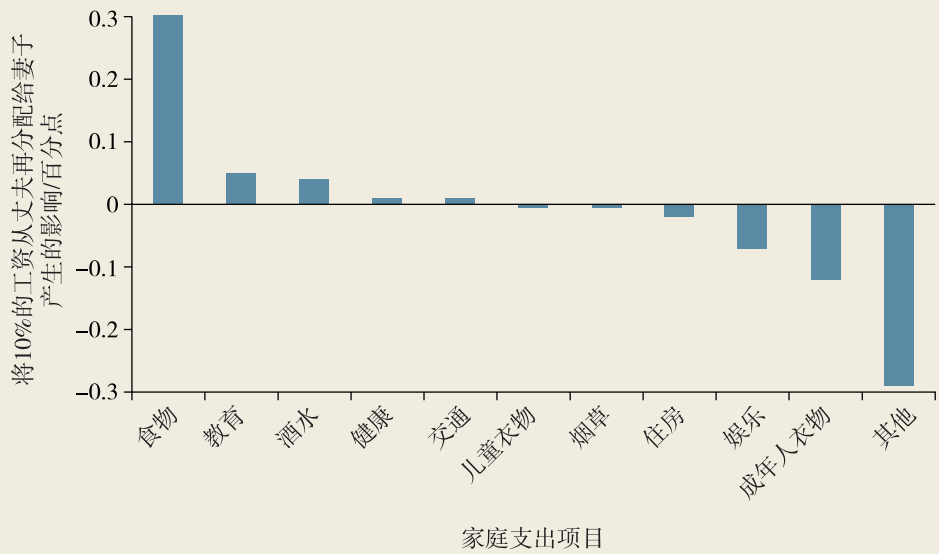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Montenegro 和 Patrinos 2012。
注释：基础工作包括常常要求相当体力劳动的简单的、常规性的工作任务。竖轴显示了两组在每个象限中的收入差异，对照了两组人口的特征。差异测量基于具体国家相对于受教育年限、经验的可能年数（及其平方），并参照行业、职业、城市/乡村领域、民族和性别的月收入对数回归值。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国家。

各地具有相同的影响。在布基纳法索，提供现金转移支付促进了对儿童的例行预防性保健护理，这和父母双方那一方获得现金无关。[25] 在加纳和斯里兰卡进行的评估显示，小额信贷更多地投入了男性而不是女性经营的企业。[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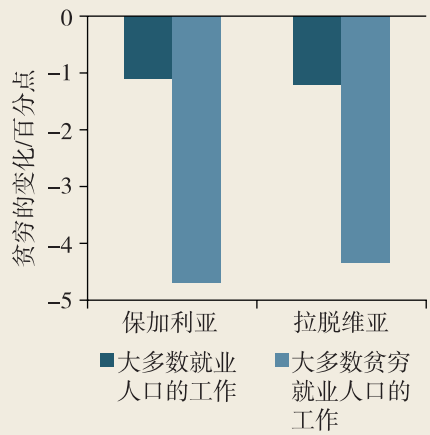
另一个方法直接审视了女性就业对人类发展成果的影响，例如儿童的教育程度和健康。在印度南部的农村里，女性年收入增加 90 美元，弱势种姓儿童的受教育年限就增加 1.6 年。[27] 在墨西哥，面向成年女性的劳动需求每增加 10%，拥有一个身体良好的女儿的机会就会增加 10%。[28] 此外，有

图 5.5 刚果共和国女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比例的增加提高了用于食物的开支



资料来源：Backiny-Yetna 和 Wodon 2011。

图 5.6 谁获得工作会对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的减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注释：本图基于使用家庭调查的微型模拟。在每一个国家，外生就业率增加了 3 个百分点。基准情景将新工作分配给那些最有可能被雇用的人口。收入数据基于个体特征。替代情景将那些穷人中最有可能被雇用的贫穷人口引入了工作。

些女性在出口制造业领域新开设的、离家较近的工厂中找到了工作，这些女性的孩子身高也比较高。[29]

减贫。工作机会与就业转型是个体生活水平和国家总量贫穷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果社会重视减贫，一项使个体或家庭脱贫的工作增加了他者的福利。这就产生了溢出效应，福祉超出了脱贫个体或脱贫家庭的范围，福祉总量增加了。

新工作机会的分配方式对减贫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揭示贫穷人口特征的贫穷档案有助于识别哪类工作，分布在哪些地方的工作将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变化。使用家庭调查数据的微型模拟可以评估就业变化对贫困率的影响。例如，提高就业率是老龄化国家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的重中之重。将就业率提高 3 个百分点对减贫的影响取决于在当前不工作的人口中，谁获得了新增的工作。如果工作被那些个体特征使他们更容易被雇用的个体获得，那么保加利亚的贫困将下降 1.1 个百分点，拉脱维亚将下降 1.2 个百分点。如果新的工作机会被那些更容易被雇用的贫穷人口获得，保加利亚的贫困率将下降 4.7 个百分点，拉脱维亚的将下降4.1 个百分点（见图 5.6）。

生产率

就业对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三种主要渠道发生。功能城市中的工作提高了专业化程度并扩大了互相学习。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工作可以获得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通过他们所根植的生产过程，工作可以对环境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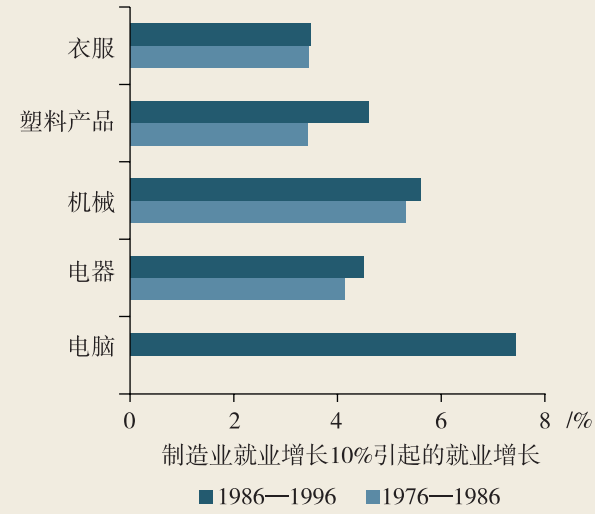
集聚效应。活动的空间集中是发展中国家生产率增长的强大动力。这种效应可以在部门内部（地方化经济）或部门间（城市化经济）实现。投入共享、更好的劳动力匹配和知识溢出是推动工业和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环境中的主要动力。投入共享促进了中间产品和服务专业化生产商的崛起。毗邻使公司能够更容易找到填补空缺的工人。知识溢出使公司从毗邻地区的公司中学到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务。这些集聚效应显示了工作私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异。

城市经济学的工具可用于评估集聚的潜在收益。在工业国家里，城市就业每增加 10%，该城市的工资和生产率就会增加 0.2 个到 1.0 个百分点。[30] 感受一下这种变化所意味的程度，如果工资和生产率将增加 0.3 个百分点，从一个有 5 000 居民的城市移居一个有 500 万居民的城市的工人，其收入将增加 23%。[31]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工人都能从一起在城市中生活或工作中平等受益，他们对生产率的贡献也不均等。 认知技能和社会技能较好的工人受益更多。[32] 而当工人置身于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队伍中时，工人的工资水平也较高。[33]

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也证明了城市规模与生产率的关系，这些国家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土耳其。[34] 在中国台湾地区，某地制造业就业总量每增加 10%，具体工业领域中的就业就会增加 3.0 个到 7.5 个百分点（见图 5.7）。[35] 企业调查也显示大城市中的公司增长速度较快。[36] 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功能不佳会削弱毗邻带来的潜在收益。劳动效率低下、土地和房产市场可能引起城市功能不佳。功能不佳也可能是由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匮乏引起的，对市场准入具有重要意义的较小城市而言尤其是这样。[37]

但是在具有 100 万到 300 万人口的城市中，集聚也可能因土地昂贵、严重的堵塞和污染而造成较高的成本。美国在 1980 年至 2000 年期间，每人每年因交通堵塞而浪费的时间从 4 小时增加到 22 小时。[38] 伦敦中心地带的交通速度每小时仅为 11 英里。[39] 墨西哥市每人每年因交通堵塞造成的成本是 580 美元，或人均年收入的 3%。[40] 堵塞和污染限制了集聚效应。[41] 在加利福尼亚，每 10 亿等分臭氧浓度降低 10

图 5.7　中国台湾地区的集聚效应因工业领域而异



资料来源：Sonobe 和 Otsuka 2006b。
注释：本图显示了某特定地方制造业领域就业总量增长 10%时某具体领域就业的增长。

等分，工人的生产率将增加 4.2%。[42]

管理文献中的分析工具可用于评估产业集群对生产率的影响。[43] 在许多低收入国家中，产业集群在制造业就业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其中包括自就业。[44] 在不熟练劳动力密集的轻工业制造业中，集群更为普遍。集群常常由富有开拓意识的人发起，他们通常是以前的贸易商或工程师，具有识别新的、盈利的行业的能力。成功引起了效仿，大量的相对较小的类似企业在毗邻地区兴起。管理文献可以帮助确认有活力的、工作具有正面溢出效益的集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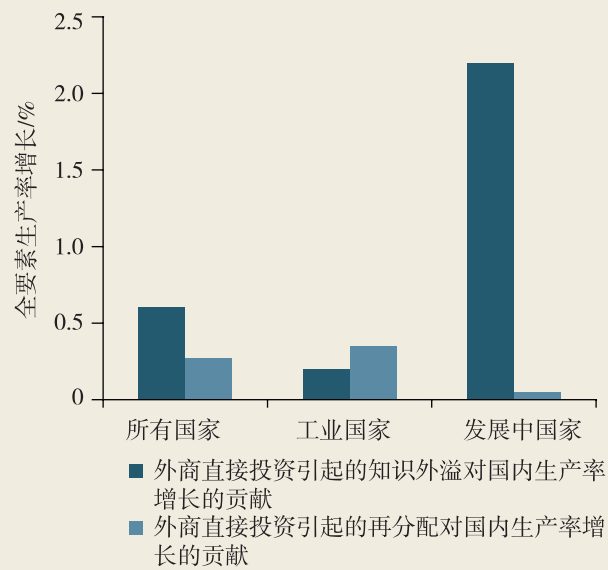
全球一体化。生产的跨疆界分割是世界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45] 价值链将跨疆界的公司和工作联系在一起，但是是通过长臂贸易或公司间的交易实现的。全球一体化改善了家庭资源的分配状况，这是因为全球一体化加大了公司提高竞争力的压力。出口使生产率最高的公司成长。但是这也迫使生产率最低的公司缩减规模或倒闭。全球一体化也产生知识外溢。这是通过接触内含于贸易商品的新技术或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公司的新的管理实践产生的。知识外溢既可以在竞争者之间横向发生，也可以通过购买者—供应商关系纵向发生。

国际经济学已经为量化全球一体化对生产率的影响做了很多工作。在哥伦比亚，贸易自由化时期工厂层面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进口替代型时期的速度[46]。在印度，紧随 1991 年贸易改革的产业重组（包括公司的进入和退出）促进了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47] 在巴西、科特迪瓦和土耳其，贸易壁垒的降低导致利润的降低，这是竞争密集化的表征。[48] 在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斯洛文尼亚和中国台湾地区及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区域层面均发现了出口提高生产率的效应。[49]

一本专业化文献重点研究了跨国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外溢效应和对生产率的影响。在印度尼西亚，当一家工厂从国内所有者所有转为外国所有者所有，三年内其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了 13.5%。在巴西，国内公司在职工人的工资受到曾就职于跨国公司的工人比例的积极影响。在加纳，企业主曾在同行业跨国公司就职的公司的生产率高于其他国内公司。[50] 在发展中国家，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源再分配的影响相比，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更重要（见图 5.8）。[51]

研究可以帮助评估全球一体化带来的知识外溢是否通过价值链渗透到非正规领域中的小企业中。较大的公司更有可能成为外资公司的供应商或直接为跨国公司收购。但是为提供成

图 5.8　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知识外溢效应提高了国内生产率



资料来源：Alfaro 和 Chen 2011。
注释：本图显示了当新跨国公司进入的可能性翻番时不同国家群组国内生产率的增长。图中估测基于来自 60 个国家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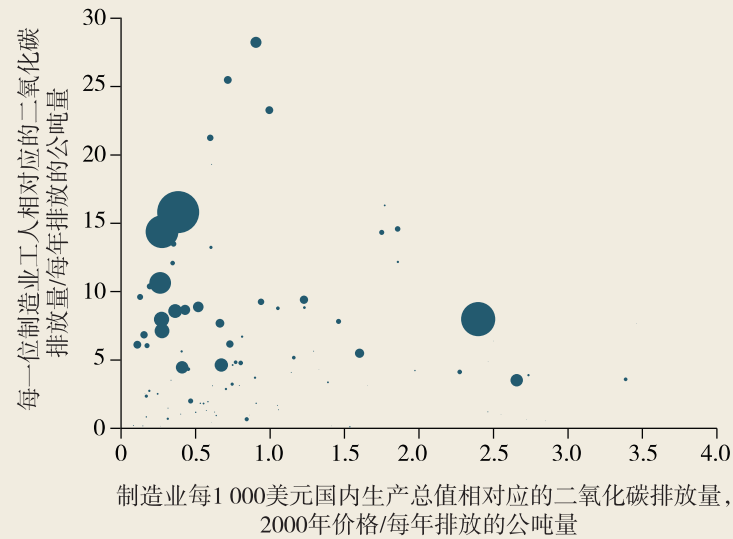
本效率，这些公司倾向于将非核心业务外包，从而将较小的地方公司引入了价值链。外包为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收获知识外溢的果实提供了机会。[52]

全球一体化工作带来生产率外溢效应，研究也可以凸显阻碍这些外溢效应实现的因素。跨国分析显示，劳动力市场流动程度、公司进入壁垒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对增长的开放度具有巨大影响。[53] 知识外溢取决于地方经济吸纳它们的能力，人力资本和研发能力都很重要。要被外国公司选择为供应商，地方公司需要具有一定水平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如果地方工资与外资公司的技术差异太大，生产率外溢发生的可能性就较低。[54]

环境效应。过分使用自然资源或破坏环境的工作，其生产力低于其直接产出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工作对环境的破坏引起了对他者的负面溢出效应，导致其对产出总量净贡献的降低。空气、水、森林和土壤等自然资源为经济活动提供基本的服务，也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它们常常被过度使用，这是因为私人对它们的成本评估低于它们实际的社会成本[55]。温室气体的排放就是这种负面外溢的典型。

环境经济学的工具可用于与就业有关的排放成本。在世界范围内，超过五分之一的碳排放是工业排放。[56] 世界制造业燃料燃烧的平均成本大约是每工作每年 82 美元。[57] 然而，这一平均数字掩盖了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和运用不同技术的生产的排放成本的巨大差异。各国每工作的年排放量成本和生产的排放效率之间存在着一种逆向关系。在比较富裕的国家中，每一份工作引起的环境成本通常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工作的生产率很高，因此，每产出单位的排放密度通常相对较低（图 5.9）。

图 5.9　每位工人的高排放量可以与每份产出的低排量并行不悖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际能源署 2011，国际收入分配数据库（I2D2）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动者统计数据的估测值。

注释：估测值基于来自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方法论和排放因子摘自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1996 年修订版。数字只考虑了制造业和建筑业领域与生产性活动相关的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泡泡代表国家。泡泡的大小代表着现价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规模。

遏制碳排放并降低环境破坏的政策有赖于旨在将成本转移给生产者的价格型和数量型工具。这些政策应当增加每工作以绿色术语说明的净产出。然而在短期内，如果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是生产的补充时，工作的数量会降低。

政策同样致力于在环境友好型的工业中创造工作机会。为发电厂制造风力机行业中的工作，建设水土保护体系的工作和植树造林的工作都属于这种类型。这些工作常常被誉为绿色工作，这个术语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符合绿色工作最普遍定义的行业相对较少，但是巴西和中国显然是例外（专栏 5.6）。[58]

在精确量化工作对环境的溢出效应时，发展中国家最具潜力减缓不利

专栏 5.6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绿色工作的国际定义可能是狭隘的

尽管绿色增长的概念臻于完善，但人们就绿色工作的概念还缺乏共识。[a] 经合组织使用绿色工作来界定与环境工业有关的工作。[b] 欧洲委员会则强调绿色工作是产品有益于环境的行业中的就业。[c] 可再生能源领域和低碳制造业中的工作就是其中的例子。出于统计需要和为决策提供信息，几个国家的政府制定了自己的绿色工作定义。

联合国环境署将绿色工作定义为“农业、制造业、建筑业、设施装配、维修中的或科技的、行政的和服务相关的可以大力保护环境或恢复环境质量的工作或活动”。[d] 联合国环境署和国际劳工组织认为这些工作也必须被称为体面工作。

但是这些定义可能太过狭隘。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有望大规模扩张的绿色增长工作可能不会被列入体面工作，比例生物燃料和生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作。[e] 而且，重视可再生能源和低碳产品的生成可能转移人们对那些既有积极环境效应也能为贫穷人口提供更高收入的活动的关注。

以减缓森林退化和加强可持续的森林管理的行动为例。[f] 封闭森林以外的木材资源对满足木炭、柴火、木料和非木材森林产品的需求的意义正在日益增长。由地方管理对退化土地的再造林和再恢复可能在为贫穷人口提供收入的同时，也创造积极的环境影响。具有固氮能力的树木被用于提高土壤肥力，提供草料、木材和燃料。改良的森林管理促使某些地方的高粱生产增加了 85%，玉米生产增加了 50%。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详细讨论，见 Bowen 2012。
b. 经合组织 1999。
c.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 2008。
d.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 2008，35–36。
e. Upadhyay 和 Pahuja 2010。
f.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Sander 和 Dewees 2012。

环境破坏的活动可能发生在农业和森林管理等不属于现代行业的领域。世界上将近 3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农业和森林采伐。[59] 随着耕种面积的扩大，低生产率农业造成了森林采伐。[60] 发展中国家减少工作环境溢出效应的行为本身注定涉及农村领域，对农业和农村生计产生影响。[61] 例如，在管理森林和自然栖息地等公共产品中可能涉及社区参与。

社会凝聚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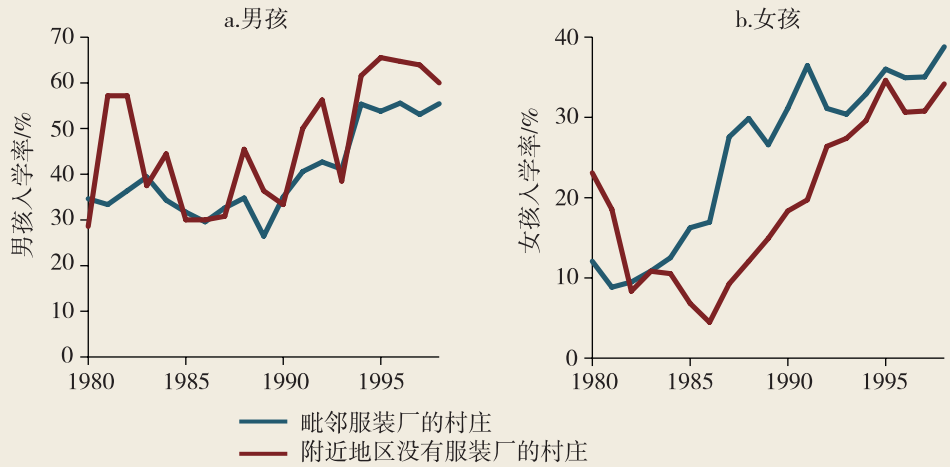
如果工作可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行为和态度，那么工作就可以对社会如何运转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工作可以对社会群体如何应对社会紧张局势和参与和平集体决策产生影响。工作对社会凝聚力的溢出效应有三类，包括社会认同、关系网络和公平感。工作对社会认同的影响对青年尤其重要。工作可以促进社会化及在工作场所和社会中获得价值和行为的过程。[62]

社会认同。工作可以影响个体相联系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行为及塑造这些行为的规范。[63] 一项工作或其特征影响个体看待自己在社区和社会中地位的方式因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异。但是当二者的关系很大时，工作就会对社会凝聚力产生溢出效应。

量化工作对社会凝聚力的溢出效应比量化其对生活水平或生产率的溢出效应要难。然而，使用家庭调查和定性研究对其进行粗略的评估是可以的。例如，大约一半的中国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有点儿意义或绝对有意义，但是在塞拉利昂，这一比例高达 90%，这可能表明工作对低收入国家和冲突后国家的社会重要性。

通过提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期望，就业概念也可以改变行为和规范，

图 5.10　毗邻服装厂促使孟加拉国年轻女孩入校就读的人数增加



资料来源：Heath 和 Mobarak 2011。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观念的变化也可以测量。以孟加拉国为例，在村庄通勤距离内的地方开办服装厂后，村庄女孩的入学率增加了。[64] 男孩中没有观察到这种效应，然而较大一点儿的女孩会辍学接受新的工作机会（见图5.10）。随着女性可以在工厂就业，父母可能看到了女儿面临的更多就业机会，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这样，在这些服装厂工作的工人就为其他女性和女孩树立了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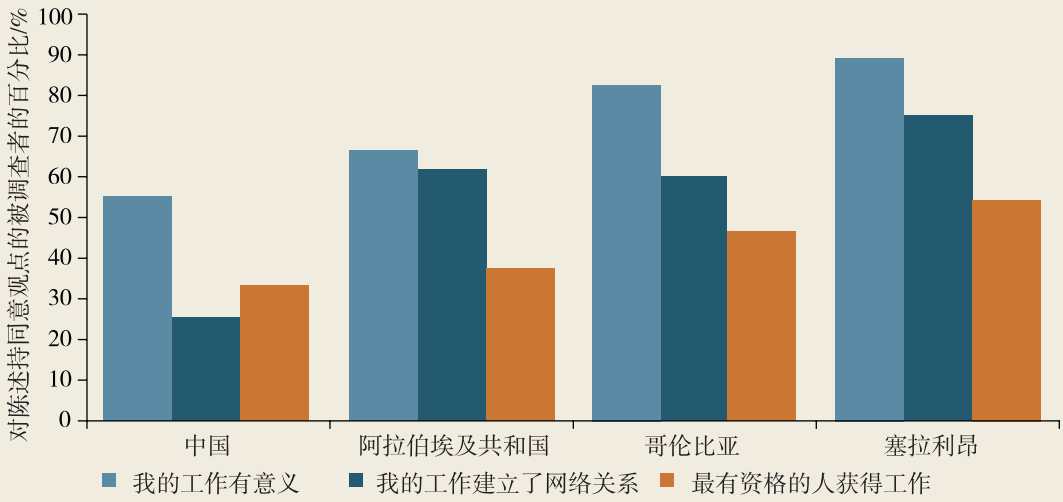
项目评估是工作对社会凝聚力溢出效应的另一个信息来源。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青年与就业计划覆盖了没有完成中学学业的青年、失业的青年、生活在贫穷家庭中的青年。参与者接受了包括自尊、团队工作、交际技能等在内的职业和生活联合培训，接着是在私营领域公司实习。[65] 方案降低了参与帮派活动和暴力活动及其他冒险行为，这其中包括吸毒和无保护性行为。参与者描述了方案对他们自尊和行为的积极效应。

关系网络。就业可以创造新的关系，而且是传播信息的渠道。从负面影响来看，就业也可能具有排斥效应，使个体进一步脱离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积极影响可以赋予人们在社会或社会中的利益，负面效应可以增加社会距离。

同样，调查可以询问这些动态，是衡量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的第一切入口。在四个国家中，参与调查的被调查者被问及他们的工作对建立与他人的关系、提供关于社会事务或其他就业信息、或有助于获得关于好的待遇的消息（例如关于食物的）是否有益的问题。在中国，只有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定网络关系效应至少具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而在塞拉利昂，这一比例足足有四分之三（见图5.11）。尽管解释跨国比较需要谨慎对待，但是对同一国家不同个体的比较可能提供信息。

定量方法是将关系网络效应置于情景中研究的必要方法。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开展的调查发现在学校中或邻里，愿意与不同种族的人共同工作或做生意的人数超过赞同种族内合作的人

图 5.11 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提供社会认同、网络关系和公平感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Bjorkhaug 等 2012、Hatloy 等 2012、Kebede 等 2012 和 Zhang 等 2012 的估测值；所有这些文件都是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数。[66]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展的小组座谈发现，工作场所是“支持民族合作力度最大的地方”。[67] 据悉，在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岛的印刷包装业、食物和饮料、建筑和零售业中，通过工作与不同种族的人之间的互动对他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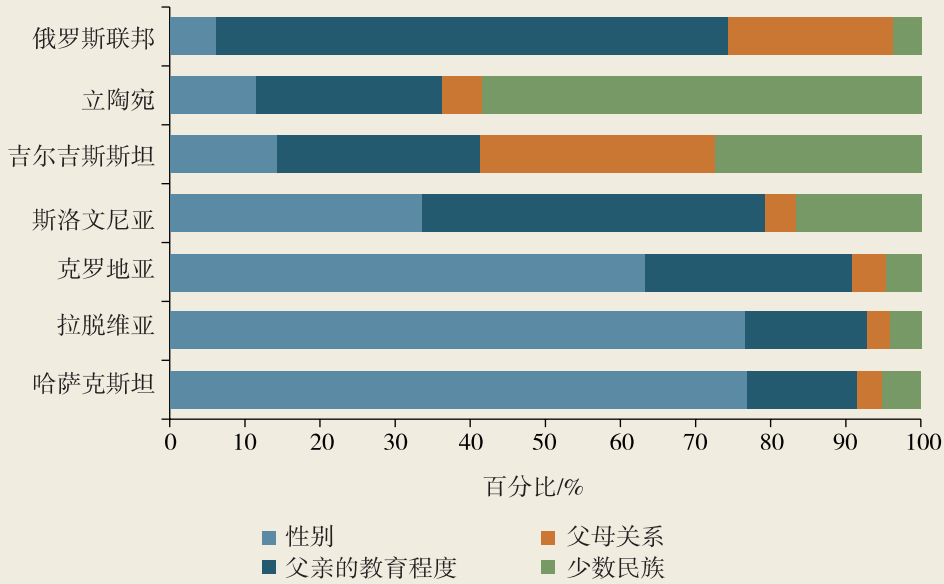
公平感。就业是否公平自然取决于主观评价。舆论调查可以提供有关人们如何评判就业市场公平程度的评估信息，而且追踪这些评估随着时间的变化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某种指导。大约 30%的中国被调查者认为最有资格的人获得工作，这表明认为工作分配基于成就的人口相对较少。而在哥伦比亚及塞拉利昂，这一比例要高得多。

实际上在这些主观评估之外，在关于机会不平等的新兴文献的基础上，就业公平可以得到严格的测量。该文献研究才能和能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就业。这些因素包括一个人出生时的情景：地理位置、家庭背景、性别、民族和语言。[69] 在一个机会公平的社会里，这类因素对个体在很多年以后的工作轨迹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而在某些国家，由出生时情景引发的不平等的比例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因素从很早就开始决定生活的机会，而且在以后实现就业和获得相关报酬的过程中表现得很明显。[70] 该方法也可用于评估不同因素对就业机会不平等的重要性。在东欧和中欧的几个国家里，父亲的教育程度是就业不平等的重要动因，在俄罗斯联邦和斯洛文尼亚尤其如此，而性别则在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和克罗地亚等国占据主导地位（见图 5.12）。

* * *

评估工作的社会价值对确认在具体的国家环境中什么是对发展有利的

图 5.12　很大一部分就业机会不平等是性别和父亲的教育程度引起的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章 Abras 等 2012。

注释：本图显示了每一种情景因素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程度，相异性指数。相异性指数系指为实现所有群体间机会覆盖率均等而可用于再分配的机会的比例。机会被定义为拥有周工作时间达到或超过 20 个小时的工作。父母关系系指父母与共产党有关系。父亲的教育程度以完成教育的年限来衡量。

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类评估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其中一些方法进行实际测量，另外一些方法对工作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别进行定性处理。评估不同类型共作的社会价值可以为就发展政策的平衡和重点展开的政策讨论提供信息。在发展水平不同、国情不同的不同国家里，相应的溢出效应也必然不同，这就产生了多元化的就业议程。

问题 5 技能或就业，二者谁应当排在第一位？

自人力资本理论首次将技能和经济绩效联系起来以后，人们普遍认为教育和培训是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的明智投资，因此，教育和培训是增长和就业创造的必要因素。贫穷风险随着基本认知能力，特别是计算能力和识字能力的获得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机会的增加而降低。技能，尤其是认知能力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比入学率还要密切。[71] 它们也与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为人们创造农业外就业机会的中低收入国家。[72] 在 110 个国家的 1 500 个次国家区域里，教育发展为知识外溢和企业家能力的关键决定因素。[73] 而技能可以决定就业如何将人们与邻居、社区和社会联系起来。[74]

但是在世界上，现有可用的技能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的需求。可以说，技能失配的问题有增无减。尽管准确地指出这些失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巴西、哥斯达黎加、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坦桑尼亚等众多迥然不同的国家里，就业人口的技能低于或高于其工作技能要求的人数高达三分之一。[75] 在世界上注册过的正规公司的经理层看来，劳动力技能是生产过程的阻碍因素，而且其重要性超出了平均水平。[76] 所有发展水平的国家均认为，现在技能阻碍因素的严重性也超出了 20 世纪上半叶（见图 5.13）。

对大多数雄心勃勃的企业家而言，技能短缺是尤为严重的阻碍因素。[77] 和中小型公司相比，较大的公司及较新的成长中公司更倾向于认为技能是一个限制因素。[78] 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的技能瓶颈制约比生产国内市场所需产品的公司严重。[79] 在 106 个发展中国家中，那些采用新技术更快和那些全球一体化程度较深的国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等待国外候选人来填补职位空缺，这表明技能相关的限制因素更具束缚性。[80] 另一方面，农民和未登记公司的企业家，无论其在农村地区还是城市地区经营，都倾向于认为技能瓶颈没那么严重。[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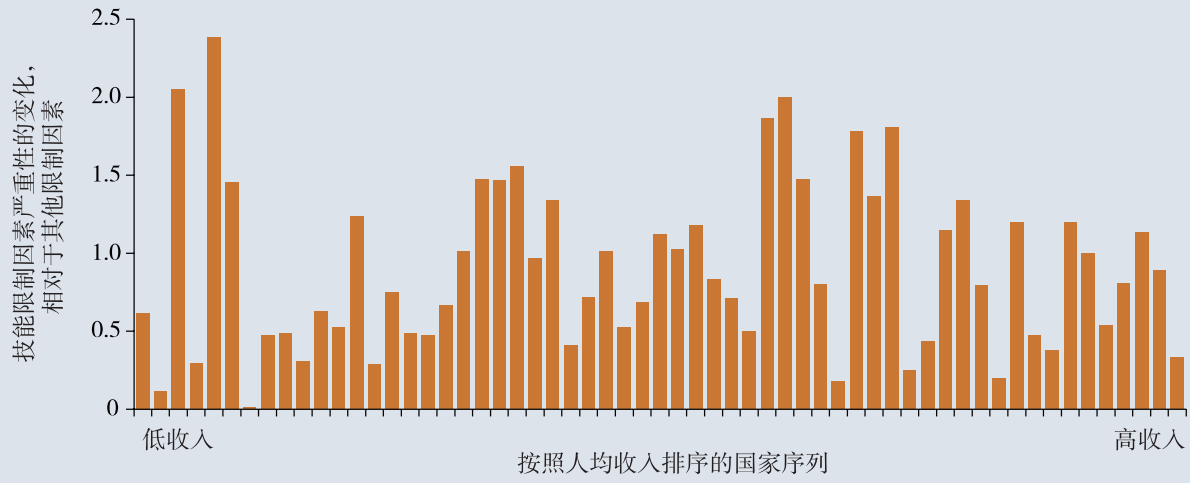
这类失配的直接响应应当是私营公司或个体通过继续教育或培训提高技能，但是有几大重要原因阻碍了人们的响应。公司和农场（尤其是较小的公司和农场）及工人极少有充裕的资金或借款用于这一目的。[82] 公司也不情愿投资员工培训，因为公司担心工人接受培训后会离开公司。[83] 而且公司和工人也可能缺乏认定技能差异的信息。

由于这类市场失灵问题，在解决高失业率问题或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问题时，决策者常常转向教育和培训体系。当前，许多国家正在通过扩大在职培训和就业前（职业）教育的方式提高当前工人或即将成为工人的劳动力的技能。自 2007 年以来，土耳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职业培训入学登记几乎扩大了十倍，2011 年提供了将近 25 万节课程。印度发起了国家技能任务，明确了到 2022 年培训 5 亿人口的目标。

技能建设陷阱

不能夸大技能的重要性（见专栏 5.7）。

图 5.13　和其他限制因素相比较，技能已经成为经营中更严重的限制因素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基于企业调查的估测。

注释：本图显示了从 21 世纪开始到 21 世纪结束时技能限制因素相对重要性的变化。相关的技能限制因素被定义为（a）认为技能短缺是主要或严重限制因素的公司经理的比例和（b）认为其他限制因素是主要或严重限制因素的公司经理的比例的比率。正分意味着技能限制因素是相对于其他限制因素更严重的因素。

专栏 5.7　技能是如何形成的，技能又如何得到测量

技能是毕生获得的能力。人们在性格形成时期的学校教育中、在工作中和培训中通过家庭内外和邻里之间的多种互动和机制学习、获得并形成他们的技能。认知技能包括语言能力、工作记忆、计算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社交技能基于隐藏于团队工作、可靠性、自律或工作努力等行为之中的个性。[a] 技术能力决定了具体任务的绩效。由于所有工作均要求形成于多种途径和不同环境下的技能组合，决策者在制定最佳技能发展方案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挑战。

生命开始的年月对技能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智力和学习能力得以巩固的时候，而智力和学习能力则是发展核心认知和社交技能的基础。[b] 大脑逐步发育成熟，新的技能建立在原先技能的基础之上。如果基础扎实，随后就可以增加较高等级的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这会提高对迅速变化的就业环境的适应能力，获得具体工作所需的技巧。在孟买的贫民窟，一项与初等教育同时进行的特殊计划提高了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和愿望，提高了他们在毕业考试中的成绩和早期劳动力市场的结果。[c] 但是，尽管基础是早些年打下的，在童年结束后和在工作生活中也会形成技能。

对技能测量的关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重视。学业考试为家长、老师和管理者提供了信息，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系统的成绩和成就。尽管这些考试测量的技能在性质上似乎是纯学术性的，考试分数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体的认知技能。相当一部分成绩测验变化可以归因于个性或社会技能及激励机制。个性和社会技能是预测个体生命成就的关键因素，其中包括教育成就和收入。

最近，通过测量在工作场所中所用技能的类别、密度和频率，人们开始评估成人的能力。这些测量的评估范围从比较常规性的手工和工作场所到诸如问题解决能力等复杂的能力，无所不包。[d]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Barrick 和 Mount 1991。

b. Grantham–McGregor 等 2007；Knudsen 等 2006。

c. Krishnan 和 Krutikova 2010。

d. 经合组织 2012；就业和生产率测量学习的技能基于世界银行 2010。

但是，在从这个认识转向启动大规模技能建设计划时，我们需要谨慎。技能短缺或失配的根本原因也许并不在于教育和培训体制。技能短缺和失配

或许是经济领域中其他地方市场扭曲或制度失灵产生的错误信号误导的结果。如果公务员的工资高得出奇，青年人可能会为获得这类工作而学习，即使他们需要排队等候。这可能导致他们获得与私营领域无关的技能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我们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观察到的那样。[84] 同样，压缩工资规模降低了投资教育和培训的积极性。[85] 缺少就业机会信息、交通成本或房地产市场失灵可能是工人没有获得可得工作的真正原因。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这些看起来和技能相关的限制因素实际上都存在于教育和培训体制之外。

此外，提供成功的技能建设服务并非易事。就业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在发展中国家显示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人们发现在职培训和较高的劳动收入和生产率的提高密切相关，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比在工业国家还要明显。[86] 但是只有一小部分工人可以获得在职培训。那些教育程度较低和那些在较小的非正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很少有机会从培训中获益。技术职业培训的结果参差不一：与一般教育相比，技术职业培训给卢旺达、斯里兰卡和泰国等国带来了较高的收入，给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带来的收入与一般教育大体相当，给巴基斯坦带来的收入低于一般教育。[87] 技术职业培训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常常极其有限。[88] 在某些国家，技术职业培训事实上强化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而不是培育了社会的流动性。[89] 质量不好和准入不平等是许多国家的关键限制因素。

问责制和治理安排常常是技能建设倡议的薄弱环节，制度失灵常常取代市场失灵。就积极的一面来看，现代灵活的技能发展战略通常已经取代了老式的、机械的人力资源计划（见专栏 5.8）。许多国家也创设了监督机构，比如巴基斯坦的信德技术和职业培训局，从而将质量控制与供应商管理与资金链分开。印度的国家技能发展战略的原则基础是严格区分管理培训、证书和鉴定的机构。[90] 就消极的一面来看，责任分散在许多部门中、与私营领域存在距离、对迅速变化的技能需求响应滞缓、供应商俘虏仍然是世界上培训计划和就业前教育的困扰因素。

所教授的内容也很重要。社会技能常常是缺失的部分，但是社交技能鲜能在学校里或培训中心中获得。在印度，工程师的雇主强调可靠、学习意愿和企业家能力，认为这些能力是比具体的技术能力、数学运营能力、科学或英语等能力更重要的能力。[91] 在博茨瓦纳，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以及其他具体工作的技能通常被认为不如忠诚、沟通和基本问题解决能力重要。[92] 在秘鲁，40%的雇主抱怨他们的雇员缺少可信赖的职业道德和团队精神、坚忍不拔、达成共识的能力或主动性等个体品质。这种主管评估得到了过硬证据的印证，证据显示，坚持不懈这一社会情感特征的回报和一般认知能力的回报一样高。[93]

在工作中学习

技能对工作很重要，反之亦然。许多技术技能和社交技能可以在工作场所的经历中获得，在工作中塑造技能可以获得优厚的回报。一般而言，在非农活动中工作经历每增加一年带来的回报，大约相当于开始工作时增加一年教育所带来回报的一半。[94] 而且经理层会对经验予以奖励。在五个非洲国家里，经理层认为在作出聘用

专栏 5.8　人力资源规划让位于活跃的技能发展

人力资源规划盛行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这是一种使用宏观经济和部门预测决定需要多少具体技术技能的工人。少数人力资源规划取得了成功，这些人力资源规划密切融入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战略，并受益于普遍的基本教育体制，如同韩国做的那样。[a] 但是人力资源规划的僵化特点很快使其令人感到压抑。人力资源规划通常假定劳动和产出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关系，从而完全将技术变革排除在外。人力资源规划也偏重技术技能，不利于认知技能和社会技能的发展。而且，人力资源规划不能很快适应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就业的迅速变化。[b]

工作的重点逐渐从只确保技能的充分供应转向提供需求响应的优质技能开发方案。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韩国不再制定具有明确工业目标的长期宏观经济计划。人力资源供给工业规划退居次要地位，强调教育和技能发展质量和相关性的新的国家倡议占据了主要地位。[c] 范围扩大了，一体化程度加深了，机械式的预测被取代了。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新加坡制定了为其劳动力、特别是教育程度和技能都比较低的劳动力提供进修、再培训和终身学习机会的一体化战略。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地要求私营领域成为技能发展的推动力量。2006 年，印度的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制定了标准技能评估和认证机制。韩国技术教育大学（KUT）确立了网桥模式，这是一种三向伙伴关系，也涉及一个单一的主要企业及作为其主要分包商的中小企业集群。主要企业贡献技术知识，中小企业培训雇员，韩国技术教育大学提供教学设备和内容。[d] 2006 年，三星成为第一家“网桥”，此后，另外五家大公司也成为网桥。

从综合技能建设体制中，尤其是从东亚的综合技能建设体制中可以学到很多。但是这些体制要求复杂的制度机制，而这可能是能力较低的环境力不能及的。[e] 围绕能力、证书和鉴定等定义，100 多个国家启动了综合性的国家资格认证框架。但是也有例外，结果和效果可以振聋发聩。[f] 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有效执政能力不强，而由于最重要的参与者（父母、教师、培训院校和公司）对综合技能建设缺少强烈的认可，因而进步受到阻碍。或许最具价值的教训来自东亚国家，即技能发展体制需要在上层的协调和培育下自下发展。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Kim 2002。
b. Richards 1994。
c. Kim 2002。
d. Lee 等 2008。
e. Nam 2011。
f. 国际劳工组织 2010b。同时见 DFID 2010；Gill，Fluitman 和 Dar 2000。

决定时，工作经验是比技术技能和教育更重要的因素。[95]

学徒计划将教育和在工作中学习融为一体，在世界上有很多种存在的形式，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正规模式到中欧的二元模式，种种不一。非正规学徒方式常常是技术技能代际传承的基本机制，如果逐渐将其纳入国际培训体系，这种方式可以得到加强。[96]

二元模式在德国根深蒂固，这种模式将基于教室的、旨在建设一般性可传递技能的学校教育与在培训公司中的在职培训结合在一起。[97] 在法国、德国和荷兰，二元模式因其快速的、结构式的就业一体化而得到认可。[98] 但是二元模式不仅仅要求合适的经济激励，二元模式基于雇主（提供场所、投资学徒的未来事业作为公共商品）、工作（接受培训生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和政府（资助职业学校并进行质量监控）之间的社会合同。[99] 私营领域的承诺是基本的条件，包括培训资金及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的连续性。鉴于如此高的制度要求，试图完全移植二元模式的举动收益甚微。

在职发展技能前景很好，这是因为在正式的学校教育结束后，技能在青年时期和工作生涯中持续发展和积累。[100] 工作，尤其是早期经历也可以塑造行为和态度，其中包括对社会整

体的奉献意愿。

重要的是，工作也支持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传播知识。知识溢出效应是城市中和生产集群中聚集效应的基础。[101] 但是来自工作的知识溢出效应也发生在农村地区。在印度绿色革命期间，与那些与无经验的人比邻而居的农民相比，与有经验的人比邻而居的农民收获更大的利益。[102] 村庄层面的社会学习效应是可观的。[103]

通过促使人们与外界的联系，工作也可以激励技能建设。在外资公司工作或在融入国际价值链的公司中工作提供了获得新技术和管理技能的机会。这种学习促进模仿，可以具有一圈圈扩大的涟漪效应。[104] 在新加坡，1972 年，印度塔塔集团与经济发展委员会合作建立公司所有的、培训精密工程师的培训中心，就这一方面而言，印度塔塔集团是第一家。接下来，这一合作模式在与其他外资公司的合作中得到成功复制，并于 1993 年最终合并形成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今天，南洋理工大学已经成为工业主导型培训的国际专门技能的源泉。[105] 英特尔决定在哥斯达黎加建立半导体装配和测试工厂的决定同样大大改善了该国的愿景并促进了其技能建设体系。[106]

工作需要技能，促进技能并建设技能

某些技能是生产性就业兴起的第一位必要条件。这些技能不能在工作中获得。无论是在农业环境中还是在城市环境下，没有计算能力和识字能力，要想改善就业机会并提高收入的希望微乎其微。今天，世界上超过十五分之一的 15~24 岁青年属于功能上的文盲，这不利于他们未来的发展。[107] 而且，作为基本认知能力的补充，社交能力的地位日益突出。鉴于技能建设是累积性的，为今后技能获得道路奠定基础的工作仍然是绝对的重点。然而许多国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基础到位的情况下，工作可以促进技能。就业机会增加了对教育的需求，而体系必须应对这一需求。这里，政策的作用在于信号得到充分的传递，为青年人口和其他工作年龄人口持续积累技能提供动力。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给学生提供关于中学教育实际回报的信息大大提高了入学率。[108] 在印度，为女性提供工作机会的信息提高了女孩的教育程度，延迟了女性的婚姻和生育行为。[109] 另一方面，就业中的特权扭曲了信号。特权不能促进技能建设，而是损害并阻碍了技能建设。

工作本身就可以建设技能，尤其是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考虑到坎坷的由学校向工作转型的长期负面效应，重视支持第一次求职者的行为应该具有重要的收效。

但是即使基本认知能力到位，工作可能既不大幅度促进也不大幅度建设技能。当来自聚集和全球一体化的利益存在但却得不到充分挖掘的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的国家常常可以收获可观的知识溢出，但是却可能不能沿着附加值阶梯向上移动。如果是这样，这些国家可能陷入低生产率和低技能的陷阱。[110] 当技能不足以刺激创新和过低的技能需求不能鼓励获得技能时，就会出现这样的陷阱。在这些情况下，就需要更具相关性的学校教育和中等的、技术的及可能更高层面的技能培训，从而为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创造前提条件。

注释

1. Glewwe 2004；世界银行 2008b。

2. Nunn 和 Wantchekon 2011。

3. 国际劳工组织 2012b。

4. 国际劳工组织 2010a。

5. 联合国，1948，《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纽约，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第 23 条（1）。对宣言予以补充的国际公约旨在保护女性、儿童、残疾人、移民和其他人口的权利，这些公约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儿童权利公约》（1989）、《保护一切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的国际公约》（1990）及《残疾人权利公约》（2006）。保护劳动权利的区域性机制包括《欧洲人权公约》、《欧洲社会宪章》和《美洲国家人权公约》。这些公约均明确提出保护一系列劳动权利。在国家层面，国家将工人权利纳入宪法、国家法律和规章制度。国家法律对国际权利和标准的具体解释和应用予以详细说明。

6. 核心国际劳动标准是涉及四大领域的八大公约的内容：第 87 号公约（1948），《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公约》；第 98 号公约（1949），《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29 号公约（1930），《强迫劳动公约》；第 105 号公约（1957），《废止强迫劳动公约》；第 100 号公约（1951），《同酬公约》；第 111 号公约（1958），《（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38 号公约（1973），《最低就业年龄公约》和第 182 号公约（1999），《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公约》。同时见“公约”，Normlex（国际劳动标准信息体系）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

7. 例如，第 122 号公约涉及就业政策，第 81 号公约和第 129 号公约针对劳动监察（第 129 号公约针对农业），第 144 号公约涉及三方磋商。

8. 国际劳工组织 1998。

9. Hassel 2008。例如，国际金融组织的保障政策与核心劳动标准是一致的。见国际金融组织 2012。

10. 理论上，结社自由为工人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提供了途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国家法律和规章制度都涉及安全和健康，自愿将安全与健康纳入行动章程的私人领域也日益增加。

11.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Fredman 2012。

12. 家庭工人在由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的亲属经营的市场导向型的企业中自就业。见国际劳工组织 2011a。

13. Sankaran 2007。

14.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Fredman 2012。

15.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Levi 等 2012。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Newitt 2012。这些倡议受到国际标准的支持，例如国际金融组织的绩效标准 2，针对金融机构的赤道原则及联合国商业及人权指导原则。

16. Clark 2005；Helliwell 和 Putnam 2004。

17. Fan 和 Chan-Kang 2008。

18. Summers 1989。

19. 世界银行 2009a。

20. Bell 和 Blanchflower 2010；Bell 和 Blanchflower 2011。

21. Beegle，Goldstein 和 Rosas 2011。

22. Attanasio 和 Lechene 2002。

23. Hoddinott 和 Haddad 1995；Quisumbing 和 Maluccio 2003。

24. Backiny-Yetna 和 Wodon 2011。

25. Akresh，de Walque 和 Kazianga 2012。

26. de Mel，McKenzie 和 Woodruff 2009；Fafchamps 等 2011。

27. Luke 和 Munshi 2011。

28. Kaveh 2012。

29. Atkin 2009。

30.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Duranton 2012。

31. 本例证旨在阐释利害的程度，而不是宣示福利。城市有金钱成本（如较高的房价）和非金钱成本（如更严重的污染问题和更多的犯罪问题）。生活成本也随着城市的规模而增加。来自工业国家的越来越多的证据也显示了在较大的城市中工资的增长效应，而不仅仅是水平效应。见 Freedman 2008；Holmlund 和 Storrie 2002；Wheeler 2006。

32. Bacolod，Blum 和 Strange 2009；Glaeser 和 Resseger 2010；Wheeler 2001。

33. Duranton 2006；Moretti 2004a。文献中的早期研究结果来自美国数据，但是这些结果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得到了验证。就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结果在智利（Saito 和 Gopinath 2011），中国（Liu 2011）、马来西亚（Conley，Flyer 和 Tsiang 2003）和俄罗斯联邦（Muravyev 2008）中再次出现。

34. Duranton 2008；Henderson 2005；Overman 和 Venables 2005。

35. Sonobe 和 Otsuka 2006b。

36. 国际金融公司，待出版。

37. Duranton 2008；Henderson 2005；Overman 和 Venables 2005；世界银行 2009c。

38. Glaeser 和 Kohlhase 2004。

39. Santos 和 Shaffer 2004。

40. Parry 和 Timilsina 2010。

41. Rappaport 2008。关于荷兰的证据，见 Broersma 和 Oosterhaven（2009）。

42. Zivin 和 Neidell 2011。

43. Henderson，Kuncoro 和 Turner 1995；Henderson，Lee 和 Lee 2001。

44. Long 和 Zhang 2011；Mano 等，待出版；McCormick 1999；Schmitz 和 Nadvi 1999；Sonobe 和 Otsuka 2006a。

45. Feenstra 1998；Hummels，Ishii 和 Yi 2001；Yeats 2001；Yi 2003。

46. Fernandes 2007。

47. Harrison，Martin 和 Nataraj 2011。

48. Harrison 1994；Levinsohn 1993；Muendler 2004。

49. Aw，Chung 和 Roberts 2000；Aw，Roberts 和 Winston 2007；Blalock 和 Gertler 2004；De Loecker 2007；Fernandes 和 Isgut 2007；Hallward-Driemeier，Larossi 和 Sokoloff 2002；Lileeva 2004；Matthias Arnold 和 Javorcik 2009；Park 等 2010；Van Biesebroeck 2005。

50. Aitken，Hanson 和 Harrison 1997；Gorg 和 Strobl 2005；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Javorcik 2012；Kee 2010；Poole，待出版。

51. Alfaro 和 Chen 2011。

52. Unni 和 Rani 2008。

53. Bolaky 和 Freund 2004；Chang，Kaltani 和 Loayza 2009；DeJong 和 Ripoll 2006。

54. Blalock 和 Gertler 2005；Borensztein，De Gregorio 和 Lee 1998；Glass 和 Saggi 2002；Kinoshita 2000；Kokko，Tansini 和 Zejan 1996；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Javorcik 2012。

55. Hallegatte 等 2011。

56. 联合国环境署 2011。

57. 该估测基于 1995 年每公吨碳 20 美元的社会成本（Fankhauser 1994），使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转化为 2009 年价格。关于估测方法的来源，见图 5.9 注释。

58. 相比之下，欧洲有关绿色增长的讨论常常围绕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低碳制造（GHK 2009；Oral，Santos 和 Zhang 2011）。

59.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07。

60. Stevenson 等 2011。

61. Otsuka 和 Place 2001；Pingali，Bigot 和 Binswanger 及 Mkhize 1987；Yamano，Otsuka 和 Place 2011。

62.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Norton 和 de Haan 2012。

63. Akerlof 和 Kranton 2010。

64. Heath 和 Mobarak 2011。

65. Ibarraran 等 2012。

6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3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3b。

67. Dani 等 1999，3。

68. Kilroy 2011。

69. 假定情景与儿童出生时的能力无关。

70.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bras 等 2012。

71. Hanushek 和 Woessmann 2008。Lee 和 Newhouse 2012（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通过开展小组分析，将测验分数与就业成果相匹配，从而拓展了 Hanushek 和 Woessmann（2008）的分析。

72.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Lee 和 Newhouse 2012。

73. Gennaioli 等 2011。

74.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Welzel 2012。

75.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家家庭调查计算出来的。如果员工的教育（在校年限）比所在行业的平均值高出一个规格，该员工就被认为资历过高；如果员工的教育比所在行业的平均值低出一个规格，该员工就被认为是资历过低。使用国际劳工组织二类职业分类定义。

76. 这是对相关限制因素的比较。每一个国家将技能列为严重或极其严重的限制因素的公司的比例除以所有其他限制因素的这类评估的平均数。这使得不受主观回答程度影响的跨国比较成为可能。

77. 使用世界银行在 105 个国家开展的企业调查对相关技能限制因素和一系列变量的条件相关进行估测，我们发现与公司规模（正相关）、年龄（负相关）、出口活动（正相关）、创新活动（正相关）和制造业领域（正相关）存在很大的相关性。

78. 关于在格鲁吉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波兰和乌克兰等国家例证的信息，

见 Rutkowski（2008）；Rutkowski（2010）；世界银行（2009b）；和世界银行（2011a）。

79. Di Gropello，Kruse 和 Tandon 2011；Di Gropello，Tan 和 Tandon 2010。

80. Almeida 和 Filho 2012。

81. 针对未登记公司的专业化投资气候调查，由国际金融公司主持在阿富汗、安哥拉、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佛得角、刚果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马里和尼泊尔进行的调查。公司所有者被要求指出对他们经营活动限制最大的因素，限制因素的数量因调查而异。据悉，埃及的百分比最高，在 21 项选项中，6%的公司所有者选择技能为最严重的限制因素。阿富汗的百分比最低，在 12 项选项中，5%的公司所有者选择技能为最严重的限制因素。在贝宁、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坦桑尼亚、斯里兰卡和也门共和国对农村投资气候进行了评估，就技能的重要性而言，得到的结果大同小异（见 Sawada 2011）。

82. 许多国家设立了常常由工薪税资助的培训基金为培训提供资金，这些国家有巴西、智利、墨西哥或新加坡。Almeida，Behrman 和 Robalino，2012。

83. 在拉丁美洲，10%的小公司说这是它们不在机构内部加强培训的主要原因。《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拉丁美洲国家企业调查的计算（巴西除外）。

84. Assaad 1997。

85. 见 Biavaschi 等 2012 中所记载的关于地中海国家的例证。（Biavaschi 等 2012 是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86. Almeida，Behrman 和 Robalino 2012。

87. 来自具体年份研究的估测。印度（2004 年数据），巴基斯坦（2004 年数据），斯里兰卡（2002 年数据）：Riboud，Savchenko 和 Tan（2007）；印度尼西亚（1993 年、1997 年、2000 年、2007 年数据）：Newhouse 和 Suryadarma（2011）；卢旺达（1999—2001 年数据）：Lassibille 和 Tan（2005）；泰国（1989—1995 年数据）：Moenjak 和 Worswick（2012）。

88. 关于多少中学生应当在职业学校就读的问题，并不存在金科玉律。大多数发达国家对具体技术技能的需求较大，报酬也较优厚，在职业学校就读的学生比例在 40%到 50%之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例是 33%（http：//www.uis.unesco.org/Pages/default.aspx）。

89. 见 Tan 和 Nam（2012）。在发达国家中，从技术职业培训学校毕业的学生的就业率与一般教育中毕业的学生的就业率大体相当，但是他们的收入稍微低点儿。

90. 印度计划委员会 2008。

91. Blom 和 Saeki 2011。

92. 世界银行 2012a。

93. 世界银行 2011b。

94. 《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对 545 个家庭调查的 Mincer 回归，其中包括受教育的年限和潜在的工作经历。（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Montenegro and Patrinos 2012）。

95. 麦肯锡公司 2012。经理们面临四个选项并从中选出聘用中最大的瓶颈因素：教育（毕业证书或教育程度）、不一定在学校学到的技术能力（例如焊接或会计）、社交能力（例如，态度、工作行为、守时、可信任）或工作经历。

96. 国际劳工组织 2011b；Nübler 2008。国际劳工组织也组织了为数不少的学校—工作转型的调查，提供了关于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限制因素和选择的远见卓识。见 Matsumoto 和 Elder（2010）。

97.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Biavaschi 等 2012。有趣的是，对德国而言，起初的转型并不取决于在培训公司中谋求就业。即便在具体的公司发生培训和在职学习，学到的技能似乎是可传递的（Winkelmann 1996）。

98. 关于文献综述，见 Biavaschi 等 2012（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99. 见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Biavaschi 等 2012。

100. Cunha，Heckman 和 Schennach 2010；Heineck 和 Anger 2010。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针对贫穷青年（未完成中学学业的 16 岁到 29 岁青年）的生活技能培训早期结果显示了巨大的成就。青年女性参与者的怀孕率降低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工作满意度和愿望都显著提高了（Ibarraran 等 2012）。

101. Glaeser 和 Mare 2001；Kimura 2011；Mas 和 Moretti 2009；Peri 2002。Iranzo 和 Peri（2009）发现在美国，由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拥有的工作产生很大的溢出效应（较高的教育程度是先进技能的代表因素）。每位工人的大学教育增加一年，除了对学生的收入

和就业机会具有的影响外，还具有对各自国家的生产率增长具有 6%到 9%的溢出效应。同时见 Ciccone 和 Peri 2006；Moretti 2004a；Moretti 2004b；Moretti 2004c；及 Rosenthal 和 Strange 2008。

102. Foster 和 Rosenzweig 1996。

103. Yamauchi 2007。同时见 Ghana，Conley 和 Udry 2010。

104. Almeida，Behrman 和 Robalino 2012。

105. Lin 和 Lim 2011；Tan 和 Nam 2012。

106. 世界银行 and MIGA 2006。

107.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http：//data.world 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 indicators。

108. Jensen 2010。

109. Jensen，待出版。

110. 关于低技能、低生产率陷阱的讨论，见 Acemoglu（1997）；Almeida，Behrman 和 Robalino（2012）；Amjad（2005）；Atal 等（2010）；Munshi（2011）；及 Snower（1994）。关于中美洲人力资本积累、生产多元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的关系，见 Bashir，Gindling 和 Oviedo 2012（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bras, Ana, Alejandro Hoyos, Ambar Narayan, and Sailesh Tiwari. 2012.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in the Labor Market: Evidence from Life in Transition Surveys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Acemoglu, Daron. 1997. "Technology, Unemployment and Efficienc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1 (3–5): 525–33.

Aitken, Brian, Gordon H. Hanson, and Ann E. Harrison. 1997. "Spillovers,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xport Behavi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3 (1–2): 103–32.

Akerlof, George A., and Rachel E. Kranton. 2010. *Identity Economics: How Our Identities Shape Our Work, Wages, and Well-Be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kresh, Richard, Damien de Walque, and Harounan Kazianga. 2012. "Alternative Cash Transfer Delivery Mechanisms: Impacts on Routine Preventative Health Clinic Visits in Burkina Faso."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95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lfaro, Laura, and Maggie Xiaoyang Chen. 2011. "Selection, Reallocation,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Identifying the Impact of Multinational Activity o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 October 6.

Almeida, Rita, Jere R. Behrman, and David A. Robalino, eds. 2012. *The Right Skill for the Job? Rethinking Effective Training Policies for Worke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lmeida, Rita, and Jaime Filho. 2012.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the Demand for Skills: Learning from the Time to Fill Job Vacancies in LAC."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Amjad, Rashid. 2005. "Skills and Competitiveness: Can Pakistan Break Out of the Low-Level Skills Trap?"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44 (4): 387–409.

Anker, Richard. 2003. "Measuring Decent Work with Statistical Indicator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2 (2): 147–77.

Assaad, Ragui. 1997. "The Effects of Public Sector Hiring and Compensation Policies on the Egyptian Labor Market."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1 (1): 85–118.

Atal, Vidya, Kaushik Basu, John Gray, and Travis Lee. 2010. "Literacy Traps: Society-Wide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Skill Prem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6 (1): 137–48.

Atkin, David. 2009. "Working for the Future: Female Factory Work and Child Health in Mexic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Processed.

Attanasio, Orazio, and Valerie Lechene. 2002. "Tests of Income Pooling in Household Decisions."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5 (4): 720–48.

Aw, Bee Yan, Sukkyun Chung, and Mark J. Roberts. 2000. "Productivity and Turnover in the Export Market: Micro-Level Evidence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aiwan (Chin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4 (1): 65–90.

Aw, Bee Yan, Mark J. Roberts, and Tor Winston. 2007. "Export Market Participation, Investments in R&D and Worker Trai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Firm Productivity." *World Economy* 30 (1): 83–104.

Backiny-Yetna, Prospere, and Quentin Wodon. 2011. "Gender Labor Income Shares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ongo." In *Gender Disparities in Africa's Labor Market*, ed. Jorge Saba-Arbache, Alexandre Kolev, and Ewa Filipiak, 359–8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Bacolod, Marigee, Bernardo S. Blum, and William C. Strange. 2009. "Skills in the Cit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5 (2): 136–53.

Barrick, Murray R., and Michael K. Mount. 1991.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and Job Performance: A Meta Analysis." *Personnel Psychology* 44 (1): 1–26.

Bashir, Sajitha, T. H. Gindling, and Ana Maria Oviedo. 2012. "Better Jobs in Central America: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Beegle, Kathleen, Markus Goldstein, and Nina Rosas. 2011. "A Review of Gend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Asset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Bell, David N. F., and David G. Blanchflower. 2010. "Youth Unemployment: Déjà Vu?"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4705,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 2011. "The Crisis, Policy Reactions and Attitudes to Globalization and Job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680,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Biavaschi, Costanza, Werner Eichhorst, Corrado Giulietti, Michael J. Kendzia, Alexander Muravyev, Janneke Pieters, Nuría Rodríguez-Planas, Ricarda Schmidl, and Klaus F. Zimmermann. 2012. "Youth Unemployment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Bjørkhaug, Ingunn, Anne Hatløy, Tewodros Kebede, and Huafeng Zhang.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Colombi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Blalock, Garrick, and Paul J. Gertler. 2004. "Learning from Exporting Revisited in a Less Developed Sett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5 (2): 397–16.

———. 2005.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ternalities: The Case for Public Intervention." In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mote Development?*, ed. Theodore H. Moran, Edward M. Graham, and Magnus Blomstrom, 73–106.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lom, Andreas, and Hiroshi Saeki. 2011. "Employability and Skill Set of Newly Graduated Engineers in India." Working Paper Series 564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olaky, Bineswaree, and Caroline Freund. 2004. "Trade, Regulations, and Growt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25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orensztein, Eduardo, José De Gregorio, and Jong-Wha Lee. 1998.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5 (1): 115–35.

Bowen, Alex. 2012. " 'Green' Growth, 'Green' Jobs and Labour Market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99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roersma, Lourens, and Jan Oosterhaven. 2009. "Regional Labor Productivity in the Netherlands: Evidence of Agglomeration and Congestion Effect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49 (3): 483–511.

Chang, Roberto, Linda Kaltani, and Norman V. Loayza. 2009. "Openness Can Be Good for Growth: The Role of Policy Complementarit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0 (1): 33–49.

Ciccone, Antonio, and Giovanni Peri. 2006. "Identifying Human-Capital Externalities: Theory with Applic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3 (2): 381–412.

Clark, Andrew. 2005. "What Makes a Good Job?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In *Job Quality and Employer Behavior*, ed. Stephen Bazen, Claudio Lucifora, and Wiemer Salverda, 11–3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Conley, Timothy G., Fredrick Flyer, and Grace R. Tsiang. 2003. "Spillovers from Local Market Human Capital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vity in Malaysia." *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3 (1): 1–45.

Conley, Timothy G., and Christopher Udry. 2010. "Learning about a New Technology: Pineapple in Gha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1): 35–69.

Cunha, Flavio, James J. Heckman, and Susanne Schennach. 2010. "Estimating the Technology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 Formation." *Econometrica* 78 (3): 883–931.

Dani, Anis, Sarah Forster, Mirsada Muzur, Dino Djipa, Paula Lytle, and Patrizia Poggi. 1999. *A Social Assessment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e Loecker, Jan. 2007. "Do Exports Generate Highe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Slove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3 (1): 69–98.

de Mel, Suresh, David J. McKenzie, and Christopher Woodruff. 2009. "Are Women More Credit Constrained?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Gender and Microenterprise Returns." *Applied Economics* 1 (3): 1–32.

DeJong, David N., and Marla Ripoll. 2006. "Tariffs and Growth: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Contingent Relationship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8 (4): 625–40.

DFID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nited Kingdom). 2010. *Engaging the Private Sector in Skills Development*. London: DFID.

Di Gropello, Emanuela, Aurelien Kruse, and Prateek Tandon. 2011. *Skills for the Labor Market in Indonesia: Trends in Demand, Gaps, and Suppl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i Gropello, Emanuela, Hong Tan, and Prateek Tandon. 2010. *Skills for the Labor Market in the Philippin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iallo, Yacouba, Frank Hagemann, Alex Etienne, Yonca Gurbuzer, and Farhad Mehran. 2010. *Global Child Labour Developments: Measuring Trends from 2004 to 2008*.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Duranton, Gilles. 2006.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in Cities: Identification and Policy Issues." In *A Companion to Urban Economics*, ed. Richard J. Arnott and Daniel P. McMillen, 24–39. Oxford: Blackwell.

———. 2008. "Viewpoint: From Cities to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1 (3): 689–736.

———. 2012. "Agglomeration and Jo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2007. D.H. and Others v. The Czech Republic [GC], No. 57325/00.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Strasbourg.

Fafchamps, Marcel, David J. McKenzie, Simon Quinn, and Christopher Woodruff. 2011. "When Is Capital Enough to Get Female Microenterprises Growing?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in Ghana." Working Paper Series 1720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Fan, Shenggen, and Connie Chan-Kang. 2008. "Regional Road Development, Rural and Urban Poverty: Evidence from China." *Transport Policy* 15 (5): 305–48.

Fankhauser, Samuel. 1994. "The Economic Costs of Global Warming Damage: A Surve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4 (4): 301–9.

Farley, Melissa. 2003. *Prostitution, Trafficking and Traumatic Stress*. Binghamton, NY: Haworth Maltreatment & Trauma Press.

Feenstra, Robert C. 1998. "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 (4): 31–50.

Fernandes, Ana M. 2007. "Trade Policy, Trade Volumes and Plant-Level Productivity in Colomb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1 (1): 52–71.

Fernandes, Ana M., and Alberto Isgut. 2007. "Learning-by-Exporting Effects: Are They for Real?" MPRA Paper 3121,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 Munich.

Foster, Andrew D., and Mark R. Rosenzweig. 1996. "Technical Change and Human-Capital Returns and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the Green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 (4): 931–53.

Fredman, Sandra. 2011. *Discrimination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2. "Anti-Discrimination Laws and Work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 Thematic Overview."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Freedman, Matthew L. 2008. "Job Hopping, Earnings Dynamic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the Software Publishing Industr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4 (3): 590–600.

Gennaioli, Nicola,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2011. "Human Capit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1715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Ghai, Dharam. 2003. "Decent Work: Concept and Indicator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2 (2): 113–45.

GHK. 2009.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European Employment and Skills in the Short to Medium-Term: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Final Report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for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Inclusion Restructuring Forum No. 2, London.

Gill, Indermit, Fred Fluitman, and Amit Dar. 2000.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form: Matching Skills to Markets and Budge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laeser, Edward, and Janet Kohlhase. 2004. "Cities, Regions and the Decline of Transport Costs."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3 (1): 197–228.

Glaeser, Edward L., and David C. Mare. 2001. "Cities and Skill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 (2): 316–42.

Glaeser, Edward L., and Matthew G. Resseger. 2010.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Cities and Skill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0 (1): 221–44.

Glass, Amy Jocelyn, and Kamal Saggi. 2002.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6 (2): 387–410.

Glewwe, Paul W. 2004. "An Overview of Economic Growth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Vietnam in the 1990s." In *Economic Growth, Poverty,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Vietnam*, ed. Paul Glewwe, Bina Agarwal, and David Dollar, 1–2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örg, Holger, and Eric Strobl. 2005.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Firms through Worker Mobilit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4): 693–709.

Grantham-McGregor, Sally, Yin Bun Cheung, Santiago Cueto, Paul Glewwe, Linda Richter, Barbara Strupp, and Inter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eering Group. 2007.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the First 5 Years for Childr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ancet* 369 (9555): 60–70.

Hallegatte, Stephane, Geoffrey Heal, Marianne Fay, and David Treguer. 2011. "From Growth to Green Growth: A Framewor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87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allward-Driemeier, Mary, Giuseppe Larossi, and Kenneth L. Sokoloff. 2002. "Exports and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in East A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Firm-Level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889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Hanushek, Eric A., and Ludger Woessmann. 2008. "The Role of Cognitive Skill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 (3): 607–88.

Harrison, Ann E. 1994. "Productivity,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rade Reform: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6 (1–2): 53–73.

Harrison, Ann E., Leslie A. Martin, and Shanthi Nataraj. 2011. "Learning Versus Stealing: How Important Are Market-Share Reallocations to India's Productivity Growth?" Working Paper Series 1673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Hassel, Anke. 2008. "The Evolution of a Global Labor Governance Regim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21 (2): 231–51.

Hatløy, Anne, Tewodros Kebede, Huafeng Zhang, and Ingunn Bjørkhaug.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Sierra Leon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Heath, Rachel, and Mushfiq Mobarak. 2011. "Supply and Demand Side Constraints on Educational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Garment Sector Jobs and a Girls' Schooling Subsidy Program in Bangladesh."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Processed.

Heineck, Guido, and Silke Anger. 2010. "The Returns to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in Germany." *Labour Economics* 17 (3): 535–46.

Helliwell, John, and Robert Putnam. 2004. "The Social Context of Well-Be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59: 1435–46.

Henderson, J. Vernon. 2005. "Urbanization and Growth."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B, ed.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1543–91. Amsterdam: Elsevier.

Henderson, Vernon, Ari Kuncoro, and Matt Turner. 1995.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 (5): 1067–90.

Henderson, Vernon, Todd Lee, and Yung Joon Lee. 2001. "Scale Externalities in Korea."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9 (3): 479–504.

Hoddinott, John, and Lawrence Haddad. 1995. "Does Female Income Share Influence Household Expenditures? Evidence from Côte d'Ivoire."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7 (1): 77–96.

Holmlund, Bertil, and Donald Storrie. 2002. "Temporary Work in Turbulent Times: The Swedish Experience." *Economic Journal* 112: 245–69.

Human Rights Watch. 2011. *A Poisonous Mix: Child Labor, Mercury, and Artisanal Gold Mining in Mali*.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Hummels, David, Jun Ishii, and Kei Mu Yi. 2001.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4 (1): 75–96.

Ibarrarán, Pablo, Laura Ripani, Bibiana Taboada, Juan Miguel Villa, and Brigida Garcia. 2012. "Life Skills, Employability and Training for Disadvantaged Youth: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Desig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6617,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1. *CO_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Highlight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IEA: Paris.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2012. *IFC's Performance Standard 2*. Washington, DC: IFC.

———. Forthcoming. "Assessing Private Sector Contributions to Job Creation." Jobs Study, IFC, Washington, DC.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1998.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at its 86th session, ILO, Geneva, June 18.

———. 2002. *Decent Work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Geneva: ILO.

———. 2003. *Safety in Numbers: Pointers for a Global Safety Culture at Work*. Geneva: ILO.

———. 2009. *The Cost of Coercion*. Geneva: ILO.

———. 2010a. *Accelerating Action against Child Labour*. Geneva: ILO.

———. 2010b.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s: Report of a Study in 16 Countries*. Geneva: ILO.

———. 2011a. *Coverage of Domestic Workers by Key Working Conditions Laws*. Geneva: ILO.

———. 2011b. *Skills for Employment Policy Brief: Upgrading Informal Apprenticeship Systems*. Geneva: ILO.

———. 2012a. *General Survey on the Fundamental Conventions Concerning Rights at Work in Light of the ILO Declaration on Social Justice for a Fair Globalization, 2008*. Geneva: ILO.

———. 2012b. *ILO Global Estimate of Forced Labour: Results and Methodology*. Geneva: ILO.

Indian Planning Commission. 2008. *Eleventh Five Year Plan, 2007–2012*.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Government of India.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AR4)*. Geneva: IPCC.

Iranzo, Susana, and Giovanni Peri. 2009. "Schooling Externalities,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S. Stat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 (2): 420–31.

ITUC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2011. *Annual Survey of Violations of Trade Union Rights, Foreword: 2011 Survey*. Brussels: ITUC.

Javorcik, Beata Smarzynska. 2012. "Does FDI Bring Good Jobs to Host Countri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Jensen, Robert. 2010. "The (Perceived)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Schoo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 (2): 515–48.

———. Forthcoming. "Do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Affect Young Women's Work and Family Decision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Kaveh, Majlesi. 2012.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Sex-Specific Investment in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Mexico."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ustin, TX. Processed.

Kebede, Tewodros, Anne Hatløy, Huafeng Zhang, and Ingunn Bjørkhaug.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Egyp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Kee, Hiau Looi. 2010. "Uncovering Horizontal Spillovers: When Foreign and Domestic Firms Share Common Local Input Supplier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Kilroy, Austin. 2011. "Business Bridging Ethnicity." PhD thesi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Kim, Gwang-Jo. 2002. "Education Policies and Reform in South Korea." I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Africa: Strategies for Renewal*, 29–4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Kimura, Yuichi. 2011.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Clusters: A Paper-Manufacturing Village in Northern Vietnam." *World Development* 39 (12): 2105–18.

Kinoshita, Yuko. 2000. "R&D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via FDI: Innova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Working Paper Series 349,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Ann Arbor, MI.

Knudsen, Eric, James Heckman, Judy Cameron, and Jack Shonkoff. 2006. "Economic, Neurob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erspectives on Building America's Future Workfor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3 (27): 10155–62.

Kokko, Ari, Ruben Tansini, and Mario C. Zejan. 1996. "Loca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DI in the Uruguayan Manufacturing Sect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2 (4): 602–11.

Krishnan, Pramila, and Sofya Krutikova. 2010. "Skill Formation in Bombay's Slums." Cambridge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1010,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K.

Lassibille, Gerard, and Jee-Peng Tan. 2005.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Rwand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4 (1): 92–116.

Lee, Jean, and David Newhouse. 2012. "Cognitive Skill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Lee, Sing Kong, Chor Boon Goh, Birger Fredriksen, and Jee-Peng Tan. 2008. *Toward a Better Futu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since 196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ingapo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Levi, Margaret, Christopher Adolph, Aaron Erlich, Anne Greenleaf, Milli Lake, and Jennifer Noveck. 2012. "Align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Why, When, and How to Uphold Labor Standard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Levinsohn, James. 1993. "Testing the Imports-as-Market-Discipline Hypothe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5 (1–2): 1–22.

Lileeva, Alla. 2004. "Import Competition and Selection."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Processed.

Lin, Cheng Ton, and David Lim. 2011. "Foreign Aid to Expertise Export." In *Heart Work 2: EDB & Partners: New Frontiers for the Singapore Economy*, ed. Chan Chin Bock, 124–29.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Liu, Zhiqiang. 2007. "The External Returns to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1 (3): 542–64.

Long, Cheryl, and Xiaobo Zhang. 2011. "Cluster-Base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Financing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4 (1): 112–23.

Luke, Nancy, and Kaivan Munshi. 2011. "Women as Agents of Change: Female Income and Mobility in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4 (1): 1–17.

Mano, Yukichi, Alhassa Iddrisu, Yutaka Yoshino, and Tetsushi Sonobe. Forthcoming. "How Can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 Sub-Saharan Africa Become More Productive? The Impacts of Experimental Basic Management Training." *World Development*.

Mas, Alexandre, and Enrico Moretti. 2009. "Peers at Work."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 (1): 112–45.

Matsumoto, Makiko, and Sara Elder. 2010. "Characterizing the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of Young Men and Women: Evidence from the ILO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Surveys." Employment Working Paper 5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eneva.

Matthias Arnold, Jens, and Beata S. Javorcik. 2009. "Gifted Kids or Pushy Paren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lant Productivity in Indones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9 (1): 42–53.

McCormick, Dorothy. 1999. "African Enterprise Clusters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ory and Reality." *World Development* 27 (9): 1531–51.

McKinsey & Company. 2012. "Survey on African Employment." McKinsey & Company, New York. Processed.

Moenjak, Thammarak, and Christopher Worswick. 2012.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ailand: A Study of Choice and Return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2: 99–107.

Montenegro, Claudio E., 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 2012. "Returns to Schooling around the World."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Moretti, Enrico. 2004a. "Estimating the Social Return to Higher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and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Data."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21 (1–2): 175–212.

———. 2004b.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in Cities." In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4, ed. J. V. Henderson and Jacques Francois Thisse, 2243–92. Amsterdam: Elsevier.

———. 2004c. "Workers' Education, Spillover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Plant-Level Production Fun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 (3): 656–90.

Muendler, Marc Andreas. 2004. "Trade,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A Study of Brazilian Manufacturers, 1986–1998." Working Paper Series 1148, CESifo, Munich.

Munshi, Kaivan. 2011. "Strength in Numbers: Networks as a Solution to Occupational Trap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8 (3): 1069–101.

Muravyev, Alexander. 2008.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Evidence from the Transition Economy of Russi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6 (3): 415–43.

Nam, Chang Chin. 2011. "Equipping the Dream Catchers." In *Heart Work 2: EDB & Partners: New Frontiers for the Singapore Economy*, ed. Chan Chin Bock, 46–54.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Newhouse, David, and Daniel Suryadarma. 2011. "The Valu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 School Type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Indonesi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5 (2): 296–322.

Newitt, Kirsten. 2012. "Private Sector Voluntary Initiatives on Labour Standard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Norton, Andrew, and Arjan de Haan. 2012. "Social Cohesion: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ith Respect to Job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Nübler, Irmgard. 2008. "Institutions and the Finance of General Skills Training: Evidence from Africa." In *In Defence of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Cultivating Justi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d. Janine Berg and David Kucera, 64–7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Nunn, Nathan, and Leonard Wantchekon. 2011.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7): 3221–52.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9. *The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Industry: Manual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Paris: OECD.

———. 2012. *Literacy, Numeracy and Problem Solving in Technology-Rich Environments: Framework for the OECD Survey of Adult Skills.* Paris: OECD.

Oral, Isil, Indhira Santos, and Fan Zhang. 2011.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and Employment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Otsuka, Keijiro, and Frank Place. 2001. *Land Tenure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grarian Communities in Asia and Af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Overman, Henry G., and Anthony J. Venables. 2005. "C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Discussion Paper 695,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Park, Albert, Dean Yang, Xinzheng Shi, and Yuan Jiang. 2010. "Export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Chinese Exporters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2 (4): 822–42.

Parry, Ian W. H., and Govinda Timilsina. 2010. "How Should Passenger Travel in Mexico City Be Priced?"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8 (2): 167–82.

Peri, Giovanni. 2002. "Young Workers, Learning, and Agglomeration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2 (3): 582–607.

Pingali, Prabhu L., Yves Bigot, and Hans P. Binswanger. 1987.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Farming Systems in Sub-Saharan Af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Poole, Jennifer P. Forthcoming. "Knowledge Transfers from Multinational to Domestic Firms: Evidence from Worker Mobil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Quisumbing, Agnes R., and John A. Maluccio. 2003. "Resources at Marriage and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Ethiopia, Indonesia, and South Africa."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5 (3): 283–327.

Rappaport, Jordan. 2008. "A Productivity Model of City Crowdednes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3 (2): 715–22.

Riboud, Michelle, Yevgeniya Savchenko, and Hong Tan. 2007.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South As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ichards, Peter. 1994. "Issues in Manpower Analysis." In *New Approaches to Manpower Planning and Analysis*, ed. Peter Richards and Rashid Amjad, 1–14.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Rosenthal, Stuart S., and William C. Strange. 2008. "The Attenuation of Human Capital Spillover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4 (2): 373–89.

Rutkowski, Jan. 2008. "Labor Market in Georgia: Lack of Jobs or Structural Mismatch?"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 2010. "Demand for Skills in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Saito, Hisamitsu, and Munisamy Gopinath. 2011. "Knowledge Spillover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Skill Intensity of Chilean Manufacturing Plant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1 (1): 83–101.

Sander, Klas, and Peter A. Dewees. 2012.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rees, Reduction in Forest Degradation, and Job Creation for the Poor."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Sankaran, Kamala. 2007. *Labour Laws in South Asia: The Need for an Inclusive Approach*.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Santos, Georgina, and Blake Shaffer. 2004.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London Congestion Charging Scheme." *Public Works Management & Policy* 9 (2): 164–81.

Sawada, Naotaka. 2011. "Improving Rural Investment Climate for Business, Key To Rural Income Generat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Schmitz, Hubert, and Khalid Nadvi. 1999. "Cluster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World Development* 27 (9): 1503–14.

Snower, Dennis J. 1994. "The Low-Skill, Bad-Job Trap." Working Paper Series 9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Sonobe, Tetsushi, and Keijiro Otsuka. 2006a. *Cluster-Bas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 East Asian Mode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006b.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Taiwan."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 (1): 71–86.

Stevenson, James, Derek Byerlee, Nelson Villoria, Tim Kelley, and Mywish Maredia. 2011.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Global Land Use, and Deforestation: A Review." 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Standing Panel on Impact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Summers, Lawrence H. 1989. "Some Simple Economics of Mandated Benefi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 (2): 177–83.

Tan, Jee-Peng, and Yoo-Jeung Nam. 2012. "Pre-Employment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stering Relevanc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In *Right Skills for the Job? Rethinking Training Policies for Workers*, ed. Rita Almeida, Jere R. Behrman, and David Robalino, 67–104.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UCW (Understanding Child Work). 2010. *Child Labor: Trends, Challenges and Policy Responses*. Rome: UCW.

UN (United Nations). 2011.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1*. New York: UN.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3a. *Early Warning Report: FYR Macedonia*. New York: UNDP.

———. 2003b. *Early Warning System: Bosnia and Herzegovina*. New York: UNDP.

UNEC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2010. *Measuring Quality of Employment: Country Pilot Reports*. Geneva: United Nations.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11. *Towards a Green Economy: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St-Martin-Bellevue: UNEP.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O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Employers), and ITUC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2008. *Green Jobs: Towards Decent Work in a Sustainable, Low-Carbon World*. Geneva: UNEP.

Unni, Jeemol, and Uma Rani. 2008. "Sub-Contracting Relationships in the Autocomponents Sector: Do Small Firms and Informal Enterprises Benefit?" In *Flexibility of Labour in Globalizing India*, ed. Jeemol Unni and Uma Rani, 88–126. New Delhi: Tulika Books.

Upadhyay, Himani, and Neha Pahuja. 2010. "Low-Carbon Employment Potential in India: A Climate of Opportunities." Discussion Paper TERI/GCN-2010:1, Centre for Global Climate Research TERI and Global Climate Framework, New Delhi.

Van Biesebroeck, Johannes. 2005. "Exporting Raises Productivity in Sub-Saharan African Manufacturing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7 (2): 373–91.

Welzel, Christian. 2012. "The Contribution of 'Good' Jobs to Development and Cohesion: The Human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Wheeler, Christopher H. 2001. "Search, Sorting,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 (4): 879–99.

———. 2006. "Cities and the Growth of Wages among Young Workers: Evidence from the NLS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0 (2): 162–84.

Winkelmann, Rainer. 1996. "Employment Prospects and Skill Acquisition of Apprenticeship-Trained

Workers in Germany." *Industrial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49 (4): 658–72.
World Bank. 200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7: Development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8a. *Czech Republic: Improving Employment Chances of the Rom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8b. *Social Protection: Vietnam Development Report*. Hanoi: World Bank.
———. 2009a.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Labor Taxes on Employment and the Balances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Funds in Turkey: Synthesis Repor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9b. *Ukraine Labor Demand Stud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9c.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0. *Stepping Up Skills for More Jobs and Higher Productiv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a. *Europe 2020: Fueling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in Polan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b. *Strengthening Skills and Employability in Peru*.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c.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d.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2a. *Botswana: Skills for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2b. *Promoting Access to Quality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for Roma Children in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and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2011. *Removing Barriers to Economic Inclus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and MIG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2006. *The Impact of Intel in Costa Rica: Nine Years after the Decision to Inves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d MIGA.
Yamano, Takashi, Keijiro Otsuka, and Frank Place. 2011. *Emerging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East Africa: Markets, Soil, and Innovations*. Dordrecht: Springer.
Yamauchi, Futoshi. 2007. "Social Learning, Neighborhood Effects, and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Green-Revolution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3: 37–62.
Yeats, Alexander J. 2001. "Just How Big Is 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 In *Fragmentation: 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World Economy*, ed. Sven W. Arndt and Henryk Kierzkowski, 108–43.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i, Kei Mu. 2003. "Can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Explain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 (1): 52–102.
Zhang, Huafeng, Ingunn Bjørkhaug, Anne Hatløy, and Tewodros Kebede.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Chin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Zivin, Joshua S., and Matthew J. Neidell. 2011. "The Impact of Pollution on Worker Productivity." Working Paper Series 1700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第 6 章 6

多样化的就业议程

国家不同，带来最大发展收益的就业领域也不同。发展收益取决于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口、禀赋和制度。

国家在沿着发展道路前进时，面临不同的就业挑战。在农业经济体中，大多数人们仍然从事农业活动，城市化还没有得到发展。在城市化经济体中，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足以解放大量人口，使他们在城市中工作。规范化国家一般包括更发达的经济体，在这些经济体中，社会保障体系足以覆盖所有的劳动力。

在某些国家，就业挑战由特定情景中的人口决定，特定情景影响某些特定的群体。在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国家中，长期的事业和赋闲对大量青年人口产生了影响，许多青年看到的未来机会有限。老龄化社会也面临着代际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源自工作年龄人口比例的不断降低和为持续增加的老年人口提供赡养和照料的相关成本不断攀升。

包括人口在内的自然禀赋可以形成独特的就业挑战。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可能坐拥大量的外汇收入而常常不能把这笔财富转化为自然资源开采之外领域中的就业创造。而小岛国家由于人口规模和地理偏远等因素而不能得到聚集和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利益。

最后，一国的制度力量可以界定一国的就业挑战。在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中，制度薄弱，私人投资暂时不能得到，通过就业恢复社会凝聚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些标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一个国家可能既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是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或者属于规范化国家，但是具有高青年失业率的特征。尽管如此，强调每一类国家情景相关的关键特征有助于确认在具体的环境中哪一类工作对发展的贡献最大，从而可以对具体国家环境中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集力的潜在平衡进行更翔实的分析。而且它提供了有关阻碍就业创造因素性质及如何移除这些障碍因素的线索（问题 6）。

农业经济体

在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国家中，工资性就业并不是普遍的就业形式。例如，肯尼亚半数的就业人口在农场工作，而在非农家庭企业中自就业和在非正规企业中工资性就业的人口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儿。[1]

正规就业包括在经注册的私营企业里领取工资的劳动者和公共领域的全体劳动者，正规就业在农业经济体中就业总量中的比例不足 10%。制造业中工资性就业的比例要小得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个讲法语的国家的比较显示，即使在首都，正规就业在就业总量的中的比例也不足 5%，科托努和洛美不足 3%，雅温得为 8%，只有塔那那利佛的比例超过了 10%。[2]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正规领域就业的女性中，女性仅为或不足四分之一，只有塞内加尔的这一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3] 而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对外贸易的自由化，正规领域的就业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在这种情景下，在解释失业的观念时需要谨慎。失业率可以得到技术上的计算，但是考虑到农业经济体中贫困问题的普遍性，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不可能长期处于赋闲状态。就业不足和低收入（而不是公开失业）是农业经济体中大多数人口面临的挑战。来自莫桑比克的家庭调查数据显示，2003 年，工作人口中每天生活费不足 1.25 美元的比例高达 81%，每天生活费不足 2 美元的人口高达 95%，这一数据令人震惊。[4]

在农业经济体中，改善生活水平的主要途径包括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城市中创造有活力的经济环境，促进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再分配，从而形成生产率积极的、螺旋式的上升和生活水平的改善。这些方法应该共同促进非农就业机会的扩大，反过来，非农就业机会的扩大也会成为减贫的重要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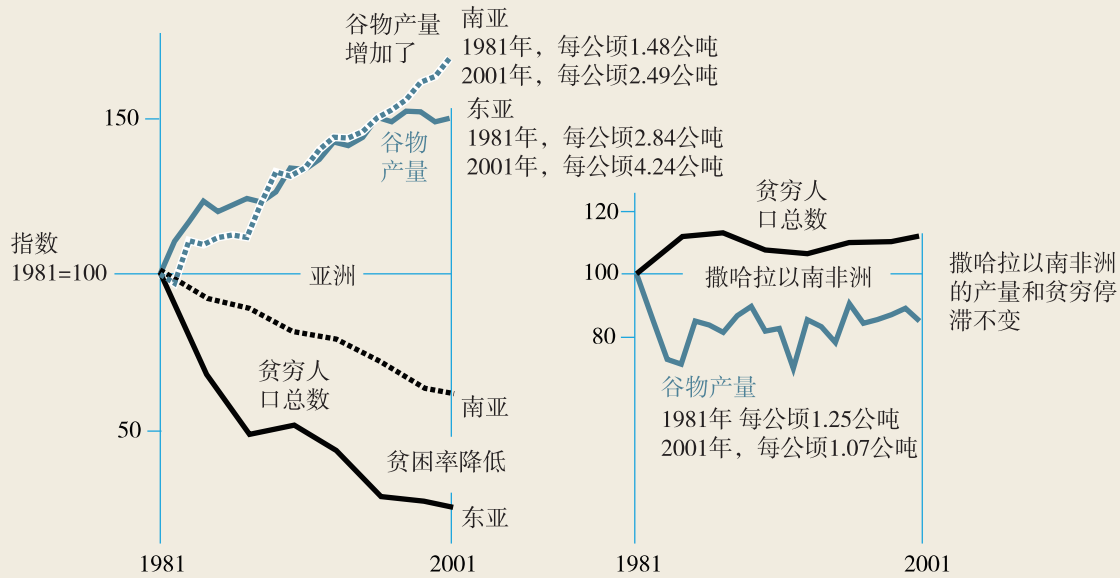
莫桑比克展示了农业经济体面临的就业挑战。[5] 得益于重要矿产资源的发现和商品的繁荣及马普托作为最靠近约翰内斯堡的港口之一的得天独厚的位置，在过去的十年中，莫桑比克的增长绩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实属翘楚。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莫桑比克的增长大幅度降低，这或许是内战结束的影响，这导致 2003 年至 2008 年期间莫桑比克的贫困率基本保持不变，大约为总人口的 55%左右。[6]

农业是莫桑比克贫穷问题集中的领域。80%以上的就业是农业就业，然而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 30%。[7] 每小时农业工作的附加值是服务行业的七分之一，是制造业的十二分之一。在过去的十年中，农业产量停滞不前。约 95%的农业工人在小块土地上工作，现代技术的应用率很低，推广服务的使用也少得可怜。

证据显示，在低收入国家，农业增长对减贫的功效高于其他领域，这是因为贫穷人口集中在农业领域，他们更多地参与农业领域的增长，而不是其他领域的增长。[8] 事实上自 1700 年以来，每一个大规模减贫的典型都发轫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9]

农业增长的限制因素不尽相同，这取决于可利用土地与可用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和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方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传统上被视为土地广袤而劳动力稀少的大陆。尽管这在某些地方仍然是事实，但是在大陆的南部和东部这已经不再是事实。在莫桑比克，平均农场规模不足 1.5 公顷。随着耕地相对于人口规模的

图 6.1 如果没有绿色革命，农业经济体的贫困率将居高不下



资料来源：Christiaensen 和 Demery 2007。

缩减，除非发生提高产量的技术变革，否则生产足够的粮食就会成为主要的议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农业经济体中还没有发生这类变革。亚洲许多地方的绿色革命增加了谷物产量并缩减了贫困范围，和亚洲这些地方不一样，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谷物产量持续不高，贫困率也居高不下（见图 6.1）。一些亚洲经济体，例如柬埔寨、老挝和缅甸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公共领域投资是小农农业生产率提高和集约化经营的重要推动力量。技术通常是一种公共物品。由于农民可用繁殖大米和小麦的改良品种，私营种子公司不能获得引入新品种的利益，因而不愿付出努力。农民不能繁殖杂交玉米、高粱和小米的种籽，因此，私营领域供应种子。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础研究也是由公共领域来承担。结果，公共支持成了发展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的必要条件。

这些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先进农业研究中心和国家计划的长期协作。它们培育了棉花和木薯的改良品种，它们的合作方式让人联想起亚洲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和国家计划就水稻和小麦展开的长期合作。[10] 近期用于出口的高价值作物生产的高涨同样鼓舞人心，其中也包括莫桑比克。[11] 然而除了这些典型，适应非洲气候的改良品种很少。

自压灌溉系统也是地方的公共物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灌溉土地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5%。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莫桑比克低地灌溉区的水稻产量可以与亚洲相提并论。[12] 在这些地区，亚洲的改良品种或与地方品种杂交的品种得到种植。观察所得显示，就低地水稻而言，亚洲技术可以直接移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灌溉区。

尽管基于作物的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与无机肥料使用的大幅度增加相关，撒哈拉以南非洲每公顷土地使用的肥料远远低于世界任何其他地区所使用的肥料。肥料价格相对于谷物价格居高不下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基础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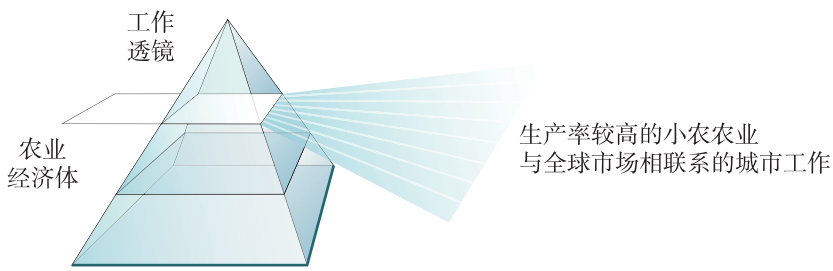
施薄弱，贸易物流落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肥料价格通常是亚洲和拉丁美洲肥料价格的二到三倍。[13] 另一个阻碍肥料应用的主要限制因素是小农缺乏信贷渠道，这是因为土地所有权权利很少得到保障，因而不能用作抵押品。[14] 因此，农业生产率提高也需要有利的投资环境，包括改善基础设施使用和信贷获得。[15]

在城市的就业结构中，自就业占据主导地位，小商业迅速成长。如果农业对减贫最重要，那么成功的城市化可能是生产率、收入及社会凝聚力更快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在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城市化未能带来在发展中世界其他地方观察到的活力。从农村向城市地区的移民在持续，但是移民仅仅扩大了自就业收入糊口工资的等级而已。如果城市缺乏活力，移民的推动力量会是绝望，而不是希望。以莫桑比克为例，青年正在移居到城市地区，但是进入正规工资性就业的青年人数寥寥无几。同时，信任程度正在降低，而青年工人的信任程度最低。[16]

有学者认为，可以以创造更多的自就业机会来应对这些城市地区的就业挑战。例如，在公交车站附近建立非正规市场场所，这将为更多的农村移民提供谋生的机会。但是这类自就业不可能支持聚集效应和知识外溢，而聚集效应和知识外溢是导致其他地方城市繁荣兴盛的原因。

一个替代性方法是创造条件让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异军突起。该方法强调识别那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活动，强调移除那些阻碍私营公司从事这些活动的限制因素。事实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地区存在很多非正规的工业集群。它们生产服装、皮鞋、简单的金属制品和家具等，尽管这些产品很少出口。[17] 这些集群是自发发展起来的，这表明了这些行业中的潜在比较优势。降低物流成本，废除官样文章及应对协调问题可以为这些集群吸引外国投资者创造必要条件，尤其是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促使某些行业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搬迁的时候，劳动力成本较低是一个关键的竞争要素（见专栏 6.1）。[18]

那些启动聚集效应并与全球经济相联系的工作是农业国家中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为更多地创造这类就业机会并成为经济活力的中心，城市应当提供其功能性。但是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境下，完成城市化进程也需要时间，因此，提高农业生产率是降低高贫困水平的首要事项。



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

就业是处于冲突的国家或正在脱离冲突的国家面临的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19] 就业是恢复受到战争和暴力冲突影响的个体和家庭的生计，对前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社会和重建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归属感的关键因素。就业也是发动经济活动、互相联系、重

专栏 6.1 农业国家埃塞俄比亚可以在制造业中竞争吗?

在埃塞俄比亚经营良好的企业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和中国与越南的劳动生产率相媲美，尽管他们的工资只是中国工人的四分之一，越南工人的二分之一。这样，埃塞俄比亚借助其相当大的、不断增长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具有在全球服装市场上竞争的潜力。埃塞俄比亚也靠近吉布提使用最先进技术的、地理位置很好的集装箱港口，并且具有免税进入欧盟和美国市场的优势。埃塞俄比亚贸易物流状况不良，这是其在服装业中竞争力的约束因素，抵消了埃塞俄比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该国远离高价值时间敏感性的市场。建立服装通过海关的快速通道、提供免费的、即时的外汇获得渠道，降低信用证的成本并在更靠近吉布提的地方设立工业园区将减轻大部分严重的贸易物流瓶颈问题。这些措施也会使埃塞俄比亚步中国和越南之后，占据吸引引领行业的投资者的有利位置。

埃塞俄比亚也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受益。用于制鞋业的皮革和用于家具制造业的软硬木材等原材料丰富。但是其价格昂贵。一立方米木材的成本是 667 美元，而中国的成本是 344 美元，越南的成本最多是 246 美元。因此，埃塞俄比亚的城市消费者购买物美价廉的进口现代家具。然而埃塞俄比亚的木材，尤其是竹木的未开发潜力巨大，改革可以提高国内家具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创造更多的生产性工作并节省外汇。

资料来源：Dinh 等 2012。

专栏 6.2 冲突可以增加女性的劳动力参与

在冲突时期，女性常常不得不增加她们的经济活动。针对女性的冲突后计划有助于帮助女性抓住冲突打开的机遇之窗这一有利机会，承担新的责任，为地方经济的复苏作出重大贡献。在国内持续了将近一年的严重暴力争斗结束后，马鲁古群岛北部地区和印度尼西亚的女性积极参与了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减贫活动。“自冲突结束的 2002 年以来，我经营了一家零售店，赚取额外的收入满足家庭的需要……我从特尔纳特市政府那里获得支持资金作为启动经营的资本金……十年前我不过是个家庭主妇，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我没有经营生意的资本金，”一名 38 岁的已婚女性如是说。

资料来源：Petesch 2011。

建网络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关键。和安全与公正一样，就业是突破暴力活动循环、恢复人们对制度的信心、赋予人们在社会中的利益的中心。[20]

然而在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中创造就业机会的阻碍因素令人震惊，决策者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如何迅速地为复员军人、流离失所的人口和受到暴力活动或战争危害的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什么样的政府计划可以迅速产生效果？如何使私营领域成为就业创造的引擎？而且，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起步时常常比较贫穷。这些国家的机会、资源和能力稀缺，用于规划的数据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从严重的暴力犯罪活动到内战再到其他形式的内部冲突，冲突环境种种不一。冲突环境较少涉及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当整个国家受到内部或外部冲突的危害时，由于制度崩溃和与外界联系的断裂，就业挑战更加严峻。如果冲突是地方化的，限制因素就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敌对活动一旦得到控制，正常发挥作用的基础设施、服务和制度就可以延伸到受到冲突危害的地方。大量的流离失所人口通常会进一步加剧冲突局势。在 2010 年年底，约有 1 540 万人口在母国之外的地方寻求避难，另外国内还有 2 750 万流离失所的人口。[21]

通过毁坏或破坏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或通过改变动机，冲突可以从根本上破坏就业。斯里兰卡北部地区的冲突破坏了经济活动，为暴乱活动在新失业的人口中招募人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2]

然而即使在战争年代，人们也工作。低工资或无工资工作（例如糊口农业或小本生意）的就业比例很高。在冲突后的利比亚，农村地区的青年说他们（她们）同时从事两份到四份工作。[23] 在不同国家中，随着女性为帮助家庭应对收入冲击并弥补参加战斗的男性的收入缺失，冲突增加了女性的劳动力参与（见专栏 6.2）。[24] 在阿富汗，严重冲突地区的女性就业率高于轻度冲突地区的女性就业率，而在尼泊尔，女性就业率不仅仅在严重冲突地区增长。[25]

在受到冲突危害的国家中，某些

就业可能涉及非法活动，这是由冲突的后遗症治理薄弱和法律选择不足引起的。即使这些活动的范围受到限制，它们也可能扭曲激励机制，导致寻租行为，从而不利于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在阿富汗，种植罂粟是农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26] 在索马里，海上劫掠需要快艇船员及与基于陆地的经营相关的人员，从而为某些人提供了某些工作。[27] 在利比里亚，农村地区的青年人通过从事非法的采矿、割胶和砍伐树木补充家用。[28]

对正在从冲突中恢复的国家而言，就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创造就业的障碍可能极其严峻（见专栏 6.3）。受到冲突危害的国家的公司说政治不稳定是企业经营最严重的瓶颈因素，电力匮乏紧随其后（见图 6.2）。仅仅是获得基本的服务和运营就是个大问题。腐败和资金的匮乏也是主要的限制因素。由于犯罪率和武装冲突都很高，安全奉献降低了投资的回报，而且即使武装冲突正式结束了，这种状况也会持续很久。企业可能需要额外的资金来雇用私人保安或用于贿赂行为。移民及学校倒闭引起的技能损失也可能阻碍企业的运营。

对正在脱离冲突的国家而言，前战斗人员的复员安置和重新融入社会是重大的挑战。尽管前战斗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对较小，失业和赋闲，特别是青年男性的失业和赋闲是加剧社会紧张局势并破坏原本就脆弱的冲突后环境的威胁因素。[29] 就业可以弥补在武装力量和军队遣散中所失去的认同和地位，可以弥补因不再偷盗和抢劫而损失的收入。就业也有助于遏制人们进一步涉足帮派活动和暴力活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取代暴力活动，当工作提供的收入微不足道而工作又很辛苦时尤其如此。

专栏 6.3　在南苏丹，解决就业问题迫在眉睫

南苏丹共和国是世界上最近成立的国家，南苏丹是说明正在脱离冲突的国家所面临挑战的典型。南苏丹拥有包括石油在内的自然资源，然而超过五分之四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大多数依靠糊口农业或养牛维持生计。根据 2009 年的家庭调查，一半人口生活贫穷，这在农村地区尤其严重。有读写能力的成年人口仅占成年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稍稍多一点儿，而且未来人力资源发展的前景黯淡：将近一半的 10 到 14 岁儿童正在工作，在学校就读的儿童刚刚超过三分之一。[a]

据国际移民组织估计，苏丹人内战期间流离失所的人口约 400 万，自 2005 年签署全面和平协议以后，将近 190 万人口返回了家园。[b] 国内流离失所人口的返回给原本已经贫穷的社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南苏丹新政府计划在未来六到八年内复员 15 万士兵。[c] 土地权获得及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也给就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此前公共领域遗留的过度就业问题也一样，由于巨大的财政压力，过度就业也不可持续。

创造就业机会是新政府面临的必须迅速解决的问题之一：就业可以促进和平与稳定，通过法律和非暴力活动维持可持续的生活水平，促进经济恢复。然而这需要时间，政府继续替代方案为缺乏工作又可能威胁稳定的群体创造就业机会，这一群体包括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口，前战斗人员和青年。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Guarcello，Rosati 和 Lyon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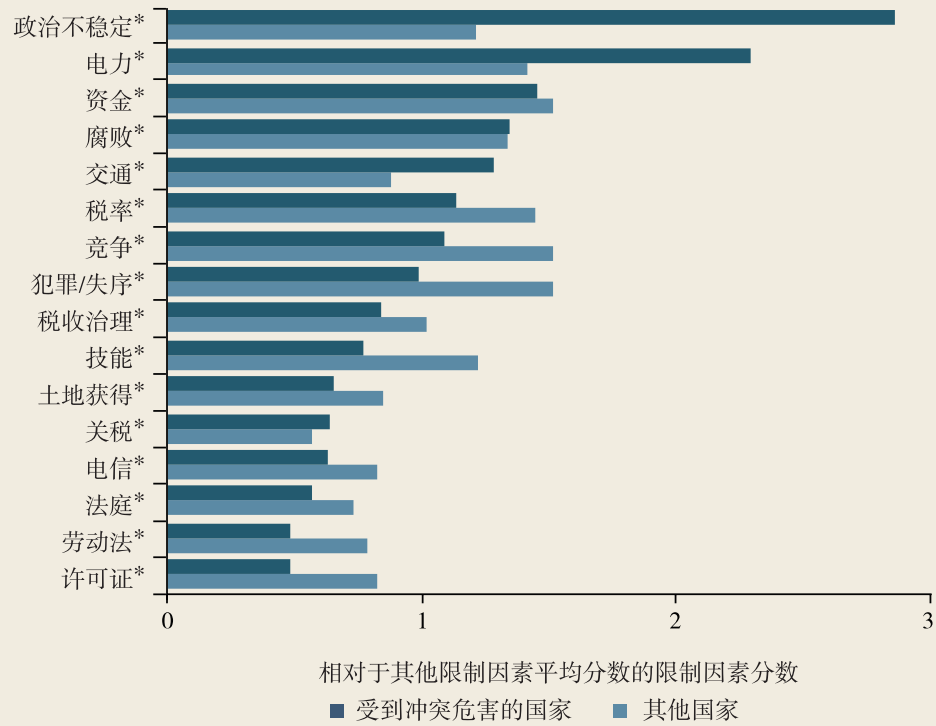
b. 国际移民组织 2009。

c. 南苏丹共和国裁军、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委员会 2012。

大多数裁军、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的计划包括某种形式的就业支持，比如灾后临时工作、工作换现金、公共就业服务、小额补贴金或职业培训。在缺少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临时就业计划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快速为前战斗人员及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关于临时就业计划是否减少了冲突并促进社区重建的证据尚不明确。工作换现金计划的成本可能过于昂贵，使原本就紧张的公共预算更加紧张，可能创造低质量的、不可持续的财产，而且如果计划只是针对特定群体，那就会引起分裂，导致紧张的局势。

基于社区的、针对性广泛的项目可能更有利于稳定。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许多从前的战斗人员都遇到了难以就业的问题，前战斗人员协会和社

图 6.2 在受到冲突危害的国家中，不稳定和基础设施薄弱是严重阻碍企业经营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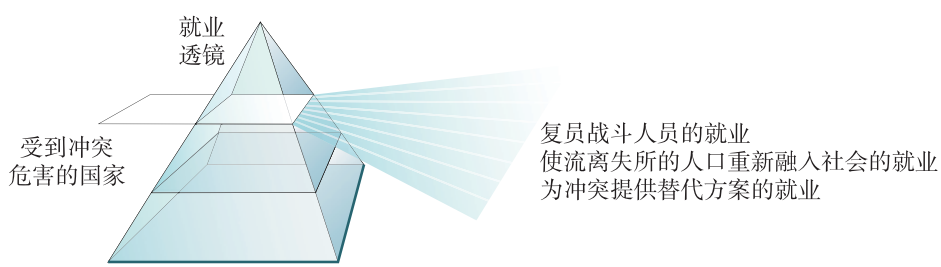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投资气候调查（数据库），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

注释：在本图中，冲突国家包括阿富汗（2008），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2009），布隆迪（2006），乍得（2009），刚果民主共和国（2006 和 2010），科特迪瓦（2009），尼日利亚（2008），几内亚比绍共和国（2006），科索沃（2009），利比里亚（2009），尼泊尔（2009），塞拉利昂（2009），和东帝汶（2009）。横轴测量某一限制因素的平均分数和其他所有限制因素的平均分数之间的比率。加星号从统计意义上表示冲突国家和其他国家高达 1%的差异。

区成员共享关于就业机会和社会支持的信息，也帮助管理纠纷。[30] 可以制定专门的计划，特别是专门针对曾经卷入冲突的青年男性的计划，促进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年轻的前战斗人员没有对和平时代或正常公民生活的记忆。

最后，受到冲突危害的国家需要吸引私人投资。国家可以通过强化规章制度、重建基本的基础设施和保障安全来履行创造有利环境的职责。[31] 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捐赠者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有助于重建市场和投资者信心。以价值链连接农民和企业家具有促进创新和就业增长的潜力。[32] 通过恢复法律和秩序、公路及电力，商业组织可以支持企业家，帮助解决集体行动问题。[33] 然而随着安全的恢复，就业工作的重点可能从针对性的公共方案转向私营领域的就业创造。但是期望受到冲突危害的国家一夜之



间成为活力四射的经济体，不过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应对受到冲突危害的国家的就业挑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要求创造促进和平和稳定的就业，创造替代非法经济活动和暴力活动的就业，创造启动经济复苏这一漫长过程的就业。在冲突环境下，就业也可以带来提高社会凝聚力的发展效益，这主要是通过使人们进入能够强化自尊、给予他们认同感和地位的生活性活动、通过重建网络关系、通过给予人们机会分配的公平感来实现的。

城市化经济体

具有丰富不熟练劳动力的城市化国家具有进入良性就业循环的潜力。这些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可以创造广泛的就业机会，尤其是轻工业领域的就业。这些工作可能艰苦，收入相对较低，福利也有限或微不足道，但是总体上他们比农业领域的工作优越。它们也可以是经济技术升级的切入点，从而改善未来的就业。[34] 这样，针对不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就为广大家庭脱贫提供了途径。在女性就业机会受到限制的国家里，城市化经济体中新的就业机会可以给家庭和社会带来重要的变化。

这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几个亚洲国家发生的事情。就很多方面而言，这也是孟加拉国近期发生的事情，吉大港和达卡等大城市里，工业化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现在，工业领域生产的附加值已经从 1990 年的 20%上升至将近 30%，城市化率也正在接近 30%，是 1980 年的二倍。[35] 1990 年至 2010年期间，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增至三倍，而相当一部分增加是在蓬勃发展的、女性劳动力高度密集的服装业中实现的。这种结构变革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一道对生活水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生活在每天 1.25 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从 1992 年的 70%下降至 2010 年的 43%。[36] 孟加拉国生产率和收入增长仍然落后于它的一些邻国，但是孟加拉国的经历仍然不同寻常，这是因为在发展文献中孟加拉国常常作为发展失败的例证（见专栏 6.4）。

这些成功是建立在农业领域的现代化、工业领域可以吸纳低技能的剩余农业劳动力和支持性社会政策的基础之上的。

加快应用技术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农民已经从种植产量低的单季深水水稻转向种植成熟期短、产量高的双季水稻。此外还出现了从分成制转向租金固定的合同租赁的显著变化。没有土地和处于温饱边缘的农民是这种变化的主要受益者。同时由于国家人尽皆知的微型金融制度，贷款限制也放松了。资金获得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促进了女性的教育和健

专栏 6.4　对孟加拉国的发展持悲观态度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是却被证明是错误的

1975 年，关于孟加拉国经济的第一本书这样论述，“如果孟加拉国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那就有合理的信心认为难度较小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加拉国将被视为发展的检验案例。”[a] 本着同样的精神，一项对女性的著名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孟加拉国“处于贫困平衡之下”。[b]

关于孟加拉国经济生存能力如此消极的观点是由孟加拉国独立后国家面临的众多不利初始条件决定的：人口密度高，自然资源基础有限，基础设施发展落后，自然灾害频繁，政治也具有不确定性。

孟加拉国最近几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记录给全球发展领域带来了乐观的信心，打破了这种消极的观点。一些国家在人类发展指标方面表现优异，一些国家在经济增长中取得了优良成绩，但是孟加拉国是为数不多的两方面都做得很好的国家之一，尽管一开始存在着悲观情绪。而这正是令人惊奇的地方。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孟加拉国国家案例研究。

a. Faaland 和 Parkinson 1976，5。

b. Alamgir 1978。

康，增加了微型企业的投资。

尽管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仍然相当可观，农业领域每天的实际工资已经从 1983 年货币价值等同于不足 2.5 公斤大米增加至今天的 6 公斤。与农闲（monga）期相关的季节性饥饿正在减少，农闲期系指水稻种植和收割之间的时期。女性在工厂工作的汇款和男性在建筑行业工作也有助于在农村的减贫工作。

毗邻城市促进了劳动力脱离农业的动向，这是孟加拉国高人口密度引起的结果。毗邻城市形成的特殊联系也可能有利于农村非农业领域劳动者生产率的增长。服装业是孟加拉国城市化过程中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有 300 万女性在这一具有强烈出口导向的领域中工作。建筑业是脱离农村农业活动的男性所从事的重要行业。许多低技能工人也出国，特别是到海湾国家就业。汇款每年以约 10%的速度增长。[37]

轻工业制造业为城市化经济体中的大量工人打开了机遇之门，这是因为轻工业制造业对技能要求不高。企业对教育有一些要求，但是通常比较有限。以孟加拉国为例。2005 年在城市就业领取工资的正式工人中，受过教育的比例是 87%，但是受过中学或中学以上教育的工人的比例仅为 28%。[38] 但是和农业领域的工人比较起来，这样的教育水平却要高出许多，因此服装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教育，特别是女孩教育的发展。城市化还为女性带来了其他的有利影响。持续增长的劳动收入增加了生养儿童的机会成本，这反过来可能提高结婚年龄，降低生育率。这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女性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提升也提高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

在社会政策这一面，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均制定了亲贫、亲青年和亲女性的方案。这对降低人口增长、鼓励公共领域和私人对教育和健康更有效的投资颇有助益。

农业现代化、劳动力移民和社会政策改变了孟加拉国的就业状况，但是这些转变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实质性规范化。在过去的十年中，受益于法律保护或社会保障体系的就业比例并没有增加多少。蓬勃发展的建筑业基本上保持非正规状态。孟加拉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在服装业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工人骚乱时有发生。而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与向工业国家出口商品相关，如果该领域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那么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性就会小一点儿。企业社会责任不可能成为建筑业可行的选择。但是尽管规范化没有取得进展，企业家能力的发展却引人瞩目，从而导致在短短的二十年内就建立了成千上万家本国所有的大中型企业（见专栏 6.5）。

孟加拉国国家案例引人瞩目，耐人寻味，尤其是考虑到孟加拉国的起点，理解孟加拉国国家案例非常重要。政府给予了诸如出口加工区、保税仓

专栏 6.5　孟加拉国的企业家是地方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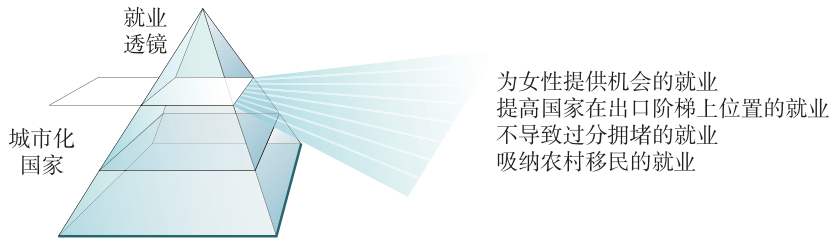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孟加拉国的成衣厂迅速成长，而且现在已经跻身于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出口国行列。尽管早期的成功归功于最初来自韩国的技术转移，但是这种一次性知识灌输并不足以解释持续的增长。在这一方面，孟加拉国的发展模式与东亚的发展模式相近，在东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从发达国家输入并吸收技术和管理知识在促进工业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早从针织品制造商和服装贸易商那里搜集来的数据可被用于探索进一步学习先进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过程。数据显示，起初特定人力资本的输入吸引了高学历的企业家进入该行业，而制造商和贸易商之间的劳动分工又促进了行业的扩张，而由于高学历企业家不断向国外学习，企业的增长也经久不衰。所有这些因素是共同造成孟加拉国服装制造业高利润的原因。

资料来源：Mottaleb 和 Sonobe 2011；Sonobe 和 Otsuka 2006。

库及港口对服装的特殊待遇等一些支持。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将繁荣的东部地区和落后西部地区连接起来的贾木纳大桥（Jamuna Bridge），使在国内流动更加便捷。但是政府并没有在转型中发挥主导作用。腐败是个问题，经营企业的成本很高。断电频繁，许多道路没有得到铺砌，而那些铺砌过的道路的堵塞问题又很严重。尽管面临着这些阻碍因素，由于绿色革命带来了高产量水稻品种的研发和推广及资金可得性，农业现代化还是发生了。通过工业化，劳动力脱离农业，而通过计划生育和社会保障，社会政策也发挥了支持性作用。

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城市化国家可以利用几种溢出效应。但是这些国家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寻找沿着增值链上升并实现制造业出口多元的路径。在孟加拉国，除了服装业，大幅度增长的领域很少。[39] 制药业发展了，但是相对于服装业的不同发展模式耐人寻味。但是制药业和其他高附加值出口领域要求高技能，因而这些领域不可能成为广大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的就业渠道。



资源丰富型国家

投资采矿业带来的产值在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相当可观，而且使出口收入大幅度增加，但是投资采矿业并不能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在建设时期所需工作人员的数量可能足以给地方带来活力，但是矿井建设完毕并开始运营，就业人数就会大幅度下降。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液化天然气项目或许是最极端的例证。在项目启动时，项目的投资成本比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还要多，而且该项目可能使该国在许多年内保持两位数增长。但是就长期来看，该项目产生的直接就业岗位不可能超过 1 000 个（见表 6.1）。

与经济中其他领域的联系也很薄弱。港口设施、交通走廊和物流服务、金融服务和会计服务等也是需要的条件。在某些情况下，石油炼制和矿石加工也可能在国内其他地方进行。所有这些服务注定要在主要城市和中心产生高附加值的工作。但是即使在将前后所有的环节都考虑进去之后，所产生的总就业数量和直接工作数量之间的比率仍然可能保持单位数。将直接和间接工作效应都考虑进去，开采业在资源丰富型国家中就业总量中的比例也可能不能超过 1%或 2%。

此外，开采业可能对经济领域中其他行业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效果常常被视为荷兰病的表现，荷兰病系指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荷兰格罗宁根省发现大面积天然气田之后发生的现象。接踵而至的出口收入带来了实际汇率的大幅度升值和受国际竞争影响领域的竞争力的降低及这些可贸易领域就业岗位的流失。

一些资源工业繁荣的工业国家成功地保护或促进了其经济的多元化。挪威或许是最引人瞩目的典范。在劳工运动的强力支持下，中央集权的集

表 6.1 开采业项目是资本密集型的，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

国 家	项目（部门或资源）	投资，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直接就业，数量
巴布亚新几内亚	液化天然气项目（天然气）	237.0	建设期间 9 300 份工作，此后 1 000 份工作
蒙古	Oyu Tolgoi 铜金矿项目（铜、金）	74.0	建设期间 14 800 份工作，此后 3 000 份到 4 000 份工作
博茨瓦纳	朱瓦能第 8 工作面项目（钻石）	20.2	1 000
巴布亚新几内亚	拉穆矿项目（镍）	19.0	建设期间 5 000 份工作，此后 2 000 份工作
莫桑比克	本加矿项目（煤）	13.6	当前 150 份工作，此后 4 500 份工作
坦桑尼亚	Mchuchuma 矿项目（煤）	12.2	5 000
纳米比亚	豪萨矿项目（铀）	11.9	建设期间 5 200 份工作，此后 1 200 份工作
赞比亚	Lumwana 矿项目（铜）	9.3	建设期间 4 700 份工作
巴基斯坦	Reko Diq 矿项目（铜、金）	4.0	建设期间 2 500 份工作，此后 200 份工作
秘鲁	Conga 矿项目（金）	2.6	建设期间 6 000 份工作，此后 1 700 份工作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项目信息的数据。
注释：GDP 即国内生产总值；LNG 即液化天然气。

体谈判协议保证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不能超过除石油之外的可贸易领域的生产率的速度。工资节制为给人人创造就业机会提供了支持作用，其作用之大，使挪威在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失业率维持在 3%左右。石油收入被用于长期投资，而不是直接转化为更高的劳动收入。

在其他地方的石油资源国家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通过金融和物流服务，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多元化。但是总体上而言，通过公共领域报酬优厚的工作，海湾国家的公民成为石油财富的直接受益者。在比较大的国家里，这些工作是配给的，某些群体，比如女性和青年群体，和那些有良好关系的人相比，获得这些工作的机会较少。不体面的工作由签署临时合同的移民承担，他们的收入和福利都很微薄。对某些人而言，就业是租金分享的窗口，就业并不给社会中的其他人带来好处。

发展中国家可能更难以规避以就业促进生产率和以就业提高社会凝聚力之间的矛盾，因为发展中国家缺少挪威那样的制度能力，或没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那样的执行能力。资源丰富型发展中国家所担忧的不仅是可贸易领域竞争力的丧失，也包括错失城市化带来的利益。不错，在资源丰富型发展中国家，主要聚集地的土地价格之高，令人望而却步。根据一个标准，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是罗安达（见表 6.2）。根据这个标准，世界上前 5 名最昂贵的城市中有 3 个，前 50 名最昂贵的城市中有 9 个是资源丰富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由于它们没有伦敦、纽约或东京的经济密度，资源丰富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很难收获集聚效益。商品生产的专业化（包括可可等农产品）可能是城市化未能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表 6.2　资源丰富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跻身世界物价最高的城市之列

2011 年排名榜	城市	国家
1	罗安达	安哥拉
2	东京	日本
3	恩贾梅纳	乍得
4	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
5	日内瓦	瑞士
12	利伯维尔	加蓬
14	悉尼	澳大利亚
18	伦敦	英国
23	尼亚美	尼日尔
27	巴黎	法国
29	圣彼得堡	俄罗斯联邦
32	纽约	美国
41	拉各斯	尼日利亚
44	喀士穆	苏丹
48	巴库	阿塞拜疆
50	阿姆斯特丹	荷兰

资料来源：Mercer 2011。

注释：根据侨民消费篮成本从最昂贵到最便宜的城市排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受到重视。

实现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40] 尽管如此，这些富裕的聚集地正在吸引农村移民，因此加剧了地方的不平等问题、不满情绪和犯罪问题。资源丰富型发展中国家跻身世界生活成本前 50 名的城市中，没有一个跻身于世界生活质量前 50 名的城市。

尽管开采业未能创造众多就业机会，但是它的确通过其他渠道为地方经济作出了贡献。近期对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家大型煤矿项目的雇员进行的调查显示，雇员给家庭带来了实物或现金汇款收入。大多数实物汇款是建筑材料（41%），交通相关的材料紧随其后（28%）。[41] 现金贡献大多用于支付学校费用（29%）和交通相关的费用（12%）。雇员还为来自农村地区的亲属提供食宿。其中一些客人帮助干家务活儿，一些由主人出资获得教育。[42]

作坊式开采可以随着主要投资的增加而蓬勃发展，提高地方社区的生活水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基层冲击矿矿主的数量比在正规开采业领域中工作的人口的数量要高出两倍到三倍，即使把承包商和临时工人计入后者。一些大型开采项目，比如 Ok Tdei 矿项目，在贫穷的地区进行。这样，围绕这些项目兴起的作坊式开采有助于扩散财富。

但是贫穷地图显示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生活水平的空间分布的巨大分散性和贫穷的持久性。[43]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农村地区最严峻的、最持久的贫穷发生在没有已知矿产资源的地方。

在大型的开采项目结束后，作坊式开采和小规模开采通过减缓收入的降低，还可以为地方经济作出贡献。以巴布亚新几内亚米西马岛（Misima）为例。当地居民已经习惯了在当地唯一的大型采矿项目米西马开采有限公司附近谋生。但该项目于 2004 年结束时，米西马的经济搁浅停滞，当地居民入不敷出。作坊式开采和小规模开采为某些人提供了收入的渠道：每一名硬岩开采矿主每年可获得相当于 5万~7 万美元的收入，每一名冲击岩开采矿主每年可获得 1 万美元左右的收入。这笔收入和在其他地方的大矿中找到

工作的前米西马雇员的汇款一道成为地方经济的主要贡献者。[44]

而且即使在开采地区，社会影响也要比生活水平所显示的积极效应复杂得多。来自开采地方的金钱的涌入给予了男性支付新娘彩礼的能力，他们迎娶多位妻子的行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可能导致了女性地位的降低。在 Porgera 矿周围，遗弃年长的妻子以及从其他部族迎娶的女性人数的持续增加被认为是导致国内暴力活动范围扩大和与毗邻群体关系紧张的因素。在利希尔（Lihir），当土地所有者群体收到补偿和特许使用金，没有女性被赋予管理款项的权利。[45] 此外，儿童一般都在作坊式小矿和小矿上帮忙。在米西马，由于 Wau 小规模开采中心的明确限制和培训，和以前相比，儿童参与开采活动的现象减少了，但是童工仍然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46] 最后，由于有人擅自进入他人的土地寻找矿物质，作坊式矿主之间常常发生土地纠纷。[47]

在地方社区之外，开采业的繁荣也正在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他地方主要农业领域的就业产生影响。近年来棕榈油的出口量稳步上升，超过了其他所有农作物的出口总量。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主要种植园周围的 18 000 家小农也参与了棕榈油果实的生产。[48] 尽管开采业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并创造了就业机会，开采业的繁荣正在削弱棕榈油出口的竞争力，这是因为开采业提高了熟练雇员的工资和物流的成本。

熟练工人工资的提高也降低了公共领域的效率。政府所有部门和教育培训机构元气大伤，这是因为其员工离职到开采业领域寻求更有吸引力的机会。开采公司一边从有助于技能建设的教育培训机构中挖人才，一边抱怨缺少技能型人才。例如，在近期对大规模开采项目进行的调查中，在 181 个受访者中，58 位工人（或 32%）至少是大学学历。[49] 提高公共领域的薪水可能是必要的，但这将造成新的问题。矿工问题普遍存在，服务提供不良。如果问责制度得不到强化，提高薪水只能将许多公共领域的就业转变为租金共享的窗口。

一些位于开采区域附近的土地所有者公司的成功是振奋人心的发展。这些公司可能形成了良好的职业道德，在一个几年前还远离现代经济的地方，开创了有效的经营方式。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土地所有者公司都是成功的，这种模式可能不能成功使开采业的财富扩散到周边之外的地区（见专栏 6.6）。

资源丰富型经济体的挑战常常被表述为透明度，当然，透明度对社会凝聚力很重要。然而，将与开采业有关的钱物列入预算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确保资源从繁荣的地区和中心流向国家中较贫穷的地区，特别是以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的方式流向较贫穷的地区。强调资源流向需求方而不是供给方（例如，流向健康保险而不是公共意愿）可能有助于提高生产率，而不是创造新的租金分享窗口。

在公共财政之外，财富在矿区和城市中心的集中要求对空间价格问题予以关注。如果城市土地价格高得令人望而却步，那么就不能收获聚集带来的利益。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增加城市土地的可得性，让城市房价保持在可以负担的水平上。即使采取了行动，矿区和城市中心的劳动力成本注定要高出许多。劳动力政策需要考虑这些不平等因素，避免出现通过效仿国家富裕地区的工资和福利而形成的

专栏 6.6　土地所有者公司可以在扩散财富的同时建设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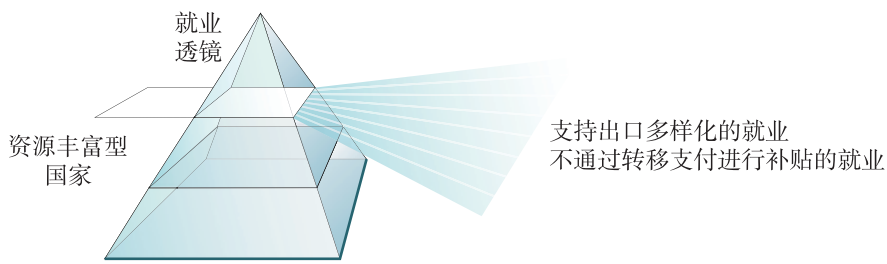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地方土地所有者群体相联系的公司正在不断地拓展新的生意，并且能够在区域中、甚至全国中竞争，因此创造了一系列技能层次的工作。这些公司源自巴布亚新几内亚土地的公共所有制，这意味着开采公司不得不向社区而不是个体支付补偿金。结果，一些土地所有者公司的股东达到 30 万人。国家机构与个体资源项目谈判，为地方土地所有者群体争取为项目供应选择性服务的特权。

最成功的土地所有者公司，包括特昂斯奇境（Trans Wonderland）、阿尼图阿（Anitua）、iPi 集团，民族餐饮（National Catering）和星山（Star mountain），都是地方管理的公司。它们的经营活动延伸到勘探、建设和开采等开采业核心工作之外的领域。例如，它们通过特许卡车所有权结构提供后勤服务，它们为整个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餐饮服务，包括为自然资源领域之外的顾客提供服务。

这些公司成功的关键可能在于其社会责任与经营模式的明确分离，建立了坚固的公司治理结构。其土地所有者起源和商业核心允许他们与土地所有者群体在其他资源项目领域进行合作，从而帮助它们建立规模和管理深度。在发展中具有真正利益的侨民似乎在实现平衡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并不是所有的土地所有者公司都取得了同等的成功。大多数土地所有者公司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分配从矿上流向社区的租金，没有为其成员建立可持续经济机会的雄心。中部省的四个土地所有者公司中，有两个从来都没有站稳脚跟，因为原本被期望作为股权的资金消失了。即使成功的土地所有者公司在开采业建设期结束后也可能是不可持续的。持怀疑态度的人在考虑通过发展这些企业建立工作技能是否真的比通过投资地方基础设施提供服务更有价值。

资料来源：Blacklock 和 Bulman 2012。



最低工资或强制福利而造成贫穷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劳动力价格过于昂贵。

资源丰富型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以不降低生产率增长和削弱社会凝聚力的方式扩散财富。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是那些在开采业之外产生产出（与正好吸收相反）的工作。如果经济将要实现其出口基础的多元化，激励公司创造就业机会和人们工作的措施就很重要。由于外汇升值，外汇储备巨大可能成为一个限制因素。一些国家的经验，特别是挪威的经验显示了用于长期投资的主权基金如何管理这一外币问题。

小岛国家

小岛国家的就业议程由其市场规模和地理位置决定。由于规模小，这些国家不能利用规模经济，收获聚集或专业化带来的利益。作为岛屿国家，许多岛国的特征是分离，原本已经很小的人口稀薄地分散在广大的地方。例如，斐济的人口在 86 万左右，总面积为 18 274 平方公里，但是分散在 332 个岛屿中。然而城市和集群中的就业依靠规模和密度来创造正向的溢出效应。

由于国内市场有限，小岛国家需要面向国外来解决规模问题。然而规模小的劣势表现为较高的生产成本，因而向较大的国外市场出口也困难重重。由于在世界市场上小国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这些成本加价很难被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去。这些经济体可以

出口的唯一途径是接受较低的利润和劳动收入。但是在电子产品装配和服装领域，即使资本回报为负，工资为零，一个小的经济体的单位生产成本仍将超过世界普遍价格。[50]

一些小岛国家，尤其是太平洋上的小岛国家也面临着地理位置偏远问题的挑战。如果小岛国家远离经济中心，与这些小岛国家进行贸易的成本可能惊人得高。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情况是，与贸易伙伴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加权距离约为 11 000 公里，而加勒比小国的这一距离为 8 000 公里（见图 6.3）[51]。这样，和其他小国相比，太平洋岛国的贸易较少也就不足为奇了。

规模小和分散性进一步提高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成本。为 10 万人服务的公路、能源网络或政府部门的每用户成本可能高于为 1 000 万人口服务的每用户成本。高额固定成本不得不分摊到总量较小的人口身上，而且常常还是分散在较多的地方的人口身上，这意味着经营生意的成本也较高。

地理挑战是这些小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基本挑战。遗憾的是，政策并不能扭转这些劣势，但是政策可以通过融入较大的经济体部分抵销这种劣势。加拿大与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季节性农业工人计划就是其中的典范。这些国家还形成了其他几个类似的双边协议。[52] 事实上，与较大的经济中心之间密切的政治关系与小岛国家较高的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相关性。[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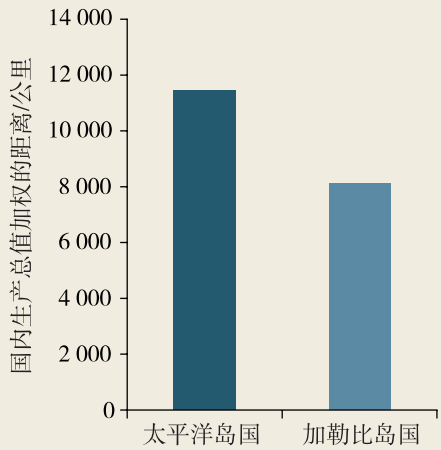
移民是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渠道之一。随着工人流向较大的经济中心，他们进入了更大的市场，获得了更便宜的投入和更多的投资。这样，劳动力就被用于更具生产率的用途，从而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反过来，来自移民的汇款改善了留守人口的生活水平。劳动力向较大的市场流动也允许工人和企业家与更具活力的公司互动，从而获得更好的、更多样化的技能并接触新观念。

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里，移民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20%。汇款在太平洋岛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平均比例超过 8%，在其他小岛国家中的比例为 5%（见图 6.4）。事实上也有几个成功的移民故事。萨摩亚群岛通过一项存在了 30 多年的友好协议，长期以来一直在向新西兰输送移民，而库克群岛与新西兰之间存在自由的联系。和其他太平洋岛国的经历相比，萨摩亚群岛和库克群岛表现出持续的增长。[54]

如同对汤加和斐济的比较所显示的那样，移民利益转化为现实还可能需要实践。汤加的大规模移民持续了四十多年，接受的人均汇款额很大。在斐济，国际移民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家庭调查发现，汤加家庭中 90% 以上的家庭有汇款收入，而斐济有汇款收入的家庭比例是 43%。[55]

移民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受到不同历史路径的左右。在移民比较成熟的国家中，留守家庭的家庭成员行为更倾向于从事商业活动。无论是在汤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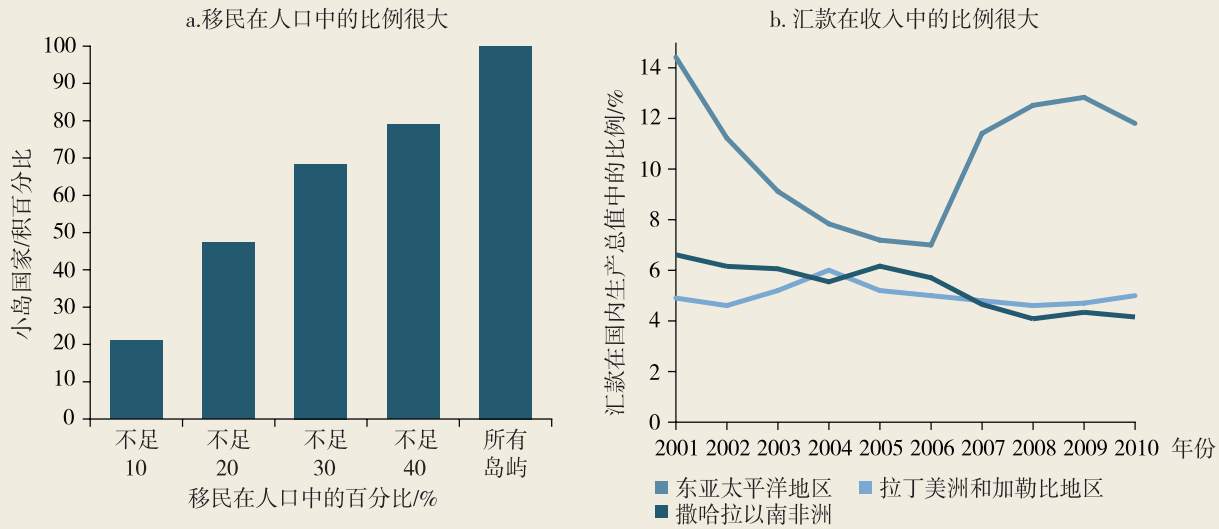
图 6.3　小岛国家的地理位置远离经济中心



资料来源：Gibson 2006。

注释：本图阐释了岛国到 218 个其他国家的加权平均数距离，以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权数。

图 6.4　移民对小岛国家至关重要，对太平洋的岛国而言更是如此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银行移民数据库和汇款数据库得出的计算值。
注释：关于移民的 a 组包括 19 个小岛国家，关于汇款的 b 组包括 15 个小岛国家。 太平洋群岛国家随着时间推移的汇款变量受到萨摩亚缺失数据的推动。

还是在斐济，移民和汇款都提高了储蓄，但是对家庭收入的产生却具有不同的影响。在汤加，无论是移民的数量还是所收到的汇款数额都增加了家庭来自商业活动的收入。相比之下，在斐济，汇款似乎没有对商业收入产生影响，而且与工资收入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就好像是移民不过是国内经济中工资就业的替代方案。[56]

然而移民并不总能带来双赢结果。例如，高额汇款流动提高了罹患荷兰病的可能性，外汇储备的丰富可能导致实际汇率升值。至少在短期内，人才流失也是这些国家的显著特征。和国家的总体人口相比较，移民的教育程度较高。在 19 个小岛国家中，12 个国家的移民中熟练工人的比例超过 30%，14 个国家中，技能熟练型移民在国内技能熟练型工人中的比例超过了 40%。[57] 尽管这些移民获得了丰厚的收入，给国内带来大量的汇款，也确实传播了知识，但是他们似乎不与母国进行贸易或在母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58] 在加勒比国家里，医务人员的外移已经引起了特别关注，因为这已对医疗卫生体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移民和汇款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移民的可能性可能会为提高教育投资提供动力，而汇款可以提供资金。短期移民可以为工人提供较好的培训和教育机会，一旦移民返回，就增加了国内人力资本存量。[59] 来自斐济的证据显示，移民机会提高了家庭成员将接受高等教育的几率。[60] 对斐济进行的定性调查结果显示，为实现移民工人会很快获得特殊技能。[61]

小岛上能持续存在的工作通常是与自然资源开发有关的工作，包括渔业、林业、矿业和旅游业。在存在利基机会时，低经营成本对吸引投资的重要性就会降低。在斐济，蔗糖生产和旅游业是最大的就业源泉。作为最重要的农业企业，蔗糖生产对出口的贡献率约为 8%，雇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 10%。每年到斐济旅游的人达到 50 万，而地方人口不足 100 万。旅游业已经成为正规领域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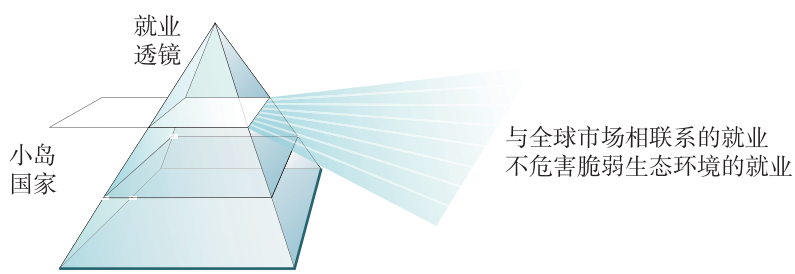
然而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脆弱性。这些领域更易受到自然冲击的影响，自然冲击既包括自然灾害也包括多变的降雨模式。和地理劣势一样，政策不能根除这种脆弱性。但是基于自然资源开发的工作不应该危害岛上脆弱的生态环境。旅游业和渔业，如果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发展，会产生积极的环境影响。

确保自然资源领域中工作的租金得到广泛的分配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例如，瓦努阿图举世瞩目的增长并没有对大多数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瓦努阿图的增长是外商对旅游业、金融服务业和土地开发的投资驱动的，只有城市人口中相对的一小撮人获得了利益。这加剧了不平等程度，可能导致社会分裂的趋势。[63]

对毛里求斯奇迹的认真研究显示了小岛国家是如何能够在不开发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活动的多样化的。1977 年至 2009 年期间，毛里求斯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 5.1%的速度增长，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总体上的速度是 3.2%。世界经济论坛将毛里求斯列入该地区第二大最具竞争力的国家。这种持续的增长伴随着随着时间推移而进行的大范围的结构转型。1968 年独立时贫穷的毛里求斯，已经从蔗糖经济体转向纺织业和服装制造然后再转向旅游业、金融和信息通信技术等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64]

对毛里求斯奇迹的解释种种不一。毫无疑问，重视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利用以轻工业制造业为目标对象的出口加工区是毛里求斯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毛里求斯也以低腐败水平、有利的监管环境、公司领域的密切合作和灵活的制度而自诩。[65] 但是允许毛里求斯开启这一伟大的发展之路的契机绝无仅有。这包括过去统制服装出口的配额制。而这种机会是当今的其他小岛国家难以企及的机会。

由于无法从规模或专业化利益中受益，小岛国家面临着独一无二的困难。在远离主要经济活动中心的地方，例如太平洋岛国，这种困难更是进一步加强。毛里求斯的经历说明，战略政策、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和些许运气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对许多小岛国家而言，与邻近的经济中心建立联系，实现移民利益的最大化，在保护其脆弱生态环境的同时挖掘利基市场是前进的道路。



青年失业率很高的国家

和年长的成年人相比，青年人失业的可能性更大。在大多数国家中，青年失业率通常是全体人口失业率的二到三倍，青年失业率被定义为 15~24 岁的人口（见图 6.5）。失业率只描述了青年人从学校走向工作中所遇问题的一个方面。例如在农业经济体中，公开失业不高，青年的就业困难更可能体现在工作质量不佳，收入低。在青年失业率很高的国家中，就业质量可能是那些找到工作的青年人所面临

的问题。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在非正规领域就业的 15~24 岁的工人是 35~54 岁的工人的两倍还多。[66] 高度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为从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提供的空间有限。在突尼斯，即使在主要雇用青年劳动力的领域，就业也常常是临时性和非正规的。[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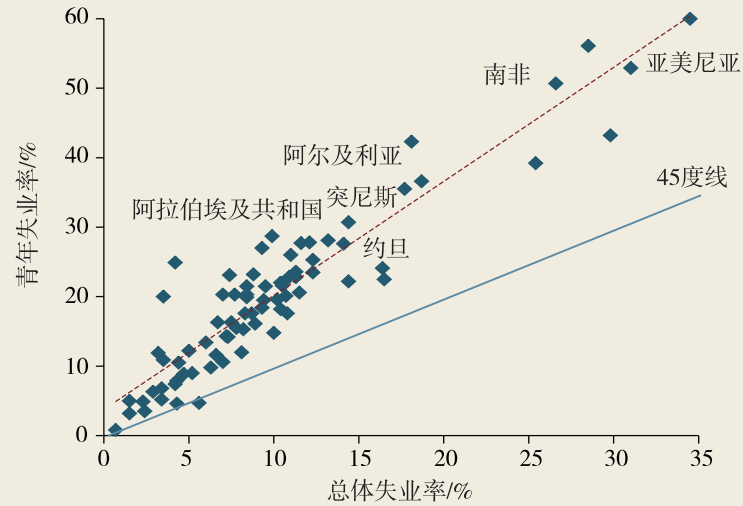
青年失业率的利害关系很大。近期发生在阿拉伯世界和南欧的事件凸显了受过教育的青年因就业机会不能如愿以偿而爆发的不满。“阿拉伯之春”可能提高了该地区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但是如果就业机会不能接踵而来，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局势。[68] 青年失业问题产生经济成本，不仅短期如此，长期上也是如此。青年失业可能导致永久性的、以较低未来收入为表现形式的伤痕。[69] 就业机会的匮乏也可能导致青年萎靡不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青年失业率的降低事实上是由青年人口退出劳动力队伍引起的。[70]

许多具有严重青年失业问题的国家的青年人口数量非常大。在津巴布韦，43%的工作年龄人口是年龄介于 15 岁到 24 岁的青年，青年失业率比整体失业率高出三倍。中东和北非的青年失业率非常高，在该地区，青年人口占有压倒性的多数。年龄介于 15 岁到 29 岁的人口超过了 1 亿，占该地区人口总量的 30%，占该地区工作年龄人口的 47%。规模如此之大的青年群体不仅要面临较高的失业率，而且产生劳动收入下滑的压力。[71]

但是人口远非全部问题。并不是所有具有青年失业问题的国家都面临着“青年膨胀”。在斯里兰卡，年龄介于 15 岁到 24 岁的工作年龄人口不足四分之一，但是青年失业率却是总体失业率的三倍还多。而且甚至在青年人口巨大的地方，青年人口可能遭遇其他就业障碍。求职者和就业机会的信息不足是青年人在寻找工作时比成年人困难的原因之一。在私营机构和公共机构及其他渠道关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足时，个人关系网络对匹配人们和工作很重要。在大多数中东和北非国家里，大部分工人通过家庭和朋友找到工作。[72] 和从教育转向就业的青年人相比，成年人具有更好的网络关系。如果一个人的网络关系中很大一部分比例处于失业状态，那么这个人找到工作的机会也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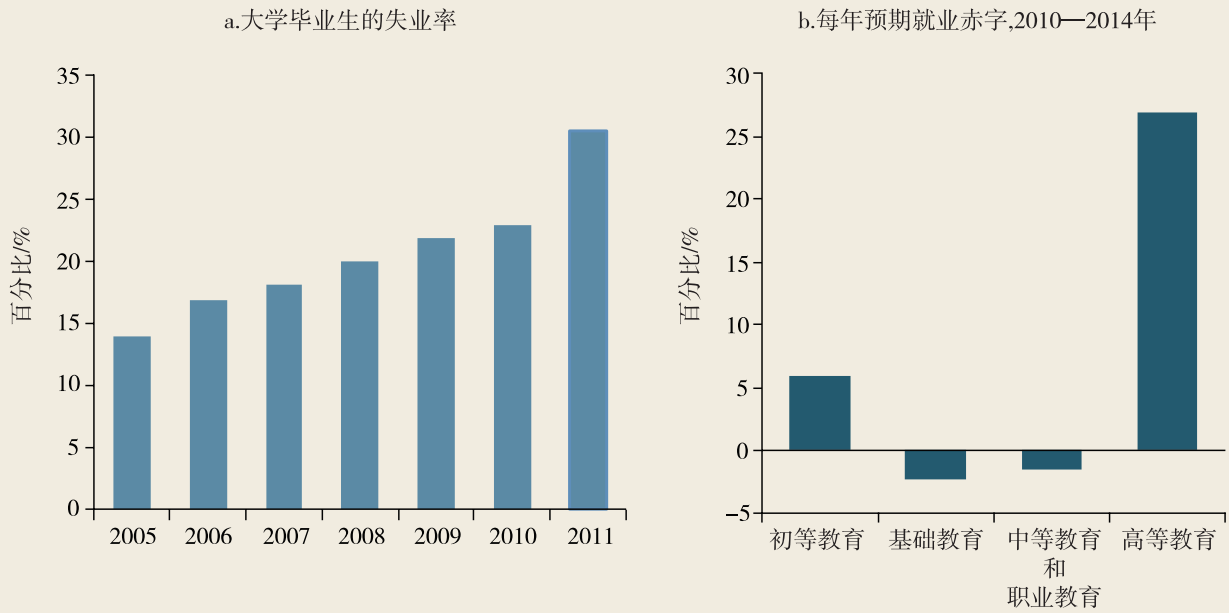
技能失配是另一常见的解释。在中东和北非投资气候评估中接受调查的公司中，近 40%的公司认为熟练技能劳动力有限是企业的主要限制因素。该地区的正规教育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因而缺少正规教育不是理由。事实上在许多国家，青年失业率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在摩洛哥，2009 年，具有大学学历的青年的失业率是 17%，这是小学学历或更低学历人群的 3.7 倍。在突尼斯，2010 年，具有大学学历的青年的失业率为 23%，而非毕业生的这一比例为 11%。[73] 在突尼斯，毕业生找到工作平均需要 28 个

图 6.5　某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非常高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
注释：失业率是 2000—2010 年的平均数。

图 6.6 在突尼斯，教育程度较高并不带来较好的就业



资料来源：Angel-Urdinola，Brodmann 和 Hilger 2010；突尼斯政府，国家统计局。
注释：就业赤字表示 2010—2014 年期间预计年劳动力增长和预计年就业增长之间的差额。

月，非毕业生只需要 19 个月。[74] 不仅仅是失业率在增长，而且大学毕业生的失业赤字增长速度也高于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见图 6.6）。

高学历者高失业率的悖论与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增长路径相关，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的公务员系统和国有企业是最佳雇主，而教育体系旨在为他们提供职员。学生向往到福利丰厚、就业稳定的公共领域工作，重视获得学历证书，而不是获得能够提高就业能力的技能。[75] 该地区首选的青年教育路径与绩效优异的东亚国家的青年教育路径差异很大。2009 年，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主修科学、技术或工程的大学学生占四分之一或不足四分之一。[76] 在某些东亚国家，例如中国、韩国和马来西亚，这一比例超过了 40%。[77]

关于如何应对青年失业率很高的国家中的就业挑战的方案一般建立在这两种解释之上。雇主和求职者之间信息流通不畅被视为采取重视改善劳动力供应和需求之间匹配度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理由。专业咨询有助于求职者理解他们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及机会在哪里。临时就业计划可能提供第一份工作，并促使雇主意识到青年工人的价值。至于技能，高学历和高失业率之间的对照被视为学校教育的质量和相关性与劳动力市场实际需求的脱节的表现。有人认为，改善青年的就业前景，调整教育培训制度促进有市场需求的技能而不是学历至关重要。[78] 在短期内，培训项目当然是为失业青年提供雇主所需要的实际技能最明显的响应。

然而这些方案的潜在影响是有限的。信息畅通、专业咨询、临时就业计划当然会对某些求职者起到帮助作用，但是这些方案是否将对总体失业率产生重大影响仍不清楚。只有在存在许多空缺职位的情况下，求职者和就业机会之间的更好匹配才会带来总

就业的大量增加。但是中东和北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毕业生高失业率部分是由熟练劳动力需求主要来自公共管理领域的事实造成的，而公共管理领域的增长受到预算问题及持续增加的私有化和管制放松的限制。[79] 同时，私人领域增长的主要源泉（如建筑业和低价值服务）多半需要不熟练工人。[80]

这个问题和培训项目的问题大同小异。受过教育的青年具有快速学习的能力。如果雇主接受了他们，他们甚至可以根据需求提供在职培训。但是培训可能不能改变意愿。

尽管吸收能力在持续下降，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公共领域已然是高等教育制度的主要客户，从而塑造了学生的期望和选择。在诸如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伊拉克、约旦和也门共和国等国家中，公共领域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例仍然占三分之一左右。[81] 在某些国家，近年来公共领域就业的增长最为有限，但是预算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未来就业规模的重大压缩。然而期望仍然存在，而且对许多希望在公共领域就业而追求大学教育的失业青年而言，这有点儿希望幻灭的意味。

信息、咨询和培训不太可能克服这种挫败感。在高青年失业率国家中应对就业挑战要求一个蓬勃发展的、能够创造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的教育水平和愿望相契合就业机会的私营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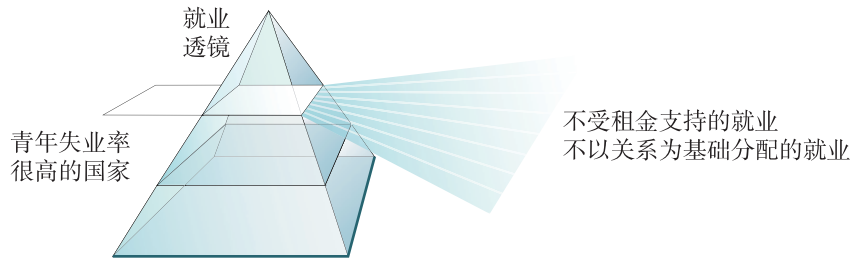
仅仅增长可能还是不够的。毕竟，突尼斯是阿拉伯世界里第一个因就业不满意而爆发政治骚乱的国家，鲜有国家的经济绩效超过突尼斯。在 2000 年到 2010 年期间，突尼斯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几乎达到 5%；同时总体失业率保持在 14%或以上，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超过了 30%。

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突尼斯和其他青年失业率很高的国家没有发展更多的劳动密集性产业，为什么扩张最快的领域依靠不熟练技能工人。问题的答案可能更在于生产市场而不是劳动力市场。尽管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已经进行了旨在精简繁文缛节和改善总体经营环境的改革，自由裁量权、独断专权和不平等待遇仍然阻碍竞争力和私营领域发展，特别是阻碍诸如电信等技能密集型领域的发展。在中东和北非的许多国家里，与政权的关系对成功的作用可能比企业家能力更重要。[82] 这些受保护行业的额外利益常常以就业保障和其他福利的形式延伸到工人，进一步加重了那些被排除在外者的挫败感。

公司动态提供了一些这些国家与就业岗位创造和就业增长相关的困难的证据。在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里，新公司的登记率不高 [83]。而且即使它们能够开始，小公司要想成长为大公司也面临着阻碍。突尼斯绝大多数正规公司是小公司：86%的公司是一人公司，拥有 100 名工人或更多工人的公司仅占 0.4%。但是这些大公司占全部就业的三分之一强，比全部一人公司的总量还要多。对这些公司过去十年活力的研究显示，微型公司和小公司几乎从来就不能发展为大公司。而且，逐渐成长为小公司的一人公司如凤毛麟角，而且许多一人公司可能关闭。[84]

尽管青年失业率很高的国家可能面临着严重的青年膨胀问题或教育质量问题，问题常常出在需求方方面面，而有限的竞争减少了就业机会，尤其是减少了高技能青年的就业机会。如果公司准入和增长的障碍因素减少了，中东和北非的许多国家将具有较大的空间为青年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然而只要政治关系对进入现代领域的重要性超过企业家能力，这种期望就不

可能实现。因此对青年失业率很高的国家而言，结束特权是比改善劳动力市场匹配或提高技能更优先的事项。通过给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口提供工作，技能密集型领域的活力将带来更快的增长。通过减轻保护性活动加给他人的负担，结束特权将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这也将加强社会的公平感，一种青年人可以通过他们的知识而不是他们的关系而获得成功的意识。



经济体的规范化

在劳动立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劳动力覆盖率很大、实现全民覆盖似乎唾手可得的国家里，存在着规范化挑战。但是朝着此方向前进引发了严重的平衡问题。规范化通常被视为加强社会凝聚力的必要条件。而且提高那些了解劳动法律、获得社会保障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这扭曲了激励机制或给公司增加了负担，规范化可能降低生产率。

规范化经济体的一个特征是，基数原本很大或持续增长的城市人口中，许多居民的收入远远超过贫困水平，然而许多仍然在非正规领域就业。这些经济体中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要求先进的公共服务，包括高等教育、卫生保健和退休金。他们常常因治理不善而感到不满。他们可能认为税收和公共领域利益无用或不公平，他们厌恶薄弱的物质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也厌恶过度的监管负担。这种挫败感导致规避或违反规则，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非正规工作不仅可能持续下去，甚至还能繁荣起来。[85]

这种状态有时候被描述为不规范陷阱，反映了薄弱的社会契约。[86] 国家的一大部分城市劳动力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这有时候被解释为国家无力执行规章制度、公民不愿遵守规章制度的征兆。[87]

在这些相对发达的经济体中，不规范就业的盛行可以滋生贫穷和社会排斥问题。[88] 根据定义，非正式工人处于法律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险覆盖之外，这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工作场所虐待、健康风险及商业周期变化的危害。非正式工人面临的贫穷几率更高，而且常常认为自己是穷人。[89]大部分非正式工人是男性，但是男性到非正规领域工作的可能性通常低于女性，致使不规范性成为性别不平等的另一个原因。在秘鲁，女性和男性在不规范领域工作的比例分别为 76%和 66%，南非相对应的比例分别为 37%和 30%。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显然是个例外，相对应的比例分别是 23%和 54%。[90]

不规范性也和低生产率相关。大多数非正式工人或者是自就业，或者为未登记的小公司工作，人均资本少，技术有限，而且没有规模经济。在土耳其，正规公司和非正规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在制造业领域是 19%，在服务业领域中是 62%。[91] 对拉丁美洲六个国家的研究发现，正规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比非正规公司高 30%。[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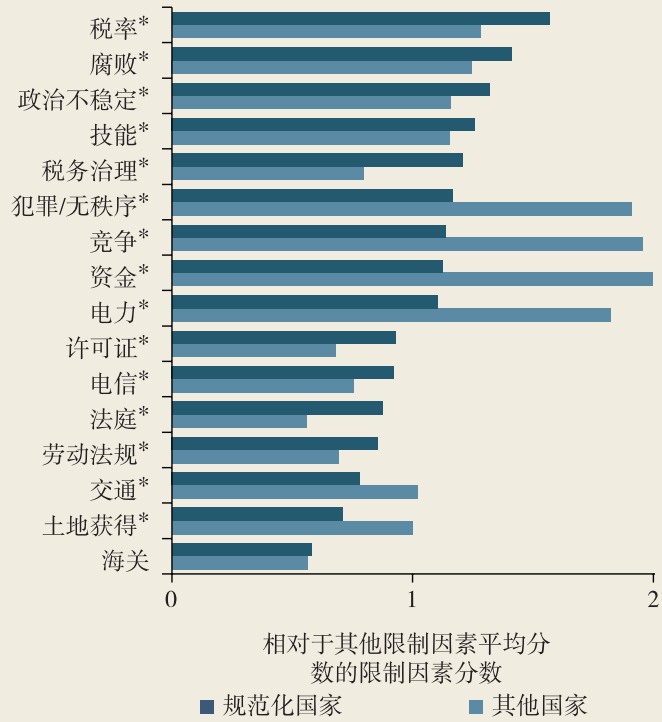
非正规领域使用公共服务而没有作出适当的税收贡献，这加重了正规公司的负担，从而也降低了正规公司的生产率。[93]

这并不是说单单规范化就可以提高生产率。证据显示，仅仅通过规范化并不能增加公司的利润。[94] 低生产率可能反映了工人和公司的自我遴选，工人和公司根据相关利益和成本的平衡来决定是否实现规范化。对许多工人而言，社会保障不佳和发生不利冲击时依赖别人的可能性使非正规领域就业成为首选的替代方案。对巴西和墨西哥劳动力市场动态的分析确认，相当一部分非正规领域的劳动力，尤其是自就业劳动力，似乎是自愿退出正规领域。[95] 自我遴选同样发生在公司身上。巴西 1996 年实行商业税减免和简化后，微型企业的正规性大大增加。[96] 在其他情况下，资产积累有限的工人发现自己陷入了低生产率非正规领域，或以非正规领域作为逃避失业的最后方法。在哥伦比亚和阿根廷，证据显示相当一部分工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整体上到正规领域工作的可能性较小，尽管他们希望到正规领域工作。[97] 无论何种情况，不规范显然是多层次的现象，一些工人被困在这个领域，一些人自己选择留在这里。[98]

事实上，关于规范性的个人观点众说纷纭。[99] 例如，来自南非德班一个比较富裕的区域的一个年轻女性焦点小组中，一些参与者将好工作与医生、律师、教师、护士或女警等正规职业联系在一起，“当一名女警是谋生的好工作，因为既能获得福利也有助于保护社区安全。”其他来自比较贫穷地区的参与者认为好工作是农业工作（“因为你可以出售蔬菜”）或缝纫工作（“因为你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其他非正规领域的工作被视为坏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具有金融风险性，而且工作条件艰苦。其中包括家政工人工作（“因为你不得不一家一家去问他们是否有工作给你做…… [他们]将支付你 30 兰特，并且说因为你只是帮了帮忙”）或割草工作（“因为你不得不到处询问你是否可以修理他们的院子……而且你在太阳底下工作”）。

长期来看，在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政府服务比较薄弱和商业环境灵活性较差的国家里，非正规领域的范围较大。[100] 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和商业法规对不规范性的实际贡献是多少。[101] 投资气候评估调查中的公司响应表明，劳动法规未必是不规

图 6.7　劳动法规可能不是实现规范化的最大障碍



资料来源：投资气候调查（数据库），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

注释：规范化国家的样本包括阿尔巴尼亚、阿根廷、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西、佛得角、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格鲁吉亚、圭亚那、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毛里求斯、墨西哥、马尔代夫、蒙古、巴拿马、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土耳其、乌克兰、乌拉圭、瓦努阿图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横轴测量了一个限制因素的分数与所有其他限制因素的平均数的比率。星号表示规范化经济体和其他国家差异的统计学的重要性在 1%左右。

专栏 6.7 在墨西哥，关于如何减少不规范性的争论处于白热化状态

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在正规领域就业使墨西哥家庭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和所有家庭成员的健康保险，并通过这些获得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一项基于人类学和统计学证据的案例研究认为，那些没有成员拥有保险的正规工作的家庭更有可能陷入贫穷，这是因为他们面临灾难性健康费用的风险。他们从亲属和邻居那里获得的社会支持也比较少。[a] 因此，正规就业对墨西哥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

尽管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墨西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 14 000 美元，根据所使用的定义，墨西哥的非正规就业在就业总量中的比例在 50%到 62%之间浮动。考虑到国家的发展水平，人们认为这一比例很高，而且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一比例没有出现下降的迹象。几项研究认为，严格的劳动立法是造成墨西哥不规范经济庞大的因素之一。[b] 墨西哥已经试图对其主要的劳动法案进行改革，新的劳动法案颁布于 1973 年，并与 1917 年宪法所包含的权利相联系，但是改革并不成功。

执行不力是隐藏在墨西哥不规范经济之后的另一个因素。2012 年，墨西哥政府宣布劳动部的监察委员增加一倍，从 300 名增加到 600 名。然而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一数字仍然不足。[c] 劳动法庭过分延迟案件判决：案件获得判决可能需要三年到六年的时间。[d]

立法改革与执法改革的滞缓与成功的现金转移计划，即机遇计划（Oportunidades）和非摊缴性社会保险计划，即社会健康保险计划（Seguro Popular）的推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机遇计划几乎覆盖了全体人口中五分之一的人口，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农村贫穷人口，从而使机遇计划成为墨西哥目标性最佳的减贫计划。社会健康保险计划是成长最快的计划，到 2012 年 4 月，其覆盖率超过了 5 000 万。[e] 但是某些初步研究发现，非摊缴性计划总体上会诱发不规范性，或至少会抑制规范就业，社会健康保险计划尤其如此。[f]

同时，关于健康保险普及化的讨论在墨西哥同样活跃。学者和决策者讨论它，它也是政治争议的课题。许多讨论围绕健康保险普及化需要多少成本展开。预测值的变化幅度很大，从没有增量成本（由于效率和税收利益）到相对很大的成本（考虑长期的人口变化），种种不一。这种差异源自方法的不同，这表明了话题的复杂性和测量改革全部意义的难度。[g]

关于墨西哥规范化的讨论需要放在更广泛的环境下进行。近年来，贫穷和失业增加了，而实际工资却保持不变。但是其他福祉标准，例如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险的可得性却在持续得到改善。[h] 平均生产率一直在增长，但是由于就业和工资的过分搅拌（churning），增长缓慢。[i] 人口趋势仍然表现为大部分人口的高生育率，这导致贫穷和不规范的社会再复制。[j] 劳动法和税法即社会保护组织的彻底改变是否将大幅度降低不规范性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Gonzalez de la Rocha 2012。

b. Botero 等 2004；Heckman 和 Pagés 2004；Levy 2008；Venn 2009。

c. 根据 Pires（2011），巴西拥有 3000 名监察委员；根据 Piore 和 Schrank（2008），法国拥有 2100 名监察委员。Piore 和 Schrank（2007）估计墨西哥每 10 名工人拥有 1.72 名监察委员，巴西是 2.45 名，阿根廷是 3.05 名，智利是 19.25 名。

d. Kaplan，Sadka 和 Silva-Mendez 2008。

e. http：//www.seguro-popular.gob.mx。

f. Aterido，Hallward-Driemeier 和 Pagés 2011。

g. Anton，Hernandez 和 Levy 2012，Perry 等 2007；Villarreal 2012。

h. Villarreal 和 Rodriguez-Oreggia 2012。

i. Calderon 2012。

j. Martinez 和 Aguilera 2012。

范性的主要原因，这倒不是因为法律、法规是不相关的，而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不相关的。腐败和税收被视为公司所面临的最令人气愤的障碍因素（见图 6.7）。近期研究也显示，和劳动法规相比，商业法规更有助于解释不规范性和失业的变化。[102]

应对规范化经济体所面临的就业挑战要求在扩大社会保障和劳动法管辖范围的同时不抑制经济的活力。拉丁美洲此前通过烦琐的法规、强制性福利和设计不良的社会保险计划实现规范化的努力引起了民众的热情，却也降低了生产率，最终导致经济的停滞和社会保障质量不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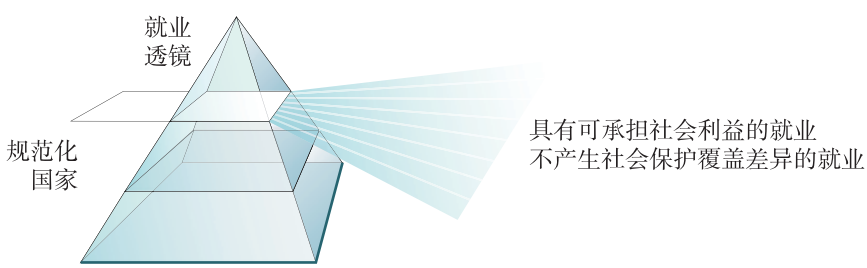
近年来降低不规范性的努力取得了

新的进展。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正在彻底变革或提议彻底变革社会保障组织。首先，转移支付计划扩大了。巴西和墨西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了现金转移计划，现在，该计划覆盖了将近 1/5 的人口。[103] 巴西、智利和墨西哥还实行了针对老年公民的非摊缴性计划，其他国家也继起效仿。更激进的是，决策者正在讨论是否普及社会保险，脱离目前的来自一般税收利益资金的摊缴性体制。[104] 改革将必然扩大受益者的范围，但这是否会鼓励公司实现规范化是一个热烈讨论的问题，尤其是在墨西哥（见专栏 6.7）。[105]

迄今为止，鲜有国家成功地大幅度降低不规范性。巴西和智利的快速增长和强化的制度使他们成为近期的例外。在这两个国家，改变劳动力市场法规引起的效果有限。持久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持续的增长取得了成效。但是法治的加强、有效的政策及更好的国家职能理念也发挥了作用。

有人认为不规范性是社会契约不强的结果，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前进的道路要包括法规执行力的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改善和政策连续性的提高等多面的联合。[106] 如果不规范性与生产单位规避、错开或置身法规之外相关，那么三管齐下的战略可能奏效。[107] 对那些明显在法规管辖范围之外工作的人而言，人类发展和社会保障服务和激励政策的覆盖面应该向他们延伸。对那些在成长受阻、以合法手段规避规范性的公司工作的人而言，应当简化法规并减轻负担。最后，对那些在规避法规法案的公司中工作的人而言，应当加强执行力度。为使这一三管齐下的战略具有成功的机会，工人和雇主需要视国家为可靠的、公平的伙伴。如果国家不能通过提供有效优质的服务产生信任感，无论是规制改革还是执行力提升都不能成功地大幅度提升规范性。

关键在于建立成本不太高、得到工人肯定的规范的制度和方案。这样，规范化经济体的就业议程与有效规章制度和社会保护体制的发展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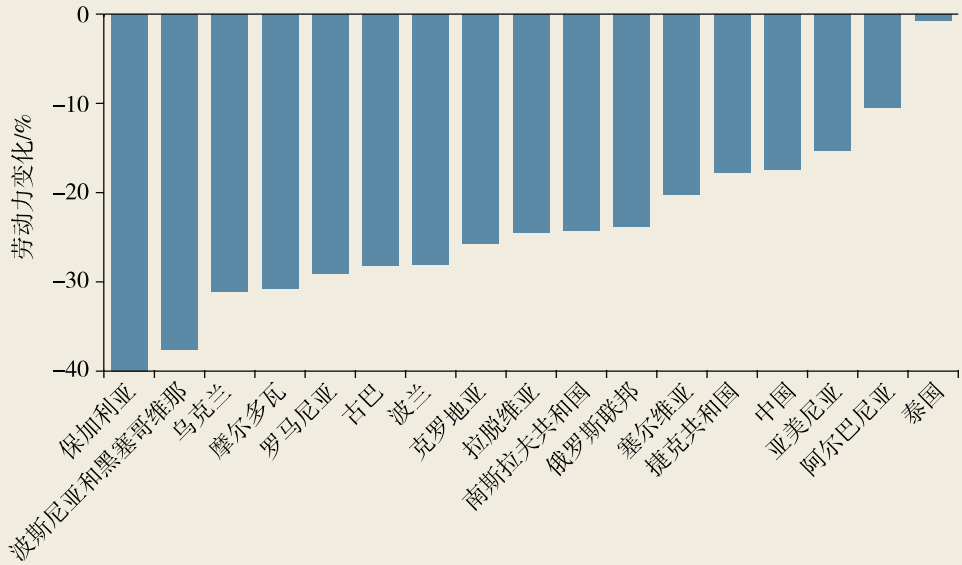


老龄化社会

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许多国家预期寿命的提高导致了世界上几个地区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当今的老龄化社会集中在工业化国家、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南锥体。2010 年，中国进入了老龄化阶段。而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加坡和泰国将在不久的将来经历老龄化。[108]

老年人赡养率衡量了 65 岁及 65 岁以上人口数量与工作年龄人口（15 岁到 64 岁）数量的比率。当这个比率很高时，工作年龄人口就会面临获得更多收入满足年长一辈需求的压力。从现在起到 2050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新加坡的老年人赡养率几乎将提高至 5 倍。在这两个国家中，每 10 名 15~64 岁工作年龄人口相对应的老人

图 6.8 如果特定年龄参与率保持不变，劳动力的规模将缩小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联合国人口统计得出的数值。
注释：模拟对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评估基于如下假设，即 2011 年到 2050 年期间，特定年龄劳动力的参与率保持不变。

人口分别为 4 位和 6 位。中国的老年人赡养率几乎将增加到 4 倍。从现在起到 2050 年，东欧及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原本已是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的赡养率一般将增加到 2 倍甚至更多。

赡养率上升的原因因国家而异。在大多数国家中，老年人的寿命更长了；在某些国家里，工作年龄的人口比较少。保加利亚的低生育率促使其人口在 1990 年至 2010 年期间降低了 15%，到 2050 年，和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人口高峰时相比，保加利亚几乎将减少 40%的人口。预计其他东欧国家，例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尔代夫、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将遵循同样的模式。2050 年，中国的人口将比现在减少 500 万。印度、新加坡和拉丁美洲南锥体地区国家的人口增长正在减缓，到本世纪中叶将开始下降。

如果目前年长工人的劳动参与率很高，如果这一水平可以得到维持，那么老龄化对平均收入的影响可以得到很大缓解。但是这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如果特定年龄的参与率维持不变，某些国家，比如泰国将可以限制劳动力的绝对下降，但是其他许多国家不会。由于工作年龄人口规模的缩减，许多东欧国家、古巴和中国将受到严重影响。2011 年到 2050 年期间，保加利亚的劳动力将下降 40%，波兰将下降 28%，中国将下降 17%（见图 6.8）。[109]

老龄化通过几种渠道影响就业。[110] 较低的生育率可能意味着准备寻找和参与工作的女性人数的增加，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东欧国家鲜有这方面的证据。青年人口群体的减少可能降低了创新能力。老龄群体致残率上升，从而进一步影响了老龄化群体的劳动供应率。[111] 考虑到储蓄促进投资、增长和就业创造，理解储蓄总量将受到怎样的影响同样重要。老年群体的储蓄一般会下降。如果青年人口确立了额外的缓冲方法支持老年人较长的生命，特别是在公共退休计划不可持续或缺位的情况下，这种降低可以得到弥补。支出模式也随着年龄而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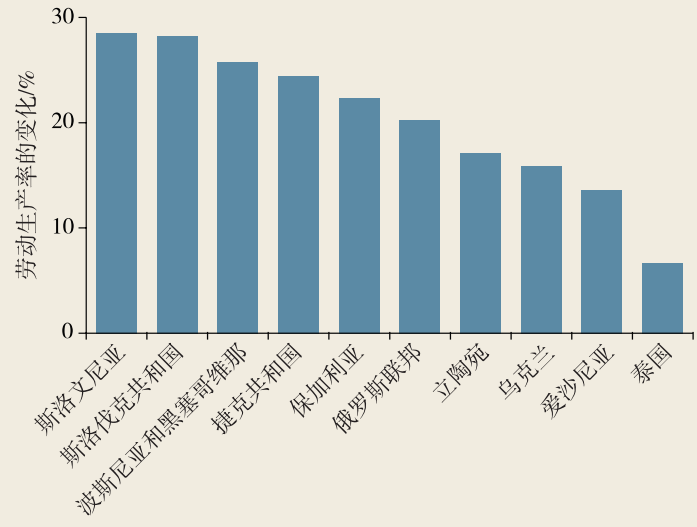
变化。长期护理业在高收入国家的兴起是一个范例。在美国，这一行业目前的正式就业岗位超过了 300 万个，而且据估计约有 1 000 万 50 岁或 50 岁以上的群体（大约是这个群体的四分之一）护理自己的一位或两位父母。[112]

在工作人口比较少的老龄化社会里，提高生产率是维持生活水平的最根本要求。许多东欧国家需要很大的生产率效益（见图 6.9）。如果这些国家不能提高生产率，持续下降的生活水平将危害这些濒临贫穷的人口的利益。[113]

通过就业，老龄化还可以对代际关系和社会凝聚力产生影响。移民和老龄化对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基于家庭的老年人赡养体制造成了压力，这提高了他们不得不高龄工作的可能性，将不能从他们孩子那里得到金钱或其他什么帮助。[114] 老年一代可能感觉到他们不仅被忽视了，而且被排斥在外。在波兰，一位 55 岁的老人感觉到“年龄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已经递交了简历，但是他们告诉我你太老了，他们告诉我如果 35 岁他们就可以雇用我。我有 20 年的经验，可他们却希望我 35 岁？”[115]

在许多老龄化中高收入国家里，当前设计的社会保障和健康体系几乎不具有持续性。基于俾斯麦模式的体制，社会福利和保险通过基于即期支付的劳动税获得资金，这种体制尤其容易受到攻击。缴纳基数的降低同时缩减了退休金和健康医疗的可用资源，但是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对这两者的权利要求有增无减。70 岁及 70 岁以上老人的健康护理成本，再加上较高的致残率，是壮年工作人口成本的二到三倍。[116] 尽管中期来看，许多老龄化国家的教育支出可能降低，但是随着学校的倒闭和教师失业，这也会造成进一步的、常常令人痛苦的调整。

图 6.9　为避免生活水平的降低，就不得不增加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联合国人口统计和国家家庭调查得出。
注释：模拟评估了在就业率下降既定的情况下，2011 年至 2050 年期间维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变劳动生产率必须增长的幅度。

社会福利体制所需调整的幅度之大，令人却步。在东欧一个代表性国家里，到 2050 年，单单公共退休金体制的赤字几乎就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7%，而目前这一数字是 2%。[117] 为实现平衡，就需要延长退休年龄或必须降低退休金利益与退休时收入的比率，或实现两种方式某种程度的联合使用。这种改变可能引起老年人的物质困难。调整过程本身可能就会引起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痛苦。几个高收入国家的经历表明，实行必要的改革可能将社会凝聚力降低到极限。

老龄化也可能降低社会的流动性，这可能产生经济影响。例如在乌克兰，老龄化发生的背景是乌克兰正在以高于危机前增长的速度增长，且创造的就业岗位微不足道。尽管如此，一些公司迫切需要工人，既包括高技能的工人，也包括手工工人。老年人的流动性比青年人低，而且房地产市场又使他们很难改变居所。内部流动性不高是扩大活动提高生产率的重大瓶颈因素（见专栏 6.8）。

专栏 6.8 在乌克兰，移民和持续下降的生育率进一步加剧了老龄化的影响

乌克兰的人口规模在缩减。在苏联解体时，在乌克兰从讲俄语的、高度工业化的东部地区到讲乌克兰语的、农业为主的西部地区，居住着 5 200 万人口。今天，乌克兰的人口减少了 600 万，到 2050 年，人口将进一步降至 3 500 万。生育率急剧下降，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 2.0 降低至今天的不足 1.5，尽管近年来又出现了向上的趋势。老年人的赡养率是 22%，在未来的 30 年中将超过 40%。

国际移民进一步扩大了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的影响。在动荡的转型时期和过去十年中叶之间，大约有 250 万乌克兰人移民，主要流向俄罗斯联邦和西欧。每年约有 8 万左右的人口离开这个国家，[a] 近期研究显示了移民可能的积极影响，其中包括汇款及返回的移民，而移民社区参与还未显示人们所期望的影响。[b] 年龄介于 25~29 岁的人口，特别是女性，大量从劳动力市场退出，2001 年至 2010 年期间，女性参与率从 78.1%降低至 70.9%。[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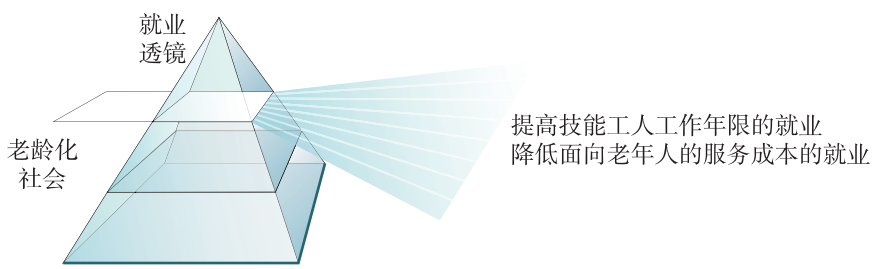
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是平衡老龄化影响的关键因素。但是正如失业率的高差异度所示，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很低。在国家的某些地方，雇主痛苦地抱怨缺少具有足够技能的工人，而同时他们不能填补可用的无技能工作。然而根据国际标准，乌克兰内部的流动性不高，而且近年来还下降了。缺少能够承担得起的房屋成为流动性的主要障碍，这也对他们在新地方登记获得福利造成了障碍。大城市中的出租物业很少，常常很贵，用于支付租金的工资可能高达家庭收入的 50%。[d]

最后，乌克兰还可能面临恶性就业循环。持续下降的劳动力和惨淡的生产率绩效将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推到了不可持续的边缘。无力为老龄化人群提供福利，改革体制可能带来压力，这可能成为社会局势紧张的导火索。正如参与者在焦点小组讨论中所提及的，这种紧张局势可能被工作分配不公正和公共领域就业存在贿赂行为的看法所扩大。[e] 就业率的降低也可能降低公民参与。尽管也不高，拥有工作的人口的政治参与和社区参与是失业者的 2 倍，比非活动人口高出 25%。[f]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世界人口前景在线数据库，联合国，日内瓦。
b.《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乌克兰国家案例研究。
c. 乌克兰统计服务。
d. Komarov 2011。
e.《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乌克兰国家案例研究。
f.《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乌克兰国家案例研究。

在乌克兰这样的老龄化社会里，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是那些维持高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维持老年人高劳动力参与率的工作。这些工作可能遏制平均收入的下降，同时保护社会保险体制的生存，在许多国家，社会保险体制处于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通过这两种渠道，这类工作也将有助于提高社会凝聚力。针对老年人的家庭护理模式的发展也有助于支撑维护高就业率、遏制社会保险成本的孪生目标。主动吸引并包容移民及管理移民社群创造良性循环的实践同样给人巨大回报的期望。

诸如提高退休年龄的措施可以促进劳动力参与，为福利制度提供资金，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群体都具有同等预期寿命。一般情况下，职业、技术和技能工人的寿命比手工工人，特别是危险行业里的工人要长。提供技能工人的工作年限是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减缓就业率下降的途径之一。



问题 6 选择目标的投资环境

创造有助于私营部门创造就业岗位的投资环境是首要优先政策。问题是，政府是应当着眼于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是着眼于具体的领域、活动类型、公司规模和最具潜力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领域。就业挑战因国家的发展水平、禀赋、人口和其制度而不相同。确保所有领域的自由进入和自由竞争是增长的基本条件。但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常常有限的财政空间和行政能力，为整体经济创造有利的商业环境可能具有挑战性，相关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设定优先实行的政策。

传统智慧对针对性政策的怀疑态度源自工业政策常常灾难性的经历。尽管拉丁美洲在进口替代性阶段选择目标市场的行为很普遍，到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一致认为支持具体领域的干预措施导致寻租行为、经济停滞和外部脆弱性等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增长缓慢也被归咎于支持地方工业集团、导致竞争力下降的政策。几个东亚国家成功的工业化重新引起了对目标选定和国家职能优点的争论，但是制度失灵的可能性仍然是主要关注的问题。[118] 主流观点认为决策者在选择目标活动时既缺乏信息又缺乏能力挑选优胜者，这样就存在一种风险，即目标性支持措施的潜在受益者可能不恰当地影响决策进程。

目标针对性未必是工业政策

投资环境是创造机会和动力促使公司投资生产性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并扩张的一系列公共商品和公共政策。[119] 它包括一系列广泛的政策杠杆：确保稳定和安全、改善金融市场、提供基础设施服务、降低管理负担和税负，以及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将针对性投资环境和工业政策等量齐观是一个自然的倾向。如果某些活动带来大规模的生产率外溢（例如，由于边做边学，或由于专业化和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目标针对性可能意味着支持这类活动。近年来，与生产率外溢相关的各种活动都从不同角度得到了重新审视，为获得认同的学术界和实践派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见专栏 6.9）。

然而，投资环境的目标针对性未必是针对工业领域的。目标针对性可能强调性别，比如政策目标在于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时，或者强调空间考虑，比如城市化政策或区域发展政策。或者它可以强调企业规模，比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因国家而异。农业经济体的就业议程可能涉及提高小农农场的生产率，资源丰富型国家的就业议程可能涉及维护国际竞争力，青年失业率很高的国家的就业继承可能着眼于培育雇用技能型劳动力的活动领域的竞争力。在每一种情况下，设定针对性目标的逻辑在于应对遏制就业对发展贡献的市场不完善或政府失灵问题。

农业领域的目标针对是一个典范。根本逻辑基于公共商品的概念。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缺乏适当的技术和足够的基础设施。随着可耕地变得稀缺，发展提高产量的技术不可避免。[120] 但是由于技术可以自由复制，发展这些技术的动力被削弱了。[121] 这样，公

专栏 6.9 围绕工业政策的辩论再一次白热化

工业政策是描述经济管理工作的方法，为实现国家目标，工业政策给特定的领域予以直接支持。20 世纪 80 年代，工业政策开始失势，但是今天工业政策再次获得了认可。然而，新兴的观点招致了批评，引发了新一轮的辩论。

关于工业政策的论据取决于三种类型的市场失灵：知识外溢和充满活力的规模经济，协作失败和信息外部性。首先，工业政策来自这样一个观察认识，即知识外溢和充满活力的规模经济因行业而异。当市场不能发出投资项目未来收益的正确信号（例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而私营领域自身也倾向于削减投资时，就会产生协作失败问题。当关于投资机会收益的信息有限和搭便车的风险阻碍投资和创新时，就会出现信息外部性问题。

在这些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几种方法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工业政策的理念。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因禀赋变化引起的比较优势的转变。基础设施的巨大生产率溢出效应和相关的协作失败为国家发挥主导作用提供了理由。为识别即将被支持的行业，该方法提出向具有相似禀赋、但是收入水平多少高一点儿的国家学习。这些国家中具有稳固出口记录的领域表明了那些领域随着经济的增长可能具有比较优势。[a]

第二种方法强调政策过程，尤其是强调公司关系。根据这种观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对话有助于克服协作失败问题并从私营领域获得关于最相关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的信息。[b]

对第三种思维学派来讲，重要的不仅仅是协作失败或外部性问题，而且也是生产性知识外溢的问题，即掌握做事情的方法。这类知识有别于编纂的公共知识，这类知识是通过经验获得和积累的。该方法认为与不同工业相联系的生产知识外溢可能是巨大的。为确认值得支持的工业，该方法提出以产品所包含的生产性知识的多少来确定产品的等级，重视那些与当前所制造的产品相似但却包含更多知识内容的产品。[c]

工业政策的反对者对所谓的基本原理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首先质疑执行工业政策的实际性。例如，在承认某些行业中存在巨大的潜在知识外溢和充满活力的规模经济的同时，怀疑论者质疑公共领域是否具备识别这些行业的能力。一个相关的考虑是公共领域使工业政策的进程充满活力的能力：对老工业适用可接受的日落条款，将资源分配给新工业。更一般地，怀疑论者相信成功执行工业政策的知识和技能需求不是公共领域力所能及的。[d]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Lin 2009，2012；Lin 和 Monga 2011。
b. Harrison 和 Rodríguez-Clare 2010；Rodrik 2004，2007。
c. Cimoli，Dosi 和 Stiglitz 2009；Hausmann 等 2011；Nuebler 2011。
d. Noland 和 Pack 2003；Pack 和 Saggi 2006。

共政策在支持这类技术的研发和传播方面发挥了作用。由于提供产量的技术是肥料密集型的、对水资源敏感的，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包括对公路和灌溉设施的投资常常是基本条件。例如，巴西政府将对适应农业研究的投资视为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巴西政府对强调技术研发和传播的研究合作予以支持，从而对巴西农业商业领域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22]

具有活力的城市的崛起是另一个切中肯綮的案例。从都柏林到上海，卷入竞争倡议的城市日益增多，超过了国家。这种转变是聚集效应的结果：公平的竞争环境产生了一个水平的世界，而城市化政策与世界多个经济活动高点区相对应。具有活力的城市可能提供更优惠的税收待遇、简捷的土地准入、简化的行政程序，并且支持公私合作关系。效率更高的物流和对重大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通常会对激励因素发挥补充作用。近期关于空间目标针对性的一种观点是关于宪章城市的观点：为将企业吸引到一个外国投资者认为信誉不佳的国家，可以将一个城市的主权过渡给另一个国家，以此换来一整套可信赖的规则。[123] 目标是优化国家内某一小块地区的投资环境，同时可能在不威胁其他地方炙手可热的地方精英的租金利益的前提

下为进一步改革提供示范效应。

目标针对性存在的信息基础

如果一国面临的就业挑战很明确，那么也就有可能确定哪种类型的就业将有助于应对这些挑战。由于研究和数据搜集的努力，决定是否支持及如何支持创造更多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信息集绝不是空的。

以农业领域的就业为例。在大宗谷物中，大米、小麦和玉米比高粱和小米更有发展前景，但是高粱和小米生长在比较干旱、比较恶劣的环境中，那里的农民尤其贫穷。[124] 现代谷物品种在条件很好的雨养区和灌溉区产量不菲。[125] 因此，农业政策注定对不同地区的农村人口福利产生不同的影响。选择取决于国家的自然禀赋和社会目标。[126]

在非农业领域，可以通过企业面临限制因素的定量和定性评估来确认就业创造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尽管需要谨慎解释这些评估，企业的不同响应解释了可用于制定具有目标针对性的政策干预措施的模式（见专栏 6.10）。[127]

如果创建有竞争力的城市是国家就业议程的一个特征，企业调查可以提供关于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企业所面临的限制因素的差异程度（见图 6.10a）。如果工作议程要求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企业调查显示外资公司较少关注金融，但是认为海关管理、交通和颁发许可证是阻碍公司活动和增长更严重的制约因素（见图 6.10b）。一个国家可能选择重视微型企业，因为微型企业的成功有助于减贫，其他国家可能重视新兴的和大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是最具创新性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企业调查均可用于揭示最相关的限制因素（见图 6.10c，6.10d）。例如，熟练劳动力的短缺、海关的拖延和严厉的劳动力法规被大中企业视为更严厉的限制因素，而小企业则不认为是这样。相比之下，微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则认为资金可得性和竞争是它们成长更为严重的阻碍因素。最近

专栏 6.10　需要谨慎解释企业调查结果

对企业家和高层管理人员的调查可以提供私营领域关于什么是阻碍私营领域发展重要因素的反馈信息。然而在解释这些响应的时候需要谨慎。被调查者将给出的答案反映的是对他们的底线构成限制的因素，并不考虑更广泛的社会或福利含义。几乎每一位企业家都会抱怨税率和贷款利息率太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税率应该降低，或者利息率与贷款者面临的风险脱节。应该以更广泛的社会目标对个体响应者所言的限制因素进行加权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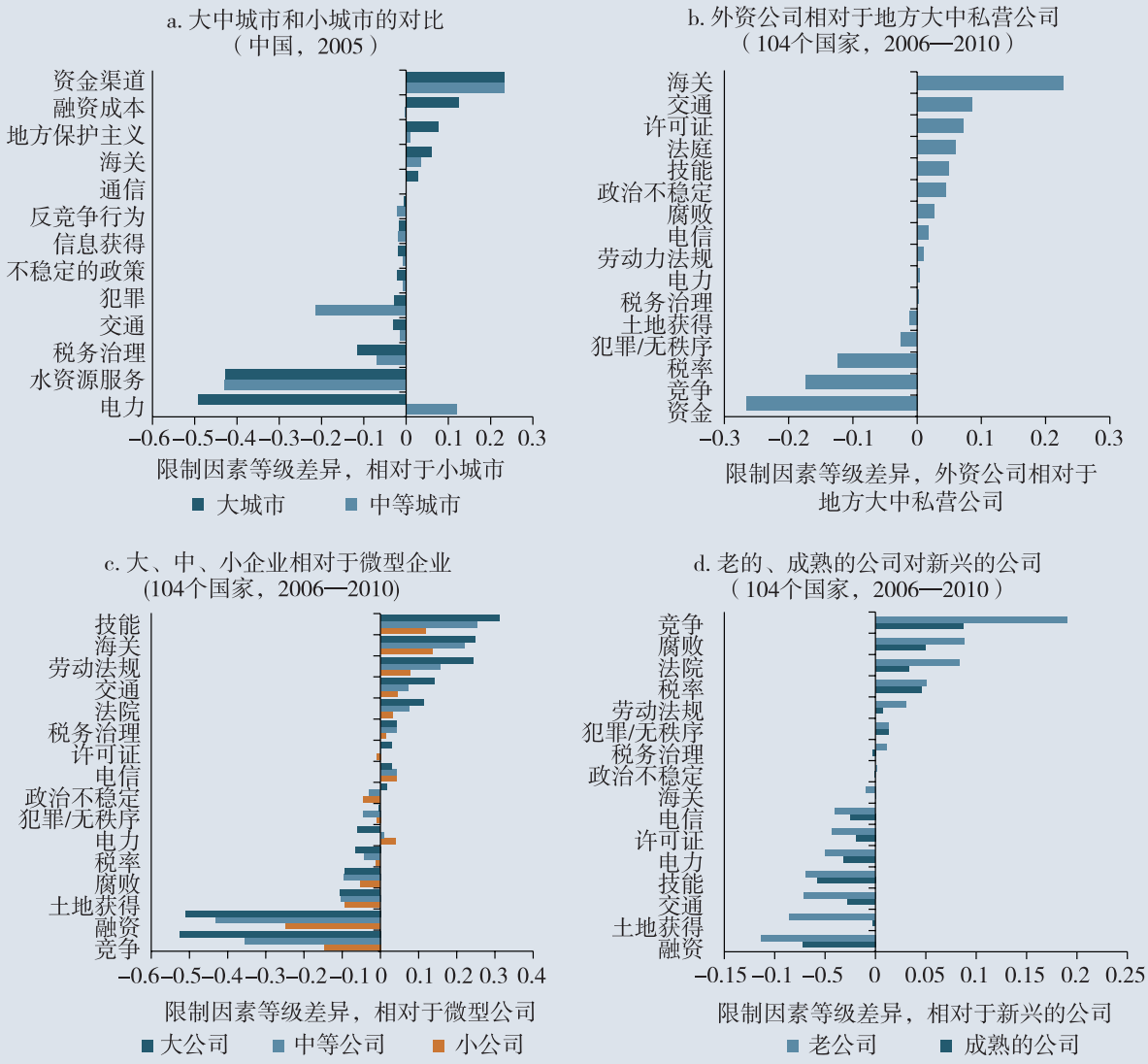
此外，企业调查只针对运营中的企业。调查并不覆盖受阻的新企业家，因此调查不曾问及他们不能克服的进入壁垒；调查也不包括刚刚倒闭的企业，没有问及为什么他们退出了市场。这样，那些可能在确定谁将被问及这些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议题不太可能得到确认。

任何问及主观问题的调查都不得不应对相应可比性的问题。如果可能，更可观的问题是优先的问题。这样，可以不问电力供应对 1~5 人规模的企业的影响这样的问题，可以问断电的频率和时长的问题，或者问使用发电机的成本。这些响应更易于在不同的调查者之间和不同的时间段内进行比较。

在解释来自企业调查的响应并将其与企业成果相联系起来时更复杂的问题是二者之间可能的双向因果联系。也可能是更复杂的条件遏制了企业生存下去的能力。但是一个公司可能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绩效不佳也可能对响应者的抱怨造成影响。绩效也影响投资环境的哪一方面特征最重要；例如，技能可得性对扩张中的公司的限制更大，而劳动法规可能对正在缩小规模，需要分流工人的公司的限制更大。

资料来源：Hallward-Driemeier 和 Aterido 2009；世界银行 2004b。

图 6.10 对企业限制因素的评估因企业而异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银行 2006—2010 年企业调查。

注释：本分析 a 组基于 2005 年对中国城市层面的企业调查，本分析其他组基于 2006—2010 对 104 个国家 6 万多家城市企业的调查。横条表明两组之间公司的限制因素等级差异。调查中的等级在 1（没有限制因素）和 5（严重限制）之间波动；这是每个公司限制因素的平均等级最终值，评估相对的严重性。分析比照了公司年龄、规模、所有制结构、出口倾向、工业和年份。

对选定国家在农村地区运营的家庭企业展开了企业调查。这些调查可以作为国家培育农村地区非农领域的额外工具。[128]

移除这些限制因素产生的效果也因行业而异。降低进入壁垒促进了自然周转率较高的行业的增长。提高资金可得性促进了那些对外部资金依赖程度比较高的行业的发展。移除限制因素的效果也因公司规模、年龄、所有权和其他特征而不同。[129] 例如，基础设施瓶颈因素阻碍了大中企业的增长，但是对微型企业的影响不大。同样，当司法体系被视为限制因素时，外资公司比地方私营公司更容易退出市场。[130]

并不是所有的针对性目标都会被利益集团俘获

毫无疑问，被既得利益集团俘获是目标针对性政策最受关注的所在。潜在受益者可能不适当地影响决策进程的风险是真切的存在。企业和政府之间太过密切的关系可能使移除支持、甚至在公然失败的情况下移除支持都极为困难。既得利益集团的政策俘获可能削弱许多发展中国家原本已经薄弱的治理能力。

覆盖大量受益者的目标针对性活动较少被俘获。例如，对小农农场、竞争性城市或女性微型企业的支持较少受到受益者的影响。在每个国家，成千上万的（如果达不到百万）的农民、城市企业和女性微型企业主一定会从针对其所属群体的目标针对性政策中受益。但是作为个体，他们没有对这类政策施加影响的权力，而且他们也可能没有能力组建有效的利益集团。

针对性的政府干预措施，只有对在具体环境下什么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只有在干预措施的设计抵制了俘获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措施。私营领域参与设计和管理特殊经济区就是其中的典范（专栏 6.11）。

专栏 6.11　特殊经济区的表现参差不一

特殊经济区（SEZs）是在一国疆域之内划出的、所实行的商业规则不同于国家其他地方普遍实行的规则的地理区域。这些不同的规则主要涉及投资条件、国际贸易和海关。该区域拥有一个从政策角度来看更自由、从管理角度来看更有效的商业环境。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大多数特殊经济区都在发达国家。然后从东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发展中国家开始启用特殊经济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常常是出口主导型增长战略的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扩大了，特殊经济区成了贸易、投资、工业、空间甚至更宽泛的经济政策的工具。1986 年，176 个特殊经济区分布在 47 个国家里，到 2006 年，3 500 个特殊经济区分布在 130 个国家里。

特殊经济区的绩效毁誉不一。特殊经济区的回报率仍然是经济学家热烈讨论的课题。特殊经济区的绩效主要取决于其设计和管理。如果特殊经济区是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如果特殊经济区与国家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果特殊经济区是基于集群的，如果特殊经济区与经济的其他领域建立了联系，特殊经济区获得成功的几率更大。

以孟加拉国为例。一开始特殊经济区项目旨在吸引高科技投资，但是政府将重点转向服装业，因为私营领域在服装业中崭露了成功的几项。事实证明，这一转变对特殊经济区项目的绩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私营领域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是一项重要的机制，通过这项机制可以克服协作挑战。从制度上，可以通过私营领域在特殊经济区委员会中的代表来建立合作关系，正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莱索托所做的那样。

许多成功的特殊经济区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官僚制度负责构建和运营特殊经济区的技术能力。当政府能力薄弱要求警惕目标针对性时，几个拉丁美洲国家通过依赖私营领域所有制和管理实现了成功。在公共领域和私营领域共存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经济区所有者结构并没有造成就业、投资或出口等方面的明显界线。但是和国营的机构相比，私营领域提供的基础设施质量更好，提供的服务附加值更高，因而收取的租金也就更高。

资料来源：Akinci 和 Farole 2011；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Kingombe 和 te Velde 2012。

注释

1. Pollin 2009。
2. De Vreyer 和 Roubaud，待出版。
3. Fox 和 Sekkel Gaal 2008。
4. Altman 2011。
5. 由于自然资源领域发现了新的矿物（其中包括天然气），莫桑比克可能一跃而为资源丰富型国家。然而，根据《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莫桑比克国家案例研究，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发展轻工业制造业仍将是该国的主要事项。
6. Arndt 等 2012；Fox，Bardasi 和 Van den Broeck 2005。
7. 专门为《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进行的莫桑比克国家案例研究。
8. Christiaensen 和 Demery 2007。
9. Lipton 2005。
10. Otsuka 和 Larson，待出版。
11. Christiaensen，Demery 和 Kuhl 2011。
12. Otsuka 和 Larson，待出版。
13. Morris 等 2007。
14. Conning 和 Udry 2007。
15. Sawada 2012。
16. 专门为《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进行的莫桑比克国家案例研究。
17. McCormick 1999；Sonobe 和 Otsuka 2011。
18. Lin 2011b。
19. 为脱离贫穷进行的调查（Narayan 和 Petesch 2010）认为经济恢复和生计恢复是最优先的事项。
20. 世界银行 2010。
21. 独立资料监察委员会和挪威难民委员会 2011；联合国难民署 2011。
22. Cramer 2010。
23. Blattman 和 Annan 2011。
24. Finegan 和 Margo 1994；Jones 等 2009；Menon 和 Rodgers 2010；Narayan 和 Petesch 2010；Schweitzer 1980。
25. Iyer 和 Santos 2012；世界银行 2011b。
26. 世界银行 2005。
27. Shortland 2011。
28. Blattman 和 Annan 2011。
29. Collier 2007；Collier，Hoeffler 和 Rohner 2006；世界银行 2010。
30. Lemasle 2012。
31. 世界银行 2010；世界银行 2011b。
32. Dudwick 和 Srinivasan，待出版；世界银行 2010。
33. Dudwick 和 Srinivasan，待出版。
34. Lin 2011a。
35. 世界发展指标。
36. 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贫穷和不平等数据库。
37. 亚洲开发银行 2012。
38. 世界银行 2011b。
39. 根据普遍接受的智慧，随着收入的增加，在工业集中开始之前，工业结构的多样化就开始增加（Imbs 和 Wacziarg 2003）。这样，孟加拉国的工业化进程向单一的服装业转变有悖于常规。
40. Jedwab 2012。
41. 专门为《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进行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案例研究。
42. 专门为《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进行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案例研究。
43. Gibson 等 2005。
44. 专门为《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进行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案例研究。
45. Macintyre 2011。
46. 专门为《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进行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案例研究。
47. 专门为《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进行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案例研究。
48. McCrea 2009。
49. 专门为《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进行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案例研究。
50. Winters 和 Martins 2004。
51. Gibson 2006。
52. McKenzie，Martinez 和 Winters 2008；世界银行 2006a。
53. Bertram 2004。
54. 世界银行 2006a。
55. 世界银行 2006a。
56. 世界银行 2006a。
57. 《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银行移民数据库的计算值。
58. Gibson 和 McKenzie 2012。
59. Stillman，McKenzie 和 Gibson（2007）也发现了移民改善工人心理健康的证据。
60. 世界银行 2006a。对汤加的分析显示移民和高等教育之间存在微弱的联系。
61. 世界银行 2011a。
62.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fj.html。
63. Stefanova 2008。
64. 世界银行 2012c；Zafar 2011。
65. Frankel 2010；Roy 和 Subramanian 2001；Zafar 2011。
66. Gatti 等 2012
67. 专门为《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进行的突尼斯国家案例研究；Stampini 和 Verdier-Choucane 2011。
68. 青年高失业率的另一个社会影响是

其对家庭组建模式的影响及被称为失速转型的现象。尤其是在中东和北非的情景下，这包括婚姻的延迟（Wrigley 2010）。婚姻率随着结婚年龄的增加而降低（Dhillon 和 Yousef 2009）。充分就业被视为男性成为合格结婚对象的必要条件。

69. Bell 和 Blanchflower 2010；Giles，Newhouse 和 Witoelar 2010。

70. 国际劳工组织 2011a。

71. 世界银行 2006b；Wrigley 2010。

72. Binzel 2011；Gatti 等 2012；Matsumoto 和 Elder 2010。

73. 世界银行 2012a。

74. Stampini 和 Verdier-Choucane 2011。这些数据基于 2005 年和 2006 年劳动力调查所搜集的数据。

75. 根据 2010 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中东和北非国家，希望到公共领域工作的青年人口的比例在 40%到 70%之间波动。只有利比亚的比例要低出许多。

76. 世界银行 2012a。

77. 世界银行 2008b。

78. 一些人呼吁扩大该地区边缘化群体的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见 2009 中东青年倡议）

79. Boughzala 2004；世界银行 2004a。

80. 世界银行 2012a。

81. Gatti 等 2012。

82. 世界银行 2009。

83. Klapper 和 Love 2011。

84. Freund 等 2012。

85. Centeno 和 Portes 2006；Mezzadri 2010；Saavedra 和 Tommasi 2007。

86. Kanbur 2011。

87. Geertz 1968；North 1991；North 1994；Stiglitz 2000。

88. 有人认为由于贫穷人口在找工作时遇到限制因素，因此贫穷产生不规范性（Devicenti，Groisman 和 Poggi 2010）。

89. Perry 等 2007

90. 国际劳工组织 2011b。

91. Taymaz 2009。

92. Perry 等 2007。

93. Loayza 1996；Perry 等 2007。

94. 关于玻利维亚近期的证据，见 McKenzie 和 Seynabou（2010），同时见 de Mel，McKenzie 和 Woodruff（2008）。

95. Bosch 和 Maloney 2010；Maloney 1999。

96. Fajnzylber，Maloney 和 Montes-Rojas 2011。

97. 关于哥伦比亚，见 Bernal 2009；关于哥伦比亚，见 Mondragón-Vélez，Pena 和 Wills 2010；关于阿根廷，见世界银行 2008a。

98. Fields 2005；Perry 等 2007。Gunther 和 Launov（2012）使用科特迪瓦的数据提供了将这两部分规模分开的经济计量技巧。

99.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Petesch 2012。

100. Loayza 和 Rigolini 2011。

101. Djankov 和 Ramalho 2009；Heckman 和 Pagés 2000，2004；Kaplan 2009。关于发达国家方面更翔实的观点，见 Boeri 和 van Ours（2008）。

102. Freund 等 2012；Ulyssea 2010。

103. Fiszbein 等 2009。

104. Anton，Hernandez 和 Levy 2012；Perry 等 2007。

105. Fields 2005；Kanbur 2009。

106. Almeida 和 Carneiro 2009；Kan 和 Lin 2007；Kanbur 2009，2011；Scarpetta 和 Tressel 2004。

107. Chen 和 Doane 2008；Jütting 和 de Laiglesia 2009；Kanbur 2011。

108. 人口统计，包括迁出率，基于联合国人口数的估计。

109. Giles，Wang 和 Cai（2011）讨论了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可能促进延长工作年龄的措施。

110. Chawla，Betcherman 和 Banerji 2007。

111.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 2011。

112. Fiegerman 2011。

113. Boersch-Supran 2003。

114. Cai 等 2012。

115. 世界银行 2011c。

116. Cotlear 2011；Reinhardt 2003；Werding 和 McLennan 2011。

117. Schwarz 2009。

118. 关于综述，见 Lin 和 Monga（2011）及 Pack 和 Saggi（2006）。关于详细的讨论，见 Cimoli，Dosi 和 Stiglitz（2009）；Harrison 和 Rodríguez-Clare（2010）；Lin（2012）；Porter（1990）；Rodrik（2004）。

119. 世界银行 2004b。

120. Hayami 和 Ruttan 1985。

121. 农民不能自己生产杂交种子，因而杂交种子不是这样的，机械技术也不是这样的。

122. 经济学家 2010。

123. Levitt 和 Dubner 2009；Mallaby 2010；Romer 2010。

124. Otsuka 和 Larson，待出版。

125. Byerlee 1996；David 和 Otsuka 1994。

126. David 和 Otsuka 1994；Fan 和 Hazell 2001；Otsuka 和 Larson，待出版。

127. Aterido，Hallward-Driemeier 和 Pagés

2007，2009；Beck，Demirg–Kunt 和 Maksimovic 2005；Djankov，Freund 和 Pham 2010；Kaufmann 和 Kraay 2002；Klapper，Laeven 和 Rajan 2006；McKenzie 2010。

128.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Sawada 2012。

129. 例如，Aterido，Hallward–Driemeier 和 Pagés 2009；Beck，Demirgüç–Kunt 和 Maksimovic 2005；Djankov，Freund 和 Pham 2010；Haltiwanger，Scarpetta 和 Schweiger 2008；Klapper，Laeven 和 Rajan 2006；Micco 和 Pagés 2006；Rajan 和 Zingales 1998。

130. Aterido，Hallward–Driemeier 和 Pagés 2009；Hallward–Driemeier 2009。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2.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2: Confronting Rising Inequality in Asia.* Mandaluyong City, Philippines: ADB.

Akinci, Gokhan, and Thomas Farole. 2011.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rogress, Emerging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lamgir, Mohiuddin. 1978. *Bangladesh: A Case of Below Poverty Level Equilibrium Trap.* Dhaka: Banglades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Almeida, Rita, and Pedro Carneiro. 2009. "Enforcement of Labor Regulation and Firm Siz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7 (1): 28–46.

Altman, Miriam. 2011. *Employment Policy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Reg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gel-Urdinola, Diego, Stefanie Brodmann, and Anne Hilger. 2010. "Labor Markets in Tunisia: Recent Trend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Anton, Arturo, Fausto Hernandez, and Santiago Levy. 2012. *The End of Informality in Mexico? Fiscal Reform for Universal Social Insurance.*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Arndt, Channing, M. Azhar Hussain, E. Samuel Jones, Nhate Virgulino, Finn Tarp, and James Thurlow. 2012. "Explaining Poverty Evolution: The Case of Mozambiqu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4 (4): 854–72.

Aterido, Reyes, Mary Hallward-Driemeier, and Carmen Pagés. 2007. "Investment Climate and Employment Growth: The Impact of Access to Finance, Corruption, and Regulations across Firm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3138,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 2009. "Big Constraints to Small Firms' Growth?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mployment Growth across Firm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03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2011. "Does Expanding Health Insurance Beyond Formal-Sector Workers Encourage Informality?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Mexico's Seguro Popula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78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eck, Thorsten, Asli Demirgüç-Kunt, and Vojislav Maksimovic. 2005. "Financial and Legal Constraints to Firm Growth: Does Firm Size Matter?" *Journal of Finance* 40 (1): 137–77.

Bell, David N. F., and David Blanchflower. 2010. "Youth Unemployment: Déjà Vu?"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4705,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Bernal, Raquel. 2009. "The Informal Labor Market in Colombia: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Desarrolloy Sociedad* 63 (March): 145–208.

Bertram, Geoffrey. 2004. "On the Convergence of Small Island Economies with Their Metropolitan Patrons." *World Development* 32 (2): 343–65.

Binzel, Christine. 2011. "Decline in Social Mobility: Unfulfilled Aspirations among Egypt's Educated Youth."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6139,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Blacklock, Carolyn, and Tim Bulman. 2012. *PNG's Maturing Landowner Companies: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ing Group of PNG-Owned-and-Managed Jobs Generators.* Port Moresby: World Bank.

Blattman, Christopher, and Jeannie Annan. 2011. "Reintegrating and Employing High Risk Youth in Liberia: Lessons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of a Landmine Action Agricultural Training Program for Ex-Combatants." Yale University, 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 New Haven, CT.

Boeri, Tito, and Jan C. van Ours. 2008.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Labor Marke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ersch-Supran, Axel. 2003.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ing." *Review of Labour Economic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17: 5–44.

Bosch, Mariano, and William Maloney.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bor Market Dynamics Using Markov Processes: An Application to Informality." *Labour Economics* 17 (4): 621–32.

Botero, Juan C., Simeon Djankov,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s Shleifer. 2004. "The Regulation of Lab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 (4): 1339–82.

Boughzala, Mongi. 2004. "The Labor Market in Tunisia: Stud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Labor Markets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Policy and Training Systems." University of Tunis, Tunis. Processed.

Byerlee, Derek. 1996. "Modern Varieties, Productivity, and Sustainability: Recent Experience and Emerging Challenges." *World Development* 24 (4): 697–718.

Byrnes, Andrew, and Marsha A. Freeman. 2011. "The Impact of the CEDAW Conventions: Paths to Equality. A Study for the World Bank."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Cai, Fang, John Giles, Philip O'Keefe, and Dewen Wang. 2012. *The Elderly and Old Age Support in Rural Chin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alderon, Alor. 2012. "Employment Outcomes and Firms'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in Mexico. Analysis Based on Economic Census Microdatasets." El Colegio de Mexico, Mexico City. Processed.

Centeno, Miguel Angel, and Alejandro Portes. 2006.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the Shadow of the State." In *Out of the Shadows: Political Action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Latin America*, ed. Maria Patricia Fernandez-Kelly and Jon Shefner, 1–23.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hawla, Mukesh, Gordon Betcherman, and Arup Banerji, eds. 2007. *From Red to Gray: The "Third Transition" of Aging Population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hen, Martha, and Donna Doane. 2008. "Informality in South Asia: A Review." Background Paper,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Stockholm.

Christiaensen, Luc, and Lionel Demery. 2007. *Down to Earth: Agriculture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hristiaensen, Luc, Lionel Demery, and Jesper Kuhl. 2011. "The (Evolving) Role of Agriculture in Poverty Reduction—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 (2): 239–54.

Cimoli, Mario, Giovanni Dosi,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2009.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abilities Accumu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er, Paul. 2007. "Post-Conflict Recovery: How Should Policies Be Distinctive." Centre for the Studies of African Economies, Oxford University, Oxford. Processed.

Collier, Paul, Anke Hoeffler, and Dominic Rohner. 2006. "Beyond Greed and Grievance: Feasibility and Civil War." Working Paper 2006-10,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Oxford University, Oxford.

Conning, Jonathan, and Christopher Udry. 2007. "Rural Financial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armers, Farm Production and Farm Markets,* Vol. 3 of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ed. Robert Evenson and Prabhu Pingali, 2857–910. Amsterdam: Elsevier.

Cotlear, Daniel, ed. 2011. *Population Aging: Is Latin America Read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ramer, Christopher. 2010. "Unemploy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Violenc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1.

David, Christina C., and Keijiro Otsuka, eds. 1994. *Modern Rice Technolog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sia.*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de Mel, Suresh, David J. McKenzie, and Christopher Woodruff. 2008. "Returns to Capital in Micro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 (4): 1329–72.

Devicienti, Francesco, Fernando Groisman, and Ambra Poggi. 2010. "Are Informality and Poverty Dynamically Interrelated?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In *Studies in Applied Welfare Analysis: Papers from the Third ECINEQ Meeting*, ed. John A. Bishop, 79–106.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De Vreyer, Philippe, and François Roubaud, eds. Forthcoming. *Urban Labour Markets in Sub-Saharan Africa.* Montepellier, Franc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hillon, Navtej, and Tarik Yousef. 2009. *Generation in Waiting: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Young People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Dinh, Hinh T., Vincent Palmade, Vandana Chandra, and Frances Cossar. 2012. *Light Manufacturing in Africa: Targeted Policies to Enhance Private Investment and Create Job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d L'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Djankov, Simeon, Caroline Freund, and Cong S. Pham. 2010. "Trading on Tim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2 (1): 166–73.

Djankov, Simeon, and Rita Ramalho. 2009. "Employment Law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7 (1): 3–13.

Dudwick, Nora, and Radhika Srinivasan, with Jose Cueva and Dorsati Mandavi. Forthcoming. *Creating Jobs in Africa's Fragile States: Are Value Chains an Answer?* Directions in Development Ser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Faaland, Just, and John Richard Parkinson. 1976. *Bangladesh: The Test Case for Development.* London: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Fajnzybler, Pablo, William Maloney, and Gabriel V. Montes-Rojas. 2011. "Does Formality Improve Micro-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Brazilian SIMPLES Progr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4: 262–76.

Fan, Shenggen, and Peter Hazell. 2001. "Returns to Public Investments in the Less-Favored Areas of India and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3 (5): 1217–22.

Fiegerman, Seth. 2011. "Our New Jobs Problem: Aging Americans." *MainStreet,* August 17.

Fields, Gary. 2005. "A Guide to Multisector Labor Market Model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50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Finegan, T. Aldrich, and Robert A. Margo. 1994. "Added and Discouraged Workers in the Late 1930s: A Re-examin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 (March): 64–84.

Fiszbein, Ariel, Norbert Schady, Francisco H. G. Ferreira, Margaret Grosh, Nial Kelleher, Pedro Olinto, and Emmanuel Skoufias. 2009.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Reducing Present and Future Pover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Fox, Louise, Elena Bardasi, and Katleen Van den Broeck. 2005. "Poverty in Mozambique: Unraveling Changes and Determinants." Africa Reg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8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Fox, Louise, and Melissa Sekkel Gaal. 2008. *Working Out of Poverty: Job Cre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Growth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Frankel, Jeffrey. 2010. "Mauritius: African Success Story." Working Paper Series 1656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Freund, Caroline, Antonio Nucifora, Bob Rijkers, Hassen Arouri, and Rim Chabbeh. 2012. "Job Creation: A Big Role for Big Firms? Evidence from Tunisi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Gatti, Roberta, Diego Angel-Urdinola, Joana Silva, and Andras Bodor. 2012. *Striving for Better Jobs: The Challenge of Informalit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eertz, Clifford. 1968. *Peddlers and Prince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wo Indonesian Tow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ibson, John. 2006. "Are the Pacific Islands Economies Growth Failures?" Working Paper 3, Pasifika Interactions Project, Hamilton, New Zealand.

Gibson, John, Gaurav Datt, Allen Bryant, Vicky Hwang, R. Michael Bourke, and Dilip Parajuli. 2005. "Mapping Poverty in Rural Papua New Guinea." *Pacific Economic Bulletin* 20 (1): 27–43.

Gibson, John, and David McKenzie. 2012.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Brain Drain' of the Best and Brightest: Microeconomic Evidence from Five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122 (560): 339–75.

Giles, John, David Newhouse, and Firman Witoelar. 2010. "Stuck for Life?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Initial Informality in Indone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Cape Town, May 3.

Giles, John, Dewen Wang, and Wei Cai. 2011. "The Labor Supply and Retirement Behavior of China's Older Workers and Elderl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83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Gonzalez de la Rocha, Mercedes. 2012. "Trabajo, Modos de Subsistencia y Vida Social en Mexico." CIESAS Guadalajara, Guadalajara. Processed.

Guarcello, Lorenzo, Furio C. Rosati, and Scott Lyon. 2011. "Labour Market in South Sudan."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Work, Rome.

Gunther, Isabel, and Andrey Launov. 2012. "Informal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pportunity or Last Resor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7 (1): 88–98.

Hallward-Driemeier, Mary. 2009. "Who Survives?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Competi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across Firm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08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allward-Driemeier, Mary, and Reyes Aterido. 2009. "Comparing Apples with . . . Apples: How to Make (More) Sense of Subjective Rankings of Constraints to Busines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05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altiwanger, John, Stefano Scarpetta, and Helena Schweiger. 2008. "Assessing Job Flows across Countries: The Role of Industry, Firm Size, and Regulations." Working Paper Series 1392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Harrison, Ann, and Andres Rodriguez-Clare. 2010.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Polic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 of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 Dani Rodrik and Mark Rosenzweig, 4039–214. Amsterdam: Elsevier.

Hausmann, Ricardo, César Hidalgo, Sebastián Bustos, Michele Coscia, Sarah Chung, Juan Jimenez, Alexander Simoes, and Muhammend A. Yildirim. 2011.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Mapping Paths to Prosper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Hayami, Yujiro, and Vernon W. Ruttan. 1985.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eckman, James J., and Carmen Pagés. 2000. "The Cost of Job Security Regulation: Evidence from the Latin American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 (1): 109–54.

———. 2004. "Introduction." In *Law and Employment: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d. James J. Heckman and Carmen Pagés, 1–108.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DMC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and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2011. *Internal Displacement: Global Overview of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2010*. Geneva: IDMC.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1a.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Geneva: ILO.

———. 2011b. *Statistical Update on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Geneva: ILO.

Imbs, Jean, and Romain Wacziarg. 2003. "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 (1): 63–86.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9. *Total Returns to South Sudan*. Geneva: IOM.

Iyer, Lakshmi, and Indhira Santos. 2012. "Creating Jobs in South Asia's Conflict Zon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610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Jedwab, Remi. 2012. "Why is African Urbanization Different? Evidence from Resource Exports in Ghana and the Ivory Coas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 Seminar, Washington, DC, February 6.

Jones, Nicola, Rebecca Holmes, Hannah Marsden, Shreya Mitra, and David Walker. 2009. "Gender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Asia: What Does the Crisis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wide Regional High-Level Meeting, Hanoi, September 29–30.

Jütting, Johannes P., and Juan R. de Laiglesia, eds. 2009. *Is Informal Normal? Towards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is: OECD Publishing.

Kan, Kamhon, and Yen-Ling Lin. 2007. "The Effect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on Labor Turnover: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aiwan." *Economic Inquiry* 49 (2): 398–433.

Kanbur, Ravi. 2009. "Conceptualizing Informality: Regulation and Enforcement." *India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 52 (1): 33–42.

———. 2011. "Avoiding Informality Traps." Working Paper Series 06, Charles H. Dyson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thaca, NY.

Kaplan, David Scott. 2009. "Job Creation and Labor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7 (1): 91–105.

Kaplan, David Scott, Joyce Sadka, and Jorge Luis Silva-Mendez. 2008. "Litigation and Settlement: New Evidence from Labor Courts in Mexico."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5 (2): 309–50.

Kaufmann, Daniel, and Aart Kraay. 2002. "Governance Indicators, Aid Allocation, and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Kingombe, Christian, and Dirk Willem te Velde. 2012.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Creation: The Role of Growth Facilitation Polic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Klapper, Leora, Luc Laeven, and Raghuram Rajan. 2006. "Entry Regulation as a Barrier to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2 (3): 591–629.

Klapper, Leora F., and Inessa Love. 2011. "The Impa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Reforms on New Firm Registrat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Komarov, Vladyslav. 2011. *Housing Market and Labor Mobility*. Kiev: Bureau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echnologies.

Lemasle, Natacha. 2012. *From Conflict to Resilience: Ex-Combatants Trade Associations in Post-Conflict: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Republic of Congo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Levitt, Steven, and Stephen Dubner. 2009. "Can 'Charter Cities' Change the World? A Q&A with Paul Romer." *Freakonomics*, September 29. http://www.freakonomics.com/2009/09/29/can-charter-cities-change-the-world-a-qa-with-paul-romer.

Levy, Santiago. 2008. *Good Intentions, Bad Outcomes, Social Policy, Inform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exico*.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Lin, Justin Yifu. 200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1a. "From Flying Geese to Leading Dragons: New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70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2011b. "How to Seize the 85 Million Jobs Bonanza." World Bank (blog), Washington, DC. http://blogs.worldbank.org/developmenttalk/node/646.

———. 2012.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Lin, Justin Yifu, and Célestin Monga. 2011. "DPR Debate: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al Chang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9 (3): 259–310.

Lipton, Richard. 2005. "The Family Farm in a Globalizing World: The Role of Crop Science in Alleviating Poverty." Discussion Paper 40,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Loayza, Norman. 1996. "The Economics of the Informal Sector: A Simple Model and Some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45: 129–62.

Loayza, Norman, and Jamele Rigolini. 2011. "Informal Employment: Safety Net or Growth Engine?" *World Development* 39 (9): 1503–15.

Macintyre, Martha. 2011. "Modernity, Gender and Mining: Experiences from Papua New Guinea." In *Gendering the Field: Towards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r Mining Communities*, ed. Kuntala Lahiri-Dutt, 21–32.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Mallaby, Sebastian. 2010. "The Politically Incorrect Guide to Ending Poverty." *The Atlantic*, July/August.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0/07/the-politically-incorrect-guide-to-ending-poverty/8134.

Maloney, William F. 1999. "Does Informality Imply Segmentation in Urban Labor Markets? Evidence from Sectoral Transitions in Mexico."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3 (2): 275–302.

Martinez, Gabriel, and Nelly Aguilera. 2012. *The Human Capital Perspective on Employment Policy*. San José, Costa Rica: Inter-American Conference on Social Security.

Matsumoto, Makiko, and Sara Elder. 2010. "Characterizing the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of Young Men and Women: Evidence from the ILO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Surveys." Employment Working Paper 5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eneva.

McCormick, Dorothy. 1999. "African Enterprise Clusters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ory and Reality." *World Development* 27 (9): 1531–51.

McCrea, Peter. 2009. "Oil Palm Sector, Situation and Perception Assessment." Report for the World Bank and the Oil Palm Industry Corporation, Port Moresby, Papua New Guinea. Processed.

McKenzie, David. 2010. *Impact Assessment in Finance and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What Should We Lear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cKenzie, David, Pilar Garcia Martinez, and L. Alan Winters. 2008. *Who Is Coming from Vanuatu to New Zealand under the New Recognized Seasonal Employer (RSE) Program?* Waikato, New Zealand: University of Waikato.

McKenzie, David, and Sakho Seynabou. 2010. "Does It Pay Firms to Register for Taxes? The Impact of Formality on Firm Profitabil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1 (1): 15–24.

Menon, Nidhiya, and Yana van der Meulen Rodgers. 2010. "War and Women's Work: Evidence from the Conflict in Nepal." Working Paper Series 19,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Brandeis University, Waltham, MA.

Mercer. 2011. *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Survey 2011—City Ranking*. London: Mercer.

Mezzadri, Alessandra. 2010. "Globalisation, Informalisation and the State in the Indian Garment Indust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 (3): 491–511.

Micco, Alejandro, and Carmen Pagés. 2006.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Industry-Level Dat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433,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Middle East Youth Initiative. 2009. *Missed by the Boom, Hurt by the Bust: Making Markets Work for Young People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Dubai: Dubai School of Government.

Mondragón-Vélez, Camilo, Ximena Peña, and Daniel Wills. 2010. "Labor Market Rigidities and Informality in Colombia." Documentos CEDE 006717,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Bogotá.

Morris, Michael, Valerie A. Kelly, Ron J. Kopicki, and Derek Byerlee. 2007. *Fertilizer Use in African Agriculture: Lessons Learned and Good Practice Guidelin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ottaleb, Khondoker A., and Tetsushi Sonobe. 2011. "An Inquiry into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Garment Industry in Banglades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60 (1): 67–89.

Narayan, Deepa, and Patti Petesch. 2010. *Moving Out of Poverty: Rising from the Ashes of Conflict*. Washington, DC: Palgrave Macmillan and World Bank.

Noland, Marcus, and Howard Pack, eds. 2003. Industrial Policy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Asia.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North, Douglass C. 1991.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1): 97–112.

———. 1994.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3): 359–68.

Nuebler, Irmgard. 2011.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Capabilities for Catching Up: Frameworks and Paradigms." Employ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77,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eneva.

Otsuka, Keijiro, and Donald F. Larson, eds. Forthcoming. *An African Green Revolution: Finding Ways to Boost Productivity on Small Farms*. Amsterdam: Springer.

Pack, Howard, and Kamal Saggi. 2006. "The Case for Industrial Policy: A Critical Survey."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83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erry, Guillermo E., William F. Maloney, Omar S. Arias, Pablo Fajnzylber, Andrew D. Mason, and Jaime Saavedra-Chanduvi. 2007. *Informality: Exit and Exclus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etesch, Patti. 2011. *Women's Empowerment Arising from Violent Conflict and Recovery*.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2012. "The Exponential Clash of Conflict, Good Jobs, and Changing Gender Norms in Four Economi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Piore, Michael, and Andrew Schrank. 2007. "Norms, Regulations and Labour Standards in Central America." *CEPAL–Serie Estudios y Perspectivas* 77: 1–64.

———. 2008. "Toward Managed Flexibility: The Revival of Labour Market Inspection in the Latin World."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7 (1): 1–23.

Pires, Roberto Rocha. 2011. "Governing Regulatory Discretion: Innov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Two Models of Labour Inspection Work." In *Regulating for Decent Work: New Directions in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 ed. Sangheon Lee and Deirdre McCann, 313–38.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Pollin, Robert. 2009.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Keny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 Amherst. Processed.

Porter, Michael E.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Rajan, Raghuram, and Luigi Zingales. 1998.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3): 559–86.

Reinhardt, Uwe. 2003. "Does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Really Drive Up Demand for Health Care?" *Health Affairs* 22: 27–39.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Disarmament, Demobilisation and Reintegration Commission. 2012.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Disarmament, Demobilisation and Reintegration Commission*. Juba: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Rodrik, Dani. 2004. "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4767,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 2007.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mer, Paul. 2010. *Technologies, Rules, and Progress: The Case for Charter Citi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Roy, Devesh, and Arvind Subramanian. 2001. "Who Can Explain the Mauritian Miracle: Meade, Romer, Sachs, or Rodrik?" Working Paper Series 01/11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Saavedra, Jaime, and Mariano Tommasi. 2007. "Informality, the State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in Latin America: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6 (3–4): 279–309.

Sawada, Naotaka. 2012. "Providing Business Services for Rural Income Generations: Using the Rural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 Dat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Scarpetta, Stefano, and Thierry Tressel. 2004. "Boosting Productivity via Innovation and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y Role for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27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chwarz, Anita M. 2009. "Pensions in Crisis: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Regional Policy Not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chweitzer, Mary M. 1980. "World War II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 89–95.

Shortland, Anja. 2011. "'Robin Hook': The Developmental Effects of Somali Piracy."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155, 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Berlin.

Sonobe, Tetsushi, and Keijiro Otsuka. 2006. *Cluster-Bas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 East Asian Mode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011. *Cluster-Bas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Stampini, Marco, and Audrey Verdier-Choucane. 2011. "Labor Market Dynamics in Tunisia: The Issue of Youth Unemploymen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611,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Stefanova, Milena. 2008. *The Price of Tourism: Land Alienation in Vanuatu*.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tiglitz, Joseph E. 2000.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Social Capital: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ed. Partha Dasgupta and Ismael Serageldin, 59–6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tillman, Steven, David McKenzie, and John Gibson. 2007. "Mig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vidence from a Nature Experimen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13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Taymaz, Erol. 2009. "Informality and Productivity: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s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Firms in Turkey."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09/01,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Ankara.

The Economist. 2010. "Brazilian Agriculture: The Miracle of the Cerrado." *The Economist*, August 26.

Ulyssea, Gabriel. 2010. "Regulation of Entry,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1: 87–99.

UNHCR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011. *UNHCR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0*. 10th ed. Geneva: UNHCR.

Venn, Danielle. 2009. "Legislatio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Enforcement."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89,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Villarreal, Hector J. 2012. *El Cambio Demográfico y las Finanzas Públicas de Mexico*. Mexico, D.F.: Centre de Investigación Económica y Presupuestaria.

Villarreal, Hector J., and Eduardo Rodriguez-Oreggia. 2012. "Precarious Labor Markets and the Evolution of Poverty: The Mexican Experience." Instituto Tecnológico de Monterrey, Monterrey, Mexico. Processed.

Werding, Martin, and Stuart McLennan. 2011. "International Portability of Health-Cost Coverage: Concepts and Experience."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11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World Bank. 2011. *World Report on Disability*. Washington, DC: WHO and World Bank.

Winters, Alan, and Pedro Martins. 2004. "When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Not Enough: Business Costs in Small Remote Economies." *World Trade Review* 3 (3): 347–83.

World Bank. 2004a. *Republic of Tunisia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Making Deeper Trade Integration Work for Growth and Job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4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A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for Every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Afghanistan: Poverty, Vulnerability and Social Protection: An Initial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6a. *At Home and Away: Expanding Job Opportunities for Pacific Islanders through Labour Mobil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6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7: Development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8a. *Argentina Labor Market Study: Informal Employment in Argentina: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8b. *The Road Not Travelled: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9. *From Privilege to Competition: Unlocking Private-Led Growth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a. *Defining Gender in the 21st Century: Talking with Women and Men around the World, A Multi-Country Qualitative Study of Gender and Economic Choi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b.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South As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c.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2a. *Bread, Freedom, and Dignity: Job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2b.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2c. "Ten Things You Didn't Know About Mauritiu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Wrigley, Patrick. 2010. "Youth 'Bulg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isk or Asset?" MENA Knowledge and Learning Fast Brief Series 7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Zafar, Ali. 2011. "Mauritius: An Economic Success Story." In *Yes Africa Can: Success Stories from a Dynamic Continent*, ed. Punam Chuhan-Pole and Manka Angwafo, 91–10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第 7 章 7

互相联系的就业议程

人口的流动带来机会的跨疆域匹配。全球化不仅带来在制造业领域就业的国际移民的持续增加，而且带来在服务业领域就业的国际移民的持续增加。

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就业挑战，但是他们的就业议程却经由人口流动和工作流动这两种力量互相联系。这两种流动对输出国和输入国的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具有影响。移民的到来或工作外包到国外对移民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具有影响。可雇用的外国工人、引入储蓄和观念的移民网络的发展和带来更多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的带来，所有这些都必将提高生产率。但是家庭结构和社区生活都受到人口和工作流动的影响。潜在的收益相当可观，但是也存在平衡。

即使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成功应对了就业挑战，国内外就业机会的错配也一定会发生，这鼓励人们离开自己的社区，到别的地方寻找机遇。考虑到在未来几十年内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劳动力迅速增长的预期，人口的国际移民将成为这些区域几乎不可避免的政策杠杆之一。移民趋势的推动力量将不仅仅包括人口压力，还包括文化地理的相近性及经济因素。

就业议程也通过国际就业移民联系在一起。生产任务的分散性促进了生产的非地方性和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包，提高了贸易量，并降低了制成品的价格。但是这也导致了制造业就业的全球性再分配，服务业中的相同趋势也日益明显。迄今为止，工业国家的就业机会外流所影响的主要是蓝领工人，但是白领工人也紧随其后受到影响。这些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行动。亚洲持续增加的劳动力成本可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动工业化带来了机会。

工人的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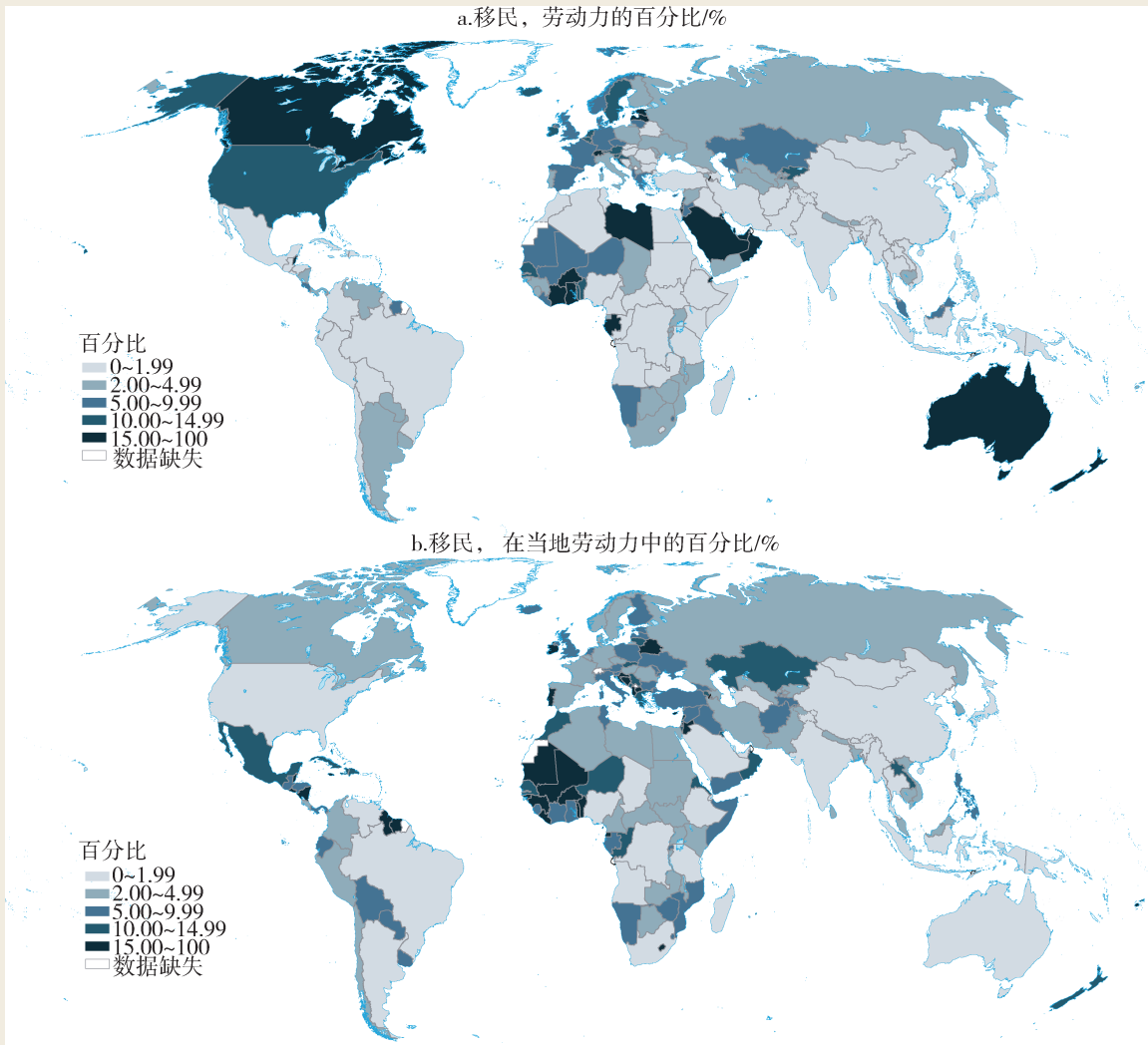
关于全球国际移民数量的精确数字并不存在，这并不奇怪，因为一些移民非法穿越国界，或者在签证与许可到期后并不返回。这也正是估测值倾向于依赖人口调查和家庭调查的原因所在。即使这样，国家间收集数据方式的不同及立法对国籍和移民地位

的界定的不同也使人们难以精确统计移民数量。[1] 然而，关于移民的个数量级却相对没有争议。世界上的移民数量超过 2 亿，其中 90%是工人。移民占世界人口的 2.5%，占全球劳动力的 3%。[2] 许多移民是临时的或季节性的工人，会回到自己的母国。

全球移民模式

全球数字掩盖了国家间的重大差异。一些国家主要是移民接收国，一些国家是移出国，还有一些国家既不是移民接收国也不输出大量的移民（见地图 7.1）。在少数相对较小的移民接收国中，外国出生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了 40%。以色列、约旦、科威特、卡塔尔和新加坡属于这样的国家。在较大的移民接收国中，移民在人口中比例最大的国家有沙特阿拉伯（27.8%）、加拿大（21.3%）、澳大

地图 7.1　只有一些国家的移民在人口中的比例较大



本地图由世界银行地图设计室制作。本地图的疆界、颜色、名称和其他任何信息并不表示世界银行集团对任何地区法律地位的看法，也不意味着这些疆界的认可或接受。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 Ozden 等 2011 和 Artuc 等 2012 的估算值，使用 2000 年左右人口统计的数据。

利亚（21.0%）和美国（13.5%）。就绝对数字而言，美国是最大的移民接收国，移民数量达到 4 280 万，俄罗斯联邦（1 230 万）和德国（1 080 万）紧随其后。在移民输出国中，移民数量最大的国家是墨西哥（1 010 万）、印度（910 万）和孟加拉国（600 万）。[3] 俄罗斯的数字如此之高是因为许多俄罗斯人居住在原先属于苏联的国家中。

在 20 世纪上半叶，政治混乱和全球化加速了移民的流动。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活动导致大量人口离开出生地到其他国家生活。交通成本的降低，波斯湾经济随着油价上涨的增长及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市场，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工人移民在世界范围内的高涨。

原籍国和移民目的国预期收入的差异是人们移民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收入收益在不同程度上被移民的直接成本（比如交通费用和中介服务）及与适应不同文化和社会及离开家庭和朋友相关的间接成本抵消了。这些成本也有助于解释移民流量。对许多移民而言，物质和文化的相似性（包括共同的语言、宗教或生活方式）是选择移民目的国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对自己在输出国就业机会和个人安全的考虑是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其他移民动力。超过 1 000 万的移民是难民，将近 200 万是寻求避难者。[4]

2005 年至 2008 年期间，移民工人全球数量的增长率达到顶峰，随后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减速。在此前的几十年中，移民流动的增长主要来自南北流动，也就是说，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南南移民，尽管在数字上比较大，在这一时期保持稳定。[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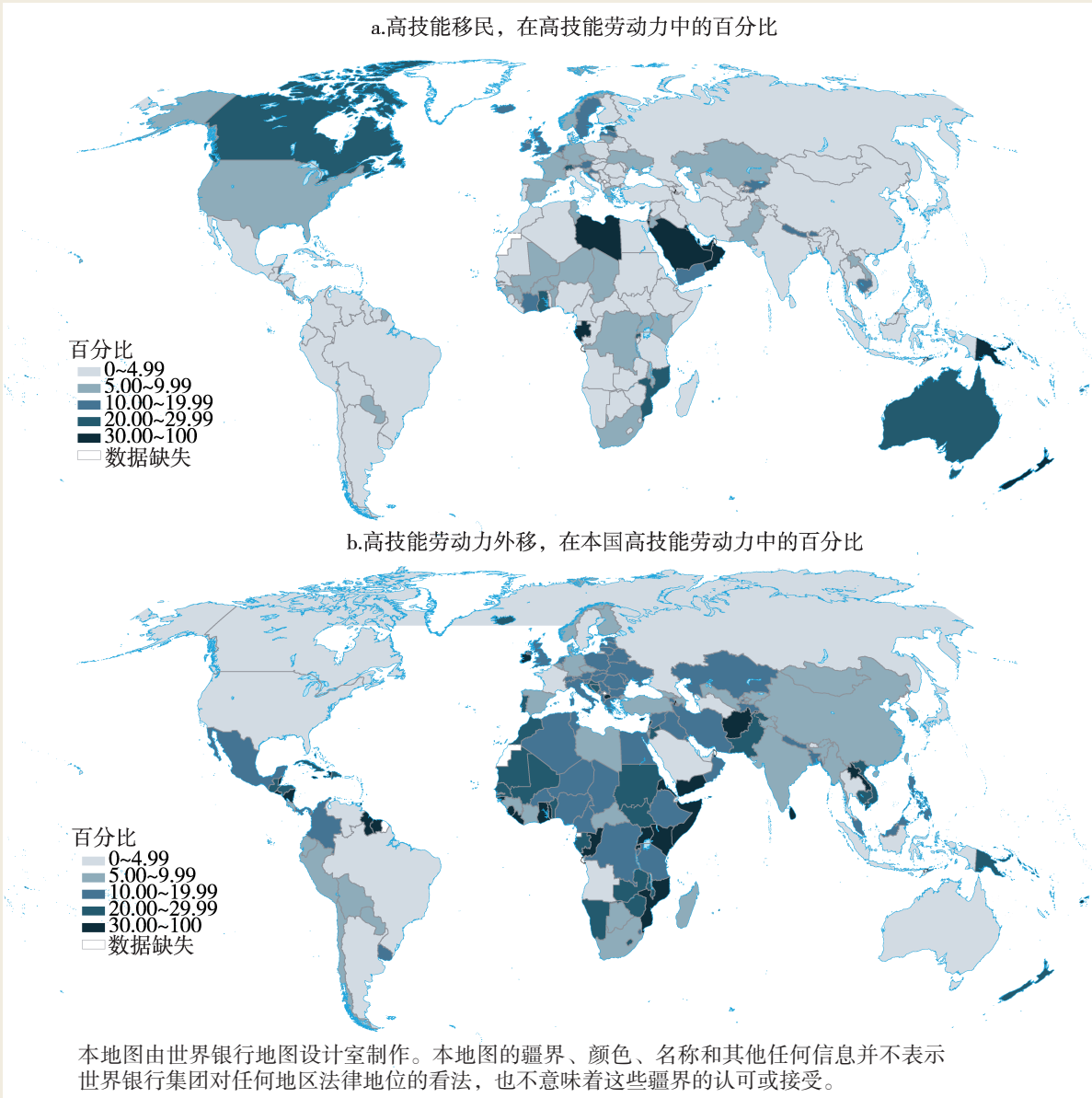
技能熟练工人在国际移民中的比例日益增长。发达国家不断实行采取吸引人才的政策。1990 年至 2000 年期间，移民中至少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工人的比例，在英国从 15%增加至 25%，在美国从 25%增加至 30%。国家的巨大差别也体现在技能熟练工人的移民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明确提倡技能熟练工人的移民，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抱怨“人才流失”。海地、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70%以上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公民生活在国外，非洲国家技能熟练工人在移民中的比例尤其高（见地图 7.2）。[6]

高技能工人归入包括技术创造者、商界开拓者、科学家、学者、学生、保健工人和文化工人等一系列不同的范畴。10%的比例在总移民中仍然相对较小，但是他们中的 90%生活在工业国家。[7] 技能熟练移民在某些行业的集中度很高，美国 27%的医生、澳大利亚 21%的医生和加拿大 20%的医生都是外国培训的。[8]

对输出国和接收国的影响

国际移民最直接的影响是对生活水平的影响。通过他们在接收国的工作和汇回输出国的汇款，移民增加了自己和自己家庭的收入。如果移民在国外的生产率高于在国内的生产率，移民也为全球产出做出了贡献，而这可能常常是事实。他们甚至能给输出国的产出做出贡献，当移民网络和返归者成为投资、创新和技能的渠道时就会这样。然而社会效应却是参差不一。就积极的一面而言，移民以必定会开阔他们眼界的方式将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联系起来。就消极的一面而言，与家庭和朋友的分离可能成为在接收国痛苦和孤独的源头。如果外国人被视为就业和公共服务的争夺者，移民数量巨大

地图 7.2　许多移民具有高技能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Ozden 等 2011 和 Artun 等 2012 得出的。
注释：高技能移民是那些至少具有某种高等学历的人。

也可能加剧接收国弱势群体的挫败感。

每年每工人因移民而增加的收入可能高达数万元。在对工人的特征进行对照后，收益可能在接收国和输出国人均收入差异的 50%和两倍多之间浮动。[9, 10] 然而，交通成本和中介机构收取的租金可能减少这种收益。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中介机构是与贩卖人口和犯罪虐待有关的非法组织的组成部分，从而使移民成为尤其容易遭遇伤害的群体。还有一些情况，中介机构是不规范的代理人，提供市场价格的移民服务，却缺少应对移民需求和供给的规范机制。[11] 移民也面临着心理和身体健康方面的风险，常常得不到健康保险。[12] 尽管如此，移民的

持续流入意味着巨大的收益，无论是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超过了所需弥补的成本。

关于移民对输出国劳动成果的影响的证据是零散的。如果移民的就业机会有限，收入和就业将保持不变。如果就业机会很多，收入增加，此前赋闲者的参与也将上升。对墨西哥、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研究显示，移民外移的确对输出国的工资和失业率产生了影响，但是孟加拉国、印度和斯里兰卡没有发现对劳动成果的明显影响。[13]

移民流动对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的净影响取决于那些移民国外的人的技能和工作。近期一项使用中高收入经济体的研究显示，高技能工人移民对地方的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的工资都具有积极影响。另外，更多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外移与留守原籍国的低技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均下降相关。[14]

汇款是输出国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尽管汇款未必会到达贫穷人口中的最贫穷者。在不同的国家里，国际汇款的增加与生活在贫穷中的人口比例的降低相关。[15] 汇款也增加了接受汇款的家庭的储蓄和投资。[16] 而且他们的弹性比人们一般认为的还大。近期研究显示，尽管在 2009 年的经济衰退中移民的状况比较艰难，但是汇款只降低了一点点儿。[17] 汇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一些研究显示，移民来自中等收入（或财富）家庭，因此在短期上，汇款对总体上的不平等没有影响。其他研究显示，从中期来看不平等降低，这是因为地方与移民之间的经济活动增多了。[18] 大多数研究也认为汇款降低了移民亲属的劳动力参与。[19]

高技能工人移民趋势的持续增长提高了人们对这种趋势对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的顾虑。一些人担心人才流失，移民将使发展中国家受到宝贵人力资源损失的困扰。[20] 根据这一观点，发展中国家划拨了相当可观的财政资源用于对这些工人的教育，意图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形成优秀的创新者、思想家和管理者。这样，技能熟练工人的移民不仅在短期内造成了财政和分配的担忧，还损害了国家长期的增长能力。根据这种观点，发展中国家应给技能熟练工人创造回归祖国的激励因素，例如通过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财政改革来激励他们回国。

然而其他国家经历了“人才引进”，借此，发展中国家从网络关系、返归的移民及促使青年人口提高自身技能的因素中受益。返归的移民带回了企业家能力和技术能力，提高了输出国的生产率。几个国家已经发现，在国外获得的经验提高了领薪水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企业家的生产效率。[21] 除了个人利益，还有社会利益，这可能延伸为整个行业的扩张和整个地区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印度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阐释了这一点：返归的移民设立了信息技术通讯公司，从而利用了他们此前的经验以及他们与国际公司的联系。[22] 美国公司高资格的印度工程师和经理层的出现为印度软件工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23] 移民关系网络的活动不局限于技能熟练移民或公司活动。在美国的墨西哥低技能工人网络关系与墨西哥政府同心协力，改变了他们原籍国的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方向，提高了投资力度。[24]

移民网络关系也可能是外商直接投资和管理知识的重要来源，这两者均会促进输出国的生产率增长。据估计，中国一半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来

自中国移民。[25] 在较小的国家中，由于缺少发展新兴有活力经济的规模，返归移民对社区的影响可能更小。[26]

通过对输出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人才移民的增加也可能带来人才引入。移民愿景提高了教育的回报率，从而促进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然而，这类积极影响取决于技能移民的规模和国家的相对规模。近期证据显示，高技能人才外迁率不高的大国获得了人力资本的净收益。相比之下，高技能人才外迁率很高的小国则经历了净损失。[27]

社会影响更是多种多样。在输出国，研究人员发现了性别和家庭关系及政治态度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性质取决于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女性和儿童因配偶和父母的移民而被赋权，在另一些情况下，女性和儿童的脆弱性增强了。[28] 那些移往重视自由和民主的社会里的移民开始认可这些价值，而那些移往更传统的接收国的移民则可能变得更加传统保守。[29]

在东道国，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移民对地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及移民流入的财政影响上。这些研究中的绝大部分或者没有发现对地方平均劳动收入的负面影响，或者发现对地方平均劳动收入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地方和移民之间的就业结构发生了转变，带来了赢家和输家。[30] 对东道国的财政影响取决于移民的特征。移民越年轻，技能越熟练，税收收入也就越高。对东道国政府支出的影响因移民的持续时间和家庭的组成而异。对移民接收国福利体制的净影响的计算受到假设和估测方法的影响。[31]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移民也可能带来种族偏见，加剧东道国的社会紧张局势。当移民被隔离在孤立的行业或社区之中，阻碍他们（她们）真正融入社会中时，就会发生这种问题。[32] 当移民被视为争夺“非移民”工作时，也可能会发生这种问题。偏见和紧张局势可能造成对移民的不信任，导致进入东道国法律要求的僵硬化，强制遣返甚至建设阻碍移民的有形壁垒。除非采纳了更全面的方法，这些政策可能不能缓和紧张局势。非法移民或无证明文件移民在持续增加，这部分是由于输出国和接收国就业机会失配的持续增加而又缺少替代性的合法移民方法造成的。[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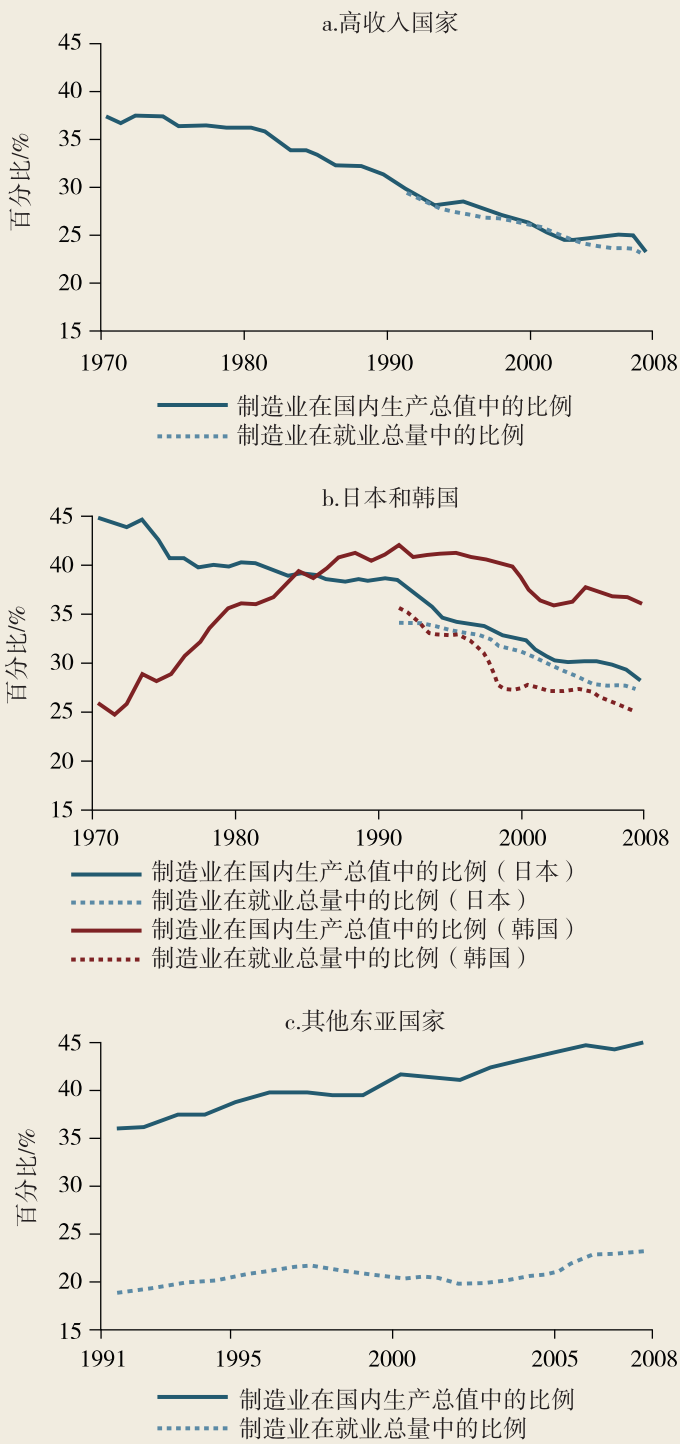
工作的流动

量化国家工作流动甚至比估测全球国际移民的数量还要难。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制造业任务从工业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向东亚国家的非本地化和外包活动很突出。近期在服务业领域的任务出现了同样的模式。事实上，服务业出口是全球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源自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出口一直稳步增长。但是计算这对全球就业的影响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一过程既包括在某些国家的就业破坏也包括在其他国家的就业创造，而且这种就业破坏和创造是以一种不容易互相匹配的方式发生的。

全球趋势

1970 年至 2008 年期间，工业国家制造业就业在就业总量中的比例大约降低了 1/3，正如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的比例一样（见图 7.1）。[34] 尽管起点很高，日本的模式和欧洲及北美一样。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韩国实现了工业化，但是 1992 年，制造业在其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开始下降。同时，包括

图 7.1 制造业工作已经流出了高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库和联合国统计署的估测值。
注释：a 组不包括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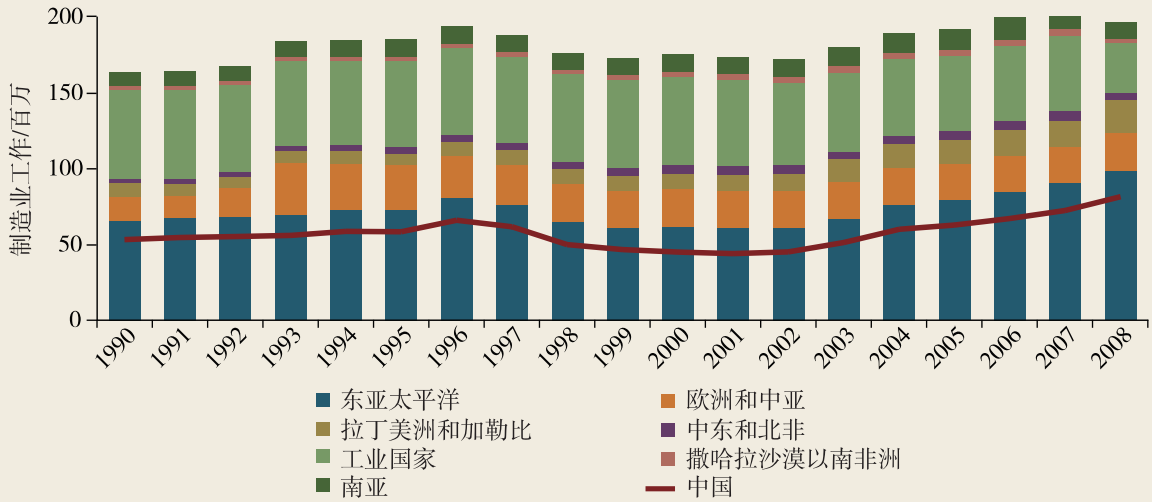
中国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比例稳步上升了四十年。在南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中，这一比例不高，而且处于停滞状态，拉丁美洲的这一比例降低了，东欧和中亚国家的这一比例上升了。总体的模式是制造业工作首先从西欧和美国流向东北亚，然后再流向东亚的其他地区。

东亚国家趋势与发展的“雁行”模式契合一致，经济转型与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相契合。东亚国家的工业化肇始于劳动密集型领域的发展，并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领域，然后再转向知识密集型活动。同时，工资和技能提高了。[35] 首先是日本，接着是韩国，更近期的是中国，都遵循了相似的模式。随着劳动成本的进一步增加，轻工业制造业工作可能流出中国沿海地区，该地区集中了中国的大部分工业。根据估测，将近 1 亿个工作面临这种状况。[36]

轻工业制造业工作迁出中国沿海地区可能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发动工业化带来一代人只有一次的机会。但是有些观察家预言，工作流动将主要流向工资率低于沿海地区的中国内陆地区。这将是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美国的工业化模式一致的模式，紧随最初的工业地理集中之后是在同一国家内部的扩散。[37] 然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相对较强，已经到了即使农村地区的不熟练工人的工资率都在快速增长的地步。[38] 因此，中国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例下降的趋势可能不可避免，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机遇。[39]

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正在造成世界范围内制造业工作数量的停滞甚

图 7.2　全球制造业工作的数量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际劳工组织 2010；工业统计数据库：INDSTAT2—2011 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维也纳，和世界发展指标。

至下降（见图 7.2）。1990 年至 2008 年期间，全球制造业就业仅增长了 30%，大部分增加发生在亚洲，尤其是中国。鉴于和其他工作相比，制造业工作与出口市场和全球价值链的联系更为密切，从而更可能产生生产率的外部效应，这种停滞或降低提高了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可能性（见问题 7）。如果制造业工作的总量一定保持相对稳定，某一区域成功的工业化可能是以其他地区的工业就业为代价的。

如果技术和管理知识传播到南亚或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那里的制造业就可以成功发展。然而这样的传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培育企业家能力、培养一支技能更为熟练的劳动力队伍、创造更稳固的投资环境和建立更有利的制度环境，这都是必要的条件。此外还存在重视与这些地区潜在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行业的风险。[40] 再加上物流状况不良，政府能力薄弱，这可能意味着实际流入这些地区的制造业工作微不足道。对跨国公司选址决策的研究显示，许多因素都发生作用（见专栏 7.1）。

服务曾经被视为一般不可贸易的产品，但是这已经不再是事实了。无论具体国家趋势还是全球趋势都显示，服务在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持续上升，其中一些服务还在境外销售。[41] 常常被划分为小任务的、由信息通信技术推动的新的服务提供方式正在向服务活动可以存在的地方扩散（见专栏 7.2）。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服务出口中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11%增至 2008 年的 21%。现在，服务产品已经是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42]

服务产品贸易的迅速扩张必定提高全球的生产率。但是这也正在引起发达国家的担忧，发达国家担心服务领域的工作像过去四十年中制造业中的工作一样，通过离岸外包或国际外包流向发展中国家。

服务业领域中相当一部分任务已经由发达国家内部的偏远地区提供，

专栏 7.1 跨国公司缘何选择了它们的经营所在地?

跨国公司设立在那里提供了企业想要的或需要的有关东道国重要特征的信息。传统上，外商直接投资（FDI）要么被归为水平的，即跨国公司寻求更好的进入较大海外市场的渠道，要么被归为垂直的，即跨国公司将部分生产任务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方。随着贸易壁垒和交通成本的降低和供应链包括了日益专业化的任务，在毗邻最终市场的地方选址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了。但是实证模式显示，“成本”需要由一系列因素来决定。

通过审视东道国的特征如何预测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从实证的角度审视了选址决策的问题。宏观经济的严重不稳定或冲突取消了大多数地方的资格。低工资可能具有吸引力，但是考虑到劳动力常常只是制造业成本总量的一小部分，劳动力成本常常不是主要考虑的因素。而且劳动力成本的评估不能与技能的质量分离；发达国家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投资地，这部分是因为发达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土地获得，尤其是在土地获得管理比较严格的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可能是主要的考虑。糟糕的或不持续的公共服务，包括电力、安全和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延迟、生产损失和私营领域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可以迅速提高成本。遵守商业规范及纳税相关的成本也可能很大，正如合同执行制度的可靠性和成本一样。文献显示，这些特征的相对重要性常常因领域类型、资本密集度程度和技术复杂性而不同。其他企业的存在也是考虑的因素。迅速而可靠的供应商可以降低成本，减少延迟行为。

除了学术文献，一些咨询公司在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意见的基础上，提供了关于国家吸引力的分析和排名。1998 年以来，A.T.科尔尼出版了外商直接投资指数。三个方面的特征成为分析中的关键因素：运营良好的资本市场、稳健的商业环境和强大的劳动力技能。关于服务业所在地的一项单独指数也强调技能，尤其是语言技能和全球一体化的程度。服务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通常比制造业中大。

供应链向更加专业化的、在多个地点运营的方向发展可以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跨国公司并不寻求总体稳健的商业环境，它们关心投入和它们具体需要的服务，因而会选择特定的地址。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Alfaro 和 Chen 2011，Helpman 2006，及 Harrison 和 Rodríguez-Clare 2009。

专栏 7.2 联系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规模仍然不大

互联网服务的可得性正在日益扩大，在发展中世界亦是如此。群众外包工具有助于企业将大额任务分解成许多较小的具体步骤。然后通过竞争提供给全球在线社区。例如，TopCoder 平台聚集了全球将近 40 万名程序设计者。

被一些人称为有偿众包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在线外包，目的是为某些低收入地区带来就业机会和补充收入。据估计，有偿众包在外包行业整个运营过程中的比例为 4%，全部收入达到 45 亿美元，在全球雇用的人口为 14 万人口。Samasource 是以旧金山为基地的非营利组织，为重要技术客户工作。它将大型项目分解成可以使用方便的电脑在线完成的“微型工作”，并将大部分工作分配给世界上最贫穷地区与服务提供商合作的女性，这些最贫穷地区包括海地、巴基斯坦、乌干达和其他国家的偏远村庄、贫民窟和难民营。在过去的三年中，Samasource 为 1 600 名女性和青年提供这样的任务。

同样，RuralShores 意欲将印度农村地区带入全球的知识世界。它为数据录入、简单的簿记工作、费用处理、文件数码化和存档等非关键的经营事项提供远程处理服务。RuralShores 在印度 7 个省设有 10 个中心，雇用的员工约 1 000 人。作为营利实体的中心全部设在偏远的印度农村。尽管大部分雇员都是高中毕业生，公司对残疾人口和来自贫穷农业家庭的青年给予更多的照顾。有偿众包的确面临着包括赢得顾客和合同、持续的需求、健全的基础设施、有效的招聘和投资者认可等多方面的挑战。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监管普惠性市场 2011 及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Selim 2012。

这是离岸外包和外包的指示信号。[43] 在美国，本质上可以贸易的服务行业，比如计算机系统设计和管理资讯，展现了高度的地理集中。这种集中部分是由聚集经济和支持专业化引起的。但是服务产品地方供给和需求的简单的地理不平衡也促使偏远地区提供服务产品。

预计未来服务业贸易将迅速扩张。直到近期，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劳动密集型任务会被分配到发展中国家中去，从而允许工业国家的生产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任务上。[44] 然而现在，发展中国家不仅出口传统服务产品（比如交通和旅游），而且也出口现代和技能密集型服务（例如金融中介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及法律和技术支持）。[45] 工业国家的企业将由会计师、程序设计员、设计师、建筑师、医疗诊断专家、金融和统计分析师所履行的技能工作外包出去的行为持续增加。[46] 在印度，这类技能型白领工人的数量在快速增长。[47] 然而，一些被发展中国家视为技能型服务工作在工业国家中并不被视为是技能型的。[48]

在发展中世界，印度是建立现代出口导向型服务业的先锋，但是其他国家（这里列举几个，巴西、智利、中国和马来西亚）也抓住了机遇。[49] 但是外包也不仅仅发生在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美国（最大的外包经济体），85%的服务贸易发生在它与其他工业国家之间。[50] 发展中国家 2/3 的服务领域出口实际上是南南贸易。[51]

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在服务业领域内的某些活动中实现专业化。例如，巴西、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的专业服务和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服务很强；智利的转运和运输服务领域很强；墨西哥的通信和转运服务很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专业服务很强。[52] 这种多样性的专业化将可能导致竞争与合作并存，涉及服务业领域的不同部分，而不是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正面碰撞。

这一全球化的新阶段必然对关于结构转型和工作流动的观点和解释产生影响。一些研究者宣称一场“革命”正在进行，这场革命正在使服务业领域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53] 其他人认为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和菲律宾）在出口技能相对密集的服务产品方面取得了成功不是因为它们在这类服务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是因为其政策阻碍它们的制造业领域成功起飞。[54] 鉴于全球制造业领域就业的停滞和贸易服务的增长，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成功地跳跃发展的工业化阶段。

赢家和输家

全球化明显的赢家是那些工业和分散任务接收国的工人和企业家。外包和离岸外包及伴随而来的新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转移，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改善。生产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刺激劳动力朝着更具生产用途的方向再分配。随后，它也通过生产链前后环节促进了其他相联系的行业和领域的发展。现代服务领域的发展可以提高价值链的协作，使进一步细分任务和重新组织生产具备可能，从而带来规模经济。[55] 包括跨国公司、社团组织和工业国家消费者在内的多个行动主体，正在积极地为改善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作条件和权利而努力。这种努力已经产生了效果，提高了出口机会，改善了工人的福利。[56] 在所有这些方式中，巨

大的滴漏效应可能给接收国带来广泛的利益。

就业流动的隐形赢家大多是消费者。国际劳动分工的优化增加了全球可用的商品和服务，在世界范围内改善了生活水平。[57] 想一想如果中国和印度不能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便宜的商品和服务，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了。

明显的输家是那些因他们曾经工作的行业和服务业竞争力持续下降而丢失工作的人。尽管技能熟练工人可能很容易在其他行业里找到类似的工作且没有薪水损失，许多低技能的工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低技能工人或那些具有特定工业或职业技能而不再有市场需求的工人更可能被迫接受其他行业的薪水较低的工作或处于失业状态。[58] 工作流失不仅可能成为工业国家的严重问题，也可能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成为中国等蓬勃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重大问题。

也存在隐形的输家。这些输家是未能发展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新工业和服务业及与之相配的就业岗位的国家中的工人和企业家。[59] 然而这些国家的工人可能观察不到就业机会的流失。[60]

减缓全球化引起的显性和隐性福利损失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国际工人移民。反映不同经济体增长率差异的国家间收入差异是推动移民的重要力量。通过将工人从增长停滞或缓慢的经济体中再分配到迅速增长的经济体中，国家工人移民促进了因国际工作流动而造成的收入差异的缩减。然而工作的流动比人口的流动更容易。

* * *

人口移民和工作流动表明，尽管就业挑战具有国家特定性，但是也可能是全球范围的。输出国和接收国都可以以一系列方式从这些国际运动中受益，这些方式包括较高的劳动收入、汇款、较高的生产率和更广泛的网络关系。世界范围内的消费者也从比较便宜的消费品中受益。然而这两种移动伴随有紧张局势和成本。移民工人可能遭遇歧视和孤立或丧失他们的家庭和文化联系与认同，不仅毁坏了自己的幸福感，而且对原籍国和东道国的社区产生了影响。

人口移民和工作流动可能改变了整个社区，造成了赢家和输家。许多人经历了生活水平的改善，但是那些因外包或离岸外包而丢失工作的人可能经历福利的永久性下降，当他们是技能不熟练工人时尤其如此。这些溢出效应，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政治社会群体提倡或反对人口移民和工作流动的强烈动因。但是这些溢出效应在性质上国际性的，因此仅仅通过国家政策工具应对它们可能不能令人满意。

问题 7 为就业而竞争吗?

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就业议程。在一些国家，就业议程涉及为农村人口脱贫提供渠道。在一些国家，就业议程着眼于平衡来自城市化的利益和来自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利益。然而还有一些国家，就业议程的目标是防止青年被剥夺权利或降低冲突风险。这些议程通过刺激私营领域，特别是刺激发展收益最高的地区和领域创造就业岗位的国家政策来解决。但是全球化将个体国家的就业议程联系在一起：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流动和移民工人。这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工作可以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那么一国支持就业创造的政策是否会成为影响其他国家就业的政策，即在全球竞争工作的政策?

在经济学家中，传统智慧认为工作的数量不是由国际贸易和投资决定的，而是由劳动力中总人口数量决定的。一般来讲，对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对所有参与的国家都有利。因此，全球化不是零和游戏。从这一点来看，支持创造就业岗位的政策不是竞争工作的政策，尽管政策可能改变了全球贸易、投资和工人的流动。

一般公众似乎对这样的局势不太乐观。代表性公共舆论民意调查显示，企业搬迁和任务外包到国外被视为对工业国家就业的威胁（见专栏 7.3）。全球化被视为一国正面竞争，在这种竞争里，一国就业利益的获得只能以另一国的就业为代价。

两种观点各有长处。抛开外包和搬迁的短期影响不提，一国工作的总量不应该受到其他国家政策决策的巨大影响。一些企业可能倒闭或开始运营，其他企业可能扩张或缩减生意，但是就业总量大体上将由劳动力的规模决定。然而就业结构必定发生变化。人们的顾虑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在某些国家会减少，在其他国家会增加。这是否会发生取决于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性质和国家采取的支持就业创造的国家政策的类型。尽管公众的担忧是合法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支持就业创造的措施都是以邻为壑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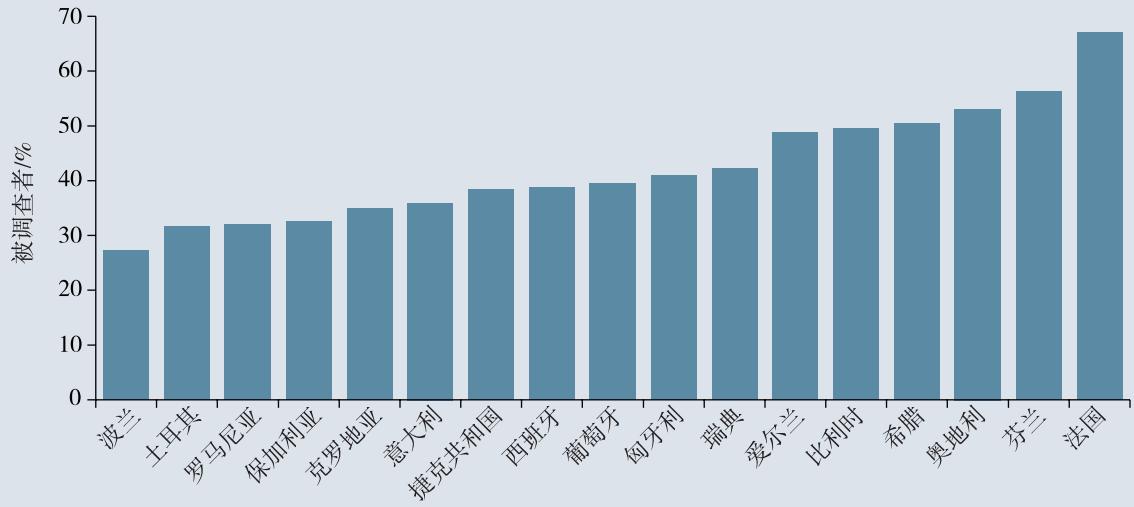
不是就业总量的竞争，而是就业结构的竞争

国际贸易和投资有望带来更大的繁荣。全球化包括企业迁移和外包，短期内可能导致国内工作的流失，但是随着专业化给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效率收益，长期上对劳动力的需求应该增长。[61] 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降低，繁荣起来的新兴国家消费需求的增加，这些只会强化全球劳动力需求的上升趋势。

经验证据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乐观的评估。劳动力收入和工作条件随着国家的富裕而改善，全球一体化有利于增长。在发展中国家，国家开放度每增加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 1%，这里国家开放度以对外贸易在国家产出中的比例来衡量。[62] 在金融服务和电信开放的情况下，平均收益可能达到 1.5 个百分点。[63] 即使在贸易自由化受到质疑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产出增长率的增长也在 0.5% 到 0.8% 之间浮动。[64] 证据还发现，涉足全球市场的企业工资也比较

专栏 7.3 全球化常常被视为工作流向国外

在欧洲国家，民众的意见可以通过欧洲民意调查获得。其中一个问题如下所述：“当你听到‘全球化’这个词语时，你头脑里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选项有国内公司的新出路机遇；国家的外商投资；一些公司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迁移；国家面临的竞争加剧；其他。第三个问题反映了已经观察到的就业不安全问题。甚至在全球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对失业的忧虑还没有加剧的时候，就有约 1/3~1/2 的被调查者认为全球化是公司向国外的迁移。调查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下面两个命题中哪一个命题与你关于全球化的观念最为接近?”可能的答案包括国内公司的良好机遇，对就业和公司的威胁和“不知道”。1/3~3/4 的被调查者把全球化视为对工作的威胁，丹麦除外，丹麦只有少数人选择了第二个选项。



注释：本图基于下述问题和答案：问题：“贸易全球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当你听到‘全球化’这个单词，你头脑里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回答是，一些公司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迁移。数据来自 2008 年调查。

根据舆论民意调查，促进就业的政策是零和游戏，一个国家获得的利益只能以另一个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盖洛普咨询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这样说：“如果你问我，根据盖洛普对世界超过 75 年的民意调查，什么可以安定世界，什么可以一下子创造世界和平、全球福利和人类发展的下一个非凡的进展，我的回答将是立即出现 18 亿工作，18 亿正式工作。”根据他的观点，“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别，我们不仅需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我们需要创造更多的好工作。而且我们不能把对好工作的追求视为国内互相冲突的政治理念的小争斗。它是一场国际战争。”[a]

资料来源：Clifton 2011；欧洲民意调查（数据库）2010，欧洲委员会，布鲁塞尔。
a.图书发行时的采访。

高。从哥伦比亚到摩洛哥的出口企业是这样，从墨西哥到韩国的出口企业也是这样。外资公司也是这样，无论它们是在喀麦隆或是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还是在印度尼西亚或是赞比亚运营。[65]

诚然，国家内部的收入分散也增加了，例如以教育回报增加的形式，将这种趋势归功于全球化是鼓舞人心的。工业国家的低技能工作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常常是高技能工作，出口本身就是一种技能密集型活动。因此，国际贸易和离岸外包有望同时增加两端的相对技能需求，有利于更合格的

工人。然而关于这一潜在效应的经验结果变化很大。[66] 毫无疑问，任何政策都产生赢家和输家，劳动收入分布随着全球化而扩大，但是很难在二者之间建立因果联系。总体上，不平等的扩大与技术进步和金融自由化的相关性可能大于与全球化的相关性。

在考虑就业结构时，一个不同于劳动收入水平或劳动收入分散性的视角产生了。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机会，获得了生产率外溢，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的繁荣。制造业就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以及技术先进的服务业和金融业中的就业常被视为快速发展的敲门砖。然而，技术的迅速进步和规模经济可能意味着某些就业的全球数量可能不会增加太多。至于制造业中的就业，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显示了其全球数量的相对稳定性及其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如果是这样，创造就业的政策就可能导致对最高发展收益的工作而不是就业水平的竞争。

日本和美国的经历解释了这一点。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出口便宜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包含更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产品。这种战略为处于“二战”后恢复期的日本带来了所需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日本生产率的提高，为制造更先进的商品奠定了基础。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日本不仅开始出口钢、半导体和汽车，而且成了主要的供应商。作为这些产品的主要出口商，美国饱受日本扩张之苦。[67] 流畅的劳动力市场曾经是美国的特征。然而即使劳动力的再分布得以平静进行，匹兹堡、底特律和其他工业中心的衰退所造成的潜在福利损失也可能是巨大的。[68] “资源出口限制”解决了这一竞争问题，资源出口限制是一种实际上将所有配额租金都给予日本但却遏制美国这类就业全面下降的一种特殊配额制度，显示了这类工业的重要性。[69]

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相似的担忧。想想中国沿海地区劳动收入增加打开的机遇。[70] 为了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一些与全球价值链相联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迁离中国。鉴于技术的快速进步，轻工业制造业的全球就业数量不可能增加许多。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南亚的低收入国家均有意吸引这类工作，因此就形成了竞争。冲突并不局限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作。类似的逻辑也存在于政府吸引高科技公司的行动中，例如哥斯达黎加成功地吸引了英特尔。[71] 这也是政府努力促进服务出口背后的逻辑，巴西、智利、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成功就是典型。[72]

由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使市场的联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技术进步和全球化也造成了对其他发展收益很高的工作类型的竞争。位于全球中心的工作可以产生巨大的生产率外溢效应。伦敦是欧洲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这大体上是因为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金融产业包含规模经济，而且其支撑是密度。因此，全球金融中心的数量是有限的，它们的形成是由地理位置、历史和民族政策决定的。同样的逻辑适用于国际运输中心新加坡、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相关行业集群硅谷和班加罗尔等。

以政策促进就业：不同程度的竞争

即使全球化可能会造成对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竞争，但并不是所有支持就业岗位创造的行为都是以邻为

壑的政策。政策是否以邻为壑取决于其所使用的工具类型和就业外溢的性质。[73]

由于全球化包括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那么政策自然首先考虑使用贸易和投资相关的工具。其中一些工具，比如进口关税、出口补贴、本地需求，是多边贸易协议所排除的；其他一些工具，比如拓宽私营出口商的信贷渠道、确认和移除外国投资者所面临的具体限制因素，是多边贸易协议所允许使用的。但是事实上，这些不过是狭隘的促进就业的政策组合。当力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时，政府可以直接通过免税周末或通过专用的物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进行竞争。政府也可能间接竞争，正如它们采取对地方企业家和外国投资者均有吸引力的措施。例如，政府可以通过保持强制性福利的合理价格来遏制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或者政府可以改善诸如工人技能和公共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和质量。以南亚为例，物质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是新企业进入最强大的预测器。[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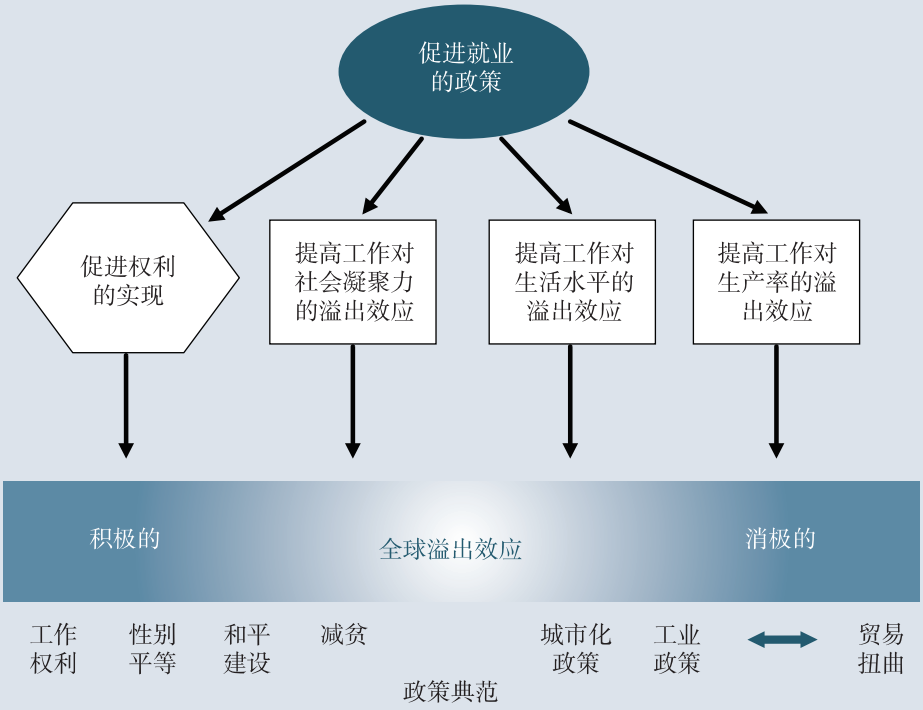
如果从广义上考虑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而不是仅仅考虑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工作，政策选择的组合甚至更广泛。城市政策是促进私营领域创造就业岗位的另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考虑到潜在的聚集经济，相对不大的干预措施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75] 在低收入国家，扩大推广服务可能对农业生产率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对减贫产生影响。这一比较广泛的政策组合是否会导致就业竞争取决于一国的政策是否会对他国的社会福利产生有利的或不利的影响。

需要问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策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见图 7.3）。例如，就业政策可能以改善维护权利为目的，对强迫劳动和有害的童工形式提出公诉。由于大多数国家都批准了基本的劳动权利和原则，维护权利的行动已经上升到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地位。这样，一国反对人口贩卖或雏妓的干预措施不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对工作的竞争。

在全球公共商品不存在的情况下，第二个问题是政策干预措施应对的市场不完善或制度失灵问题是哪些。应对导致冲突、歧视或缺少话语权的制度失灵问题对国际商品、服务和金融的流动具有影响，但只是间接影响。这些领域的政府干预将导致与另一国就业竞争的风险是有限的。当干预措施旨在为贫穷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时，风险也是有限的。在所有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将取得进步，其他国家的福利也不会有大的损失。因此，强调加强社会凝聚力和改善生活水平的就业政策也应当被接受。

当政府干预的目的在于扩大来自就业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答案就不是那么明确了。这些干预措施通常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基础设施投资和技能投资或提高企业家能力。由于这些干预措施可能对商品、服务和金融的国际流动产生影响，可能出现的结果的范围比较广泛。尽管没有普遍的规则，削弱贸易体制开放性的干预措施是最可能降低总体福利水平的方法，对国内的影响可能还要大于国外。另外，与国家动态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干预措施可能带来相互利益。毫无疑问，评估什么是与国家动态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干预措施意味着在实践中必然涉及判定的因素。[76] 但是东亚国家的经历，制造业中的工作从日本迁移到韩国和中国台湾，随即又迁移到

图 7.3　促进就业的政策可能伤害也可能不伤害其他国家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中国，接着又迁移到越南，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建议。尽管这些国家遵循了符合它们动态比较优势的“雁行”发展模式，但是它们之间公开的就业竞争却并不多见。

注释

1. Ozden 等 2011。

2. 国际移民组织 2008；Lucas 2005。

3. 国际移民组织 2010。

4. 国际移民组织 2010；联合国难民署 2010。

5. 这一发现使南亚和苏联的政治变革的影响大打折扣。见 Ozden 等 2011。

6. Docquier 和 Marfouk 2006

7. Docquier 和 Marfouk 2006；Solimano 2010。

8. Bach 2008。

9. Docquier，Ozden 和 Peri 2011。

10. 就汤加向新西兰移民的案例而言，McKenzie，Gibson 和 Stillman（2006）发现移民导致收入增加了 263%。Clemens，Montenegro 和 Pritchett（2008）发现，从墨西哥向美国移民获得的年工资收益将近 1 万美元，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海地、印度和尼日利亚向美国移民的年工资收益约 1.8 万美元。

11. Chin 1999；Di Nicola 1999。

12. Hanson 2006；Spener 2009。

13. 见 Lucas 2005，第 3 章。同时见 Docquier，Ozden 和 Peri 2010。关于该议题的跨国分析，见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Hovhannisyan 2012。

14. Lucas 2005，267–69；Priebe 等 2011。关于健康和移民关系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成长中的研究领域。Gibson，McKenzie 和 Stillman（待出版）使用从汤加移民新西兰的数据研究发现，移民改善了心理健康，而 McKenzie，Gibson 和 Stillman（2006）则发现，移民导致血压的大幅度和持续性上升。

15. Gupta，Patillo 和 Wagh 2009；Lokshin，Bontch–Osmolovski 和 Glinskaya 2010。

16. Anzoategui，Demirgüç–Kunt 和 Martinez–Peria 2011。

17. Sirkeci，Cohen 和 Ratha 2012。

18. 关于汇款和不平等之间关系难以解释的理论解释，见 Shen，Docquier 和 Rapoport（2010）。实证研究包括 Acosta 等（2007）；Adams（1989）；Adams（1992）；Adams（2004）；Adams（2006）；McKenzie 和 Rapoport（2007）；及 Milanovic（1987）。

19. Adams 2011。

20.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才浪费”的情况：无论是在输出国（由于增长停滞）还是在东道国（由于行业分割），技术熟练工人从事低技能工作。在这两种案例中，由于这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生产率受阻。见 Ozden he Schiff 2006。

21. 关于埃及，见 Wahba（2007）；关于乌干达和南非，见 Thomas（2009）；关于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国家，见 De Vreyer，Gubert 和 Robilliard（2010）。

22. Chacko 2007。同时见 Saxenian 2004。

23. Pandey 等 2006。

24. Cordova 2009；Garcia Zamora 2005；McKenzie 和 Rapoport 2007；Torres 和 Kuznetsov 2006。

25. Gibson 和 McKenzie 2012。

26. Kuznetsov 和 Sabel 2006。

27. Beine，Docquier 和 Rapoport 2011；Lucas 2010。

28. 关于墨西哥，见 Heymann 等（2009）。关于阿尔巴尼亚，见 de Soto 等（2002）。

29. 一些学者，包括 Keddie（1998），认为移民造成政治极端主义，而其他人，例如 Pérez–Armendáriz 和 Crow（2010）认为，移民带来民主。

30. 关于美国的证据，见 Abowd 和 Freeman（1991）；Borjas（2003）；Card（2001）；及 LaLonde 和 Topel（1997）。关于法国和德国案例的类似的定性结果见 Giuletti（2012），Hunt（1992）及 Pischke 和 Velling（1997）；关于以色列，见 Friedberg（2001）；关于西班牙，见 Carrasco，Jimeno 和 Ortega（2008）；关于英国，见 Dustmann，Fabbri 和 Preston（2005）。见 Chiswick 和 Miller 2009。

31. Lucas 2005，285–86。关于对移民的态度和福利国家之间复杂的政治经济联系，见 Koopmans（2010）及 Razin，Sadka 和 Suwankiri（2011）。

32. Dingeman 和 Rumbaut 2010。

33. 尽管难以测量非法移民，仍然存在这样一个共识，即 2009 年大衰退之前非法移民的数量在持续增长。测量非法移民的新渠道包括行政记录和合法化方案。其他经历包括国际移民组织（IOM）反对人口贩卖机构（CTM）、边境与移民资讯交换中心（CIREFI）或欧洲委员会搜集的移民立法执行统计数据。见国际移民组织 2010。

34. 由于数据有限，图 7.1 显示了国内工业领域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这里工业领域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和采矿业。

35. Akamatsu 1962；Lin 2011。

36. Lin 2011；Lin 2012。

37. Glaeser 等 1992；Henderson，Lee 和 Lee 2001；Mano 和 Otsuka 2000；Sonobe 和 Otsuka 2006。

38.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Rozelle 和 Huang 2012。

39. 特别是要参阅 Dinh 等 2012。

40. Lin 2012；Lin 等 2010。

41. 测量离岸外包的净效应是复杂的，而且已经提出了不同的方法。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既定国家的净效应是不明确的，这是因为在短期内离岸外包可能降低就业，但是由此形成的专业化可以形成生产率收益，从而在长期上增加了就业，尽管在总的就业中不同类型劳动力和职业的比例发生了变化。经合组织（OECD 2007）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UNCTAD 2004）指出，离岸外包未必是零和游戏，尽管不同行业和领域存在差异，短期工作流失可能得到更多的工作收益的补偿。

42. Ghani 2010。

43. Jensen 2011。

44. 关于例证，见 Gorg 2011。

45. Goswami，Mattoo 和 Sáez 2011。

46. Millberg 等 2007。

47. 关于例证，见 Suri 2007。

48. Goldberg 和 Pavcnik 2007。

49. Goswami，Mattoo 和 Sáez 2011。

50. Ebenstein 等 2009。

51. Goswami，Mattoo 和 Sáez 2011。

52. Goswami，Mattoo 和 Sáez 2011。

53. Ghani 2010。

54. Goswami，Mattoo 和 Sáez 2011；Jensen 2011。

55. Francois 和 Hoekman 2010。

56. Elliott 和 Freeman 2003；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文件 Newitt 2012。

57. Bhagwati，Panagariya 和 Srinivasan 2004。

58. Ebenstein 等 2009。

59. 有证据显示中国持续增加的出口影响了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模式。见 Eichengreen，Rhee 和 Tong 2007；Greenaway，Mahabir 和 Milner 2008。

60. Blomstrom 和 Kokko 2009。

61. 关于例证，见 Bhagwati，Panagariya 和 Srinivasan 2004；Francois 和 Hoekman 2010；及 Grossman 和 Rossi-Hansberg 2008。

62. Noguer 和 Siscart 2005。

63. Mattoo 和 Rathindran 2006。

64. Brückner 和 Lederman 2012。

65. 关于出口公司，见 Aw，Chung 和 Roberts（2000）及 Clerides，Lach 和 Tybout（1998）。关于外资公司，见 Aitken，Harrison 和 Lipsey（1996）；Velde 和 Morrissey（2003）；及 Gorg，Strobl 和 Walsh（2007）。

66. 关于综述，见 Goldberg 和 Pavcnik（2007）；Jansen，Ralf 和 Manuel（2011）；New farmer 和 Sztajerowska（2012）；Rama（2003）；及 Robertson 等（2009）。

67. 关于例证，见 McKinnon 和 Ohno 1997。

68. Gomory 和 Baumol 2001。

69. 关于例证，见 Feenstra 1984 及 Hymans 和 Stafford 1995。

70. Lin 2012。

71. Rodríguez-Clare 2001。

72. Goswami，Mattoo 和 Sáez 2011。

73.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Levy 2012。

74. Ghani，Kerr 和 O'Connell 2011。

75. Glaeser 和 Gottlieb 2008。

76. Lin（2012）提出使用禀赋相近、但是人均收入比所考虑的国家适当高出一些的国家的贸易模式作为参照物。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bowd, John M., and Richard B. Freeman. 1991. *Immigration, Trade, and the Labor Marke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costa, Pablo, César Calderón, Pablo Fajnzylber, and J. Humberto Lopez. 2007. "What I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24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dams, Richard H. 1989. "Worker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8 (1): 45–71.

———. 1992. "The Effects of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on Inequality in Rural Pakistan."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31 (4 Pt. 2): 1189–203.

———. 2004. "Remittances and Poverty in Guatemal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41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2006. "Remittances and Poverty in Ghan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83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2011.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Using Household Surveys: A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7 (6): 809–28.

Aitken, Brian, Ann Harrison, and Robert E. Lipsey. 1996. "Wages and Foreign Owne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xico,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0 (3–4): 345–71.

Akamatsu, Kaname. 1962.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ing Economies* 1 (Suppl. s1): 3–25.

Alfaro, Laura, and Maggie Xiaoyang Chen. 2011. "Selection, Reallocation,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Identifying the Impact of Multinational Activity o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 October 6.

Anzoategui, Diego, Asli Demirgüç-Kunt, and Maria Soledad Martinez-Peria. 2011. "Remittances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Evidence from El Salvado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83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rtuc, Erhan; Frederic Docquier, Caglar Özden and Chris Parsons. 2012. "Education Structure of Global Migration Patterns: Estimates Based on Census Dat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Aw, Bee Yan, Sukkyun Chung, and Mark J. Roberts. 2000. "Productivity and Turnover in the Export Market: Micro-level Evidence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aiwan (Chin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4 (1): 65–90.

Bach, Stephen. 2008.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Brain Drain or Brain Ex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 ed. Andrés Solimano, 202–3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ine, Michel, Frédéric Docquier, and Hillel Rapoport. 2011. "Brain Drain 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nners and Losers." *Economic Journal* 118 (4): 631–52.

Bhagwati, Jagdish, Arvind Panagariya, and T. N. Srinivasan. 2004. "The Muddles over Outsourcing." *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 18 (4): 93–114.

Blomström, Magnus, and Ari Kokko. 2009. "The Economic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entive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Real and Financial Sector of Industrial Countries*, ed. Heinz Hermann and Robert Lipsey, 37–56. Heidelberg, Germany, and New York: Springer.

Borjas, George J. 2003. "The Labor Demand Curve Is Downward Sloping: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4): 1335–74.

Brückner, Markus, and Daniel Lederman. 2012. "Trade Causes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600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ard, David. 2001. "Immigrant Inflows, Native Outflows, and the Local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Higher Immigratio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 (1): 22–64.

Carrasco, Raquel, Juan F. Jimeno, and Anna Carolina Ortega. 2008.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of Native-Born Workers: Some Evidence for Spai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1 (3): 627–48.

Chacko, Elizabeth. 2007. "From Brain Drain to Brain Gain: Reverse Migration to Bangalore and Hyderabad, India's Globalizing High Tech Cities." *Geo Journal* 68 (2–3): 131–40.

Chiswick, Barry R., and Paul W. Miller. 2009. "Earnings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among Immigrants."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48 (3): 454–65.

Chin, Ko-Lin. 1999. *Smuggled Chinese: Clandestine Immigration to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Clemens, Michael A., Claudio E. Montenegro, and Lant Pritchett. 2008. "The Place Premium: Wage Differences for Identical Workers across the U.S. Borde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67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lerides, Sofronis K., Saul Lach, and James R. Tybout. 1998. "Is Learning by Exporting Important? Micro-dynamic Evidence from Colombia, Mexico and Morocco."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 (3): 903–47.

Clifton, Jim. 2011. *The Coming Jobs War: What Every Leader Must Know about the Future of Job Creation*. New York: Gallup Press.

Cordova, Karina. 2009. "Collective Remittances in Mexico: Their Effect on the Labor Market for Mal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ld Bank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0.

de Soto, Hermine, Peter Gordon, Ilir Gedeshi, and Zamira Sinoimeri. 2002. "Poverty in Albania: A Qualitative Assessment."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Environmentally and Soci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ries 52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De Vreyer, Philippe, Flore Gubert, and Anne-Sophie Robilliard. 2010. "Are There Returns to Migration Experie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Data on Return Migrants and Non-Migrants in West Africa." *Annales d'Économie et de Statistique* 97–98 (January/June): 307–28.

Dingeman, Kathleen M., and Ruben G. Rumbaut. 2010. "The Immigration-Crime Nexus and Post-Deportation Experiences: Encountering Stereotype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El Salvador." *University of La Verne Law Review* 31 (2): 363–402.

Dinh, Hinh T., Vincent Palmade, Vandana Chandra, and Frances Cossar. 2012. *Light Manufacturing in Africa: Targeted Policies to Enhance Private Investment and Create Job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d 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Di Nicola, Andrea. 1999. "Trafficking in Immigrants: A European Perspective." Research Centre on Transnational Crime, University of Trento.

Docquier, Frédéric, and Abdeslam Marfouk. 200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by Education Attainment, 1990–2000."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Brain Drain*, ed. Çaglar Özden and Maurice Schiff, 151–9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Docquier, Frédéric, Çaglar Özden, and Giovanni Peri. 2010. "The Wag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11664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2011.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in OECD Countri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6528,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Dustmann, Christian, Francesca Fabbri, and Ian Preston. 2005.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British Labour Market." *Economic Journal* 115 (507): F324–41.

Ebenstein, Avraham, Ann Harrison, Margaret McMillan, and Shannon Phillips. 2009.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Trade and Offshoring on American Workers Using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s," Working Paper Series 1510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Eichengreen, Barry, Yeongseop Rhee, and Hui Tong. 2007. "China and the Exports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3 (2): 201–26.

Elliott, Kimberly A., and Richard B. Freeman. 2003. *Can Labor Standards Improve under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eenstra, Robert C. 1984.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in U.S. Autos, 1980–81: Quality, Employment and Welfare Effects." In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Recent U.S. Trade Policy*, ed. Robert E. Baldwin and Anne O. Kruger, 35–6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ançois, Joseph F., and Bernard Hoekman. 2010. "Services Trade and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8 (3): 642–92.

Friedberg, Rachel M. 2001. "The Impact of Mass Migration on the Israeli 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 (4): 1373–408.

Garcia Zamora, Rodolfo. 2005. "Mexic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In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81–87. Paris: OECD.

Ghani, Ejaz. 2010. *The Services Revolution in South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hani, Ejaz, William R. Kerr, and Stephen D. O'Connell. 2011. "Who Creates Jobs?" *Economic Premise* 2011 (70): 1–7.

Gibson, John, and David McKenzie. 2012.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Brain Drain' of the Best and Brightest: Microeconomic Evidence from Five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122 (560): 339–75.

Gibson, John, David McKenzie, and Steven Stillman. Forthcoming. "Selectivity and the Estimated Impact of Emigration on Incomes and Poverty in Sending Areas: Evidence from the Samoan Quota Migration Lotte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Giuletti, Corrado. 2012. "Jobs, Migration, and Social Inclusion—Empirical Evidence." In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2: Moving Jobs Center Stage*. Berlin: Berlin Workshop Series.

Glaeser, Edward L., and Joshua D. Gottlieb. 2008. "The Economics of Place-Making Polic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1437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Glaeser, Edward L., Hedi D. Kallal, Jose A. Scheinkman, and Andrei Shleifer. 1992. "Growth in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 (6): 1126–52.

Goldberg, Pinelopi Koujianou, and Nina Pavcnik. 2007.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45 (1): 39–82.

Gomory, Ralph E., and William J. Baumol. 2001.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örg, Holger. 2011. "Globalization, Offshoring and Jobs." In *Making Globalization Socially Sustainable*, ed. Marc Bacchetta and Marion Jansen, 21–47.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örg, Holger, Eric Strobl, and Frank Walsh. 2007. "Why Do Foreign-Owned Firms Pay More? The Role of On-the-Job Training."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3 (3): 464–82.

Goswami, Arti Grover, Aaditya Mattoo, and Sebastián Sáez, eds, 2011. *Exporting Services: 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eenaway, David, Aruneema Mahabir, and Chris Milner. 2008. "Has China Displaced Other Asian Countries' Export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 (2): 152–69.

Grossman, Gene M., and Esteban Rossi-Hansberg. 2008. "Trading Tasks: A Simple Theory of Offshor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5): 1978–97.

Gupta, Sanjeev, Catherine A. Patillo, and Smita Wagh. 2009. "Effect of Remittances on Povert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37 (1): 104–15.

Hanson, Gordon H. 2006. "Illegal Migration from Mexico to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4 (4): 869–924.

Harrison, Ann, and Andrés Rodríguez-Clare. 2009.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Polic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 of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 Dani Rodrik and Mark Rosenzweig, 4039–214. Amsterdam: Elsevier.

Helpman, Elhanan. 2006. "Trade, FDI,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Firm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4 (3): 589–630.

Henderson, Vernon, Todd Lee, and Yung Joon Lee. 2001. "Scale Externalities in Korea."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9 (3): 479–504.

Heymann, Jody, Francisco Flores-Macias, Jeffrey A. Hayes, Malinda Kennedy, Claudia Lahaie, and Alison Earle. 2009.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the Well-being of Transnational Families: New Data from Sending Communities in Mexico." *Community, Work and Family* 12 (1): 91–103.

Hovhannisyan, Shoghik. 2012. "Labor Market and Growth Implications of Emigration: Cross-Country Evidenc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Hunt, Jennifer. 1992. "The Impact of the 1962 Repatriates from Algeria on the French Labor Market."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45 (3): 556–72.

Hymans, Saul H., and Frank P. Stafford. 1995. "Divergence, Convergence,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1): 118–23.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0.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Geneva: ILO.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8.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8: Managing Labour Mobility in the Evolving Global Economy*. Geneva: IOM.

———. 2010.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0—The Future of Migration: Building Capacities for Change*. Geneva: IOM.

Jansen, Marion, Peters Ralf, and Jose Manuel, eds. 2011. *Trade and Employment: From Myths to Fact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Jensen, J. Bradford. 2011. *Global Trade in Services*. Washington, DC: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Keddie, Nikki R. 1998. "The New Religious Politics: Where, When and Why Do 'Fundamentalisms' Appear?"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0 (4): 696–723.

Koopmans, Rudd. 2010. "Trade-Offs between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Immigrant Integration,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6 (1): 1–26.

Kuznetsov, Yevgeny, and Charles Sabel. 200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Talent, Diaspora Networks, and Development: Overview of Main Issues." In *Diaspora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Skills: How Countries Can Draw on Their Talent Abroad*, ed. Yevgeny Kuznetsov, 3–2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LaLonde, Robert, and R Topel. 1997. "Econom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Migrants." In *Handbook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Economics*, ed. Mark R. Rozenweig and Oded Stark, 799–850. Amsterdam: Elsevier.

Levy, Philip. 2012. "Potential for International Rivalry as Governments Pursue Job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Lin, Justin Yifu. 2011. "From Flying Geese to Leading Dragons: New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70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2012.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Lin, Justin Yifu, Célestin Monga, Dirk Willem te Velde, Suresh D. Tendulkar, Alice Amsden, K. Y. Amoako, Howard Pack, and Wonhyuk Lim. 2010.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al Chang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9 (3): 259–310.

Lokshin, Michael, Mikhail Bontch-Osmolovski, and Elena Glinskaya. 2010. "Work-Related Migr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Nepal."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4 (2): 323–32.

Lucas, Robert E. B. 2005.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Low-Income Countri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2010. "Migrant Sending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abor Market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abor Markets*, ed. Christiane Kuptsch, 63–87.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Mano, Yukichi, and Keijiro Otsuka. 2000.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es: A Case Study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Postwar Japan." *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4 (3): 189–203.

Mattoo, Aaditya, and Randeep Rathindran. 2006. "Measuring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n Illust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21 (1): 64–98.

McKenzie, David, John Gibson, and Steven Stillman. 2006. "How Important Is Selection? Experimental versus Non-experimental Measures of the Income Gains from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8: 913–45.

McKenzie, David J., and Hillel Rapoport. 2007. "Network Effects and the Dynamics of Migration and Inequ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Mexic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4 (1): 1–24.

McKinnon, Ronald, and Kenichi Ohno. 1997. *Dollar and Yen: Resolving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ilanovic, Branko. 1987. "Remittance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14 (5): 24–37.

Millberg, William, Melissa Mahoney, Markus Schneider, and Rudy von Arnim. 2007. "Dynamic Gains from U.S. Services Offshoring." In *Global Capitalism Unbound: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Offshoring,* ed. Eva Paus, 77–9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Monitor Inclusive Markets. 2011. *Job Creation through Building the Field of Impact Sourcing.* Mumbai: Monitor Inclusive Markets.

Newfarmer, Richard, and Monika Sztajerowska. 2012. *Trade and Employment in a Fast-Changing World.*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itt, Kirsten. 2012. "Private Sector Voluntary Initiatives on Labour Standard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Noguer, Marta, and Marc Siscart. 2005. "Trade Raises Income: A Precise and Robust Resul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5 (2): 447–60.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7. *Offshoring and Employment: Trends and Impacts.* Paris: OECD.

Özden, Çaglar, and Maurice Schiff. 200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Brain Drai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and World Bank.

Özden, Çaglar, Christopher Parsons, Maurice Schiff, and Terrie L. Walmsley. 2011. "Where on Earth Is Everybody?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Bilateral Migration 1960–2000."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5 (1): 12–56.

Pandey, Abhishek, Alok Aggarwal, Richard Devane, and Yevgeny Kuznetsov. 2006. "The Indian Diaspora: A Unique Case?" In *Diaspora Network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Skills*, ed. Yevgeny Kuznetsov, 71–9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érez-Armendáriz, Clarisa, and David Crow. 2010. "Do Migrants Remit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tical Beliefs, and Behavior in Mexico."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3 (1): 119–48.

Pischke, Jörn-Steffen, and Johannes Velling. 1997. "Employment Effects of Immigration to Germany: An Analysis Based on Local Labor Marke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9 (4): 594–604.

Priebe, Stefan, Sima Sandhu, Sónia Dias, Andrea Gaddini, Tim Greacen, Elisabeth Ioannidis, Ulrike Kluge, Allan Krasnik, Majda Lamkaddem, Vincent Lorant, Rosa Puigpinósi Riera, Attila Sarvary, Joaquim JF Soares, Mindaugas Stankunas, Christa Strafsmayr, Kristian Wahlbeck, Marta Welbel, and Marija Bogic. 2011. "Good Practice in Health Care for Migrants: Views and Experiences of Care Professionals in 16 European Countries." *BMC Public Health* 11 (187): 1471–2458.

Rama, Martín. 2003. "Globalization and the Labor Market."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8 (2): 159–86.

Razin, Assaf, Efraim Sadka, and Benjarong Suwankiri. 2011. *Migr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Political-Economy Policy Form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Robertson, Raymond, Drusilla Brown, Gaelle La Borgne Pierre, and Maria Laura Sanchez-Puerta, eds. 2009. *Globalization, Wages, and the Quality of Jobs: Five Country Stud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odríguez-Clare, Andrés. 2001. "Costa Rica's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How It Got There, the Impact of Intel, and Lessons for Other Countrie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2 (2): 311–24.

Rozelle, Scott, and Jikun Huang. 2012. "China's Labor Transition and the Future of China's Rural Wages and Employmen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Saxenian, Annalee. 2004. "The Bangalore Boom: From Brain Drain to Brain Circulation." In *IT Experience in India: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ed. Kenneth Keniston and Deepak Kumar, 169–81.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Selim, Nadia. 2012. "Innovation for Job Creatio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Shen, I-Ling, Frédéric Docquier, and Hillel Rapoport. 2010.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A Dynamic Migration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8: 197–220.

Sirkeci, Ibrahim, Jeffrey Cohen, and Dilip Ratha, eds.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Beyon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olimano, Andrés. 2010.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Age of Crisis and Globalization: Historical and Recent Exper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nobe, Tetsushi, and Keijiro Otsuka. 2006. *Cluster-Bas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 East Asian Mode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Spener, David. 2009. *Clandestine Crossings: Migrants and Coyotes on the Texas-Mexico Bord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uri, Navdeep. 2007. "Offshoring Outsourcing of Services as a Catalys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India." In *Global Capitalism Unbound: Winners and Loser from Offshoring*, ed. Eva Paus, 163–8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Thomas, Kevin J. A. 2009. "The Human Capital Characteristics and Household Living Standards of Returning International Migrants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0 (4): 85–106.

Torres, Federico, and Yevgeny Kuznetsov. 2006. "Mexico: Leveraging Migrants' Capital to Develop Hometown Communities." In *Diaspora Network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Skills*, ed. Yevgeny Kuznetsov, 99–12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4.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010. *Global Appeal 2010–2011: Real People, Real Needs*. Geneva: UNHCR.

Velde, Dirk Willem te, and Oliver Morrissey. 2003. "Do Workers in Africa Get a Wage Premium if Employed in Firms Owned by Foreigners?"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2 (1, Special Issue): 41–73.

Wahba, Jackline. 2007. "Return to Overseas Work Experience: The Case of Egypt."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ed. Çaglar Özden and Maurice Schiff, 235–5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11.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第三部分 3

透过就业的镜头看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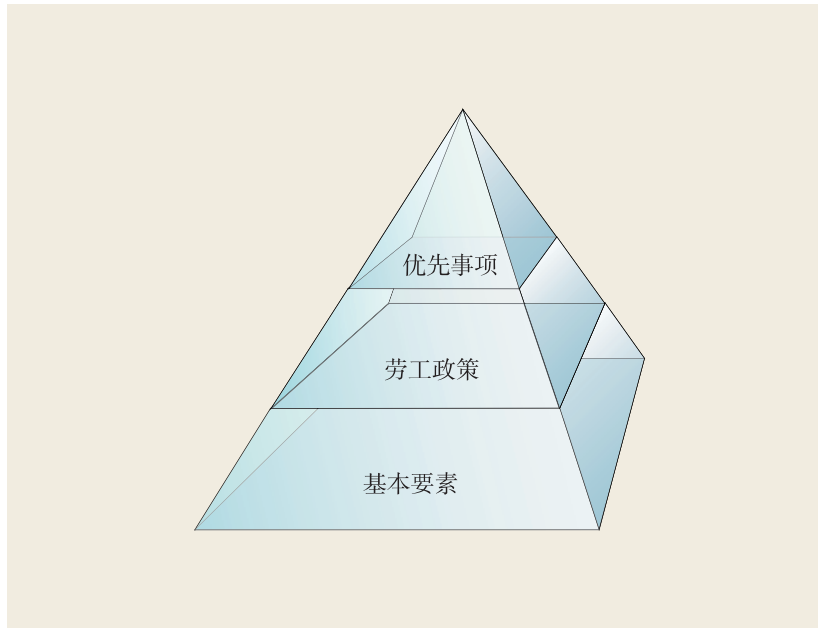


第三部分

大多数工作是由私营领域创造的。尽管在某些情景下，公共工程和针对性就业计划是适当的，但是政府的首要职能不是直接提供就业。考虑到国家的情况，政府的首要职能是为私营领域创造就业提供条件，特别是消除创造更多具有最高发展收益的工作面临的障碍因素。

当面临就业挑战时，决策者首先倾向于或者把劳工政策视为解决方案，或者把劳工政策视为问题所在。那么，理解像劳动力市场管制、集体谈判、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和社会保险等政策和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很重要。但是就业创造的主要障碍因素常常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之外，因此就需要明确的方法来支持合理的政策响应。

- 基本要素是增长的必要条件，是私营领域创造就业的前提条件。宏观经济稳定、良好的经营环境、人力资本、法治以及权利的逐渐实现，是关键的政策基本要素。
- 劳工政策要足以让增长转化为就业机会。政策应该避免成为阻碍劳动力迁移和削弱功能城市中和全球价值链中就业创造的扭曲性干预措施。但是政策也应当确保话语权和社会保障，特别是最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和社会保障。
- 所确定的政策优先项必须支持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理论上，政策应当以消除阻碍私营领域创造就业的市场不健全问题和制度失灵问题为目标。如果限制因素不容易被确认或很难被消除，抵消政策可能被考虑。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第 8 章

8

重新审视劳工政策

劳工政策可以应对劳动力市场不健全问题，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干预措施可以降低经济活力，而缺乏话语权和社会保障机制会对最弱势群体产生影响。

劳动力市场具有缺陷，其表现形式为信息不完全、谈判力不平衡、执行长期承诺的能力有限及预防就业相关风险的保险机制不完全等，这类缺陷造成了就业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异。因此，这可能造成从社会角度而言不是最佳结果的就业水平和组成。

原则上劳工政策和制度可用于应对这些缺陷，这里劳工政策和制度包括管制、集体代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和就业保险等。其他政策，诸如退休金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等可以在经济领域的其他方面应对这些缺陷，但是对劳动力市场的运营具有重要的含义。

劳工政策和制度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组合方式（见图 8.1）。[1] 它们的组合倾向于因发展水平而异，一般而言，工业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更先进。提供集体话语权渠道（比如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谈判）的制度和提供社会保险的制度尤其是这样。但是任何国家劳工政策和制度的性质都不仅仅受到发展水平的影响，因而必须在国家的法律传统、政治、社会规范及价值的大环境中审视劳工政策和制度。

劳工政策的影响常常是人们争论的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完善的数据和方法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新信息，这些新信息不仅仅是工业国家的，而且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新信息也在持续增加。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带来了新的认识。事实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估测效应相对适中，当然要比讨论的密度所显示的适中。干预过度或干预不足肯定会对生产率产生不良影响。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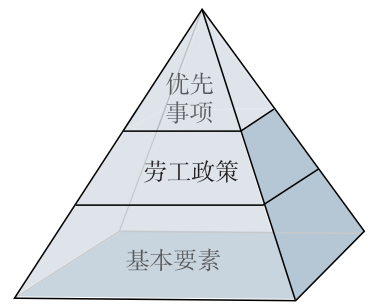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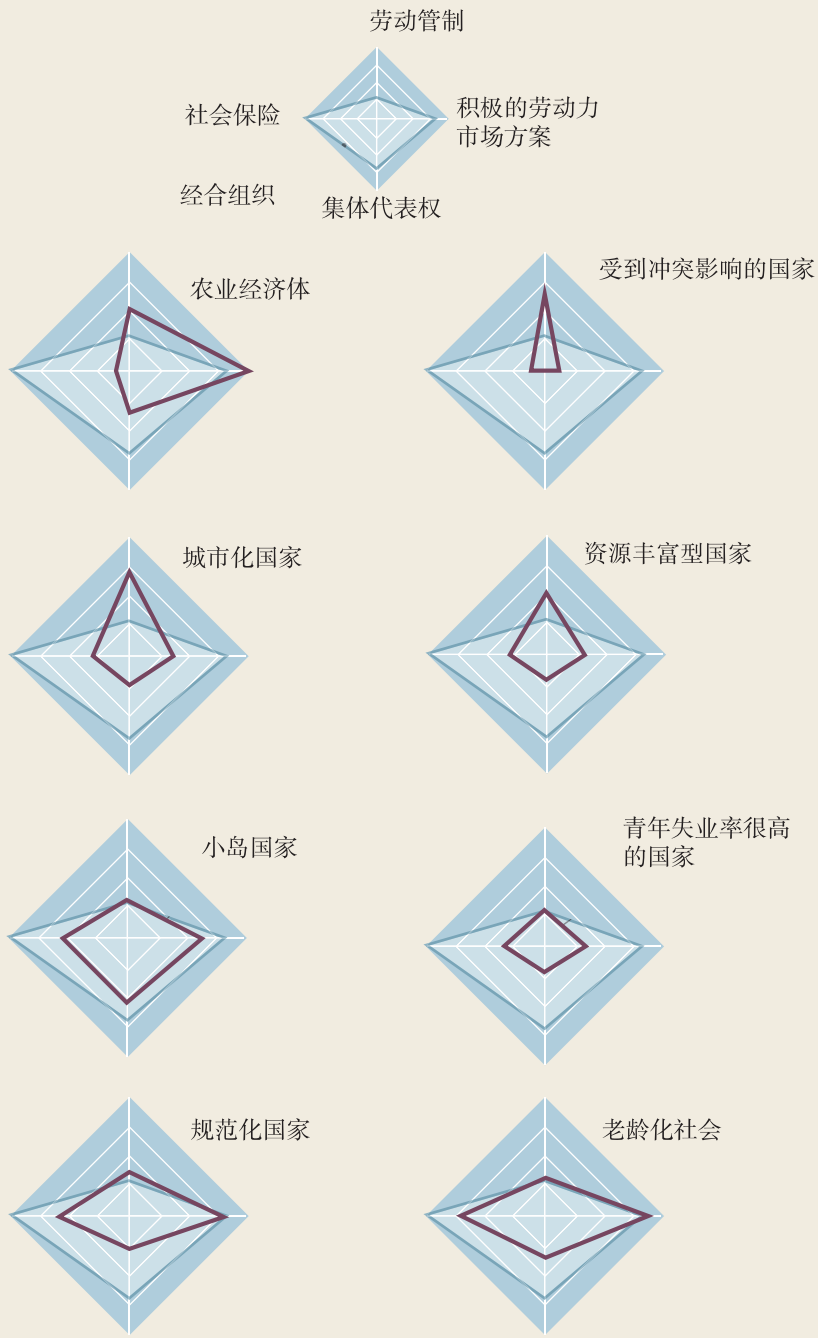


图 8.1　劳工政策和制度的组合因国家而异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下述资料的估测值：欧洲统计局劳动力市场干预措施公共支出（数据库），欧洲委员会；工会、工资设定、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约的制度特征（ICTWSS）（数据库），阿姆斯特丹高级劳动研究学院，阿姆斯特丹；Pallares-Miralles，Romero 和 Whitehouse 2012；劳动力市场方案公共支出和参与者股份（数据库），经合组织，巴黎；Robalino，Newhouse 和 Rother，待出版；及世界银行，待出版。

注释：OECD 即经合组织。数字是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数。劳动力管制表示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率。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是用于劳动力市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集体代表是集体谈判协议的规模除以劳动力。社会保险表示缴纳老年退休金的工人在劳动力中的比例。《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将国家划分为 8 个组，一个国家可以属于几个组。数字是国家的未加权平均数。

是在这些极端中存在“平台”地带，可以同时发现提高和降低效率的效果，而且大部分效果是可以再分配的。总体上来说，在大多数国家中，劳工政策和制度既不是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主要障碍因素，也不是魔弹。

劳动管制：“平台”效应

可以制定劳动法规应对导致抵消结果或不平等结果的市场失灵问题。履行雇主与雇员之间长期合同的困难可能导致过度的滥竽充数和培训投资不足。保险计划组织的无效可能导致被解雇的工人得不到保障，这可能迫使他们缩短在找到合适工作前找工作的时间。不平衡的市场力量使公司能够设定低于竞争条件下所达成的工资水平的工资。歧视性行为可能产生相同的效应，力量不平衡或信息不完全可能导致工作场所的不安全。市场不完全和制度失灵可能对就业创造产生影响，导致工人就业收益和工作社会价值的差异。

就业保障立法和最低工资

就业保障立法（EPL）和最低工资被广泛用于应对这些失灵问题。就业保障立法包括管理雇用和终止雇用及界定就业安全保障程度的规则（见专栏 8.1）。实际上所有国家都以某种方式管理雇用和终止雇用的行为，例如，170 个国家以法律规定或集体协议强制发放遣散费。[2] 同样，签署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最低工资公约的国家超过了 100 个，而且许多国家尽管没有批准这些公约，却设定了最低工资。[3] 然而，劳动法规的具体性质却反映了其所属社会的状况。重要的决定因素包括一国的立法传统及公民对待团结、不平等和信任的态度。[4] 法规的内容及其影响也受到其他诸如集体代表和社会保险等潜在补充性制度之间互动的影响。

对劳动法规的观点可能是两极对立的，这对决策具有不同的启示。诸如劳工政策是否应当保障就业或工人等基本问题，常常激起热烈的讨论（见问题 8）。

对一些人来讲，这些法规为工人抵御经济波动和公司强大谈判力的伤害提供了必要的保障[5]。就业保障立法可以提供就业安全，遏制有害的就业形式。最低工资可以预防工人中出现

专栏 8.1　就业保障立法不仅仅包括解雇规则

就业保障立法，或者缩写为 EPL，可以划分为两大主要规则体系，其一涉及雇用；其二涉及终止雇用。雇用规则规定何种类型的劳动合同在何种条件下是被允许的：例如，开放式合同、固定期合同、兼职合同和学徒合同。终止雇用规则规定合同的终止，包括原因（自愿和非自愿的、合理的或不公平的）、服务终止补偿（遣散费）和程序（例如，第三方通知或批准，提前通知和授予时期）。这些严密组合在一起的规则导致了国家间管制的连续性，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努力。[a]

其他类型的劳工政策也对就业安全具有意义。一些法规为女性工人和青年工人的就业设定了具体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产假、儿童护理设施的需求、放弃第一次合同的权利或针对学徒的最低工资减少等。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弱势人口群体更多地参与就业，并且在他们实现就业后保护他们。反歧视法规应对不为社会接受的工人差别待遇，目的是降低不平等程度，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就业中的公平性。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力图总结就业保障立法的措施包括 Botero 等 2004 提出的措施；就业保障指标（数据库），经合组织，巴黎；及经商指标（数据库），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

极端贫穷的现象，应对源自非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低下问题。[6] 通过确立工资参考标准，最低工资甚至可以通过所谓的灯塔效应使不在其范围内的工人受益。[7] 人们认为，就业保障立法和最低工资也为人力资本积累及相关的生产率收益创造了条件。[8]

批评者认为，强大的就业保障立法和最低工资趋于降低就业，阻碍生产率增长，可能导致立法受益者和非受益者之间的社会分割。根据这种观点，就业保障立法和最低工资提高了劳动成本，将低技能工人、青年人口和女性推入失业状态或非正规领域就业，从而扩大了贫穷。[9] 雇用限制和终止雇用限制可以减缓劳动力的再分配，从而遏制生产率增长。最后，由于就业保障立法和最低工资常常被视为社会契约的组成部分，当环境发生变化时，社会很难对其进行改革，从而产生不满情绪甚至冲突。[10]

总体的效果是适度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新的数据和更严格的方法已经引起了对劳工发挥效果的实证研究。[11] 这些研究审视了就业保障立法和最低工资对就业、工资和工资分布的影响，而且也对其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较小程度的研究。鲜有研究审视就业保障立法和最低工资对更广泛的社会凝聚力的影响。

在这一波新的研究的基础上，就业保障立法和最低工资的总体影响比讨论的密度所显示的影响小（见表 8.1 和表 8.2）。[12] 大多数对就业水平影响的估测趋于不大或适度。[13] 例如，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就业保障立法的研究显示了不同的结果：阿根廷、哥伦

表 8.1　出现了新一波的关于就业保障立法影响的实证证据

维　度	指　标	结　果	评　论
生活水平	总就业和失业	对就业（失业）或者没有影响，或者具有中等的负面（积极）影响	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拉丁美洲国家）的证据；结果趋于有活力的
	特定群体就业	壮年男性受到有利影响；青年、女性和低技能工人受到不利影响	双轨劳动力市场的部分改革导致受到影响的群体面临更多有害的就业形式
	就业动态	就业、失业和游离于劳动力之外的时间较长，不同类型工作状况之间较小的流动	
	应对冲击的调整	冲击的负面影响增加	未达成强烈的共识
	工资分布	工资分散性降低	
生产率	劳动和多因素生产率增长	未形成一致的结论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证据很少
	培训	积极影响	就业延续期限的延长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提高
	技术变革	负面影响	鲜有研究
	劳动力的再分配	由于劳动力流动较少引起的负面影响	
社会凝聚力	公正	雇主社会责任的标志	取决于执行力度和覆盖范围；“双轨”管制可能被视为是不公平的
	安全	由于就业期限较长而具有积极意义	取决于执行力度和覆盖范围
	平等	较高的工资平等度对收入分布具有适度的平等化影响	主要是工业国家的证据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Betcherman 2012，基于对就业保障立法实证研究的综述。
注释：EPL 即就业保障立法。

表 8.2 最低工资的影响是劳动经济学所热衷的研究课题

维 度	指 标	结 果	评 论
生活水平	总就业	或者没有影响，或者适度的负面影响	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工业国家；一些研究显示了积极的就业影响
	特定群体的就业	负面就业影响集中在青年工人和低技能工人身上	一些研究显示了积极的就业影响
	工资	积极效果	围绕最低工资的效果最强烈
	工资分布	降低了工资的不平等程度	
	贫穷	减少了贫穷	一些研究没有发现影响
生产率	劳工和全要素生产率	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很少得到分析
社会凝聚力	公平	提供“体面的”工资	取决于执行力和覆盖面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Betcherman 2012，基于对最低工资实证研究的综述。

比亚和秘鲁的就业安全规则对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巴西和一些加勒比国家则没有明显的重大影响。对智利的不同研究显示了不同的结果。[14] 总体上，大多数最低工资研究的确发现了对就业，特别是对青年人就业的负面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大，一些研究认为没有影响，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存在积极效应。[15] 就业保障立法和最低工资可能使就业从青年人口、女性和较低技能的工人转移到壮年男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16] 在一国之内的影响可能不同。在印度尼西亚，20 世纪 90 年代最低工资的增加对小公司的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对大公司没有影响。[17] 在不同国家中，劳动保障立法和最低工资均与工资不平等的降低相关。[18]

就业保障立法具有明显的动态效果，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延长了就业和失业的时间。[19] 这样，严厉的就业安全规则滞缓了劳动力的再分配，限制了创造性破坏的效率收益。然而关于就业保障立法对生产率的整体影响的研究结果参差不一，一些研究发现了其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一些发现了正面影响或没有重大影响。[20] 结果的参差不一可能是由就业安全规定的其他影响引起的，比如投资培训的动力，这可能抵消低劳动力再分配率的影响。一些国家已经试图通过实行扩大非永久性就业范围的部分（“双轨”）改革来降低就业保障立法的影响。然而，除非同时降低对永久性工作的保护，否则这种方法似乎以更多的弱势群体成员陷入更有害的就业形式而告终。[21]

在许多不规范领域规模很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就业保障立法和最低工资的影响一般不大，部分原因在于覆盖面窄和执行不力。在巴西执行力强的城市里，强大的就业安全规则对就业产生负面的影响。[22] 话语权机制和代表机制及政府有效实施规则的能力对执行效果具有影响。当然，不当规则和薄弱执行力并不是应对劳动力市场缺陷的理想组合。

但是许多国家似乎将就业保障立法和最低工资设定在对就业或生产率产生适度影响的范围之内。在这个范围内，或“平台地带”，效率提高和效率降低同时存在，而且大部分效果是可以重新分配的。在被法规覆盖的群体中，分配效应倾向于均等化，但是被法规覆盖的群体和不被法规覆盖的群体之间的分裂可能被加剧。由于平台地带的效率效果相对适度，国家可以根据其对再分配标准的取舍决定自

身在平台地带的位置。

但是平台地带的边缘是悬崖

然而，当接近平台地带的边缘时（无论是太严厉或是太松弛），影响负面会更强。一些研究发现，在印度，就业保障立法更严苛的省里，就业和产出要低出很多，在纠纷解决无效或昂贵的地方，这种效果是最强大的。[23]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哥伦比亚最低工资的大幅度上升导致了就业的严重损失，这一时期微弱的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损失。[24] 平台地带的边缘因国家的情况而不同，在平台地带的边缘，劳动法规可以减少城市，或全球价值的就业创造，可以引起国家错失以就业支持聚集效应和知识外溢的机会。放弃城市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收益将是跌落悬崖的路径之一。

但是接下来，最低限度的管制并不就是答案。如果规则过于无力，或规则得不到执行，信息匮乏、谈判力不平等或风险管理不足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和过度的劳动力市场僵化相比，悬崖也许没那么明显，但是悬崖却是真实存在的。

确立应对劳动力市场缺陷但却不落在平台地带之外的就业保障立法和最低工资是主要的挑战。平台地带的边缘因国家而异，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也会不同。以巴西为例，20 世纪 90 年代，最低工资对就业具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在随后的十年，尽管相对于平均工资，最低工资在上涨，最低工资对就业没有产生负面的影响，[25] 那么，密切监控最低工资的影响并反映在规则的制定、执行及其与其他制度的互动就很重要了。[26] 尽管就业保障立法和最低工资可能不能有效应对劳动力市场的缺陷，大多数国家缺少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

集体代表：话语权的新形式

集体谈判和其他形式的“话语权”可以以一种提高生产率、就业安全和收入的形式应对工作场所的信息失灵问题。例如，工人可能具有决策者所没有的关于生产和运营的详细知识。雇主可能被告知在经营中与工人相关、对工人有益的某些方面。通过提供解决冲突和减少亏本经营，信息共享可以产生额外的效率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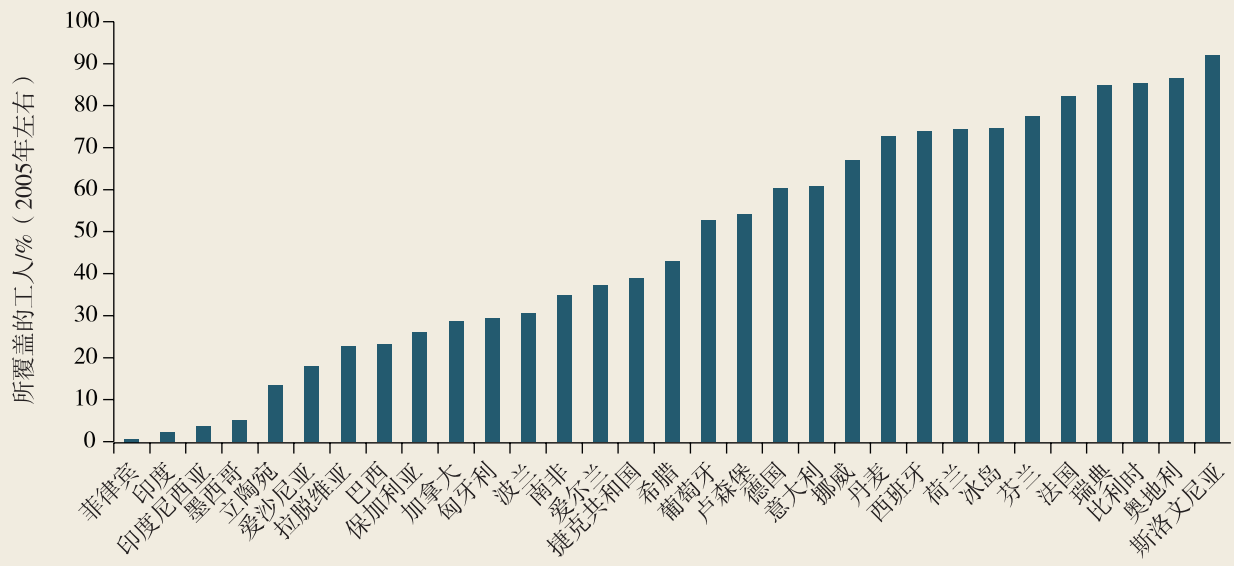
集体代表和谈判也可以应对市场力量不平衡的问题，市场力量不平衡时，公司可能可以把与竞争环境中相比较低的工资或较恶劣的工作条件强加给个体工人。

公司与工人之间的谈判

在世界范围内，工会和集体谈判的覆盖率差别很大（见图 8.2）。发展中国家的覆盖率一般不高，公务员系统或受保护领域之外的工人很少参加工作。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大多数具有定期数据的国家的集体谈判协议的覆盖范围都减少了。[27] 就业向服务业领域的转移、全球化、技术进步、演进中的社会价值和立法变化，所有这些因素都被列为集体谈判协议覆盖范围缩小的原因。[28]

众多证据确认存在有利于工会成员及集体协议所覆盖的其他工人的工资溢价。调整的工会工资效应（参照其他因素）的估测值在日本和韩国的 5%左右到巴西、加拿大、德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和美国等如此不同的国家中高至 15%的比例之间浮动。[29] 南非高居顶端，尽管工会工资效应到底有多高还存在着争议（见专栏 8.2）。工资效应对女性影响最大，在工会成员数量很高的国家影响也最大。工会

图 8.2 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谈判覆盖率不高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ICTWSS 数据库，Visser 2011，及世界银行 2011b。
注释：所述变量基于工会成员数量或集体谈判覆盖数量在总就业数量中的比例。

和集体谈判通过减少工资差异对收入分配产生均等化效应也具有明显的影响。研究已经显示，在工会密度增加的时期，工资不平等程度降低，在工会成员减少的时期，工资不平等程度上升。[30] 关于工会对贫穷的影响，证据很少。

一个具有相关性的问题是，工会工资收益是否是以就业的减少为代价的。遗憾的是，鲜有研究应对发展中国家的这个问题。在工业国家里，研究的结果分为两种，一种是发现工会减少了就业（或增加了失业），另一种是发现工会没有太大的影响。在发现负面影响的国家，影响的程度也是适度的。经合组织的最近估测发现，工会的覆盖率每降低 10 个百分点，就业率就增加 0.8 个百分点。[31]

工业关系和生产率

集体谈判力对生产率的影响反映了两大相悖力量的平衡。一方面，话语权可能导致更好的信息共享，而工会组织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可能促使管理部门加大对培训和技术的投资力度，从而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工会也可能就工作的时间和薪水原则展开磋商，这会降低取得的效果，阻碍生产率的提高。这样，这些力量的净效应就成了实证的问题。在美国和欧洲搜集的关于生产率的证据并不是包容性的。[32] 在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墨西哥和乌拉圭的效果是正面的，但是巴西的效果是负面的。[33] 结果显示，和没有成立工会的企业相比，成立了工会的公司的培训更多。但是引入新技术的差异并不是特别明显。

国家间集体谈判的制度结构的差异可能很大，尤其是集中和协调程度方面的差异可能很大。谈判的安排各不相同，从对其他公司没有影响的公司层面的谈判到行业层面和全国层面的集体谈判，种种不一。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研究者发现无论是集体谈判还是分散谈判都带来了较好的就业绩效。然而自此以后，分析的可信性

专栏 8.2　磋商委员会是造成南非失业问题的原因吗?

南非的失业率远远超过了 20%，南非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大相径庭，其一般特征是公开失业率不高或适度。关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众说纷纭，其中包括增长集中在低劳动密集领域，技能赤字，社会福利引起的工作意愿的降低及种族隔离制度的众多遗留问题。南非引人瞩目的集体磋商安排也常常被认为是就业匮乏的可能原因。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南非制造业领域就工资和工作条件展开的大多数磋商是通过工业委员会进行的，并不是磋商委员会。磋商委员会可以要求协议延伸到整个领域，将没有参与磋商的雇主和工人包括进去。延伸很普遍，但是也因领域和地区而有很大不同。公司层面的磋商也会发生。有人认为磋商委员会协议在全领域的延伸极大增加了小公司的劳动力成本负担，削弱了就业创造。[a]

工会成员工资溢价高达 60%的估测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某些可信度。[b] 工资效应的相当一部分与可能受到委员会影响的行业有关。使用更新数据和更好方法的后续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早期研究夸大估测了磋商委员会协议对实际工资的影响。最近研究认为工资溢价在 10%~20%之间波动。[c] 这一水平很大，但是与其他国家观察到的工会工资差异更相契合。证据也显示磋商委员会的延伸的确具有影响，在磋商委员会的制度内使非工会工人的工资增加了 10%。[d]

这些结果意味着南非的工资制定制度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就业效应，在根据国际标准对总就业贡献不大的小公司中尤其如此。据估计，磋商委员会直接覆盖的公司中，就业率降低了 8%~13%，小工种的就业率下降了 7%~16%。[e]

尽管这些效果举足轻重，但是磋商委员会只能是南非异乎寻常的高失业率的一小部分原因。考虑到集体协议所覆盖行业所雇用工人的数量，剔除磋商委员会的就业效应至多将使失业率下降 1.5%。[f] 因此，就业创造的主要限制因素可能存在于其他地方。

线索之一是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南非非正规领域的规模相对较小。南非和其他国家也有其他不同的方面。在种族隔离期间，贫民窟拆迁、难以取得许可证和土地管制分区剥夺了城市中黑人主导的非正规领域的利基市场。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二十年后，空间分割依然存在，对黑人主导地区的投资依然很低。[g] 种族分割的遗留问题也提高了失业人口的交通成本，失业人口倾向于在远离工作所在地的地方居住。因此，南非的就业创造问题可能主要是由城市问题引起的。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Butcher 和 Rouse 2001。
b. Schultz 和 Mwabu 1998。
c. Magruder 2010。
d. Bhorat，Goga 和 van der Westerhuizen 2011。
e. Magruder 2010。
f. Godfrey 等 2010；Magruder 2010。
g. Banerjee 等 2007；Kingdon 和 Knight 2004。

降低了。[34]

随着政策的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扩大了工人的代表名额，集体谈判的新形式也正在涌现。以中国为例，一系列立法改革似乎为工会和集体谈判协议的蓬勃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见专栏 8.3）。

公司之外的话语

雇主组织和工会也发挥着社会代理人和政治代理人的作用，它们可能对调整劳动力市场的法律甚至对劳工关系领域之外的政策施加影响。这类干涉的性质取决于它们所在社会的规范和制度框架。历史上，劳工工会促进了许多国家社会权利和劳工权利的建立，也促进了政治变革。例如波兰工会联盟 Solidarność在反对共产主义统治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而南非工会联盟在反对种族隔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工会组织涉足政治活动会削弱其在工作场所的活动。[35] 由于工会在公务员系统和受保护领域中的成员很多，工会也常常反对涉及财政统一、私有化或自由化的改革。对改革时期经济绩效的对比发现，在工会成员比例较

专栏 8.3 集体磋商的新形式正在中国兴起

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劳工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其中包括新法律的颁布实施，这些法律涉及工会（2001 年）和就业促进、劳动合同及劳动纠纷调解与仲裁（2007 年）。随之而来的是工会成员工人、工资工人或集体协议工人数量的激增（目前超过了 1.5 亿人）。除了工会和集体协议的扩张，国际劳工组织记录了工人直接选举工会代表的形式的逐渐扩大。这种变革反映了政策从“旨在更好地保护工人权利”转向“创造灵活性和安全之间新的平衡并促进雇主与工人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对话。”[a]

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地方性的、基于部门的集体磋商协议的引入。浙江省温岭县新河镇的羊毛衫制造业 2003 年达成的协议是这类协议中的第一份。[b] 该地区作为透明度和地方民主的典范而闻名。自此，浙江省的这类协议就最为普遍，但是这类协议也扩散到沿海省区。[c] 这类地方性的、基于部门的磋商绝大部分兴起于工业集群所在的地区或乡村。到 2010 年年底，这种形式的磋商通过 73 000 份协议覆盖了 500 万工人。[d]

地方性的、部门集体磋商协议的扩散是在蓬勃发展的私营领域日益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和规则不健全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众多破坏性劳动纠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协议似乎更有效地保护了工人的权利。[e] 同时，私营领域也可以从其与工人更稳定的关系、更可靠的劳动力供应和更规范、更透明的劳动成本变化中受益。

在政府鼓励下，中国集体代表的形式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尽管关于这些变革的影响证据只是逐渐兴起，一些研究显示，地区或地方层面的部门磋商最有希望。[f] 政府采取了“自上而下”的集体努力来促进这些协议的扩散，然而收效有限。但是这种集体磋商空间组织的自发扩散表明，它极度符合私营领域协调工业集群的运营与工人在工作场所话语权权益之间关系的利益。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Lee 和 Liu 2011a；2011b，8。

b. Wei 等 2009。

c. 通过将公共磋商引入这一过程，温岭县新河镇还引领了全国地方预算透明度增加的进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011。

d. workercn.cn 2011。

e. Liu 2010。

f. Liu 2010。

高、公共领域（是大多数工会成员工人就业的领域）就业比例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中，在采取主要改革和比较缓慢的恢复之后，经济活动经历了较严重的衰退。[36] 该发现与随后采取的改革是契合的，改革的实施也大打折扣。另外，最低工资水平和社会安全福利并不对绩效产生影响，这表明工会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由其政治活动而不是其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引起的。

围绕雇主—雇员关系组织起来的工会组织并不适合代表那些不为工资工作的工人讲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就业的高覆盖率以及更广泛的不规范领域的顽固存在，为创建创新性的集体代表制度提供了动力。这些制度有别于传统的工会，因为这些制度所应对的市场不健全问题和制度失灵问题并不涉及传统的雇主—雇员关系或基于工作场所的生产结构。这些制度是为在特定城市机构或地方政府中代表成员利益而组织起来的。

自就业工人协会正在成长为要求和保护成员权利、改善工作条件的途径。其中一些协会受到了 40 多年前创建的印度自就业女性协会（SEWA）的启示。在许多情况下，秘鲁利马的街贩群体或印度浦那的垃圾清理工群体可能不仅与政府机构磋商，也诉诸法庭。哥伦比亚波哥大捡垃圾者组织起来捍卫他们为城市提供服务的权利（见专栏 8.4）。南非德班的街贩协会向法庭提起的反对建设购物中心、反对市政当局扰乱和没收他们商品存货的诉讼堆积如山。[37]

这些非传统的工人组织正在日益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等全球性制度。例如，为准备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国际

专栏 8.4　废品回收者迫使波哥大改革固体垃圾管理政策

捡垃圾者，或者说废品回收者（recicladores）是哥伦比亚首都依靠回收金属、纸板、纸张、塑料和玻璃并通过中间人出售这些废品而谋生的人。先抛开效率不提，他们的经历表明了非正规工人协会如何利用法律机制获得权利。

当公共服务竞标改革允许市政府将收集、运输和处理垃圾及可循环再用品的排他性合同给予私营公司时，废品回收者组织并提起了法律要求。波哥大废品回收者协会是代表 25 000 名捡垃圾者的总协会，波哥大废品回收者协会等组织在汇总各种要求和推动案件进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找到根据，波哥大废品回收者协会转向宪法的“权利平等”，认为捡垃圾者在政府管理垃圾合同的投标和竞标过程中应该得到优惠待遇和司法肯定性行动。

2003 年，宪法法庭判定市政府卫生服务的招标过程侵犯了捡垃圾者的基本权利。随后的案件参考了包括作为“生命权”表述方式的“生存权”在内的宪法条款。法庭援引《宪法》第 11 条，认为捡垃圾是维持生存的权利和“追求经营和贸易权”。法庭援引《宪法》第 333 条，认为捡垃圾者合作社，而不仅仅是公司，可以参与废品回收市场竞争。最近的诉讼发生在 2011 年 12 月，该诉讼撤销了在城市中收集和移除垃圾、金额为 13.7 亿美元的合同。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Chen 等 2012。

劳工大会上讨论和投票新的国际劳工组织家政工人公约，国际家政工人网络参与了 2009 年的国际劳工大会。[38]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在限制中实现效率

通过在雇主和求职者之间传递关于工作空缺和工人特征的信息，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ALMPs）可以提高工作匹配的效率。当雇主或工人因为各种市场失灵问题而对培训的投资不足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会填补这一空缺，而且通过为工人提供临时的就业或激励雇主雇用劳动力，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可以减缓经济衰退的影响。对急于为创造就业做点儿事情的政府而言，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具有政治吸引力。

最普遍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包括求职协助、工资补贴、培训和公共工程。[39] 就规模而言，干预措施既包括大型的公共工程计划，比如为印度农村地区数百万人口提供工作的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也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为小规模青年参与者量身定制的生活技能课程。所有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都努力去培育新的工作机会，这些工作机会常常是针对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机会最少的人口的。

方案概览

求职协助。求职协助是提供工作空缺和求职信息及咨询和实习支持的服务。评估显示，求职协助可以改善就业和收入状况，而且成本很低，但是只有在存在职位空缺的情况下才如此。通过提供信息和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更有效的工作匹配可以产生积极的生产率效应。但是在大多数工人是农民和自就业的国家中，求职协助的相关性不高。

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拥有大型正规劳动力市场的高收入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对求职协助进行了彻底整顿。尽管公共资助仍然是规范，私营领域提供的服务更加普遍了。绩效合同正在被用于激励提供商。这些合同必须确保提供商的触角延伸到最需要服务的人口，而不只是集中在容易被安置的人群身上。[40] 求职支持正在日益融入一系列互补性的服务中，例如评估机会、生存技能或其他培训。要求求职者具有蓬勃朝气的“激活”

策论也正在日益普及。最后，求职服务的工程取决于提供商满足雇主需求的能力。[41]

目前，潜在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创新正在延伸传统中介的覆盖范围。[42]移动电话和因特网为普惠性的信息获得创造了机会，将未注册的公司和难以联系的青年纳入了联系网络。新行动者，既包括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已经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中崛起并提供服务（见专栏 8.5）。

工资补贴。为鼓励雇主雇用新的工人或留用原本可能下岗的工人，政府为雇主提供直接的转移支付或降低他们的税负，或降低他们的社会保障缴款。工资补贴在以特定的群体为目标对象时最有效，例如需要机会展示自身技能的年轻人，或因长期失业而有可能面临遭遇“伤痕”效应风险的人群。[43]但是许多研究显示，工资补贴常常不能以成本节约的方式实现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的满意的效果。[44]

工资补贴的正式成本常常难以计算；公共资金的直接费用只是部分的成本。为获得补贴，企业可能以合格的工人替换不合格的工人，或者在补贴方案下解雇一个人，然后再雇用同一个人。如果企业以何种方法雇用都算数，那么补贴对就业的影响效果就是零。补贴方案设计有助于节约成本。土耳其的一项补贴方案改善了方案的目标针对性和其他特征，从而降低了这种“无谓的损失”，尽管在所有补贴性的工作中，仍有一部分工作的创造没有得到补贴，这一部分工作的比例在 25%~50%之间波动。[45]合理的成本核算可以使工资补贴对就业的估测影响减少到 90%。[46]因此即使在最好的

专栏 8.5　就业 E—联系，新技术开辟新疆域

新技术正在彻底改革人们与就业的联系方式。移动电话被广泛使用，已经渗透到世界范围内的低收入家庭中。拥有手机的人口超过了 40 亿，15 亿人口可以固定使用因特网服务。

短信息、语言通话和移动手机的应用给求职者和雇主提供信息，并且提供完善简历、提高面试技能和建立网络关系的咨询服务。基于语音的服务对目不识丁的求职者而言尤其重要。Souktel 公司、保障劳工组织（Assured labour）、Babajob 公司和劳工网（Labournet）等公司或非营利组织已经建立了活跃的工作匹配网络，这些公司或组织在拉丁美洲、印度和中东等差异很大的地方运营。以 Souktel 公司为例，仅仅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就有 17 000 名求职者和 600 多家注册的公司。60%的注册雇主认为他们的招聘时间和成本降低了 50%以上。

一些组织，诸如保障劳工组织，专门为中等工资到低工资的工人提供服务，这些工人大多数没有大学学历。目前在墨西哥，保障劳工组织拥有 15 万名注册的求职者和 2 000 家注册的雇主。同样，印度的 Babajob 公司为 20 万名求职者提供服务，他们可以在拥有 4 万家雇主的数据库中寻找工作，劳工网为 10 万名求职者提供服务，他们可以在 4.5 万家雇主的数据库中寻找工作。劳工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提供服务，以建筑业和物业管理等领域为中心。

尽管这些公司和组织一直很成功，海地的 Konbit 公司和巴基斯坦的 PULS 公司却不得不克服严重的困难。它们所面临的困难包括吸引足够数量的求职者和雇主，在用户之间建立信任及充分保证求职者的质量。为应对这些困难，Konbit 公司已经通过与地方的一名著名电台节目主持人和移动电话提供商合作宣传其服务，从而增加用户的数量。通过这些努力，公司在一个月内成功吸引了 1 万名求职者。

因特网也通过在线平台将求职者和雇主联系起来。大型的、迅速成长的 oDesk 网站将世界范围内的 35 万家公司（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体承包商联系起来。从 2012 年 4~6 月，oDesk 网站在线发布了将近 45 万份工作和 28 万多份求职申请。工作包括从打字、网页搜寻、翻译到软件开发和后勤法律服务等一系列工作。每小时工资从 1 美元到几百美元不等。尽管这种新事物具有创造新的就业并产生大量新财富的潜力，在线平台一般视为具有专业技能和技术技能的群体服务，因此，很少能覆盖最弱势的群体。

资料来源：基于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Selim 2012 和监控普惠性市场 2011。

情况下，其对就业的总体影响也不高。替代性设计方案，尤其是能延伸到青年人口和低技能人口的方案，可以包括与其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比如培训）相联系的工资补贴。[47] Jóvenes 方案和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类似的干预措施采用了这种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模式。[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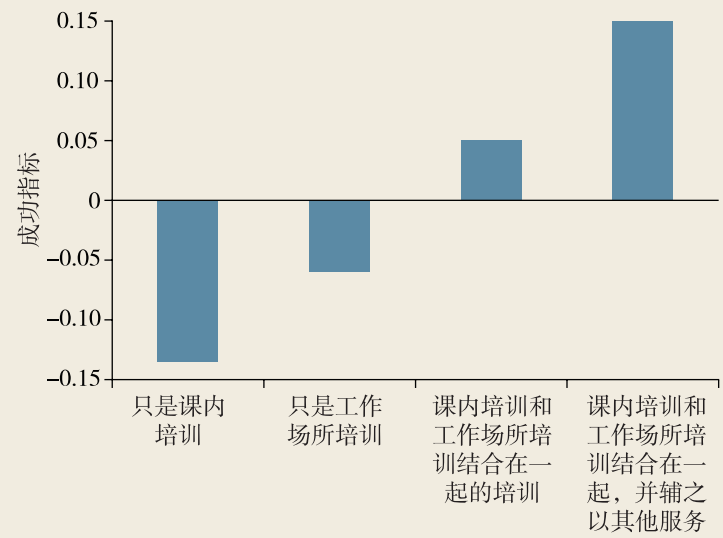
工资补贴的影响趋向于随着目标针对性和受益群体的弱势程度而加大。在摩洛哥，Idmaj 青年工资补贴有效缓解了受益者的劳动力市场准入。[49] 阿根廷为雇用曾经参与过大型公共工程项目的人员的雇主提供补贴。这些工人在找工作时更努力，被视为比同类工人更可信赖的工人。对女性参与者和青年而言尤其如此。[50] 但是目标对象越狭窄，耻辱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大。事实上在波兰，有资格领取工资补贴的男性被雇用的可能性反倒较低。[51]

求职者培训。培训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日益扩大的效果评估强调将所教技能与劳动需求结合起来的重要性。这些评估显示，正向福利并不能得到保障，而方案的成本却可能是巨大的。然而，如果方案设计合理，执行有效，这些方案可以使那些工作机会最少的人受益最大。在拉丁美洲国家和罗马尼亚等转型中经济体中，青年和女性因培训获得成功的成功率远远高于中年男性。[52]

某些设计特征对于成功至关重要，同时包括在职培训和课内培训的一体化方案也有收益。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目前针对求职者的培训常常沿用这种一体化模式，有时候还辅之以生活技能培训和咨询等服务。这类联合增加了成功率（见图 8.3）。[53] 拉丁美洲的 Jóvenes 方案将生活技能和技术培训与工作经验结合起来，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在哥伦比亚，青年在行动（Jóvenes en Acción）增加了培训生的就业率，据估计，女性参与者的回报率在 13.5%~25%之间浮动。[54] 此外，供应商需要激励措施来确保他们提供的培训与雇主的需求相关。公共服务机构对公司和求职者不断变化的需求的响应常常过慢。在一国制度能力和培训组织供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公共培训资金可以以竞争的方式导入私营和非营利供应商。基于绩效的竞标可以为提供更相关的培训创造激励，而合同的制定则要遵循不损害最难被覆盖的群体的利益的原则。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公共就业服务通过公共竞标的方式从不同的供应商那里购买培训方案。

研究显示，至少有一些培训方案有助于建立信任和扩大民众参与，但是关于这是如何发生的信息却很少。在突尼斯，将企业家能力培训纳入教育的课程改革提高了参与者对未来的乐观情绪。[55]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青

图 8.3　将工作和培训联合起来的方法提高了成功率



资料来源：Fares 和 Puerto 2009。
注释：图表显示了培训类型和方案已汇报的成功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这里成功被定义为提高了就业率或收入，而且是节省成本型的。

年与就业（Juventudy Empleo）方案的参与者对未来的期望可能更高，工作满意度更高，寻找工作的态度更积极。[56] 在乌干达北部，将补贴、职业培训、生活技能和心理咨询结合起来的综合性干预措施成功提高了社区的参与率。[57]

公共工程。这些项目提供短期的工资就业或提供食物。来自效果评估的证据显示，公共工程项目可以发挥安全网的作用，在其以最需要工作的人群为目标对象时尤其如此。[58] 正如哥伦比亚的青年在行动（Empleo en Acción）项目和阿根廷的 Trabajar 项目那样，谨慎设定工资水平可以是自我针对性的工具。印度的 MGNREGA 项目使用了类似的目标针对性方法，该项目不仅因其规模和成本，而且因其基于权利的保障就业的方法而驰名（见专栏 8.6）。

但是公共工程很少成为未来更好就业的跳板。鲜有证据表明公共工程有助于参与者在离开公共工程项目之后的就业[59]。和其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相比，公共工程项目结束后的安置率最低，单位的成本最高（见图 8.4）。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公共工程甚至对就业率产生了负面影响。[60] 因此，公共工程对生产率的影响，最好的结果都很低。

公共工程项目要成为就业阶梯，就需要超越减贫的目标，减贫是一些国家已经采取的路线。在萨尔瓦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共工程项目的参与者获得了额外的技术和生活技能支持。在塞拉利昂，项目与强制性识字培训和计算培训相结合，在利比里亚与技能培训相结合。在孟加拉国，农村就业计划的受益者被引向微型金融机构，在项目结束三年后，仍然有将近 80%的参与者在小型企业活动中自就业。[61] 但是总体而言，成功改善参与者长期就业状况的公共工程项目寥寥无几。

然而公共工程具有提高社会凝聚力的潜力，尤其是在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中。塞拉利昂冲突结束后不久，国家启动了工作福利制，帮助重建基础设施，为贫穷人口和前战斗人员提供短期就业机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利比里亚和也门共和国也启动并扩大其公共工程项目。在塞尔维亚，公共工程项目使参与者感到社会对自己更加包容。[62]

努力提供更好的成果

尽管许多方案满足了具有不同就业挑战的国家的期望，其他许多方案并没有成功改善参与者的状况。而且，尽管某些方案是可承受的，其他方案却代价高昂。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的成果取决于方案的设计，但是也取决于国家持续提供国家层面服务的制度能力。

近年来，为取得更好的绩效，许多国家修订了方案和政策设计。公共资金对私营或非营利供应商的资助持续增加。在老龄化和规范化国家里，国家越来越要求求职者的随时就业态度，要保留失业和其他社会福利的资格。通过参与培训或教育课程，使用咨询和其他就业服务或公共工程，这类激励措施为求职者创造了动力。

许多工业国家正在通过管理社会福利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的“一站式购物”实施这类政策。德国的就业中心和英国的就业中心就是典范。原则上这类一体化的方法有助于工人维持或创造在社会中的联系，尽管有关证据不足。[63] “一站式购物”模式在国情相差很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阿根廷、阿塞拜疆和保加利亚）中劲头正猛。

另一重大的提供改革是加大对识

专栏 8.6　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启动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印度积极应用公共工程项目。但是没有机会就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MGNEEGA）的规模划定范围或确定预算。该项目启动于 2006 年，分三个阶段实施，为所有拥有农业人口的地区提供就业保障。项目旨在提供工资就业，提高农村贫穷人口的购买力，为社区创造资产，强化自然资源管理，培育社会和性别平等。[a]

该项目为农村家庭中有意从事非技能工作的成年成员提供每年高达 100 天的就业保障，工资和国家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大体相当。[b] 有意参加项目的农村家庭到各自的村庄委员会登记，并免费领取一张带有照片的工作卡，照片包括所有的家庭成员。工作卡拥有者可能申请就业，而政府必须在 15 天内为其提供就业。如果政府未能提供就业，原则上必须给申请者提供每日失业补贴。每一个家庭自行决定如何在家庭成员中分配就业机会。日工资根据所完成工作的数量决定，并通过邮局或银行账户直接支付。项目包括提供充分的工地设施，其中包括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凉棚、事故用急救包及为女性离开自己孩子而设立的托儿所。项目鼓励女性参与，这是通过一项女性在雇用工人中的比例应当占到 33%的命令实现的。此外，男女两性的工资必须平等，所提供的工作地距离申请者所在村庄必须在 5 公里之内，而且任何类型的性别歧视都是被禁止的。[c]

在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框架中进行的大多数公共工程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工程不允许承包商参加，不允许使用机器。为反映村庄的优先事项，项目由公开的村庄会议（gram sabhas）选择，而地方委员会在项目的规划、实施和监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项目主要强调发展和维护社区资产，比如水资源保护、灌溉渠道和乡村公路。项目也支持防旱、防洪、土地发展等。中央政府承担总成本的 90%，即参与者的全部工资和 75%的材料和管理费用。[d] 省政府承担 25%的材料和管理成本，日失业补贴以及省就业保障委员会的开支。法案也呼吁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社会审计和第三方监控进行问责。[e]

2006—2007 年是计划实施的第一阶段，预算开支是 24.9 亿美元。项目颁发了 3 700 万张工作卡，平均为 2 100 万个家庭提供了 43 天的就业，就业总量达到 9 亿天。此后，项目的覆盖率和预算都大幅度扩张。在 2010—2011 年财政年度，项目平均为 5 500 万个家庭提供了 47 天的就业，就业总量达到 25 亿天，成本达到 87 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 0.51%）。[f] 这使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作福利制项目。根据管理数据，贫穷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参与率很高。

批评者认为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干扰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运行。项目设定的工资大约为每天 100 印度卢比（相当于 1.8 美元），这样，项目可能有助于在所有零散农村工作中执行某种形式的最低工资。如果这高于正常的工资，项目可能改变零工的供给，挤迫私营雇主。[g] 项目也可能阻碍劳动力流出农业领域进入更具生产率领域的过程。

由于被指控存在腐败、漏损、实施不完全等问题，项目受到了媒体的密切关注。但是鲜有研究尝试以系统的方式对项目对农村家庭、农村劳动力市场和生产率的影响进行评估。在不断涌现的证据中，一个惊人的发现是最需要实施该项目的地区，其参与率并不是最高的。[h] 家庭调查显示了限量配额和需求不能满足的证据，这限制了项目的减贫效果。然而，尽管存在限量配额，项目还是延伸到了贫穷人口，吸引女性和弱势种姓加入劳动力大军中去。[i] 对安得拉省的一项研究显示，项目提高了食品和非食品商品的支出。[j] 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影响和对劳动力再分配影响的证据仍然难以给出结论。该项目对非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寥寥无几。

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面临着几项挑战。应对漏损和透明度就是挑战之一。政府认真地应对这一挑战，例如，通过采取生物特征身份鉴别卡等应对这一挑战。改善社区资产的质量和相关性，从而产生较广阔的和长期的效果是另一挑战。但是最大的挑战在于确保满足就业需求，并按时全额支付工资。同样，如果项目的目标在于增加最贫穷人口的收入，项目应该容纳那些身体状况不允许从事艰苦手工劳动的人口。[k]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注释：GDP 即国内生产总值。

a. 农村发展部 2012；世界银行 2011d。

b. 农村发展部 2012。最初，法定最低工资因省区而异。但是 2009 年，中央政府将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的工资与省区层面的法定最低工资脱钩，确立统一的日工资标准，每天 100 印度卢比，并根据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调整。

c. 农村发展部 2008；世界银行 2011d。

d. 世界银行 2011b。

e. 农业发展部 2008。

f. 世界银行 2011b。就其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而言，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障法案可以与最大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比如占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 0.4%的 Progresa 机会和占巴西国内生产总值 0.36%的家庭补助金计划）相提并论。但是就家庭覆盖率而言，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障计划的规模却要胜出一筹。

g. Basu 2011；Basu，Chau 和 Kanbur 2009；Dutta 等 2012；世界银行 2011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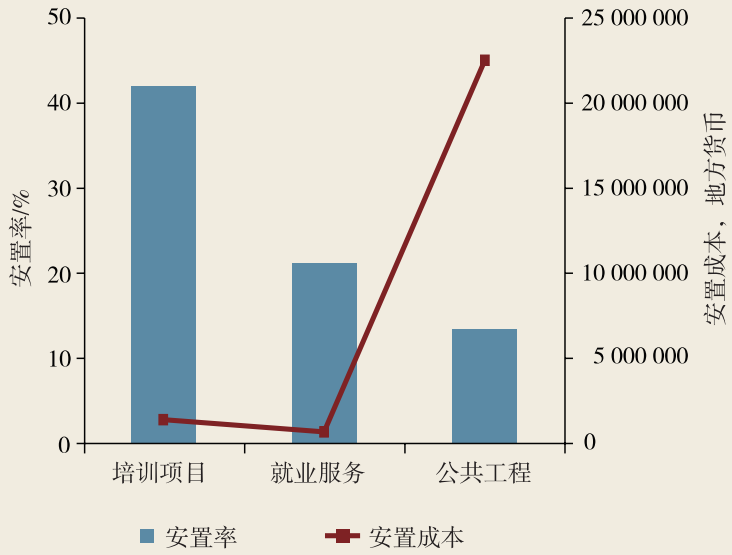
h. Dutta 等 2012。

i. Dutta 等 2012。

j. Ravi 和 Engler 2009。

k. 世界银行 2011d。

图 8.4 在罗马尼亚，公共工程项目的安置率最低，安置成本最高



资料来源：Rodriguez-Planas 和 Benus 2010。
注释：安置率是项目参与者中实现就业的比率。

别求职者面临的就业限制因素的投资力度。阻碍就业的限制因素形形色色，包括技能匮乏、健康问题及难以平衡家庭责任和工作责任。将受益者个体特征和可能的限制因素及适当的补救方案联系在一起的统计监测器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工具，对制度能力卓著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64] 诸如智利 Solidario 方案的综合性方案投入巨额资金，将受益者和基于受益者限制因素的最佳方案联系在一起。

简言之，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可以产生作用，但是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需要顺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其设计要应对阻碍期望就业成果实现的市场不健全和制度失灵问题。总体上，对青年参与的项目的评估显示，就促进就业而言，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比工业国家优异的成果。[65] 时间范围也很重要：在工业国家，培训项目只有在中长期内才会显现它的真实价值。[66] 但是在决定某一具体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是否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时，关键是要完全理解所面临的就业挑战和正确把握所具备的制度能力。

即使出现了这些创新，对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的期望仍然需要克制。只有在企业创造就业岗位的情况下求职和中介机构才能奏效。短期培训并不能解决教育体制中的基本问题。如果根深蒂固的歧视造成人们不再寻找工作，激发式激励将不会带来任何成果。

社会保险：扩大覆盖面的挑战

许多人无力或不愿为应对丢失工作、残疾、养家者的死亡或没有资源的老龄化等主要风险而储蓄。由于保险公司不能准确评估个体风险（逆向选择），由于个体可以影响风险水平（道德风险），市场并不提供足够的风险集合。社会保险是可以应对这类市场失灵问题的潜在的一揽子方案。但是社会保险方案的形成是由历史、价值观和政治决定的，所以社会保险方案的设计并不完全在于提高效率。

一些国家引入了公共失业保险体系，帮助工人减少丢失工作的风险。许多国家设有残废险，为那些因疾病或伤残而影响就业机会的情况提供保险。大多数国家也拥有社会安全网，社会安全网并不直接与就业状况相关，但是在收入不足以满足基本生活水准时，可以提供应对机制。

其他不与劳动力市场风险直接相关的社会保险方案常常与人们所从事的工作或他们的就业状况相关。最重要的是由雇主、雇员或同时由雇主和雇员支付的工薪税（社会保障缴费）资助的老年人退休金和健康保险计划。这些福利由公共提供，原因在于保险市场的不健全，而不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然而，这些社会保险方案对所创造的就业类型具有重要影响，

从而对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工薪税资助这些方案可以影响劳动力需求及雇主是否选择将提供保险作为就业合同的组成部分。这些方法也可以影响工人的行为，包括他们接受、保有和转换工作的动机，在正规或非正规领域工作及涉足高风险、高回报工作的行为。

从工作的角度看，主要问题包括两方面，即如何管理劳动力市场风险和如何设定其他类型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从而对就业产生最有利的影响。

管理劳动力市场风险

在低收入国家，管理收入损失比管理就业损失更重要。当大多数人口从事糊口农业或自就业时，公开失业并不是普遍现象。在这种环境下，社会安全网络，包括非摊缴性现金转移和公共工程计划，对应对这些不利冲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67]

但是当工资就业更普遍时，失业保险就可能是更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失业保险可以为丢失工作的工人提供收入支持，防止个体和家庭陷入贫穷。通过提供求职协助，它可能带来更好的工作匹配和效率收益。然而有效的覆盖远远没有实现；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在近期的金融危机中，世界上享有这些福利的失业工人仅有 15%。[68] 失业福利体制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它可能降低人们保有工作、寻找工作或接受工作机会的动机。大多数失业福利对动机影响的证据来自工业国家，这些证据正反不一。一些研究发现了更优厚的福利，无论是通过提高福利水平还是延长福利期限的方式，都可以延长失业期或提高失业率。[69] 当福利失效时，失业退出率通常会增加。[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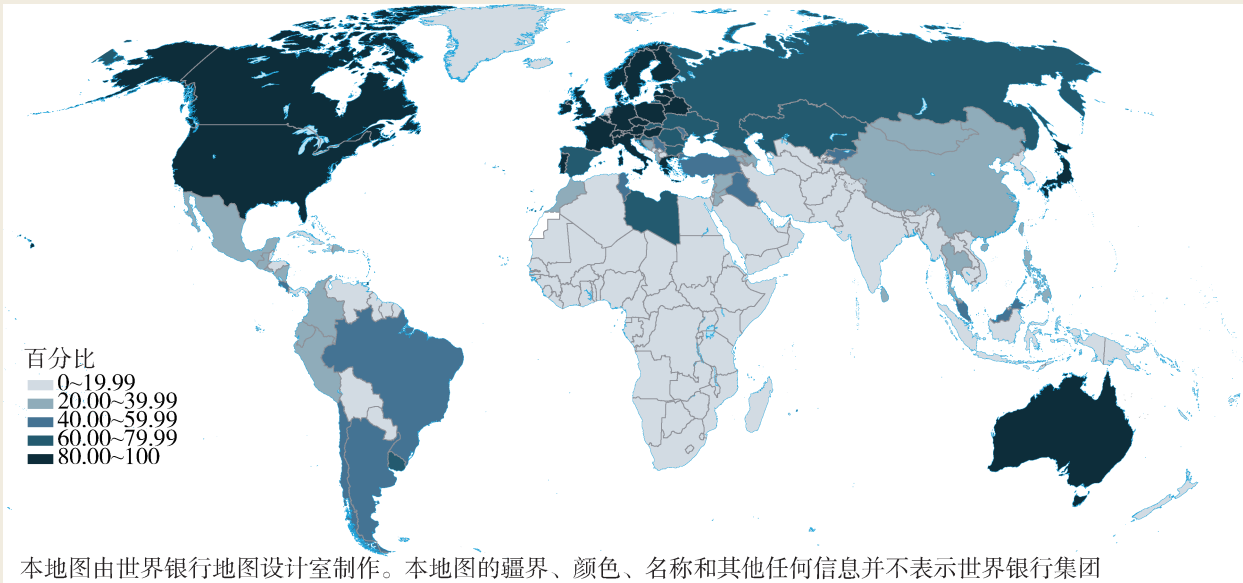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些国家对失业保险资格和福利进行改革，以减少降低求职积极性的障碍因素。尽管某些阻碍效应是任何就业保险体系都有的内生效应，近期对丹麦、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即使工人在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失业状态，他们最终也能够找到稳定的工作。[71] 对巴西失业保险的研究发现，福利对失业的期限没有影响，工人从失业转向自就业则是例外。在这种情况下转型期会缩短，这表明福利使工人可能开始经营新生意。[72]

对求职阻碍因素和隐性再分配的担忧引起了对失业保险储蓄账户的兴趣。尽管计划可能不同，工人向账户缴费，在失业期间可以从账户提钱。工人退休时可以提取余额，可以用于退休金补贴。一些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国家，但也包括奥地利和约旦，已经采纳储蓄账户作为基于保险的方案的替代性方法。但是保险储蓄账户并不允许风险集中，因此青年工人和经常失业的工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储蓄。为应对这一问题，一些计划具有了再分配的特征。例如，智利的计划包括统一基金，为那些失业期间账户余额过低的工人提供足够的收入支持。

残疾在任何国家都是重要的劳动力市场风险。根据近期的估测，残疾的发生率约为成年人口的 15%。在低收入国家和老龄化社会中，这一比率更高。[73] 尽管许多残疾人口参加工作，但是残疾人口的不作为率要比整体人口的不作为率高出许多。在工业国家里，残疾人的不作为率比非残疾人口的不作为率高出 2.5 倍。[74]

残疾福利可以提供重要的收入保护，但是在一些国家成本在攀升，而且福利可能创造正常人工作意愿降低的动机。为残疾人提供食宿是鼓励残疾人寻求就业的重要战略。也可以根据这一目的调整福利体制。就业支付、

地图 8.1　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险覆盖率持续不高



本地图由世界银行地图设计室制作。本地图的疆界、颜色、名称和其他任何信息并不表示世界银行集团对任何地区法律地位的看法，也不意味着对这些疆界的认可或接受。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Pallares-Miralles 等 2012 和加拿大的行政管理数据绘制。
注释：覆盖率系指向收入相关的强制性退休金计划缴费（基准年中至少一个月）的人口的数量，以其在劳动力中的比例来衡量。

时限福利和工作税务补助均在欧盟得到检验。[75] 不实行残疾福利的国家需要重视食宿，在残疾与贫穷相关的地方依靠社会安全网络。

为社会保险提供资金

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险计划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覆盖率不高。[76] 世界上享有社会保险福利的工人仅有 30%，非洲和亚洲的比例不足 25%（见地图8.1）。从平均数字来看，老龄化社会和规范化社会的覆盖率最高，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和农业经济体的覆盖率最低，工作人口参加退休金计划的比例不足 10%。一般而言，低收入工人是最不可能被覆盖的群体。在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中，收入最底端的20%人口的覆盖率不足 10%，但是收入最顶端的 20%人口的覆盖率却高达50%以上。[77] 即使理论上社会保险覆盖这些工人，他们也未必能得到福利。财政压力和低执行能力可能降低有效的覆盖率。

覆盖率不高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资助计划的财政空间有限，管理福利治理与提供的制度能力薄弱，覆盖某些群体而不覆盖其他群体的计划的分割性，以及计划的设计不足以吸引人参与计划。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领域的工人和企业一般落在计划的范围之外。计划尤其难以延伸到自就业者、农民和移民身上。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险法案并不覆盖微型企业和小企业，或者这些企业和农场因为承担不起最低缴费成本而选择不参与计划。[78] 执行能力薄弱也是导致覆盖率不高的原因。

在大多数国家，工薪税（包括社会计划缴费）一直是资助社会保险计划的主导方式。但是工薪税是否是最佳模式，尤其是是否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模式，正在遭遇与日俱增的质

疑。[79] 以工薪税资助社会保险可能加剧覆盖率不高的问题，因为这阻碍了正规领域就业的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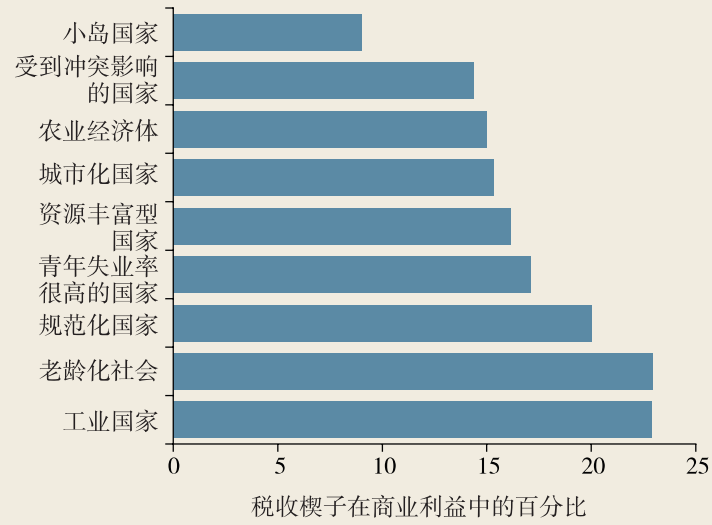
在哥伦比亚、土耳其、东欧和中亚一些转型中国家进行的研究已经发现，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增加使正规就业以不同程度降低。[80] 通过为“税收楔子”做出贡献（全部劳动力成本和扣税后的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用以资助社会保险的工薪税可以同时降低劳动力需求和工作的意愿。国家间税收楔子的规模差异很大。税收楔子在工业国家、老龄化社会和规范化国家中的规模最大（见图 8.5）。

然而，全面的评估需要考虑工人对社会保险获得的价值认识。当缴费者将价值与参与者的福利联系在一起时，社会缴费就不应当被视为单纯的纳税。大量的证据显示事实的确是这样子的。[81] 当被要求列举好工作的基本要素时，中国、哥伦比亚、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塞拉利昂的被调查者将退休金获得和健康保险列为与丰厚工资同等重要的要素。在这些国家，参与了社会保险体系的工人意味着他们将要求大幅度提高收入来弥补没有社会保险的损失。同时，体系之外的工人也愿意拿出相当一部分收入参与体系（见图 8.6）。[82] 但是计划与执行很重要，参与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对于缴费的充足福利以及福利管理的效率和透明性。社会保险体制的长期信用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老龄化社会中尤其如此。

为扩大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的覆盖率，需要应对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重要因素是哪些风险是应当优先应对的风险。在低收入国家里，老年人的退休金和基本的医疗保险比失业保险要重要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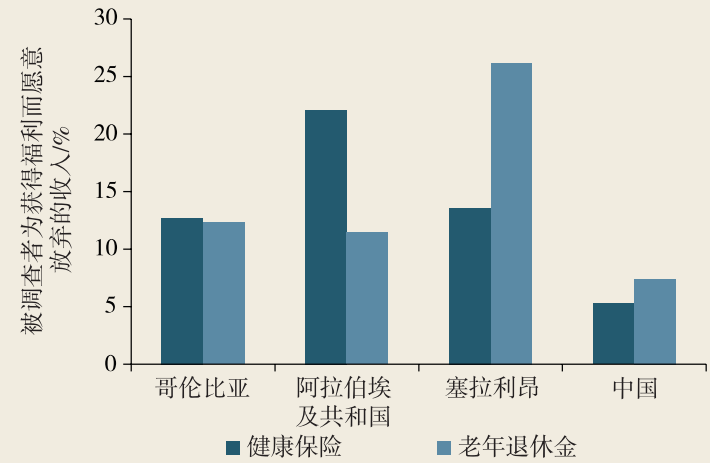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如何将优先实施的计划延伸到非正规领域的工人身上。一些国家正在使用创新性技术提高非正规领域工人参加计划的便利性（见专栏 8.7），但是只有技术不足以克服导致社会保障覆盖率不高的市场不健全和制度失灵问题。例如，移动电话提高了农民缴纳健康保险的便利性，但是那些患病概率较小的人仍可能选

图 8.5　不同国家的劳动税和社会缴费在面临不同就业挑战的国家中也不同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11a。
注释：以企业为劳动力支付的税负和强制性缴费数额来衡量的劳动税和缴费。

图 8.6　工人愿意为获得健康保险和退休金而放弃部分收入



资料来源：Bjorkhaug 等 2012；Hatloy 等 2012；Kebede 等 2012；及 Zhang 等 2012；所有这些都是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注释：数据是雇主没有提供医疗保险或退休金福利的工资工人的数据。本图显示了工人为获得这些福利而愿意放弃的收入最大额（通常为月工资的比例）。

专栏 8.7 现代技术可以减少社会保障的成本、漏损和腐败

基于创新技术的方法正在转变保险和其他现金福利提供的方式。印度针对贫穷人口的新健康保险计划使用生物统计身份智能卡，一方面判定家庭的资格，一方面与不使用现金支付的意愿程序保持一致。现在拥有智能卡的家庭将近 3 000 万。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的近期报告，“来自南非、印度、肯尼亚和利比里亚的证据表明，使用智能卡或移动电话的电子支付系统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漏损。”[a] 另一份由援助贫穷者专家组撰写的报告发现巴西和哥伦比亚的电子支付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些“前端”应用有助于克服在过去阻碍服务提供的几个问题，包括受益人需要长途去取福利，需要让中间人填写表格等问题。

许多发展中国家缺少识别身份的健全系统，从而导致了形形色色欺诈行为的存在，并阻碍许多贫穷人口进入社会计划。例如在多米尼加共和国，1/4 有资格参加一项减贫项目的受益人由于缺乏适当的身份证明而未能参加。缺少身份证明也削弱了协调政府和捐赠者资助项目之间行动的努力，导致成本翻番。为应对这一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转向生物统计身份技术。印度独特的身份识别方案 Aadhaar 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宏大的身份识别系统，已经采集了将近 2 亿人口数字指纹和虹膜扫描。诸如装有指纹识别器的移动手机的应用目前正在试行，这种手机允许在线识别身份，并且为服务提供商所接受。

尽管不那么引人瞩目但同样重要的社会保障系统“后端”定期跟踪交易，并且产生关键的指标和报告。毋庸置疑，管理信息系统对复杂的社会保险方案更重要，在人口老龄化和非传染病更加普遍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即时的工作历史提高了退休金福利和社会保障缴费的一致性。医疗历史数据库为健康保健提供商设计更有效的健康方案和支付机制提供支持。

然而，信息已经不再是方案管理者独享的领域。现代技术应用最可能出现的影响是公民通过社会媒体举报腐败行为和渎职行为。移动电话的大规模应用一直是一种特别的赋权工具。

然而技术不是灵丹妙药，失败的项目比比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与重新设计的过程并不匹配。其他常见的问题包括规划和采购实践存在问题，政府和摊贩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系统到位后缺乏受过培训的运作系统的人。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包括以创新的方式应用新技术。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Bold，Porteous 和 Rotman 2012；Devereux 等 2007；DFID 2011；Gelb 和 Decker 2011；Palacios，Das 和 Sun 2011 的总结。

a. DFID 2011，9。

择不参加保险。也就是说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除了需要现代“技术”外，还需要充分的法规与资源的原因所在。

方法之一是为非正规领域工人设立一套平行的缴费体制。该方法应对覆盖率差异问题，但是如果平行机制的资金来源于普遍收入之外的来源，就会阻碍人们参加缴费制度，这可以阻碍正规领域的发展。通过两种体制福利的差异化和至少以部分缴费来为平行体制提供资金的方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83]

另一个方法是在一般社会保险体制内对参保的农民和自就业者提供部分补贴。在越南，那些被划入贫穷范畴的人口的健康保险卡完全由预算支付，那些“接近贫穷”的人口得到 50%的补贴。[84] 第二种方法似乎与前一种方法相近，因为资金也依赖一般税收收入。但是第二种方法具有不阻碍规范化的优势。从社会凝聚力的角度来看，第二种方法允许建立一个统一的体系，而不是建立一个两层架构体系。

精心设计的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具有促进三大转型的潜力。减轻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度和覆盖重点风险可以弥补损失的收入，而且通过降低不确定性，也可以提高主观幸福感。福利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的可转移性和系统管理转移的能力有助于工人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工作，鼓励工人承担风险。而且扩大覆盖面可以促进社会凝聚力，这是通过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严密社会合同的职能实现的。[85]

问题 8 保护工人还是保护就业?

保护人的政策通常被誉为优于保护就业政策的政策。提供收入补助阻止了消费的大幅度下降，降低了受到失业、就业不足或劳动收入损失等因素影响的家庭陷入贫穷的风险。依靠过渡性收入补助，在某些情况下依靠再培训方案，而不是依靠保护就业的措施，为劳动力的再分配和维系创造性破坏的进程保留了余地，从而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益，加速经济增长。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和就业保护立法等手段保护已经不具经济可行性的就业，延长了资源低效益分配的时间。

而且，就业保护也隐含着高俘获风险。就业保护具有变成长期性而非临时性、创造出永久性的低生产效益补助性就业的风险。显性就业保护除了为企业主和从该领域受益的工人带来大量的租金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收效，反而阻碍了技术进步、结构改革和增长，这样的例子在发展的历程中俯拾皆是。

因此，传统智慧反对保护就业。但是在众多就业机会丧失或受到威胁而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又寥寥无几时，这类传统智慧就需要被重新审视。受到保护的就业的生产率可能仍然高于下岗工人可能找到的替代性就业的生产率，而生产率差异可能超过维系被保护工作所需要的成本。如果下岗工人在很长时期内处于失业状态，那么上述现象就是现实。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即时的产出损失外，延长的失业可能导致技能贬值，社会凝聚力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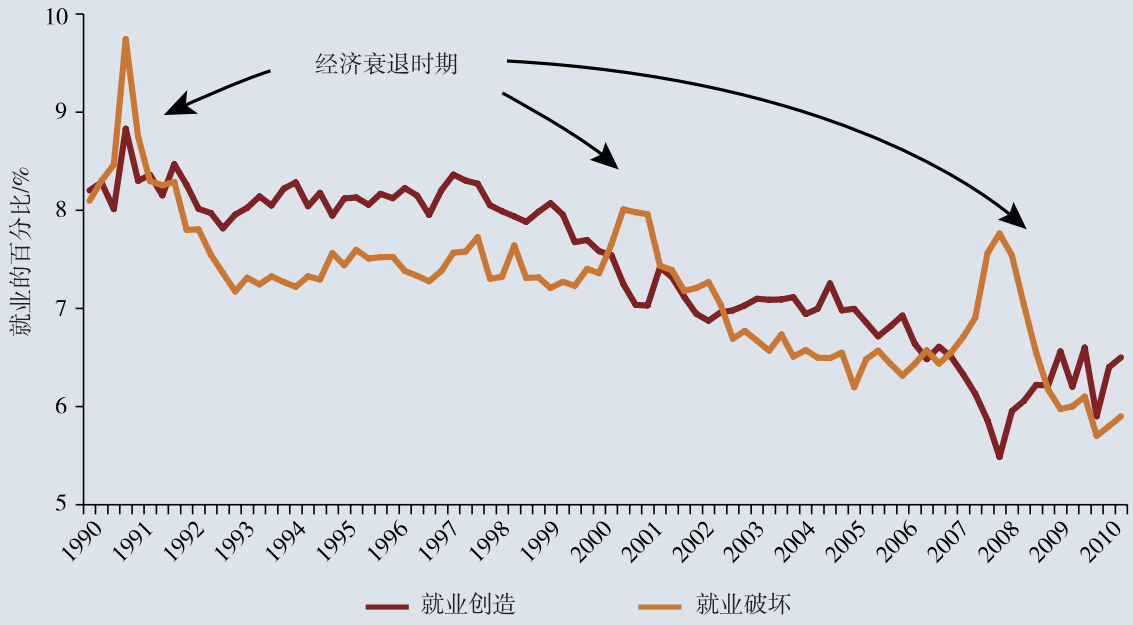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需要考虑就业的整体生产率，包括对其他者生产率可能的溢出效应。当人们在一起工作，或者当人们通过更广泛的价值链联系在一起时，大量就业岗位的丧失可能对生产率产生涟漪效应。这样，在就业具有巨大生产率溢出效应的领域中或活动中，产出的总损失超出个体收入损失的总和。因此，大规模的就业丧失可能导致城市繁华不再，地区经济萧条，而这种前景表明传统智慧可能并不永远是正确的。

流转率与分离

每一天，工作岗位都在被创造和被破坏。工人被雇用和解聘，或者离职创办自己的企业；同时一些企业在倒闭，而另一些企业在成立。在工业国家中，这一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每年约对 15%的就业岗位产生影响。[86] 在正常时期，一人丢失工作的概率一般与他人丢失工作的概率没有关系，而找到另一份工作的概率也与发生在其他工人身上的事情无关。这样，就业冲击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个体的冲击”。

但是当就业冲击是整体性的冲击时，就出现了例外的时期。这样就会发生正常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过程的持续性分离：工作大量破坏，然而工作创造却没有同步进行。这就是严重经济危机时期，当经济活动的衰退对大量企业和行业产生影响时所发生的问题。工作破坏常常急剧加速，而就业创造就保持稳定或甚至出现下滑（见图 8.7）。这种分离导致规范化经济体中的失业问题和较不规范经济体中的就业不足问题。[87] 在许多国家中，干旱、洪涝及其他自然灾害也可以产生类似的效果。在危机的源头消失后，就业创造好转，失业或就业不足问题

图 8.7 美国经济衰退期间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之间的分离是大规模的



资料来源：Davis，Faberman 和 Haltiwanger 2012。

降低。就业创造恢复所需的时间越长，失业或就业不足的问题延续的时间也越长。

在技术快速进步（例如电脑的引入）或政策改革（例如贸易自由化）引起大规模结构变革的时期，也可能发生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的分离。结构变革可以对整个行业产生影响。在转型经济体中，这种变革是巨大的，因为整个领域的经济都不得不应对不确定性，适应新的激励因素。公共领域重组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可以引起类似的冲击。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可能是严重的、长期性的问题。

和个体冲击相比较，整体冲击的收入损失和产出损失要普遍得多，但是有时候这两类就业冲击可以重叠。近期的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国家出现了异于寻常的深层衰退。美国的高失业率仍然在持续，失业期比往常长，在经济危机开始的四年后，新的就业创造依然滞缓。[88] 有人认为危机并不是固定的周期性变化，而是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引起的更长期的转型的表现。[89]

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的分离会造成损害

如果就业冲击是个体性的，如果就业困难在一定限度内，流转率保持正常，那么保护人应该是首要任务。存在一系列社会保障机制支持人们从一项工作转向另一项工作，这些社会保障机制强调通过失业福利和公共转移维系生活水平。学习新技能或迁移到有就业机会的地方也可能发挥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从受到不利影响的活动转入另一份工作而获得的产出收益会超出支持机制的成本。因此，保护人的政策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社会。

如果发生了就业破坏和就业创造的大规模分离，无论这种分离是更大规模的危机还是大规模的结构变革引

起的，保护工人远远不足以解决问题。由于就业机会根本不存在，中介服务衰退不前。培训可能有助于个体工人找到工作，但是由于培训不能应对就业冲击的周期性原因或结构原因，因而在整体层面上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就业福利和公共转移支付形式提供的收入补贴可能遭遇资金不足问题，或对财政账户产生严重影响。只有持续性的就业创造可以应对分离效应，但是即使在最佳条件下，抵消系统性冲击造成的就业衰退影响也可能需要好几年时间。因此，问题就成了长期提供大规模的收入协助是否比改善就业创造的短期性就业支持更优越。

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分离的长期后果和成本比人们通常认为的后果和成本严重。在大规模结构变革时期，由于替代性就业很少，工人被再分配出衰退行业的行为可能导致大量的产出损失。衰退行业工作的生产率可能不高，但是仍然可以高于替代方案。同样在经济危机期间，企业可能没有破产，而只是缺少流动资金。本身仍有偿还债务能力的公司的倒闭可能引起具体公司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损失，破坏价值链，给周边社区造成伤害。尽管提供信贷将是更好的解决方案，识别破产公司并不总是具有可行性，而且可能受到透明性问题的困扰。临时就业保障政策可能是可行的替代方案，为正在挣扎的但是本身仍有清偿能力的公司提供一条救生索。

长期失业也可能降低技能和劳动力联系。从事既定行业的资质和态度可能会丧失。[90]“创伤”可能发生，对寻找相当收入的就业产生长期影响。[91]人力资本和技能在降低。抛开就业破坏和就业创造是否是严重衰退或主要结构变革的产物不提，工人可能陷入不喜欢的工作中和生活水平的螺旋式下降中。潜在的成本可能对社会凝聚力尤其具有破坏力。社会网络关系可能解体，致使下岗人口的再就业难度加大，甚至造成下岗人口参与其他形式社会活动的难度加大。[92]长期的高失业率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会对从学校转向工作的青年产生影响，而且可能导致被社会剥夺资格。[93]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就可以考虑就业保护。这不是说要通过就业保障立法对雇用和解雇设置永久性的限制，而是通过有时间限制的政策措施减缓就业破坏。换句话说，就业保护应当是选择性地使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促进就业创造或保持既有的就业岗位。有几个国家在近期的经济衰退中采取了这类政策。德国这类政策有着悠久的传统，德国通过减少工作时间规避了就业损失（见专栏 8.8）。在最近的经济衰退中，美国也采取了保护就业的措施，最引人瞩目的是其对汽车制造业的挽救。但是美国主要是依靠刺激总体需求和扩大保护工人的失业保险，而不是采取保护就业的措施。相对来讲，美国的就业和失业变化远远大于德国的变化。[94]

保护就业陷阱

发展中国家也有例证。智利和墨西哥引入了工作共享政策和补偿性补贴来减缓危机的影响，但是这些政策的影响有限。由于是新出现的政策，这些政策需要新的程序，所以很难迅速实施，因而导致使用率很低。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并不十分适合非正规就业比例很大的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中，这些政策不能覆盖大多数的雇主。在规范化中取得进展的智利和墨西哥行政能力相对较高，这两国的经验表明工作分享政策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有限。

专栏 8.8 短时工政策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新世界

德国应用短时工政策（也被翻译为“短期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间”）已经一个世纪了。根据这一政策，参与这一政策的公司可以减少雇员的工作时间，并减少相应的补偿金。德国政府通过联邦雇用处覆盖了相当比例的随即而来的工资损失。经过受到影响的工人的同意是公司参与这一政策的约束条件，[a] 因此贯彻该方案要重视社会对话。在经济衰退期间，德国雇主倾向于以缩减工作时间来响应经济衰退，从而减少工作损失。

十几个国家采取了基于一般短时工政策模型的缩减工作时间的方案，但是设计一系列设计和法规。[b]2008—2009 年期间，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已经采用这类政策方案的国家经历了吸纳率的大幅度上升。

作为对危机的响应，几个实施公共共享计划的国家增加了所覆盖企业的工资比例，延长了福利的持续时间，而且放松了取得参与这些政策方案资格的标准。在德国，公司可以请求补贴的期限从 6 个月延长到 24 个月；政府覆盖的社会保险成本增加了 50%；临时帮工获得了资格，而且政策方案允许覆盖的受影响雇员的工资损失达到 67%。[c] 据估计，德国通过短时工政策拯救的长期工资超过 1%。[d] 2009 年，该政策方案覆盖了 3%以上的劳动力。

该政策方案被誉为有利的方案，因为政府因雇员工作时间缩短而支付雇员的资金小于政府用于失业福利的资金。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该政策方案有助于保护技能熟练的雇员，降低滥竽充数成本和再培训成本，从而维持了公司的生产率。从雇员的角度来看，方案预防了失业及失业引起的收入损失、技能耗损、生活满意度降低和不安全等问题。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方案减缓了经济衰退的影响，使之更平均地分摊在劳动者身上。

然而，工作共享方案只能给正规领域的雇员带来收益，而且还不是所有的正规领域雇员都能受益。短时工政策对挽救长期就业有效，但是对临时就业和临时工人的工作时间没有太多影响。[e] 工作共享方案在劳动力市场法规灵活性较低因而吸纳率较高的国家中也更有效。[f] 而且，对这类方案的长期依赖可以严重阻碍必要的劳动力再分配，因而在中期可以阻碍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如果采用工作共享方案是集体协议所预知的，那么雇员的同意就不必要了。见 Eurofound 2009。

b. 这些国家是阿根廷、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波兰和土耳其。见 Hijzen 和 Venn 2011。

c. Burda 和 Hunt 2011。

d. Cahuc 和 Carcillo 2011。

e. Cahuc 和 Carcillo 2011。

f. Robalino 和 Banerji 2009。

也有正面的例证。中国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应对经济重组的不同方式最具说服力。改革伊始，中国拥有成千上万家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SOEs）。但是大规模的劳动力缩减将迫使工人转入生产率更低的就业，除非得到充分发展的私营领域吸纳他们。因此，中国在以银行信贷支持其发展不佳的国有企业的同时，迅速实现其经济的现代化，阻止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社会瓦解现象。[95] 拉丁美洲国家也开始了清理在进口替代性政策下发展起来的低效企业的进程，但是拉丁美洲的进程更为突然。突然缩减规模可能导致不规范性的长期上升，导致生产率的增长降低。[96]

就业保障政策的风险在于就业保障政策可以创造永久性的低效率，在制度薄弱的国家中尤其如此。就业保障政策可能导致一些企业或乃至整个行业为保障永久性政府支持而联合寻租的行为。如果要采取这类政策，就有必要建立和实施触发原则和落日原则来界定保护的程度和规模。如果保障这类支持的制度前提条件暂时不存在，或者不可靠，就业保障政策可能是具有风险的政策。而且如果工作损失不是由引起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大规模分离的整体性就业冲击造成的，那就根本不应该考虑使用就业保障政策。

注释

1. 某一特定国家可以被划归一个以上的群组。国家类型根据下述定义划分。农业经济体：2010 年农村人口的比例为 60%或以上（世界发展指标 [WDI]，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形成于两个根源的结合，（i）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数据库，2010 年在国内冲突或国际化的国内冲突中至少战死 1 000 人的国家，（ii）驻有联合国维护和平和建设和平特派团的国家（2012 年世界银行脆弱性清单）；城市化经济体：2000 年居住在城市化地区的人口是 65%或不足 65%，到 2010 年增加了 4.5 个百分点的国家（世界发展指标）；资源丰富型国家：2005—2010 年期间矿物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例至少为 20%的国家（世界贸易综合解决方案）；青年失业率很高的国家："青年膨胀指数"分数为 0.9 或以上的国家。青年膨胀指数这样计算，即青年就业总量（2010 年）乘以青年失业率（2001—2010 年平均数）再除以总人口（2010，世界发展指标）；规范化经济体：缴纳退休金的人口在全体劳动力中的比例为 25%~75%（PDB 临时退休金数据库，2012 年 2 月）；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65 岁或以上）是工作年龄（15~64 岁）群体人口的 8%以上（世界发展指标）；小岛国家：人口不足 200 万的岛国（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和世界发展指标）。

2. Holzmann 和 Vodopivec 2012。

3. 116 个国家批准了与最低工资相关的第 26 号公约和第 131 号公约。世界银行 2012 经商指标报告指出，在 182 个样本国家中，147 个国家具有为 19 岁工人或学徒设定的最低工资。

4. Aghion，Algan 和 Cahuc 2011；Aghion 等 2010；Alesina 等 2010；Botero 等 2004。

5. 这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的法规。例如对夜班和加班的限制；关于病假、休假和产假的规定；健康安全发挥均为工人设定了"最低保障"。

6. Boeri 和 van Ours 2008；Eyraud 和 Saget 2008。

7. 术语灯塔效应由 Souza 和 Baltar（1980）引入。同时见 Boeri，Garibaldi 和 Ribeiro 2011；Neri，Gonzaga 和 Camargo（2001）。

8. Acemoglu 2001。

9. 关于最低工资可以影响贫穷的更多渠道，见 Fields 和 Kanbur（2007）。

10. Cahuc 和 Kramarz 2004。

11. 关于众多此类研究的综述，见 Boeri，Helppie 和 Macis（2008）及 Freeman（2009）。

12.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Betcherman 2012。

13. 关于就业保障立法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对经合组织国家的影响见 Nickell 和 Layard（1999）；关于对经合组织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见 Heckman 和 Pagés（2000），而不是 Heckman 和 Pagés（2004）；关于对阿根廷的影响，见 Mondino 和 Montoya（2004）；关于对智利的影响，见 Micco 和 Pagés（2006）；关于对哥伦比亚的影响，见 Kugler（2004）；关于对印度的影响，见 Ahsan 和 Pagés（2009）及 Gupta，Hasan 和 Kumar（2008）；关于对秘鲁的影响，见 Saavedra 和 Torero（2004）；关于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见 Djankov 和 Ramalho（2009）；关于对拉丁美洲的影响，见 Kaplan（2009）。相比之下，下述研究没有发现就业保障立法对就业或失业的重大影响，关于对经合组织国家的影响，见 Baccaro 和 Rei（2007）及 Bassanini 和 Duval（2006）；关于对巴西的影响，见 Paes de Barros 和 Corseuil（2004）；关于对三个加勒比国家的影响，见 Downes，Mamingi 和 Antoine（2004）；关于对智利的影响，见 Petrin 和 Sivadasan（2006）。关于最低工资，发现最低工资对就业具有负面影响的研究有：Fajnzylber（2001），Lemos（2004），及 Neumark，Cunningham 和 Siga（2006）对巴西的研究；Arango 和 Pachón（2004），Bell（1997）及 Maloney 和 Núñez Méndez（2003）对哥伦比亚的研究；Kertesi 和 Kollo（2003）对匈牙利的研究；Alatas 和 Cameron（2003），Rama（2001）及 SMERU 研究院（2001）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及 Strobl 和 Walsh（2003）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研究。没有发现效果的研究有：Lemos（2007）对巴西的研究；Gindling 和 Terrell（2007）对哥斯达黎加的研究及 Bell（1997）和 Feliciano（1998）对墨西哥的研究。

14. Micco 和 Pagés 2006；Petrin 和 Sivadasan 2006。

15. Card 和 Krueger 1995。

16. 尽管一些研究已经发现最低工资增长可能对青年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Card 和 Krueger 1995），大多数研究已经发现了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尽管影响的程度通常适中（例如，Montenegro 和 Pagés 2004 对智利的研究，Arango 和 Pachón 2004 对哥伦比亚的研究，SMERU 研究院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及 Neumark 和 Nizalova 2007 对美国的研究）。在几个案例研究中，由于最低工资的

增加，女性就业率降低了（例如，Feliciano 1998 对墨西哥的研究，Arango 和 Pachón 2004 对哥伦比亚的研究）；尽管 Pagés 和 Montenegro（2007）确认了在智利就业向女性转移的趋向。在研究者审视最低工资增长对技能最低工人的就业影响时，他们通常会发现负面影响（例如，Arango 和 Pachón 2004；Kertesi 和 Kollo 2003；Montenegro 和 Pagés 2004；及 SMERU 研究院 2001）。一般而言，小企业中的工人最容易受到因最低工资增加而引起的就业损失的影响（Kertesi 和 Kollo 2003；Rama 2001）。关于就业保障立法，Montenegro 和 Pagés（2004）发现，在智利，保护力度更大的规则的引入对女性的负面影响高于男性，对青年的负面影响高于有经验的人，对技能熟练工人的负面影响大于不熟练工人。同样，经合组织主持的跨国分析确认了就业保障立法对女性和青年的负面影响。

17. Alatas 和 Cameron 2003；Rama 2001。

18. 关于最低工资，对拉丁美洲的一些研究发现工资的平等程度提高了（例如，Fajnzylber 2001 对巴西的研究，Gindling 和 Terrell 1995 对哥斯达黎加的研究，Bosch 和 Manacorda 2010 对墨西哥的研究）。经合组织（2011）认为持续下降的实际最低工资和约束力较小的就业保障立法是隐藏在许多国家持续上升的不平等问题背后的因素。

19. 关于欧洲国家，见 Messina 和 Vallanti（2007）；关于哥伦比亚，见 Eslava 等（2004）；关于经合组织和拉丁美洲国家，见 Haltiwanger，Scarpetta 和 Schweiger（2008）；关于经合组织国家，见 Bentolila 等（2011），关于 60 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见 Caballero（2004）。然而，Eichhorst 等（2010）对 20 家经合组织样本国家就业保障立法应对冲击差异的研究并没有发现系统的差异。

20. Belot，Boone 和 van Ours（2007）发现了积极影响，但是只有在工人投资具体企业所需技能的情况下才能如此。Koeniger（2005）及 Nickell 和 Leyard（1999）发现了积极的生产率影响，但是结果取决于估测的具体要求。Autor，Kerr 和 Kugler（2007）发现保护就业力度的加大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相比之下，Bassanini 和 Venn（2008）及 Cingano 等（2010）发现了负面的影响。Bassanini，Nunziata 和 Venn（2009）发现解雇规则对劳动力具有压制效应，但是利用临时就业的限制对劳动力没有这一效应。所有这些研究都基于工业国家的数据。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Micco 和 Pagés（2006）得出结论说劳动法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大。在对亚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中，DeFreitas 和 Marshall（1998）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就业安全保护对生产率具有积极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就业安全保护对生产率具有负面影响。Bassanini 和 Venn（2007）发现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工资对生产率具有积极的影响。

21. Blanchard 和 Landier 2002；Dolado，García－Serrano 和 Jimeno 2002；经合组织 2004。

22. Almeida 和 Carneiro 2009。

23. Ahsan 和 Pagés 2009；世界银行 2011b。

24. Kucera 和 Roncolato 2008。

25. Berg 2011；Fajnzylber 2001；Foguel，Ramos 和 Carneiro 2001；Lemos 2004；Neumark，Cunningham 和 Siga 2006。

26. 关于共同制定劳动力市场制度需求的分析讨论，见 Blanchard 和 Tirole（2008）。关于在发展中国家环境中制定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讨论，见 Blanchard（2005）。

27. 集体协议所覆盖工人的比例通常高于工会成员率。原因在于工会和雇主谈判达成的协议有时候会延伸到没有参与谈判的其他工作场所。

28. Hayter 2011。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劳动研究院（2012）对立法的近期变革进行了总结。

29. 关于工会工资效应证据的总结，见 Aidt 和 Tzannatos（2002）及 Freeman（2009）。

30. DiNardo，Fortin 和 Lemieux 1996。

31. 基于使用 1985—2007 年 22 个经合组织国家专门小组数据的回归。详细内容，见经合组织（2011）。

32. Aidt 和 Tzannatos 2002。

33. Freeman 2009。

34. Aidt 和 Tzannatos 2002。

35.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Betcherman 2012。

36. Forteza 和 Rama 2006。

37.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Chen 等 2012。

38.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Chen 等 2012。

39. 小型企业发展和小额信贷通常不属于这个范畴，因为它们旨在培育企业家能力。

40. Almeida 等 2012。

41. Kuddo 2009。

42. 信息提供有助于人们了解可用的工作机会。然而，如果雇主不能判断申请者的全部能力，那么，信息将不会解决市场信号的

失灵问题。

43. Bell 和 Blanchflower 2010。

44. Betcherman，Olivas 和 Dar（2004）发现大多数被评估的工资补贴并不改善参与者的就业状况或收入状况。

45. Betcherman，Daysal 和 Pagés 2010。

46. Calmfors 1994；Martin 和 Grubb 2001。

47. 关于这些联合性方案的积极效果的证据，见 Cockx，van der Linden 和 Karaa（1998）及 Katz（1996）。Robalino 和 Sanchez-Puerta（2008）也提供了相关的概述。

48. Almeida 等 2012。

49. 世界银行 2011c。

50. Galasso，Ravallion 和 Salvia 2004。

51. Kluve，Lehmann 和 Schmidt 1999；Kluve，Lehmann 和 Schmidt 2008。

52. Rodriguez-Planas 和 Benus 2010。

53. Almeida，Behrman 和 Robalino 2012。关于经合组织国家，见 Almeida 和 Carneiro（2009）；Heckman，Stixrud 和 Urzua（2006）；及 Holzer 和 Lerman（2009）。

54. Attanasio，Kugler 和 Meghir 2008。

55. Premand 等 2011。

56. Acevedo Alameda，Garcia 和 Martinez 2011；世界银行 2008。

57. Blattman，Fiala 和 Martinez 2011。

58. del Ninno，Subbarao 和 Milazzo 2009。

59. 关于公共工程低效的记录很多。例如，关于综述，见 Betcherman，Olivas 和 Dar（2004）及 Martin 和 Grubb（2001）；关于元分析，见 Card，Kluve 和 Weber（2010）及 Kluve（2010）；Carling 和 Richardson（2004）及 Sianesi（2008）认为，政策越靠近固定工作，其对参与者的长期就业影响就越好。

60. 关于波兰，Kluve，Lehmann 和 Schmidt 2008；关于罗马尼亚，Rodriguez-Planas 2010。

61. Hashemi 和 Rosenberg 2006。

62. Bonin 和 Rinne 2006。2004 年和 2005 年针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建筑业领域弱势失业人口的“美丽塞尔维亚”项目，将职业培训和公共工程结合在一起。该项目的正面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主观福利而不是劳动力市场的成果上，该项目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不大。

63. Almeida 等 2012；de Koning，Kotzeva 和 Tsvetkov 2007。

64.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lmeida 等 2012。

65. Kluve 等，待出版。

66. Card，Kluve 和 Weber 2010；Hotz，Imbens 和 Klerman 2006；Lechner，Miquel 和 Wunsch 2005。

67. Grosh，del Ninno 和 Ouerghi 2008。

68. 国际劳工组织 2010b。

69. Boeri 和 van Ours 2008；Holmlund 1998；Margolis，Navarro 和 Robalino 2011；Olinto 等 2007；Vodopivec，Worgotter 和 Raju 2005。

70. van Ours 和 Vodopivec 2006。

71. Tatsiramos 2009。

72. Ribe，Robalino 和 Walker 2011。

73.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

74. 经合组织 2010。

75. 经合组织 2010。

76. Dorfman 和 Palacios 2012；Holzmann，Robalino 和 Takayama 2009；国际劳工组织 2010b；Robalino 等 2012。

77. Ribe，Robalino 和 Walker 2011。

78. Cho 等 2012；Rutkowski 等 2005。

79. Bird 和 Smart 2012；Levy 2008。

80. Betcherman，Daysal 和 Pagés 2010；Kugler 和 Kugler 2003；Rutkowski 等 2005。

81. 这些观察基于 Fafo 基金会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而进行的调查。

82. Barnighausen 等（2007）提供了关于中国的确切证据，发现非正规领域的工人愿意将近 5%的收入用于支付基本健康保险。

83. 这类方法中的一些例证正被南亚国家效仿。见世界银行 2011d。

84. Lieberman 和 Wagstaff 2009。

85. Babajanian 2012；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lmeida 等 2012。

86. 关于法国，见 Cahuc 和 Zylberberg 2006；关于美国，见 Davis，Haltiwanger 和 Schuh 1996；根据 Kaplan，Martínez González 和 Robertson（2007），墨西哥的比率大体相当，尽管更为混乱。

87. 关于巴西，见 Bosch，Goni，and Maloney（2007）；关于墨西哥，见 Bosch 和 Maloney（2006）及 Kaplan，Martínez González 和 Robertson（2007）。

88. Haltiwanger 2012；Haltiwanger，Jarmin 和 Miranda 2011；Herkenhoff 和 Ohanian 2011。

89. Stiglitz 2009；Gatti 等 2011。

90. Pissarides 1992。

91. “创伤”系指那些之前曾经遭遇失业困扰的人，其失业和劳动收入降低的概率持续增加。这意味着失业的负面影响延伸到失业期之外。见 Arulampalam，Gregg 和 Gregory（2001）。本术语也用于描述失业的心理影响及其甚至在失业期结束后的持续时间。见 Clark，Georgellis 和 Safney（2001）；Knabe 和 Ratzel（2009）。

92. Biewen 和 Steffes（2010），Bramoullé 和 Saint–Paul（2010）及 Calvó–Armengol 和 Jackson（2004）是对融入社会网络关系在寻找工作中发挥的作用进行现代描述的文献。Wahba 和 Zenou（2005）发现了埃及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中的网络效应的影响；Munshi（2003）发现关系网络较大的移民更有可能受雇于收入较高的非农业领域。

93. Bell 和 Blanchflower 2011；Cramer 2010；Fougère，Kramarz 和 Pouget 2009；世界银行 2006。

94. Burda 和 Hunt 2011；Cazes，Verick 和 Al Hussami2011；Farber 2011；Ohanian 2010。

95. Fang，Park 和 Zhao 2008。

96. Hirschmann 1987。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cemoglu, Daron. 2001. "Good Jobs Versus Bad Job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 (1): 1–21.

Acevedo Alameda, Paloma, Brigida Garcia, and Sebastian Martinez. 2011. *Informe de Linea de Base de la Evaluación de Impacto del Banco Mundial del Programa Juventud y Empleo en República Dominican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ghion, Philippe, Yann Algan, and Pierre Cahuc. 2011.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The Interplay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the Minimum Wage Regulation."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 (1): 3–42.

Aghion, Philippe, Yann Algan, Pierre Cahuc, and Andrei Shleifer. 2010. "Regulation and Distru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 (3): 1015–49.

Ahsan, Ahmad, and Carmen Pagés. 2009. "Are All Labor Regulations Equal? Evidence from Indian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7 (1): 62–75.

Aidt, Toke, and Zafiris Tzannatos. 2002. *Union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Economic Effects in a Global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latas, Vivi, and Lisa Ann Cameron. 2003.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s on Employment in a Low Income Country: An Evaluation Us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98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lesina, Alberto, Yann Algan, Pierre Cahuc, and Paola Giuliano. 2010. "Family Values and the Regulation of Labor." Working Paper Series 1574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lmeida, Rita, Juliana Arbelaez, Maddalena Honorati, Arvo Kuddo, Tanja Lohmann, Mirey Ovadiya, Lucian Pop, Maria Laura Sanchez-Puerta, and Michael Weber. 2012. "Improving Access to Jobs and Earnings Opportunities: The Role of Activation and Graduation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cial Protection and Labo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20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lmeida, Rita, Jere R. Behrman, and David A. Robalino, eds. 2012. *The Right Skills for the Job? Rethinking Training Policies for Worke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lmeida, Rita, and Pedro Carneiro. 2009. "Enforcement of Labor Regulation and Firm Siz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7 (1): 28–46.

Almeida, Rita, David Margolis, David Robalino, and Michael Weber. 2012. "Facilitating Labor Market Transition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Arango, Carlos, and Angelica Pachón. 2004. "Minimum Wages in Colombia: Holding the Middle with a Bite on the Poor." Borradores de Economía Serie 280, Banco de la República de Colombia, Bogotá.

Arulampalam, Wiji, Paul Gregg, and Mary Gregory. 2001. "Unemployment Scarring." *Economic Journal* 111 (475): 577–84.

Attanasio, Orazio, Adriana Kugler, and Costas Meghir. 2008. "Training Disadvantaged Youth in Latin America: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Trial." Working Paper Series 1393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utor, David H., William Kerr, and Adriana D. Kugler. 2007. "Do Employment Protections Reduce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U.S. States." *Economic Journal* 117 (6): 189–217.

Babajanian, Babken. 2012. *Social Protec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Social Cohesion and State-Building.*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Baccaro, Lucio, and Diego Rei. 2007.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Unemployment in OECD Countries: 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 (1960–199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60: 527–69.

Banerjee, Abhijit V., Sebastian Galiani, Jim Levinsohn, Zoë McLaren, and Ingrid Woolard. 2007. "Why Has Unemployment Risen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6 (4): 715–40.

Bärnighausen, Till, Yuanli Liu, Xinping Zhang, and Rainer Sauerborn. 2007. "A Contingent Valuation Study of Willingness to Pay for Health Insurance among Informal Sector Workers in Urban China."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7 (114): 2–16.

Bassanini, Andrea, and Romain Duval. 2006. "Employment Patterns in OECD Countries: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s Series 486, Economic Department,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Bassanini, Andrea, Luca Nunziata, and Danielle Venn. 2009. "Job Protection Legisl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OECD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y* 58 (April): 349–402.

Bassanini, Andrea, and Danielle Venn. 2007.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Labour Market Policies on Productivity: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Series 54,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 2008. "The Impact of Labour Market Policies on Productivity in OEC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Monito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s* 17: 3–15.

Basu, Arnab. 2011. "Impact of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s on Seasonal Labor Markets: Optimum Compensation and Workers' Welfare."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701,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Basu, Arnab, Nancy Chau, and Ravi Kanbur. 2009. "A Theory of Employment Guarantees: Contestability, Credibility and Distributional Concer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9 (3-4): 482–97.

Bell, David N. F., and David G. Blanchflower. 2010. "Youth Unemployment: Déjà Vu?"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4705,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 2011. "Youth Unemploymen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673,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Bell, Linda A. 1997.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s in Mexico and Colombia."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5 (3): S102–35.

Belot, Michèle, Jan Boone, and Jan van Ours. 2007. "Welfare-Improving Employment Protection." *Economica* 74 (295): 381–96.

Bentolila, Samuel, Pierre Cahuc, Juan Dolado, and Thomas Le Barbanchon. 2011. "Why Have Spanish and French Unemployment Rates Differed So Much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VOX*, January 22.

Berg, Janine. 2011. "Laws or Luck? Understanding Rising Formality in Brazil in the 2000s." In *Regulating for Decent Work, New Directions in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 ed. Sangheon Lee and Deirdre McCann, 123–50.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Betcherman, Gordon. 2012.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Betcherman, Gordon, N. Meltem Daysal, and Carmen Pagés. 2010. "Do Employment Subsidies Work? Evidence from Regionally Targeted Subsidies in Turkey." *Labor Economics* 17 (4): 710–22.

Betcherman, Gordon, Karina Olivas, and Amit Dar. 2004. "Impacts of Active Labor Market Programs: New Evidence from Evaluations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40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horat, Haroon, Sumayya Goga, and Carlene van der Westerhuizen. 2011. "Institutional Wage Effects: Revisiting Union and Bargaining Council Wage Premia in South Africa." Working Paper Series 11/146, Development Policy Research Unit,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Cape Town, South Africa.

Biewen, Martin, and Susanne Steffes. 2010. "Unemployment Persistence: Is There Evidence for Stigma Effects?" *Economic Letters* 106 (3): 188–90.

Bird, Richard M., and Michael Smart. 2012. "Financing Social Expenditur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ayroll or Value Added Taxe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Working Paper Series 1206, Andrew Young School of Policy Studies,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Atlanta.

Blanchard, Olivier. 2005. "Designing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In *Labor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ed. Jorge Restrepo, and Andrea R. Tokman, 367–81. Santiago: Banco Central de Chile.

Blanchard, Olivier, and Augustin Landier. 2002. "The Perverse Effects of Partial Labour Market Reform: Fixed-Term Contracts in France." *Economic Journal* 112 (480): 214–44.

Blanchard, Olivier J., and Jean Tirole. 2008. "The Joint Design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Employment Protection: A First Pas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6 (1): 45–77.

Blattman, Christopher, Nathan Fiala, and Sebastian Martinez. 2011.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Rural Africa, Mid-Term Results from an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the Youth Opportunities Program in Northern Ugand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

Boeri, Tito, Pietro Garibaldi, and Marta Ribeiro. 2011. "The Lighthouse Effect and Beyond."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7: S54–78.

Boeri, Tito, Brooke Helppie, and Mario Macis. 2008. "Labor Regul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83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oeri, Tito, and Jan C. van Ours. 2008.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Labor Marke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ld, Chris, David Porteous, and Sarah Rotman. 2012. *Social Cash Transfers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Bonin, Holger, and Ulf Rinne. 2006. "Beautiful Serbi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533,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Bosch, Mariano, Edwin Goni, and William F. Maloney. 2007. "The Determinants of Rising Informality in Brazil: Evidence from Gross Worker Flow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970,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Bosch, Mariano, and William Maloney. 2006. "Gross Worker Flows in the Presence of Informal Labor Markets: The Mexican Experience 1987–2002."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864,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Bosch, Mariano and Marco Manacorda. 2010. "Minimum Wages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Urban Mexico." Discussion Paper 7882,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Botero, Juan C., Simeon Djankov,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s Shleifer. 2004. "The Regulation of Lab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 (4): 1339–82.

Bramoullé, Yann, and Gilles Saint-Paul. 2010. "Social Networks and Labor Market Transitions." *Labour Economics* 17 (1): 188–95.

Burda, Michael C., and Jennifer Hunt. 2011. "What Explains the German Labor Market Miracle in the Great Recess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1718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Butcher, Kristin F., and Cecilia Elena Rouse. 2001. *Wage Effects of Unions and Industrial Councils in South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overty and Human Resources.

Caballero, Ricardo J. 2004. "Effective Labor Regulation and Microeconomic Flexibility." Working Paper Series 1074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Cahuc, Pierre, and Stéphane Carcillo. 2011. "Is Short-Time Work a Good Method to Keep Unemployment Dow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430,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Cahuc, Pierre, and Francis Kramarz. 2004. *De la Précarité à la Mobilité: Vers une Sécurité Sociale Professionnelle*. Paris: Ministère de l'Economie, des Finances et de l'Industrie.

Cahuc, Pierre, and André Zylberberg. 2006. *The Natural Survival of Work: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in a Growing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almfors, Lars. 1994.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and Unemployment: 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Crucial Design Feature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alvó-Armengol, Antoni, and Matthew O. Jackson. 2004. "The Effects of Social Networks on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 (3): 426–54.

Card, David, Jochen Kluve, and Andrea Weber. 2010.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Evaluations: A Meta-Analysis." *Economic Journal* 120 (11): 452–77.

Card, David, and Alan Krueger. 1995. *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rling, Kenneth, and Katarina Richardson. 2004.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Labor Market Programs: Swedish Experience from the 1990s." *Labour Economics* 11 (3): 335–54.

Cazes, Sandrine, Sher Verick, and Fares Al Hussami. 2011. "Diverging Trends in Un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Evidence from Okun's Law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mploy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106, Employment Sector,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eneva.

Chen, Martha, Chris Bonner, Mahendra Chetty, Lucia Fernandez, Karin Pape, Federico Parra, Arbind Singh, and Caroline Skinner. 2012. "Urban Informal Workers: Representative Voice and Economic Right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Cho, Yoonyoung, David Margolis, David Newhouse, and David A. Robalino. 2012. "Labor Markets in Middle and Low Income Countries: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Protection and Labor Policie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6761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ingano, Federico, Marco Leonardi, Julian Messina, and Giovanni Pica. 2010. "The Effect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and Financial Market Imperfections o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a Firm-Level Panel of EU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y* 25 (61): 117–63.

Clark, Andrew, Yannis Georgellis, and Peter Safney. 2001. "Scarring: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Past Unemployment." *Economica* 68 (May): 221–41.

Cockx, Bart, Bruno van der Linden, and Adel Karaa. 1998.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and Job Tenur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0: 685–708.

Cramer, Christopher. 2010. *Unemploy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Violen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avis, Steven J., R. Jason Faberman, and John Haltiwanger. 2012. "Labor Market Flows in the Cross-Section and Over Tim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9: 1–18.

Davis, Steven J., John C. Haltiwanger, and Scott Schuh. 1996.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e Koning, Jaap, Mariana Kotzeva, and Stoyan Tsvetkov. 2007. "Mid-Term Evaluation of the Bulgarian Programme 'From Social Assistance to Employment.'" In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Polic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Transitional Labour Market Perspective*, ed. Jaap de Koning. 103–31. Amsterdam: Dutch University Press.

DeFreitas, Gregory, and Adriana Marshall. 1998. "Labour Surplus, Worker Right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sia and Latin America." *Labour* 12 (3): 515–39.

del Ninno, Carlo, Kalanidhi Subbarao, and Annamaria Milazzo. 2009. "How to Make Public Works Work: A Review of Experience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90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Devereux, Stephen, Catherine Mthinda, Fergus Power, Patrick Sakala, and Abigail Suka. 2007. *An Evaluation of Concern Worldwide's Dowa Emergency Cash Transfer Project (DECT) in Malawi, 2006/07*. Lilongwe: Concern Worldwide.

DFID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1. *DFID Cash Transfers Evidence Paper*. London: DFID Policy Division.

DiNardo, John E., Nicole M. Fortin, and Thomas Lemieux. 1996.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ages, 1973–1992: A Semiparametric Approach." *Econometrica* 64 (5): 1001–44.

Djankov, Simeon, and Rita Ramalho. 2009. "Employment Law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7 (1): 3–13.

Dolado, Juan J., Carlos García-Serrano, and Juan F. Jimeno. 2002.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Boom of Temporary Jobs in Spain." *Economic Journal* 112 (480): 270–95.

Dorfman, Mark, and Robert Palacios. 2012. *The World Bank in Pensions: 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Social Protection Strateg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wnes, Andrew S., Nlandu Mamingi, and Rose-Marie Belle Antoine. 2004.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and Employment in the Caribbean." In *Law and Employment: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d. James J. Heckman and Carmen Pagés, 517–5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utta, Puja, Rinku Murgai, Martin Ravallion, and Dominique van del Walle. 2012. "Does India's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Guarantee Employmen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600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Eichhorst, Werner, Veronica Escudero, Paul Marx, and Steven Tobin. 2010.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on Employment and the Role of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Eslava, Marcela, John C. Haltiwanger, Adriana Kugler, and Maurice Kugler. 2004.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Reforms on Productivity and Profitability Enhancing Re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Colomb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5 (2): 333–71.

Eurofound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2009. *Eurofound European Industrial Relations Dictionary*. Dublin: Eurofound.

Eyraud, François, and Catherine Saget. 2008. "The Revival of Minimum Wage-Setting Institutions." In *In Defence of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Cultivating Justi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d. Janine Berg and David Kucera, 100–1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Fajnzylber, Pablo. 2001. "Minimum Wage Effects throughout the Wag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Brazil's Formal and Informal Sectors." Working Paper Series 151, Centro de Desenvolvimento e Planejamento Regional, Belo Horizonte, Brazil.

FAFO. 2012. "Household Survey on Good Jobs." Fafo Institute for Appli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slo. Background work for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Fang, Cai, Albert Park, and Yaohui Zhao. 2008.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in the Reform Era." In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d.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167–21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ng, Tony, and Ying Ge. 2011. "Unions and Firm Innovation in China: Synergy or Strife?" *China Economic Review* 23 (1): 170–80.

Farber, Henry S. 2011. "Job Loss in the Great Recess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rom the Displaced Workers Survey, 1984–2010."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696,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Fares, Jean, and Olga Susana Puerto. 2009. "Towards Comprehensive Training."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92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Feliciano, Zadia. 1998. "Does the Minimum Wage Affect Employment in Mexico?"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4 (2): 165–80.

Fields, Gary, and Ravi Kanbur. 2007. "Minimum Wages and Poverty with Income-Sharing."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5 (2): 135–47.

Foguel, Miguel Natan, Lauro Ramos, and Francisco Galrao Carneiro. 2001. "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the Labor Market, Poverty and Fiscal Budget in Brazil."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839,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Brasilia.

Forteza, Alvaro, and Martín Rama. 2006. "Labor Market 'Rigidity' and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Reforms across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9 (1): 75–105.

Fougère, Denis, Francis Kramarz, and Julien Pouget. 2009. "Youth Unemployment and Crime in Franc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7 (5): 909–38.

Freeman, Richard. 2009. "Labor Regulations, Unions,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rket Distortions or Efficient Institutions?" I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 ed. Dani Rodrik and Mark Rosenzweig, 4657–702. Amsterdam: Elsevier.

Galasso, Emanuela, Martin Ravallion, and Agustin Salvia. 2004. "Assis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Workfare to Work: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58 (1): 128–42.

Gatti, Domenico Delli, Mauro Gallegati, Bruce C. Greenwald, Alberto Russo, and Joseph E. Stiglitz. 2011. "Sectoral Imbalances and Long Run Cri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Meeting, Beijing, July 4.

Gelb, Alan, and Caroline Decker. 2011. "Cash at Your Fingertips: Biometric Technology for Transfers in Developing and Resource-Rich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253,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Gindling, T. H., and Katherine Terrell. 1995. "The Nature of Minimum Wage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as a Wage Floor in Costa Rica, 1976–91." *World Development* 23 (8): 1439–58.

———. 2007. "The Effects of Multiple Minimum Wages throughout the Labor Market: The Case of Costa Rica." *Labour Economics* 14 (3): 485–511.

Godfrey, Shane, Johann Maree, Darcy Du Toit, and Jan Theron. 2010.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South Afric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ape Town: Juta.

Grosh, Margaret, Carlo del Ninno, and Azedine Ouerghi. 2008. *For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Safety Net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unther, Isabel, and Andrey Launov. 2012. "Informal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pportunity or Last Resor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7 (1): 88–98.

Gupta, Poonam, Rana Hasan, and Utsav Kumar. 2008. "What Constrains Indian Manufacturing?" Working Paper Series 119, Economic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New Delhi.

Haltiwanger, John. 2012. "Job Creation and Firm Dynamics in the U.S." In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Vol. 12, ed. Josh Lerner and Scott Stern, 17–3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ltiwanger, John, Ron S. Jarmin, and Javier Miranda. 2011. *Business Dynamics Statistics Briefing: Historically Large Decline in Job Creation from Startup and Existing Firms in the 2008–2009 Recession.* Kansas City: Eu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

Haltiwanger, John, Stefano Scarpetta, and Helena Schweiger. 2008. "Assessing Job Flows across Countries: The Role of Industry, Firm Size and Regulations." Working Paper Series 1392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Hashemi, Syed, and Richard Rosenberg. 2006. *Graduating the Poorest into Microfinance: Linking Safety Net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Washington, DC: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Hayter, Susan, ed. 2011. *The Rol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Geneva: Edward Elgar.

Heckman, James J., and Carmen Pagés. 2000. "The Cost of Job Security Regulation: Evidence from the Latin American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 (1): 109–54.

Heckman, James J., and Carmen Pagés. 2004. *Law and Employment: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ambridge, MA: NBER Books.

Heckman, James J., Jora Stixrud, and Sergio Urzua. 2006.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4 (3): 411–82.

Herkenhoff, Kyle F., and Lee E. Ohanian. 2011. "Labor Market Dysfunction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1731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Hijzen, Alexander, and Danielle Venn. 2011. "The Role of Short-Time Work Schemes during the 2008–09 Recession."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Series 115,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Hirschmann, Albert O.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Seven Exercises in Retrospectio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2 (3): 7–36.

Holmlund, Bertil. 1998.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00 (1): 113–41.

Holzer, Harry, and Robert Lerman. 2009. *The Future of Middle-Skill Jobs.* Washington, DC: Center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Brookings Institutution.

Holzmann, Robert, David Robalino, and Noriyuki Takayama. 2009. *Closing the Coverage Gap: The Role of Social Pensions and Other Retirement Income Transfe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olzmann, Robert, and Milan Vodopivec, eds. 2012. *Reforming Severance Pa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otz, V. Joseph, Guido Imbens, and Jacob Alex Klerman. 2006. "Evaluating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Alternative Welfare-to-Work Training Components: A Re-Analysis of the California GAIN Program."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4: 521–66.

Ibarrarán, Pablo, and David Rosas Shady. 2008.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Job Training Programs in Latin America: Evidence from IDB Funded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0a. *Accelerating Action against Child Labour.* Geneva: ILO.

———. 2010b. *World Social Security Report 2010/11: Providing Coverage in Times of Crisis and Beyond.* Geneva: ILO.

ILO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2012. *Better Jobs for a Better Economy.* Geneva: ILO.

Kaplan, David Scott. 2009. "Job Creation and Labor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7 (1): 91–105.

Kaplan, David Scott, Gabriel Martínez González, and Raymond Robertson. 2007. "Mexican Employment Dynamics: Evidence from Matched Firm-Worker Dat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43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atz, Lawrence. 1996. "Wage Subsidies for the Disadvantaged." Working Paper Series 567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Kertesi, Gabor, and Janos Kollo. 2003.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Nearly Doubling the Minimum Wage: The Case of Hungary." Working Papers 6,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Budapest.

Kingdon, Geeta Gandhi, and John Knight. 2004. "Unemployment in South Africa: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World Development* 32 (3): 391–408.

Kluve, Jochen. 2010. "The Effectiveness of European Active Labor Market Programs." *Labour Economics* 17 (6): 904–18.

Kluve, Jochen, Hartmut Lehmann, and Christoph Schmidt. 1999.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 in Poland: Human Capital Enhancement, Stigmatization or Benefit Churn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 (27): 61–89.

———. 2008. "Disentangling Treatment Effects of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 The Role of Labor Force Status Sequences." *Labour Economics* 15 (6): 1270–95.

Kluve, Jochen, Friederike Rother, Susana Puerto-Gonzalez, Michael Weber, and David Robalino. Forthcoming. *Youth Employment Inventory (YEI) Synthesis Report: New Evidence on Employment Interventions for Young Peopl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Knabe, Andreas, and Steffen Ratzel. 2009. "Scarring or Scaring?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Past Unemployment and Future Unemployment Risk." *Economica* 78: 283–93.

Koeniger, Winfried. 2005. "Dismissal Costs and Innovation." *Economics Letters* 88 (1): 79–84.

Kucera, David, and Leanne Roncolato. 2008. "Informal Employment: Two Contested Policy Issue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7 (4): 321–48.

Kuddo, Arvo. 2009. "Employment Services and Active Labor Market Programs in Eastern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91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ugler, Adriana. 2004. "The Effect of Job Security Regulations on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Colombian Labor Market Reform." In *Law and Employment: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d. James J. Heckman and Carmen Pagés, 2004, 183–22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ugler, Adriana, and Maurice Kugler. 2003.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Payroll Taxes in a Middle-Income Country." Discussion Papers Series 4046,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Lechner, Michael, Ruth Miquel, and Conny Wunsch. 2005. "The Curse and Blessing of Training the Unemployed in a Changing Economy: The Case of East Germany after Unifica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171,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C.

Lee, Hee Chang, and Mingwei Liu. 2011a.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Transition: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Collective Voice in China." In *The Rol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Negotiating for Social Justice*, ed. Susan Hayter, 205–26.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2011b.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the Collective Voice Mechanism and the Labour Contract Law: A Survey of Labour Relations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eneva.

Lemos, Sara. 2004. "Minimum Wage Policy and Employment Effects: Evidence from Brazil." *Economía* 5 (1): 219–66.

———. 2007. "A Survey of the Effects of the Minimum Wage in Latin America."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s 07/04,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U.K.

Levy, Santiago. 2008. *Good Intentions, Bad Outcomes, Social Policy, Inform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exico.*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Lieberman, Samuel S., and Adam Wagstaff. 2009. *Health Financing and Delivery in Vietnam: Looking Forward.* Health, Nutrition, and Population Ser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Liu, Mingwei. 2010. "Union Organizing in China: Still a Monolithic Labor Movement?" *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 64 (1): 30–52.

Magruder, Jeremy R. 2010. "Intergenerational Networks, Unemployment, and Persistent Inequality in South Africa." *Applied Economics* 2 (1): 62–85.

Maloney, William F., and Jairo Núñez Méndez. 2003.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s: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Working Paper Series 98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Margolis, David, Lucas Navarro, and David Robalino. 2011. "Unemployment Insurance, Job Search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6660,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Martin, John P., and David Grubb. 2001. "What Works and for Whom? A Review of OECD Countries' Experiences with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8 (2): 9–60.

Messina, Julián, and Giovanna Vallanti. 2007. "Job Flow Dynamics and Firing Restrictions Evidence from Europe." *Economic Journal* 117 (521): F279–301.

Micco, Alejandro, and Carmen Pagés. 2006.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Industry-Level Data." Discussion Papers Series 2433,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Ministry of Finance. 2011. "How to Promote Public Deliberation in Budgeting."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2008. *The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 2005 (NREGA):*

Operational Guidelines 2008. New Delhi: Depart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India.

———. 2012. *Report to the People*. New Delhi: Depart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India.

Mondino, Guillermo, and Silvia Montoya. 2004. "The Effect of Labor Market Regulations on Employment Decisions by Firm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rgentina." In *Law and Employment: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n and the Caribbean*, ed. James J. Heckman and Carmen Pagés, 351–4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nitor Inclusive Markets. 2011. *Job Creation through Building the Field of Impact Sourcing*. Mumbai: Monitor Inclusive Markets.

Montenegro, Claudio E., and Carmen Pagés. 2004. "Who Benefits from Labor Market Regulations? Chile, 1960–1998." In *Law and Employment: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n and the Caribbean*, ed. James J. Heckman and Carmen Pagés, 401–3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unshi, Kaivan. 2003. "Networks in the Modern Economy: Mexican 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2): 549–99.

Neri, Marcelo, Gustavo Gonzaga, and José Márcio Camargo. 2001. "Salário Mínimo, Efeito Farole Pobreza." *Revista de Economia Política* 21 (2): 79–90.

Neumark, David, Wendy V. Cunningham, and Lucas Siga. 2006. "The Effects of the Minimum Wage in Brazil on the Distribution of Family Incomes: 1996–2001."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0 (1): 136–59.

Neumark, David, and Olena Nizalova. 2007. "Minimum Wage Effects in the Longer Ru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2 (22): 435–52.

Nickell, Stephen, and Richard Layard. 1999.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 3, ed. Orley Ashenfelter and David Card, 3029–84. Amsterdam: Elsevier.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4.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04*. Paris: OECD.

———. 2006.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06*. Paris: OECD.

———. 2010. *Sickness, Disability, and Work: Breaking the Barriers. A Synthesis of Findings across OECD Countries*. Paris: OECD.

———. 2011. *Divided We Stand*. Paris: OECD.

Ohanian, Lee E. 2010. "The Economic Crisis from a Neoclass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4 (4): 45–66.

Olinto, Pedro, Kathy Lindert, Rita Almeida, Jason Hobbs, and Rodrigo G. Verdú. 2007. *The Impacts of Public Transfers on Labor Supply in Brazil and Abroad: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aes de Barros, Ricardo, and Carlos Henrique Corseuil. 2004. "The Impact of Regulations on Brazilian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In *Law and Employment: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d. James J. Heckman and Carmen Pagés, 273–3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gés, Carmen, and Claudio E. Montenegro. 2007. "Job Security and the Age Composition of Employment: Evicence from Chile." *Estudios de Economía* 34 (2): 109–39.

Palacios, Robert, Jishnu Das, and Changqing Sun. 2011. *India's Health Insurance Scheme for the Poor: Evidence from the Early Experience of the Rashtriya Swasthya Bima Yojana*. New Delhi: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Pallares-Miralles, Montserrat, Carolina Romero, and Edward Whitehouse. 2012. "International Patterns of Pension Provision II: A Worldwide Overview of Facts and Figure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21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etrin, Amil, and Jagadeesh Sivadasan. 2006. "Job Security Does Affect Economic Efficiency: Theory, A New Statistic, and Evidence from Chile." Working Paper Series 1275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Pissarides, Christopher A. 1992. "Loss of Skill during Unemployme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mployment Shock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4): 1371–91.

Premand, Patrick, Stefanie Brodmann, Rita Almeida, and Barouni Mahdi. 2011.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and Self-Employment among University Graduate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in Tunis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ama, Martín. 2001. "The Consequences of Doubling the Minimum Wage: The Case of Indonesia."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54 (4): 864–81.

Ravi, Shamik, and Monika Engler. 2009. "Workfare in Low Income Countries: An Effective Way to Fight Poverty? The Case of India's NREGS." Working Paper, Indian School of Business, Hyderabad.

Ribe, Helena, David A. Robalino, and Ian Walker. 2011. *Achieving Effective Social Protection for All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From Right to Real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obalino, David, and Arup Banerji. 2009. "Addressing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Employment Policy Primer Note 1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Robalino, David, David Newhouse, and Friederike Rother. Forthcoming. "Labor and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during the Crisis and Recovery." In *Labor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Impacts and Policy Responses*, ed. Arup Banerji, David Newhouse, David Robalino, and Pierella Paci.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obalino, David, Aleksandra Posarac, Friederike Rother, Michael Weber, Arvo Kuddo, and Kwabena Otoo. 2012. "Towards Smarter Worker Protection Systems: Improving Labor Regulations and Social Insurance Systems While Creating (Good) Job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21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Robalino, David A., and Maria Laura Sanchez-Puerta. 2008. *Managing Labor Market Risks and Creating Better Jobs: Alternative Designs for Income Protection and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odriguez-Planas, Nuria. 2010. "Channels Through Which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s and Small Business Assistance Programs Work."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2 (4): 458–85.

Rodriguez-Planas, Nuria, and Jacob Benus. 2010. "Evaluating Active Labor Market Programs in Romania." *Empirical Economics* 38 (1): 65–84.

Rutkowski, Jan, Stefano Scarpetta, Arup Banerji, Philip O'Keefe, Gaelle Pierre, and Milan Vodopivec. 2005. *Enhancing Job Opportunities: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aavedra, Jaime, and Maximo Torero. 2004. "Labor Market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ver Formal Labor Demand and Job Market Turnover: The Case of Peru." In *Law and Employment: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d. James J. Heckman and Carmen Pagés, 131–8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ultz, T. Paul, and Germano Mwabu. 1998. "Labor Un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ages and Employment in South Africa."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51 (4): 680–703.

Selim, Nadia. 2012. "Innovation for Job Creatio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Sianesi, Barbara. 2008.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Active Labour Market Programs for the Unemployed." *Labour Economics* 15 (3): 370–99.

SMERU Research Institute. 2001. *Wage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Policy in the Indonesian Urban Labor Market*. Jakarta: SMERU Research Institute.

Souza, Paulo R., and Paulo E. Baltar. 1980. "Salario Minimo e Taxa de Salarios no Brasil." *Pesquisa e Planejamento Economico* 10: 1045–58.

Stiglitz, Joseph E. 2009.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and Lessons for Economic Theory."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35: 281–96.

Strobl, Eric, and Frank Walsh. 2003. "Minimum Wages and Compliance: The Case of Trinidad and Tobag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1 (2): 427–50.

Tatsiramos, Konstantinos. 2009. "Geographic Labour Mobility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 Europ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2 (2): 267–83.

van Ours, Jan C., and Milan Vodopivec. 2006. "Shortening the Potential Duration of Unemployment Benefits Does Not Affect the Quality of Post-Unemployment Jobs: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741,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Visser, Jelle. 2011. "ICTWSS: Database on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e Unions, Wage Setting, State Intervention and Social Pacts in 34 Countries between 1960 and 2007."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msterdam. Processed.

Vodopivec, Milan, Andreas Worgotter, and Dhushyanth Raju. 2005. "Unemployment Benefit System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Review of the 1990s."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47 (4): 615–51.

Wahba, Jacqueline, and Yves Zenou. 2005. "Density, Social Networks and Job Search Method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Egyp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8: 443–73.

Wei, Weiwei, Jianqiang Ping, Min Zhao, Shasha Liao, and Xeurong Wang. 2009. "Sectoral Collective Bargaining: Sectoral Collective Bargaining of the Wool-Sweate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t Xinhe District of Wenling." Chin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Processed (in Chinese).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World Bank. 2011. *World Report on Disability*. Washington, DC: WHO and World Bank.

workercn.cn. 2011. "Zhejiang: The Implications of Harmonizing the Management-Union Relationship in a Labor Abundant Province." April 6 (in Chinese).

World Bank. 200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7: Development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8. *Nota Conceptual de la Evaluación de Impacto del Banco Mundial del Programa Juventud y Empleo en República Dominican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a. *Doing Business 2012: Doing Business in a More Transparent Worl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b.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South As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c. *Program Document for Morocco First Skills and Employment Development Policy Loa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d. *Social Protection for a Changing Ind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Forthcoming. *Doing Business 2013: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Business Regul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第 9 章

9

劳工政策之外的政策问题

基本要素需要到位，限制高发展回报就业创造的因素需要被移除或冲抵。跨界的政策协调可能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改善生活水平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有利于私营领域主导就业创造的政策环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扶持性商业环境、人力资本和法治均是必要的组成成分。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减缓了经济的总体波动，保持主要相对价格的一致性。商业环境提供私营领域运营所需要的基本公共物品：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健全的规章制度。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良好的营养、健康及塑造人类技能的教育。法治保障合同的履行，法治也包括权利的逐渐实现，以规避增长与不可接受的工作形式的并存。这些都是就业政策所依赖的基本要素（见图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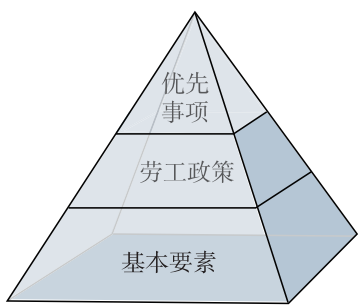
仅仅基本要素可能不足以促进就业创造并应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就业挑战。劳工政策需要在合理的范围内设置，即避免两个悬崖的平台地带：一个悬崖是阻碍在城市中和全球价值链中就业创造的误导性干预措施；另一个是最弱势群体尤其缺少话语权和社会保障。

市场可能发挥作用，也不会引起过多摩擦，但是市场可能不足以提高农业经济体中的糊口农业的生产率或为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的青年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然而，政府的积极作用需要慎重考虑。就业主要由私营领域创造，当个体动机与社会目标不一致时，政府就有理由进行干预，比如，当就业对女性不利，或青年人口“排队”想当公务员，当城市过于拥挤不能吸纳更多的农村移民从事生产活动，或当物流成本过高不利于国内公司涉足国际贸易时，政府的干预就是正当的。在这些情况下，政府政策应当以移除阻碍个体、农场和公司做出有利于社会的最佳选择的因素为目标。如果不能准确地识别限制因素，或改革不具备政治上的可行性，政策可以以抵消而不是直接移除限制因素为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

政策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之外。

国内就业政策是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但是也存在国际协调行动的领域。权利是一种全球性公共物品，一国侵害权利的行为会对世界产生危害。但是一国的就业创造政策可能对另一国的就业和收入产生积极的或负面的影响，而移民政策可以在国外产生机会或杜绝机会。劳工标准、国家贸易规则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移民协议都是管理这些国际外溢效应的可用工具。在协调产生和使用就业的高质量数据的重要全球性计划中，国际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些数据是稳健的决策所依赖的基础。



构建基本要素体系

绝大多数就业是由私营领域创造的，由正规领域企业及微型企业和农场创造。私营领域投资和就业创造的相关条件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扶持性的商业环境、人力资本和法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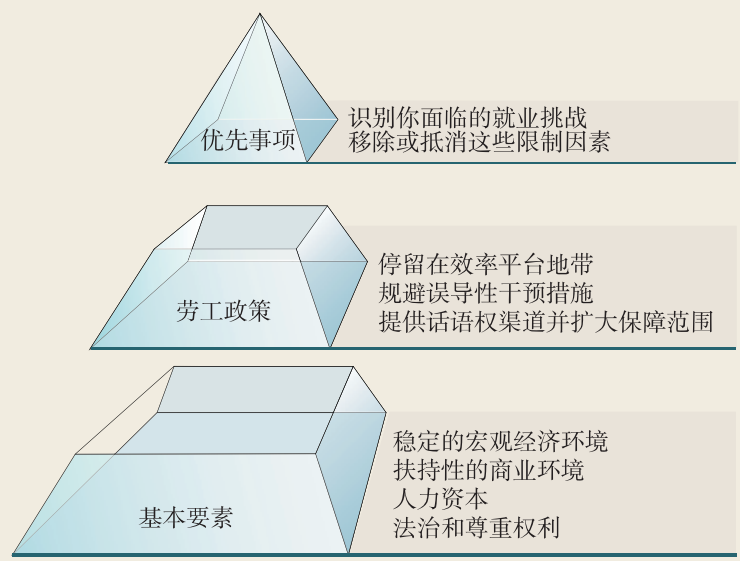
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在对 13 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战略的政策成分进行评估时，就业和增长委员会这样评述，“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繁荣发展。价格水平、汇率、利率或税负的剧烈波动是私营投资的主要阻碍因素，而私营投资是增长的直接推动力量”。[1] 宏观经济不稳定短期内也对就业和收入产生影响。根据近期的估测，国内生产总值（GDP）降低 1%，将导致日本的失业率增加 0.19 个百分点，美国的失业率增加 0.45 个百分点，西班牙的失业率增加 0.85 个百分点。[2]

在发展中国家，收入补贴机制更受到限制，宏观经济不稳定对公开失业的短期影响常常不如它对就业构成的短期影响那么大。经济衰退导致向非正规就业或以家庭为基地的活动转变，而未必是失业。因此，研究重视宏观经济波动如何对非正规就业的比例造成影响，而不是重视如何对失业率造成影响。[3] 全球危机影响的国家案例研究已经确认了发展中国家就业的波动性。但是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相关性丝毫未减：尽管总的波动对就业工人的数量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总的波动的确对就业中工人的收入以及他们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工具产生影响。[4]

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常常是不具可持续性的预算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结果。20 世纪 80 年代，巴西陷入债务危机和高通胀危机，导

图 9.1　政策需要分成相互区别的三层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致巴西经济增长大幅度降低，出口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减半。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的国际高利率是造成危机的导火索，而遭遇遏制的地方政府支出又难以为继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然而紧缩预算和严格的货币政策原则可能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杖。预算赤字多多少少令人担忧，这取决于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有多快，而中央银行的独立需要以发展战略的整体连续性来考量。对宏观经济管理稳健性的评估要求考虑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5]

然而并不是所有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都是自我造成的。动荡可能来自自然灾害或国外发生的危机等这些国家鲜能控制的冲击。如果这类冲击发生和当这些冲击发生时，可以采用预警政策减缓这些冲击的影响。但是国家常常需要以短期一揽子刺激措施或调整措施来响应这些冲击。这类响应的效果是矛盾的。近期一项基于 29 个依赖援助的国家的经验的研究估计，政府额外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就增长将近 0.5 个百分点。所谓的乘数效应远远低于美国，美国在 0.8 和 1.5 之间波动。[6]

剧烈波动只是宏观经济环境对就业和收入产生不利影响的一种方式。主要相对价格的失调是宏观经济环境对就业和收入产生不利影响的另一种方式。一国外汇收入的激增常常导致对本国货币估价过高，提高进口能力并降低出口的竞争力。发展中世界的资源丰富型国家面临着类似的货币升值压力。[7] 过去几年的商品繁荣只是加强了这些压力。货币估价过高的问题也存在于需要大量外国援助来启动发展、应对自然灾害或促进冲突后恢复的国家中。例如在阿富汗，据估计到 2010 年 11 月，来自多边和双边捐赠者的平民援助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0%。[8] 货币估价过高是许多其他外援没有达到阿富汗的水平、但外援仍然是其预算重要来源的国家所担忧的问题。对 83 个发展中国家 1970 年至 2004 年期间的分析表明，援助促进增长（尽管回报率持续下降），但是诱发本国货币估价过高，从而对出口多元化造成负面影响。[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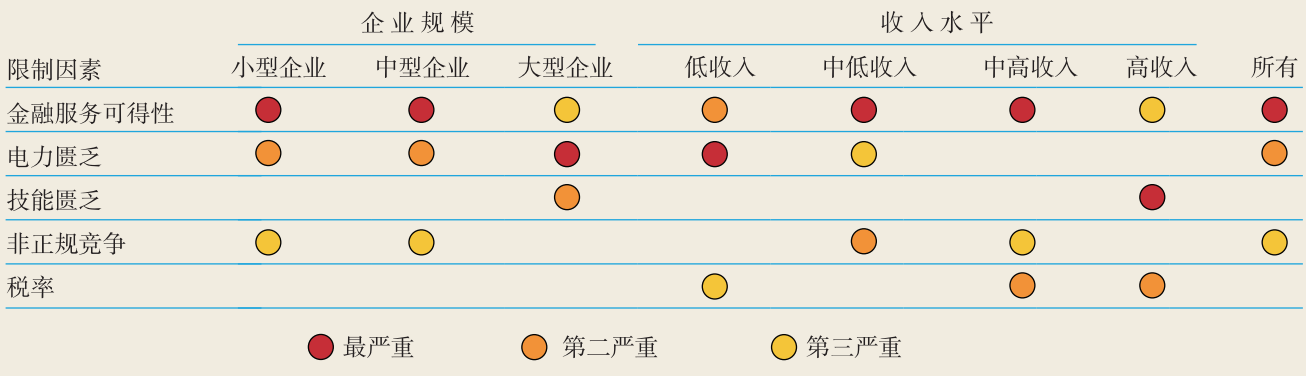
避免汇率失调是维持出口领域蓬勃发展，进而创造与国际市场和全球价值链相联系的就业的必要条件。[10] 为此甚至出现了偏重本币贬值的案例，理由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领域受到制度失灵和市场不健全问题的严重困扰。[11] 然而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同时实行本币贬值。而且尽管就业融入世界市场对增长具有积极移除效应的论断是合理的，这些就业未必是发展收益最高的工作。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就业议程，从为女性创造就业机会到支持城市创造就业等种种不一。汇率只是其中一种工具，很少能提供如此多样化的议程。

扶持性的商业环境

在不同发展水平的企业和国家间，正规的私营领域企业最严重的限制因素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金融服务可得性、基础设施和包括税收和不公平竞争在内的规章制度（见图 9.2）。技能短缺也是关键因素，但是主要是对大企业尤其是富裕国家而言。

金融服务可得性赋予公司扩张、投资新技术或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现金流顺畅的能力。[12] 金融市场也在将资源分配到更具生产效率的使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3] 金融领域的透明性避免了资源被导入具有政治关系或经济权力的用途中，也为金融的普惠

图 9.2　金融和电力是正规私营企业面临的顶级限制因素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公司，待出版。

注释：分析基于世界银行在 106 个国家对 46 556 家企业进行的企业调查。小型企业的员工不超过 20 人，中等企业的员工在 21~99 人之间，大型企业的员工为 100 人及 100 人以上。

性提供支持。记录债务人良好和不良行为的信贷历史有助于人们展示自己的信誉。但是需要以规章监管来确保资金分配的透明和竞争。2008 年金融危机重启了对下述问题的激烈讨论，即对金融领域合理的监管水平及以创新和包容平衡谨慎和稳健的必要性。

质量差强人意的、能够负担得起的基础设施可得性常常是阻碍企业增长和就业创造的另一个顶级限制因素。电力使应用更先进的技术成为可能。电力使时间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农村地区，电力可以极大地促进女性就业。[14] 电信使供应商、生产商和顾客之间的信息流通更顺畅，因特网和移动技术促进了新观念的传播。和港口、飞机场一样，公路扩大了市场准入。[15]

在许多低收入国家中，劣质基础设施是极其严重的挑战。然而，基础设施问题部分源自基础设施服务的管理方式，而不仅仅是建设额外设施及公路的资源不足引起的。据估计，近期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增长，一半以上归功于改善的基础设施。[16] 但是为消弭基础设施服务仍然存在的巨大差异就需要提高效率，而效率源自更好的管理支出与维护、价格政策和规章制度等。在许多国家和基础设施此领域，基于政治关系的垄断导致和允许竞争的地方相比，所提供的服务质量较少，价格较高，质量较差。[17]

规章制度是影响企业增长机会的另一个方面。一些规章制度决定游戏的规则，鼓励（或阻碍）某些活动。其他规章制度对企业从开展到履约到关闭等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产生影响。[18] 规章制度对经营成本产生影响，无论从货币的意义上还是从需要遵从的时间都是如此。和延迟收到许可证或执照一样，为满足要求而采取的措施或付费是企业的负担。同一地方不同公司履行规章制度或收到许可证所需时间的巨大差异反映了自由裁量权和腐败问题的存在。[19] 除了这些宽泛的成本措施外，规章制度对可用机会的类型及可用的范围产生影响。规章制度可以减少或加剧不确定性和腐败，但是也可能对竞争的程度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对经济体中的工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由于商业规章制度对竞争的程度产生影响，因而形成了创新和提高生产率的压力。竞争有助于将资源从低效率活动中再分配到生产率更高的活

动中去。以丧失的产出和就业增长来考量，旨在保护行业或阻碍新进入者的规章制度成本极其高昂。[20] 各国关于商业准入的规章制度与生产率和企业创办呈负相关关系，对那些流转率较高的领域的影响较大。[21] 放松准入要求有助于扩大墨西哥的企业登记和就业，为消费者降低价格。这一效应主要是通过创办新企业而不是对既有非正规企业的规范化实现的。[22] 将准入要求放松和其他体制改革（比如投资促进和贸易物流）结合起来，这要比单纯的放松准入有效得多。[23]

人力资本

良好的营养状况、健康和教育成果本身就是发展的目标，因为它们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是它们也使得人们具备了生产性就业和获得公开就业机会的资格，进而通过就业渠道，人力资本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根据增长与就业委员会，“任何一个长期维持高增长的国家都大力推进公民教育，深化人力资本发展。”[24]

人力资本和就业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来自世界范围内的有力证据显示，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劳动收入就会大幅度上升，而这种收入溢价反映了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生产率也更高。[25] 从中长期来看，营养、健康和教育形成的技能和能力与生产率增长和减贫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系。[26] 良好的健康状况也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在疟疾肆虐的地方，工人平均每年的发病率是两次，每次要丧失 5~10 天的工作时间。[27] 在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盘尾属皮肤病使受感染工人的收入降低了 10%~25%。[28] 正因为如此，人力资本成了理想就业成果的基本要素。

人力资本是累积形成的。它是由连续的、上升的阶段构成的生命周期进程，每一个阶段的累积都建立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之上。在生命中的第一个 1 000 天，即从出生到两岁，良好的健康和营养状况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一时期的大脑发育对一生的身体健康、学习能力和社会行为具有影响。[29] 儿童所有的基本大脑和心理结构在生命的早期形成，这是此后增长和学习的基础。事实已经证明，儿童早期的发育不良对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碘缺乏症可以导致大脑发育不全，认知功能刺激不足会降低学习能力。保证从孕期到生命早年充足的营养、健康和认知刺激功能，大幅度提高了此后教育投资的回报。[30] 对出生在贫穷家庭、又处在这些关键发育阶段的儿童提供补贴可以大幅度提高机会平等性。提供补贴的时间越晚，将儿童导向正常发育轨道的难度就越大，成本就越高。在罗马尼亚，在早期转型期间，孤儿在脱离孤儿身份时，其认知绩效低于实际年龄。社会的、情感的和认知的隔离是普遍存在的问题。[31]

尽管基础是早期打下的，人力资本和技能在儿童、青年和工作生涯中持续形成。在青年期结束之前，教育是进一步发展认知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基本要素，但是学习能力持续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塑造。在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早期，社会技能仍然具有可塑性。[32] 青年承认可以继续专业化的技能建设，包括高等教育层面的技能建设，但是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他们是否已经取得了学习并适应不同任务和解决问题环境的一般技能。在更具活力的经济体中，这些能力更为重要。

遗憾的是，证据显示，许多国家对儿童和青年人力资本建设的重视不足。提供体系的质量常常不能与基本社会服务准入的扩张同步进行。以教

育为例，到 2010 年，低收入国家小学净入学率达到了 80%，学校毕业率是 68%，初中总入学率超过了 50%。[33] 但是学习成果明显滞后。在参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至少 20%的 15 岁学生是功能性文盲。对一些国家而言（包括印度尼西亚、吉尔吉斯斯坦、巴拿马、秘鲁、卡塔尔、突尼斯和参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两个印度省），60%的 15 岁学生都未能达到这个水平。同样，二年级期末的早期阅读测试显示，在许多国家中，相当一部分比例的学生不能阅读一个简单的单词，洪都拉斯农村学校的比例约为 30%，冈比亚的比例为 50%，马里的比例超过了 80%。[34] 因此，入学人数未必代表实际的学习建设和技能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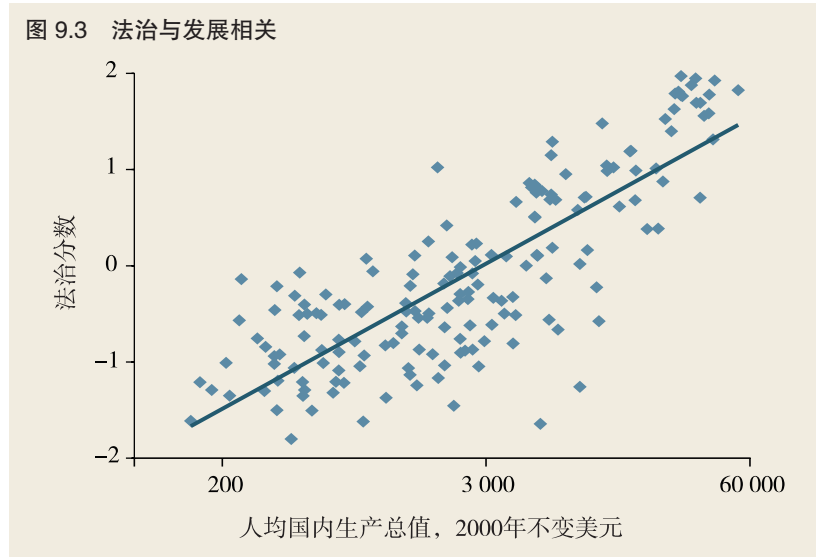


图 9.3　法治与发展相关

资料来源：2010 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世界治理指标 2010。

注释：法治分数是衡量代理人对法治社会信心程度的标准，其中包括履约绩效、财产权、警察、法庭及犯罪活动和暴力行为的可能性。

法治和尊重权利

在各国，支持法治的制度的出现是与较高的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的（见图 9.3）。[35] 明确的财产权和强化治理的制度机制可以创造一种企业愿意投资、达成协议并创造就业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可能更愿意承担风险创立新企业，成为企业家。[36]

尊重财产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很密切。[37] 财产权使企业在投资时不必担心自己的资产被盗窃或没收，促进了私营领域的增长。履约能力拓宽了潜在供应商和客户的范围，个人关系在建立信任中的作用也随之下降。[38] 和不相信自己的财产权得到保障的企业家相比，相信自己的财产权得到保障的企业家将更多的利润用于再投资。[39] 提高财产权的安全性常常包括设立有效的所有权和登记程序。评估和保护其他类型财产权利的机制也同样重要，其中包括管理知识产权的立法。

猖獗的暴力犯罪活动可能对发展和就业创造产生毁灭性的影响。[40] 无法无纪可能导致企业离开，阻碍国内外投资。各国投资环境调查一致显示，犯罪活动和腐败行为阻碍企业运营。[41] 普惠性和响应性制度减少暴力行为，提高安全性。加大发现和打击白领犯罪和渎职行为的力度可以减少腐败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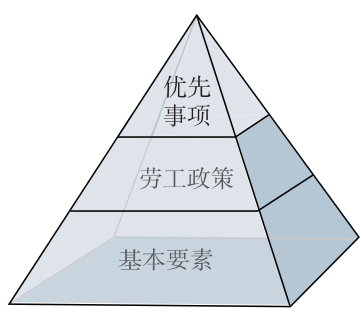
有效的司法体系是贯彻财产权、减少犯罪活动和腐败行为的关键因素。独立的、负责任的、公正的司法体系有助于私营领域的增长和就业创造，这主要是通过贯彻管理交易的准则、帮助确保增长成本和收益的公平分配来实现。[42] 司法体系可以执行合同，降低公司的交易成本，创造安全的、更可预测的商业环境。[43] 高效法庭的存在增加了企业投资的意愿。[44]

尊重权利的制度环境是法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动标准提供了不可接受的童工、强迫劳动、歧视、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力领域中的指导方针。[45] 就业中的健康和安全也需要政府和雇主重视。确保标准在实践中的贯彻执行要求为工

人和雇主提供信息获得渠道。信息可以增强工人让雇主和中介负责的能力和意愿。信息也有助于确保所有参与者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强化执行制度和不公平事件补救制度是另一个必要的结构单元。

确保权利和标准得到维护要求不仅要实现已经获得的权利，而且要将这些权利和标准延伸到正规法律和规章所不及的工人。非正式工人协会可以在告知工人信息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但是仅仅信息本身常常不足以解决问题：老挝的制衣工人认为他们被告知就业的基本条件，但是他们并不总能理解其中的细节，也不知道如何实现他们的权利。[46] 非正式工人组织不仅可以帮助工人学习和实现权利和标准，而且也可以代表个体和群体向法庭提起诉讼。[47]

问责制度的质量关系到劳动权利在实践中的实现程度。[48] 由于法庭诉讼常常时日长，成本高，解决纠纷的替代性机制，譬如在法庭听审之前进行调解、调停和仲裁可以拓宽司法和不公平事件补救的渠道。[49] 这些替代性机制对那些因成本高昂或其他障碍因素而不能采取法庭诉讼手段的工人而言尤其重要。



制定就业政策优先事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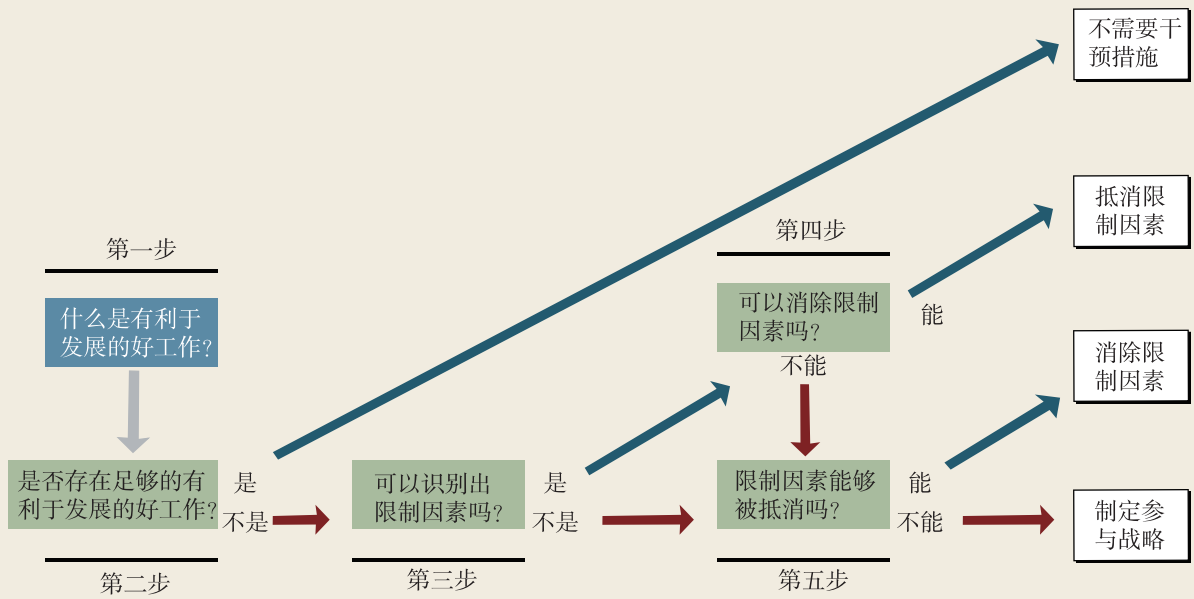
除了确保基本要素到位、劳工政策范围合理之外，决策者可以帮助实现就业的发展收益。一些工作对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的作用大于其他工作。这类工作是哪些工作取决于国家的环境：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口、禀赋和制度。在某些环境中，并不存在阻碍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兴起的因素，因而不需要具体的政策。在其他环境中，政府可以支持私营领域创造更多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有时，取缔阻碍具有高发展收益工作兴起的既有限制因素是可能的。在其他情况下，政策可能需要规避限制因素。

制定政策优先事项的简单办法遵循一系列步骤。第一步是必须评估国家环境，识别特定的就业挑战或国家面临的挑战。第二步是甄别最具发展收益的工作是否对个体最具吸引力，或最能给企业带来收益。当激励因素一致时，即就业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等时，就不缺乏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干预措施也就没有必要。第三步是是否能够准确指出导致动机不一致的制度失灵问题和市场不健全问题。第四步是理解政治上可行的改革是否可以消除或矫正这些失灵问题和不健全问题。第五步涉及在政治上可行的改革不能消除或矫正这些问题时，是否应当以其他政策重新协调这些动机（见图 9.4）。

第一步：什么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评估工作在具体国家环境中的发展收益是识别优先事项的重要一步。具有最高收益的工作的性质因国家特征而异，这里国家特征包括国家的发展阶段、禀赋和制度。农业经济体、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资源丰富的国家、具有高青年失业率的国家及其他环境所面临的就业挑战各不相同。而且由于就业议程的多元化，最具发展影响的工作也不相同。

第二步：是否存在足够的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 一国可能面临也可能

图 9.4　决策树可能有助于制定政策优先事项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不面临阻碍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限制因素。例如，轻工业可以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对减贫具有重大影响。如果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新的制造业工作的发展收益就可能实现。如果是这样，就很难证明确立基本要素和采取充分的劳工政策之外的政府干预措施的合理性。

当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给个体带来的利益不足或给农场及企业带来的利益不足时就会产生动机的不一致。可以使用数据和分析来识别工作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异。可以说，发展经济学的诸多关键领域解决的就是这些差异问题。例如，公共财政工具可用于衡量资本和劳动的税负，评估个体之间或企业之间的交叉补贴。劳动经济学方法可用于揭示特定群体工人实际收入和潜在收入的差异。贫穷分析有助于甄别更可能为贫穷人口提供机会的工作类型，或甄别哪些地方的就业创造对减贫具有更大的影响。生产率研究可以有助于量化外国直接投资公司、与全球市场相联系的企业或功能城市中的就业溢出效应。而价值调查分析可以揭示哪种类型的工作与网络关系相联系并提供社会身份认同。

第三步：可以识别出限制因素吗？下一步便是理解为何具体类型的工作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会有差异。这类差异显示还存在未充分发掘的就业溢出效应。这类差异一般是由市场不健全和制度失灵问题造成的，市场不健全和制度失灵导致人们从事从社会角度而言次优的工作，导致企业创造的工作达不到原本可能达到的发展效益，导致就业联系人们的作用低于社会所希望其达到的程度。但是识别这些限制因素的所在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文化、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宽泛组合可能导致女性的就业机会不充分。同样，我们很难准确确定实现城市功能性的关键阻碍因素是存在于土地市场，还是存在于协调城市发展的制度安排中，或是存在于提供金融基础设施收入的能力中。

第四步：可以消除限制因素吗？如果可以识别导致动机不一致的制度失灵和市场不健全问题，那么就应当考虑改革。改革以问题的根本所在，即制度失灵和市场不健全问题为目标，这是一条良好的经济原则。在改革具有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可行性的时候，决策者应当直接应对阻碍创造更多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限制因素。

第五步：限制因素能够被抵消吗？改革可能在技术上或政治上不具可行性。也许就业的限制因素是不可识别的。一个替代性方案是确立可以恢复就业创造激励因素的抵消政策。例如，如果一套零散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导致女性难以就业，行动就应当以提高女性的就业率为目标，并通过对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的针对性投资和干预来实现（见专栏 9.1）。同样，如果政治上被指责的规章制度滞缓了劳动力朝着更具生产率的活动再分配，城市基础设施和物流可能提供城市中工作和与全球市场相联系的工作的吸引力（见问题 9）。但是限制因素既不能消除也不能被抵消的情况也存在。因此，基于对关键利益相关者的选择和认可深刻分析上的参与战略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

消除或抵消限制因素的决策必须是精心选择的、得到良好公共财政原则支持的决策。需要对政策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评估，但是当总体发展影响是指导目标时，计算是不同的。而且计算也更加困难。例如，在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中实行的针对前战斗人员的就业计划，可以以参与者的收入收益是否可以证明项目成本的合理性来考量。但是全面计算项目的收益

专栏 9.1　如何增加女性的劳动力参与？

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的重大增长。拉丁美洲的变化最快。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女性超过了 7 000 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 36%上升到 43%。在哥伦比亚，该比率从 1984 年的 47%上升至 2006 年的 65%。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东和北非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每年仅增长 0.17 个百分点。

近期研究将这一迅速转型归因于带小孩的已婚女性或同居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增加，而不是归因于人口统计、教育或商业周期。社会态度的变化有助于转型，但是对这一复杂领域进行直接政策干预的范围有限，合理性也不足。例如，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的参与率非常低。但是这不能机械地归咎于宗教，因为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参与率很高。其他社会规范和规章制度阻碍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尽管她们愿意也有能力加入劳动力大军。

尽管能够影响社会态度的范围有限，但是证据显示，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和项目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证据也显示，对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的针对性投资和干预措施的组合可以改变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和她们的收入回报。这类投资和干预措施可以归入三类。投资和干预措施可以应对可得服务的匮乏（比如电力匮乏或托儿所设施匮乏），可得服务的匮乏迫使女性将大量时间用于家庭生产。投资和干预措施可以降低女性积累教育、资本和土地等生产性资产的难度，帮助她们进入高生产率的市场活动。投资和干预措施可以消除阻碍女性拥有平等就业机会的有偏见的甚至是歧视性的规范或规章制度。

这三类针对性投资和干预措施都存在成功的案例。公共提供或补贴托儿服务可以降低女性从事市场工作时家庭里产生的成本。案例包括墨西哥的庄园托儿计划（Estancias Infantiles），哥伦比亚的社区家园计划（Hogares Comunitarios）以及阿根廷和巴西的类似计划。基础设施服务的改善，尤其是水电服务的改善，可以解放女性用于家务劳动和护理工作的时间。例如，南非农村地区的电气化使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增加了约 9%。矫正服务提供制度中的偏见，譬如矫正政府土地分配工作和登记机制，赋予女性拥有和继承资产的资格。最后，采纳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网络关系及消除歧视性规章制度对提高女性的工作收益具有重要作用。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Amador 等 2011，Chioda 2012 和世界银行 2011i 的总结。

需要将项目对建设和平的潜在积极效应纳入计算范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社会项目的成本是每受益者 800 美元。[50] 根据传统标准，这类项目将可能被判定为成本效益低的项目。该项目是否仍然值得实行取决于决策者对项目社会凝聚力利益潜在价值的认识。这类就业溢出效应可能不能得到精确量化，但是为表现决策的透明性，至少应当表明就业的这种溢出效应。

多元化的就业议程，多元化的政策重点

识别阻碍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限制因素，然后消除或抵消这些限制因素，遵循这样的方案，听起来可能是抽象的工作。但是一些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而且直接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是可能的（见专栏 9.2）。越南、卢旺达、智利和斯洛文尼亚的经历表明，政策可以有效支撑创造高发展收益的工作。这些国家面临的就业挑战各不相同，因而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可为其他面临相似就业议程的国家所借鉴。通过确保宏观经济稳定、改善商业环境及遵守法治原则理顺基本要素是所有四种案例的显著特征。这四国也在合理的范围内采用劳工政策和制度。但是显然，这些国家针对的主要限制因素并不在劳动力市场范围之内。

农业经济体：越南

持续增长的农业生产率解放了劳动力，使他们得以在农村从事非农业工作并最终迁居城市，这是农业经济体面临的主要挑战。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和 90 年代初期经济改革伊始的越南清楚地展现了这种挑战。1993 年是具有可靠数据的第一年，这一年，70%的就业是农业就业，58%的人口生活在贫穷中，饥荒随时可能发生。[51] 二十年后，越南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泰国的第二大大米出口国，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咖啡出口国，世界上最大的胡椒出口国，而且是世界橡胶、腰果和海鲜的最大出口国。到 2006 年，贫困率降至 16%，这是越南有记录以来贫困率下降最快的时期。这二十年的加速发展使越南脱离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范畴，跻身于具有良好发展愿景的中低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越南从低效的农业经济体向出口强国的转型发轫于土地改革。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和 90 年代早期，越南摒弃了集体化政策，开始允许地方当局将公共土地再分配给个体家庭，并进而将土地使用权赋予他们。土地向农村家庭的转移严格遵守平均主义，在北部地区尤其如此。[52] 到 1993 年，土地使用权基本上可以被转让、交易、抵押和继承。土地改革是广泛的一揽子改革，或革新（Doi Moi）的组成部分，改革使越南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3] 一揽子改革包括移除大部分领域的进入壁垒，其中包括农产品的商业化。竞争缩减了农场交货价格和国际价格的差异。土地改革和管制撤销与大力重视农业推广服务一道，促进了极小农场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

旨在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的政策与土地改革并行不悖。越南向外国投资者开放，首先是自然资源开采和轻工业等挑选出来的部门，然后随着越南 2007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越来越多的领域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从 1992 年到 1994 年的短短两年内，登记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四倍；到 2007 年，流入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持

专栏 9.2 世界上存在成功应对就业挑战的典范

韩国采取有效的政策实现了城市化经济体的聚集效益和一体化效益。[a] 1960 年，将近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但是到 2000 年，五分之四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今天，首尔已经成长为一个人口超过 1 000 万的城市，是国家整体增长的引擎，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和 90 年代初期以来尤其如此。许多工业集群在毗邻首都的地区建立起来。精心设计的、阶段性的城市发展政策伴随着就业从农业向轻工业再向具有较高附加值工业的转移。首先制订了土地开发方案，随之又建立了土地使用管理体制，最后是全面的城市规划。住房和交通政策遏制了城市化过程中的逆经济因素。韩国城市中心的全球一体化是经济活力的核心推动力量。为支撑结构转型，韩国对技能进行大规模投资。成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1960 年的 4.3 年增加至 2010 年的 11.8 年。在经合组织（OECD）开展的对 15 岁成人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的国际测验分数中，韩国高居榜首。

小岛国家的特征主要是规模小，孤立和易受气候风险的冲击。在这样的环境中，收获聚集和全球一体化的生产率收益尤其具有挑战性。汤加目前以移民作为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重要途径。[b] 居住在国外的汤加人将近 10 万，几乎和国内一样多。据估计，汇款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2%，覆盖 80%的家庭，提高了教育水平和生产性投资。移民协议也覆盖了较贫穷和技能较低的工人。2007 年，新西兰启动了季节工作许可（RSE）方案，为来自大西洋的季节工人提供了在园艺业和葡萄栽培业中临时就业的机会。对该方案参与者的家庭而言，方案带来了高达 38%的收入收益，使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耐用消费品，更多地改善福利。除收入之外，获得季节工作许可的工人将学来的农业技能知识、计算机文化和英语语言技能带回母国。

规范化国家可以设想将其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率提高至工业国家的普遍水平。但是正如扭曲激励体制并削弱生产率的风险很大一样，成本也很高。巴西是能够在规范化过程中同时实现迅速增长和扩大正规领域的国家之一。[c]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巴西经济的年增长率在 5%左右，这受益于全球商品市场的繁荣和具有竞争力的汇率。但是和其他迅速增长的国家不同，巴西正规领域的就业创造是非正规领域的三倍。仅仅在危机爆发之前的短短五年内，正规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例增加了约 5 个百分点。在某些方面，巴西不像是一个真正的“规范者”，它拥有庞大的管控经营领域，它的劳工制度成本高昂。尽管全面解释巴西迅速的规范化为时尚早，但是巴西简化方案并扩大方案覆盖范围的努力和规章制度是促进巴西迅速规范化的因素。政府已经通过非摊缴性方案扩大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政府还简化了小企业的税收规则，提高了企业将其工人转变为正式工人的激励，加大了税收和劳工制度的执行力度。

在老龄化社会里，老年赡养率的增加降低了每人的人均生产率，而老年人护理成本的持续增加又降低了生活水平。但是应对这些挑战所需要进行的改革在政治上难以实行，而且常常涉及艰难的权衡。波兰是已经采取了一些成功举措的国家之一。[d] 到世纪之交，由于早退和病退退休金覆盖面的日益扩大，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但是降低新受益人进入的几项改革导致就业人口比率从 2006 年的 60%增加至 2009 年的 65%。2005 年对病退退休金申请资格准则的改革大大降低了新增加的受益人。2009 年，退休金改革解决了选择早退的问题。这项改革的内容是，老年人退休金收益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而下调。因此从长期来看，波兰有望实现退休金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但是这种可持续性是有代价的：作为退休时收入的收益比例大大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2012 年，一轮新的退休金改革将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从当前的男性 65 岁和女性 60 岁提高至 67 岁。这种提高应该有助于提高福利水平，而且不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不利影响。然而，放松任何年龄不活跃人口和失业人口劳动力市场准入的政策和方案仍然不足，而且其效果也有待确定。同样，长期健康医疗仍然主要依靠非正规安排，但是公众正在讨论改革。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 Park 等 2011；Yusuf 和 Nabeshima 2006。

b. Gibson，McKenzie 和 Rohorua 2008；世界银行 2010a。

c. Fajnzylber，Maloney 和 Montes-Rojas 2011；经合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 2011。

d. Styczynska 2012；世界银行 2011b。

续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8%。[54] 由于法律体制仍在转型的复杂情况，一开始投资者与国有企业合作。但是国有企业逐渐获得了自主经营决策的灵活性，而且许多国有企业被全部或部分出售给私营投资者。到世纪之交，未开发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准则，尤其是在服装、鞋袜、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55] 这些领域的企业雇用大量工人。尽管重大的挑战依然存在，但是越南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迅速城市化的经济体，这是越南成功

的表现。

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卢旺达

今天的卢旺达似乎远远摆脱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战争和种族屠杀，而就业促进了这一不同寻常的转折。冲突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生命大量丧失，基础设施毁坏，国家制度出现危机，国内生产总值降低了 50%以上。[56] 冲突的终止和积极的一揽子改革使得卢旺达的经济在 2000 年反弹到危机前的水平。[57] 增长在持续，据估测 2011 年达到 8.8%，2005 年至 2010 年期间贫困率降低了 12 个百分点。[58]

在脱离冲突的国家中实现可持续就业创造的前提条件是确保和平并降低暴力活动反复发生的风险。[59] 冲突结束以后，卢旺达政府对 54 000 多名前战斗人员的复员和遣散予以支持。前战斗人员受到包括现金援助、咨询、职业培训、教育、收入产生支援和有社区成员参加的社会再融入活动在内的一系列帮助。[60] 在冲突结束十多年后，前战斗人员中的大多数参与了职业培训或工作，主要是从事糊口农业和自就业，和卢旺达的其他人口相似。[61] 据悉尽管在前战斗人员中，许多人都持续遭受社会和心理困苦的折磨，但是他们与邻里的关系良好，对邻里的信任在提高。2012 年，73%的前战斗人员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再融入的满意，85%的社区成员感觉到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信任。[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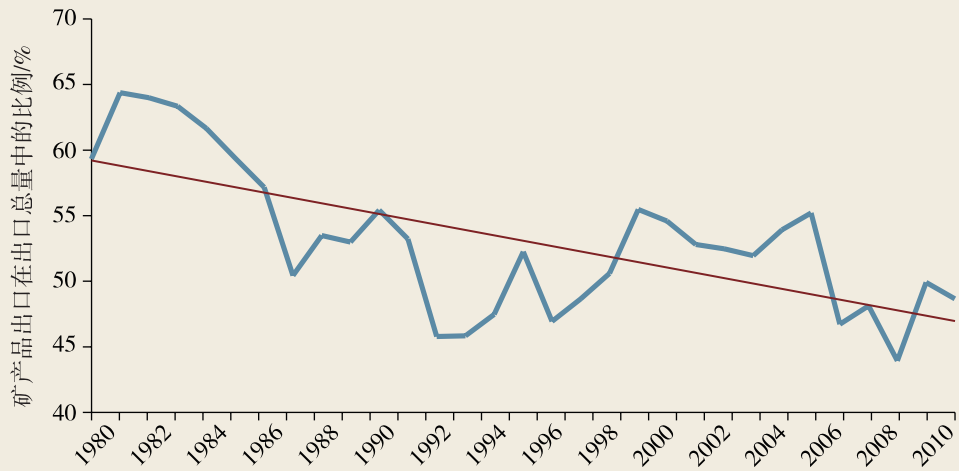
尽管前战斗人员在卢旺达 1 000 万的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很小，通过再就业实现的社会再融入具有社会凝聚力收益，这为国家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卢旺达开展制度改革和经营规章改革，恢复了私营领域的活力。[63] 通过撤销管制和对新技术进行投资的决策复兴咖啡业是政府私营领域发展战略的典范之一，这一决策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64] 卢旺达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就业挑战。超过 80%的人口在生产率有待提高的糊口农业或家庭企业中工作。而且，非农就业机会有待扩大，而当前小型制造业领域的增长将对非农就业机会的扩大有所助益。[65] 但是经济整合和通过就业实现的社会凝聚力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6]

资源丰富型国家：智利

尽管许多资源丰富型国家似乎不能实现多元化并陷入不良治理的困境，智利对其铜矿财富的合理管理却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特例。2010 年，智利的铜储量占世界储量的 28%，铜生产约占世界铜生产的三分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智利的铜出口占世界的 17%。[67] 但是尽管铜在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智利还是在有效管理货币升值和宏观经济动荡等资源相关风险的同时，实现了其出口产品结构和经济的多元化。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非矿产品出口在出口总量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2007 年之后全球商品繁荣期间又有所下降（见图 9.5）。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非矿领域的就业增势强劲，年增长率超过 2%。[68] 过去十年的平均失业率在 8%左右，这和 20 世纪 80 年代 20%的记录简直是天壤之别。[69]

宏观经济、制度、出口多元化和技能建设政策的组合促进了这种具有广泛基础的就业创造路径。智利联合使用资源稳定机制和透明财政规则，共同管理铜开采租金的使用 [70]，其中资源稳定机制是 1987 年采用的，目前的机制框架是 2006 年采用的，透明的财政规则是 1999 年采用的。结构剩余目标是确定两股基金流量之锚，一股基金用于支付退休金和其他长期政府

图 9.5 智利降低了对矿产品出口的依存度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智利中央银行的出口值数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铜价指数。
注释：本图表明了以 1990 年不变价格测量的矿物出口在出口总量中的比例。本图分别使用出口价格指数和铜价格指数来平抑出口总量和矿物出口。

债务，另一股基金用于短期稳定目的。基金被赋予投资组合全部用于国外投资的权利，从而减轻汇率的压力。[71] 同时，过去几十年在所有公共管理领域中的治理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1996 年至 2009 年期间，治理的话语权和问责等级攀升了 5 个百分点，政治稳定性和腐败控制等级也提高了。[72]

智利进而采取了积极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政策，开放贸易，积极接受直接外国投资，从而提高了来自全球一体化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为提高竞争力，智利制定了宏大的创新战略。[73] 1990 年至 2009 年期间，专门用于提高教育经费的公共资金，几乎增长了一倍。[74] 尽管当今教育体制的质量和公平性引起了众多讨论，所有经济领域低技能工人的比例降低了。[75]

青年失业率很高的国家：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已经在应对高青年失业率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见图 9.6）。在前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内，青年人口失业的可能性是成人的三倍。到 2010 年，这一比例降低到 2 比 1。[76] 2000 年，斯洛文尼亚的青年失业率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 10 个百分点，2010 年，其青年失业率却比欧盟平均水平低。[77] 此时，斯洛文尼亚的 15 岁到 24 岁的群体中，不在教育、就业状态或培训状态中的青年人口比例仅为 7.5%，远远低于欧盟 11.2%的平均水平。[78] 尽管青年人口的确感受到了危机的存在，最近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将斯洛文尼亚突出列为青年就业最佳实践的典范。[79]

斯洛文尼亚相对成功的降低青年失业率的实践并不严格遵循传统的方法。斯洛文尼亚对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支出和转型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不相上下。尽管斯洛文尼亚的一些改革放松了合同和临时就业的规则，它的劳动规章仍然比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严格，这通常是一种与青年人口就业机会的减少相联系的政策态度。常常被引述为青年就业障碍因素的最低工资处于优势。但是这些政策的潜在扭曲效果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被基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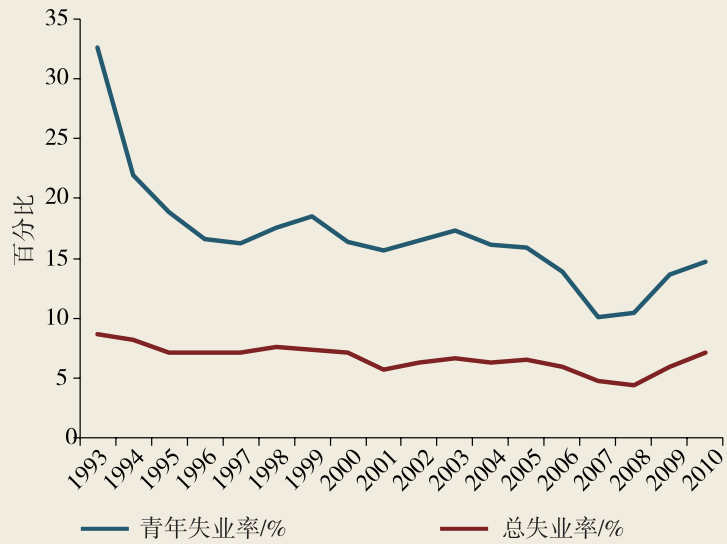
共识的决策抵消了。在斯洛文尼亚，覆盖率都很大的工会和雇主组织根据宏观经济趋势和部门生产率模式确定工资水平。[80]

由竞争加剧的产品市场支撑的持续增长是斯洛文尼亚青年失业率降低的重要原因。斯洛文尼亚抓住了欧洲一体化的契机，成功地重组了其出口领域，进入欧盟市场。优良的基础设施和相当熟练的劳动力也发挥了作用。这种活力要求现代领域采用更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特别适合青年人口。尽管在许多方面斯洛文尼亚的经历是成功的，进一步的政策改革可以帮助斯洛文尼亚更多地实现青年人口就业的发展收益。一些改革发生在劳动力市场，譬如移除就业保护法律产生的使就业创造向青年合同工和临时工倾斜的激励因素。但是其他改革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譬如采取措施鼓励引入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81]

相互联系的就业议程：就业领域的全球合作

一国的就业政策可以对其他国家具有溢出效应，这种效应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国际协调机制是否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提高正向溢出效应并降低负面溢出效应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许多领域都采取了协调机制。促进遵守权利和劳动标准是一项全球公共商品，是采用协调机制最明显的领域，但是促进遵守权利和劳动标准的机制的效果优先。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措施，尤其是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服务业的措施，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产生巨大效果，但是这些措施也可能具有社会含义。移民对输出国和输入国均有影响，这表明双边协议可能为双方带来更好的结果。

图 9.6　斯洛文尼亚的青年失业率下降了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KILM）2011。
注释：青年失业率系指 15~24 岁年龄群体的失业率，而总失业率系指 15 岁及 15 岁以上人口的失业率。

权利和标准：到目前为止的压力

几项跨境运行的机制旨在为改善工人的权利和他们的工作条件制定标准并提供途径。这些机制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以及私营领域、民间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倡议等的发布与签署。这些机制或者通过同侪压力，或者通过为政府和企业提供遵守这些机制的动力来运行。但是这些压力和动力是否真正改变了实际工作条件还不明确，而且也不能排除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就业创造为代价的风险。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为权利、标准和工作条件提供了框架。在国家层面，如果国家确实要使国内法律与国际标准接轨，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可以对国内立法施加影响。正如接受关于基于家庭的工人和家政工人的公约所显示的那样，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可以成为国际话语和国际协调的渠道。[82]签署国际劳工组织八大公约的证据表

明，国家会响应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这八大公约包括国际劳工组织 1998 年的关于工作中基本权利和原则宣言这一核心的劳动标准。[83] 然而，强迫劳动、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的童工、歧视及缺乏话语权也表明，仅仅签署公约是不够的。

贸易协议也被用于支持工人权利。一些贸易协议将改善工作条件和扩大话语权的激励措施纳入贸易协议中。例如，柬埔寨和美国 1999 年的双边贸易协议包括如下条款，如果定期检查显示了工作条件的改善，美国将增加柬埔寨向美国市场出口服装的配额。

贸易协议中的劳动条款是否真的为协议双方的工人带来了更好的结果是一个仍在持续讨论的议题。持怀疑态度者指出，协议自身可能只是改善权利和工作条件的弱小工具，不能替代国内劳动法的全面实施。[84] 人们也关注利益集团的政治俘获和压力及协议双方不平衡的谈判力。[85] 劳动条款可以作为保护主义工具被使用，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就业机会。支持者宣称贸易协议中的劳动条款不仅改善了既有劳动和就业标准的执行，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从而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受益。[86]

如果以促进国家层面执行和遵守协议能力的投资作为补充，将权利与贸易协议结合起来的方式可能会对工作条件产生影响。在签署中美洲自由贸易协议后，多米尼加共和国增加了劳动监察官的数量，对能力建设进行投资。[87] 在与柬埔寨签署双边贸易协议以后，美国对柬埔寨的两个国际劳工组织的项目予以资助。柬埔寨更佳工厂项目是其中之一，包括建设遵守和监控制衣业工作条件的能力。另一个项目支持解决集体劳动纠纷的仲裁委员会。[88] 随后的评估发现，工作条件和集体权利改善了。[89]

除了政府通过公约和贸易协议的倡议之外，对私人领域责任的重视也在与日俱增。根据更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议程，企业自愿在经营中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90] 尽管一些企业制定了自己的行动准则，但是集体倡议对改善全球供应链工作条件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通用的标准允许企业与工业主导平台上的其他企业协作，与多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工作和非政府组织协作（有时候与政府观察员协作）。[91]

几乎所有的这类组织都规定了实践的标准，但是它们的治理结构，实施、监控和核查程序及它们是否具有证书和标志等却很不相同。[92] 企业社会责任倡议强调的劳动议题一般集中在依赖全球供应链、容易遭遇声誉风险的领域中，譬如服装、运动装、食品以及日益受到影响的电子产品。[93] 欧盟和北美以遵守劳动标准为与它们做生意的条件，因而基于欧盟和北美的公司最频繁地采纳这些标准。发展中国家中也兴起了少量的自愿性组织，尽管这些组织一般是响应外部压力而不是地方消费者要求的结果。[94]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其良好的目的，带来权利和工作条件可见的、持续的、改善的证据有限。最显著的影响发生在健康和安全领域，其次是工作时间的规范化。改善结社自由和歧视的可能性要低得多。总体而言，长期工人获得的利益要比移民、中介工人、季节性工人和临时工人获得的利益显著。[95] 准则并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所有地方行为者能力和国内法律与制度的质量对行动的效果至关重要。[96]

这些发现强调了改善工作条件的

专栏 9.3　改善经营时间，促进遵守劳动标准

更佳工作项目追求在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同时，提高遵守国际劳动标准和国内法律的力度。项目通过与政府、雇主、工人组织和国际购买者合作来实施。当前，该项目包括将供应链生产外包给柬埔寨、海地、印度尼西亚、约旦、莱索托、尼加拉瓜和越南的全球服装品牌和零售商。

项目包括完全的工作场所评估和咨询服务，完全的工作场所评估检查工厂是否遵守国际劳动标准和国家劳动法，咨询服务则帮助雇主和工人联合制订和实施改善的计划。量身定制的培训服务支持工作场所协作和应对监督技能、人力资源系统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等具体问题。项目承担向公众汇报的任务，发布一国所有参与工厂中不遵守标准的工厂的数据，允许根据具体指标进行跨国比较。更佳工作全球工作组确保质量、延续性和有效的知识管理，并承担以咨询服务工具支持国家工作组、监控和评估及效果评估等任务。

更佳工作以柬埔寨的更佳工厂项目为样板，更佳工厂项目是与柬埔寨和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协议联合引入的。柬埔寨更佳工厂项目覆盖率超过 90%，对更佳工厂项目的评估结果发现，职业安全和健康的遵守率提高了 20%。工资、加班和利益的正确支付提高了 37%。一开始，改善工作条件的动力是根据贸易协议的配额增加需求；然而随着多种纤维协议（MFA）的到期，已经不再可能增加配额。尽管如此，柬埔寨的制衣业仍然持续对监控进行投资，并已将遵守劳动法确认为在全球服装业中获得利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多种纤维协议到期了，由于声誉在供应链中发挥的作用，利基市场仍然存在。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际金融公司（华盛顿特区）更佳工作项目和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Robertson 等 2009；及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dler 和 Hwang 2012 等做出的总结。

方法向部门和国家层面的政府、雇主、工会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延伸的必要性。自愿性的劳动组织不能替代提供充分法律保护，促使保障遵守标准、提供补救机制的制度到位的诸多国内行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可以同心协力应对问题，譬如巴西，2003 年巴西劳工部开始发布被发现使用强迫劳动的企业的名单。公共意识的增强迫使企业签署了一项反对奴隶劳动国家公约，同时公民社会组织成立了委员会监督公约的实施。[97]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就业都发生在企业社会责任倡议的范围之外，如果这些倡议可以延伸到没有正式合约的工人（主要是女性），这些倡议就具有发挥更广泛影响的可能性。同时可以通过提高行为者和制度能力、完善对话和合作机制的活动促进地方治理和制度。如果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增加了改善权利和工作条件的活动的可见性，如果劳动监察官和第三方监控机构获得了经验和能力，那么在国家层面发生示范效应也未必不可。地方能力建设的潜在效益体现在更佳工作的经历中，更佳工作是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金融公司（IFC）为促进制衣业遵守劳动标准而合作开展的项目（见专栏 9.3）。[98]

进一步自由化贸易，但是要管理贸易平衡

国际商品贸易正在逐步实现自由化，贸易自由对交易双方均有利益的观点目前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多边协议、区域协议和双边协议及单边承诺等多种机制被用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在多边层面，一开始通过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随后在其继任者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进行的磋商实现了自由化。最近一轮多边磋商，多哈发展议程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工业提供更佳的市场准入。农产品的平均约束税率将从 40%降低至 30%，制造业产品的平均约束税率将从 10%降低至 5%。农产品的实际税率可能下降 11~14 个百分点，制造业产品的实际税率可能降低 2~3 个百分

点。纺织业和服装业领域的降低可能要大得多。最不发达国家甚至可能因其获得向工业国家出口的几乎所有产品的免税配额而受益。[99]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多哈谈判的成功可以对与全球价值链相联系的就业创造发挥重大影响，而这通常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但是多哈磋商正处于停滞状态。

尽管贸易自由化取得了进展，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缺少获得全球一体化利益的竞争力。因此，为它们提供直接援助降低物流成本并提高企业和农场的竞争力是首要事项。贸易援助倡议旨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从而使它们能够利用既有的市场机会。贸易援助已经大幅度增加，目前约占发展中国家援助总量的 1/3。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资源被导向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促进。但是通过强调更适合应对援助接收国面临的具体就业挑战的出口活动，可以提高援助的效率。扩大私营领域的参与也将提高所提供援助的效果。[100]

和商品贸易相比，无论是在多边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服务自由化都取得了缓慢的进展。服务业受到更普遍的规章制度的约束，这是因为服务业面临着众所周知的市场不健全问题。这些问题，从电力分配的自然垄断到通信的网络外部性，从信息不对称到金融道德风险再到零售贸易的市场力量，无所不包。商品贸易的自由化与国内自由化息息相关，但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通常要求国内规章制度的约束。建立电力市场、确保通信的普遍服务、采用适当的银行监管和管理大型零售贸易分销商的社会影响是极具挑战性的任务。[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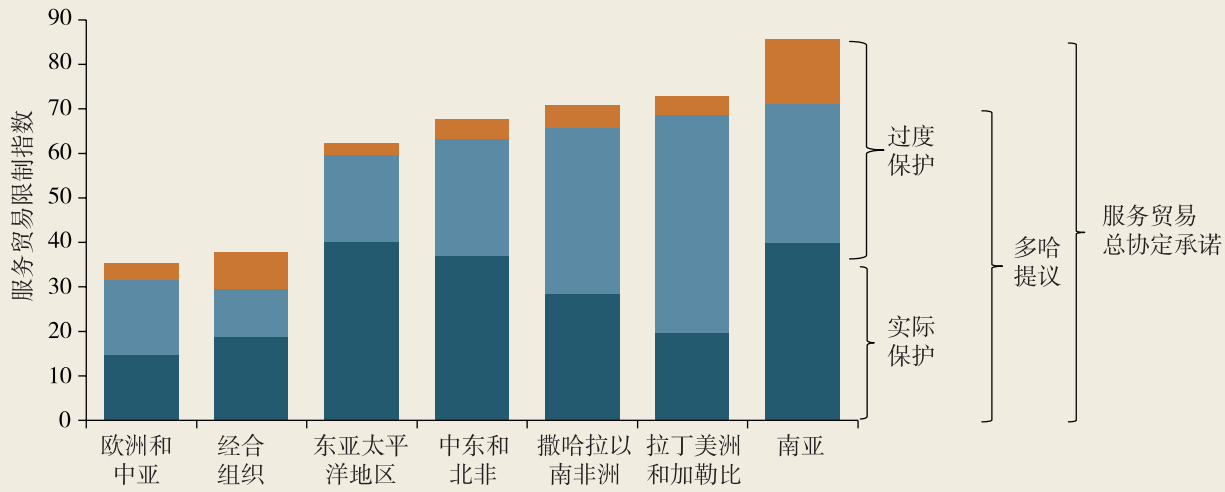
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自由化程度远远低于工业国家的程度不足为奇。发展中国家也迟迟不愿做出额外的承诺。无论是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框架下的既有协议还是多哈议程中的提议还是区域讨论都未能为自由化提供美好的愿景（见图 9.7）。[102]

然而服务自由化的生产率收益将是巨大的。电力、金融、通信和贸易对生产和交易成本具有直接的影响，使不景气的行业更具竞争力。通过促进就业创造和提高劳动收入，这些生产率收益也应当带来生活水平的改善。社会影响可能更复杂。当手机将人们（尤其是贫穷人口）的产品与市场联系起来，将人们与就业机会或政府服务联系起来，手机显然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零售贸易的消失导致传统城市地区的衰落并对不容易找到替代性就业方式的年长店主的生计造成影响时，手机的影响是负面的。

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充分排序和国内管理有助于管理平衡，而且这样做，解决了发展中国家所担心的问题。例如在通信行业，提高国内竞争力比将当前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转交给绩效更佳的外国运营商提供更能改善福利。1985 年至 1999 年期间来自 86 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显示，竞争和自由化均可独立改善绩效。但是如果先自由化后再引入竞争，以主线准入为衡量标准的通信服务的渗透的程度低于同时引入自由化和竞争时渗透的程度。[103]

谨慎部署自由化也可以缓冲社会效果。例如，在与美国签署的优惠贸易协议中，阿曼对零售贸易的自由化选择了循序渐进的方法。一开始，阿曼允许资产超过 500 万美元的外国零售企业公司总部拥有高达 100%的股票，现在门槛已经逐渐降低至 100 万美元。该协议允许循序渐进的调整。同时它对外商所有制相当宽容，阿曼的大多数多边协议将这一比例限定

图 9.7　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提议一般是稳健的



资料来源：Borchert，Gootiiz 和 Mattoo 2010。

注释：GATS 即服务贸易总协定；OECD 经合组织。本图对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国家承诺的主要服务领域所应用的政策和它们在多哈磋商中做出的最佳提议进行了比较。本图基于来自 62 国的数据。国家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是一国对外商在金融、零售、通信、交通运输及选择性专业化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政策或承诺的加权平均数。权数是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区域指数是国家指数的简单平均数。

在 49%。[104] 同样，阿曼通过土地分区限制应对自由化对城市中心影响的忧虑，这和工业国家的做法如出一辙。但是这些限制也可能被用做进入壁垒，减少竞争并削弱就业创造。[105]

服务自由化的拉力有限大体上是由其所涉及的潜在平衡引起的。发展中国家可能缺少对如下领域的知识：开放性市场所能带来的收益，在既有平衡中实现此类收益的前提条件及实现该种收益最大化并妥善处理平衡关系可供选择的政策。商品贸易大体也是这样，许多国家也面临着实施政策和履行协议的能力。因而需要实行国际协作，应对这类知识欠缺问题并促进协议的履行和政策的实施。[106]

国际协议也可用于促进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性别平等正是这样的例证。贸易并不是性别中立的。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贸易的自由化改变了女性获得就业的机会。传统上男性更有可能从事“体力工作”，这对体力的要求很严格。但是从缝制衣服到加工数据的“脑力劳动”要求技巧、注意力或沟通能力，这为女性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在德里和孟买，呼叫中心雇用的人口超过了 100 万，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因而在远未实现性别平等的国家中，可使用优惠准入政策从发展中国家“脑力劳动”更多的领域中进口产品，从而为女性创造就业机会。[107] 然而随着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位置的上升，女性也可能丧失就业机会。这正是马来西亚面临的问题，马来西亚在制造业中工作的女性的比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降低了。[108]

移民政策：转向双边协议

在历史的进程中，人口的跨境流动在输入国中引起了不同的政策响应。这些政策响应包括将外国人隔离在外的壁垒，防止跨洋强迫劳动和抵押劳动的政策以及公开移民的政策。此外还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包括对非法移民的赦免，对难民进入的法律控制以及获得签证的复杂系统。在大多

数情况下，这些政策是由接收国单边引入的，与输入国的国际对话或合作微不足道，甚至不与输入国对话与合作。

与跨境商品和服务流通相对比，鲜有国际协议从整体上关注移民，特别是移民工人。那些已有的协议覆盖率有限。分别于 1952 年和 1978 年生效的国际劳工组织第 97 号公约和第 143 号公约分别寻求保护移民免于歧视和虐待，呼吁对那些促进私下或非法移民的人进行处罚或制裁。但是分别签署这些公约的国家只有 49 个和 23 个。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4 条覆盖了通过个体向另一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的行为。[109] 服务贸易总协定于 1995 年生效，覆盖了世贸组织的所有签署国，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自由化的数量都有限，只有极少数国家在健康服务等敏感领域取得了进展。最后，关于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的联合国国际公约旨在“通过接受与移民及其家庭成员待遇相关的基本原则促进国家间态度的友好和谐”。该公约于 2003 年生效，但是签署该公约的国家只有 22 个，而且大多数是输出国。

国家间年龄、收入、技能和经济愿景日益扩大的差异可能导致移民不断攀升的压力。尽管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人才”移民均有兴趣，低技能移民仍将是未来移民跨境流动的主流。[110] 但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间日益扩大的差异并以互惠的方式管理移民的准备有限。制定多国协议的进展缓慢。对地理因素和历史趋势予以考虑、保护工人基本权利及对移民社会影响予以考虑的双边协议可以使输入国和输出国均从中受益。

移民是全球愿景得到保障的领域，但是关于需要做什么的观点却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一种观点强调国家间收入的巨大差异，建议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加速全球生产率的增长并大幅度减少贫穷。[111] 另一种视角强调国家安全及社区和文化保护，这意味着需要设置壁垒遏制移民。还有一种视角突出无论移民法律地位如何都要保护其人权及给那些遭遇任何形式迫害的人口提供庇护的道德必要性。[112] 没有一种观点足以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没有一种观点可以单独应对移民引起的、政策设计需要考虑的复杂的平衡关系。

关于这类平衡关系的例证不胜枚举。如果如同输出国和世界各地关心社会的公民所要求的那样保护移民的福利，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用于保护移民福利的支出越多，使用移民劳动力的成本就会越高，被雇用的工人的人数就会越少。为使移民融入输入国所做的工作越多（这是一些东道国群体所支持的），移民返回母国的可能性就越小。为吸引“人才”移民而采取的政策越积极，输出国对“人才外流”的担忧就越大。工业国家对农业等领域的保护力度越大，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到这些领域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以禁止移民为外援条件的做法似乎是不可接受的，而且通过对自由流动的限制对工人的基本权利产生了影响。严厉的签证限制和驱逐出境通常适得其反，可能使逾期停留者成为非法移民。这些例证表明，单边政策不能应对所有这些困境。然而，通过全球协议为移民和大的移民输出国的立法设定条件似乎没有可能性。这也正是这种解决方法更有效果的原因所在。

在许多情况下，输出国和东道国均可以从移民的协作方法中受益。大多数由商贩、企业或工人所施行的虐待都与非法移民流相关。移民流规范化是保护移民工人权利的基本工具，

同时要使他们尊重那些受欢迎移民所应具备的条件。然而没有移民输出国和接收国在制度层面的通力合作，这种规范化很难实现。[113] 双边协议可以包括关于根据职业、行业、地区和停留时间的配额。双边协议可以区分工人的临时流动和永久移民的程序，并规定从一国移向另一国的条件和协议以及人才招聘机构和中介机构的规章制度。双边协议可以包括对税负和社会安全的考虑，包括将提供的利益、缴费的可流动性以及成本共担的机制安排。这些协议可以设计激励措施，使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公司、工人协会和政府均从其贯彻实施中受益。[114]

规范并扩展临时移民协议可以俘获当前被中介机构攫取的移民的部分工作收益，这对移民和他们的雇主都有好处。金融领域的协议可以降低移民汇款的成本，规避非法交易的蔓延。在存在人才移民的情况下，重新考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助学金方式有利于实现更均衡的投资回报分配。一般而言，双边协作是管理移民、确保移民输出国和接收国双赢的合理路径。

就业是中心议题，但是数字在哪里?

就业政策需要以可靠的数据和严格的分析为基础。[115] 发展中国家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口属于非工资雇员，而没有受到社会保障覆盖的工作人口的比例甚至更大，因此，就业测量必须超越国家所收集的规范就业数据。确定哪些工作最具减贫收益要求将家庭的收入或消费信息与家庭成员的就业信息联系起来考虑。理解哪些公司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或理解劳动力再分配是否带来了大幅度的增长而不仅仅是搅拌，这要求获得差异极大的生产单元（包括微型企业）的投入和产出信息。评估就业经历是否对信任及融入社会的意愿产生影响要求获得关于个体价值观和行为的信息。这类信息是处理有关就业与发展方兴未艾的研究议程的必要信息（见专栏 9.4）。

然而，关于全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不足，而且跨国比较非正规就业措施存在困难，这表明，数据质量难以保证，数据可得性有限。相当多的工作在于测量失业率，其频率甚至相对很高。[116] 但是在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没有工资的国家中，公开失业并不是一个说服力很强的指标。根据世纪发展目标（MDG）根除贫穷的目标，四大指标被列为监测就业目标进步的指标。该目标呼吁“为包括女性青年在内的所有人口获得全面的、生产性的就业和体面的工作”。但是这里所述的四大指标只是部分抓住了发展中世界就业的数量和质量进步。[117] 许多可得的就业数据实际上是通过在年度之间添加和使用“类似”国家的数据推断出来的数据，但是这些方法的可靠性仍然是有待商榷的方法。

这些评议本意不在于批评国家层面的统计机构或国际层面的数据收集工作。他们的工作填补了重要的空缺，调动技能完善定义、达成最佳实践的协议并为那些产生原始数据的机构提供技术援助。[118] 尽管存在局限性，关于非正规就业、失业率或世纪发展目标就业目标的数据成了一个重要的目标，即强化了以就业促进发展的重要性的意识。然而，让就业成为中心议题可能仍然是在缺少改善数据数量和可比较性的持续性努力的情况下的一种愿望式陈述。

目前关于劳动统计的挑战可以被重新划分为三个关键领域：数据差异；

专栏 9.4 就业与发展的知识缺口确定了研究议程

近年来，对分散调查数据依赖程度的增加和严格的项目评估及对照实验一道推进了关于就业和发展的知识前沿。几乎在所有相关的议题中都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证据。当前关于研究社区的工作为其在未来几年的扩张带来了希望，这种扩张是以促进信息更完全的政策制定的方式进行的。然而在几个领域中仍然存在着知识缺口的问题。

就业和生活水平。关于测量贫穷及评估减贫项目的高质量工作已经做了很多。关于就业态势如何对家庭的生活水平及家庭陷入贫穷或脱贫产生影响的认识却较少。对不同就业状况、职业、行业和工作类型的转换研究阐明了参与工作和规范工作的动机及工作对家庭福利的影响。关于工人对自己工作不同特征主观价值的认识也有限，其中包括老年退休金和残废抚恤金等社会保障福利。

就业和生产率。关于企业成立、增长和倒闭的企业动态的研究很多。关于贸易自由化影响和外国直接投资对工厂层面生产率和收入研究的文献也在持续增加。然而，相当一部分研究重视正规领域的公司。尽管非正规领域的微型企业和小企业对就业很重要，研究它们动态的现成研究要少得多。而且基于工厂层面的研究和不断增加的对城市化效果研究的文献之间存在着某种脱节。关于生产过程的规模回报或外部性等议题的不同观点部分削弱了不同文献之间的对话。

就业和社会凝聚力。该领域的研究是试探性的，鲜有实证证据。课题的重要性和良好结果的缺乏为该领域的高质量研究所带来的收益可能非常高。自然实验与时间跨度相对较长的纵向数据可能阐释了就业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跨学科研究可以解释就业和制度发展过程之间更宽泛的关系。人类学方法可以提供关于现行机制的认识，例如就业如何对公平的概念及人们信任他人的意愿产生影响。

就业的溢出效应。关于就业溢出效应重要性的研究很零散。议程很长，但是振奋人心的地方是就业对获得认知和非认知技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变化方式取决于工作的特征及工作所有者的特质。和对不同工作类型环境影响进行估测时面临的情况一样，关于具有不同特征的不同城市间聚集效应的证据也很稀缺。

劳工政策。以劳工政策和制度影响为研究核心的实证研究与日俱增，而且许多研究非常严密。然而，对这些研究的仔细审视显示，以劳工政策和制度为一方，以结果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线的。相反，它引起了适量的“平台”效应，但是在两端的“悬崖”地带，对效率和就业分布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确定悬崖所在位置及如何确认界定高原地界的制度特征的实证工作将具有重大的价值。

相互联系的就业议程。世界需要更多地研究国际贸易、两端地带投资及移民如何对国家间的就业结构产生影响。所有这些领域的知识缺口都是普遍的现象。影响不同国家就业的国家政策能力及贸易协议等超国家机制只能部分被理解。关于服务相关的国际承诺和国内政策正确排序的更充分的知识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迟迟不愿朝着自由化方向前进的问题。对移民政策的合理评估也将有所裨益。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数据质量议题；规划、协作和沟通议题。某些国家根本不存在劳动统计，或者只是零星地收集了一点儿数据。在的确存在劳动数据的地方，数据质量是贯穿整个统计生产链的，从使用科学的定义到问卷的设计，从样本框架到采访规则，从数据录入和编码到校正评判程序，无一例外。当不同的制度负责收集和传播数据时，规划、协作和沟通的问题就会进一步凸显。[119] 当务之急是实现就业模块的标准化并确保企业调查包括非正规公司和微型企业，这里就业模块是用于贫穷分析的家庭调查的一部分。

25 年前，重新强调减贫作为发展政策的目标开启了长期收集数据的工作。在世界上，关于家庭生活水平的信息通过标准化的调查来收集，样本方法和使用的不同定义得到合理的记录，在可能的时候，这些数据和记录可以为研究者和践行者所用。应当设想类似的方法使就业成为中心议题。

问题 9 如何加速劳动力的再分配？

作为经济增长的柱石，创造性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劳动力的再分配实现的。随着工人从生产率不高的农场和被淘汰的企业转移到更具活力的经济单元工作，产出增加了，经济朝着效益前沿迈进。经济单元间的生产率差异凸显了这种创造性破坏的进程。这类差异可以反映由竞争推动的文件的生态系统，竞争奠定了提高效率的就业再分配的基础。然而，市场不健全和政府失灵可能阻碍劳动力的再分配，导致生产率差量的扩大，并致使许多企业错失增长的机会。[120]

阻碍工人从低生产率领域流向高生产率领域或阻止工人离开被淘汰企业的严苛的规章制度就是例证之一。这些规章制度的本意可能是好的，比如遏制城市的拥堵问题或为工人提供稳定的收入。但是这些规章制度的生产率增长成本可能是巨大的。这类规章制度并不基于劳工政策主要是可再分配性的效率“平台”地带；相反，这些规章制度位于悬崖地带，而且对经济效率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

可以说，印度是复杂而低效的劳工政策将国家推离“平台”地带的例证。印度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劳动法律高达 40 多部。大多数法律适用于有组织的（或正规的）领域和超过一定规模的企业。随着企业雇用人数的增加，企业受到越来越多的规章制度的约束。[121] 1947 年的工业争端法尤其具有约束性。工业争端法管理雇员与雇主的关系，该法致使企业极难终止雇用关系。[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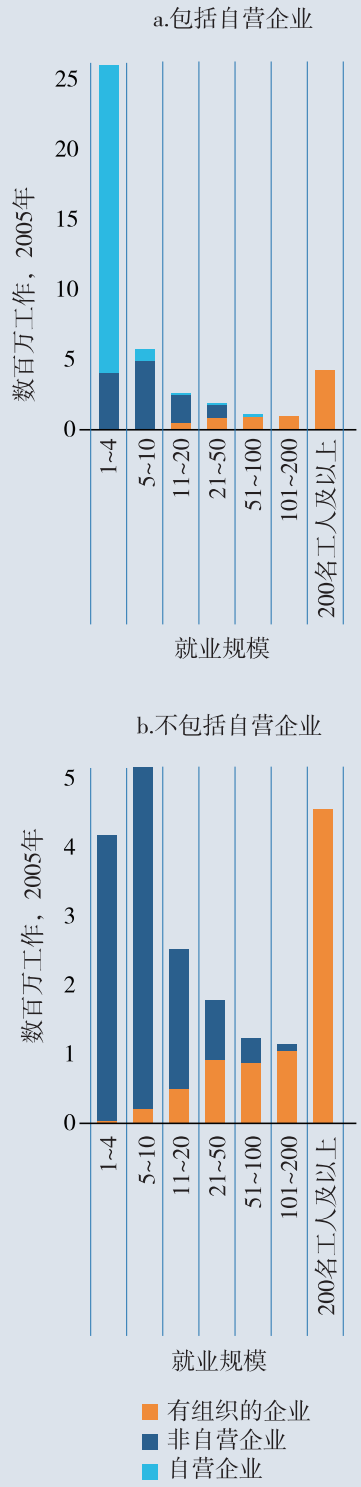
严苛的劳动规章制度与“中等规模企业消失”的现象相随相伴，这是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在印度和这些发展中国家中，中等规模的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比例极其微小。和严苛的劳动规章制度相随相伴的还有生产率的巨大差量。如果每一工业内部观察到的差量和美国可观察到的差量相匹配，印度制造业的平均生产率可以增加一半以上。[123] 恰恰相反，尽管印度在过去的 20 年中的经济迅速增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的绩效处于停滞状态。[124] 非农就业的增长主要发生在非正规领域。

当一国受到误导性劳动规章制度的困扰时，传统智慧的做法是废除这些规章制度。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印度复杂的劳动规章制度体系已有 60 年的历史，即使 1991 年收支危机引发的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基本上也没有触及劳动规章制度。[125] 1947 年工业争端法已经在国家层面得到了修订，但是修订并不总是靠近平台地带。1958 年到 1992 年期间，印度七省修订了工业争端法，赋予雇主在进行劳工决策时更多的选择余地。这些省的正规制造业领域随即经历了产出、就业、投资和生产率的较高增长。但是，其他六省朝着相反的方向修改了工业争端法，导致企业绩效的下滑和非正规领域扩张的放缓。[126] 总体而言，1987 年至 1994 年期间印度制造业领域的生产率差异保持稳定，或甚至增加了。[127]

……从忽视规章制度障碍

应对这些规章制度的响应一直是学习如何与这些规章制度共生共存，而这是通过广泛不遵守规章制度的行为实现的。[128] 例如，大企业依赖承包商，承包商转而雇用工人；这样，就

图 9.8 印度制造业企业的分布存在“中等规模企业消失”的问题吗？



资料来源：Hasan 和 Jandoc 2010。

注释：有组织或正规领域的数据来自印度中央统计局的年度工业调查；无组织或非正规领域的数据来自国家样本调查组织（NSSO）的无组织制造业企业调查。自营制造业企业系指那些在运营过程中不雇用固定工人的企业。

业总量被“划分”成较小的小块，双方均规避了最严苛的劳动力市场规章制度的约束。短期合同和临时就业机构是规避规章制度的其他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雇用 10 个或更多工人的企业雇用合同工人的倾向增加了，中等规模企业（雇用 50~99 个工人）雇用合同工人的数量最高。[129] 对 1 300 家公司的 10 年期研究也发现了中等规模企业和更大企业在雇用手工工人中的席位差异。[130] 正规企业中雇用的非正式工人在就业总量中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32%增加至 2005 年的 52%再到 2010 年的 68%。[131]

与不遵守规章制度的行为相一致，在规章制度愈加严苛的门槛水平上，基于规模的企业分布并没有显示出严重的脱节问题。从包括非正规公司在内的整体分布来考虑，最严重的脱节发生在雇用多达 4 个工人的企业和雇用 5~10 个工人的企业之间（见图 9.8a）。然而在适用的劳动力市场规章制度中并不存在 5 个工人的门槛。另一方面，跨越 50 工人分界点时并不出现分布的脱节问题，尽管超过 50 工人分界点的门槛时企业将受到工业争端法的约束（见图 9.8b）。

可以说，其他因素可以影响印度基于规模的企业分布。[132] 但是总体上，这些模式是与公司绕过劳动规章制度的行为是一致的。

……积极抵消它们……

印度学会了如何与这些烦琐的规章制度障碍因素共存共处，面临类似限制因素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取得了效率更高的劳动力再分配。和印度一样，斯里兰卡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劳动规章制度。尽管没有达到印度那样的极端程度，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面临着类似的规章制度障碍因素。尽管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劳动规章

专栏 9.5　中国部分放宽了户籍制度

户口类似于内部的护照。个体在一个城市、小镇或乡村的法定居所由个体的出生地决定。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分别登记。户口制度管理公民的许多社会权益，包括教育、住房、公共补贴和社会保障。和中央计划时期的城市食品配给制等其他政策一道，户口制度阻止了农村劳动力流出农业。户口制度维系了具有基本社会福利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排他性，支持工业政策，实际上形成了城乡分割。

改革开放伊始，城镇只能为有限的人口负担基本的社会福利。因此，农村工人的涌入被视为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福祉水平；另一方面也导致基础设施的拥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城市地区开始进行改革之后，农民被允许进入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工作，但是根据仍然实行的食物配给制度，只有在实现食物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农民才能进入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工作。直到改革顺利进行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些限制才被取缔。其时，城市地区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领域的快速增长及私营领域活动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到了这个时候才大幅度放宽了户口制度。

这一放宽的过程是通过权力下放的方式实现的。大多数大中城市都逐渐降低了改变户口身份的移民标准，因而也改变了伴随他们的权益。然而，在主要城市及高收入城市，移民标准依然惊人的严苛，这些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和广州。比如上海是第一个居住许可制度向所有人开放的城市，但是上海的资格条件也是最严苛的。上海的制度有待那些具有大学学历或特殊技能以及那些前来经商或投资的人。在申请居住资格之前，申请人还需要缴纳七年的保险费。此外，上海户口迁移配额紧张，迄今为止，实际转入上海的户口数量极小。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Cai，Du 和 Meiyan 2002；Cai 和 Meiyan 2011；Cai，Park 和 Zhao 2008；Chaudhuri 和 Datt 2009 及 Giles，Wang 和 Park 2012 的总结。

制度比较宽松，中国的家庭登记（户口）制度却是劳动力再分配的终极障碍因素。[133] 然而所有这些国家都成功地促进了高生产率领域和地方的增长。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期间，斯里兰卡逐步实现了许多市场领域的自由化，但是并没有改革其复杂的、昂贵的就业保护立法。根据 1971 年工人就业合同终止法（TEWA），雇用 15 个及 15 个以上雇员的企业在未获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不能解雇工人，而且在解雇工人时需要支付的雇用期终止执法最高可达 4 年的薪水，具体取决于工人的服务期限。然而斯里兰卡的服装业迅速成功，取代茶叶成为国家的主要出口收入来源，目前，服装业的境外销售收入从 20 世纪 70 年代接近零上升到占斯里兰卡境外销售的一半。服装业也是制造业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134] 服装业的成功已经成为吸引农村移民的磁铁，45%的农村移民移向服装业集中的西部省区。

严苛的劳动力市场规章制度也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特征。在巴西，在经过多年的经济改革之后，雇用工人依然和以前一样是一种负担。如果有任何不同的话，那就是在过去十年中规范化的持续增长使企业更普遍地遵守劳动规章制度。然而巴西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是大规模的内部移民和极高的劳动力流动率。据估计，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期间，终身省际移民翻了一番，到 1999 年达到人口的 2/5。20 世纪 90 年代，巴西正规领域变换工作的工人中，1/3 的工人跨省移民寻找工作。而且据估计，每年变换工作的正规领域工人的人数在 2/5 和 1/2 之间。[135]

中国的劳动力再分配程度之大，没有国家能出其右，而且许多劳动力再分配都是在户口制度下进行的。中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引入户籍制度以来，该制度管理人们生活的地方，有效阻止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保障了城市居民的就业（见专栏 9.5）。随着市场导向型改革的进展，户口制度的限制逐渐放宽，许多针对内部移民的限制被取缔。但是户口制度并没有完全取缔，即使在今天，户籍制度仍然可能遏制移民流动，降低工人携

带被抚养人和被赡养人移民的发生率。尽管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因素，中国仍然经历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显著增长，涉及从内地到沿海地区、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城市中心的大规模内部移民。这种地理集中的发展吸纳了很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使中国融入国际价值链，成为“世界工厂”。[136]

……通过生产率外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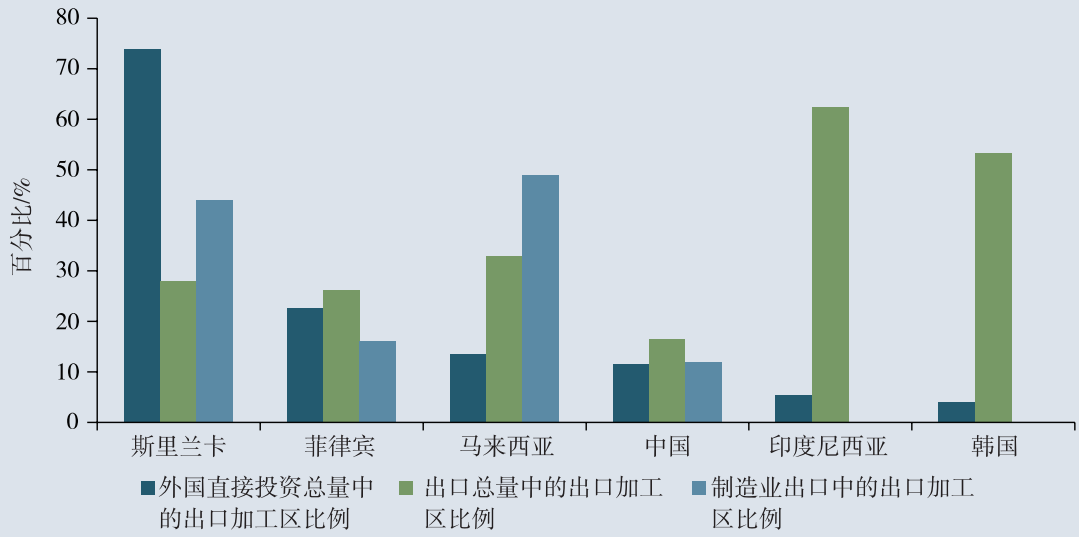
这些例证指出了成功抵消规章制度障碍因素的次佳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去试图避免或规避劳动规章制度，而是积极地参与利用工业集群、蓬勃发展的城市或全球价值链中工作的生产率溢出效应，降低规章制度在实践中的相关性。

在斯里兰卡，发展出口加工区（EPZs）驱动了服装业的腾飞。和经济体中的其他地方相比，这些经济飞地提供了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优惠的制度环境。结果，这些经济飞地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成为斯里兰卡出口的重要来源（见图 9.9）。[137] 出口加工区里的地方生产者也能从集群效应中受益。斯里兰卡的服装业超越了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者，成功地沿着价值链上升，从工厂向设计中心转型。

在巴西，内部移民的高涨与国家持续融入全球经济和采纳重视聚集效应的发展政策息息相关。20 世纪 90 年代，巴西实行了重要的贸易自由化措施，逐渐放松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并实行货币贬值。在这种环境下，发展政策日渐被交给地方政府制定，强调区域中心和基于地方力量的因地制宜型政策议程的重要性。这些工作支持工业向之前不受重视的区域转移。尽管地方政策基本上旨在培育中小企业，这些政策也吸引了较大的企业和跨国公司。这对内部移民的影响举足轻重。某一特定地方的外国直接投资的集中度增加 1%，该地方的移民率就会增加 0.2%。而出口领域就业率每增加 1%，移民外迁率就会降低 0.3 个百分点。[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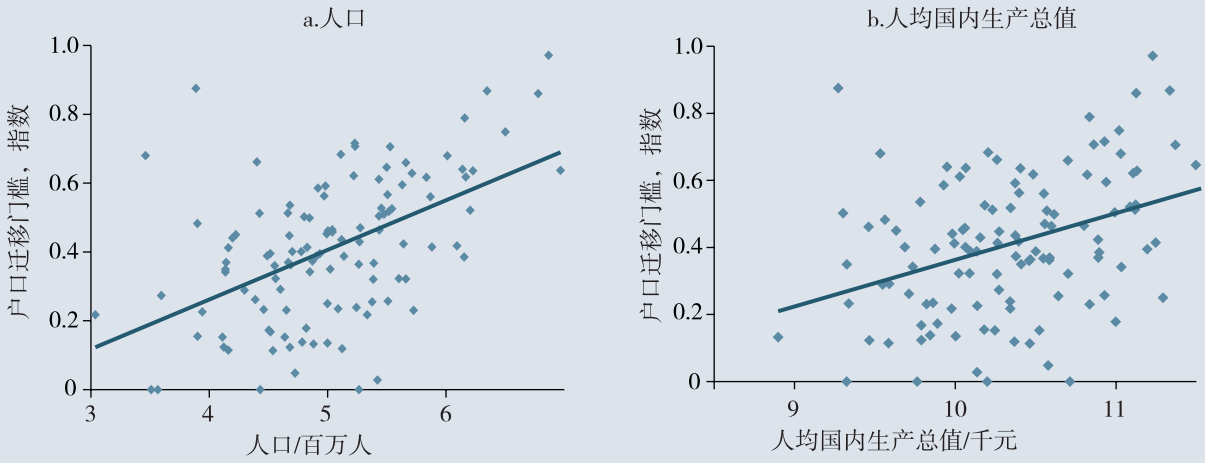
在中国，劳动力再分配的根本原因在于竞争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27%跃升为 2010 年

图 9.9　出口加工区是斯里兰卡外国直接投资的推动力量



资料来源：EPZ 即出口加工区；FDI 即外国直接投资。本图概括了 20 世纪 80 年代出口加工区的活动。

图 9.10　户口转变的限制随着城市规模和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资料来源：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Wang，Song 和 O'Keefe 2012。
注释：衡量户口迁移门槛的指数考虑投资要求、就业和家庭团聚等因素。一个点代表 30 个省中 120 个城市中的某一个城市。

的将近 50%。这一转型是史无前例的，城市人口从 1978 年的 1.7 亿增至 2000 年的 4.56 亿再增至今天的 6.65 亿。商业供电、城市基础设施、高速公路和港口的显著扩张是支撑这种增长的柱石。1988 年，中国的高速公路仅为 100 千米，十年后，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长度仅次于美国，而到 2009 年，中国正在使用中的高速公路超过了 6 万千米。[139]

区域竞争和部分试点巩固了这一成功。在中国，地方政府拥有相当的增加财政和非财政资源的自主权。因而，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对地方发展负责。中国共产党对地方官员的奖励也基于地方业绩，这促使地方官员积极参与经济竞争。[140]

这种权力下放式的制度环境为中国城市以改革户口制度作为城市化途径的实验提供了条件。有人认为，由于户口制度的存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规模过小。[141] 但是制度实施的权力下放允许主要的全球化城市使用户口制度作为选择技能熟练移民和提高就业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的遴选工具。大多数大中城市已经逐渐放宽了移民改变户口身份的标准。然而，较大的、较富裕的全球化城市采用了技能密集型增长模式，对生产率增长的重视超过了对减贫的重视（见图 9.10）。[142] 相应地，这些城市改变户口身份的标准通常以技能、投资、收入和居住要求来界定。符合这些标准的移民数量一直很小。[143]

然后再回到印度。印度城市化的缓慢进程比其严苛的劳动力规章制度还要引人瞩目。1990 年，印度在城市生活的人口的比例和中国相当，均为 27%。20 年后，印度的这一比例仅仅增至 30%。[144] 城市的功能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例如，德里或孟买的大片地区每天供水的时间不超过 4~5 个小时。近年来，能源短缺的问题加剧了，而且被视为营业的最大限制因素。一个公司每月可能遇到 17 次停电问题。印度是世界上电力问题给企业造成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145] 从巴西、中国和斯里兰卡的经历来看，在经过 60 年使劳动规章制度更灵活的部分改革后，印度的关键在于加速劳动力的再分配，从而实现可能存在于其城市化政策中的发展潜能。

注释

1. 增长与就业委员会 2008，53。

2. Ball，Leigh 和 Loungani，待出版。

3. Bosch 和 Maloney 2010；Fiess，Fugaz-za 和 Maloney 2010。

4. 世界银行 2012b，不同的议题。

5. 增长与就业委员会 2008。

6. Kraay 2012。

7. Frankel 2012。

8. 世界银行 2012a。

9. Elbadawi，Kaltani 和 Soto 2009。

10. 应对外汇收入丰厚的选择包括创立专业化的主权基金来平缓收入激增的影响；采取反周期财政政策来稳定总体需求，货币政策针对与丰厚外汇联系比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化联系更直接的通胀率。Arezki，Sy 和 Gylfason 2012。

11. Rodrik 2008。

12. 国际金融公司，待出版。

13. King 和 Levine 1993；Levine 2005。

14. Dinkelman 2011。

15. 国际金融公司，待出版。

16. Foster 和 Briceno-Garmendia 2010。

17. Foster 和 Briceno-Garmendia 2010。

18. 世界银行（2011a）对 183 个经济体 11 个领域的企业规章制度进行了考量。

19. Hallward-Driemeier，Khun-Jush 和 Pritchett 2010。

20. Ramachandran，Gelb 和 Shah 2009；世界银行 2009a。

21. Klapper，Laeven 和 Rajan 2006。

22. Bruhn 2008。

23. 国际金融公司，待出版。

24. 增长与就业委员会 2008，37。

25.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Montenegro 和 Patrinos 2012；Psacharopoulos 和 Patrinos 2004。

26. 关于例证，见 Hanushek 和 Woessmann（2008）对其与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章 Lee 和 Newhouse（2012）对结构变革与贫穷的联系做了研究。

27. Bloom 和 Canning 2008。

28. Kim，Tandon 和 Hailu 1997。

29. Engle 等 2007；Grantham-McGregor 等 2007；Heckman 2008；Walker 等 2007；Young 和 Richardson 2007。

30. Engle 等 2007。

31. O'Connor 等 2000。

32. Cunha，Heckman 和 Schennach 2010；Heineck 和 Anger 2010。

33. 数据来自教育统计（Edstats），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TOPICS/EXTED UCATION/EXTDATASTATISTICS/EXTEDST ATS/0，menuPK：3232818~pagePK：64168427~ piPK：64168435~theSitePK：3232764，00.html。

34. Gove 和 Cvelich 2010。

3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3；Rodrik 2000。

36. 世界银行 1997；世界银行 2004b；世界银行 2011h。

37. Keefer 2009；North 1981，1990。

38. 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 2001；North 1990；Rodrik，Subramanian 和 Trebbi 2004。

39. 世界银行 2004b。

40. 世界银行 2011h。

41. 世界银行 2004b。

42. 世界银行 2012e。

43. 世界银行 2004b。

44. Laeven 和 Woodruff 2007。

45. 国际劳工组织 1998。

46. 世界银行 2012c。

47.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Chen 等 2012。

48. Locke，Amengual 和 Mangla 2009。

49. Purcell 2010。

50. 世界银行 2010b。注意，该单位成本是多国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方案的总成本，包括各种形式的再融入社会支持，不仅仅是就业。

51. Glewwe 2004。

52. Ravallion 和 van de Walle 2008。

53. Rama 2009。

54. 世界银行 2012f。

55. 世界银行 2009b；世界银行 2011e。

56. 死于内战和种族屠杀的生命高达 80 万。约 380 万人口流离失所，其中约 200 万人口逃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坦桑尼亚的难民营。世界银行 2007。

57. 世界银行 2007。

58. 世界银行 2012d。

59. 世界银行 2011h。

60. MDRP 2008。

61. 前女性战斗人员是特例，其失业率高于其他人口的失业率。Consia Consultants 2007；Stavrou，Jorgensen 和 O'Riordan 2007；MDRP2010；Mehreteab 2005。

62. 卢旺达军人复员和再融入社会委员会 2012。

63. 2010 年，《营商环境》将卢旺达列为最积极的改革者（http://www.doing business.org/reforms/top-reformers-2010/）。

64. Dudwick 和 Srinivasan，待出版；世界银行 2011h。

65. 世界银行2011d。

66. 一项对咖啡业农民和工人的研究发现，通过这些工作而发生的互动与对待不同种族间协作的态度的改善、不信任的减少及对条件的积极看法等相联系。Tobias 和 Boudreaux 2011。

67. 美国地理调查，http：//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mmodity/copper/mcs-2012-coppe.pdf；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统计网站，http：//unctadstat.unctad.org/。

6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对外贸易（数据库），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圣地亚哥，http：//websie.eclac.cl/badecel/badecel_new/index.html。

69. 世界银行 2012f。

70. Sinnott，Nash 和 De la Torre 2010。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2008 年智利的稳定资金占 200 亿美元（或国内生产总值的 12%），允许国家为逆周期支出扩张提供资金。

71. Sinnott，Nash 和 De la Torre 2010。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采纳了自由浮动的汇率政策，引入了降低汇率风险的工具。世界银行 2006。

72. 世界治理指标。见 See Kaufmann，Kraay 和 Mastruzzi 2010。

73. Consejo Nacional de Innovación 2008；世界银行 2008。

74. 世界银行 2011f。

75. 世界银行 2006。

76. 经合组织青年记分板，http：//www.oecd.org/document/31/0，3746，en_2649_37457_46328479_1_1_1_37457，00.html。

77. 经合组织 2010。

78. 经合组织 2010。

79. 欧盟通讯稿，http：//www.eu-skladi.si/information-and-publicity/news-on-cohesion-policy-implementation/latest-news/barrososlovenia-example -of -best -practice -in -youthemployment#c1 =News% 20Item&c1 =novica。

80. 经合组织 2009。

81. 经合组织 2011。

82. 国际劳工组织 1996；国际劳工组织 2011。

83. Chau 和 Kanbur（2001）发现了同侪效应，即签署公约取决于已经签署该公约的同类国家的数量。

84. Aaronson 和 Zimmerman 2008；Elliott 和 Freeman 2003。

85. Hafner-Burton 2009。

86. Mosley 2011。

87. Schrank 2009。

88.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Adler 和 Hwang 2012。

89. Berik 和 Rodger 2010；Polaski 2006。

90.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Levi 等 2012；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Newitt 2012。

91. 关于多利益相关者倡议的例证包括英国道德贸易组织（http：//www.ethicaltrade.org/）；美国公平劳动协会（http：//www.fairlabor.org/）和国际社会责任组织（http：//www.sa-intl.org/）。

92.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Levi 等 2012；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Newitt 2012；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11。

93.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Newitt 2012。

94. 这些包括南非葡萄酒业道德贸易协会（http：//wieta.org.za.www34.cpt3.host-h.net/）和 Fibre Citoyenne，这是摩洛哥制衣业领域的一个多利益相关者组织（http：//www.fi -brecitoyenne.org/）。

95. Barrientos 和 Smith 2007。

96. Locke，待出版；Locke，Quin 和 Brause 2007。

97. Maranhao Costa 和 Trindade 2009。

98. 见“更佳工作”，国际金融公司，华盛顿特区；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http：//www.betterwork.org/EN/Pages/newhome.aspx）。

99. Laborde 和 Martin 2011a；Laborde 和 Martin 2011b。

100. Hoekman 2011。

101. Francois 和 Hoekman 2010；Hoekman 和 Mattoo 2011。

102. Hoekman 和 Mattoo 2011。

103. Fink，Mattoo 和 Rathindran 2003；Francois 和 Hoekman 2010。

104. Roy 2008。

105. Bertrand 和 Kramarz 2002；Wrigley 和 Lowe 2010。

106. Hoekman 和 Mattoo 2011。

107. Randriamaro 2007。

108. 世界银行 2011g。

109. 见世界贸易组织，“国家退休金的流动”，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mouvement_persons_e/mouvement_persons_e.htm。

110. Solimano 2008。

111. 关于例证，见 Winters 等（2002）和世界银行（2005）。

112. 关于例证，见 EFRA（2011）和 Angenendt（2012）。

113. 也存在区域性协议，例如欧盟的 Schengen 地区。

114. 关于对这些议题的讨论，见 Pritchett（2006）。

115. Kanbur 和 Svejnar 2009。

116. 在世界范围内，65 个国家开展劳动力月度调查或季度调查，而开展劳动力年度调查的国家有 116 个。

117. 这四个指标是被雇用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率标准）、就业人口比率、被雇用人口中每天生活费用不足 1.25 美元的人口（所谓的工作贫穷人口）的比例和雇用人口中自营工人和无酬工人（也被称做弱势工人）的比例。联合国发展小组 2010。

118. 关于劳动力统计的国际标准有两类：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会议上通过的公约和建议所规定的标准和国际劳工统计会议（ICLS）所通过的决议和指导方针。第一类标准是国际劳动法律的组成部分，在签署国中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国际劳工统计会议通过的标准旨在为各国提供指导，促进国际劳工统计的可比性，鼓励不同来源间和范围中的概念和方法的连贯性。

119. 国际劳工组织 2012。

120. Bartelsman，Haltiwanger 和 Scarpetta 2011；Hsieh 和 Klenow 2009，2011；McMillan 和 Rodrik 2011；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McMillan 和 Verduzco；Pagés 2010。

121. 例如，一旦一家使用电力的企业雇用的工人达到 10 个（不使用电力的企业雇用的工人达到 20 个），企业就进入了有组织的领域，要受到 1948 年工厂法的约束。一旦企业雇用的人数达到了 50 个，企业就要受到 1947 年工业争端法的约束，而根据 1948 年的雇员国家保险法，企业必须强制性的缴纳健康保险。一旦企业雇用的人数达到 100 个，企业实际上就丧失了解雇工人的权利。

122. Panagariya 2008。

123. Hsieh 和 Klenow 2009。

124. Panagariya 2008。1990 年至 1991 年以来农业领域比例的降低全部被服务业吸收。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 1970—1971 年的 46%降低至 1990—1991 年的 27%再降低到 2004—2005 年的 21%；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 1970—1971 年的 22%上升至 1990—1991 年的 27%，而再到 2004—2005 年的期间维持了同一水平；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也相应地从 1970—1971 年的 13%上升至 1990—1991 年至 2004—2005 年期间的 17%。

125. 改革强调贸易自由化和外国投资及 1951 年引入的许可证为主体制的解体，从而对有组织的制造业领域的准入和生产施加中央的控制。

126. Ahsan 和 Pagés 2009；Besley 和 Burgess 2004。由于对 1947 年工业争端法修订的解释和执行，关于 Besley 和 Burgess（2004）提出的证据，同时见 Bhattacharjea（2006）。

127. Hsieh 和 Klenow 2009。

128. Bhattacharjea 2006。

129. Hasan 和 Jandoc 2012。

130. Deshpande 等 2004。

131. Santosh Mehrotra 做出的初步估计（印度计划委员会）。

132. Hasan 和 Jandoc 2012。

133. 2000 年以来，中国颁布了几部劳动法律，其中包括 2001 年工会法修正案和 2008 年的劳动合同法、就业保障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及 2011 年的社会保险法。这些法律规章的实施可能导致劳动率市场流动性的降低。

134. 世界银行 2004a。

135. 更有趣的是，正规领域工人的移民流动向巴西中西部、北部和东北部等非传统的地区流动。这种流动与移民一般从低收入的北部流入收入较高的南部地区的断言相悖。Aguayo-Tellez，Muendler 和 Poole 2010。

136. 世界银行 2009c；Lin 2012。

137. Jayanthakumaran 2003。

138. Aguayo -Tellez，Muendler 和 Poole 2010；Amaral-Filho 2003；Lastres，Cassiolato 和 Campos 2006。

139. Bardhan 2010。

140. Bardhan 2010。

141. Au 和 Henderson 2006。

142. 专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文件 Wang，Song 和 O'Keefe 2012。

143. Cai 2011；Cai，Du 和 Meiyan 2002；Cai，Park 和 Zhao 2008；Chaudhuri 和 Datt 2009；Giles，Wang 和 Park 2012。

144. 世界银行 2012f。

145. Bardhan 2010；世界银行 2011c。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aronson, Susan, and Jamie Zimmerman. 2008. *Trade Imbalance: The Struggle to Weigh Human*

Rights Concerns in Trade Policymak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5): 1369–401.

Adler, Daniel, and Hans Hwang. 2012. "From Law on the Books to Law in Action: A Note on the Role of Regula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Good Jobs in Cambodia's Garment Sector."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Aguayo-Tellez, Ernesto, Marc-Andres Muendler, and Jennifer P. Poole. 2010. "Globalization and Formal Sector Migration in Brazil." *World Development* 38 (6): 840–56.

Ahsan, Ahmad, and Carmen Pagés. 2009. "Are All Labor Regulations Equal? Evidence from Indian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7 (1): 62–75.

Amador, Diego, Raquel Bermal, and Ximena Peña. 2011. "The Rise in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Colombia: Fertility, Mental Status, or Educatio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Amaral-Filho, Jair. 2003. "Ajustes Estruturais, Novas Formas de Intervencao Publica e Regime de Crescimento, Economico no Ceara." In *Regiões e Cidades, Cidades nas Regiões: O Desafio Urbano-Regional*, ed. Maria Flora Gonçalves, Carlos Antônio Brandão, and Antônio Carlos Galvão, 367–85. São Paolo: Universidade Estadual Paulist.

Angenendt, Steffen. 2012. "Migration and Social Inclusion—Looking through the Good Jobs Lens." In *Moving Jobs to Center Stage*. Berlin: BMZ (Bundesministerium fuer Wirtschaftliche Zussamenarbeit), Berlin Workshop Series.

Arezki, Rabah, Amadou Sy, and Thorvaldur Gylfason. 2012. *Beyond the Curse: Policies to Harness the Power of Natural Resourc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u, Chun Chung, and J. Vernon Henderson. 2006.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3 (3): 549–76.

Ball, Laurence, Daniel Leigh, and Prakash Loungani. Forthcoming. "Okun's Law: Fit at 50?" Working Pape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Bardhan, Pranab K. 2010. *Awakening Giants, Feet of Clay: Assessing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rrientos, Stephanie, and Sally Smith. 2007. "Do Workers Benefit from Ethical Trade? Assessing Codes of Labour Practice in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s." *Third World Quarterly* 28 (4): 713–29.

Bartelsman, Eric, John Haltiwanger, and Stefano Scarpetta. 2011.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The Role of Allocation and Selec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MD. Processed.

Berik, Gunseli, and Yana van der Meulen Rodger. 2010. "Options for Enforcing Labour Standards: Lessons from Bangladesh and Cambod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2 (1): 56–85.

Bertrand, Marianne, and Francis Kramarz. 2002. "Does Entry Regulation Hinder Job Creation? Evidence from the French Retail Indus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4): 1369–413.

Besley, Timothy, and Robin Burgess. 2004. "Can Labor Regulation Hinder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 (1): 91–134.

Bhattacharjea, Aditya. 2006.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 India." Working Papers 141, Centr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 New Delhi.

Bloom, David E., and David Canning. 2008. "Population Health and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24,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Borchert, Ingo, Batshur Gootiiz, and Aaditya Mattoo. 2010. "Restrictions on Services Trade and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Bosch, Mariano, and William Maloney.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bor Market Dynamics Using Markov Processes: An Application to Informality." *Labour Economics* 17 (4): 621–32.

Bruhn, Miriam. 2008. "License to Sell: The Effect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Reform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Mexico."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53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ai, Fang. 2011. "Hukou System Reform and Unification of Rural-Urban Social Welfare."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19 (3): 33–48.

Cai, Fang, Yang Du, and Wang Meiyan. 2002. "What Determine Hukou System Reform? A Case of Beijing." Working Paper Series 15,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ai, Fang, and Wang Meiyan. 2011. "Labor Market Changes, Labor Disputes and Social Cohesion in China." Working Paper Series 307,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Cai, Fang, Albert Park, and Yaohui Zhao. 2008.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in the Reform Era." In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d.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167–2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u, Nancy H., and Ravi Kanbur. 2001. "The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Conventions: Who, When and Why?" In *Brookings Trade Forum: 2001*, ed. Nancy H. Chau, Ravi Kanbur,

Ann E. Harrison, and Peter Morici, 113–56.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Chaudhuri, Shubham, and Gaurav Datt. 2009. *From Poor Areas to Poor People: China's Evolving Poverty Agenda, An Assessment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hen, Martha, Chris Bonner, Mahendra Chetty, Lucia Fernandez, Karin Pape, Federico Parra, Arbind Singh, and Caroline Skinner. 2012. "Urban Informal Workers: Representative Voice and Economic Right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Chioda, Laura. 2012. *Work and Family: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Women in Search of a New Balan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008. *The Growth Commission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onsejo Nacional de Innovación. 2008. *Hacia una Estrategia Nacional de Innovación para la Competitividad.* Santiago: Consejo Nacional de Innovación.

Consia Consultants. 2007. *Second External Annual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 the Rwanda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Program (RDRP).* Copenhagen: Consia Consultants.

Cunha, Flavio, James J. Heckman, and Susanne Schennach. 2010. "Estimating the Technology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 Formation." *Econometrica* 78 (3): 883–931.

Deshpande, Lalit K., Alakh N. Sharma, Anup K. Karan, and Sandip Sarkar. 2004. *Liberalisation and Labour: Labour Flexibility in Indian Manufacturing.*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Dinkelman, Taryn. 2011. "The Effects of Rural Electrification on Employment: New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7): 3078–108.

Dudwick, Nora, and Radhika Srinivasan, with Jose Cueva and Dorsati Mandavi. Forthcoming. *Creating Jobs in Africa's Fragile States: Are Value Chains an Answer?* Directions in Development Ser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EFRA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2011. *Fundamental Rights of Migrants in an Irregular Situ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lbadawi, Ibrahim, Linda Kaltani, and Raimundo Soto. 2009. *Aid, Real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Santiago: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Elliott, Kimberly A., and Richard B. Freeman. 2003. *Can Labor Standards Improve under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ngle, Patrice L., Maureen M. Black, Jere R. Behrman, Meena Cabral de Mello, Paul J. Gertler, Lydia Kapiriri, Reynaldo Martorell, Mary Eming You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eering Group. 2007. "Strategies to Avoid the Loss of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in More Than 200 Million Childre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Lancet* 369: 229–42.

Fajnzylber, Pablo, William Maloney, and Gabriel V. Montes-Rojas. 2011. "Does Formality Improve Micro-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Brazilian SIMPLES Progr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4: 262–76.

Fiess, Norbert, Marco Fugazza, and William Maloney. 2010. "Informal Self-Employment and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1 (2): 211–26.

Fink, Carsten, Aaditya Mattoo, and Randeep Rathindran. 2003. "An Assess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s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15 (4): 443–66.

Foster, Vivien, and Cecilia Briceño-Garmendia, eds. 2010. *Africa's Infrastructure: A Time for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François, Joseph F., and Bernard Hoekman. 2010. "Services Trade and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8 (3): 642–92.

Frankel, Jeffrey. 2012.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 Survey of Diagnoses and Some Prescrip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igh-Level Seminar, "Commodity Price Volatility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Low-Income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1.

Gibson, John, David McKenzie, and Halahingano Rohorua. 2008. "How Pro-Poor Is the Selection of Seasonal Migrant Workers from Tonga under New Zealand's Recognized Seasonal Employer Program."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69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Giles, John, Dewen Wang, and Albert Park. 2012. "Expanding Social Insurance Coverage in Urban China: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s of Policy and Participat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Glewwe, Paul W. 2004. "An Overview of Economic Growth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Vietnam 1990s." In *Economic Growth, Poverty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Vietnam*, ed. Paul Glewwe, Nisha Agarwal, and David Dollar, 1–2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antham-McGregor, Sally, Yin Bun Cheung, Santiago Cueto, Paul Glewwe, Linda Richter, Barbara Strupp,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eering Group. 2007.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the First 5 Years for Childr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ancet* 369: 60–70.

Gove, Amber, and Peter Cvelich. 2010. *Early Reading: Igniting Education for All.* Research Triangle Park, NC: 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

Hafner-Burton, Emilie. 2009. *Forced to be Good: Why Trade Agreements Boost Human Right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llward-Driemeier, Mary, Gita Khun-Jush, and Lant Pritchett. 2010. "Deals Versus Rules: Policy Implementation Uncertainty and Why Firms Hate It." Working Paper Series 1600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Hanushek, Eric A., and Ludger Woessmann. 2008. "The Role of Cognitive Skill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 (3): 607–88.

Hasan, Rana, and Karl Jandoc. 2010. "The Distribution of Firm Size in India: What Can Survey Data Tell Us?" Working Paper Series 213,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 2012. "Labor Regulations and the Firm Size Distribution in Indian Manufacturing." In *Reform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India*, ed. Jagdish Bhagwati and Arvind Panagariy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ckman, James J. 2008. "The Case for Investing in Disadvantaged Young Children." In *Big Ideas for Children: Investing in Our Nation's Future,* 49–58. Washington, DC: First Focus.

Heineck, Guido, and Silke Anger. 2010. "The Returns to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in Germany." *Labour Economics* 17 (3): 535–46.

Hoekman, Bernard. 2011. "Aid for Trade: Why, What, and Where Are We?" In *Unfinished Business? The WTO's Doha Agenda*, ed. Will Martin and Aaditya Mattoo, 233–54. London: London Publishing Partnership.

Hoekman, Bernard, and Aaditya Mattoo. 2011.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gulatory Reform: Re-invigora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51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sieh, Chang-Tai, and Peter J. Klenow.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4): 1403–48.

———. 2011. "The Life Cycle of Plants in India and Mexico." Chicago Booth Research Paper Series 11-33, University of Chicago, IL.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Forthcoming. *IFC Job Study: Assessing Private Sector Contributions to Job Creation*. Washington, DC: IFC.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1996. C177 Home Work Convention (Entry into force: 22 April 2000).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at its 83rd session, ILO, Geneva, June 20.

———. 1998.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at its 86th session, ILO, Geneva, June 18.

———. 2011. C189 Domestic Workers Convention.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at its 100th session, ILO, Geneva, June 16.

———. 2012. "What Are the Key Challenges Facing Labour Statistics Today?" ILO, Geneva. Processed.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3. "Growth and Institutions." In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03; Growth and Institutions,* 95–128. Washington, DC: IMF.

Jayanthakumaran, Kankesu. 2003. "Benefit-Cost Appraisals of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1 (1): 51–65.

Kanbur, Ravi and Jan Svejnar. 2009. "Overview." In *Labor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d. Ravi Kanbur and Jan Svejnar, 1–12. New York: Routledge.

Kaufmann, Daniel, Aart Kraay, and Massimo Mastruzzi. 2010.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Issu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43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eefer, Philip. 2009. "Governance."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ed. Todd Landman and Neil Robinson, 439–62.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Kim, Aehyung, Ajay Tandon, and Asrat Hailu. 1997. "Health and Labor Productivity: The Economic Impact of Onchocercal Skin Diseas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1836,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ing, Robert, and Ross Levine. 1993.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 (3): 717–37.

Klapper, Leora, Luc Laeven, and Raghuram Rajan. 2006. "Entry Regulation as a Barrier to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2 (3): 591–629.

Kraay, Aart. 2012. "How Large Is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Multiplier? Evidence from World Bank Lend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 (2): 1–59.

Laborde, David, and Will Martin. 2011a. "Agricultural Market Access." In *Unfinished Business? The WTO's Doha Agenda*, ed. Will Martin and Aaditya Mattoo, 35–54. London: London Publishing Partnership.

———. 2011b. "Non-agricultural Market Access." In *Unfinished Business? The WTO's Doha Agenda*, ed. Will Martin and Aaditya Mattoo, 55–68. London: London Publishing Partnership.

Laeven, Luc, and Christopher Woodruff. 2007. "The Quality of the Legal System, Firm Ownership, and Firm Siz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 (4): 601–14.

Lastres, Helena M. M., Cassiolato Jose E., and Renato Campos. 2006. "Arranjos e Sistemas Produtivos e Inovativos Locais: Vantagens e Enfoque." In *Es-*

trategias para o Desenvolvimento: Um Enfoque sobre Arranjos Produtivos Locais do Norte, Nodeste e Centro-Oeste Brasileiro, ed. Helena M. M. Lastres and Jose E. Cassiolato, 13–28. Rio de Janeiro: Instituto de Economia da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de Janeiro.

Lee, Jean, and David Newhouse. 2012. "Cognitive Skill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Levi, Margaret, Christopher Adolph, Aaron Erlich, Anne Greenleaf, Milli Lake, and Jennifer Noveck. 2012. "Align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Why, When, and How to Uphold Labor Standard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Levine, Ross. 2005. "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865–934. Amsterdam: Elsevier.

Lin, Justin Yifu. 2012.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cke, Richard. Forthcoming. *Beyond Compliance: Promoting Labor Justice in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cke, Richard, Matthew Amengual, and Ashkay Mangla. 2009. "Virtue out of Necessity? Compliance, Commit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 Conditions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Politics & Society* 37 (3): 319–51.

Locke, Richard, Fei Quin, and Alberto Brause. 2007. "Does Monitoring Improve Labor Standards? Lessons from Nike."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61 (1): 3–31.

Maranhao Costa, Patricia Trindade. 2009. *Fighting Forced Labour: The Example of Brazil.*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McMillan, Margaret S., and Dani Rodrik. 2011.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Working Paper Series 1714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MDRP (Multi-Country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Program). 2008. *The Rwanda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Program: Reflections on the Reintegration of Ex-Combatants.* Washington, DC: MDRP.

———. 2010. *Final Report Overview of Program Achievements.* Washington, DC: MDRP.

Mehreteab, Amanuel. 2005. *Rwanda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Program: Tracer Study*. Kigali: Rwanda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Commission.

Montenegro, Claudio E. 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 2012. "Returns to Schooling around the World."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Mosley, Layna. 2011. *Labor Rights and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itt, Kirsten. 2012. "Private Sector Voluntary Initiatives on Labour Standard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Connor, Thomas, Michael Rutter, Celia Beckett, Lisa Keaveney, Jana Kreppner, and the English and Romanian Adoptees Study Team. 2000. "The Effects of Global Severe Privation on Cognitive Competence: Extension and Longitudinal Follow-up." *Child Development* 71 (2): 376–90.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9. *OECD Reviews of Labour Market and Social Policies: Slovenia.* Paris: OECD.

———. 2010. *Off to a Good Start? Jobs for Youth.* Paris: OECD.

———. 2011. *OECD Economic Surveys: Slovenia.* Paris: OECD.

OECD and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1. *G20 Country Policy Briefs: Brazil—Share of Formal Employment Continues to Grow.* Paris: OECD and ILO.

Pagés, Carmen, ed. 2010. *The Age of Productivity: Transforming Economies from the Bottom Up.*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anagariya, Arvind. 2008. *India: The Emerging Gia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rk, Jaegil, Daejong Kim, Yongseok Ko, Eunnan Kim, Keunhyun Park, and Keuntae Kim. 2011.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olicies in Korea.* 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 Settlements.

Polaski, Sandra. 2006. "Combining Global and Local Forces: The Case of Labor Rights in Cambodia." *World Development* 34 (5): 919–32.

Pritchett, Lant. 2006. *Let Their People Come: Breaking the Gridlock on Global Labor Mobil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Psacharopoulos, George, and Harry Patrinos. 2004.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Further Update." *Education Economics* 12 (2): 111–34.

Purcell, Julius. 2010. *Individual Disputes at the Workplace: Alternative Disputes Resolution.* Dublin: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Rama, Martín. 2009. "Making Difficult Choices: Vietnam in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40,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ommiss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Ramachandran, Vijaya, Alan Gelb, and Manju Kedia Shah. 2009. *Africa's Private Sector: What's Wrong with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Randriamaro, Zo. 2007. *Gender and Trade: Overview Report (2006)*. Brighton, U.K.: BRIDGE.

Ravallion, Martin, and Dominique van de Walle. 2008. *Land in Transition: Reform and Poverty in Rural Vietna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obertson, Raymond, Drusilla Brown, Gaëlle La Borgne Pierre, and Maria Laura Sanchez-Puerta, eds. 2009. *Globalization, Wages, and the Quality of Jobs: Five Country Stud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odrik, Dani. 2000. "Institutions for High-Quality Growth: 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5 (3): 3–31.

———. 2008.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Grow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39 (2): 365–439.

Rodrik, Dani, Arvind Subramanian, and Francesco Trebbi. 2004. "Institutions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9 (2): 131–65.

Roy, Martin. 2008. "Out of Stock or Just in Time? Doha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Distribution Services." In *Opening Markets for Trade in Services: Countries and Sectors in Bilateral and WTO Negotiations*, ed. Juan Marchetti and Martin Roy, 224–63.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wanda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Commission. 2012. *Tracer: Community Dynamics and Payment Verification Study*. Kigali: Rwanda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Commission.

Schrank, Andrew. 2009.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Probity in a Patrimonial State: Labor Inspectors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Latin America Politics and Society* 51 (2): 91–114.

Sinnott, Emily, John Nash, and Augusto de la Torre. 2010. *Natural Resourc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Beyond Booms and Bust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olimano, Andres. 2008.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 Types, Causes and Development Impa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vrou, Aki, Rasmus Jorgensen, and Jennifer O'Riordan. 2007. *Beneficiary Impact Assessment and Tracer Study*. Taastrup, Denmark: Nordic Consulting Group.

Styczynska, Izabela. 2012. *Provision of Long 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Poland in Comparison to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Prague: Policy Association for an Open Society.

Tobias, Jutta, and Karol Boudreaux. 2011. "Entrepreneurship and Conflict Reduction in the Post-Genocide Rwanda Coffee Industry."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24 (2): 217–42.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1.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 Non-Equity Mode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Geneva: UNCTA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Group. 2010. *Thematic Paper on MDG1: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and Hunger, Review of Progres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Walker, Susan, Theodore Wachs, Julie Meeks Gardner, Betsy Lozoff, Gail Wassermann, Ernesto Pollitt, Julie Cart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eering Group. 2007. "Child Development: Risk Factors for Adverse Outcom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ancet* 369: 145–57.

Wang, Dewen, Jin Song, and Philip O'Keefe. 2012. "Understanding the Hukou System through Quantifying Hukou Thresholds: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Finding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3.

Winters, Alan, Terrie Walmsley, Zhen Kun Wang, and Roman Grynberg. 2002. "Negotiating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Temporary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University of Sussex Discussion Paper 87, Sussex, U.K.

World Bank. 199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a. *Sri Lanka: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Connecting People to Prosper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4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A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for Every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Remittances and Migr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6. *Chil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7. *Rwanda: Toward Sustained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Vol. I, Synthesis and Priority Measur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8. *Chile: Toward a Cohesive and Well Governe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9a. *From Privilege to Competition: Unlocking Private-Led Growth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9b. *Vietnam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Capital Matte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9c.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0a. *Country Assistance Strategy for the Kingdom of Tong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0b. *MDRP (Multi-Country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Program) Repor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a. *Doing Business 2012: Doing Business in a More Transparent Worl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b. *Fueling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in Poland Through Employment, Skills, Innovation, Technical Repor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c.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South As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d. *Rwanda Economic Update: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Advers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e. *Vietnam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Market Economy for a Middle-Income Countr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f.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g.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h.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i. "Capabilities, Opportunities, and Participation: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Companion report to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 2012a. *Afghanistan in Transition: Looking Beyond 2014*.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2b. *Job Trend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2c. *Labor Practices in Lao PD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2d. "Rwanda Ninth Poverty Reduction Support Financing." Program Information Documen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2012e. *The World Bank: New Directions in Justice Refor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2f.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rigley, Neil, and Michelle Lowe. 2010. *The Globalization of Trade in Retail Service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Young, Mary Eming, and Linda Richardson. 2007.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From Measurement to Ac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Yusuf, Shahid, and Kaoru Nabeshima. 2006. *Post-Industrial East Asian Cities: Innovation for Growth*.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附录


Работа
وظائف
küdawün
Darbo vietos
suydi
Pekerjaan
TRABAHO
Nitsumo
starf
kop
일
就业
Työ
Tiro
Emplois
mahi
asa
Traballo
Θέσεις εργασίας
בודה
Werk
Jobs
ise
Зайнятість
Emprego
Tsi Nikaio'tenhsero:ten's
อาชีพ
Empregos
Posao
Basa
Umsebenzi
Muncă
Imirimo
việc làm
Занятость
KAZI
punë
Empleo
Postanna
Arbeitsplätze
ian
a lavur
luoi
chokol

术语汇编

工作

工作：尽管关于工作的准确定义多种多样，工作是产生以货币或实物形式表现出来的收入并且在工作过程中不侵犯基本权利和原则的劳动活动。工作可以表现为工资就业、自就业和农业就业等多种形式。工作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非正式的。

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世界上存在对社会目标最有贡献的工作。一项工作的发展收益系指工作对工人及对他人溢出效应（如果有）的价值总和。个体价值是衡量发展收益的第一位序标准，但是溢出效应可以很大。

工作透镜：如果战略、政策和项目对工作的发展收益予以考虑，那么战略、政策和项目就采用了工作透镜。工作透镜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应对阻碍私营领域创造更多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因素来实现为开发的发展收益。

技能

认知技能：认知技能包括能力、工作记忆、计算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认知技能是一生中获得和建设其他技能的基础。

社会技能：社会技能促进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互动与沟通。社会技能基于表现在团队工作、可靠性、纪律或工作努力等行为中的个体特征。

技术能力：技术能力是完成具体任务的能力。技术能力表现为特定职业或职业圈子所需的具体知识。

企业家能力：企业家能力是在已知技术的范围内，通过将新观念付诸实施的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结合起来提高企业效率的能力。

转型

生活水平：生活水平包括物质方面和主观方面的福祉。工作通过赋予人们脱离贫穷的收入机会、降低人们的脆弱性、激励人们以及提高更广泛领域的幸福度和生活满意度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生产率：生产率系既定生产投入数量的产出量。更多生产率较高工作的创造和生产率较低工作的破坏及工人在国内和跨国之间的再分配推动改变整体生产率。

社会凝聚力：当社会具有和平管理集体决策的能力时，社会就具有凝聚力。通过培育个体对所属群体之外的其他人的信任，工作可以提高社会凝聚

力。工作也可以通过培育公民参与提高社会凝聚力。

权利

核心劳动标准：核心劳动标准系指包括在 1998 年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之中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八大公约。这些公约覆盖童工、歧视、强迫劳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力等。

工作中的健康与安全：职业事故和工作相关的疾病可以削弱工人的健康，是死亡的重要原因，可以给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

发展收益

溢出效应：除了对工作持有者的福利产生直接影响外，工作可以对社会目标产生额外影响。工作可能对他人的生活水平、他们的生产率或者集体决策的方式产生影响。来自工作的溢出效应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其他人的收入：不平衡的谈判力或歧视可能导致劳动收入的过低或过高，从而给他人带来利益或损失。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或限制性规章制度支持的就业也对他人的收入和就业机会产生影响。

家庭分配：工作可以改变工作持有者的地位，增加其如何在家庭成员中分配资源的话语权。赋予女性权利的工作可能提高对儿童教育和健康的投资。

减贫：在重视减贫的社会里，使人们脱离艰苦的就业提高整体的福祉水平。在这样的社会里，向贫穷人口倾斜的就业机会被视为是更可取的方针，即使整体的收入或产出保持不变。

聚集效应：工作中的互动可以提高他人的生产率。观念共享，向顾客、供应商和竞争者学习以及在更大工人蓄水池中技能的更佳匹配均是实现生产率收益的机制。

全球一体化：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工作和外资公司中的工作使人获得更先进的技术技能和管理技能。这些工作也可以改变产业结构，而且这种改变是通过有利于生产率最高的经济单位并将生产率最低的经济单位淘汰出局的方式进行的。

环境效应：当工作破坏环境或导致稀缺资源的过度使用时，工作对整体生产率具有负面影响。但是工作也可以产生积极的环境效应，管理森林和其他公共资源的工作就是如此。

社会身份：通过以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的方式影响工作持有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就业可以对他人的福祉产生影响。工作可以塑造规则，从而对工作持有者如何与他者互动产生影响。

网络关系：工作使人们彼此联系。工作在同事之间及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传递信息。当工作场所的互动增加了不同社会背景和种族背景的人口之间的直接了解，工作也可能促进他们之间的互相宽容。

公平感：与就业平等观念相左的工作分配可能导致挫败感和脱离社会或集体决策进程的行为。遵循透明和业绩标准的就业有助于提高社会中的公平感。

就业挑战

农业经济体：在农业经济体中大多数人口仍然从事农业活动，常常在规模极小的家庭农场中，而城市还不是经济活力的主要源泉。

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正在经历冲突或正在脱离冲突，这些国家仍然需要维和力量，或者死于冲突的人数可能仍然很高。

资源丰富型国家：矿物出口在出口中的比例很大。资源开采带来经济的蓬勃增长，但是降低了竞争力，刺激基于转移支付的工作。

小岛国家：小岛国家的规模及其偏远的地理位置使其难以收获聚集和全球一体化的利益。小岛国家脆弱的生态体系进一步加剧了其脆弱性。

城市化国家：城市人口的比例正在迅速增加。城市吸引农民移民，但是可能不能从轻工业产品出口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青年失业率很高的国家：长期的失业和赋闲状态对规模很大一部分青年人口具有影响，而青年人口的规模又常常很大。特权常常染指商业机会和工作的分配。

规范化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率大到足以延伸到整个劳动力队伍，但是如何在不降低生产率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目标是一大挑战。

老龄化社会：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正在持续下降，赡养和护理持续增加的老年人的成本正在持续增加，这对生活水平造成了双重负担。

文献注释

本报告广泛参考了工作小组委托撰写的大量背景文件及世界银行内外众多同行的资料。工作组谨在此向下述提供文件、注释、报告和数据分析的人士致以诚挚的感谢：

Ana Abras，Daniel Adler，Christopher Adolph，Cristian Aedo，Alpasan Akay，Yilmaz Akyuz，Rita Almeida，Miriam Altman，Uma Rani Amara，Colin Andrews，Steffen Angenendt，Omar Arias，Hassen Arouri，Javier Arias-Vasquez，Gabriela Armenta，Ragui Assaad，Joao Pedro Azevedo，Elisabeth Baehr，Aminata Bakouan，Sajitha Bashir，Daniel Berliner，Janine Berg，M.In é s Berniell，Haroon Bhorat，Constanza Biavaschi，Ingunn Bjorkhaug，David Blanchflower，Erik Bloom，Nicholas Bloom，Chris Bonner，Alessio Brown，Drusilla Brown，Tilman Brueck，Martha Chen，Mahendra Chetty，Yoonyoung Cho，Hayat Chowdhury，Sarah Cook，Katia Covarrubias，Hai-Anh Dang，Maitreyi Bordia Das，Benjamin Davis，Arjan de Haan，Joost de Laat，Rajeev Dehejia，Peter Dewees，Stefania Di Giuseppe，Rafael Díez de Medina，Susanne Dorasil，Nora Dudwick，Gilles Duranton，Werner Eichhorst，Aaron Erlich，Jonna Estudillo，Christine Evans-Klock，Paolo Falco，Lucia Fernandez，Gary Fields，Sandra Fredman，Richard Freeman，Caroline Freund，Leonardo Garrido，John Giles，T.H.Gindling，Corrado Giulietti，Anne Greenleaf，Michael Grimm，Lorenzo Guarcello，John Haltiwanger，Anne Hatloy，Ricardo Hausmann，Yuki Higuchi，Margo Hoftijzer，Maddalena Honorati，Shoghik Hovhannisyan，Alejandro Hoyos，Jikun Huang，Steffen Hummelsheim，Hans Hwang，Gabriela Inchauste，Beata Javorcik，Johannes J ü tting，Tewodros Kebede，Jennifer Keller，Michael Kendzia，Niny Khor，Talip Kilic，Austin Kilroy，Christian Kingombe，Johannes Koettl，Irina Kovrova，Adea Kryeziu，David Kucera，Nandika Kumanayake，Milli Lake，Peter Lanjouw，Donald Larson，Jean Lee，Hartmut Lehman，Margaret Levi，Philip Levy，Richard Locke，Javier Luque，Scott Lyon，William Maloney，Ghazala Mansuri，David Margolis，Pedro Martins，Tomoya Matsumoto，Dimitris Mavridis，Catriona McLeod，Margaret McMillan，Johan Mistiaen，Martin Moreno，Marc-Andreas Muendler，Alexander Muravyev，Yoo-Jeung Nam，Ambar Narayan，David Newhouse，Kirsten Newitt，Andrew Norton，Jennifer Noveck，Antonio Nucifora，Philip O'Keefe，Sergio Olivieri，Remco Oostendorp，Ana Maria Oviedo，Caglar Ozden，Pierella Paci，Karin Pape，Federico Parra，Harry Anthony Patrinos，Patti Petesch，Janneke Pieters，Uma Rani，Marco Ranzani，Bob Rijkers，David Robalino，Raymond Robertson，Nur í a Rodr í guez-Planas，Paul Romer，Furio Camillo Rosati，Friederike Rother，Scott Rozelle，Jaime Saavedra Chanduvi，Klas Sander，Mauricio Sarrias，Naotaka Sawada，Ricarda Schmidl，Helmar Schneider，Nadia Selim，Binayak Sen，Slesh Shrestha，Arbind Singh，Caroline Skinner，Jin Song，Tetsushi Sonobe，Walter Sosa，Dirk Willem te Velde，Sailesh Tiwari，Ihnsan Tunali，Erol Tymaz，Zia Uddin，Inigo Verduzco，Marco Vivarelli，Jacqueline Wahba，Dewen Wang，Michael Weber，Christian Welzel，Frank-Borge Wietzke，Hernan Winkler，Firman Witoelar，Monica Yanez-Pagans，Huafeng Zhang 和 Klaus Zimmerman。

世界银行内外许多人士向工作小组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并以不同的方式为本报告的撰写提供协助，表达意见和提供协助的人士包括：

Paloma Acevedo，Cristian Aedo，Junaid Kamal Ahmad，Ahmad Ahsan，Rita Almeida，Tilman

Altenburg，Colin Andrews，Omar Arias，Gabriela Armenta，Erhan Artuc，Orazio Attanasio，Ajita Berar Awad，Joao Pedro Azevedo，Peter Bakvis，Elena Bardasi，Nicholas Barr，Andrew Beath，Deepak Bhattasali，Benu Bidani，Erik Bloom，Richard Blundell，Carlos Braga，Milan Brahmbhatt，Hana Brixi，Miriam Bruhn，Sharan Burrows，Wei Ca，Sandrine Cazes，Barry Chiswick，Luc Christiansen，Michael Cichon，Tito Cordella，Paulo Correa，Wendy Cunningham，Karen Curtis，Mahesh Dahal，Andrea Mario Dall'Olio，Maitreyi Das，Joost de Laat，Augosto de la Torre，Gabriel Demombynes，Stefan Dercon，Shanta Devarajan，Peter Dewees，Charles di Leva，Carolina Di-az-Bonilla，Nancy Donaldson，Nora Dudwick，Olivier Dupriez，Friedel Eggelmeyer，Philippe Eg-ger，Marcelo Jorge Fabre，Gabriel Alejandro Faccini Palma，Marcel Fafchamps，Marianne Fay，Juan Feng，Colin Fenwick，Manuela Ferro，Deon Filmer，Georg Fischer，Ciprian Fisiy，Ariel Fiszbein，Roberto Foa，Louise Fox，Caroline Freund，Bernard Funck，Leonardo Garrido，Roberta Gatti，Varun Gauri，Steve Gibbons，Indermit Gill，Delfin Go，Pablo Gottret，Timo Graf von Koenigsmarck，Duncan Green，Mary Hallward-Driemeier，Mark Hanush，Bernard Harborne，Niels Harild，Rana Hasan，Susan Hayter，James Heckman，Rasmus Heltberg，Bernard Hoekman，Bert Hofman，Robin Horn，James Howard，Chang-Tai Hsieh，Elisabeth Huybens，Herwig Immervoll，Gabriela Inchauste，Selina Jackson，Steen Lau Jorgensen，Roy Katayama，Philip Keefer，William James Kemp，Austin Kilroy，Elizabeth King，Leora Klapper，Judith Klemmer，Jeni Klugman，Kalpana Kochhar，Markus Kostner，Aphichoke Kotikula，Rachel Kranton，Arvo Kuddo，Somik Lall，Esperanza Lasagabaster，Daniel Lederman，Philippe Leite，Jeffrey Lewis，Eduardo Ley，Michael Lipton，Gladys L ó pez-Acevedo，Malte Luebker，Amy Luinstra，Mattias Lundberg，Xubei Luo，Nora Lustig，Larissa Luy，Ghazala Mansuri，Alexandre Marc，Andrew Mason，Elizabeth Ma-ta Lorenzo，Aaditya Mattoo，Piotr Mazurkiewicz，Siobhan McInerney-Lankford，David McKenzie，Gerard McLinden，Julian Messina，Roland Michelitsch，Pradeep Mitra，Layna Mosley，Rose Mungai，Ana Maria Munoz Boudet，Reema Nanavaty，Urvashi Narain，Ambar Narayan，Reema Nayar，David Newhouse，Philip O'Keefe，Anna Olefir，Israel Osorio-Rodarte，Caglar Ozden，Pierella Paci，Howard Pack，Truman Packard，Carmen Pag é s，Robert Palacios，Montserrat Pal-lares-Millares，Pia Peeters，Nicola Pontara，Aleksandra Posarac，Peter Poschen，Patrick Premand，Menachem Prywes，Stephen Pursey，Rita Ramalho，Martin Ravallion，Michelle Rebosio，Ritva Reinikka，Jose Guilherme Reis，Ana Revenga，Carolyn Reynolds，Francesca Riccardone，Jamele Rigolini，Bob Rijkers，David Robalino，Nigel Roberts，Halsey Rogers，Mark Rosenzweig，Friederike Rother，Robert Francis Rowe，Jan Rutkowski，Jaime Saavedra Chanduvi，Frank Sader，Juan Sebasti á n Saez，Jamil Salmi，Carolina S á nchez Paramo，Maria Laura Sanchez Puerta，Justin Sanderfur，Prem Sangraula，Indhira Santos，Sigrid Schenk-Dornbusch，Grit Schmalisch，Anita Schwarz，Sudhir Shetty，Saurabh Shome，Sandor Sipos，Radhika Srinivasan，Stavros Stavrou，Henriette Strothmann，Manami Suga，Naotaka Sugawara，Victor Sulla，Jee-Peng Tan，Afia Tas-neem，Ehab Tawfik，Graham Teskey，Manuela Tomei，Carrie Turk，Alexandria Valerio，Bernice Van Bronkhurst，Aleem Walji，David Warren，Michael Weber，Deborah Welzel，Jill Wilkins，Alys Willman，Doris Witteler-Stiepelmann，Michael Woolcock，Colin Xu，Xiao Ye，Nobuo Yoshi-da 和 Anders Zeijlon。

在与国际金融公司 Roland Michelitsch 领导的就业研究工作组，即“评估私营领域对就业创造的贡献”工作组的密切协作中，《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受益良多。工作组也从与就业知识平台的互动中受益良多，就业知识平台是在本报告撰写期间在 Mary Hall-ward-Driemeier，Gladys L ó pez-Acevedo，David Robalino 和 Claudia Sepulveda 的指导下启动的平台。

工作组也密切参加了由 Mahmoud Mohieldin 召集的、由 Tamar Manuelyan Atinc 和 Arup Banerji 领导的、由 Omar Arias，Najy Benhassine，Mary Hallward-Driemeier，Roland Michelitsch，Pierella Paci 和 Idah Pswarayi-Riddihough 参与的报告执行特别工作组的工作。

背景文件和注释

Abras, Ana, Alejandro Hoyos, Ambar Narayan, and Sailesh Tiwari. 2012.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in the Labor Market: Evidence from Life in Transition Surveys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Adler, Daniel, and Hans Hwang. 2012. "From Law on the Books to Law in Action: A Note on the Role of Regula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Good Jobs in Cambodia's Garment Sector."

Almeida, Rita, David Margolis, David Robalino, and Michael Weber. 2012. "Facilitating Labor Market Transitions and Managing Risks."

Aedo, Cristian, Jesko Hentschel, Javier Luque, and Martin Moreno. 2012. "Skills Around the World: Structure and Recent Dynamics."

Andrews, Colin, and Adea Kryeziu. 2012. "Public Works and the Jobs Agenda: Pathways for Social Cohesion."

Arias, Omar, and Walter Sosa. 2012. "Do Jobs Cause Trust? Results from Pseudo-Panel Analysis of Euro and Latino Barometer Surveys."

Arias-Vasquez, Javier, Jean N. Lee, and David Newhouse. 2012. "The Role of Sectoral Growth Patterns in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

Azevedo, João Pedro, Gabriela Inchauste, Sergio Olivieri, Jaime Saavedra Chanduvi, and Hernan Winkler. 2012. "Is Labor Income Responsible for Poverty Reduction? A Decomposition Approach."

Bashir, Sajitha, T. H. Gindling, and Ana Maria Oviedo. 2012. "Better Jobs in Central America: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Betcherman, Gordon. 2012.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Bhorat, Haroon. 2012. "Temporary Employment Services in South Africa."

Biavaschi, Costanza, Werner Eichhorst, Corrado Giulietti, Michael J. Kendzia, Alexander Muravyev, Janneke Pieters, Nuría Rodríguez-Planas, Ricarda Schmidl, and Klaus F. Zimmermann. 2012. "Youth Unemployment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Bjørkhaug, Ingunn, Anne Hatløy, Tewodros Kebede, and Huafeng Zhang.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Colombia."

Chen, Martha, Chris Bonner, Mahendra Chetty, Lucia Fernandez, Karin Pape, Federico Parra, Arbind Singh, and Caroline Skinner. 2012. "Urban Informal Workers: Representative Voice and Economic Rights."

Cho, Yoonyoung, and Maddalena Honorati. 2012. "A Meta-Analysis of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varrubias, Katia, Benjamin Davis, Aminata Bakouan, and Stefania Di Giuseppe. 2012. "Household Income Generation Strategies."

Das, Maitreyi Bordia. 2012. "Stubborn Inequalities, Subtle Processes: Exclusion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Dehejia, Rajeev, Drusilla Brown, and Raymond Robertson. 2012. "Life Satisfaction, Mental Well-Being and Workplace Characteristics: Evidence from Vietnam, Jordan, and Haiti."

Dudwick, Nora. 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s and Social Cohesion: Some Examples from Ethnography."

Duranton, Gilles. 2012. "Agglomeration and Jo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studillo, Jonna P., Tomoya Matsumoto, Hayat Chowdhury, Zia Uddin, Nandika Kumanayake, and Keijiro Otsuka. 2012. "Labor Markets,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Rural Poverty in Selected Countries in Asia and Sub-Saharan Africa."

Falco, Paolo, William Maloney, Bob Rijkers, and Mauricio Sarrias. 2012. "Subjective Well-Being, Informality, and Preference Heterogeneity in Africa."
Fredman, Sandra. 2012. "Anti-Discrimination Laws and Work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 Thematic Overview."
Giles, John, Dimitris Mavridis, and Firman Witoelar. 2012.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Cohesion,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Indonesia."
Gindling, T. H., and David Newhouse. 2012. "Self-Employ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Hatløy, Anne, Tewodros Kebede, Huafeng Zhang, and Ingunn Bjørkhaug.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Sierra Leone."
Hovhannisyan, Shoghik. 2012. "Labor Market and Growth Implications of Emigration: Cross-Country Evidence."
Inchauste, Gabriela. 2012. "Jobs and Transitions Out of Poverty: A Literature Review."
Inchauste, Gabriela, Sergio Olivieri, Jaime Saavedra Chanduvi, and Hernan Winkler. 2012. "Decomposing Recent Declines in Poverty: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Peru, and Thailand."
Javorcik, Beata Smarzynska. 2012. "Does FDI Bring Good Jobs to Host Countries?"
Kebede, Tewodros, Anne Hatløy, Huafeng Zhang, and Ingunn Bjørkhaug.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Egypt."
Kilroy, Austin. 2012. "Jobs to Social Cohesion: Via Interests, Attitudes, and Identities."
Kingombe, Christian, and Dirk Willem te Velde. 2012.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Creation: The Role of Growth Facilitation Polic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Kovrova, Irina, Scott Lyon, and Furio Camillo Rosati. 2012. "NEET Youth Dynamics in Indonesia and Brazil: A Cohort Analysis."
Larson, Donald, Keijiro Otsuka, Tomoya Matsumoto, and Talip Kilic. 2012. "Can Africa's Agriculture Depend on Smallholder Farmers?"
Lee, Jean N., and David Newhouse. 2012. "Cognitive Skill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Levi, Margaret, Christopher Adolph, Aaron Erlich, Anne Greenleaf, Milli Lake, and Jennifer Noveck. 2012. "Align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Why, When, and How to Uphold Labor Standards."
Levy, Philip. 2012. "Potential for International Rivalry as Governments Pursue Jobs."
Lyon, Scott, Furio Camillo Rosati, and Lorenzo Guarcello. 2012. "At the Margins: Young People Neither in Education nor in Employment."
Mansuri, Ghazala, Slesh Shrestha, Hernan Winkler, and Monica Yanez-Pagans. 2012a. "A Plot of My Own: Land Titling and Economic Mobility in Rural Uganda."
———. 2012b. "Health or Wealth? Income Earner Death and Economic Mobility in Rural Pakistan."
Martins, Pedro. 2012.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Africa: Tales of Lions and Cheetahs."
McMillan, Margaret S., and Inigo Verduzco. 2012.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Change on Labor's Share of Income."
Montenegro, Claudio E., 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 2012. "Returns to Schooling around the World."
Newitt, Kirsten. 2012. "Private Sector Voluntary Initiatives on Labour Standards."
Norton, Andrew, and Arjan de Haan. 2012. "Social Cohesion: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ith Respect to Jobs."
Oostendorp, Remco. 2012. "The Occupational Wages around the World (OWW) Database: Update for 1983–2008."
Petesch, Patti. 2012. "The Exponential Clash of Conflict, Good Jobs, and Changing Gender Norms in Four Economies."
Ranzani, Marco, and Furio Camillo Rosati. 2012. "The NEET Trap: A Dynamic Analysis for Mexico."
Rijkers, Bob, Hassan Arouri, Caroline Freund, and Antonio Nucifora. 2012. "Which Firms Create Jobs in Tunisia?"
Rozelle, Scott, and Jikun Huang. 2012. "China's Labor Transition and the Future of China's Rural Wages and Employment."
Sander, Klas, and Peter A. Dewees. 2012.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rees, Reduction in Forest Degradation, and Job Creation for the Poor."
Sawada, Naotaka. 2012. "Providing Business Services for Rural Income Generations: Using the Rural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 Data."

Selim, Nadia. 2012. “Innovation for Job Creation.”
Sonobe, Tetsushi, Yuki Higuchi, and Keijiro Otsuka. 2012.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Job Cre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Wang, Dewen, Jin Song, and Philip O’Keefe. 2012. “Understanding the Hukou System through Quantifying Hukou Thresholds: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Findings.”
Welzel, Christian. 2012. “The Contribution of ‘Good’ Jobs to Development and Cohesion: The Human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Wietzke, Frank-Borge, and Catriona McLeod. 2012. “Jobs, Well-Being, and Social Cohesion: Evidence from Value and Perception Surveys.”
Zhang, Huafeng, Ingunn Bjørkhaug, Anne Hatløy, and Tewodros Kebede. 2012. “Perception of Good Jobs: China.”

部分指标

整体注释
表 1　劳动力
表 2　技能
表 3　就业结构
表 4　生活水平
表 5　生产率
表 6　社会凝聚力
表 7　政策与制度
表 8　相互联系性
技术注释
表 9　微型数据源

整体注释

指标

表 1 到表 8 包括 68 个与就业相关的指标。这些指标概括了每个国家的就业水平和结构，不仅包括工资就业，还包括自就业和农业就业。这些指标覆盖了就业与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的关系，提供了促进移民的措施。技术注释陈述了各个定义。

资料来源

表 1 到表 8 的 68 个指标中，37 个指标的数据来源是公共来源。在遴选这些公共来源时，本报告对跨国比较性的重视高于对国家覆盖率的重视。大多数指标还有一系列其他数据来源，包括国家统计机构、国际数据库和具体的研究。然而，只有在所有国家都使用同一标准形成的数据被保留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 37 个指标都使用了同一数据来源。例如，表 1 到表 6 的五项失业指标全部基于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库的关键指标。

表 2 的教育成就指标使用了两种数据源，即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与国际数学与科学成就趋势研究（TIMSS），这两种数据源采用不同的标准。只有 6 个国家同时具有这些数据源，这使得本报告可以同时公布这些数据而没有太多的重复。对每一种情况使用的具体来源，表 2 在注释中予以说明。

表 1 到表 8 其他 31 个数据全部或部分基于由《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处理的微观数据。完全基于工作组数据处理的指标系指作为限制因素的技能（表 2）、工作贫穷人口（表 4）、收入的性别差异（表 4）、微型企业中的工人（表 5）、工资不平等（表 6）和既不在学校就读也不参加工作的青年（表 6）。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经合组织成员国、其他工业国家和新加入欧盟的国家的数据来自经合组织和欧盟统计局网站。发展中国家的指标基于《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处理的微观数据，工作组在处理数据时，使用了和经合组织和欧盟统计局相同的标准和定义。

这 31 项指标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大量的家庭调查、劳动力调查、人口普查和企业调查。《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依赖下述四个大规模的微观数据库：世界银行国际收入分布数据库（I2D2）、欧洲统计局、明尼苏达人口中心的整合公共使用的微观数据系列（IPUMS 国际，6.1 版）和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库。工作组也收集了许多额外的生活水平调查和劳动力调查数据。

要想成为这 31 项指标中任何一项指标的微观数据来源，生活水平调查或劳动力调查就必须具有国家代表性。对高度城市化的国家而言，这一要求意味着调查覆盖二级城镇；对其他国家而言，调查也必须包括农村地区。总之，《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对 800 多次家庭调查和普查（包括 6 亿多人口的数据）进行了标准化，从而确保国家间数据的可比性。表 9 对基于微观数据的指标的信息来源进行了概括。关于资料来源的更多信息，见技术注释。

年度

表 1 到表 8 的数据通常包括 1995 年、2005 年和 2010 年三个年份。在少数情况下，由于数据可得性的缘故，

本报告不得不保留使用其他年份的数据。例如，基于行业的最近工资估测（在表 4 中）是 2008 年的数据，但是第一组最低工资的可比较观察（在表 7 中）发生在 2007 年。同样，教育成就（见表 2）数据是 2003 年、2006 年和 2009 年的数据，这是因为这三年是具有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数据的年份（标为 2006 年国际数学与科学成就趋势研究的数据实际上是 2007 年的数据）。

使用《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处理的微观数据计算的 31 个指标以 1995 年、2005 年、2010 年为参照年。使用的微观数据来源鲜有基于年度的数据可用。这些指标使用五年窗口中距离参照年最近的年度的数据。例如，1995 年的数字是 1993 年至 1997 年期间可得的与 1995 年距离最近的年度的数据。调查数据的准确年度因国家而异。

国家

表 1 到表 8 包括 156 个国家或经济体。国家一词可能指任何具有独立的社会或经济统计数据的领土。表 1 到表 8 显示了 2010 年组成世界的国家或经济体的数据。除非另有说明，中国的数据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或中国台湾的数据。直到 1999 年，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包括东帝汶的数据。直到 2005 年，塞尔维亚的数据包括黑山共和国的数据，1999 年之后，不再包括科索沃的数据。

符号表示

空档表示数据不可获得，或表示指标无法计算汇总。0 或 0.0 表示指标为零或指标太小，为接近于零的小数位。

表 1 劳动力

	人口/百万 总量			工作年龄人口/% 总量			参与率/% 总量			失业率/% 总量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阿富汗	22.5	29.9	34.4		48.7			65.2			8.5	
阿尔巴尼亚	3.1	3.1	3.2	61.7	69.1		68.1	57.8			13.5	13.8
阿尔及利亚	28.3	32.9	35.5							27.9	15.3	11.4
安哥拉	12.1	16.5	19.1									
阿根廷	34.8	34.8	40.5	61.0	64.7	65.6	63.5	69.0	67.8	18.8	10.6	8.6
亚美尼亚	3.2	3.1	3.1		66.6			54.3		36.4	28.4	28.6
澳大利亚	18.1	20.4	22.3	66.6	67.3	67.6	74.1	75.4	76.5	8.5	5.0	5.2
奥地利	8.0	8.2	8.4	67.1	67.9	67.5	71.5	72.4	75.1	3.7	5.2	4.4
阿塞拜疆	7.7	8.4	9.0	63.2			48.0				8.1	6.0
孟加拉国	117.5	140.6	148.7		59.0	60.5			60.0	2.5	4.3	5.0
巴巴多斯岛	0.3	0.3	0.3	83.9			73.2			19.7	9.1	8.1
白俄罗斯	10.2	9.8	9.5		70.0			70.3				
比利时	10.1	10.5	10.9	66.2	65.6	65.9	62.1	66.7	67.7	9.3	8.4	8.3
伯利兹	0.2	0.3	0.3	52.8			58.1				3.1	4.0
贝宁	5.7	7.6	8.8		50.4			78.6				
不丹	0.5	0.7	0.7		61.7			68.8		12.5	11.0	8.2
玻利维亚	7.5	9.1	9.9	55.7	57.2	59.6	71.4	71.8	74.7	3.6	5.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3	3.8	3.8		80.9			58.5			31.8	27.2
博茨瓦纳	1.6	1.9	2.0			59.9			68.5	21.5	17.6	
巴西	168.1	186.0	194.9	62.1	66.6	67.9	72.1	74.0	73.9	6.0	9.3	8.3
保加利亚	8.4	7.7	7.5	67.0	69.0	68.9	68.7	62.1	66.5	15.7	10.1	10.2
布基纳法索	10.7	14.2	16.5	48.3	50.5		86.8	86.7		2.6	2.7	
布隆迪	6.1	7.3	8.4									
柬埔寨	11.2	13.4	14.1	56.3	62.1	63.4	77.0	84.6	84.8			1.7
喀麦隆	13.9	17.6	19.6	51.4	89.7		69.4	67.5		8.1	4.4	
加拿大	29.4	32.3	34.1	67.6	69.2	69.4	74.7	77.7	77.8	9.5	6.7	8.0
中非共和国	3.3	4.0	4.4		51.3			75.4				
乍得	7.0	9.8	11.2		49.0					0.7		
智利	14.4	16.3	17.1	63.8	67.1	68.7	59.1	59.3	64.8	4.7	8.0	8.1
中国	1 211.2	1 307.6	1 340.9	66.7	71.4	74.5		71.7	71.0	2.9	2.7	2.9
哥伦比亚	36.5	43.0	46.3	53.9	62.8	64.5	56.0	69.3	71.9	8.7	11.3	11.6
刚果民主共和国	44.1	57.4	66.0		50.1			70.9				
刚果共和国	2.7	3.5	4.0		57.3			66.0				
哥斯达黎加	3.5	4.3	4.7	60.5	65.9	68.5	61.7	65.5	65.3	5.2	6.6	7.8
科特迪瓦	14.7	18.0	19.7									
克罗地亚	4.7	4.4	4.4		66.9	67.2		63.3	61.5	10.0	11.8	12.6
古巴	10.9	11.3	11.3							8.3	1.9	1.6
捷克共和国	10.3	10.2	10.5	68.0	71.0	70.6		70.4	70.2	4.0	7.9	7.3
丹麦	5.2	5.4	5.5	67.4	66.2	65.6	72.3	79.8	79.4	7.0	4.8	7.5
多米尼加共和国	7.9	9.3	9.9	58.5	61.9	63.5	63.1	58.2	59.4	15.8	18.0	14.2
厄瓜多尔	11.4	13.4	14.5	58.0	61.1	62.5	72.1	73.4	66.8	6.9	7.7	6.5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62.1	74.2	81.1	56.2	63.2		48.5	59.8		11.3	11.2	8.7
萨尔瓦多	5.7	6.1	6.2	56.5	58.7	61.1	62.9	63.5	64.8	7.6	7.2	7.3
厄立特里亚	3.2	4.5	5.3									
爱沙尼亚	1.4	1.3	1.3	65.8	68.0	67.8		70.1	73.8	9.7	7.9	16.9
埃塞俄比亚	57.0	74.3	82.9	49.2	49.4		70.4	84.4		3.1	5.4	
斐济	0.8	0.8	0.9	61.2		65.7	48.9		54.6	5.4	4.6	
芬兰	5.1	5.2	5.4	66.8	66.7	66.4	72.1	74.7	74.5	15.3	8.4	8.4
法国	59.4	63.0	64.9	65.3	65.0	64.8	67.6	69.9	70.5	11.8	8.9	9.4
加蓬	1.1	1.4	1.5		58.5			58.4		17.8		
冈比亚	1.1	1.5	1.7									
格鲁吉亚	4.7	4.4	4.5		66.5	67.6			64.2		13.8	16.5
德国	81.6	82.5	81.7	68.3	66.9	65.9	70.5	73.8	76.6	8.1	11.1	7.1
加纳	17.0	1.6	24.4		55.3			75.6			3.6	
希腊	10.6	11.3	67.5	67.5	66.7	60.4	66.8	68.2	9.1	9.8	12.5	
危地马拉	10.0	12.7	14.4		53.8			68.0		3.1		
几内亚	7.6	9.0	10.0	49.4			83.6			3.1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1.1	1.4	1.5									
海地	7.9	9.3	10.0									
洪都拉斯	5.6	6.9	7.6	52.2	55.4	58.2	60.6	63.6	63.2	3.2	4.2	
匈牙利	10.3	10.1	10.0	67.6	68.7	68.6	58.9	61.3	62.4	10.2	7.2	11.2
印度	932.2	1 094.6	1 170.9	59.9	61.8	64.5	62.0	62.2	56.6	2.2	4.4	3.6
印度尼西亚	199.4	227.3	239.9	61.9	66. 0	65.4	63.8	64.8	61.6	4.4	11.2	7.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59.8	69.7	74.0		65.9			49.0		9.1	12.1	10.5
伊拉克	20.9	27.6	32.0	48.6	57.4		43.5	41.5			18.0	
爱尔兰	3.6	4.2	4.5	64.0	68.2	67.3	61.6	70.8	69.8	12.0	4.3	13.6
以色列	5.5	6.9	7.6	60.9	61.7	62.2	60.8	62.4	64.5	6.9	9.0	6.6
意大利	56.8	58.6	60.5	68.8	66.4	65.7	57.6	62.5	62.2	11.7	7.7	8.4
牙买加	2.5	2.7	2.7	60.1			86.3			16.2	10.9	11.4
日本	125.4	127.8	127.5	69.5	66.1	63.8	71.5	72.6	74.0	3.2	4.4	5.0
约旦	4.2	5.4	6.0		56.0			47.5		14.6	12.4	12.9
哈萨克斯坦	15.8	15.1	16.3	63.8	70.3		55.9	64.3		11.0	8.1	6.6
肯尼亚	27.4	35.6	40.5	51.4	53.8		58.7	60.6				
基里巴斯	0.1	0.1	0.1		58.4			66.5				
韩国	45.1	48.1	48.9	70.7	71.7	73.2	64.9	66.3	65.8	2.1	3.7	3.7
科索沃	2.0	1.8	1.8		62.5			46.5			41.4	
吉尔吉斯斯坦	4.6	5.1	5.4	57.9			57.4				8.1	8.2
老挝	4.8	5.8	6.2	52.0		59.5			87.7	2.6	1.4	

（续）

	人口/百万 总量			工作年龄人口/% 总量			参与率/% 总量			失业率/% 总量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拉脱维亚	2.5	2.3	2.2	65.7	68.7	68.9		69.6	73.2	20.2	8.9	18.7
黎巴嫩	3.5	4.1	4.2		64.7			47.9		8.5	7.9	
莱索托	1.8	2.1	2.2							39.3		25.3
利比里亚	2.1	3.2	4.0		55.6			73.1			5.6	3.7
利比亚	4.8	5.8	6.4									
立陶宛	3.6	3.4	3.3	65.9	67.8	68.9		68.4	70.5	17.1	8.3	17.8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2.0	2.0	2.1	66.6	69.1	70.6		62.2	64.2	36.0	37.3	32.0
马达加斯加	13.1	17.9	20.7	51.8	51.0		89.1				2.6	
马拉维	9.9	12.8	14.9	53.5	49.9			89.2			7.8	
马来西亚	20.7	26.1	28.4							3.1	3.5	3.7
马里	9.8	13.2	15.4	62.2	50.7		83.4	57.3		3.3	8.8	
毛里塔尼亚	2.3	3.0	3.5			52.2			83.1		33.0	
毛里求斯	1.1	1.2	1.3		68.8	69.9		63.6	62.2	5.8	9.6	7.7
墨西哥	92.3	106.5	113.4	59.3	63.5	65.9	61.5	61.9	63.7	6.9	3.5	5.2
马尔代夫	3.7	3.6	3.6		67.6			73.5			7.3	7.4
蒙古	2.3	2.5	2.8			68.4			68.1		3.3	
黑山共和国	0.6	0.6	0.6		68.7			56.9			30.3	
摩洛哥	26.9	30.4	32.0	55.9	61.7		52.2	54.3		22.9	11.0	10.0
莫桑比克	15.9	20.8	23.4	51.6	50.2	48.2	79.9	83.1	91.2	2.2		
缅甸	42.1	46.3	48.0									
纳米比亚	1.7	2.1	2.3	52.2			56.9			19.4	21.9	37.6
尼泊尔	21.6	27.3	30.0	55.0	55.7	57.4	62.3	81.3	75.7	4.5		2.7
荷兰	15.5	16.3	16.6	68.4	67.5	67.1	69.2	76.9	78.2	7.2	4.7	4.5
新西兰	3.7	4.1	4.4	65.4	66.4	66.5	74.5	77.3	77.5	6.5	3.8	6.5
尼加拉瓜	4.6	5.4	5.8	51.6	59.1		65.6	67.3		16.9	5.6	
尼日尔	9.2	13.0	15.5	47.6			59.2			5.1		
尼日利亚	110.0	139.8	158.4	53.3	63.3		62.7	63.7				
挪威	4.4	4.6	4.9	64.6	65.5	66.2		78.3	78.1	4.9	4.6	3.6
阿曼	2.2	2.4	2.8				76.8					
巴基斯坦	127.3	158.6	173.6		53.7	55.3		56.7	55.2	5.0	7.4	5.0
巴拿马	2.7	3.2	3.5	60.7	62.7	62.6	62.2	67.3	68.4	14.0	9.8	6.5
巴布亚新几内亚	4.7	6.1	6.9	55.7		56.2			70.5			
巴拉圭	4.8	5.9	6.5	53.1	58.9	61.6	79.7	73.5	72.0	3.4	5.8	5.6
秘鲁	23.8	27.6	29.1	59.3	61.3	61.0	74.3	74.4	78.0	7.1	11.4	6.3
菲律宾	69.3	85.5	93.3	58.3	60.7	62.4	64.1	62.1	63.7	8.4	7.7	7.5
波兰	38.6	38.2	38.2	65.9	70.1	71.3	67.4	64.4	65.6	13.3	17.7	9.6
葡萄牙	10.0	10.5	10.6	67.3	67.3	66.9	67.4	73.4	74.0	7.2	7.6	10.8
罗马尼亚	22.7	21.6	21.4	67.3	69.5	69.9	71.5	62.3	63.6	8.0	7.2	7.3
俄罗斯联邦	148.1	143.2	141.8		52.4					9.4	7.2	7.5
卢旺达	5.6	9.2	10.6	51.9	53.5		76.3	85.7		0.6		
沙特阿拉伯	18.5	24.0	27.4								6.3	5.4
塞内加尔	8.4	10.9	12.4	58.7	53.7		59.3	51.6		10.0		
塞尔维亚	7.7	7.4	7.3			64.5			59.1		20.8	16.6
塞拉利昂	3.9		5.2	5.9		52.6			67.1			3.4
新加坡	3.5	4.3	5.1							2.7	5.6	5.9
斯洛伐克共和国	5.4	5.4	5.4	66.3	71.3	72.4	69.3	68.9	68.7	13.1	16.2	14.4
斯洛文尼亚	2.0	2.0	2.1	69.4	70.3	69.4	66.3	70.7	71.5	7.2	6.5	7.2
索马里	6.5	8.4	9.3									
南非	39.1	47.2	50.0	62.3	62.6		57.6	68.2		16.9	23.8	24.7
西班牙	39.4	43.4	46.1	68.0	68.7	68.2	60.6	69.7	73.4	22.7	9.2	20.1
斯里兰卡	18.2	19.8	20.9	65.3	67.3	66.9	60.8	58.8	59.1	12.2	7.7	4.9
苏丹	30.1	38.4	43.6									
斯威士兰	1.0	1.1	1.2	57.1			61.8	21.7				
瑞典	8.8	9.0	9.4	63.7	65.2	65.3	77.7	78.7	79.5	9.1	7.7	8.4
瑞士	7.0	7.4	7.8	67.7	67.9	68.0	79.1	80.9	82.4	3.3	4.4	4.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4.2	18.5	20.4		57.5			51.1		7.2	8.2	8.4
塔吉克斯坦	5.8	6.5	6.9		57.0			54.4				
坦桑尼亚	29.9	38.8	44.8	48.8	51.3	50.5	77.4	91.4	78.4		4.3	
泰国	59.7	66.7	69.1	74.1	66.3	67.5	80.7	82.1	81.5	1.1	1.3	1.2
东帝汶	0.9	1.0	1.1		53.7	53.3		63.3	43.0			
多哥	4.1	5.4	6.0		55.1			82.8				
汤加	0.1	0.1	0.1	55.7			60.6			13.3	1.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3	1.3	1.3							17.2	8.0	4.6
突尼斯	9.0	10.0	10.5	61.0			51.4			15.9	14.2	14.2
土耳其	58.9	68.1	72.8	63.0	65.5	67.0	56.8	49.8	51.9	7.6	10.6	11.9
土库曼斯坦	4.2	4.7	5.0									
乌干达	20.8	28.4	33.4		51.4			85.7			2.0	4.2
乌克兰	51.5	47.1	45.9		67.8			68.3		5.6	7.2	8.8
英国	58.0	60.2	62.2	64.7	66.0	66.1	74.7	75.4	75.5	8.6	4.7	7.8
美国	266.3	295.8	309.1	65.4	67.0	66.8	76.9	75.4	73.9	5.6	5.1	9.6
乌拉圭	3.2	3.3	3.4	62.4	61.6	62.9	71.7	72.7	75.0	10.2	12.2	7.6
乌兹别克斯坦	22.8	26.2	28.2									
委内瑞拉	22.0	26.6	28.8	59.8	63.6		64.0	69.2		10.2	11.4	7.6
越南	72.0	82.4	86.9	61.9	68.3	69.0	84.4	80.5	79.6	1.9	2.1	2.4
西岸和加沙地带	2.54	3.6	4.2	51.9		55.6	5.1	42.6	43.0			
也门共和国	15.1	20.6	24.1		52.1					8.3	16.1	14.6
赞比亚	8.9	11.5	12.9		62.3			64.2		15.3	15.9	
津巴布韦	11.7	12.6	12.6							5.0	4.2	

（续）

	人口/百万			工作年龄人口/%			参与率/%			失业率/%		
		男性			男性			男性			男性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阿富汗	11.6	15.5	17.8		47.9			85.2			7.6	
阿尔巴尼亚	1.6	1.6	1.6	61.0	69.4		73.5	65.8			14.4	12.2
阿尔及利亚	14.3	16.6	17.9							26.0	14.9	10.0
安哥拉	6.0	8.2	9.4									
阿根廷	17.1	18.9	19.8	61.8	64.2	65.4	80.4	81.7	81.0	16.5	9.2	7.8
亚美尼亚	1.5	1.4	1.4		65.6			64.6		38.0	21.9	
澳大利亚	9.0	10.1	11.1	67.4	67.9	68.1	83.9	82.6	82.9	8.8	4.9	5.1
奥地利	3.8	4.0	4.1	69.9	70.0	69.4	80.8	79.3	80.9	3.1	4.9	4.6
阿塞拜疆	3.8	4.1	4.5	62.1			57.9				8.0	5.2
孟加拉国	60.3	71.9	75.3		58.5	59.1			89.0	2.7	3.4	4.2
巴巴多斯岛	0.1	0.1	0.1	85.6			79.7			16.6	7.3	6.8
白俄罗斯	4.8	4.6	4.4		72.3			72.0				
比利时	5.0	5.1	5.3	68.2	67.4	67.6	72.3	73.9	73.4	7.3	7.6	8.1
伯利兹	0.1	0.1	0.2	51.9			81.9				2.9	2.6
贝宁	2.7	3.7	4.4		47.9			77.4				
不丹	0.3	0.3	0.4		60.3			76.1		10	7.5	
玻利维亚	3.7	4.6	5.0	54.4	55.8	58.9	83.1	82.1	84.5	3.3	4.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6	1.8	1.8		84.5			73.7			29.5	25.6
博茨瓦纳	0.8	0.9	1.0			59.0			74.7	19.4	15.3	
巴西	80.2	91.7	95.9	61.5	66.3	67.5	87.7	85.6	85.1	5.1	7.1	6.1
保加利亚	4.1	3.8	3.6	67.8	70.7	70.9	71.7	67.0	70.8	15.5	10.3	10.9
布基纳法索	5.2	7.0	8.2	45.8	47.9			92.2	91.7			2.9
布隆迪	3.0	3.5	4.1									
柬埔寨	5.4	6.5	6.9	54.0	60.7	62.1	80.7	90.8	89.1			1.5
喀麦隆	6.9	8.8	9.8	49.4	90.5		76.8	70.0		9.5	4.2	
加拿大	14.5	16.0	16.9	68.7	70.3	70.3	81.5	82.5	81.5	9.8	7.0	8.7
中非共和国	1.6	2.0	2.2		49.5			76.6				
乍得	3.5	4.9	5.6		46.9					1.1		
智利	7.1	8.1	8.5	64.0	67.6	69.2	80.7	76.7	77.8	4.4	7.0	7.2
中国	618.1	673.8	687.5		70.5	74.1		78.6	78.2		2.4	2.6
哥伦比亚	18.0	21.2	22.8	52.4	61.9	63.6	80.7	84.1	84.8	6.8	8.7	9.1
刚果民主共和国	21.8	28.5	32.8		48.9			72.2				
刚果共和国	1.4	1.8	2.0		55.7			68.0				
哥斯达黎加	1.8	2.2	2.4	59.3	65.4	67.6	86.4	84.0	82.1	4.6	5.0	6.6
科特迪瓦	7.6	9.2	10.1									
克罗地亚	2.3	2.1	2.1		69.2	69.5		70.0	67.2	9.5	11.6	11.4
古巴	5.5	5.7	5.7							5.4	1.8	1.4
捷克共和国	5.0	5.0	5.2	69.9	73.1	72.7	80.6	78.4	78.6	3.4	6.5	6.4
丹麦	2.6	2.7	2.7	69.3	67.5	66.7	85.6	83.6	82.6	5.6	4.4	8.4
多米尼加共和国	4.0	4.7	5.0	57.4	61.9	63.1	85.1	75.6	75.3	10.2	11.1	8.5
厄瓜多尔	5.7	6.7	7.2	56.9	60.4	61.8	89.3	86.6	81.8	5.5	5.6	5.2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31.2	37.3	40.7	56.7	62.8		80.7	78.6		7.6	7.1	5.9
萨尔瓦多	2.8	2.9	2.9	54.2	56.3	59.1	84.5	81.9	82.6	8.7	8.9	9.0
厄立特里亚	1.6	2.2	2.6									
爱沙尼亚	0.7	0.6	0.6	67.9	70.9	70.9	79.9	73.6	76.8	10.5	8.8	19.5
埃塞俄比亚	28.3	36.9	41.3	47.8	47.3		90.4	91.6		3.0	2.7	
斐济	0.4	0.4	0.4	60.8			65.3	72.1		75.1	4.8	4.1
芬兰	2.5	2.6	2.6	69.3	68.9	68.4	74.8	76.6	76.4	15.4	8.1	9.0
法国	28.9	30.6	31.6	66.9	66.5	66.2	74.9	75.2	74.9	10.0	8.0	9.0
加蓬	0.5	0.7	0.8		59.1			66.2		19.1		
冈比亚	0.6	0.7	0.9									
格鲁吉亚	2.2	2.1	2.1		66.0	68.4			71.9		14.8	16.8
德国	39.7	40.3	40.0	71.6	69.3	67.9	79.6	80.6	82.3	7.2	11.3	7.5
加纳	8.6	11.0	12.4		53.9			76.4			3.5	
希腊	5.2	5.5	5.6	68.3	68.7	68.2	77.2	79.2	78.9	6.2	6.1	9.9
危地马拉	5.0	6.2	7.0		51.2			90.9			2.8	
几内亚	3.8	4.6	5.0	45.8			85.7			4.6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0.6	0.7	0.8									
海地	3.9	4.6	5.0									
洪都拉斯	2.8	3.4	3.8	50.6	53.6	56.4	87.6	85.9	85.8	3.2	3.2	
匈牙利	4.9	4.8	4.8	69.3	71.1	71.3	67.9	67.9	68.3	11.3	7.0	11.6
印度	484.0	566.6	604.8	59.3	61.1	63.7	85.7	85.1	82.1	2.4	4.1	3.3
印度尼西亚	99.7	113.5	119.6	60.9	65.6	64.7	89.1	84.4	83.0	3.8	9.5	7.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0.1	35.5	37.5		64.6			79.3		8.5	10.5	9.1
伊拉克	10.4	13.8	16.1	48.6	56.1		78.0	72.4			19.2	
爱尔兰	1.8	2.1	2.2	64.7	68.9	67.7	76.1	80.6	77.4	11.9	4.6	16.8
以色列	2.7	3.4	3.8	61.1	62.0	62.4	69.0	66.8	68.2	5.6	8.5	6.8
意大利	27.5	28.5	29.6	70.5	68.4	67.6	73.2	74.6	73.3	9.1	6.2	7.6
牙买加	1.2	1.3	1.3	61.4			87.7			10.8	7.4	8.5
日本	61.5	62.4	62.1	71.2	68.0	65.9	84.5	84.4	84.8	3.1	4.6	5.4
约旦	2.2	2.8	3.1		55.8			71.8		12.1	11.8	10.3
哈萨克斯坦	7.6	7.2	7.8	63.2	70.3		62.7	71.6			6.7	5.6
肯尼亚	13.7	17.8	20.2	50.1	53.0		68.3	68.7				
基里巴斯					58.2			70.4				
韩国	22.6	24.0	24.4	71.3	72.7	74.7	78.7	78.2	77.1	2.3	4.0	4.0
科索沃					61.9			63.9			32.9	
吉尔吉斯斯坦	2.3	2.5	2.6	57.9			69.4				7.4	7.3
老挝	2.4	2.9	3.1	50.8		58.3			90.3	2.6	1.3	

（续）

	人口/百万 男性			工作年龄人口/% 男性			参与率/% 男性			失业率/% 男性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拉脱维亚	1.2	1.1	1.0	68.0	71.9	72.5		74.4	75.8	20.6	9.1	21.7
黎巴嫩	1.7	2.0	2.1		63.3			74.5			7.3	
莱索托	0.9	1.0	1.1							30.7		23.0
利比里亚	1.0	1.6	2.0		54.2			77.1			6.8	3.4
利比亚	2.5	2.9	3.2									
立陶宛	1.7	1.6	1.5	67.5	70.1	71.8		72.1	72.4	15.3	8.2	21.2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1.0	1.0	1.0	66.7	69.7	71.4		75.0	77.7			
马达加斯加	6.6	8.9	10.3	51.1	49.5		91.6				1.7	
马拉维	4.9	6.4	7.5	53.3	49.7			91.3			5.4	
马来西亚	10.5	13.3	14.4							2.8	3.4	3.6
马里	4.9	6.6	7.7	60.3	48.1		88.0	68.0		3.3	7.2	
毛里塔尼亚	1.1	1.5	1.7			48.3			89.5			
毛里求斯	0.6	0.6	0.6		69.3	70.2		81.9	79.3	4.6	5.8	4.6
墨西哥	45.7	52.6	55.9	58.8	62.9	65.4	85.7	83.1	83.0	6.0	3.4	5.2
马尔代夫	1.8	1.7	1.7		67.8			79.0			8.7	9.1
蒙古	1.1	1.3	1.4			67.2			73.0		3.0	
黑山共和国	0.3	0.3	0.3		69.2			64.2			26.2	
摩洛哥	13.4	15.0	15.7	54.6	60.9		84.7	83.7		18.7	10.8	9.8
莫桑比克	7.6	10.0	11.4	49.8	48.0	46.4	79.6	82.3	90.6	3.4		
缅甸	20.9	22.9	23.6									
纳米比亚	0.8	1.0	1.1	50.7			64.6			17.9	19.4	32.5
尼泊尔	10.8	13.5	14.9	54.4	52.6	53.7	64.2	88.1	81.0			3.1
荷兰	7.6	8.1	8.2	70.3	69.0	68.3	79.9	83.7	83.7	6.1	4.4	4.4
新西兰	1.8	2.0	2.1	65.9	66.6	66.5	83.7	84.4	83.6	6.4	3.5	6.2
尼加拉瓜	2.3	2.7	2.9	50.3	58.3		87.3	88.1	75.0	15.9	5.4	
尼日尔	4.6	6.5	7.8	47.3			65.7			3.6		
尼日利亚	55.4	70.7	80.2	50.2	60.9		82.0	74.2				
挪威	2.2	2.3	2.4	66.4	67.1	67.7	81.2	81.6	80.6	5.1	4.8	4.1
阿曼	1.3	1.3	1.6									
巴基斯坦	65.5	81.0	88.2		52.7	54.0		85.1	83.2	3.7	6.2	4.0
巴拿马	1.4	1.6	1.8	60.5	61.5	61.9	83.1	84.2	85.3	10.8	7.6	5.3
巴布亚新几内亚	2.4	3.1	3.5	54.2		55.2			70.0			
巴拉圭	2.4	3.0	3.3	52.7	59.1	61.7	93.7	87.7	86.5	3.1	4.8	4.4
秘鲁	12.0	13.8	14.6	58.4	61.1	60.6	86.0	84.3	86.2	6.0	9.6	4.4
菲律宾	35.0	43.0	46.8	57.9	60.6	62.3	80.5	77.6	76.6	7.7	7.7	7.5
波兰	18.8	18.5	18.4	67.2	72.0	73.3	73.9	70.8	72.4	12.1	16.6	9.3
葡萄牙	4.8	5.1	5.2	68.3	68.7	68.5	76.4	79.0	78.2	6.4	6.7	9.8
罗马尼亚	11.1	10.5	10.4	68.3	71.0	71.6	77.7	69.4	71.5	7.5	7.8	7.9
俄罗斯联邦	69.4	66.4	65.6		47.9					9.7	7.3	8.0
卢旺达	2.7	4.5	5.2	49.8	51.8		75.4	83.7		0.9		
沙特阿拉伯	10.3	13.5	15.2								4.7	3.5
塞内加尔	4.2	5.4	6.2	58.2	50.9		77.8	71.5			7.9	
塞尔维亚	3.8	3.7	3.6			65.9			67.4		16.8	15.3
塞拉利昂	1.9	2.5	2.9		50.0			66.8			4.5	
新加坡	1.8	2.1	2.6							2.6	5.6	5.4
斯洛伐克共和国	2.6	2.6	2.6	67.3	73.0	74.4	77.3	76.5	76.1	12.6	15.4	14.2
斯洛文尼亚	1.0	1.0	1.0	71.7	73.0	72.3	71.1	75.1	75.4	7.4	6.1	7.4
索马里	3.2	4.1	4.6									
南非	19.3	23.3	24.8	61.3	61.4		68.0	72.3		14.4	20.0	22.6
西班牙	19.3	21.4	22.8	69.4	70.4	69.9	75.5	80.9	80.7	17.8	7.0	19.7
斯里兰卡	9.2	9.8	10.3	64.3	66.5	65.5	82.1	80.2	80.9	9.0	5.6	3.5
苏丹	15.2	19.3	21.9									
斯威士兰	0.5	0.5	0.6	57.0			71.3			20.4		
瑞典	4.4	4.5	4.7	65.4	66.8	66.7	79.6	80.9	82.3	9.8	7.8	8.5
瑞士	3.4	3.6	3.8	69.5	69.5	69.5	90.0	87.4	88.3	2.9	3.9	4.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7.1	9.4	10.3		56.6			81.3		5.5	5.3	5.7
塔吉克斯坦	2.9	3.2	3.4		56.0			63.5				
坦桑尼亚	14.8	19.4	22.4	46.5	50.1	50.3	83.6	92.0	80.7		2.8	
泰国	29.7	32.8	34.0	73.5	65.4	66.8	89.8	88.4	88.0	1.0	1.5	1.2
东帝汶	0.4	0.5	0.6		53.5	53.3		77.5	57.9			
多哥	2.0	2.7	3.0		53.6			82.2				
汤加	0.0	0.1	0.1	54.7			77.6				3.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6	0.6	0.7							15.2	5.8	3.5
突尼斯	4.5	5.0	5.3	60.4			77.2			15.5	13.1	
土耳其	29.4	34.0	36.3	63.1	65.9	67.4	81.1	73.0	74.5	7.8	10.4	11.4
土库曼斯坦	2.1	2.3	2.5									
乌干达	10.3	14.2	16.7		52.9			87.9			1.8	3.1
乌克兰	23.9	21.7	21.1		69.7			75.8		6.3	7.5	6.6
英国	28.2	29.5	30.6	66.3	67.1	67.1	83.3	82.0	81.7	10.0	5.0	8.6
美国	130.2	145.6	152.5	66.5	68.0	67.8	84.3	81.8	79.6	5.6	5.1	10.5
乌拉圭	1.6	1.6	1.6	62.7	62.3	63.2	86.4	82.9	84.5	8.0	9.5	5.4
乌兹别克斯坦	11.3	13.0	14.0									
委内瑞拉	11.1											
越南	35.3	40.6	43.0	60.4	68.6	69.6	85.9	82.3	81.9	2.2	1.9	
西岸和加沙地带	1.3	1.8	2.1	52.1		56.6	79.0	70.0	65.9			
也门共和国	7.6	10.4	12.1		50.5					9.3	11.9	11.5
赞比亚	4.4	5.7	6.5		61.3			62.5		14.9		
津巴布韦	5.8	6.2	6.2							6.8	4.2	

（续）

	人口/百万			工作年龄人口/%			参与率/%			失业率/%		
		女性			女性			女性			女性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阿富汗	10.8	14.4	16.6		49.6			45.1			9.5	
阿尔巴尼亚	1.6	1.6	1.6	62.4	68.7		62.3	49.2			12.2	15.9
阿尔及利亚	14.0	16.3	17.6							38.4	17.5	20.0
安哥拉	6.1	8.3	9.6									
阿根廷	17.7	19.7	20.7	61.0	62.8	63.8	47.7	57.2	55.5	22.3	12.4	9.8
亚美尼亚	1.7	1.6	1.7		67.6			45.0		34.4	35.0	
澳大利亚	9.1	10.3	11.2	65.7	66.8	67.1	64.2	68.2	70.0	8.1	5.2	5.4
奥地利	4.1	4.2	4.3	64.5	66.0	65.8	62.3	65.6	69.3	4.3	5.5	4.2
阿塞拜疆	3.9	4.3	4.6	64.2			39.3				8.3	6.9
孟加拉国	57.2	68.7	73.4		59.5	61.8			31.0	2.2	7.0	7.4
巴巴多斯岛	0.1	0.1	0.1	82.4			67.3			22.7	10.9	9.4
白俄罗斯	5.4	5.2	5.1		68.1			68.9				
比利时	5.2	5.4	5.5	64.3	63.8	64.3	51.7	59.5	61.8	12.2	9.5	8.5
伯利兹	0.1	0.1	0.2	53.6			34.8				3.3	5.3
贝宁	2.9	3.9	4.5		53.1			79.8				
不丹	0.3	0.3	0.3		62.9			62.1		17.9	17.2	
玻利维亚	3.8	4.6	5.0	57.0	58.5	60.3	60.5	62.4	65.8	4.0	6.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7	2.0	2.0		77.5			43.3			35.7	30.0
博茨瓦纳	0.8	0.9	1.0			60.7			63.0	23.9	19.9	
巴西	81.7	94.3	99.0	62.6	67.0	68.4	57.4	63.1	63.5	7.2	12.2	11.0
保加利亚	4.3	4.0	3.9	66.3	67.5	67.1	65.8	57.3	62.3	15.8	9.8	9.5
布基纳法索	5.4	7.2	8.3	50.7	53.0		82.0	82.4			1.7	
布隆迪	3.1	3.7	4.3									
柬埔寨	5.8	6.8	7.2	58.4	63.3	64.6	74.0	79.2	80.8			1.8
喀麦隆	7.0	8.8	9.8	53.3	89.0		62.7	65.0		6.5	4.6	
加拿大	14.8	16.3	17.2	66.6	68.2	68.5	67.8	72.9	74.2	9.1	6.5	7.2
中非共和国	1.7	2.0	2.2		53.1			74.5				
乍得	3.5	4.9	5.6		51.0					0.3		
智利	7.3	8.2	8.7	63.6	66.7	68.1	37.4	42.3	51.8	5.3	9.8	9.6
中国	593.1	633.8	653.4		72.3	74.9		64.8	63.7		3.1	3.2
哥伦比亚	18.4	21.8	23.5	55.3	63.8	65.3	33.2	55.4	59.8	11.3	14.9	15.0
刚果民主共和国	22.2	28.9	33.2		51.3			69.6				
刚果共和国	1.4	1.8	2.0		58.8			64.2				
哥斯达黎加	1.7	2.1	2.3	61.7	66.4	69.3	37.7	47.5	49.2	6.6	9.6	9.9
科特迪瓦	7.1	8.8	9.7									
克罗地亚	2.4	2.3	2.3		64.8	65.0		56.7	55.9	10.5	13.8	12.2
古巴	5.4	5.6	5.6							13.0	2.2	2.0
捷克共和国	5.3	5.2	5.4	66.3	69.1	68.5		62.4	61.5	4.8	9.8	8.5
丹麦	2.6	2.7	2.8	65.6	64.8	64.5	64.1	75.9	76.0	8.6	5.3	6.5
多米尼加共和国	3.9	4.6	4.9	59.6	61.9	63.9	73.3	40.7	44.0	26.2	28.8	22.8
厄瓜多尔	5.7	6.7	7.2	59.6	61.8	63.1	55.3	60.4	52.5	8.8	10.8	8.4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30.9	36.9	40.4	55.7	63.6		15.3	40.7		24.1	25.1	19.2
萨尔瓦多	3.0	3.2	3.3	58.6	60.9	62.9	44.5	48.2	49.7	5.9	4.8	4.9
厄立特里亚	1.6	2.3	2.7									
爱沙尼亚	0.8	0.7	0.7	64.0	65.6	65.1		66.9	71.0	8.9	7.1	14.3
埃塞俄比亚	28.7	37.3	41.7	50.5	51.5		66.5	78.0		3.3	8.2	
斐济	0.4	0.4	0.4	61.5		66.0	25.3		33.9	7.8	5.9	
芬兰	2.6	2.7	2.7	64.4	64.6	64.4	69.4	72.8	72.5	15.1	8.7	7.7
法国	30.5	32.4	33.3	63.8	63.6	63.5	60.6	64.7	66.1	14.1	9.8	9.7
加蓬	0.5	0.7	0.8		57.9			50.7		16.1		
冈比亚	0.6	0.8	0.9									
格鲁吉亚	2.5	2.3	2.4		67.1	67.0			57.2		12.7	16.1
德国	41.9	42.1	41.7	65.2	64.6	63.9	61.3	66.9	70.8	9.4	10.9	6.6
加纳	8.4	10.6	12.0		56.6			74.9			3.6	
希腊	5.4	5.6	5.7	66.7	66.2	65.2	44.3	54.5	57.6	13.8	15.3	16.2
危地马拉	5.0	6.5	7.4		56.3			49.0			3.7	
几内亚	3.7	4.5	4.9	52.8			81.8			1.7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0.6	0.7	0.8									
海地	4.0	4.7	5.0									
洪都拉斯	2.8	3.4	3.8	53.8	57.2	59.9	35.9	44.0	43.6	3.4	6.2	
匈牙利	5.4	5.3	5.3	66.1	66.6	66.3	50.3	55.1	56.7	8.7	7.5	10.7
印度	448.1	528.0	566.1	60.5	62.4	65.5	37.2	38.7	30.1	1.7	5.1	4.5
印度尼西亚	99.7	113.8	120.2	62.8	66.4	66.1	39.6	45.4	40.9	5.5	14.2	8.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9.7	34.2	36.4		67.3			19.5		13.4	18.2	16.8
伊拉克	10.5	13.8	16.0	48.5	58.6		9.3	12.8			14.2	
爱尔兰	1.8	2.1	2.2	63.3	67.5	67.0	47.1	60.8	62.2	12.1	4.0	9.6
以色列	2.8	3.5	3.9	60.7	61.5	61.9	52.7	58.1	60.9	8.6	9.5	6.5
意大利	29.3	30.2	30.9	67.1	64.5	64.0	42.4	50.4	51.1	16.1	10.1	9.7
牙买加	1.3	1.3	1.4	58.8			84.8			22.5	15.3	14.8
日本	64.0	65.4	65.4	67.9	64.2	61.8	58.4	60.8	63.2	3.3	4.2	4.5
约旦	2.0	2.6	2.9		56.1			21.6		29.9	16.5	24.1
哈萨克斯坦	8.2	7.9	8.5	64.8	70.3		49.7	58.0			9.6	7.5
肯尼亚	13.8	17.8	20.3	52.7	54.5		49.9	53.0				
基里巴斯					58.6			62.7				3.3
韩国	22.5	24.1	24.5	70.2	70.7	71.8	51.4	54.5	54.5	1.7	3.4	
科索沃					63.0			28.3			60.5	9.4
吉尔吉斯斯坦	2.3	2.6	2.7	58.1			46.0				9.1	
老挝	2.4	2.9	3.1	53.3		60.6			85.3	2.6	1.4	15.7

（续）

	人口/百万			工作年龄人口/%			参与率/%			失业率/%		
		女性			女性			女性			女性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拉脱维亚	1.4	1.2	1.2	63.7	65.9	65.8		65.1	70.7	19.8	8.7	
黎巴嫩	1.8	2.1	2.2		66.1			22.9			9.5	
莱索托	0.9	1.1	1.1							47.1		28.0
利比里亚	1.1	1.6	2.0		56.9			69.4			4.2	4.1
利比亚	2.3	2.8	3.1									
立陶宛	1.9	1.8	1.8	64.5	65.8	66.5		64.9	68.8	15.9	8.3	14.4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1.0	1.0	1.0	66.4	68.5	69.9		49.2	50.4	40.8	38.4	32.2
马达加斯加	6.6	9.0	10.4	52.5	52.5		86.6				3.5	
马拉维	5.0	6.4	7.4	53.6	50.0			87.3			10.0	
马来西亚	10.2	12.8	14.0							3.8	3.7	3.8
马里	5.0	6.6	7.7	64.1	53.1		79.2	47.8		3.3	10.9	
毛里塔尼亚	1.1	1.5	1.7			55.7			72.7			
毛里求斯	0.6	0.6	0.6		68.3	69.7		45.3	45.2	8.2	16.5	12.8
墨西哥	46.6	53.9	57.5	59.7	64.1	66.5	39.5	43.2	46.3	8.6	3.6	5.2
马尔代夫	1.9	1.9	1.9		67.4			69.0			6.0	5.7
蒙古	1.2	1.3	1.4			69.4			63.5		3.6	
黑山共和国	0.3	0.3	0.3		68.3			50.0			35.5	
摩洛哥	3.5	15.4	16.3	57.1	62.5		21.4	26.4		32.2	11.5	10.5
莫桑比克	8.3	10.7	12.0	53.3	52.3	49.9	80.0	83.7	91.8	1.3		
缅甸	21.2	23.4	24.3									
纳米比亚	0.8	1.1	1.1	53.5			50.4			21.1	25.0	43.0
尼泊尔	10.8	13.7	15.1	55.6	58.5	60.5	60.3	75.6	70.9			2.4
荷兰	7.8	8.2	8.4	66.6	66.1	65.9	58.3	70.0	72.6	8.7	5.1	4.5
新西兰	1.9	2.1	2.2	64.9	66.3	66.4	65.6	70.6	71.8	6.5	4.1	6.8
尼加拉瓜	2.3	2.7	2.9	52.9	59.8		45.2	47.8	31.1	19.3	6.0	
尼日尔	4.6	6.5	7.7	47.9			52.6			8.1		
尼日利亚	54.6	69.1	78.2	56.5	65.8		44.9	53.1	75.5			
挪威	2.2	2.3	2.4	62.8	64.0	64.8	72.3	74.9	75.5	4.6	4.4	3.0
阿曼	0.9	1.1	1.1									
巴基斯坦	61.9	77.7	85.4		54.8	56.6		28.2	26.8	14.0	13.0	8.7
巴拿马	1.3	1.6	1.7	61.0	63.8	63.3	41.5	50.9	52.1	20.1	13.3	8.5
巴布亚新几内亚	2.3	3.0	3.4	57.4					71.1			
巴拉圭	2.4	2.9	3.2	53.6	58.6	61.5	66.0	59.2	57.2	3.7	7.2	7.5
秘鲁	11.9	13.7	14.5	60.2	61.5	61.4	63.4	64.9	70.2	8.7	13.7	8.8
菲律宾	34.3	42.5	46.5	58.8	60.7	62.4	47.9	46.4	50.6	9.4	7.8	7.4
波兰	19.8	19.7	19.8	64.7	68.4	69.4	55.3	58.1	59.0	14.7	19.1	10.0
葡萄牙	5.2	5.4	5.5	66.5	66.1	65.5	59.1	67.9	69.9	8.2	8.7	11.9
罗马尼亚	11.6	11.1	11.0	66.4	68.1	68.3	65.4	67.9	55.0	8.6	6.4	6.5
俄罗斯联邦	78.8	76.7	76.2		56.0			56.3		9.2	7.0	6.9
卢旺达	2.9	4.7	5.4	53.7	54.9		77.0	87.4		0.4		
沙特阿拉伯	8.2	10.6	12.3								14.7	15.9
塞内加尔	4.2	5.5	6.3	59.3	56.3		43.2	35.0			13.6	
塞尔维亚	3.9	3.8	3.7			63.1			50.9		26.2	18.4
塞拉利昂	2.0	2.6	3.0		55.0			67.3			2.3	
新加坡	1.8	2.1	2.5							2.8	6.2	6.5
斯洛伐克共和国	2.8	2.8	2.8	65.3	69.7	70.5	61.4	61.5	61.3	13.8	17.2	14.6
斯洛文尼亚	1.0	1.0	1.0	67.3	67.7	66.7	61.5	66.1	67.4	6.8	7.0	7.0
索马里	3.3	4.2	4.7									
南非	19.8	23.9	25.2	63.2	63.7		48.5	64.4		20.0	28.2	27.3
西班牙	20.1	22.0	23.3	66.6	67.0	66.6	45.8	58.3	65.9	30.8	12.2	20.5
斯里兰卡	9.1	10.0	10.6	66.3	67.9	68.2	40.4	39.3	39.7	18.7	11.9	7.7
苏丹	15.0	19.1	21.6									
斯威士兰	0.5	0.6	0.6	57.2			52.8			23.2		
瑞典	4.5	4.6	4.7	61.9	63.6	64.0	75.9	76.3	76.7	8.2	7.6	8.2
瑞士	3.6	3.8	4.0	65.9	66.3	66.6	68.3	74.3	76.4	3.8	5.1	5.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7.0	9.1	10.1		58.4			20.5		14.2	23.8	22.5
塔吉克斯坦	2.9	3.3	3.5		58.0			45.6				
坦桑尼亚	15.1	19.5	22.4	51.1	52.5	50.7	72.0	90.9	76.2		5.8	
泰国	30.0	33.9	35.1	74.8	67.1	68.1	72.2	76.4	75.7	1.1	1.2	1.1
东帝汶	0.4	0.5	0.6		53.9	53.4		48.7	27.9			
多哥	2.1	2.7	3.0		56.6			83.4				
汤加	0.0	0.1	0.1	56.7			43.7				7.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6	0.7	0.7							20.6	11.0	6.2
突尼斯	4.5	5.0	5.3	61.5			25.5			17.3	17.3	
土耳其	29.5	34.1	36.5	62.8	65.2	66.7	32.7	25.2	29.6	7.3	11.2	13.0
土库曼斯坦	2.1	2.4	2.6									
乌干达	10.5	14.3	16.7		50.1			83.5			2.2	5.1
乌克兰	27.6	25.4	24.8		66.3			61.5		4.9	6.8	6.1
英国	29.8	30.7	31.6	63.2	64.8	65.0	66.0	68.8	69.4	6.8	4.2	6.7
美国	136.1	150.1	156.6	64.4	66.2	66.3	69.7	69.7	68.4	5.6	5.1	8.6
乌拉圭	1.7	1.7	1.7	62.1	61.1	62.7	58.5	63.6	66.4	13.2	15.3	10.1
乌兹别克斯坦	11.5	13.2	14.2									
委内瑞拉	10.9	13.2	14.4	59.9	63.6		43.6	54.7	12.8	13.0	8.1	
越南	36.7	41.8	44.0	63.3	67.9	68.5	83.1	78.8	77.3	1.7	2.4	
西岸和加沙地带	1.2	1.8	2.0	51.6		54.5	9.9	14.2	18.2			
也门共和国	7.5	10.3	11.9		53.7				3.9	46.3	40.9	
赞比亚	4.5	5.7	6.4		63.2			65.9		15.9		
津巴布韦	5.9	6.3	6.4							3.0	4.1	

（续）

	15～24 岁人口参与率/% 男性			15～24 岁人口参与率/% 女性			25～64 岁人口参与率/% 男性			25～64 岁人口参与率/% 女性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阿富汗	22.5	29.9	34.4		48.7			65.2			8.5	
阿尔巴尼亚	3.1	3.1	3.2	61.7	69.1		68.1	57.8			13.5	13.8
阿尔及利亚	28.3	32.9	35.5							27.9	15.3	11.4
安哥拉	12.1	16.5	19.1									
阿根廷	38.6	34.8	40.5	61.0	64.7	65.6	63.5	69.0	67.8	18.8	10.6	8.6
亚美尼亚	3.2	3.1	3.1		66.6			54.3		36.4	28.4	28.6
澳大利亚	18.1	20.4	22.3	66.6	67.3	67.6	74.1	75.4	76.5	8.5	5.0	5.2
奥地利	8.0	8.2	8.4	67.1	67.9	67.5	71.5	72.4	75.1	3.7	5.2	4.4
阿塞拜疆	7.7	8.4	9.0	63.2			48.0				8.1	6.0
孟加拉国	117.5	140.6	148.7		59.0	60.5			60.0	2.5	4.3	5.0
巴巴多斯岛	0.3	0.3	0.3	83.9			73.2			19.7	9.1	8.1
白俄罗斯	10.2	9.8	9.5		70.0			70.3				
比利时	10.1	10.5	10.9	66.2	65.6	65.9	62.1	66.7	67.7	9.3	8.4	8.3
伯利兹	0.2	0.3	0.3	52.8			58.1				3.1	4.0
贝宁	5.7	7.6	8.8		50.4			78.6				
不丹	0.5	0.7	0.7		61.7			68.8		12.5	11.0	8.2
玻利维亚	7.5	9.1	9.9	55.7	57.2	59.6	71.4	71.8	74.7	3.6	5.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3	3.8	3.8		80.9			58.5			31.8	27.2
博茨瓦纳			45.2			37.4			88.6			74.0
巴西	78.5	74.7	71.3	51.8	55.9	54.0	91.9	90.2	90.1	59.7	65.9	66.6
保加利亚	40.9	31.1	33.5	38.4	24.5	24.2	80.4	76.1	79.5	72.8	65.2	70.6
布基纳法索	86.1	83.0		77.6	77.5		96.0	97.1		84.3	85.3	
布隆迪												
柬埔寨	58.7	81.1	78.4	68.3	75.7	75.0	92.3	96.4	95.5	76.6	81.0	83.7
喀麦隆	51.7	71.8		43.8	63.2		92.6	69.9		73.7	65.1	
加拿大	64.9	66.0	64.4	61.3	65.7	64.6	85.8	86.6	85.6	69.4	74.6	76.5
中非共和国		72.1			73.7			79.2			75.0	
乍得												
智利	49.1	38.2	43.8	26.3	24.4	30.4	91.9	90.9	90.5	41.3	48.1	58.6
中国		60.4	59.6		58.7	55.1		90.5	90.8		74.5	74.1
哥伦比亚		62.5	61.9		42.8	43.4		93.4	94.2		60.5	65.9
刚果民主共和国		37.5			47.8			91.3			82.0	
刚果共和国		40.5			41.7			84.3			76.4	
哥斯达黎加	71.7	61.1	57.8	35.1	36.4	36.1	93.3	94.5	93.1	38.9	52.1	54.2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43.0	40.2		32.9	27.6		77.0	74.0		62.2	62.0
古巴												
捷克共和国	58.7	38.9	36.2	42.0	28.9	25.3	87.9	87.7	87.8	70.9	69.9	69.1
丹麦	77.0	70.0	67.6	69.4	66.2	67.4	87.7	86.3	86.1	74.3	77.9	78.0
多米尼加共和国	67.9	51.5	49.0	38.6	26.2	26.5	95.2	87.5	87.9	44.1	47.0	51.8
厄瓜多尔	78.1	66.7	55.4	45.1	45.6	33.8	95.1	96.4	94.5	60.9	66.8	59.9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51.1			25.9			95.0			48.7	
萨尔瓦多	69.8	63.0	62.8	31.9	31.6	31.6	94.0	92.2	93.2	51.5	55.6	57.8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58.3	39.7	42.3	39.7	29.5	34.3	86.1	84.2	86.3	73.1	77.0	79.9
埃塞俄比亚	81.3	81.7		48.0	72.3		96.4	97.2		53.6	81.3	
斐济	49.7		44.1	21.2		23.8	82.5		88.0	27.2		37.3
芬兰	51.1	50.9	49.4	48.1	50.4	49.3	79.9	82.2	82.4	73.8	77.9	77.7
法国	37.3	41.8	42.8	33.8	34.3	35.5	84.0	83.4	82.5	67.4	71.9	73.0
加蓬		26.4			22.2			86.8			68.4	
冈比亚												
格鲁吉亚			41.8			23.6			81.8			67.3
德国	54.6	52.4	53.7	50.3	46.7	48.9	84.4	86.7	88.2	63.3	71.2	75.2
加纳		43.6			44.3			94.8			89.6	
希腊	41.3	37.0	33.4	32.5	30.4	27.2	86.3	88.0	87.1	47.3	59.5	63.0
危地马拉		80.0			40.9			97.2			53.5	
几内亚	67.9			74.2			95.1			84.8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海地												
洪都拉斯	75.7	73.4	71.9	28.1	33.1	29.5	95.6	94.5	95.3	40.5	50.6	51.6
匈牙利	44.6	30.3	27.7	31.9	23.8	22.1	75.4	76.9	77.4	55.5	62.0	63.9
印度	66.0	63.3	52.1	29.1	27.6	19.1	94.9	94.8	95.1	40.7	43.4	34.4
印度尼西亚	65.7	59.5	47.5	35.1	37.9	26.9	98.9	93.9	94.6	41.5	48.1	45.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58.7			16.9			93.2			21.1	
伊拉克		51.4			4.7			83.1			16.7	
爱尔兰	48.3	56.6	43.1	41.4	49.9	41.5	86.5	87.7	85.0	49.1	63.9	66.8
以色列	35.1	30.4	28.9	34.6	34.4	33.7	83.4	80.3	81.6	59.8	66.3	69.7
意大利	43.9	38.7	33.2	33.6	28.7	23.4	80.6	81.4	80.8	44.6	54.3	56.0
牙买加	62.6			58.7			97.9			94.9		
日本	48.0	44.5	42.3	47.2	45.0	44.0	94.7	92.6	92.9	61.4	63.9	66.7
约旦												
哈萨克斯坦	33.1	32.4		26.5	25.1		74.7	89.6		57.8	70.0	
肯尼亚	42.6	40.6		35.3	29.2		83.3	88.7		58.6	69.0	
基里巴斯		60.0			55.6			75.5			65.8	
韩国	31.2	26.7	20.2	41.8	39.0	30.4	92.6	88.8	88.2	54.7	58.2	59.7
科索沃		46.8			31.8			72.8			26.7	
吉尔吉斯斯坦	52.1			32.3			78.1			53.2		
老挝			78.5			80.6			96.2			87.7

（续）

	15～24岁人口参与率/% 男性			15～24岁人口参与率/% 女性			25～64岁人口参与率/% 男性			25～64岁人口参与率/% 女性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拉脱维亚		43.8	43.0		31.3	37.7		84.0	85.2		74.3	79.0
黎巴嫩		43.7			17.8			88.4			24.9	
莱索托												
利比里亚		58.5			58.0			87.8			75.8	
利比亚												
立陶宛		29.5	32.8		20.5	26.3		85.4	84.5		77.0	80.1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42.0	42.2		29.3	24.0		85.0	87.9		55.0	57.7	
马达加斯加	83.1			80.2			96.9			90.4		
马拉维		80.3			78.7			97.9			93.0	
马来西亚	80.6	53.5		75.5	42.5		92.1	78.1		81.0	50.9	
马里			81.3			59.9			92.0			78.6
毛里塔尼亚		53.3	45.7		35.6	31.4		90.7	89.8		48.2	49.2
毛里求斯		53.3	45.7		35.6	31.4		90.7	89.8		48.2	49.2
墨西哥	71.8	61.3	61.8	37.3	33.3	33.2	92.6	92.8	92.3	40.6	47.3	51.4
马尔代夫		50.9			41.7			87.9			76.9	
蒙古			41.2			30.7			89.4			80.4
黑山共和国		39.3			27.6			73.0			56.8	
摩洛哥												
莫桑比克	59.2	56.1	76.1	68.8	70.0	82.8	91.5	96.7	98.0	86.4	91.9	96.6
缅甸												
纳米比亚	37.8			34.3			83.6			61.1		
尼泊尔	50.0	76.4	58.0	53.5	69.1	52.7	72.1	93.9	91.5	64.1	78.9	80.3
荷兰	62.2	71.2	68.6	61.8	70.8	69.4	84.1	86.4	87.1	57.4	69.8	73.3
新西兰	71.2	65.6	62.2	63.0	59.4	58.5	87.5	89.7	89.9	66.4	73.5	75.3
尼加拉瓜	73.7	76.8		33.1	34.9		95.8	95.9		52.4	54.9	
尼日尔	54.5			45.6			71.2			55.8		
尼日利亚	47.3	30.9		27.2	23.7		97.6	91.0		52.9	64.0	
挪威	54.3	60.5	56.6	55.4	60.1	56.8	87.9	86.1	86.4	76.8	78.1	80.0
阿曼												
巴基斯坦		70.8	64.9		25.5	23.8		93.9	94.5		29.8	28.4
巴拿马	62.5	62.1	62.8	28.4	35.3	32.4	92.6	93.1	93.7	47.3	56.8	59.2
巴布亚新几内亚			68.3			68.4			70.8			72.4
巴拉圭	86.8	73.5	70.0	56.8	45.0	43.6	96.8	95.2	94.5	70.3	66.3	63.3
秘鲁	67.4	64.9	67.2	51.8	51.8	54.6	95.8	93.6	94.7	69.3	70.5	76.4
菲律宾	56.0	52.1	50.3	32.6	31.6	31.9	93.1	90.4	89.5	55.1	53.8	59.4
波兰	43.9	39.5	39.1	35.6	31.8	29.7	82.2	80.1	80.6	67.9	65.5	65.7
葡萄牙	47.2	46.9	38.6	38.9	38.9	34.8	86.4	86.6	86.2	65.0	74.2	76.5
罗马尼亚	50.1	35.9	36.2	42.3	26.5	26.1	86.5	79.1	80.5	72.6	63.3	62.9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65.1	69.5		66.7	73.5		84.2	95.4		84.7	97.4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60.0	53.8		25.9	24.8		88.6	83.4		55.4	41.4	
塞尔维亚			34.6			21.2			75.0			57.0
塞拉利昂		35.2			46.5			85.1			77.5	
新加坡												
斯洛伐克共和国	52.0	40.7	36.4	40.4	32.4	25.5	86.2	87.4	86.4	68.3	69.9	70.1
斯洛文尼亚	44.6	44.5	44.4	40.7	36.3	34.8	79.1	82.4	82.0	67.7	73.0	73.7
索马里												
南非	30.3	42.5		26.8	43.0		86.5	87.4		58.8	74.1	
西班牙	44.6	52.3	45.1	38.6	42.9	40.1	85.4	87.2	87.3	48.1	61.5	70.5
斯里兰卡	57.9	53.7	50.8	36.8	32.9	28.1	92.7	89.5	90.8	41.9	41.3	43.3
苏丹												
斯威士兰	39.4			37.4			90.8			62.4		
瑞典	44.2	49.1	52.1	46.8	51.3	51.4	88.3	88.4	90.1	82.9	82.1	83.1
瑞士	65.0	66.6	69.1	62.1	64.7	66.5	95.5	91.9	92.5	69.6	76.2	78.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63.3			18.9			93.7			21.5	
塔吉克斯坦		43.8			37.0			75.9			50.9	
坦桑尼亚	58.9	80.2	57.0	55.2	81.2	55.3	97.8	97.6	95.3	82.5	95.5	87.8
泰国	71.8	58.4	56.0	64.8	45.2	39.9	96.2	95.7	95.4	74.8	83.0	83.0
东帝汶		47.6	17.5		37.8	10.5		94.4	79.8		54.2	36.8
多哥		63.1			68.8			92.8			90.4	
汤加	53.9			29.7			91.4			51.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50.0			27.3			91.0			24.6		
土耳其	63.7	51.7	49.8	34.2	24.5	25.5	89.1	83.3	82.3	37.0	75.5	31.0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75.4			70.0			95.2			92.9	
乌克兰		40.6			29.6			86.0			69.2	
英国	67.9	65.3	61.8	59.2	59.2	56.4	87.1	86.1	86.5	67.6	71.0	72.4
美国	70.2	62.9	56.7	62.3	58.6	53.5	87.8	86.4	85.1	71.5	71.6	71.8
乌拉圭	72.6	60.3	61.3	52.5	45.8	44.5	91.5	90.9	92.5	60.5	68.9	72.8
乌兹别克斯坦												
委内瑞拉	64.0	60.1		29.3	35.1		93.9	93.9		50.3	63.1	
越南	79.7	57.6	56.3	80.1	53.8	49.5	89.1	94.9	93.9	84.4	89.2	87.9
西岸和加沙地带		43.0	42.5		7.2	7.7		86.8	85.8		18.4	26.0
也门共和国												
赞比亚		43.1			55.3			74.4			72.5	
津巴布韦												

表 2 技能

	平均受教育程度(年份) 总量			平均受教育程度(年份) 男性			平均受教育程度(年份) 女性			技能作为限制因素/% 总量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2005	2010
阿富汗	2.2	3.4	4.2	3.4	5.5	6.7	0.9	1.1	1.5		18
阿尔巴尼亚	9.4	10.3	10.3	9.8	10.5	10.4	9.1	10.1	10.1	10	
阿尔及利亚	6.3	7.7	8.3	7.7	8.8	9.1	4.8	6.7	7.5		
安哥拉										21	26
阿根廷	8.6	9.1	9.3	8.5	9.0	9.1	8.7	9.3	9.5	49	57
亚美尼亚	10.4	10.4	10.4	10.5	10.1	9.8	10.3	10.6	11.0	2	23
澳大利亚	11.7	11.9	12.1	11.5	11.5	11.7	11.9	12.2	12.5		
奥地利	8.5	9.3	9.5	9.5	10.3	10.3	7.6	8.4	8.8		
阿塞拜疆										2	15
孟加拉国	3.7	5.2	5.8	4.3	5.5	6.0	3.1	4.8	5.6	25	
巴巴多斯岛	8.8	9.3	9.5	8.8	9.2	9.2	8.7	9.5	9.8		
白俄罗斯										7	61
比利时	9.9	10.5	10.5	10.0	10.6	10.7	9.8	10.4	10.4		
伯利兹	8.8	9.3	9.5	8.8	9.4	9.5	8.7	9.3	9.5		
贝宁	2.6	3.6	4.2	3.6	4.8	5.5	1.6	2.4	2.9	26	26
不丹											13
玻利维亚	7.8	9.4	9.9	8.6	10.1	10.5	6.9	8.7	9.3	28	3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4	19
博茨瓦纳	8.2	9.2	9.6	8.3	9.4	9.8	8.2	9.1	9.4	20	32
巴西	5.4	7.2	7.5	5.3	7.1	7.4	5.4	7.3	7.7	40	69
保加利亚	9.1	9.7	9.9	9.2	9.7	9.8	9.0	9.7	9.9	10	21
布基纳法索										13	37
布隆迪	2.2	2.9	3.3	2.7	3.4	3.9	1.6	2.3	2.7	12	
柬埔寨	5.6	5.9	6.0	6.1	6.2	6.3	5.3	5.6	5.8	7	
喀麦隆	5.0	5.8	6.1	5.8	6.5	6.8	4.1	5.0	5.4	8	38
加拿大	10.8	12.1	12.1	10.8	12.1	12.0	10.7	12.2	12.1		
中非共和国	3.0	3.5	3.6	4.1	4.7	4.8	1.9	2.4	2.6		
乍得											53
智利	8.8	9.7	10.2	8.9	9.8	10.3	8.7	9.6	10.1	42	41
中国	6.4	7.6	8.2	6.9	8.2	8.7	5.9	7.0	7.6		
哥伦比亚	6.5	7.0	7.7	6.6	7.0	7.7	6.4	7.1	7.7	29	45
刚果民主共和国	3.2	3.5	3.5	4.6	4.7	4.6	2.0	2.3	2.4	13	65
刚果共和国	5.7	5.9	6.0	6.4	6.7	6.9	5.1	5.1	5.2		51
哥斯达黎加	7.6	8.1	8.7	7.6	8.0	8.6	7.5	8.1	8.8	13	38
科特迪瓦				4.2	5.2	5.5					27
克罗地亚	8.1	8.7	9.0	8.7	9.2	9.4	7.5	8.3	8.6	7	
古巴	9.5	10.1	10.6	9.7	10.3	10.7	9.3	10.0	10.5		
捷克共和国	11.4	12.7	12.1	11.6	12.9	12.3	11.2	12.6	12.0	12	29
丹麦	9.7	9.9	10.1	9.9	10.1	10.2	9.5	9.7	9.9		
多米尼加共和国	6.3	7.0	7.4	6.5	7.0	7.3	6.1	7.0	7.5	31	
厄瓜多尔	7.2	7.6	8.1	7.4	7.8	8.3	7.1	7.5	7.9	36	34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5.1	6.6	7.1	6.1	7.5	7.9	4.0	5.6	6.3	30	
萨尔瓦多	5.6	7.3	8.0	5.8	7.7	8.3	5.4	7.0	7.7	32	30
厄立特里亚											1
爱沙尼亚	10.4	11.6	11.8	10.3	11.3	11.5	10.5	11.8	12.1	7	30
埃塞俄比亚											
斐济	10.1	9.4	10.0	10.3	9.4	9.9	9.9	9.3	10.0		14
芬兰	9.1	9.8	10.0	9.2	9.7	9.9	9.0	9.8	10.1		
法国	8.6	9.9	10.5	8.8	10.2	10.7	8.3	9.6	10.4		
加蓬	6.2	7.7	8.4	5.5	7.1	7.9	7.0	8.2	8.8		43
冈比亚	2.5	3.1	3.5	3.2	3.8	4.2	1.7	2.3	2.9	12	
格鲁吉亚										14	26
德国	9.2	11.8	11.8	9.9	12.2	12.1	8.4	11.5	11.6	7	
加纳	6.1	6.8	7.1	7.6	7.7	7.8	4.6	5.8	6.4	5	
希腊	8.7	9.9	10.7	9.2	10.2	10.9	8.2	9.6	10.5	9	
危地马拉	3.9	4.0	4.8	4.3	4.4	5.3	3.5	3.6	4.4	29	33
几内亚										12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12	
海地	4.0	4.8	5.2	5.6	6.8	7.3	2.6	3.0	3.1		
洪都拉斯	5.6	6.8	7.5	5.7	7.0	7.6	5.4	6.7	7.4	23	28
匈牙利	10.4	11.5	11.7	10.7	11.6	11.8	10.2	11.4	11.5	13	6
印度	3.8	4.7	5.1	4.9	5.8	6.1	2.6	3.6	4.1	14	
印度尼西亚	4.7	5.7	6.2	5.4	6.4	6.9	3.9	5.1	5.6	19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6.1	8.1	8.6	7.3	9.3	9.6	4.9	6.8	7.5		
伊拉克	4.9	5.4	5.8	6.0	6.4	6.8	3.7	4.4	4.9		
爱尔兰	10.7	11.3	11.6	10.6	11.1	11.5	10.8	11.4	11.7	16	
以色列	10.9	11.3	11.3	10.9	11.2	11.2	10.8	11.3	11.5		
意大利	8.3	9.1	9.5	8.6	9.5	9.9	7.9	8.8	9.2		
牙买加	8.1	9.6	9.9	7.9	9.4	9.7	8.3	9.8	10.0	42	20
日本	10.6	11.3	11.6	11.0	11.6	11.8	10.2	11.0	11.4		
约旦	7.4	8.7	9.2	8.3	9.4	9.8	6.4	8.0	8.6		
哈萨克斯坦	8.8	10.1	10.4	9.0	10.2	10.5	8.6	10.0	10.3	9	50
肯尼亚	6.2	7.1	7.3	6.9	7.7	7.8	5.4	6.5	6.8	3	
基里巴斯											
韩国	10.6	11.5	11.8	11.4	12.1	12.4	9.7	10.8	11.3	7	
科索沃											10
吉尔吉斯斯坦	8.4	8.6	8.7	8.6	8.6	8.7	8.3	8.6	8.8	19	28
老挝	3.9	4.7	5.1	4.8	5.4	5.7	3.0	3.9	4.5	11	19

（续）

	平均受教育程度（年份） 总量			平均受教育程度（年份） 男性			平均受教育程度（年份） 女性			技能作为限制因素/% 总量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2005	2010
拉脱维亚	8.9	10.2	10.6	9.1	10.2	10.6	8.8	10.2	10.6	18	39
黎巴嫩										38	
莱索托	5.1	6.0	6.6	4.1	4.9	5.5	5.9	7.0	7.5	30	17
利比里亚	3.0	4.2	5.4	4.3	5.7	7.0	1.8	2.8	3.9		5
利比亚	5.7	7.2	7.9	6.1	6.9	7.4	5.3	7.6	8.3		
立陶宛	9.2	10.4	10.9	9.5	10.5	10.9	8.9	10.3	10.9	15	40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6	15
马达加斯加										30	17
马拉维	3.1	4.4	4.7	3.8	5.1	5.2	2.3	3.7	4.2	50	22
马来西亚	8.4	9.7	10.1	8.9	10.0	10.4	7.9	9.4	9.9		
马里	1.0	1.5	2.0	1.3	1.9	2.3	0.7	1.2	1.7	8	12
毛里塔尼亚	3.1	4.1	4.6	4.0	5.1	5.6	2.3	3.1	3.7	23	
毛里求斯	6.8	7.3	7.9	7.4	7.7	8.2	6.3	6.9	7.5	43	46
墨西哥	7.1	8.4	9.1	7.4	8.7	9.4	6.8	8.1	8.8	10	31
马尔代夫	8.8	9.4	9.7	9.2	9.6	9.7	8.5	9.2	9.6	12	41
蒙古	7.8	8.0	8.4	7.8	7.8	8.3	7.7	8.1	8.5	29	15
黑山共和国										20	7
摩洛哥	3.5	4.4	5.0	4.5	5.5	6.1	2.5	3.4	4.0	21	
莫桑比克	0.9	1.2	1.8	1.3	1.7	2.3	0.6	0.8	1.2	19	
缅甸	3.1	4.1	4.6	3.1	4.1	4.8	3.1	4.0	4.5		
纳米比亚	6.1	5.9	6.0	6.1	5.6	5.5	6.1	6.1	6.4	20	
尼泊尔	2.6	3.4	4.0	3.7	4.1	4.4	1.6	2.7	3.5		6
荷兰	10.5	10.8	11.0	10.8	11.1	11.2	10.2	10.6	10.8		
新西兰	12.0	12.4	12.7	12.1	12.5	12.7	11.8	12.3	12.6		
尼加拉瓜	4.8	6.1	6.7	5.8	6.9	7.5	3.9	5.3	6.0	23	24
尼日尔	1.2	1.5	1.8	1.8	2.1	2.4	0.6	0.9	1.2	18	37
尼日利亚										6	
挪威	11.0	12.3	12.3	11.2	12.3	12.2	10.8	12.4	12.4		
阿曼										35	
巴基斯坦	3.4	4.9	5.6	4.6	6.2	6.8	2.1	3.6	4.3		
巴拿马	8.4	9.3	9.6	8.3	9.1	9.3	8.5	9.5	9.8	14	19
巴布亚新几内亚	3.3	3.9	4.1	4.0	4.6	4.7	2.6	3.2	3.4		
巴拉圭	6.3	7.6	8.5	6.4	7.7	8.6	6.2	7.5	8.5	36	51
秘鲁	7.8	8.7	9.0	8.3	9.2	9.4	7.4	8.2	8.6	32	28
菲律宾	7.9	8.6	9.0	7.9	8.4	8.7	8.0	8.9	9.2	12	8
波兰	9.2	9.7	9.9	9.2	9.7	9.8	9.1	9.7	10.0	15	36
葡萄牙	7.0	7.6	8.0	7.3	7.8	8.1	6.7	7.4	7.8	12	
罗马尼亚	9.6	10.1	10.4	10.0	10.4	10.6	9.2	9.8	10.1	14	43
俄罗斯联邦	10.2	11.3	11.5	10.5	11.5	11.7	9.9	11.1	11.3	13	57
卢旺达	2.6	3.6	3.9	3.0	3.8	4.1	2.3	3.4	3.8	12	
沙特阿拉伯	6.3	7.7	8.5	7.1	8.0	8.7	5.1	7.2	8.2		
塞内加尔	3.8	4.7	5.2	4.9	5.8	6.3	2.8	3.6	4.1	10	
塞尔维亚	8.5	9.0	9.2	9.0	9.4	9.4	7.9	8.7	8.9	20	17
塞拉利昂	2.6	3.4	3.7	3.5	4.3	4.6	1.8	2.5	2.8		16
新加坡	7.4	8.5	9.1	7.8	9.0	9.5	7.0	7.9	8.8		
斯洛伐克共和国	11.0	11.1	11.2	11.4	11.0	11.0	10.7	11.1	11.3	8	30
斯洛文尼亚	11.0	11.5	11.7	11.2	11.6	11.7	10.9	11.4	11.6	5	15
索马里											
南非	8.3	8.3	8.6	8.2	8.3	8.4	8.3	8.3	8.7	9	
西班牙	8.2	9.7	10.4	8.5	9.9	10.5	8.0	9.5	10.3	14	
斯里兰卡	9.7	10.8	11.1	9.9	10.9	11.1	9.5	10.7	11.0	21	
苏丹	2.5	3.0	3.3	3.1	3.5	3.7	1.9	2.5	2.8		
斯威士兰	6.3	7.3	7.6	5.9	7.1	7.4	6.7	7.5	7.8	13	
瑞典	10.8	11.5	11.6	10.5	11.3	11.4	11.1	11.7	11.7		
瑞士	9.6	9.7	9.9	10.3	10.3	10.4	8.9	9.1	9.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4.5	4.8	5.3	5.2	5.2	5.5	3.9	4.5	5.0	36	
塔吉克斯坦	9.6	9.3	9.3	9.9	8.8	8.6	9.3	9.8	10.0	5	34
坦桑尼亚	4.4	5.0	5.5	5.1	5.6	6.0	3.7	4.5	5.1	20	
泰国	5.9	6.8	7.5	6.2	7.0	7.7	5.6	6.6	7.3	30	
东帝汶											19
多哥	4.5	5.4	5.9	6.3	7.3	7.9	2.8	3.6	4.0		17
汤加	9.2	9.2	9.4	9.3	9.3	9.5	9.1	9.2	9.2		59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8.5	9.3	9.6	8.5	9.1	9.5	8.6	9.5	9.8		
突尼斯	5.1	6.6	7.3	6.1	7.4	8.0	4.1	5.7	6.6		
土耳其	5.4	6.5	7.0	6.5	7.4	7.9	4.4	5.6	6.1	33	25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4.0	4.9	5.4	4.8	5.6	5.9	3.2	4.2	4.8	10	
乌克兰	10.4	10.9	11.1	10.7	11.0	11.2	10.2	10.7	11.0	20	42
英国	8.6	9.3	9.8	8.4	9.1	9.5	8.7	9.5	10.0		
美国	12.6	12.9	13.1	12.7	12.9	13.0	12.6	12.9	13.2		
乌拉圭	7.6	8.0	8.6	8.2	7.8	8.3	7.1	8.2	8.8	25	31
乌兹别克斯坦										5	35
委内瑞拉	5.5	6.4	7.0	5.5	6.3	7.0	5.5	6.5	7.0	28	25
越南	4.6	5.7	6.4	4.9	6.0	6.6	4.3	5.5	6.3	14	9
西岸和加沙地带											
也门共和国	1.6	3.0	3.7	2.6	4.2	5.0	0.7	1.7	2.4		24
赞比亚	6.0	6.5	7.0	6.2	7.0	7.4	5.9	6.0	6.5	8	
津巴布韦	6.7	7.5	7.7	7.4	7.8	7.9	6.0	7.1	7.4		

（续）

	教育成就（阅读）			教育成就（数学）			教育成就（科学）		
	2003	**2006**	**2009**	**2003**	**2006**	**2009**	**2003**	**2006**	**2009**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385			377			391
阿尔及利亚					387*			408*	
安哥拉									
阿根廷		374	398		381	388		391	401
亚美尼亚				478*	499*		461*	488*	
澳大利亚	525	513	515	524	520	514	525	527	527
奥地利	491	490	470	506	505	496	491	511	494
阿塞拜疆		353	362		476	431		382	373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岛									
白俄罗斯									
比利时	507	501	506	529	520	515	509	510	507
伯利兹									
贝宁									
不丹									
玻利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456*			466*	
博茨瓦纳				366*	364*		365*	355*	
巴西	403	393	412	356	370	386	390	390	405
保加利亚		402	429	476*	413	428	479*	434	439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528	527	524	532	527	527	519	534	529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442	449	387*	411	421	413*	438	447
中国									
哥伦比亚		385	413		370	381		388	402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477	476		467	460		493	486
古巴									
捷克共和国	489	483	478	516	510	493	523	513	500
丹麦	492	494	495	514	513	503	475	496	499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406*	391*		421*	408*	
萨尔瓦多					340*			387*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501	501	531*	515	512	552*	531	528
埃塞俄比亚									
斐济									
芬兰	543	547	536	544	548	541	548	563	554
法国	496	488	496	511	496	497	511	495	498
加蓬									
冈比亚									
格鲁吉亚					410*			421*	
德国	491	495	497	503	504	513	502	516	520
加纳				276*	309*		255*	303*	
希腊	472	460	483	445	459	466	481	473	470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海地									
洪都拉斯									
匈牙利	482	482	494	490	491	490	503	504	503
印度									
印度尼西亚	382	393	402	360	391	371	395	393	38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411*	403*		453*	459*	
伊拉克	515	517	496	503	501	487	505	508	508
爱尔兰		439	474	496*	442	447	488*	454	455
以色列	476	469	486	466	462	483	486	475	489
意大利									
牙买加	498	498	520	534	523	529	548	531	539
日本		401	405	424*	384	387	475*	422	415
约旦			390			405			400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基里巴斯									
韩国	534	556	539	542	547	546	538	522	538
科索沃									
吉尔吉斯斯坦		285	314		311	331		322	330
老挝									

（续）

	教育成就（阅读）			教育成就（数学）			教育成就（科学）		
	2003	**2006**	**2009**	**2003**	**2006**	**2009**	**2003**	**2006**	**2009**
拉脱维亚	491	479	484	483	486	482	489	490	494
黎巴嫩				433 *	449 *		393*	414*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利比亚									
立陶宛		470	468	502*	486	477	519*	488	491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435*			449*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508*	474*		510*	471*	
马里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400	411	425	385	406	419	405	410	416
马尔代夫				460*			472*		
蒙古									
黑山共和国		392	408		399	403		412	401
摩洛哥				387*	381*		396*	402*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亚									
尼泊尔									
荷兰	513	507	508	538	531	526	524	525	522
新西兰	522	521	521	523	522	519	521	530	532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挪威	500	484	503	495	490	498	484	487	500
阿曼					372*			423*	
巴基斯坦									
巴拿马			371			360			376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鲁			370			365			369
菲律宾				378*			377*		
波兰	497	508	500	490	495	495	498	498	508
葡萄牙	478	472	489	466	466	487	468	474	493
罗马尼亚		396	424	475*	415	427	470*	418	428
俄罗斯联邦	442	440	459	468	476	468	489	479	478
卢旺达									
沙特阿拉伯				332*	329*		398*	403*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412	401	442	437	435	442	436	436	443
塞拉利昂									
新加坡			526	605*	593*	562	578*	567*	542
斯洛伐克共和国	469	466	477	498	492	497	495	488	490
斯洛文尼亚		494	483	493*	504	501	520*	519	512
索马里									
南非				264*			244*		
西班牙	481	461	481	485	480	483	487	488	488
斯里兰卡									
苏丹									
斯威士兰									
瑞典	514	507	497	509	502	494	506	503	495
瑞士	499	499	501	527	530	534	513	512	51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95*			452*	
塔吉克斯坦									
坦桑尼亚									
泰国	420	417	421	417	417	419	429	421	425
东帝汶									
多哥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416			414			410
突尼斯	375	380	404	359	365	371	385	386	401
土耳其	441	447	464	423	424	445	434	424	454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乌克兰					462*			485*	
英国		495	494		495	492		515	514
美国	495		500	483	474	487	491	489	502
乌拉圭	434	413	426	422	427	427	438	428	427
乌兹别克斯坦									
委内瑞拉									
越南									
西岸和加沙地带				390*			435*		
也门共和国									
赞比亚									
津巴布韦									

表 3 就业结构

	第一产业就业/%			第二产业就业/%			第三产业就业/%			行政部门就业/%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阿富汗		59. 1			12. 5			28. 4		1. 8	3. 3	3. 2
阿尔巴尼亚	3. 0	47. 1		40. 2	20. 5		56. 8	32. 4		15. 9	11. 2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阿根廷	7. 3	6. 7	5. 8	34. 6	30. 3	29. 4	58. 1	63. 0	64. 8	8. 7	9. 0	
亚美尼亚										10. 4	16. 5	15. 6
澳大利亚	5. 0	3. 6	3. 3	22. 8	21. 3	21. 1	72. 2	75. 1	75. 5	13. 4	14. 0	14. 6
奥地利	7. 4	5. 5	5. 2	32. 0	275	24. 9	60. 6	66. 9	69. 9	14. 9	11. 8	11. 5
阿塞拜疆	24. 8			18. 2			57. 0			21. 7	15. 4	14. 3
孟加拉国			39. 0			21. 0			40. 0		2. 2	
巴巴多斯岛												
白俄罗斯										22. 1	24. 4	
比利时	2. 7	2. 0	1. 4	28. 3	24. 7	23. 4	69. 1	63. 3	65. 3	18. 9	18. 7	18. 8
伯利兹	29. 7			18. 7			51. 6			12. 6		
贝宁		45. 1			9. 2			45. 7	1. 4			
不丹		69. 1			7. 2			23. 7	8. 8			
玻利维亚	43. 8	40. 0	35. 6	18. 2	18. 9	18. 8	38. 1	41. 1	45. 6	6. 2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0. 4			40. 5			29. 1				
博茨瓦纳			25. 5			18. 1			56. 5	16. 0	15. 5	15. 2
巴西	26. 3	20. 5	17. 0	19. 8	21. 4	22. 2	53. 9	58. 1	60. 9	8. 9	10. 6	11. 0
保加利亚	23. 9	8. 9	6. 8	33. 5	34. 2	33. 3	42. 6	56. 6	59. 9	18. 0	16. 3	13. 9
布基纳法索	89. 1	88. 0		2. 7	2. 8		8. 2	9. 2				
布隆迪												
柬埔寨	72. 5	62. 3	60. 1	7. 4	12. 3	13. 1	20. 1	25. 3	26. 8			
喀麦隆	68. 7			6. 1			25. 1					
加拿大	4. 1	2. 7	2. 4	22. 0	22. 0	21. 5	74. 0	75. 3	76. 5	19. 4	17. 8	18. 6
中非共和国		66. 9			9. 2			23. 9				
乍得												
智利	15. 7	13. 2	11. 2	26. 1	23. 0	23. 2	58. 2	63. 9	65. 6	8. 1	8. 5	9. 3
中国	52. 2	44. 8	36. 7	23. 0	23. 8	28. 7	24. 8	31. 4	34. 6	5. 4		
哥伦比亚	27. 0	20. 7	18. 5	21. 8	20. 0	19. 8	51. 2	59. 3	61. 7	3. 2	6. 1	53
刚果民主共和国		71. 5			8. 0			20. 6				
刚果共和国		36. 4			23. 9			39. 7	7. 6			
哥斯达黎加	7. 2	15. 2	11. 9	28. 8	21. 6	20. 0	64. 0	63. 1	68. 1	13. 3	11. 3	11. 7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19. 9	17. 3	14. 9	29. 1	28. 6	27. 3	50. 9	54. 0	57. 6	15. 9	16. 1	15. 5
古巴										37. 1	41. 6	42. 5
捷克共和国	6. 6	4. 0	3. 1	41. 8	39. 5	38. 0	51. 5	56. 5	57. 9		14. 0	13. 4
丹麦	4. 4	2. 8	2. 4	27. 0	23. 4	19. 6	68. 6	73. 5	77. 7	30. 4	30. 6	30. 7
多米尼加共和国	16. 8	14. 8	14. 6	23. 7	22. 3	18. 1	59. 4	63. 0	67. 4	9. 7		
厄瓜多尔	38. 1	31. 3	28. 4	17. 3	17. 5	18. 6	44. 6	51. 3	53. 0	9. 0	7. 5	7. 9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33. 3	39. 1		22. 8	18. 8		44. 0	42. 1			22. 8	23. 6
萨尔瓦多	27. 0	20. 2		26. 3	22. 1		46. 7	57. 7		7. 2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10. 2	5. 2	4. 2	34. 2	33. 8	30. 1	55. 6	61. 1	65. 1	24. 2	20. 8	22. 8
埃塞俄比亚	81. 9	82. 8		3. 5	6. 0		14. 5	11. 2		1. 3	1. 7	
斐济	32. 9		26. 1	20. 5		17. 5	46. 6		56. 4	11. 1	11. 9	11. 4
芬兰	8. 0	4. 8	4. 4	26. 8	25. 6	23. 2	64. 9	69. 5	71. 9	24. 3	23. 1	22. 0
法国	4. 9	3. 6	2. 9	26. 9	23. 7	22. 2	68. 1	72. 4	74. 5		22. 8	
加蓬		23. 8			21. 2			55. 0		13. 4		
冈比亚												
格鲁吉亚			53. 3			9. 7			37. 0			
德国	3. 2	2. 3	1. 6	36. 0	29. 7	28. 4	60. 8	67. 9	70. 0	13. 1	11. 6	11. 2
加纳		57. 4			14. 2			28. 5				
希腊	20. 4	12. 4	12. 5	23. 2	22. 4	19. 7	56. 3	65. 1	67. 7	6. 8	7. 6	8. 2
危地马拉		33. 8			22. 6			43. 6		4. 3	4. 5	
几内亚											1. 7	2. 1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海地												
洪都拉斯	37. 4	34. 3	37. 1	25. 0	23. 0	20. 3	37. 6	42. 7	42. 5	6. 2	6. 2	
匈牙利	8. 0	5. 0	4. 5	32. 6	32. 4	30. 7	59. 4	62. 6	64. 9	21. 9	22. 1	22. 0
印度	61. 9	56. 1	51. 2	15. 8	19. 0	22. 3	22. 3	24. 9	26. 4	2. 8	2. 3	
印度尼西亚	45. 3	45. 7	37. 1	17. 3	17. 7	18. 7	37. 3	36. 7	44. 1	4. 9	3. 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0. 8			32. 7			46. 5			11. 7	10. 6
伊拉克		2. 9			29. 8			67. 3				
爱尔兰	9. 1	5. 9	4. 6	29. 3	27. 9	19. 5	61. 5	65. 5	75. 5	17. 5	15. 5	18. 4
以色列	2. 9	2. 0	1. 7	28. 7	21. 4	20. 4	67. 7	75. 7	77. 1	19. 0	17. 2	17. 0
意大利	6. 6	4. 2	3. 8	33. 7	30. 8	28. 8	59. 8	65. 0	67. 5	18. 3	16. 0	15. 1
牙买加	19. 5			17. 9			62. 6					
日本	5. 7	4. 4	3. 7	33. 6	27. 9	25. 3	60. 4	66. 4	69. 7	8. 0	7. 0	7. 1
约旦		3. 8			22. 8			73. 4		16. 1	14. 9	16. 2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67. 9	72. 3		4. 6	7. 9		27. 5	19. 8		4. 3		
基里巴斯		3. 4			6. 3			90. 3				
韩国	12. 4	7. 9	6. 6	33. 3	26. 8	17. 0	54. 3	65. 2	76. 4	4. 3		
科索沃		17. 3			26. 7			56. 0				
吉尔吉斯斯坦	51. 3			10. 2			38. 5			18. 3	14. 3	
老挝			71. 3			10. 7			18. 1			

（续）

	第一产业就业/%			第二产业就业/%			第三产业就业/%			行政部门就业/%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拉脱维亚	17.3	12.1	8.8	27.2	25.3	24.0	55.4	61.3	66.9	24.4	22.7	23.2
黎巴嫩		7.3			54.6			38.1				
莱索托												
利比里亚		44.2			1.9			53.3				
利比亚										36.4		
立陶宛	20.7	14.0	9.0	28.5	29.1	24.4	50.3	56.9	66.2	21.4	23.4	25.0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19.5			32.3			48.2				
马达加斯加	70.1			3.9			26.0			2.0	2.1	
马拉维		84.9			4.6			10.5		2.7		
马来西亚												
马里	70.7	58.0		6.6	12.2		22.3	29.3				
毛里塔尼亚			25.2			9.7			65.2			
毛里求斯		12.0	11.5		32.4	31.4		55.6	57.1	14.0	14.7	13.3
墨西哥	23.8	14.9	13.1	21.5	25.5	25.5	54.2	59.0	60.6	12.4	8.9	8.3
马尔代夫		48.7			15.8			35.5			19.3	17.9
蒙古			40.5			16.8			42.7			
黑山共和国												
摩洛哥	39.2	34.9		24.3	24.8		36.6	40.3			7.5	7.7
莫桑比克	87.2	81.2	83.5	3.9	3.2	3.8	8.8	15.6	12.7			
缅甸												
纳米比亚	44.5			12.7			42.8					
尼泊尔		80.1	76.3		8.1	10.5		11.8	13.2			
荷兰	3.7	3.2	2.8	22.6	19.6	15.9	70.6	72.4	71.6	13.8	12.8	12.5
新西兰	9.7	7.1	6.6	25.1	22.0	20.9	65.2	70.7	72.5	12.4	10.2	10.7
尼加拉瓜	43.8	35.9	31.7	14.7	18.3	18.8	41.4	45.2	50.0	5.4		
尼日尔												
尼日利亚	68.1			2.7			29.2					
挪威	5.4	3.3	2.5	23.0	20.8	19.7	71.3	75.7	77.6	30.9	30.1	30.8
阿曼										14.0		
巴基斯坦		41.8	43.4		21.3	21.2		36.9	35.5			
巴拿马	21.3	19.9	18.1	17.9	16.9	18.5	60.7	63.3	63.4	8.8	7.9	
巴布亚新几内亚			25.2			6.8			68.8			
巴拉圭	40.8	32.4	25.8	16.5	15.7	19.2	42.7	51.9	54.9	5.1	6.6	
秘鲁	31.7	37.5	31.7	15.7	13.7	16.4	52.6	48.8	51.9		8.2	9.5
菲律宾	40.2	38.7	33.5	17.1	16.0	14.5	42.7	45.3	52.0	7.4	7.1	7.8
波兰	22.6	17.4	12.8	32.0	29.2	30.2	45.3	53.4	56.9	16.2	11.4	10.6
葡萄牙	11.5	11.8	10.9	32.2	30.6	27.7	56.3	57.5	61.4		13.6	12.5
罗马尼亚	40.3	32.1	30.1	31.0	30.3	28.7	28.7	37.5	41.2	13.1	13.9	13.0
俄罗斯联邦										20.1	21.5	
卢旺达	88.6	78.0		1.7	5.0		9.7	17.0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5.1	36.2		29.7	14.5		65.2	49.3		2.9	2.7	
塞尔维亚			22.9			24.9			52.2			14.2
塞拉利昂		70.8			5.5			23.7				
新加坡										5.4	5.0	5.0
斯洛伐克共和国	9.2	4.7	3.2	38.9	38.8	37.1	51.9	56.3	59.6	30.7	16.0	14.8
斯洛文尼亚	10.1	8.8	8.8	43.1	37.2	32.5	46.4	53.3	58.3	11.6	15.5	16.0
索马里												
南非	14.3	7.8		27.9	25.5		57.9	66.6		12.8	8.9	
西班牙	9.0	5.3	4.3	30.2	29.7	23.1	60.8	65.0	72.6	14.8	14.1	15.5
斯里兰卡	38.8	30.9	31.6	20.9	26.4	26.3	40.3	42.7	42.1	8.2	10.7	
苏丹												
斯威士兰	16.3			19.0			64.7					
瑞典	3.1	2.0	2.1	25.9	22.0	19.9	71.0	75.7	77.7	30.3	28.0	
瑞士	4.4	3.8	3.3	28.6	23.7	21.1	67.0	72.5	70.9	11.8	12.4	12.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5.4			26.6			47.9			20.7	19.8
塔吉克斯坦		67.0			4.5			28.5				
坦桑尼亚		75.8	78.5		4.5	2.7		19.7	18.8			
泰国	28.9	44.3	42.1	24.5	19.9	20.0	46.6	35.8	38.0		6.7	7.3
东帝汶			50.5			9.8			39.7		3.0	
多哥		59.1			8.6			32.3				
汤加	33.1			26.0			40.9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24.3	21.2	21.1
突尼斯	21.8			37.2			41.0					
土耳其	43.4	29.5	23.7	22.3	24.8	26.2	34.3	45.8	50.1	9.8	11.2	12.8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73.1			6.4			20.5		1.8		
乌克兰		9.6			31.9			58.6		22.4	19.5	20.3
英国	2.0	1.3	1.2	27.3	22.2	19.1	70.2	76.3	78.9	17.0	19.7	19.6
美国	2.9	1.6	1.6	24.3	20.6	16.7	72.9	77.8	81.2	15.0	15.0	15.6
乌拉圭	5.2	4.6	11.6	21.0	21.9	21.4	73.9	73.5	67.0	14.1	11.2	12.5
乌兹别克斯坦												
委内瑞拉	14.2	10.4		24.0	21.7		61.9	67.8				
越南	61.8	52.3	54.0	14.8	20.0	20.4	23.4	27.8	25.7		4.3	4.4
西岸和加沙地带	11.0	6.9	26.3	41.7	38.2	32.8	47.3	54.9	40.9		23.6	23.8
也门共和国											8.5	
赞比亚		72.1			6.4			21.5				
津巴布韦										5.9		

（续）

	工资就业/%			自就业/%			农业就业/%			城市地区就业/%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阿富汗		22.6			22.2			55.1			16.5	
阿尔巴尼亚		43.6			13.5			42.9		23.0	37.7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阿根廷												
亚美尼亚											55.5	
澳大利亚			84.6			13.6			1.8		89.7	88.8
奥地利		87.8	87.1		8.1	8.8		4.1	4.1		60.5	59.6
阿塞拜疆	78.2			12.8			9.0			46.3		
孟加拉国		36.0			20.0			44.0				24.0
巴巴多斯岛												
白俄罗斯											73.2	
比利时		87.7	88.8		11.0	10.1		13	1.1		95.8	95.8
伯利兹	65.2			18.3			16.5			52.5		
贝宁		9.4			46.2			44.5			37.0	
不丹		23.8			9.1			67.1			22.1	
玻利维亚	28.5	33.1	36.1	29.2	29.3	30.3	42.3	37.6	33.7	57.0	63.0	64.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69.8			9.8			20.3				
博茨瓦纳			68.4			12.2			19.3			
巴西	58.7	62.9	66.5	22.0	22.3	21.7	19.3	14.9	11.8	77.4	81.6	83.7
保加利亚		92.4	86.4		7.6	10.0		0.0	3.6	72.4	54.6	50.3
布基纳法索	3.6	4.4		7.6	7.9		88.8	87.7		12.6	15.3	
布隆迪												
柬埔寨	12.4	22.7	25.9	17.0	19.2	19.2	70.6	58.1	54.9	18.2	17.8	17.4
喀麦隆										23.0	30.1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10.0			24.5			65.5			42.9	
乍得											24.9	
智利	74.5	75.8	763	19.9	20.8	20.8	5.6	3.4	3.0	85.8	88.8	88.5
中国							48.0	36.8	25.8	28.0	38.0	45.6
哥伦比亚		50.7	46.4		36.9	41.6		12.4	12.0		76.5	78.4
刚果民主共和国		9.1			20.3			70.6			31.8	
刚果共和国		21.6			42.3			36.1			48.2	
哥斯达黎加	73.0	71.3	72.6	24.2	22.8	23.2	2.8	5.8	4.2	46.8	61.9	62.1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78.0			7.7			14.4			54.1	
古巴												
捷克共和国		83.6	84.3		15.6	14.7		0.7	1.0		59.0	59.4
丹麦		90.6	91.7		8.1	7.2		1.4	1.1		64.4	75.6
多米尼加共和国	60.0	52.2	50.4	29.3	35.0	37.1	10.7	12.7	12.5	54.2	66.7	69.3
厄瓜多尔	48.9	52.0	54.6	27.3	27.4	27.7	23.7	20.6	17.7	54.5	67.0	67.7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53.3			13.2			33.5			38.9	
萨尔瓦多	56.2	56.2		28.8	32.0		15.0	11.8		61.3	64.9	67.7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93.0	93.7		5.0	5.1		2.0	1.2		50.3	53.3
埃塞俄比亚	9.7	6.0		4.8	11.7		85.6	82.3		12.4	11.7	
斐济	59.8		68.9	9.3		11.7	30.8		19.4	33.4		
芬兰		86.8	86.2		10.0	10.9		3.2	2.9		46.8	46.6
法国		90.9	91.4		6.9	6.8		2.2	1.8		83.5	83.1
加蓬		55.8			23.3			20.9			81.2	
冈比亚												
格鲁吉亚			52.1			13.8			34.1		38.6	40.5
德国		90.7	92.0		8.3	7.6		1.0	0.4		81.5	84.9
加纳		18.5			25.9			55.6			36.2	
希腊		65.3	66.2		23.2	22.6		11.5	11.2		42.1	53.0
危地马拉		48.5			28.0			23.5			54.3	
几内亚	45.5			54.2			0.3			27.7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海地												
洪都拉斯	45.9	43.0	43.0	28.4	33.0	31.9	25.7	24.0	25.1	46.9	50.8	48.6
匈牙利		84.6	87.5		13.3	10.8		2.1	1.7		58.1	55.3
印度	43.3	45.1	50.5	17.1	21.0	20.3	39.6	33.9	29.2	22.0	23.4	25.8
印度尼西亚	48.6	38.6	42.3	23.7	24.9	27.3	27.7	36.6	30.4	33.6	39.2	48.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41.4	
伊拉克		99.9			0.0			0.0			66.8	
爱尔兰		83.4	83.6		11.5	11.4		5.1	5.1		65.6	65.7
以色列												
意大利		74.4	75.9		22.7	21.9		2.9	23		82.5	83.7
牙买加	61.8			21.8			16.4			58.7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52.7	56.6	
肯尼亚	31.4	29.1		10.4	7.4		58.2	63.5		16.0	21.2	
基里巴斯											58.4	
韩国												
科索沃		67.6			17.3			15.1				
吉尔吉斯斯坦	86.0			1.9			12.1			38.2		
老挝			15.5			16.9			67.6	30.3		23.0

（续）

	工资就业/%			自就业/%			农业就业/%			城市地区就业/%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拉脱维亚		90.0	91.1		5.3	6.2		4.7	2.7		51.1	53.4
黎巴嫩												
莱索托												
利比里亚		14.2			43.8			42.0			24.6	
利比亚												
立陶宛		87.3	89.1		4.8	5.9		8.0	5.0		45.8	47.0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71.8			11.2			17.0			62.5	
马达加斯加	12.6			18.9			68.5			15.7		
马拉维	29.3	10.2		10.8	7.0		59.9	82.8		19.8	9.0	
马来西亚												
马里	3.0	11.0		14.9	33.0		82.2	56.1		12.4	27.9	
毛里塔尼亚			35.6			42.8			21.6			54.0
毛里求斯		79.9	78.8		15.6	15.9		4.5	5.3		56.4	
墨西哥	63.1	68.5	72.8	23.0	23.6	20.1	13.8	7.8	7.1	74.2	79.2	80.0
马尔代夫		57.8			2.8			39.4			36.8	
蒙古			49.3			11.5			39.2			51.0
黑山共和国												
摩洛哥												
莫桑比克	9.7	12.9	8.9	4.5	7.3	8.6	85.8	79.9	82.5	14.8	27.9	27.1
缅甸												
纳米比亚	54.7			9.6			35.6			42.4		
尼泊尔		17.2	14.4		9.6	13.3		73.3	72.6	6.0	13.4	21.0
荷兰		89.0	88.0		9.5	10.3		1.6	1.7			
新西兰												
尼加拉瓜		48.4			26.6			25.1		58.2	58.3	
尼日尔										16.6		
尼日利亚	9.0	19.3		23.2	57.7		67.7	23.0			43.1	
挪威		89.1	92.4		8.3	5.9		2.6	1.8		68.2	68.8
阿曼												
巴基斯坦		38.3	37.1		23.8	23.1		37.8	39.8		33.1	32.1
巴拿马	66.9	61.1	65.2	19.1	24.3	21.9	13.9	14.6	12.9	63.7	66.0	68.0
巴布亚新几内亚			32.6			40.6			26.9			10.7
巴拉圭	37.1	46.7	51.6	26.2	24.7	24.8	36.7	28.6	23.5	51.8	58.3	60.9
秘鲁	41.8	39.7	42.8	31.9	29.4	30.9	26.3	31.0	26.3	66.4	63.4	65.9
菲律宾	48.0	47.9	55.9	20.1	22.4	21.5	31.8	29.7	22.6	47.5	48.3	48.3
波兰		78.7	80.1		8.6	8.9		12.8	11.0		55.7	54.7
葡萄牙		78.2	81.2		15.2	13.1		6.6	5.7		76.3	76.9
罗马尼亚	84.2	72.0	72.0	3.5	9.1	7.2	12.3	18.9	20.8	48.8	51.6	43.9
俄罗斯联邦											78.3	
卢旺达	11.0	23.9		4.0	9.1		85.1	67.0		8.5	15.8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39.1	23.2		58.6	42.5		2.3	34.3			45.8	
塞尔维亚			65.6			13.5			20.9			
塞拉利昂		9.3			20.1			70.6			35.3	
新加坡												
斯洛伐克共和国		90.0	90.2		9.7	9.5		0.3	0.3		62.0	62.3
斯洛文尼亚		91.6	93.1		6.4	5.6		2.0	1.3			
索马里												
南非		78.6			18.5			2.9		65.9	69.2	
西班牙		83.1	83.9		14.3	14.1		2.6	2.0		75.3	75.4
斯里兰卡	63.0	58.9	56.0	14.3	20.7	22.3	22.7	20.5	21.7	12.5	12.3	10.9
苏丹												
斯威士兰	59.3			30.4			10.3			30.6		
瑞典		91.1	93.9		8.3	5.9		0.6	0.2		33.9	38.8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54.2			24.1			21.7			50.5	
塔吉克斯坦		64.0			8.1			28.0			21.1	
坦桑尼亚		8.0	8.1		17.1	11.6		74.9	80.4	25.5	25.5	21.1
泰国	56.4	40.6	41.3	18.0	19.8	20.9	25.6	39.6	37.8	62.2	30.6	31.3
东帝汶		99.8	28.0		0.2	21.8		0.0	50.2		20.3	
多哥		9.2			32.5			58.2			32.4	
汤加	43.1			24.2			32.7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68.3			16.6			15.0			66.0		
土耳其		54.2	60.9		18.7	16.3		27.1	22.8		58.1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18.7			13.8			67.5			17.4	
乌克兰		97.7			2.2			0.2			73.8	
英国		87.8	88.8		11.7	10.6		0.5	0.6		95.2	96.1
美国		89.3			10.1			0.6			77.5	
乌拉圭	73.1	71.2	71.3	24.7	27.0	24.1	2.2	1.8	4.6			93.9
乌兹别克斯坦												
委内瑞拉	60.0	55.7		31.9	38.2		8.2	6.2		19.4		
越南	7.7	33.1	36.3	31.0	19.5	7.9	61.3	47.5	55.8	27.3	25.7	25.9
西岸和加沙地带		58.8	66.6		25.9	21.5		15.3	11.9		56.6	72.1
也门共和国											34.1	
赞比亚		17.2			12.6			70.2			30.4	
津巴布韦												

表 4　生活水平

	被选择出来的行业的工资(2005 年美元,年收入)											
	会计师			化工工程师			汽车司机			缝纫机操作员		
	1995	2005	2008	1995	2005	2008	1995	2005	2008	1995	2005	2008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7 139						1 989					
阿根廷					10 849	17 214	9 581			2 948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32 498	40 267		39 694	59 054		28 065	29 331		22 418	21 019	
奥地利	57 907			38 574			27 954			19 402		
阿塞拜疆		2 769	7 483	454	1 785	6 544						
孟加拉国	1 548			1 201			578	1 077		584		
巴巴多斯岛	32 772						13 553			4806		
白俄罗斯				1 188	2 657					761	1 133	
比利时										22 692	22 093	
伯利兹												
贝宁												
不丹	25 028						5 967			4 989		
玻利维亚	12 745			5 159			1 173			2 13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1 528										
巴西		20 045						3 134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3 516											
布隆迪												
柬埔寨	293						225			707		
喀麦隆												
加拿大	25 459	37 540	41 143	37 116	60 033		20 146	21 033	27 400	12 253	13 125	13 159
中非共和国	21 735			10 284			1 028			799		
乍得												
智利		12 951									5 184	
中国	1 096	2 913		874	2 538		501			891	1 327	
哥伦比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												
哥斯达黎加	10 761	8 998	12 518		9 078	12 011	5 198	3 993	5 973	3 475	2 541	2 579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8 955			6 953			5 424			6 281		
古巴												
捷克共和国		14 387	23 583	5 918	14 559	22 528	4 024	8 478	12 911	3 133	4 383	
丹麦		123 067			116 081			51 740			47 102	
多米尼加共和国	2 561									2 561		
厄瓜多尔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2 778			4 469			1 041			615		
萨尔瓦多	16 107	15 103	17 006	12 547	12 267	16 327	2 688	2 906	4 083	2 053	2 496	2 079
厄立特里亚	3 077						1 518			615		
爱沙尼亚	8 180			5 166			3 593			2 011		
埃塞俄比亚												
斐济												
芬兰	42 583	59 695		44 183	55 887		30 885	32 263		23 362	24 554	
法国												
加蓬	12 045									2 725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国	68 538	63 483	71 989	78 873	73 544	86 265	48 206	41 013	44 482	29 536	26 388	31 576
加纳	5 589	1 516		2 298	519		760			867	562	
希腊												
危地马拉										1 476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海地												
洪都拉斯	3 206			32 684			2 304			953		
匈牙利	4 548	24 679		10 439	28 345		4 514	8 987				
印度	3 261						912			800		
印度尼西亚					2 533			818			73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55 684	52 973	58 298	30 449	34 726	40 328	20 270	21 559	24 380	17 366	18 269	20 791
牙买加												
日本							50 366	30 710	30 452	29 592	19 914	19 836
约旦	8 320	8 163		3 580	4 925		3 830	2 488		1 757	2 945	
哈萨克斯坦		5 965			3 269			2 165			957	
肯尼亚												
基里巴斯												
韩国	22 122	38 755		20 206	29 415		14 914	14 647		13 291	13 698	
科索沃												
吉尔吉斯斯坦	605									251		
老挝												

（续）

	被选择出来的行业的工资（2005 年美元，年收入）											
	会计师			化工工程师			汽车司机			缝纫机操作员		
	1995	2005	2008	1995	2005	2008	1995	2005	2008	1995	2005	2008
拉脱维亚	8 347	12 686		3 837	10 368		2 763	5 877		2 181	3 066	
黎巴嫩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利比亚												
立陶宛	3 939	11 976					2 864	5 228		2 030	4 155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马达加斯加	1 205						466	488		424		
马拉维	16 360						1 106			389		
马来西亚											1 673	
马里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17 701	16 091	19 100				3 465	2 826	3 622	2 330	1 895	2 369
墨西哥		3 319	3 220		11 355		1 796	2 623	2 682	1 552	2 115	2 158
马尔代夫	1 130	1 644	3 693		1 436	2 345		588	1 535	377	1 040	1 691
蒙古												
黑山共和国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4 880	11 869		4 164	16 617		2 733	10 575		2 082	7 985	
纳米比亚	19 393											
尼泊尔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3 891			11 728			1 327					
尼日尔												
尼日利亚	4 472			21 678			3 012			944		
挪威							24 680	28 863	36 446			
阿曼												
巴基斯坦		3 193			2 182			1 230			851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16 770			23 560			5 500			3 779		
巴拉圭												
秘鲁	17 836	24 789	23 679				1 543	2 181	5 702	2 516	2 474	2 579
菲律宾	5 853	3 951		6 513	3 408		2 640	1 919		2314	1 653	2 159
波兰	7 068	12 502		5 867	12 150		3 869	7 961		3 656	7 059	
葡萄牙	19 084	23 948		32 444	34 440		8 653	9 039		6 259	5 940	
罗马尼亚	4 773	9 876	15 849	3 476	5 661	10 681	2 754	3 395	6 386	1 549	2 082	3 305
俄罗斯联邦				2 288	2 780			2 922		759	1 542	
卢旺达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拉利昂	5 782						463			449		
新加坡	44 523	28 089		29 164	27 275		10 665	9 229		9 005	6 424	
斯洛伐克共和国	4 394	7 829		2 753	7 315		2 027	5 963		2 053	2 583	
斯洛文尼亚	11 945			19 381			12 974			6 153		
索马里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1 101			1 054		
苏丹	11 213			14 663			7 095			4 341		
斯威士兰	16 472									8 697		
瑞典	37390			33 607			24 762			28 083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	288			357			108			338		
坦桑尼亚												
泰国	14 657	13 861		7 118	16327		4 072	3 291		4 343	2 562	
东帝汶												
多哥	11 021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7 777			1 903		
突尼斯				4 911			4 702			2 849		
土耳其		14 624		16 305	17 410			5 823		3 140	5 648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3 784			1 235			866			237		
乌克兰				1 909						767		
英国	46 991	60 352	56 524		33 624		21 452	30 880	32 388		22 402	23 513
美国	43 432	50 457		67 014	82 647		27 533	30 958		18 100	18 515	
乌拉圭							10 389			4 782		
乌兹别克斯坦												
委内瑞拉	7 857			7 275			2 205			1 924		
越南												
西岸和加沙地带												3 464
也门共和国	7 572			9 466			5 429			3 360		
赞比亚	2 758							522		781	304	
津巴布韦												

（续）

	贫穷工作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低于1.25 购买力平价美元的人口比例）/%			对生活满意的人口的比例（在最近调查中的百分比）/%			劳动力比例（在国家收入中的百分比）/%			收入性别差异（女性/男性）		
	1995	2005	2010	就业	失业	脱离劳动力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46. 3	33. 3	35. 5					0. 79	
阿尔及利亚				55. 4	39. 3	57. 5	29. 9	22. 3				
安哥拉												
阿根廷	0. 0	5. 0	1. 0	87. 1	71. 6	90. 4	37. 8	34. 8			0. 90	0. 96
亚美尼亚		11. 0					39. 4	42. 6	43. 9			
澳大利亚				86. 9	65. 6	81. 5	54. 8	52. 3	52. 5			
奥地利							59. 6	54. 5	54. 2		0. 87	0. 88
阿塞拜疆	16. 0						24. 5	24. 4	18. 9			
孟加拉国				40. 4	41. 5	42. 4					0. 68	
巴巴多斯岛												
白俄罗斯	1. 0						45. 7	52. 9	55. 5			
比利时							56. 9	56. 5	57. 2		0. 93	0. 35
伯利兹	12. 0											
贝宁		47. 0					18. 3					
不丹		10. 0						89. 5	88. 9			
玻利维亚	17. 0	18. 0	16. 0				37. 5	37. 6	31. 5		0. 76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58. 7	38. 2	49. 1		54. 3	59. 9			
博茨瓦纳							31. 9					
巴西	11. 0	9. 0	6. 0	85. 6	74. 2	82. 3	48. 3	46. 7	49. 1	0. 84	0. 88	0. 89
保加利亚	2. 0	0. 0		51. 9	31. 3	38. 3	38. 9	40. 7	42. 5		0. 93	0. 82
布基纳法索	71. 0	57. 0		48. 7	37. 1	47. 1		24. 9	22. 0	0. 80		
布隆迪	86. 0							40. 7				
柬埔寨		32. 0	23. 0								1. 05	0. 99
喀麦隆		10. 0					22. 5	20. 0	20. 8			
加拿大				91. 4	78. 7	90. 7	55. 8	54. 3				
中非共和国		62. 0						20. 7				
乍得							18. 8					
智利	3. 0	1. 0	1. 0	80. 1	73. 2	74. 6	40. 5	39. 8	42. 3	0. 96	0. 93	0. 86
中国				72. 5	65. 8	74. 9						
哥伦比亚		13. 0	8. 0	91. 3	84. 1	89. 9	36. 0	35. 1	35. 0			0. 91
刚果民主共和国											0. 89	
刚果共和国												
哥斯达黎加	0. 0	4. 0	3. 0				50. 0	51. 9	55. 4			
科特迪瓦							24. 1					
克罗地亚		0. 0					56. 9	57. 0			0. 93	
古巴							48. 5	46. 2	44. 5			
捷克共和国							47. 5	48. 0	49. 2		1. 01	0. 99
丹麦							60. 4	62. 9	66. 5			
多米尼加共和国	5. 0	6. 0	2. 0				37. 7					
厄瓜多尔	14. 0	9. 0	5. 0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2. 0		52. 2	42. 9	54. 6	24. 4	27. 2	26. 1		0. 59	
萨尔瓦多	10. 0	12. 0	9. 0	82. 3	75. 6	78. 0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0. 0					59. 6	49. 9	59. 7		0. 77	0. 69
埃塞俄比亚	61. 0			40. 2	38. 2	47. 5					0. 84	
斐济							39. 0					
芬兰				94. 4	69. 9	87. 4	56. 7	56. 4	56. 6			
法国				80. 8	63. 5	71. 6	58. 0	58. 0	58. 4		0. 77	0. 88
加蓬		5. 0						22. 3				
冈比亚	66. 0											
格鲁吉亚				42. 8	28. 4	33. 8		19. 2	33. 3			0. 60
德国				86. 0	50. 6	78. 1	59. 7	55. 9	54. 7		0. 99	
加纳	39. 0			63. 3	59. 7	64. 9					0. 77	
希腊							34. 9	38. 7	39. 3		0. 39	0. 93
危地马拉		14. 0		88. 1	89. 3	82. 4		34. 4	32. 6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海地												
洪都拉斯	27. 0	26. 0	18. 0				47. 7	48. 7	49. 5			
匈牙利	0. 0	0. 0					54. 4	54. 5	54. 6		1. 01	
印度				38. 9	51. 2	39. 0	30. 5	29. 1	30. 0	0. 68	0. 73	0. 73
印度尼西亚	47. 0	22. 0	18. 0	73. 3	69. 3	77. 4					0. 8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63. 3	60. 7	66. 9	23. 4	21. 8				
伊拉克				31. 4	22. 1	31. 3	6. 7	14. 7	21. 9		0. 70	
爱尔兰							50. 3	46. 2	48. 8		0. 93	1. 02
以色列				80. 7	71. 9	67. 6	56. 6	54. 1	53. 3			
意大利				85. 7	69. 4	80. 6	45. 8	45. 3	46. 4		1. 12	0. 90
牙买加								48. 5	51. 0	0. 98		
日本				80. 9	70. 6	85. 2	52. 1	49. 5				
约旦				47. 7	40. 2	50. 6	45. 0	42. 0	44. 0			
哈萨克斯坦							39. 0	34. 4	34. 4			
肯尼亚		43. 0					35. 1	41. 4	40. 4		0. 81	
基里巴斯												
韩国				72. 5	55. 0	71. 2	51. 5	51. 1	51. 6			
科索沃												
吉尔吉斯斯坦				64. 9	73. 4	64. 7	40. 0	27. 2	32. 0			
老挝	49. 0		34. 0									

（续）

	贫穷工作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低于1.25购买力平价美元的人口比例）/%			对生活满意的人口的比例（在最近调查中的百分比）/%			劳动力比例（在国家收入中的百分比）/%			收入性别差异（女性/男性）		
	1995	2005	2010	就业	失业	脱离劳动力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拉脱维亚		0.0	0.0				50.0	47.3	47.9		0.74	0.67
黎巴嫩							35.5					
莱索托							57.4	48.8	48.4			
利比里亚		84.0										
利比亚												
立陶宛			0.0				41.6	45.1	49.5		0.69	0.71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51.1	43.9	44.0			
马达加斯加	72.0											
马拉维												
马来西亚				79.6	75.0	81.2						
马里	86.0			58.2	53.1	54.5				0.49		
毛里塔尼亚								25.2				
毛里求斯							43.3	38.7	38.4		0.76	
墨西哥	6.0	5.0	4.0	89.2	83.5	89.5	32.3	30.4		0.94		
马尔代夫	27.0	12.0		52.1	49.1	42.6	50.6	49.9	57.5		0.85	
蒙古							27.5	26.1	33.8			0.77
黑山共和国												
摩洛哥				36.7	20.0	52.2		37.4	34.2			
莫桑比克							16.9	27.7	27.3	1.09		0.93
缅甸												
纳米比亚	49.0						47.6	46.4	44.4			
尼泊尔		53.0	25.0									0.72
荷兰				96.4	76.6	93.4	56.5	55.8	55.8			
新西兰							37.0	40.6				
尼加拉瓜	21.0	15.0										
尼日尔							17.1	17.0	15.8			
尼日利亚				71.4	76.7	80.6	17.3	5.2	4.1			
挪威				94.5	58.3	89.4	54.2	46.3	46.7			
阿曼							33.4	26.4	32.5			
巴基斯坦				26.6	29.2	29.1					0.63	0.36
巴拿马	16.0	9.0	6.0				39.2	34.5	31.4			
巴布亚新几内亚							26.0	17.3				
巴拉圭	12.0	7.0	7.0				35.2	36.9	37.1			
秘鲁	14.0	9.0	5.0	75.5	68.5	74.7	27.9	25.3	23.8	0.71	0.82	0.81
菲律宾		23.0	18.0	67.4	69.5	64.9	25.3	27.7	27.9		0.89	
波兰	0.0	0.0	0.0	82.2	64.5	71.4	45.1	40.7	42.4		0.89	0.96
葡萄牙							54.7	58.2	58.2		0.83	0.90
罗马尼亚	5.0	1.0	0.0	67.4	25.7	45.6	39.6	44.3	47.1	0.86	0.81	0.89
俄罗斯联邦				59.5	41.2	59.6	48.5	49.9	52.1			
卢旺达				42.2		44.7				0.93	0.90	
沙特阿拉伯				77.2	67.1	78.6	35.1	28.1				
塞内加尔		34.0					17.6	24.1	21.6			
塞尔维亚			0.0	70.9	55.9	53.1	65.7	56.6	53.6			
塞拉利昂		53.0										
新加坡				83.3	71.6	83.9	43.9	42.1	44.3			
斯洛伐克共和国		0.0	0.0				65.1	58.1	60.9			
斯洛文尼亚				85.0	65.5	72.5						
索马里												
南非				81.9	63.4	77.7	54.9	49.9	49.8		0.85	
西班牙				93.4	94.5	83.6	53.0	52.9	53.3		0.80	0.83
斯里兰卡							46.4	57.3	57.3		0.86	0.80
苏丹							37.1	25.1	25.1			
斯威士兰	79.0											
瑞典				92.4	77.1	88.6	60.2	62.0	61.1		1.06	0.91
瑞士				93.7	75.6	90.7	64.1	65.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0									1.08	
塔吉克斯坦		35.0						15.9	15.7		0.66	
坦桑尼亚				23.5	22.1	27.2					0.79	
泰国	4.0	1.0	0.0	84.5	72.1	91.3	32.3	32.9	33.2	0.89	0.89	0.95
东帝汶		37.0										
多哥		39.0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82.5	71.6	79.8	46.2	30.6	33.0			
突尼斯							41.8	35.8	36.1			
土耳其				85.9	70.4	84.3	22.2	27.1			0.96	0.96
土库曼斯坦	25.0											
乌干达				49.6	31.2	49.6						
乌克兰		0.0		60.1	57.3	48.4	53.2	55.7	56.3			
英国				89.8	79.6	91.8	58.2	60.1			0.98	
美国				85.9	81.0	87.8	57.2	56.2	56.0		0.85	
乌拉圭	1.0	1.0	0.0	88.9	80.2	86.8	43.0	38.5			0.99	
乌兹别克斯坦												
委内瑞拉	10.0	13.0		80.8	75.0	76.6	35.6	30.6		0.93	0.94	
越南	50.0	21.0	17.0	82.6	46.3	82.2				0.94	0.89	0.80
西岸和加沙地带			0.0								0.77	0.73
也门共和国	13.0										0.70	
赞比亚	56.0	65.0		64.3	56.2	64.5					0.89	
津巴布韦				25.0	25.1	28.1						

表 5 生产率

	每工人附加值(2005 年美元,每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2 409	2 622	3 885	6 602	10 419	8 110	3 031	13 496	14 021
阿尔及利亚		5 364			23 962			6 979	
安哥拉									
阿根廷	169 887	115 095	134 720	30 924	18 165	24 322	27 453	8 976	14 530
亚美尼亚		2 452	4 636		15 285	28 403		4 803	10 819
澳大利亚	40 133	61 462	70 416	73 971	95 996	90 412	55 153	70 239	89 745
奥地利	32 626	22 953	26 250	83 512	89 626	99 691	95 032	88 496	84 955
阿塞拜疆	903	909	1 627	1 915	18 994	44 347	1 115	1 939	6 286
孟加拉国	394	398		2 406	1 720		1 914	1 348	
巴巴多斯岛	25 047	24 469		19 951	19 992		22 501	23 701	
白俄罗斯	3 261			4 693			5 595		
比利时	51 682	40 155	67 238	103 700	93 212	91 242	104 053	99352	99 674
伯利兹	7 302	7 920		12 726	10 017		12 421	11 235	
贝宁		1 066			1 960			1 684	
不丹		1 474	1 017		6 136	25 363		2 337	4 794
玻利维亚	22 960	827		3 106	3 780		1 971	2 86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2 562	858		20 939	47 317		7 425	12 354	
巴西	2 764	2 618	5 048	17 135	13 428	18 599	15 379	10 798	16 888
保加利亚	3 536	10 254	11 062	4 412	8 675	13 748	7 076	11 058	15 240
布基纳法索	207	348		3 803	6 551		2 813	3 125	
布隆迪									
柬埔寨			615			3 359			2 762
喀麦隆									
加拿大	42 189	46 905	84 494	81 109	112 454	129 063	52 079	67 069	76 038
中非共和国									
乍得	316			5 679			2 875		
智利	8 839	7 230	7 742	20 778	32305	39 481	14 640	18 340	21 281
中国	576	912	1 649	3 077	6 683	10 799	1 972	4 425	7 788
哥伦比亚	143 353	3 298	5 171	9 289	13 472	23 951	7 423	8 389	12 101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		626			16 495			2 705	
哥斯达黎加	6 904	6 367	7 964	13 678	14 495	16 232	11 644	11 324	13 386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5 509	8 061	12 516	16 501	26 744	34397	18 959	33 420	39 446
古巴	2 778	2 396	2 848	7 880	8 687	12 553	10 416	10 477	12375
捷克共和国	10 589	21 146	30 708	13 520	26 449	38 029	17 605	31 396	41 145
丹麦	78 444	46 179	65 098	83 948	107 422	120 024	93 598	95 626	108 138
多米尼加共和国	4 614	5 113	4 814	10 323	14 995	17 142	6 144	10 549	11 879
厄瓜多尔	17 147	1 428	1 942	6 974	13 671	14385	4 995	7 264	8 338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2 299	2 125	2 759	6 839	7 234	10 894	5391	4 543	7 308
萨尔瓦多	3 217	4 267	4 839	6 845	10 911	10 641	7 131	8 254	8 561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286	1 122	1 831	477	1 338	1 992	538	1 770	2 157
埃塞俄比亚	264	216		1 986	678		1 619	1 136	
斐济									
芬兰	44 202	46 796	63 793	97 244	105 407	111 333	75 501	78 173	83 346
法国	61 774	51 238	59 087	84 530	77 422	83 291	98 683	95 476	107 508
加蓬	4 968	4 517		92 742	113 418		24 212	11 700	
冈比亚	665			2 418			7 841		
格鲁吉亚		1 091			10 531			5 537	
德国	39 654	37 059	35 975	83 494	83 183	82 362	102 070	87 032	82 997
加纳		1 204			3 353			3 797	
希腊									
危地马拉	2 485	2 226		5 193	7 885		10 519	7 908	
几内亚	434			6 350			4 665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海地									
洪都拉斯	1 441	1 373		3 167	5364		3 032	5 649	
匈牙利	15 389	24 218	22 162	13 658	27 139	31 452	16 227	30 227	31 631
印度	530	620	1 154	1 919	2 733	4 089	2 395	3 917	6 775
印度尼西亚	1 223	947	2 527	7 292	7 779	15 500	3 393	3 462	5 63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9 417	3 798		16 510	13 386		14 977	9 339	
伊拉克									
爱尔兰	53 117	27 237	22 334	88 974	127 274	172344	60 801	100 012	103 349
以色列									
意大利	36 317	49 362	41 152	68 402	77 744	75 596	85 677	98 654	93 103
牙买加	2 865	3 409	3 123	13 424	14 414	13 113	6 946	10 989	11 501
日本	32 158	28 324	30 531	116 579	93 297	115 414	131 008	99 791	107 592
约旦		10 358	27 585		13 865	26 114		9 033	13 463
哈萨克斯坦		1 725	3 016		18 115	28 778		8 638	13 905
肯尼亚		644			3 941			2 425	
基里巴斯									
韩国	15 783	15 431	14 515	37 835	51 736	91 330	28 615	33 609	30 423
科索沃									
吉尔吉斯斯坦	1 035	921	1 550	1 274	1 399	2 183	1 125	1 166	2 142
老挝	690			5 064			2 400		

（续）

	每工人附加值（2005 年美元，每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拉脱维亚	3 207	5 585	11 889	7 771	14 025	23 498	8 546	20 297	28 582
黎巴嫩									
莱索托	652			6 868			2 365		
利比里亚		888	879		1 717	489		1 146	526
利比亚									
立陶宛	4 290	6 692	10 421	8 886	22 045	31 384	9 674	21 276	27 697
马其顿 前南斯拉夫		6 775	8 551		9 675	14 199		13 631	17 705
马达加斯加		207			2 309			2 047	
马拉维									
马来西亚	9 322	7 825	11 257	18 628	23 171	26 866	13 692	10 460	12 878
马里		881			5 310			2 198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8 652	7 300	6 256	9 137	10 423	14 876	13 003	13 840	17 007
墨西哥	2 494	5 183	6 269	13 386	27 286	27 497	13 003	22 058	21 103
马尔代夫	929	1 055	1 468	2 606	2 262	3 040	1 148	3 305	6 502
蒙古	1 779	1 355	1 825	4 588	5 234	8 190	2 048	2 385	3 915
黑山共和国									
摩洛哥	13 450	1 949	2 764	5 359	8 431	10 669	4 611	9 749	11 517
莫桑比克		188			4 724			1 556	
缅甸	4 933			4 676			6 976		
纳米比亚	2 600	3 717	8 562	18 084	22 451	30 857	11 804	12 665	11 758
尼泊尔									
荷兰	71 226	56 148	54 577	97 454	97 381	124 750	79 808	82 539	86 039
新西兰	36 258	45 578		52 576	57 432		49 929	57 782	
尼加拉瓜	1 506	1 539		5 147	3 503		3 252	2 359	
尼日尔									
尼日利亚		1 795			8 285			1 333	
挪威	56 806	72 622	85 197	138 356	290 065	318 919	82 263	105 301	118 318
阿曼	9 161			158 023			14 500		
巴基斯坦	1 139	1 139	1 187	2 564	3 092	3 519	2 929	3 172	3 968
巴拿马	3 933	4 407	4 143	10 280	11 691	13 451	12 711	14 334	18 195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2 743	2 149	5 335	7 104	4 204	5 493	5 952	3 642	5 241
秘鲁	58 831	46 902	61 865	7 986	9 308	12 014	5 533	5 007	5 279
菲律宾	1 850	1 197	1 724	7 581	7 197	9 750	4 380	3 716	5 093
波兰	4 038	5 933	7 196	12 748	23 585	27 886	14 647	27 215	30 078
葡萄牙	15 813	9 349	9 359	30 226	32 333	34 814	40 227	50 158	51 660
罗马尼亚	2 410	3 564	4 085	6 205	13 115	15 498	5 560	16 253	27 896
俄罗斯联邦	2 951	5 713	7 744	7 167	14 600	19 908	7 859	10 919	16 432
卢旺达		295			2 134			1 698	
沙特阿拉伯		33 414	30 025		146 499	120 850		19 343	20 513
塞内加尔		857			3 030			3 406	
塞尔维亚		5 228	5 949		10 346	16 543		11 991	18 115
塞拉利昂		395			2 099			750	
新加坡	9 160	3 408	2 873	67 962	90 290	87 976	61 005	55 810	64 964
斯洛伐克共和国	256	539	45 309	377	691	33 247	422	790	35 907
斯洛文尼亚	53	51	11 699	99	156	41 034	161	202	48 714
索马里									
南非		6 241	10 725		22 418	22 059		18 468	16 554
西班牙	32 396	41 405	48 517	63 427	64 101	80 812	70 171	66 716	69 968
斯里兰卡	1 545	1 366	2 015	2 866	4 160	6 217	3 686	5 467	7 548
苏丹									
斯威士兰									
瑞典	84 800	57 864	93 839	98 760	119 616	135 069	78 875	87 010	94 173
瑞士	61 238	34 325	48 439	124 652	122 634	166 833	120 305	106 178	130 55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7 111	34 206	61 887	9 922	44 830	40 385	17 821	31 138	38 924
塔吉克斯坦	245	355		923	1 624		379	1 648	
坦桑尼亚		303			4 392			1 388	
泰国	1 294	1 252	1 934	14 421	11 532	15 349	12 577	6 490	8 209
东帝汶									
多哥		619			2 450			1 119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 466	3 403	3 883	28 504	54 117	82 586	12 489	17 024	24 172
突尼斯									
土耳其	4 162	7 974	10 596	16 599	25 270	27 153	16 311	29 236	33 775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293	395		3 951	4 542		1 655	1 870
乌克兰	1 405	2 366	3 997	3 199	5 825	11 824	6 283	4 419	7 756
英国	55 402	58 380	56 013	68 950	92 373	88 189	57 625	86 429	75 957
美国	41 807	57 756	59 247	85 509	100 547	118 051	77 029	93 562	97 669
乌拉圭	35 312	26 313		21 948	15 641		18 551	10 712	
乌兹别克斯坦	1 312			2 437			1 900		
委内瑞拉		4 708	5 358		20 515	36 666	10 073	7 370	
越南	351	538		2 391	2 846		1 979	1 862	
西岸和加沙地带									
也门共和国	6 093			30 134			19 342		
赞比亚		534			7 446			3 541	
津巴布韦		285			2 776			3 404	

（续）

	每工人附加值（2005 年美元，每年）			微型企业就业（非农就业的百分比）/%			正规就业（在非农就业中的百分比）/%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2 935	6 784	8 379						
阿尔及利亚		11 055							
安哥拉									
阿根廷	29 815	12 243	17 954		57. 7	55. 9	44. 0		49. 7
亚美尼亚		5 399	11 088						49. 6
澳大利亚	58 730	75 297	89 305		31. 7	30. 7			
奥地利	86 977	85 765	85 704		32. 1	34. 6			
阿塞拜疆	1 026	3 584	9 545						26. 5
孟加拉国	967	948							
巴巴多斯岛	19 868	20 723							
白俄罗斯	4 565								
比利时	102 383	96 998	96 414		253	24. 0			
伯利兹	11 094	10 353							
贝宁		1 429							
不丹		2 798	3 525						
玻利维亚	2 720	2 242			793	80. 5		75. 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10 235	14 150							
巴西	12 450	9 633	15 252	60. 0	57. 0	55. 3	47. 3		42. 2
保加利亚	5 391	10 176	14 455		25. 2	22. 9			
布基纳法索	523	868							
布隆迪									
柬埔寨			1 270						
喀麦隆					95. 3				
加拿大	58 070	76 449	88 633						
中非共和国									
乍得	807								
智利	15 308	20 223	23 977	52. 1	44. 9	44. 7	33. 1		
中国	1 500	3 386	6 145						
哥伦比亚	9 380	8 253	13 223			70. 0	53. 4	63. 5	59. 6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		4 819							
哥斯达黎加	11 089	10 938	13 136	52. 1	51. 5	47. 9	39. 6	39. 9	43. 3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15 556	27 173	34 043						
古巴	7 923	8 521	10 912						
捷克共和国	15 574	29 321	39 648		31. 6	30. 7			
丹麦	90 386	96 856	109 655						
多米尼加共和国	6 918	10 290	11 621						48. 5
厄瓜多尔	6 160	6 486	7 810		42. 2	45. 5		71. 3	60. 9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4 658	4 431	6 677						51. 2
萨尔瓦多	6 000	8 041	8 216						66. 4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492	1 591	2 073		21. 4	21. 1			
埃塞俄比亚	404	366							
斐济									
芬兰	78 868	84 467	88 167						
法国	93 016	89 373	100 485		28. 7	29. 2			
加蓬	24 595	22 182							
冈比亚	2 773								
格鲁吉亚		3 530							
德国	93 510	84 878	81 878		26. 2	22. 6			
加纳		2 257							
希腊					56. 8	54. 3			
危地马拉	5 276	6 028							
几内亚	1 581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海地									
洪都拉斯	2 475	3 921		58. 7	60. 6	66. 3	49. 0	54. 6	73. 9
匈牙利	15 312	28 939	31 419		37. 3	35. 8			
印度	1 163	1 846	3 318		79. 4	77. 8		83. 5	
印度尼西亚	3 140	3 176	6 273					63. 2	61. 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3 874	9 318							
伊拉克					72. 4				
爱尔兰	68 280	103 279	113 892		34. 5	41. 1			
以色列									
意大利	77 205	90 200	86 879		47. 7	47. 8			
牙买加	7 303	10 241	10 099						
日本	120 171	93 118	105 389						
约旦		10 087	16 149						
哈萨克斯坦		8 132	13 573						
肯尼亚		1 445							
基里巴斯									
韩国	29 831	37 049	39 749						
科索沃									
吉尔吉斯斯坦	1 108	1 124	1 949						
老挝	1 053								

（续）

	每工人附加值（2005 年美元，每年）			微型企业就业（非农就业的百分比）/%			正规就业（在非农就业中的百分比）/%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拉脱维亚	7 344	16 901	25 859		29. 9	26. 8			
黎巴嫩									
莱索托	2 064								34. 9
利比里亚		650	696						60. 0
利比亚									
立陶宛	8 412	19 457	26 750		20. 2	17. 5			
马其顿 前南斯拉夫		10 994	14 788		29. 0				12. 6
马达加斯加		585						73. 6	
马拉维									
马来西亚	14 397	13 983	16 556						
马里		1 576						81. 3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10 838	12 093	15 443		35. 5				
墨西哥	10 565	20 886	20 837	71. 0	59. 8	63. 4		54. 8	53. 7
马尔代夫	1 273	2 216	4 249						15. 9
蒙古	2 381	2 457	3 720						
黑山共和国									
摩洛哥	5 349	5 975	7 741						
莫桑比克		543							
缅甸	5 406								
纳米比亚	9 068	11 449	14 685						43. 9
尼泊尔						93. 0			
荷兰	81 927	80 589	83 545						
新西兰	49 224	59 050							
尼加拉瓜	2 639	2 350						58. 8	65. 7
尼日尔									
尼日利亚		2 362							
挪威	93 069	143 121	158 628						
阿曼	25 608								
巴基斯坦	2 047	2 282	2 627		94. 2	96. 2			78. 4
巴拿马	10 430	11 998	14 765	44. 8	50. 5	45. 1	33. 7	44. 1	43. 8
巴布亚新几内亚						78. 3			
巴拉圭	5 294	3 254	6 106						70. 7
秘鲁	6 704	6 508	8 211					78. 0	70. 6
菲律宾	3 783	3 404	4 612						70. 1
波兰	11 599	22 272	26 446		43. 0	43. 5	12. 7		
葡萄牙	34 097	40 237	42 290		43. 7	43. 0			
罗马尼亚	4 500	11 251	17 157		20. 2	19. 4			
俄罗斯联邦	6 594	11 503	16 536						
卢旺达		607							
沙特阿拉伯		45 337	40 961						
塞内加尔		1 972							
塞尔维亚		9 975	14 802			47. 8			6. 1
塞拉利昂		607		85. 3					
新加坡	63 970	62 872	69 405						
斯洛伐克共和国	389	738	35 205		42. 7	43. 7			
斯洛文尼亚	122	170	42 848		23. 9	25. 6			
索马里									
南非		18 701	17 639		46. 2				32. 7
西班牙	64 748	64 666	71 604		41. 1	42. 6			
斯里兰卡	2 484	3 583	5 238						62. 1
苏丹									
斯威士兰									
瑞典	84 223	93 600	102 345						
瑞士	119 203	108 315	129 18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5 173	35 585	43 556						
塔吉克斯坦	376	920							
坦桑尼亚		768				87. 6			76. 2
泰国	7 079	5 246	7 083						42. 3
东帝汶					96. 6	100. 0			
多哥		931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5 785	27 808	42 053						
突尼斯									
土耳其	10 987	22 158	26 490		54. 6	46. 6			30. 6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789	1 057						68. 5
乌克兰	2 099	4 322	8 090						
英国	60 062	86 592	77 322		27. 6	28. 2			
美国	78 008	95 269	100 365						
乌拉圭	20 492	12 684			54. 5	51. 3		44. 6	39. 8
乌兹别克斯坦	1 666								
委内瑞拉	11 929	13 319			60. 3				47. 5
越南	885	1 370							68. 2
西岸和加沙地带									57. 2
也门共和国	13 181								
赞比亚		1 649							69. 5
津巴布韦		945						51. 6	

表 6　社会凝聚力

	信任(在最近调查中的百分比)/%			公民参与(在最近调查中的百分比)/%			工资不平等(90%/10%比率)		
	就业	失业	脱离劳动力	就业	失业	脱离劳动力	1995	2005	2010
阿富汗								2. 5	
阿尔巴尼亚	22. 4	27. 5	26. 8				2. 6	3. 9	
阿尔及利亚	10. 1	10. 6	13. 9						
安哥拉									
阿根廷	19. 9	10. 1	15. 5	32. 4	32. 0	28. 7		5. 8	5. 5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49. 2	38. 5	41. 2	64. 9	28. 7	55. 0		10. 3	8. 3
奥地利				41. 9				4. 4	5. 2
阿塞拜疆							10. 0		
孟加拉国	24. 8	24. 6	23. 7					3. 8	3. 8
巴巴多斯岛							6. 1		
白俄罗斯								4. 7	
比利时			29. 5					2. 9	3. 0
伯利兹							5. 7		
贝宁				39. 5	37. 7	37. 7			
不丹									
玻利维亚	21. 6	16. 3	21. 9	31. 2	29. 3	30. 9	10. 0	8. 5	7. 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3. 9	16. 1	18. 0						
博茨瓦纳	17. 3	12. 3		55. 0	42. 3	55. 3			28. 3
巴西	8. 4	11. 3	10. 4	66. 8	50. 0	72. 3	10. 4	7. 4	6. 0
保加利亚	21. 3	23. 0	22. 9	11. 4	6. 6	5. 8		3. 6	4. 5
布基纳法索	12. 3	13. 3	17. 5	43. 7	35. 2	33. 0			
布隆迪									
柬埔寨							20. 0	6. 9	8. 6
喀麦隆								10. 4	
加拿大	44. 9	36. 5	40. 3	72. 4	46. 6	63. 4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14. 1	18. 5	10. 2	45. 5	44. 2	42. 2	7. 0	5. 5	5. 5
中国	52. 7	43. 1	53. 0	15. 7	26. 0	23. 5		5. 6	4. 0
哥伦比亚	16. 0	12. 5	11. 4	36. 2	33. 1	39. 1		6. 5	6. 6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									
哥斯达黎加	10. 1	4. 6	6. 9	30. 9	20. 3	28. 0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2. 9	
古巴									
捷克共和国									
丹麦				47. 3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12. 2	8. 7	11. 6	19. 8	0. 0	16. 8	6. 5	6. 6	4. 9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16. 9	17. 3	20. 0	11. 8	4. 6	3. 0			
萨尔瓦多	15. 8	12. 2	13. 7	34. 1	35. 9	27. 3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4. 3	4. 3
埃塞俄比亚	21. 4	27. 2	26. 9	49. 5	36. 5	52. 6		11. 8	
斐济									
芬兰	65. 9	44. 5	52. 6	54. 4	42. 3	43. 0			
法国	19. 4	18. 5	17. 7	43. 6	27. 5	34. 7		4. 7	4. 9
加蓬								10. 7	
冈比亚									
格鲁吉亚	21. 2	10. 4	21. 7	7. 4	4. 7	3. 5			7. 4
德国	40. 6	22. 6	34. 1	47. 1	25. 5	44. 6		6. 3	
加纳	8. 7	8. 0	8. 7	81. 7	76. 2	81. 2		9. 1	
希腊				8. 3				4. 3	4. 2
危地马拉	17. 5	24. 1	10. 6	35. 9	32. 0	35. 0		6. 2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海地									
洪都拉斯	18. 2	13. 8	16. 4	51. 0	59. 3	49. 8	6. 6	9. 7	8. 3
匈牙利								4. 2	
印度	23. 4	19. 1	27. 1	54. 2	40. 6	34. 6	12. 1	11. 4	10. 7
印度尼西亚	45. 7	25. 0	40. 7	60. 6	51. 2	58. 9	10. 4	4. 2	8. 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1. 2	10. 3	10. 0	50. 0	43. 4	33. 5			
伊拉克	36. 7	46. 0	43. 2					4. 4	
爱尔兰				34. 7				5. 8	5. 6
以色列	27. 5	17. 6	18. 1						
意大利	31. 3	26. 3	26. 1	44. 4	22. 3	35. 7		3. 4	3. 2
牙买加							5. 7		
日本	39. 3	12. 5	40. 3	34. 1	31. 3	39. 7			
约旦	33. 6	27. 1	23. 9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73. 3	74. 3	70. 1		13. 3	
基里巴斯									
韩国	30. 0	40. 3	25. 6	36. 4	23. 6	33. 5			
科索沃								3. 5	
吉尔吉斯斯坦	17. 6	12. 4	17. 4						
老挝									

（续）

	信任（在最近调查中的百分比）/%			公民参与（在最近调查中的百分比）/%			工资不平等（90%/10%比率）		
	就业	失业	脱离劳动力	就业	失业	脱离劳动力	1995	2005	2010
拉脱维亚						4.7	6.1		
黎巴嫩									
莱索托	3.3	4.0		44.6	44.6	44.9			
利比里亚				83.8	78.5	80.6			
利比亚									
立陶宛								4.9	43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11.7	14.7	15.0	12.3				2.7	
马达加斯加				12.5	10.3	9.4			
马拉维	44.4	45.3		75.3	62.9	61.7		10.1	
马来西亚	9.5	9.6	7.7	29.4	21.2	28.0			
马里	16.6	20.0	17.1	65.6	59.4	51.6	24.4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5.8	6.7
墨西哥	17.5	15.1	12.8	64.6	50.5	59.7	8.4		6.5
马尔代夫	16.0	14.6	22.3	36.0	18.9	33.9		8.1	
蒙古									3.6
黑山共和国								2.9	
摩洛哥	12.3	20.8	17.5	17.0	8.7	11.1			
莫桑比克				62.8	58.1	52.6	6.7		10.5
缅甸									
纳米比亚	33.3	36.2		35.2	33.4	39.1			
尼泊尔									6.0
荷兰	47.0	25.8	42.7	60.3	31.3	57.0			
新西兰									
尼加拉瓜	21.5	24.2	20.5	46.8	42.7	42.7	6.8	5.8	
尼日尔							7.0		
尼日利亚	24.9	27.2	26.3	63.8	60.0	61.1	5.0	28.8	
挪威	77.4	66.7	66.3	58.3	45.5	46.6			
阿曼									
巴基斯坦	32.5	25.4	29.7					6.3	6.4
巴拿马	27.6	12.5	21.7	25.6	34.9	22.9	7.6	6.7	5.5
巴布亚新几内亚									10.9
巴拉圭	5.5	9.3	6.3	45.1	52.2	38.8	6.8	6.5	5.3
秘鲁	5.7	9.0	7.1	54.7	36.4	42.6	6.3	6.8	6.1
菲律宾	8.1	12.4	6.8					6.1	6.3
波兰	19.3	21.8	18.9	28.2	15.6	27.7		5.4	5.2
葡萄牙				8.2				4.9	4.3
罗马尼亚	18.7	14.3	22.1	19.6	6.7	8.4	3.2	5.5	3.7
俄罗斯联邦	26.7	18.1	26.7	13.2	6.6	17.7			
卢旺达	4.0		8.4	70.8		70.8	37.8	31.3	
沙特阿拉伯	52.6	62.7	52.4						
塞内加尔				50.3	42.9	40.0			
塞尔维亚	15.9	11.1	15.8	18.6	15.1	9.8			3.3
塞拉利昂								4.7	
新加坡	15.8	16.7	18.7						
斯洛伐克共和国								3.0	
斯洛文尼亚	17.7	13.3	19.2	51.4	32.6	38.6		3.2	3.2
索马里									
南非	16.1	21.6	19.3	66.3	52.9	66.2		14.0	
西班牙	22.0	23.8	17.4	28.4	24.9	22.2		4.5	4.2
斯里兰卡								6.2	5.7
苏丹									
斯威士兰									
瑞典	72.3	43.8	60.4	63.7	52.3	59.9		4.3	3.8
瑞士	59.4	7.5	45.6	69.5	51.2	64.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3	
塔吉克斯坦								15.0	
坦桑尼亚	7.6	9.3	6.7	79.9	75.1	74.8		12.9	13.3
泰国	42.7	32.4	44.4	35.4	24.7	37.9	8.9	10.8	9.6
东帝汶								8.5	5.5
多哥								14.6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8	3.0	4.1	59.0	56.0	63.6			
突尼斯									
土耳其	4.8	3.3	5.1	13.8	6.6	4.0		4.0	4.2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7.0	4.7	9.6	60.4	55.2	54.3		13.6	
乌克兰	29.1	35.7	25.3	19.2	22.1	13.9		4.7	
英国	31.0	19.5	32.0	66.2	38.2	57.5		5.3	
美国	40.2	36.5	40.7	66.1	47.0	63.2		12.5	
乌拉圭	30.2	15.7	29.4	29.5	29.8	30.9	6.0	6.4	5.8
乌兹别克斯坦									
委内瑞拉	16.9	16.7	13.4	33.7	27.3	30.5	4.6	5.5	
越南	51.9	52.2	53.7	49.6	51.5	59.0	7.7	8.0	8.7
西岸和加沙地带								3.8	4.0
也门共和国	42.4								
赞比亚	11.5	12.5	10.6	81.0	70.3	78.7		11.1	
津巴布韦	13.9	10.4	5.3	59.4	61.3	65.4			

（续）

	青年失业率（在青年劳动力中的百分比）/%						既不就读也没参加工作的青年（在青年群组中的比例）/%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阿富汗								8.2			50.0	
阿尔巴尼亚		22.8	26.2		16.6	28.3	50.2	33.7		41.7	35.1	
阿尔及利亚		42.8			46.3							
安哥拉												
阿根廷	29.9	21.6	18.8	37.6	28.0	24.7		14.7	14.8		24.8	24.8
亚美尼亚		47.2	37.4		69.4	54.7		52.2		67.2		
澳大利亚	15.9	10.9	11.9	14.8	10.4	11.1		15.3	18.1		18.5	19.0
奥地利	4.8	10.7	8.9	5.6	9.9	8.8		14.5	18.5		14.5	20.0
阿塞拜疆		18.2	13.4		10.4	15.5	49.3				57.8	
孟加拉国	8.0	8.0		5.7	13.6					28.9		
巴巴多斯岛	33.3	24.1		42.4	28.7		23.1					
白俄罗斯								53.4			60.3	
比利时	19.7	21.0	22.4	23.7	22.1	22.4		10.6	12.7	15.1	11.6	
伯利兹	19.1	13.8		31.7	28.8		26.6			69.2		
贝宁								14.9		20.1		
不丹		5.5	10.7		7.2	14.7		17.7		22.3		
玻利维亚	5.2			7.0			3.5	5.5	15.8	17.0	18.3	18.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60.4	44.7		65.6	51.9		32.0			33.7	38.9
博茨瓦纳	33.5			42.4					25.7			
巴西	9.7	15.3	13.9	14.1	24.9	23.1	10.4	11.5	12.1	28.2	26.0	24.3
保加利亚		23.4	24.1		21.0	21.7	33.5	29.3	17.4	36.0	32.3	29.6
布基纳法索		4.6			2.9		5.3	5.7		17.5	15.0	
布隆迪												
柬埔寨		3.5			3.3	7.9	4.0	3.6	15.2	11.5	10.6	
喀麦隆							20.0	7.3		34.2	19.6	
加拿大	16.3	14.2	17.1	13.2	10.6	12.4						
中非共和国								26.4			27.0	
乍得												
智利	10.8	17.3	16.6	12.7	23.8	21.7	11.6	13.5	17.6	30.4	24.5	26.8
中国								9.8	12.8		9.4	11.0
哥伦比亚	15.6	17.9	18.2	21.8	28.3	29.9		16.9	14.5		38.4	33.3
刚果民主共和国								13.2			23.1	
刚果共和国								6.0			13.4	
哥斯达黎加	10.2	11.3	9.6	13.0	21.5	13.4	11.5	9.3	12.8	37.5	28.2	27.1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30.2	31.1		35.1	35.0		20.8			20.5	
古巴		3.5	2.8		4.4	3.5						
捷克共和国	7.2	19.4	18.3	8.7	19.1	18.5		11.5	9.6		15.3	12.3
丹麦	7.8	8.6	16.1	12.3	8.6	11.8		9.5	11.9		15.1	14.5
多米尼加共和国	20.9	21.2		41.5	44.5		10.6	14.5	14.1	31.7	28.3	28.1
厄瓜多尔	13.0	12.2	11.7	18.6	20.6	18.1	6.8	7.9	8.3	31.1	27.6	23.6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23.3			62.2			15.2			45.7	
萨尔瓦多	13.4	11.3		13.0	8.4		13.0	14.1	13.5	41.7	39.3	36.7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21.0	16.6	35.4	15.4	15.1	30.0		16.0	10.6		13.3	11.2
埃塞俄比亚		4.1			11.2		7.5	1.8		43.6	10.9	
斐济	11.3			16.8			24.0		19.6	49.9		36.7
芬兰	25.7	18.4	21.6	28.7	19.4	18.9		20.2	17.2		15.1	13.1
法国	23.7	19.5	22.2	30.6	21.9	23.7		8.6	10.5		12.7	10.5
加蓬	41.7			40.2				20.0			31.3	
冈比亚												
格鲁吉亚		26.8	32.4		30.6	40.7						
德国	8.3	16.1	10.4	8.0	14.0	8.8		15.3	13.0		9.0	8.5
加纳								12.9			20.8	
希腊	19.4	18.7	26.7	37.7	34.8	40.6		17.3	16.1		21.3	20.2
危地马拉								4.6			40.7	
几内亚							6.6			16.9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海地												
洪都拉斯	4.3	5.2		6.9	11.2		9.3	10.2	10.0	51.7	43.0	42.7
匈牙利	20.7	19.7	27.9	15.6	19.1	24.9		13.6	13.1		12.4	19.4
印度	8.3	9.9	9.9	8.0	10.3	11.3	9.7	10.0	10.0	56.1	51.8	50.5
印度尼西亚	14.3	28.8	21.6	17.0	37.7	23.0	19.3	23.3	13.8	45.1	44.0	33.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1.2	20.2		34.0	33.9		21.6			55.1	
伊拉克								25.6			75.6	
爱尔兰	20.3	9.1	34.0	17.4	7.9	21.5		9.9	17.0		11.8	17.1
以色列	12.8	17.0	14.5	17.1	18.6	12.9						
意大利	29.8	21.5	26.8	38.2	27.4	29.4		20.5	20.7		22.6	20.6
牙买加	25.1	22.0	22.5	44.6	36.3	33.1	20.5			44.0		
日本	6.1	9.9	10.4	6.1	7.4	8.0						
约旦		23.7	22.6		47.9	45.9						
哈萨克斯坦		13.1	6.8		15.7	8.2	54.0	13.8		56.9	14.9	
肯尼亚							24.5	16.3		36.8	31.6	
基里巴斯								21.8			22.4	
韩国	7.8	12.2	11.2	5.3	9.0	9.0						
科索沃								37.7			59.3	
吉尔吉斯斯坦		13.3			16.2		24.9			36.7		5.3
老挝	6.4			3.9					2.1			

（续）

	青年失业率（在青年劳动力中的百分比）/%						既不就读也没参加工作的青年（在青年群组中的比例）/%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拉脱维亚	34.2	11.7	35.4	34.1	16.1	33.5		10.2	11.8		14.0	15.8
黎巴嫩		20.3			19.0			18.1			33.3	
莱索托	37.9		29.0	58.5		41.9						
利比里亚		5.7	3.4		3.7	6.6		6.8			15.2	
利比亚												
立陶宛	28.5	16.0	38.4	21.7	15.3	30.3		11.9	8.0		12.3	3.6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63.0	53.8		62.1	53.4						
马达加斯加		1.7			2.8		8.8			12.2		
马拉维							19.4	5.4		44.9	11.1	
马来西亚		10.5	10.3		11.5	11.8			12.2			21.4
马里							10.2	26.7		19.8	47.6	
毛里塔尼亚									23.9			34.6
毛里求斯	21.4	20.5	19.4	28.1	34.3	29.0		27.6	26.1		45.7	39.0
墨西哥	9.2	6.1	9.0	15.3	7.4	10.1	11.3	10.9	12.0	41.9	34.3	33.7
马尔代夫		19.1	20.1		18.3	15.0		5.8			6.6	
蒙古		19.5			20.7				14.0			16.9
黑山共和国								32.3			24.9	
摩洛哥		16.2	22.8		14.4	19.4						
莫桑比克							15.3	9.0	5.9	19.7	11.5	8.3
缅甸												
纳米比亚	29.6	36.7	54.6	33.8	47.0	63.8	20.4			29.2		
尼泊尔							33.5	8.4	8.3	36.2	19.6	15.4
荷兰	11.5	8.0	8.8	12.7	8.4	8.6		8.3	11.9		10.7	12.8
新西兰	12.3	9.4	16.8	12.2	10.1	17.4						
尼加拉瓜	22.4	8.1		24.7	9.7		20.9	10.5		52.3	39.4	
尼日尔							15.2			45.3		
尼日利亚							7.2	22.2		43.4	36.1	
挪威	11.9	12.5	10.9	11.8	11.5	7.7		7.4	17.8		6.1	20.5
阿曼												
巴基斯坦	7.6	11.0	7.0	18.1	14.9	10.5		11.4	9.9		65.8	59.6
巴拿马	23.0	18.5	11.7	35.6	29.6	21.1	15.4	11.3	10.6	36.4	30.1	30.8
巴布亚新几内亚									17.3			18.7
巴拉圭	5.5	12.1	8.7	7.3	20.5	16.3	6.3	9.7	9.9	27.7	29.7	28.3
秘鲁	9.8	16.2	12.5	13.6	17.4	15.6	11.9	15.4	11.7	25.3	28.7	21.6
菲律宾	14.4	14.9	16.2	19.1	18.9	19.3	10.6	10.7	19.9	24.9	27.4	31.9
波兰	29.0	36.7	22.4	33.3	39.2	25.4		16.4	8.5		17.7	12.3
葡萄牙	14.1	13.7	21.1	17.7	19.1	23.7		12.3	13.4		13.3	15.2
罗马尼亚	18.8	21.5	22.3	23.1	18.4	21.3	30.3	2.0	11.3	32.3	6.3	16.7
俄罗斯联邦	17.8	14.5	16.9	20.0	17.2	17.5						
卢旺达	1.0			0.5			13.9	4.1		15.5	4.5	
沙特阿拉伯			23.6			45.3						
塞内加尔		11.9			20.1		13.4	19.3		50.5	58.7	
塞尔维亚		43.2	31.0		55.5	41.3			23.4			19.1
塞拉利昂		7.3			3.5			16.0			25.6	
新加坡	4.5	6.4	9.8	5.5	11.6	16.6						
斯洛伐克共和国	26.0	30.7	34.7	23.1	28.8	32.0		12.5	6.6		11.4	8.8
斯洛文尼亚	18.1	14.5	15.2	19.6	17.8	13.8		6.8	5.1		5.3	4.1
索马里												
南非		42.7	47.2		54.7	54.6	18.0	27.4		27.0	36.3	
西班牙	33.6	16.7	43.2	49.2	23.5	39.8		12.4	19.6		15.8	18.1
斯里兰卡		20.4	17.1		37.0	27.9	4.0	19.3	14.6	28.9	32.9	36.1
苏丹												
斯威士兰	44.2			43.0			2.2			13.4		
瑞典	20.6	22.3	26.7	18.4	21.6	23.7		14.5	15.7		11.7	13.7
瑞士	5.7	8.5	7.3	5.3	9.1	8.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2.7	15.3		46.1	40.2		13.3			55.4	
塔吉克斯坦								26.9			43.4	
坦桑尼亚		7.4			10.1		3.2	5.3	9.5	17.5	9.1	16.9
泰国	2.6	4.9	3.7	2.3	4.6	5.1	5.4	1.6	2.5	13.0	11.5	12.0
东帝汶								10.4	15.6		26.5	22.5
多哥								6.2			13.0	
汤加	32.0	9.9		27.0	15.1		22.9			34.9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28.3	12.9	8.3	35.2	21.6	12.9						
突尼斯	33.3	31.4		29.0	29.3							
土耳其	16.9	19.5	21.0	13.1	20.6	23.1		27.3	21.9		57.9	46.9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3.8			13.5	
乌克兰		15.2			14.4			17.6			24.2	
英国	17.9	13.6	21.3	12.2	10.7	16.9		12.7	12.8		18.4	16.4
美国	12.5	12.4	20.8	11.6	10.1	15.8		10.7			13.8	
乌拉圭	21.3	25.4	16.9	29.2	34.9	26.5	15.3	15.0	14.2	25.2	23.5	22.1
乌兹别克斯坦												
委内瑞拉	20.2	14.3	12.3	35.2	22.0	15.9	15.0	10.2		36.0	20.5	
越南	3.4	4.4		2.9	4.9		9.3	4.6	4.3	14.3	7.4	7.9
西岸和加沙地带								21.3	19.6		37.9	30.6
也门共和国	20.2			9.8								
赞比亚								21.8			22.4	
津巴布韦	20.7	7.6		12.4	7.6							

表 7 政策与制度

	签署核心 ILO 公约的国家数量	最低工资（2005 年美元，每年）		离开成本（周工资）/美元 1 年以后	离开成本（周工资）/美元 10 年以后	工会会员（工资就业的百分比）/%		
	2012	2007	2010	2012	2012	1995	2005	2010
阿富汗	5	0	0	13.0	30.3			
阿尔巴尼亚	8	1 608	2 160	4.3	34.4			
阿尔及利亚	8	1 848	2 460	17.3	17.3			
安哥拉	8	1 296	1 308	8.6	80.1			
阿根廷	8	2 952	4 824	8.7	52.0			
亚美尼亚	8	540	948	13.0	13.0			
澳大利亚	7	13 464	13 896	5.0	16.0	32	22	19
奥地利	8	6 780	7 704	2.0	2.0	41	33	28
阿塞拜疆	8	648	1 068	21.7	21.7			
孟加拉国	7	288	252	9.3	54.3			
巴巴多斯岛	8							
白俄罗斯	8	936	1 104	21.7	21.7			
比利时	8	15 996	18 804	5.0	8.0	56	53	52
伯利兹	8	3 300	3 156	2.0	14.0			
贝宁	8	600	732	5.6	18.4			
不丹	0	0	0	5.3	10.3			
玻利维亚	8	696	96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8	4 092	4 356	2.0	16.4			
博茨瓦纳	8	1 308	1 164	6.7	42.0	9		
巴西	7	2 136	3 000	5.9	20.9		30	29
保加利亚	8	1 296	1 788	8.6	8.6	39	22	20
布基纳法索	8	672	756	5.4	16.3			
布隆迪	8	48	36	4.3	26.0			
柬埔寨	8	468	444	4.3	34.4			
喀麦隆	8	504	684	5.8	23.8			
加拿大	5	13 104	17 952	2.0	18.0	34	30	30
中非共和国	8	408	432	21.7	21.7			
乍得	8	552	780	4.3	20.6			
智利	8	0	0	8.6	47.6	16	13	14
中国	4	1 080	1 728	8.6	47.6	92	74	79
哥伦比亚	8	2 076	2 628	4.3	30.0			
刚果民主共和国	8	180	696	4.2	16.8			
刚果共和国	8	864	1 296	4.3	17.8			
哥斯达黎加	8	3 600	3 852	7.1	29.5			
科特迪瓦	8	0	0	5.6	22.8			
克罗地亚	8	4 452	5 748	4.3	25.1			
古巴	7							
捷克共和国	8	3 996	4 608	21.7	21.7	44	20	17
丹麦	8	0	0	0.0	0.0	77	72	69
多米尼加共和国	8	2 700	2 436	7.8	45.8			
厄瓜多尔	8	1 800	2 328	14.1	54.2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8	276	336	13.0	67.2			
萨尔瓦多	8	768	936	4.3	42.9			
厄立特里亚	7	0	0	4.0	29.3			
爱沙尼亚	8	3 264	4 236	8.6	17.2	32	9	7
埃塞俄比亚	8	0	0	8.6	30.1			
斐济	8	2 472	3 132	5.3	14.3			
芬兰	8	18 816	22 212	4.3	17.3	80	72	70
法国	8	7 284	8 484	5.2	17.3	9	8	8
加蓬	8	432	516	1.0	26.0			
冈比亚	8	0	0	26.0	26.0			
格鲁吉亚	8	252	264	4.3	4.3			
德国	8	9 816	12 276	6.2	39.0	29	22	19
加纳	7	252	276	10.7	91.0			
希腊	8	10 512	12 756	24.0	24.0	31	25	24
危地马拉	8	1 776	1 992	5.1	50.6			
几内亚	8	0	0	3.2	13.0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7	0	0	13.0	43.3			
海地	8	504	1 356	4.3	17.3			
洪都拉斯	8	1 788	3 504	8.7	52.0			
匈牙利	8	3 516	4 200	4.3	20.9	49	17	17
印度	4	204	264	6.5	25.8			41
印度尼西亚	8	1 104	1 140	17.3	95.3	5	1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5	1 848	3 324	4.3	43.3			
伊拉克	7	0	1 248	0.0	0.0			
爱尔兰	8	16 992	19 308	2.7	11.0	52	37	37
以色列	8	9 036	10 608	8.7	47.7	61	34	
意大利	8	16 236	18 768	6.5	8.7	38	34	35
牙买加	8	2 388	2 232	2.0	26.0			
日本	6	12 108	14 652	4.3	4.3	24	19	18
约旦	7	1 752	2 160	4.3	4.3			
哈萨克斯坦	8	864	1 200	8.7	8.7			
肯尼亚	7	924	1 068	6.5	25.8			
基里巴斯	8	0	0	4.3	4.3			
韩国	4	6 960	6 756	8.6	47.6	13	10	10
科索沃	0		0	13.0	26.0			
吉尔吉斯斯坦	8	96	132	17.3	17.3			
老挝	5	300	684	11.6	84.4			

（续）

	签署核心 ILO 公约的国家数量	最低工资（2005 年美元，每年）		离开成本（周工资）/美元 1 年以后	离开成本（周工资）/美元 10 年以后	工会会员（工资就业的百分比）/%		
	2012	2007	2010	2012	2012	1995	2005	2010
拉脱维亚	8	2 424	3 816	5. 3	14. 0	28	19	15
黎巴嫩	7	2 244	3 408	4. 3	13. 0			
莱索托	8			6. 3	24. 3			
利比里亚	6	588	564	8. 3	44. 3			
利比亚	8							
立陶宛	8	2 460	3 552	17. 3	30. 3	33	10	9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8	1 104	1 824	8. 7	17. 3			
马达加斯加	8	288	420	3. 1	21. 0			
马拉维	8	192	252	6. 3	34. 3			
马来西亚	5	0	0	5. 7	41. 3	13	10	
马里	8	156	9. 5	18. 4				
毛里塔尼亚	8	876	888	5. 4	16. 3			
毛里求斯	8	1 188	1 692	4. 7	18. 6			
墨西哥	6	1 368	1 332	14. 6	30. 0	18	18	
马尔代夫	8	648	1 044	18. 3	27. 3			
蒙古	8	660	888	8. 7	8. 7			
黑山共和国	8	732	1 572	28. 1	28. 1			
摩洛哥	7	2 364	2 736	6. 5	36. 0			
莫桑比克	8	732	1 032	6. 5	69. 3			
缅甸	2							
纳米比亚	8	0	0	5. 3	14. 3			
尼泊尔	7	360	660	8. 6	47. 2			
荷兰	8	9 672	11 448	4. 3	13. 0	26	21	19
新西兰	6	14 292	14 868	0. 0	0. 0	27	21	21
尼加拉瓜	8	996	1 308	4. 3	21. 7			
尼日尔	8	612	636	9. 5	7. 8			
尼日利亚	8	0	0	6. 3	26. 9			
挪威	8	36 444	45 504	4. 3	13. 0	57	55	54
阿曼	4	3 528	3 924	4. 3	4. 3			
巴基斯坦	8	372	480	8. 6	47. 2			
巴拿马	8	3 192	3 984	3. 4	34. 0			
巴布亚新几内亚	8	456	1 296	3. 7	21. 3			
巴拉圭	8	1 464	1 824	7. 1	52. 9			
秘鲁	8	1 728	2 004	2. 9	17. 1			
菲律宾	8	1 500	1 860	8. 7	47. 7	31	12	
波兰	8	2 724	4 080	8. 7	26. 0	31	19	15
葡萄牙	8	6 660	8 520	17. 3	54. 0	25	21	19
罗马尼亚	8	1 776	2 316	8. 3	8. 3	69	34	33
俄罗斯联邦	8	2 544	3 816	17. 3	17. 3	76	44	43
卢旺达	8	228	0	8. 6	17. 3			
沙特阿拉伯	5	0	0	6. 5	36. 8			
塞内加尔	8	780	828	6. 4	20. 6			
塞尔维亚	8	1 296	2 196	1. 4	14. 4			
塞拉利昂	6	636	552	17. 5	152. 7			
新加坡	5	0	0	1. 0	4. 0	14	19	18
斯洛伐克共和国	8	2 392	4 752	17. 3	26. 0	56	23	17
斯洛文尼亚	8	7 356	11 160	5. 2	17. 3	60	44	27
索马里	3							
南非	8	5 472	5 556	5. 0	14. 0		32	28
西班牙	8	9 432	11 400	5. 0	30. 7	16	15	16
斯里兰卡	8	396	384	15. 2	104. 3	20		
苏丹	7	780	984	4. 3	47. 7			
斯威士兰	8	1 080	912	3. 4	26. 6			
瑞典	8	0	0	4. 3	26. 0	87	76	69
瑞士	8	0	0	8. 7	13. 0	23	19	1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8	1 272	1 440	8. 7	8. 7			
塔吉克斯坦	8	72	156	13. 0	19. 5			
坦桑尼亚	8	408	648	5. 0	14. 0			
泰国	5	744	852	19. 3	54. 3			
东帝汶	4	0	0	4. 3	4. 3			
多哥	8	288	648	5. 6	18. 4			
汤加	0	0	0	0. 0	0. 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8	0	0	8. 6	34. 6			
突尼斯	8	1 176	1 308	6. 0	17. 3			
土耳其	8	4 440	5 436	8. 3	51. 3	13	8	6
土库曼斯坦	7							
乌干达	8	36	36	4. 3	13. 0			
乌克兰	8	888	1 344	13. 0	13. 0			
英国	8	16 044	16 188	1. 0	15. 1	33	29	27
美国	2	13 992	13 488	0. 0	0. 0	15	13	12
乌拉圭	8	1 560	2 532	5. 2	31. 2			
乌兹别克斯坦	7	108	264	17. 3	17. 3			
委内瑞拉	8	2 472	3 504					
越南	5	228	408	8. 7	43. 3			
西岸和加沙地带	0	0	0	8. 7	47. 7			
也门共和国	8	1 140	1 068	8. 6	47. 6			
赞比亚	8	840	624	13. 0	91. 0			
津巴布韦	8	72	2 040	26. 0	143. 0			

（续）

	劳工市场政策（在 GDP 中的支出比例）/%			社会保障缴费（占工资的百分比）/%			社会保障覆盖率（占就业的比例）/%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阿富汗								3. 7	
阿尔巴尼亚					34. 4	23. 1			37. 9
阿尔巴尼亚					34. 0	34. 0			
安哥拉									
阿根廷			4. 97	45. 4	24. 7	24. 8			47. 0
亚美尼亚			1. 89		3. 0	3. 0			32. 1
澳大利亚	1. 95	0. 91	0. 87		9. 0	9. 0		90. 7	
奥地利	1. 97	2. 13	2. 34		37. 7	37. 8		93. 7	
阿塞拜疆					25. 0	25. 0		35. 4	
孟加拉国			0. 09					2. 5	
巴巴多斯岛					17. 6	17. 6		83. 5	
白俄罗斯					22. 0	29. 5			93. 5
比利时	3. 94	3. 41	3. 77		22. 3	22. 4		91. 4	
伯利兹									61. 0
贝宁					14. 0	12. 5		55	
不丹									14. 0
玻利维亚					22. 2	20. 5			12. 2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4. 5
博茨瓦纳								9. 0	
巴西				31. 0	29. 0	29. 3			59. 3
保加利亚					30. 2	21. 3	81. 1		78. 7
布基纳法索					14. 5	18. 0		1. 2	
布隆迪					9. 5	9. 5		3. 5	
柬埔寨									
喀麦隆					12. 0	10. 1		16. 2	
加拿大	1. 83	0. 94	1. 33		14. 6	14. 0	95. 4		87. 4
中非共和国								1. 5	
乍得					8. 5	8. 5		2. 7	
智利			3. 13	24. 7	20. 3	18. 0			57. 7
中国			0. 06		32. 0	32. 0			33. 5
哥伦比亚			0. 00		40. 0	44. 8			27. 8
刚果民主共和国					8. 5	8. 5			14. 2
刚果共和国					14. 3	14. 3			9. 7
哥斯达黎加			0. 60		23. 3	23. 8			58. 6
科特迪瓦				11. 5	13. 0	11. 5			12. 8
克罗地亚					36. 7	36. 7			76. 0
古巴					14. 0	14. 0			
捷克共和国	0. 24	0. 48	0. 72	34. 0	34. 0	31. 5		95. 4	
丹麦	6. 02	3. 92	3. 33		8. 0	8. 0		92. 9	
多米尼加共和国				12. 5					26. 9
厄瓜多尔					24. 5	19. 0		26. 4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35. 0	35. 0			55. 1
萨尔瓦多									22. 9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0. 19	1. 62		34. 5	29. 9		94. 5	
埃塞俄比亚					10. 0	15. 0			
斐济					16. 0	27. 0			
芬兰	5. 27	2. 81	2. 80		32. 9	28. 9		89. 7	
法国	2. 70	2. 49	2. 42		34. 9	34. 9		87. 3	
加蓬									
冈比亚								2. 7	
格鲁吉亚					20. 0	25. 0		29. 2	
德国	3. 51	2. 93	2. 53		41. 5	38. 9		86. 9	
加纳					17. 5	17. 5			8. 7
希腊	0. 78				25. 2	25. 2		86. 0	
危地马拉					15. 5	15. 5			20. 3
几内亚								12. 1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2. 0	
海地					15. 0	15. 0			
洪都拉斯					10. 5	10. 5			17. 3
匈牙利	1. 29	0. 69	1. 15		45. 5	38. 5	79. 9		92. 0
印度			6. 74		22. 2	22. 2		10. 3	
印度尼西亚			0. 15	12. 2	5. 7	5. 7			11.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0. 0	30. 0			
伊拉克									43. 1
爱尔兰	3. 91	1. 46	3. 47		14. 8	14. 8		88. 9	
以色列		1. 02	0. 90		6. 7	8. 9			
意大利		1. 34	1. 86		39. 5	40. 1		90. 1	
牙买加			0. 00	5. 0	5. 0	5. 0		17. 2	
日本	0. 69	0. 60	0. 85		31. 8	31. 9		95. 4	
约旦				15. 0	16. 5	18. 0	25. 6	38. 4	
哈萨克斯坦					10. 0	10. 0			62. 5
肯尼亚			3. 78		10. 0	10. 0	20. 8	7. 5	
基里巴斯					15. 0	15. 0			
韩国		0. 32	1. 02		12. 4	28. 8		49. 5	
科索沃									
吉尔吉斯斯坦				39. 0	29. 0	27. 3	52. 7		40. 4
老挝					9. 5	9. 5			

（续）

	劳工市场政策（在 GDP 中的支出比例）/%			社会保障缴费（占工资的百分比）/%			社会保障覆盖率（占就业的比例）/%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1995	2005	2010
拉脱维亚			0. 11		33. 1	33. 1			91. 7
黎巴嫩					8. 5	8. 5		34. 5	
莱索托								4. 4	
利比里亚									
利比亚					14. 3	14. 3		68. 5	
立陶宛					31. 2	31. 3			82. 9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52. 3
马达加斯加					11. 8	11. 8			5. 3
马拉维									
马来西亚			0. 57		24. 3	24. 3			49. 0
马里			0. 22	20. 0	13. 0	11. 5		7. 9	
毛里塔尼亚					6. 0	6. 0			
毛里求斯			0. 04		9. 0	10. 0			53. 4
墨西哥			0. 04	26. 0	7. 2	7. 2	32. 0	27. 4	
马尔代夫					29. 0	29. 0			56. 7
蒙古									33. 5
黑山共和国									
摩洛哥					12. 9	12. 9		23. 8	
莫桑比克								1. 9	
缅甸									
纳米比亚									9. 6
尼泊尔					20. 0	20. 0			3. 4
荷兰	4. 14	3. 31	2. 92	25. 5	22. 4		90. 7		
新西兰	1. 80	0. 81	0. 84						
尼加拉瓜					32. 8	19. 8			21. 7
尼日尔								1. 9	
尼日利亚					15. 0	15. 0		8. 1	
挪威	2. 33	1. 24		21. 9	21. 9		93. 2		
阿曼									
巴基斯坦			0. 33		14. 0	12. 0			3. 9
巴拿马					18. 0	19. 8			
巴布亚新几内亚					13. 2	14. 4		12. 4	4. 4
巴拉圭					23. 0	23. 0			
秘鲁			0. 06		23. 2	23. 2			21. 7
菲律宾			0. 02		10. 4	10. 6		25. 0	
波兰			0. 30		26. 0	26. 7			81. 4
葡萄牙	1. 32	1. 94	2. 08		34. 8	34. 8		92. 0	
罗马尼亚					36. 8	33. 7			67. 9
俄罗斯联邦					24. 1	33. 3		66. 8	
卢旺达					8. 0	8. 0		4. 6	
沙特阿拉伯					20. 0	20. 0			
塞内加尔					16. 5	16. 5		5. 1	
塞尔维亚			0. 13					45. 0	
塞拉利昂					15. 0	15. 0		5. 5	
新加坡					36. 0	35. 0	66. 2		62. 1
斯洛伐克共和国	1. 18	0. 60	0. 93		29. 6	23. 6	81. 9	78. 9	
斯洛文尼亚		0. 68	0. 96		37. 5	37. 5			87. 4
索马里									
南非					2. 0	2. 0			6. 7
西班牙	2. 36	224	3. 86		37. 8	37. 3	85. 6	69. 4	
斯里兰卡					20. 0	20. 0	21. 3	24. 1	
苏丹					25. 0	27. 0		5. 2	
斯威士兰									15. 4
瑞典	4. 62	2. 44	1. 84		28. 7	28. 7		88. 3	
瑞士	1. 59	1. 66			10. 4	10. 4		95. 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4. 0	24. 0			26. 8
塔吉克斯坦									
坦桑尼亚					20. 0	20. 0		4. 3	
泰国			0. 04		9. 7	9. 7		22. 8	
东帝汶									
多哥								7. 3	
汤加									71. 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 20		9. 9	10. 8			
突尼斯					25. 8	23. 0		48. 6	
土耳其			0. 12		30. 5	38. 0	16. 2		58. 6
土库曼斯坦					23. 0	23. 0			
乌干达			0. 78		15. 0	15. 0		10. 3	
乌克兰			0. 00		38. 8	41. 8			62. 1
英国	1. 13	0. 62	0. 71		23. 8	23. 8		93. 2	
美国	0. 52	0. 37	1. 18		18. 6	18. 6		92. 2	
乌拉圭			0. 01	40. 5	35. 5	32. 0		78. 5	
乌兹别克斯坦					36. 5	29. 0			
委内瑞拉				25. 5	14. 2	23. 9			33. 9
越南				20. 0	20. 0	23. 0	9. 2		19. 3
西岸和加沙地带									14. 0
也门共和国				15. 0			10. 7	10. 4	
赞比亚								10. 9	
津巴布韦					6. 0	8. 0		20. 0	

表 8　相互联系性

	签署的移民公约数量	移入移民（占人口的百分比）/%			移出移民（占当地人口的百分比）/%			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2010	1990	2000	2010	1990	2000	2010	1990	2000	2010
阿富汗	0	0.3	0.3	0.3			6.4			
阿尔巴尼亚	3	2.0	2.5	2.8	6.0	25.5	31.6	17.6	15.4	9.7
阿尔及利亚	2	1.1	0.8	0.7	5.9	4.2	3.3	2.7	2.0	1.3
安哥拉	0	0.3	0.3	0.3	2.5	2.6	2.7	0.1		0.1
阿根廷	1	5.1	4.2	3.6	1.4	1.6	2.4	0.0	0.2	0.2
亚美尼亚	2	18.6	18.7	10.5	14.0	25.1	23.9	4.5	10.2	10.6
澳大利亚	0	21.0	21.0	21.1	2.2	2.9	2.5	0.4	0.4	0.4
奥地利	0	10.3	12.4	15.6	6.8	7.0	7.8	0.4	0.9	0.9
阿塞拜疆	1	5.0	4.3	2.9	13.4	16.3	14.0	0.1	5.2	2.7
孟加拉国	0	0.8	0.8	0.7	4.6	3.7	3.5	3.2	7.2	10.8
巴巴多斯岛	1	8.2	9.2	10.3	27.5	26.6	3.0	3.3	4.5	3
白俄罗斯	0	12.3	11.2	11.5	22.5	16.4	17.4	0.2	0.8	0.7
比利时	1	8.9	8.6	8.9	4.3	3.5	4.4	1.7	1.9	2.2
伯利兹	2	16.1	14.6	13.6			14.4	2.2	4.1	5.7
贝宁	1	1.6	2.1	2.6	5.4	5.2	5.8	5.0	4.0	3.8
不丹	0	4.3	5.6	5.5	2.7	2.1	6.1		0.2	0.3
玻利维亚	1	0.9	1.1	1.5	3.3	4.2	6.5	0.1	3.6	5.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	1.3	2.6	0.7	16.3	26.5	28.1		18.7	11.4
博茨瓦纳	0	2.0	3.2	5.7	5.1	2.2	3.2	1.2	1.3	0.7
巴西	1	0.5	0.4	0.4	0.3	0.5	0.7	0.4	0.4	0.2
保加利亚	0	0.2	1.2	1.4	7.0	8.8	13.9	0.5	5.6	2.9
布基纳法索	3	3.7	4.7	6.3	9.8	10.6	9.3	3.3	1.0	1.1
布隆迪	0	5.9	1.2	0.7	4.1	3.3	4.1		0.0	1.4
柬埔寨	0	0.4	1.9	2.4	2.5	2.3	2.5	0.3	3.2	3.3
喀麦隆	2	2.2	1.5	1.0	1.0	0.9	1.4	0.1	0.5	0.9
加拿大	0	16.2	18.1	21.1	4.7	4.7	4.2			
中非共和国	0	2.1	1.9	1.8	1.2	0.7	2.9	0.0		
乍得	0	1.2	1.3	3.5	2.7	1.7	2.2	0.1		
智利	1	0.8	1.2	1.9	3.6	3.2	3.6		0.0	0.0
中国	0	0.0	0.0	0.1	0.4	0.5	0.6	0.1	1.0	0.9
哥伦比亚	1	0.3	0.3	0.2	3.0	3.7	4.4	0.9	2.3	1.4
刚果民主共和国	0	2.1	1.2	0.7	1.0	1.3	1.4			
刚果共和国	0	5.4	3.3	3.5	2.3	2.0	5.1	0.2	0.2	0.1
哥斯达黎加	0	13.6	7.9	10.5	2.7	2.8	2.9	1.1	2.1	1.5
科特迪瓦	0	14.5	14.1	12.2	2.7	3.7	6.3	1.4	1.0	0.8
克罗地亚	0	9.9	13.9	15.8	8.2	14.1	16.9	2.5	1.6	2.2
古巴	1	0.3	0.2	0.1	7.7	8.6	9.8			
捷克共和国	0	4.1	4.4	4.3	5.8	8.2	3.5	0.3	0.8	0.6
丹麦	0	4.6	6.9	8.7	4.1	4.1	4.9	0.3	0.3	0.2
多米尼加共和国	0	4.0	4.1	4.4	6.0	9.3	9.8	5.1	8.0	6.5
厄瓜多尔	2	0.8	0.8	2.7	2.2	4.9	7.5	1.9	6.7	4.4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1	0.3	0.3	0.3	3.3	3.2	4.4	5.4	5.6	3.5
萨尔瓦多	1	0.9	0.5	0.7	9.7	13.7	17.1	11.2	17.7	16.1
厄立特里亚	0	0.4	0.4	0.3	9.4	8.9	15.2			
爱沙尼亚	0	24.3	18.2	13.6	14.1	17.1	12.8	0.0	1.9	1.7
埃塞俄比亚	0	2.4	1.0	0.7	0.3	0.4	0.7	0.4	1.4	0.8
斐济	0	1.9	2	2.2	9.3	13.7	17.8	1.7	6.2	5.8
芬兰	0	1.3	2.6	4.2	6.2	6.9	6.0	0.1	0.4	0.3
法国	1	10.1	10.3	10.3	2.3	2.7	2.9	0.3	0.6	0.6
加蓬	0	13.7	17.0	18.9	1.7	1.4	2.0	0.1	0.1	
冈比亚	0	12.2	14.3	16.8	2.7	3.1	4.3		9.3	11.0
格鲁吉亚	0	7.0	4.9	3.8	16.6	21.2	19.8	8.1	5.4	6.9
德国	1	7.5	12.1	13.2	4.1	4.7	4.7	0.2	0.3	0.3
加纳	1	4.8	7.9	7.6	2.7	2.6	3.5	0.3	0.9	0.4
希腊	0	4.1	6.7	10.0	9.8	9.3	10.6	2.5	0.5	0.5
危地马拉	2	3.0	0.4	0.4	3.4	4.8	5.7	2.4	11.3	10.2
几内亚	2	4.2	8.5	4.0	7.0	5.3	5.3	0.0	1.4	1.3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2									
海地	0	0.3	0.3	0.3	6.6	8.0	9.2		23.7	22.6
洪都拉斯	1	5.5	0.5	0.3	3.2	5.2	7.0	3.2	18.7	17.3
匈牙利	0	3.3	2.9	3.7	4.0	4.2	4.6	0.3	1.8	1.8
印度	0	0.9	0.6	0.4	0.9	0.9	0.9	1.7	2.7	3.2
印度尼西亚	0	0.3	0.1	0.1	0.6	0.9	1.0	0.3	1.9	1.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	7.8	4.3	2.9	1.3	1.6	1.8	1.8	0.5	0.3
伊拉克	0	0.5	0.6	0.3	3.6	4.1	4.6		2.3	0.1
爱尔兰	0	6.5	10.1	20.1	22.5	24.5	17.1	0.5	0.3	0.3
以色列	1	35.0	35.9	38.6	14.5	15.0	17.9	0.7	0.6	0.6
意大利	2	2.5	3.7	7.4	6.4	5.4	5.3	0.2	0.1	0.3
牙买加	2	0.9	1.0	1.1	20.8	26.1	27.0	11.2	15.8	14.5
日本	0	0.9	1.3	1.7	0.6	0.7	0.6	0.0	0.0	0.0
约旦	0	36.2	40.2	49.2	32.6	27.7	19.3	21.4	19.9	13.8
哈萨克斯坦	0	22.1	19.3	18.9	18.7	21.8	21.9	0.6	0.3	0.2
肯尼亚	2	0.7	2.4	2.0	1.3	1.2	1.1	3.3	4.3	5.5
基里巴斯	0	3	2.4	2	6.8	11.9	6.2	12.3		
韩国	0	1.3	1.2	1.1	3.6	3.9	4.1	0.7	0.8	0.9
科索沃	0								18.8	16.7
吉尔吉斯斯坦	2	14.2	7.6	4.1	12.7	13.2	10.6	0.1	13.1	26.6
老挝	0	0.5	0.4	0.3	6.5	6.0	5.6	1.3	0.0	0.6

（续）

	签署的移民公约数量	移入移民（占人口的百分比）/%			移出移民（占当地人口的百分比）/%			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2010	1990	2000	2010	1990	2000	2010	1990	2000	2010
拉脱维亚	0	24.3	18.1	15.0	13.6	14.9	12.6	0.7	2.4	2.6
黎巴嫩	0	17.8	18.5	17.9	19.8	18.1	16.1		22.5	19.4
莱索托	1	0.5	0.3	0.3	16.7	8.2	16.5	50.4	44.1	34.2
利比里亚	0	3.8	5.6	2.4	4.3	9.0	10.0		5.9	2.7
利比亚	1	10.6	10.7	10.7	1.8	2.3	1.9		0.0	0.0
立陶宛	0	9.4	6.1	3.9	15.0	14.0	12.0	0.0	2.1	4.3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2	5.0	6.3	6.3	11.0	15.4	18.8	1.5	3.8	4.2
马达加斯加	1	0.4	0.3	0.2	0.8	0.4	0.4	0.4	0.2	
马拉维	1	12.3	2.5	1.9	3.2	2.1	1.4	0.0		
马来西亚	1	5.6	6.6	8.3	3.3	5.0	5.4	0.1	0.3	0.5
马里	1	1.9	1.5	1.1	7.0	6.5	6.2	4.5	3.3	4.6
毛里塔尼亚	1	4.7	2.4	2.9	4.4	3.6	3.4	0.4		
毛里求斯	1	0.8	3.3	3.4	8.8	6.9	10.2	3.3	3.4	2.3
墨西哥	1	0.8	0.5	0.6	5.4	8.8	9.5	1.5	2.7	2.1
马尔代夫	1	15.7	13.0	11.5	16.4	17.0	19.6	0.1	30.3	23.6
蒙古	0	0.3	0.3	0.4	0.1	0.2	1.2		7.1	4.5
黑山共和国	2			6.7			0.0		5.3	7.3
摩洛哥	1	0.2	0.2	0.2	6.2	5.3	8.6	6.0	7.7	7.1
莫桑比克	0	0.9	2.0	1.9	4.1	4.0	4.9	2.6	0.9	1.4
缅甸	0	0.3	0.2	0.2	0.5	0.7	1.1			
纳米比亚	0	7.9	6.6	6.1	7.6	3.4	0.8	0.4	0.2	0.1
尼泊尔	0	2.3	2.9	3.2	3.1	3.1	3.3	1.3	14.9	21.7
荷兰	1	8.0	10.0	10.5	5.0	5.0	6.3	0.3	0.3	0.5
新西兰	1	15.2	17.8	22.0	10.9	13.5	15.5	2.6	0.7	0.6
尼加拉瓜	1	1.0	0.6	0.7	7.2	9.1	11.3	2.4	12.6	12.5
尼日尔	1	1.7	1.5	1.3	1.9	2.0	2.5	0.4	1.9	1.6
尼日利亚	2	0.5	0.6	0.7	0.4	0.5	0.6	2.9	3.0	5.1
挪威	2	4.6	6.6	9.9	3.9	4.6	4.0	0.2	0.2	0.2
阿曼	0	22.7	27.5	29.7	12.4	14.3	0.8	0.3	0.1	0.1
巴基斯坦	0	5.9	2.9	2.4	3.2	2.6	2.7	2.8	3.9	5.5
巴拿马	0	2.6	2.9	3.4	5.9	5.7	4.0	1.4	0.8	0.9
巴布亚新几内亚	0	0.8	0.5	0.4	0.6	0.7	0.9	0.3	0.1	0.2
巴拉圭	1	4.3	3.3	2.5	7.0	7.1	7.5	3.6	3.6	3.7
秘鲁	1	0.3	0.2	0.1	1.3	2.6	3.6	1.1	1.3	1.6
菲律宾	3	0.3	0.4	0.5	3.2	3.8	4.4	7.2	13.2	10.7
波兰	0	3.0	2.1	2.2	9.7	12.0	7.8	0.5	2.1	1.6
葡萄牙	2	4.4	6.2	8.6	15.7	12.2	18.7	3.4	1.6	1.6
罗马尼亚	0	0.6	0.6	0.6	7.1	5.5	11.5	0.0	4.8	2.4
俄罗斯联邦	0	7.8	8.1	8.6	8.6	7.3	7.8	0.6	0.4	0.4
卢旺达	1	1.0	4.8	4.4	4.5	3.0	2.5	1.6	0.8	1.6
沙特阿拉伯	0	29.4	25.6	26.6	1.4	1.4	0.9		0.0	0.1
塞内加尔	1	3.7	2.4	1.7	4.3	3.5	5.0	3.0	9.1	10.5
塞尔维亚	2	1.3	11.4	7.2			2.8		7.9	8.7
塞拉利昂	0	3.9	2.3	1.8	1.6	3.6	4.4	2.7	0.2	3.0
新加坡	0	23.9	33.6	38.7	6.3	9.6	8.7			
斯洛伐克共和国	0	0.8	2.2	2.4	6.6	9.3	8.9	0.1	1.5	1.8
斯洛文尼亚	2	8.9	8.8	8.0	4.3	4.8	6.5	1.3	0.7	0.7
索马里	0	9.6	0.3	0.2	3.1	4.8	8.0			
南非	0	3.5	2.3	3.7	1.1	1.6	1.8	0.1	0.3	0.3
西班牙	1	2.1	4.4	13.8	4.0	2.8	3.3	0.5	0.7	0.8
斯里兰卡	1	2.7	2.1	1.6	3.7	4.0	8.3	6.2	8.2	8.4
苏丹	0	6.2	3.1	2.2	2.1	2.2	2.9	2.5	3.7	2.9
斯威士兰	0	8.3	3.6	3.8	8.5	4.7	13.7	4.9	3.7	2.9
瑞典	1	9.1	11.2	13.9	2.7	3.3	3.8	0.1	0.2	0.1
瑞士	0	20.5	21.8	22.5	6.0	5.5	6.3	0.5	0.5	0.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	5.6	5.8	10.8	3.9	3.7	4.9	3.0	2.9	2.9
塔吉克斯坦	3	8.0	5.4	4.1	6.6	8.6	10.7		20.2	40.0
坦桑尼亚	1	2.3	2.6	1.5	0.8	0.7	0.7	0.0	0.1	0.1
泰国	0	0.7	1.3	1.7	0.5	1.1	1.2	1.0	0.7	0.6
东帝汶	1	1.2	1.1	1.2	0.5	1.9	1.5			
多哥	0	4.4	3.7	3.1	4.6	4.9	5.9	1.1	9.1	10.5
汤加	0	3.2	1.6	0.8	22.4	31	31.5	15.1	26.5	23.7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	4.2	3.2	2.6	14.9	19.4	21.5	0.6	0.6	0.6
突尼斯	0	0.5	0.4	0.3	6.5	5.6	5.8	3.8	4.3	4.5
土耳其	1	2.1	2.0	1.9	4.5	4.6	5.6	2.0	0.2	0.1
土库曼斯坦	0	8.4	5.4	4.1	9.0	7.3	5.1	0.2		
乌干达	2	3.1	2.6	1.9	1.2	2.2	2.3		3.5	5.3
乌克兰	0	13.3	11.2	11.5	14.3	11.8	13.8	0.0	0.7	4.1
英国	1	6.5	8.1	10.4	7.3	6.9	7.7	0.2	0.3	0.3
美国	0	9.3	12.3	13.8	0.7	0.8	0.9	0.0	0.0	0.0
乌拉圭	2	3.2	2.7	2.4	6.9	6.8	9.7		0.4	0.3
乌兹别克斯坦	0	8.1	5.5	4.1	5.9	6.6	6.7			
委内瑞拉	2	5.2	4.2	3.5	1.1	1.4	1.8	0.0	0.1	0.0
越南	0	0.0	0.1	0.1	1.6	2.2	2.5		6.0	7.8
西岸和加沙地带	0	46.0	46.9	49.3			60.4	18.1	17.6	
也门共和国	0	2.9	2.3	2.2	4.3	3.4	4.6	25.4	7.7	4.0
赞比亚	1	3.6	3.5	1.8	2.3	1.6	1.4		0.7	0.3
津巴布韦	0	6.0	3.3	3.0	3.0	2.9	9.3	0.6		

技术注释

表 1：劳动力

• 人口：生活在一国或经济体中人口的数量；以百万计；总量，根据性别分类（三个指标）。数据来自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学估测。数据来源为世界发展指标（WDI），如欲查阅，请登录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TOTL。

• 工作年龄人口：15~64 岁年龄段人口在人口中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总量，根据性别分类（三个指标）。数据来源见表 9。

• 参与率：工作年龄人口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劳动力被定义为参加工作的人口或参照期内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口；以百分比表示。根据性别和年龄组别分类（五个指标）。数据来源见表 9。

• 失业率：劳动力中处于未就业状态的人口比例，未就业人口被定义为某一参照期内正在寻找工作并随时可以参加工作的人口；以百分比表示；总量，根据性别分类（三个指标）。数据来源：KILM，如欲查阅，请登录：http：//www.ilo.org/kilm。

表 2：技能

• 平均受教育年限：15 岁及 15 岁以上所有人口所受最高正规教育的最高平均水平；以所受教育年限表示；总量，根据性别分类（三个指标）。数据是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估测值。Robert J.Barro 和 Jong-Wha Lee 2010 年在其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第 15902 号工作文件《1950—2010 世界教育成就新数据集》中对方法论进行了描述。数据来源：http：//www.barrolee.com。

• 作为制约因素的技能：认为熟练劳动力不足是经营“主要”或“极其严重的”制约因素的公司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数据主要来自企业调查，接受调查的企业至少有五个员工，主要是正规企业。“主要”和“极其严重的”是规模为五个员工的企业的两个最高层次。数据来源：国际金融公司 /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网址为 http：//www.enterprisesurveys.org。

• 教育成就：阅读、数学和科学的平均分数。平均数是 500，标准偏差是 100。来自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数据是评估初期处于 15 岁 3 个月到 16 岁 2 个月年龄段之间的学生的数据。来自 TIMSS（以星号标记）的数据是所有注册受过八年正规教育的学生的全国性代表样本的数据，条件是测试时的平均年龄至少是 13.5 年。TIMSS 不评估阅读的教育成就。数据来源：关于 PISA 数据，请登录：http：//www.oecd.org/pisa；关于 TIMSS 和波士顿林奇教育学院 PIRLS 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请登录：http：//timssandpirls.bc.edu/index.html。

表 3：就业结构

• 各行业就业：基于国际标准工业分类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就业比例；以百分比表示（三个指标）。第一产业如第 1 类（国际标准工业分类修订版 2），表 A 和表B（国际标准工业分类修订版 3），或表 A（国际标准工业分类修订版 4）所述，包括农业、狩猎、林业和渔业。第二产业如第 2~5 类（国际标准工业分类修订版 2）、表 C~ 表 F（国际标准工业分类修订版 3）或表 B~ 表 F（国际标准工业分类修订版 4）所述，包括采掘业（包括石油生产）、制造业、建筑业和公共失业（电、气和水）。第三产业如第 6~9 类（国际标准

工业分类修订版 2）、表 G~ 表 P（国际标准工业分类修订版 3）或表 G~ 表U（国际标准工业分类修订版 4）所述，包括批发零售贸易、餐饮酒店、运输、仓储、通信、金融、保险、房地产、商务服务，社区、社会和个体服务。数据来源：见表 9。

• 公务员就业：公共领域就业总量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公共领域就业包括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SNA）所界定的政府就业总量，包括居民及中央、省（或区）和地方层面运营的政府体系。无论其就业合同的类型，任何由这些机构直接雇用的人均包括在内；国有企业工人不包括在内。数据来源：国际劳工局劳动统计数据数据库关于“公共领域就业”和“就业整体水平”表，登录 http：//laborsta.ilo.org。

• 不同工作状况就业：工资性就业、自就业和农业就业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三个指标）。自就业者包括农业领域之外的雇员和不计其数的家庭工人。数据来源：见表 9。

• 城市地区就业：城镇的就业比例，以百分比表示。城市由国家统计局界定。数据来源：见表 9。

表 4：生活水平

• 不同行业的工资：会计师、化学工程师、公共汽车司机和缝纫工的平均工资；以 2005 年美元年度价格表示（四项指标）。工资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十月调查数据库，并以同年使用地方货币汇率换算的成年工人美元平均月工资率规范格式进行校正。然后，数据使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换算为 2005 年价格。R.H.Oostendorp 2012 年在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背景文件，《世界行业工资数据库：1983—2008》中对方法论进行了描述。数据来源：http：//www.worldbank.org/ wdr2013。

• 工作贫穷人口：极贫家庭的工人在就业总量中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根据 2005 年价格确定的 1.25 平价美元购买力的国际贫困线计算的贫困率界定极贫家庭。使用国际贫困线表明数字可能不能与使用国家贫困线得出的估测数据进行比较。数据来源：见表 9，关于贫困率，请登录：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

• 生活满意度：参与一个调查，并在调查中对接受采访时他们（她们）对生活是否满意时给予肯定回答的人口；以其在所有被调查中的百分比来表示；根据工作状况分类（三个指标）。调查的问题是：“如果考虑所有的因素，你对这些天生活满意度是多少？”备选答案从 1（“完全不满意”）到 10（“完全满意”）。选择 6 或 6 以上选项的相应被视为肯定答案。数据来源：世界价值观调查，1999—2008，请登录：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

• 国民收入的劳动力比例：雇员补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雇员赔偿根据国民账户体系账户 D.1 衡量，国内生产总值根据国民账户体系账户 B.1 衡量。雇员补偿包括现金和实物形式的支付。雇员补偿也包括政府缴纳的、为雇员提供福利的社会保险。数据来源：UNDATA，请登录：http：//data.un.org。

• 收入性别差异：相对于男性工资收入的女性收入（比率）具有相似的性质。估测基于具体国家回归的、以当地货币表示的、受教育年限及潜在经验（及其平方）的月收入对数值，参照工业、行业、城市居所和性别。

Claudio E.Montenegro 和 Harry Anthony Patrinos 2012 年为《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的背景文件《重返教育的世界》对方法论进行了描述。数据来源：见表 9。

表 5：生产率

• 工人人均附加值：每名工人的附加值总量；以 2005 年价格美元表示；总量，并根据活动部门分类（四个指标）。附加值是一个部门产出超出中间净投入以上的部分。这种计算方法没有减掉资产的消耗或自然资源的退化。附加值的概念是由国际标准工业分类（ISIC）修订版 3 确定的。首先使用当前汇率将附加值数据转化为美元，然后使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转化为 2005 年价格。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请登录：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 微型企业就业：在雇员不超过 10 个的公司中的非农就业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某些国家的截止点是 9 个雇员。所有自就业工人和无酬家庭工人都计入微型企业的工人。既包括正规公司，也包括非正规公司。数据来源：见表 9。

• 非正规就业：非农就业中的非正规就业比例，以百分比表示。非正规就业包括非正规领域企业的就业和正规公司的非正规工作，不包括农业就业。原则上，本报告以国际劳工统计会议第 15 次会议的决策测量非正规领域和非正规就业。但是，不同国家的定义和方法论存在巨大的差异。数据来源：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指标，请登录：http://www.ilo.org/empelm/what/WCMS_114240/lang—en/indexhtm 和 Vanek，Joann，Martha Chen，Ralf Hussmanns，James Heintz 和 Francoise Carré 2012。《非正规经济中的男性和女性：统计概览》。《日内瓦的非正规就业女性：全球化、组织化与国际劳工组织》。

表 6：社会凝聚力

• 信任：认为他人可以信任的人口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根据工作状况分类（三个指标）。数字基于对涉及下述问题的调查的响应："一般来说，你认为大多数都可以信任，或者你认为你应该非常谨慎地与他人交往？"参与世界观调查的被采访对象至少为 14 岁，参与拉美晴雨表调查的至少为 16 岁，参与阿拉伯晴雨表调查的至少为 18 岁，参与非洲晴雨表调查的至少为 15 岁。数据来源：世界价值观调查，1999—2008 年度，请登录：http：// www.worldvaluessurvey.org；非洲晴雨表调查，第一轮，2004 年，请登录：http：// www.afrobarometer.org；拉美晴雨表调查，2007 年，请登录：http：//www.latinó－ barómetro.org；阿拉伯晴雨表调查，2006 年，请登录：http：//www.arabbarometer.org/。

• 民事参与：回答说自己参与了社区或国家相关的事务的人口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根据工作状况分类（三个指标）。数字基于涉及下述问题的调查："现在我将宣读一个自愿性组织的名单，请你告诉我对每一个组织，你是否是该组织的积极成员、不积极成员或你不是任何这类组织的成员？"备选的答案包括一系列教堂或宗教组织、体育或娱乐组织；艺术、音乐或教育组织；工会；政党；环境组织；职业协会；人道主义或慈善组织；消费者组织等。参与世界观调查的被采访者至少为 14 岁；参与非洲晴雨表

调查的被采访至少为 18 岁；参与欧洲晴雨表调查的被采访者至少为 15 岁，参与拉美晴雨表调查的被采访者至少为 16 岁。数据来源：世界价值观调查，1999—2008 年度，请登录：http：// www.worldvalues survey.org；非洲晴雨表调查，2008—2009 年度，请登录：http：// www.afrobarometer.org；拉美晴雨表调查，2007 年，请登录：http：// www.latinobarometro.org；欧洲晴雨表调查，2007 年，请登录：http：//ec.eu-ropa.eu/ public_opinion/index_en.htm。

• 工资不平等：每一国家工资分布根据工人汇报的工资和确认的工资发放频率的劳动数据建构。数据来源：见表 9。

• 青年失业：15 岁到 24 岁劳动力中未就业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根据性别分类（两个指标）。数据来源：KILM，请登录：http：//www.ilo.org/kilm。

表 7：政策与制度

• 获得签署的核心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系指签署下述公约的国家数量：有关强迫劳动或义务性劳动的第 29 号公约；有关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的第 87 号公约；关于行使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的第 98 号公约；关于同等报酬的第 100 号公约；关于废除强迫劳动的第 105 号公约；关于就业和行业歧视的第 111 号公约；关于入职最低工资的第 138 号公约；关于取缔最恶劣童工形式的第 182 号公约。数据来源：NORMLEX 数据库，请登录：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

• 最低工资：私营企业主可以为一位 19 岁的、之前没有在经济体中人口繁多的城市中有过就业经验的工人提供的最低收入，以 2005 年价格美元表示。可以通过立法或集体谈判协议达成适用的最低工资。汇报的数字为零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或经济体中没有有法律效力的最低工资。例如可能正式工人有适用的最低工资，但是学徒没有。数据来源：经营指标，请登录：www.doingbusiness.org。

• 遣散成本：与裁员相关的遣散费和其他成本；每位遣散工人的周薪水；1 年和 10 年的连续雇用（两个指标）。作为比较，数字系所有国家中工人和公司的假设成本。工人是男性非行政雇员，收入是经济体的平均工资水平。公司是经济体中人口最多的城市制造业领域中拥有 60 名工人的有限责任公司。遣散成本包括提前告知要求成本、遣散费以及由经济、运营和结构原因引起而非工人个体行为引起的裁员违约金。数据来源：经营指标，请登录：http：//www.doingbusiness.org。

• 工会成员资格：具有工会成员资格的工资工人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数据来源：Jelle Visser，工会制度特征、工资设定、国家干预和社会契约的数据库，1960—2010（ICTWSS），阿姆斯特丹大学高级劳动研究，第三版，2011 年 5 月，请登录：http：// www.uva-aias.net/208。

• 劳动市场政策：用于帮助失业者就业或用于支持失业者或不积极就业人口收入或消费水平等方案的政府支出，以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表示。本报告对其中类型的方案予以考虑：宏观激励政策，提高劳动力需求的措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失业福利，其他社会保障措施，社会对话遵守劳动标准。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 世界一行，应对金融经济危机的政策目录：联合综合报告，mimeo，2012 年 7 月；经合组织（2012）年就

业和劳动力市场：经合组织重要图表，请登录：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LMPEXP。

• 社保缴纳：雇主和雇员用于疾病、年老、工伤和失业等社会保障支付的数额，以其占雇员薪水总额的百分比表示。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SECSOC 数据库社会保障部，请登录：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protection/secsoc。Martín Rama 和 Raquel Artecona，2002，“国家间劳动力市场指标数据库”，国家科学院委员会委托。

• 社保覆盖率：积极参与缴纳老年退休金方案的劳动力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数据来源：Montserrat Pallares-Miralles，Carolina Romero 和 Edwards Whitehouse，2012，“退休金提供国际模式：全球现状和数字概览”，SP 讨论文件第 1211 号。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Martín Rama 和 Raquel Artecona，2002，“国家间劳动力市场指标数据库”，国家科学院委员会委托。

表 8：相互联系性

• 签署的移民公约：表示签署下述公约的国家数量：关于以移民促就业的国际劳工组织第 97 号公约；关于恶劣条件下移民和提倡移民工人机遇平等和待遇平等的国际劳工组织第 143 号公约，《联合国关于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公约》。就联合国公约而言，加入和继承也被视为签署。数据来源：ILOLEX：国际劳工标准数据库（http：//www.ilo.org/ilolex/english/convdisp1.htm；联合国条约资料库，http：//treaties.un.org/ 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13&chapter=4&lang=en）。

• 迁入移民：在国外出生的人口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数据来源：Ozden，Caglar，Christopher Parsons，Maurice Schiff 和 Terrie L.Walmsley 2011。“人口究竟在哪里? 1960—2000 年全球双边移民演变。”《世界银行经济概览》，25（1）：12-56，请登录：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M.POP.TOTL。

• 迁出移民：居住在其他国家或经济体中的本地人口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总人口减去迁入移民再加上迁出人口即为本地人口。数据来源：Ozden，Caglar，Christopher Parsons，Maurice Schiff 和 Terrie L.Walmsley 2011。“人口究竟在哪里？1960—2000 年全球双边移民演变。”《世界银行经济概览》，25（1）：12-56，请登录：http：//go.worldbank.org/JITC7NYTT0。

• 汇款：在国外的工人汇入本国的外国货币，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表示。流入量包括移民工人的当前转移和非定居工人获得的补偿。移民工人的当前转移系指在东道国居住时间超过 1 年的工人的汇款，和工人的移民地位无关。非定居工人获得的补偿系指在东道国居住时间不满 1 年的工人的工资和薪酬。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请登录：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TRF.PWKR.DT.GD.ZS。

表 9　微型数据源

	部分数据库		
	1995	2005	2010
阿富汗		LSSN	
阿尔巴尼亚	LSSN	LSSN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阿根廷	MIX	MIX	MIX
亚美尼亚		LSSN	
澳大利亚	OECD/EU	OECD/EU	OECD/EU
奥地利	OECD/EU	OECD/EU	OECD/EU
阿塞拜疆	LSSN		
孟加拉国		LSSN	LFSN
巴巴多斯岛	LFSP		
白俄罗斯		LSSN	
比利时	OECD/EU	OECD/EU	OECD/EU
伯利兹	LFSN		
贝宁		LSSN	
不丹		LSSN	
玻利维亚	LFSN	LFSN	LFSN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LSSN	
博茨瓦纳			LSSN
巴西	LFSP	LFSN	LFSN
保加利亚	LSSN	OECD/EU	OECD/EU
布基纳法索	LSSN	LSSN	
布隆迪			
柬埔寨	LSSN	LSSN	LSSN
喀麦隆	LSSN	LSSN	
加拿大	OECD/EU	OECD/EU	OECD/EU
中非共和国	OECD/EU		
乍得		LSSN	
智利	LSSN	OECD/EU	OECD/EU
中国	MIX	MIX	MIX
哥伦比亚	CENSUS	LFSN	LFSN
刚果民主共和国		LSSN	
刚果共和国		LSSN	
哥斯达黎加	LFSN	LFSN	LFSN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OECD/EU	OECD/EU
古巴			
捷克共和国		OECD/EU	OECD/EU
丹麦	OECD/EU	OECD/EU	OECD/EU
多米尼加共和国	LFSN	LFSN	LFSN
厄瓜多尔	LFSN	LFSN	LFSN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CENSUS	LSSN	
萨尔瓦多	LFSN	LFSN	LFSN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OECD/EU	OECD/EU	OECD/EU
埃塞俄比亚		LSSN	LSSN
斐济	CENSUS		LSSN
芬兰	OECD/EU	OECD/EU	OECD/EU
法国	OECD/EU	OECD/EU	OECD/EU
加蓬		LSSN	
冈比亚			
格鲁吉亚		LSSN	LSSN
德国	OECD/EU	OECD/EU	OECD/EU
加纳		LSSN	
希腊	OECD/EU	OECD/EU	OECD/EU
危地马拉		LFSN	
几内亚	LSSN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海地			
洪都拉斯	LFSN	LFSN	LFSN
匈牙利	OECD/EU	OECD/EU	OECD/EU
印度	LFSN	LFSN	LFSN
印度尼西亚	LSSN	LSSN	LSS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LSSN	
伊拉克	CENSUS	LSSN	
爱尔兰	OECD/EU	OECD/EU	OECD/EU
以色列	OECD/EU	OECD/EU	OECD/EU
意大利	OECD/EU	OECD/EU	OECD/EU
牙买加	LFSN		
日本	OECD/EU	OECD/EU	OECD/EU
约旦		CENSUS	
哈萨克斯坦	LFSN	LSSN	
肯尼亚	LSSN	LSSN	
基里巴斯		LSSN	
韩国		OECD/EU	OECD/EU
科索沃	OECD/EU	LFSP	
吉尔吉斯斯坦	LSSN		
老挝	LSSN		LSSN

	部分数据库		
	1995	2005	2010
拉脱维亚	OECD/EU	OECD/EU	OECD/EU
黎巴嫩		LSSN	
莱索托			
利比里亚		LSSN	
利比亚			
立陶宛	OECD/EU	OECD/EU	OECD/EU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OECD/EU	OECD/EU	MIX
马达加斯加	LSSN		
马拉维	LSSN	MIX	
马来西亚			
马里	LSSN	LSSN	
毛里塔尼亚			LSSN
毛里求斯		LFSN	LFSN
墨西哥	LSSN	OECD/EU	OECD/EU
马尔代夫		LSSN	
蒙古			LSSN
黑山共和国		LFSN	
摩洛哥	CENSUS	CENSUS	
莫桑比克	LSSN	LSSN	LSSN
缅甸			
纳米比亚	LSSN		
尼泊尔	LSSN	LSSN	LSSN
荷兰	OECD/EU	OECD/EU	OECD/EU
新西兰	OECD/EU	OECD/EU	OECD/EU
尼加拉瓜	LSSN	LSSN	
尼日尔	LSSN		
尼日利亚	LSSN	LSSN	
挪威	OECD/EU	OECD/EU	OECD/EU
阿曼			
巴基斯坦		LFSN	LFSN
巴拿马	LFSN	LFSN	LFSN
巴布亚新几内亚			LSSN
巴拉圭	LFSN	LFSN	LFSN
秘鲁	LFSN	LFSN	LFSN
菲律宾	LFSN	LFSN	LFSN
波兰	OECD/EU	OECD/EU	OECD/EU
葡萄牙	OECD/EU	OECD/EU	OECD/EU
罗马尼亚	LSSN	OECD/EU	OECD/EU
俄罗斯联邦		LSSN	
卢旺达	LSSN	LSSN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LSSN	LSSN	
塞尔维亚			LFSN
塞拉利昂		LSSN	
新加坡			
斯洛伐克共和国	OECD/EU	OECD/EU	OECD/EU
斯洛文尼亚	OECD/EU	OECD/EU	OECD/EU
索马里			
南非	LFSN	LFSN	
西班牙	OECD/EU	OECD/EU	OECD/EU
斯里兰卡	LSSN	LFSN	LFSN
苏丹			
斯威士兰	LSSN		
瑞典	OECD/EU	OECD/EU	OECD/EU
瑞士	OECD/EU	OECD/EU	OECD/EU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LSSN	
塔吉克斯坦		LSSN	
坦桑尼亚	LFSN	LFSN	LFSN
泰国	LSSN	LSSN	LSSN
东帝汶		LSSN	LFSN
多哥		LSSN	
汤加	LSSN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LFSN		
土耳其	OECD/EU	OECD/EU	OECD/EU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LSSN	
乌克兰		LSSN	
英国	OECD/EU	OECD/EU	OECD/EU
美国	OECD/EU	OECD/EU	OECD/EU
乌拉圭			LFSN
乌兹别克斯坦			
委内瑞拉	LFSN	LFSP	
越南	LSSN	LSSN	LSSN
西岸和加沙地带	CENSUS	LSSN	LSSN
也门共和国		LSSN	
赞比亚		LSSN	
津巴布韦			

CENSUS：来自 IPUMS 人口调查数据库的数据。
LFSN：覆盖全国的劳动力调查 。
LFSP：覆盖部分地区的劳动力调查。
LSSN：覆盖全国的生活水平调查。
MIX：人口调查微观数据和家庭调查主要比率结合的数据。
OECD/EU：来自经合组织或欧洲统计局的数据。

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

就业 Jobs

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业能带来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福利，使它们也成为发展的一个推动力。随着人们通过就业摆脱困苦，同时就业赋予女性权力后导致对孩子的投入增加，贫困有所减少。随着就业者对工作越来越熟练，加上生产率较高的工作出现以及生产率较低的工作消失，效率得到提高。由于就业将不同种族和社会背景的人带到一起并为解决冲突提供了其他替代方法，社会变得繁荣。因此，就业机会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副产品，它们还具有转化作用——它们意味着我们的收入、我们的职业，甚至我们的身份。

最迫切的忧虑是青年人的高失业率和未能得到满足的就业预期，但在许多务农和个体经营盛行、社会保障网络充其量只能算说得过去的发展中国家，失业率可以很低。在这些国家，“无就业增长”是非常少见的。大多数穷人工作时间很长，但就是无法维持日常开销，而且侵害基本权利的现象并不少见，因此，就业机会的数量并不是唯一重要的：需要的是发展效益高的工作。

面对这些挑战，决策者们提出了棘手的问题。各国制定发展战略时应该围绕增长，还是专注于就业？企业家精神能否培养出来，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微型企业中能否培养出来，还是企业家与生俱来的？增加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是具备就业能力的前提吗？技能是否可以通过工作培养？在出现重大危机和结构性转变时，受到保护的是不是不仅应该有就业者，还应该有就业机会？一个国家的就业政策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就业机会，这样的的风险是否存在？

《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就业》为这些及其他棘手的问题提供了答案，报告将就业视为发展的推动力而不是派生出来的劳动力需求，同时将各种类型的工作都考虑在内，而不是只考虑正规的雇佣就业。本报告提供的框架跨越了多个领域，并表明最佳的政策应该依据国家的发展水平、禀赋、人口构成和制度的不同而不同。基本原则在所有情况下都很重要，因为它们能使私营部门充满生气，私营部门在全世界都是就业最主要的来源。劳动力政策能起到辅助作用，即使它们不如通常假设的那么重要。最终，发展政策——从使小型农业能够生存下去，到促进高效城市的发展，再到鼓励参与全球市场——是成功的关键。

上架建议：就业、世界发展

ISBN 978-7-302-33657-0

9 787302 336570 >

定价：148.00元

世界银行